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世界文学史

第七卷 · 下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321-5103-5
9 787532 151035 >
定价：235.00元
（上下二册）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世界文学史

第七卷 · 下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史. 第7卷/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蔡捷等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2(2014.7重印)
ISBN 978-7-5321-5103-5
Ⅰ.①世… Ⅱ.①俄…②蔡… Ⅲ.①世界文学-文学史
Ⅳ.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8630号

责任编辑：徐华龙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世界文学史·第七卷
〔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蔡捷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71.5 插页 8 字数 1,283,000
2013年12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03-5/I·4020 定价：235.00元(上下二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7780459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ОМ СЕДЬМО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91

第三编　中欧及东南欧文学

本编序言

中欧及东南部欧洲各国文学的进程十分相似，这是由于它们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历史命运十分接近。这样的共同性也体现在十九世纪下半叶。

当时，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民族解放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等国最终都得以解决。隶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众斯拉夫民族（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于这个时期在民族文化发展领域获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1867 年，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统治阶级间协约的基础上建立了奥匈二元君主制国家。但是这些事件并不是发生在该段历史时期（被考察的时期）内，而对于民族独立问题的态度则成为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整个精神生活的一大特征。波兰的情况较为特殊，它的土地曾被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瓜分。

该地区几乎每个国家在这个历史时期中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日期。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日期甚至是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如，1878 年保加利亚解放，同一年独立的罗马尼亚建立，1867 年奥匈二元君主制国家建立，1863 年波兰起义）。在半个世纪中，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历史因素发挥着作用。这些因素使得这一发展阶段显得尤为特别。这些因素是在民族解放斗争问题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一问题甚至在取得了国家和政治独立之后也没有很快地消失。十分相似的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历史特征，首先包括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这一发展进程在大多数国家因受到强大的封建主义残余的阻碍而停滞——和与之相关的尖锐的农民问题。

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审美意识加速，或者说紧凑发展的阶段，因为之前的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民族压迫环境不适合它（审美意识）的发展。然而，当我们在谈论类似过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指加速经历西欧文学之前所经历过的那些阶段。该地区的文学中现实主义——它的形成乃

是该历史时期文学生活的一大基本特征——并不与浪漫主义相矛盾，而更多的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改造了后者。以前众多流派，如启蒙主义、感伤主义等，未完全形成的、被压制的一些趋向有时也被吸收进来。

与此同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过程既不同步，也不相同。确定该地区各国文学间共同的类型化特征并不抹煞其各自的，有时也是十分显著的民族特征。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各国与被哈布斯堡王朝占领的各国在传统和文化情境上有很大不同。该历史时期内文学发展模式最接近西欧的是波兰。然而，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它对于浪漫主义发展所作的独特贡献十分重大的话，那么在六十至八十年代将现实主义确定为主导流派则有些滞后——即在西欧实证主义繁荣，自然主义趋向形成的时期，且这两者对于这一过程产生了影响。八十年代现实主义渐趋成熟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完成的。

位于历史发展的另一极上的是阿尔巴尼亚文学。在封建主义时期，阿尔巴尼亚遭受了奥斯曼帝国最为残酷的压迫。只有到七十至八十年代才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此时的文学还带有启蒙主义特征。卢日昌塞尔维亚人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也快速进行着。

468 ·

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文学都呈现出各种流派互相交错、浪漫主义传统持续发展的特征，在该时期末期，批判现实主义流派渐渐占了主导地位。

在地区内部还持续保有众所周知的斯拉夫众文学间的亲近性。斯拉夫民族间在种族和语言上的亲缘关系催生出更高层次的文化联系。但是相比于前一个时期来说，在这一时期斯拉夫民族之间相关性的观点并不鲜明，虽然这些观点并未完全失去自身的吸引力而通过变体得以呈现。精神价值的交流变得更加强烈。浪漫主义在各国文学中的快速发展使得拜伦、海涅、雨果、裴多菲、密茨凯维奇、莱瑙等人的名字变得十分风靡。对于现实主义形成过程中的这一阶段来说，西欧的文学巨匠中最为重要的或许要数狄更斯了，他的知名度尤为重大。但是对于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斯拉夫国家的现实主义的形成最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文学和革命民主主义批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中最为流行的是果戈理和屠格涅夫，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该地区大部分国家中的流行度和影响力则要来得晚些。

对于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帝国中各民族文学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毫无疑问的是，在备受艺术上被德意志化损害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和德国文化的亲近性也带来了正面的影响。

自然而然的是，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学是在民族文化总体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完成历史运动的。但是比喻修辞的形式和各种艺术种类的发展水平并不是同步的。比如，波兰在前一个时期达到了类似的同步（浪漫主义诗

歌——肖邦的音乐),而相反的是,实证主义思想的传播在造型艺术和音乐方面却成果寥寥。在捷克则形成了另一种情形。内耶德利认为"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捷克民族史和捷克文化史上最为突出的一大事件。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中有三大艺术家,直到现在他们还仍旧是捷克艺术最伟大的经典作者:他们是文学界的扬·聂鲁达,音乐界的贝德瑞赫·斯美塔那和绘画领域的约瑟夫·马涅斯"。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和谐,但是民族文化各领域的代表们也都在进行着复杂的共同创作。

在诸如波兰、匈牙利等国,文学领域的复杂进程很大程度上与铲除贵族的革命性,以及与在快速资产阶级化的社会中社会力量的重新分配相关。并非偶然的是,有时候对于正在成长起来的追名逐利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病态的独特洞察力正是浪漫主义作家的特征。他们往往倾向于将拯救的希望寄托于过去,而非未来。世纪下半叶,在该地区的众浪漫主义作家那里,我们听到了悲观主义的,有时候是悲剧的调子。可以引为例子的有诺尔维德、瓦依达、马达奇、爱明内斯库等。

该时期浪漫主义在各国文学中的发展水平和特征都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各国文学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这一文学流派极为重大的影响,而这一流派在这些文学中的功能则是大体相同的。浪漫主义的繁荣首先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白热化相关。众所周知的是,该时期浪漫主义在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发展呈现出了如之前匈牙利浪漫主义所具有的诸多特征。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捷克、波兰的文学中,浪漫主义在世纪的下半叶不但没有失去(在任何情况下,在这一时期的初期)其对文学进程的影响,且获得了全新的特质。

不顾一切地想将陈腐标准保持不变的追求导致了跟风模仿。但是,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十分典型的,渗透着深刻的乐观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诸多特征却在保加利亚文学,以及部分地在南斯拉夫文学,特别是在塞尔维亚和现代希腊文学中得到了延续。

在其他国家的艺术家们那里,在对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和深广的历史回顾面前,解放问题这一主要政治倾向如今退居次要位置。典范的全民族特征改变了,它们逐渐丧失了自己重大而深广的意义,成为这个或那个团体的财富,并且有时候还激烈地自相矛盾着。如今,浪漫主义诗人们较少地对人民生活中的具体历史事件,甚至是那些与民族解放斗争——它曾一度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一大重要主题——相关的事件进行回应。

在对人类的历史命运进行思考的过程中,浪漫主义诗人有时候达到了很深的深度,展现了深刻的洞察力,并且揭示了十九世纪新出现的、极为现实的冲突(比如,爱明内斯库在其长诗《皇帝与无产者》中思考了由巴黎公

社带来的新的历史经验)。在这些诗歌中,出现了有关真正的文化价值和资产阶级社会不相容的观点(如马达奇的《人的悲剧》)。

诗歌延续并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为浪漫主义文学所具有的创造概括性的象征形象的倾向。在这个时期的浪漫主义诗歌中,艺术和诗人的主题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出现了有关艺术的自我价值的思想,虽然这些思想并不像在法国诗歌中那么流传广泛。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在寻找新的诗歌形式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隐喻得到了丰富,词语的多义性和各种表达手段得到了更灵活的运用)。这一时期诸多诗人的创作对于二十世纪诗歌艺术探索显得如此重要也就并不是偶然的了(比如,诺尔维德、爱明内斯库、瓦依达、聂鲁达)。

在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中我们有时能够听到对于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那心胸狭隘、唯利是图之本质的激烈批判。从民族期望的统一体和全民族在追求民族解放过程中结成的欢庆联盟中脱出身来使得作家们能够更加深入地观察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得不能容忍的尖锐的社会矛盾。而这又导致了对于历史现实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和对其进行分析思考。对于民族思想的态度的改变使得作家们更加认真地思索民族界限之外的情况,并使其将本民族之命运视作世界历史之一环来进行思考。由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作家们开创的这一方面成为了世纪下半叶各国文学(波兰文学、捷克文学、匈牙利文学、罗马尼亚文学)中诗歌发展的重要特征。可以认为,新的历史条件改变了文学理解人性的角度。备受异族奴役并起身奋勇反抗的公民形象如今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在一定程度上备受各种社会压力煎熬并为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同时又在生与死面前思索永恒的精神和道德价值以及自己在世上的命运问题的个人形象。

如今以新特征显现的民族解放问题本身,也引发了对于人民生活更为深入的观察,对于人民的过去、未来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进行更为冷静的思考。这些诗歌以浪漫主义作为开端并结合现实主义元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诗歌类型,这一类型对于后代来说显得尤其具有前瞻性。可以归入这一类的诗人有:波特夫、伐佐夫、聂鲁达、捷赫、奥尔萨格赫维兹多斯拉夫、阿什克尔茨、阿兰尼等。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地区十九世纪下半叶文学的一大特征乃是诗歌占据着相比于在西欧各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中更为重要的地位。在长诗和组诗中常常会阐发十分重要的现代观念并提出规模宏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在这种诗歌作品中,现实主义以一种特殊的、为诗歌独具的、同时也是少有人研究的方式渐渐形成。浪漫主义主人公退居次要地位,诗人们则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看待世界的现实主义眼光。在这里只要说出聂鲁达和哈列克、阿

斯内克和科诺普尼茨卡、赫维兹多斯拉夫、尚蒂奇、阿什克尔茨、伐佐夫和斯拉维伊科夫等人的名字便已足够。诗歌常常涉足以往“粗鲁散文”所在的领域，甚至于在某些情况下涉足新闻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不仅是在和长篇及中篇小说，也是在和随笔及小品文竞争。在诗歌体裁中展现了城市下层人民生活的图景或者表现了农村中尖锐的社会冲突（在各国文学中这些主题正是在诗歌中首次得到了深入地挖掘）。在诗歌中，正像在散文中那样如此积极地挖掘被压迫者和贫苦者的内心世界。

对于人类情感的分析态度，更加具体的特别是社会的原因解释将许多诗人的诗引向现实主义诗歌总体上经历了某种“史诗化”过程。小型史诗体裁开始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一些，比如“图画”（科诺普尼茨卡正是如此称呼自己的生活素描的，它们有时也被称作“诗体短篇小说”）。赫维兹多斯拉夫将自己的诗歌称作小型史诗，类似的体裁也能在如阿什克尔茨、哈列克、伏尔赫利茨基、海杜克等诗人那里遇到。与小型史诗的新功能相关联的还有叙事诗体裁的广泛流行。 · 470

与小型史诗一样，大型史诗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浪漫主义长诗不同的是，如今这种体裁具有了历史具体性，特别是在处理当代生活素材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同时，作家们延续了浪漫主义的传统，及其高远理想的激情，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热和对大规模实现民族命运的不懈追求。如今，这种民族命运越来越被诗人们视作人类整体命运中的一环。聂鲁达、捷赫、伏尔赫利茨基、诺尔维德、爱明涅斯库、阿兰尼、马达奇、瓦依达等人诗歌中世界历史的主题和以往世界文化的形象正是从此发端的。因此，诗歌经历了独特的向现实主义转变的过程，它深入把握当代重大问题，用历史主义看待事件，采用宏大的、包容面广泛的艺术形式（长诗、组诗），并且用分析的方法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

散文领域现实主义的确立在某些情况下（波兰）是和实证主义思想相关联的。然而，和外在于社会现实的西欧实证主义不同的是，波兰的实证主义中保留了有关艺术的社会功能的思想，尽管后者有着功利主义倾向的局限性。这一点在“带论题文学”的广泛流传中得以显现，而这样的文学是力求纯粹的科学公正的法国实证主义所完全不能接受的。需要指出的是，“波兰的实证主义首先不是哲学性质的，而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性质的流派，是一个推出整套‘基础工作’规划的流派”（戈尔斯基）。这是对于1863年起义失败的一种回应。

与此同时，在一些国家中为争取现实主义美学而进行的斗争受到了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们的强烈影响，并且纷纷涌现出与之相似的人物（波

特夫、卡拉维罗夫、捷克的“五月派”，塞尔维亚的马尔科维奇等）。

在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中，现实主义经历了由表面描画到大规模艺术概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浪漫主义传统和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开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与此同时，对于解决民族爱国主义和教化任务的不懈追求还与该时期现实主义中各种理想化的倾向（波兰“带论题”的长篇及中篇小说，匈牙利的“民族爱国”学派，捷克的马萨里克“现实主义”）相联系。通向成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并非直接而平坦，而该地区大多数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高潮则在我们考察的这一阶段之后才到来。

伴随着现实主义的发展，体裁系统也发生了最根本的变化。在此之前几乎处处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如今却在很大程度上让位给了散文。从这样或那样的“生理特写”的形式中，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小型体裁获得了新的可能性。这些体裁的主题也有所扩展：社会下层阶级的代表、被压迫者和贫苦者的形象受到了它们的关注。作家们逐渐摆脱了在前一个阶段描写人民时常具有的理想化因素和感伤倾向，并且更加深入地考察在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复杂而尖锐的冲突。社会各阶层的，城市和乡村的，每个国家各个拥有独特历史和文化的地区的生活面貌都在文学中得到了体现。

在社会生活散文领域（卡拉维罗夫，菲力蒙等），作家们确立了直接刻画生活环境和被最为清晰地表达的社会冲突及社会类型的目标。然而，在各领域中，比方说，在法国自然主义中不同的是，并没有指望艺术的公正性。公开的片面性才是这种文学的特征，其中有强烈的批评，有时候是讽刺的氛围。总的看来，讽刺的意义在散文和诗歌中的凸显对于这些国家文学的这一发展时期来说极为重要。在一些国家的文学中，相比取材于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来说，小型题材在艺术上显得更加成熟，且在现实主义深度上更进一步。对小散文形式进行系统地汇编的倾向也十分重要。它使得在短篇小说的框架内描画深广的社会现实和在对人类及社会生活一系列重大问题方面进行整体思考成为可能。系统汇编形式的采用催生了如聂鲁达的《小城故事》，康斯坦丁诺夫的《甘纽大叔》等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如今，长篇小说开始跃居重要地位。该地区所有国家文学共同经历了471·这一过程，但是它的速度和特征却是因国而异的，因为各个国家的原初状况是不尽相同的：波兰文学中，长篇小说在十八世纪就已存在了；然而，比方说，在保加利亚文学中，此时才出现第一批长篇小说体裁的作品。

和民族解放斗争问题相关联的有这一时期在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文学中历史小说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正是这一体裁所获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这些国家文学对世界文学进程所作的最为重大的贡献（显克微支、伊拉塞

克、舍诺阿、伐佐夫)。这种小说的结构(这里可以指结构类型的总特征)和沃尔特·司各特、雨果的作品,福楼拜的《萨朗波》以及迈耶的小说不同。该地区的作家们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驱使下写作历史小说的,它们的这一特征也决定了其以教育功能为主,并且较少与读者产生情感交流。难怪显克微支要说,他的小说是为"拥护民族精神"而创作的,而伊拉塞克的声明也与之相呼应:"我们特别需要回忆自己民族的历史,它给予我们力量,激发我们采取行动"。十分重要的是,这一类型的小说正是和民族历史息息相关的。绝非偶然的是,普鲁斯根据古埃及历史资料写作的《法老王》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小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二十世纪历史哲理小说的诸多特征。对于所刻画的历史时期及其在民族历史中的作用所采取的确定的、自成一体的观点导致了创作宏伟英雄系列倾向的出现(显克微支、伊拉塞克)。这些系列并不是由情节,而是由统一的激情和一致的历史观念结合在一起的。与民族解放斗争的主题相并列的是人民反封建起义的主题(伊拉塞克、舍诺阿)。群众运动的场景和各主人公自我牺牲的英雄事业都被作家们以史诗般的恢宏气势加以描绘。人们常常将显克微支或者是谢诺阿的作品与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加以比较。它们之间的相近性实在是显而易见的:惊险的故事情节,十分生动的历史描绘,情节及主人公思想中的诸多浪漫主义元素等。不过,与司各特的"中间人"不同的是,它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并对其进程产生影响。爱情故事在这些作品中并不决定情节的发展,甚至有些时候完全退居次要地位。

尽管在历史小说中有不少浪漫主义的特征,但是它还是在各地区文学现实主义体裁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小说解决了那些对于现实主义小说整体而言极为重要的艺术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揭示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

描写当代生活的小说体裁尽管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有过改良,但是它的形成过程却十分艰难和滞缓。在历史的跨度中,社会生活呈献给作家们的是一些普遍特征,在作家接近当代生活的时候,社会生活显得不重要了,失去了自身内在的关联性并分裂成一些风俗画。然而,在小说中,作家们却在竭力寻求以看待世界的综合眼光,来解释个体命运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展现人的个性并力求解决一些事关全人类的问题。

在该历史时期中,描写当代生活的社会小说在那些不曾拥有这一体裁的各国文学中渐渐勃兴(捷克的阿尔别斯、斯维特拉;匈牙利的米克沙特、托尔奈;克罗地亚的科瓦契奇等)。

如果说对于情节和对现实材料广泛的囊括力之间有机关系的探求往往会导致作品流于编年史的形式的话,那么要保持描绘现实和思考现实之间

的艺术平衡同样绝非易事。在现实主义形成的早期阶段，对于社会现实的热切参与倾向常常表现在那些所谓的“论题小说”的形式中。波兰文学中不仅形成了这类小说的美学标准，而且还出现了该类小说最为犀利的变种(如奥热什科娃的小说)。“论题小说”的理论和实践最早会在波兰文学中遭遇崩溃并非偶然。早在奥热什科创作的成熟期以及普鲁斯的创作中对于该类小说而言十分典型的、存在于艺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之间的矛盾问题便已得到了解决。诸如奥热什科的《尼曼河上》和普鲁斯的《玩偶》等作品乃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成果，是这一地区文学中描绘当代生活，并对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深入分析的社会心理小说的新类型。按照其特征来说，这些小说最接近同时期的俄罗斯小说。我们在此不仅可以列举托尔斯泰，首先是其《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冈察洛夫的各部小说。这一类型学上的相似体现在对于当时社会生活动态的广泛囊括，体现在对于当时最尖锐问题的提出，体现在美学问题的重要性和对于主人公精神探索的关注上。与这些本质特征相关联的还有寻求对于主人公的心理作更为精细的揭示。这样一种寻求不仅体现在广阔的社会领域中，也体现在像显克微支《毫无规则》之类的特殊心理小说中。使得波兰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相接近的一点还在于两者都凸显人的社会责任问题的重要性。

472・

除了与俄罗斯文学的相近之外，该时期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的另一大特征是深受自然主义，尤其是左拉作品的影响。然而，自然主义的影响丝毫未能减弱各国文学社会批判的锋芒，对于现实不作评价的思想是和这些国家的文学格格不入的。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尖锐的社会讽刺文学(哈弗里切克鲍罗夫斯基，卡拉迦列，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创作)占据了特殊的位置。此处值得一提的还有现实主义讽刺文学的出现与发展，它在文艺观念方面和流行于早先阶段的启蒙主义讽刺文学以及在此时的文学中还占据一席之地的浪漫主义讽刺文学不同。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一地区最主要的新特征——现实主义形成并快速发展，且最终在各国文学中均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一章 波兰文学

1. 1848—1863 年间的波兰文学

在波兰历史上从 1830 年革命到 1863 年革命为止的这段时期还完全属于贵族解放运动时期。无论是 1846 年的克拉科夫起义，还是 1848 年的波兹南起义和西加利奇的爱国运动都未能给波兰人民带来民族解放。

在俄国(波兰王国)、奥地利(加利奇部分)、普鲁士(波兹南公国)瓜分下变得四分五裂的波兰在贵族的带领下为解放领土进行斗争,并破坏了那些欺压自己的帝国的君主制根基。这也使得波兰成为了欧洲解放运动的先锋。列宁曾经说过,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波兰贵族的解放运动不但从全俄的、从全斯拉夫的民族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的民主事业来看,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

1846—1849 年的震撼体现在了所有波兰文学家的变化中。他们中的一些与民主决裂并加入了反动阵营,另一些在厄运中挣扎并在浪漫主义中寻求避难所,而大部分人在反动派的压迫下陷入了低谷。

虽然移民人数又有了新的增加,然而 1848 年后移民已经无法发挥昔日的杰出作用。1852 年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利沃夫出版了新的杂志《作家日志》,在这份杂志的周围聚集了民主派别最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1860 年在杂志上发表了乌叶伊斯基的《利沃夫的来信》,这是当时抵抗反动文学的最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品。

这一时期波兰文学发展的另一根据地便是俄罗斯帝国的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地区。农奴问题的尖锐性使知识分子(包括波兰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并使一批作家(例如,克拉谢夫斯基、科热尼约夫斯基、塞罗科姆拉)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色彩愈加浓烈。

1848 年波兰浪漫主义在侨民作家的创作中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后便开始逐渐衰弱,虽然直到 1863 年它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这首先表现在承认诗歌是最重要的文学体裁这点上。诚然,散文已经取得了成绩,然而无论是在作者还是在读者的意识中,正是由于诗歌与浪漫主义的反抗气概有着传统的关联,因此比起中篇、长篇小说,诗歌获得的评价更高。

在 1846—1863 年间波兰积极浪漫主义流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加利奇诗人:乌叶伊斯基和罗曼诺夫斯基。

科尔涅利·乌叶伊斯基(1823—1897),从模仿密茨凯维奇的十四行诗和维克多·雨果的诗歌创作经验起家,后来成为了斯洛伐茨基最出色的追随者之一。以"圣经"风(波兰浪漫主义的体裁之一)的形式表现革命情绪使得乌叶伊斯基的诗歌与众不同。他最重要的作品是《耶利米的抱怨》(1847)。诗人以《圣经》先知的形象悼念了在"加利奇大屠杀"中牺牲的人,正是这一流血事件镇压了克拉科夫起义。诗人在世的时候他的诗集《无香花》(1848)闻名于世。他还写下了诗集《为了莫斯卡尔人[1]》,其中的诗歌发

[1] 莫斯卡尔人,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中俄罗斯人的别称。——译注

扬了贵族革命家的优良传统,成为了1863年起义前夜起义者号召波俄两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沙皇专制的口号。

"雷雨前的诗人"、斯洛伐茨基的追随者中最具特色的要数梅契斯拉夫·罗曼诺夫斯基(1833—1863)。诗人于1863年的一场起义战役中壮烈牺牲。他的长诗《松契来的姑娘》赞颂了1655年波兰手工业者和商人抵御瑞典侵略的英雄事迹。然而无论是对于诗人自身,还是对于那一时期的波兰浪漫主义来说,他写的爱好自由的颂诗、颂歌、圣歌、祷文、歌曲以及公民爱国诗歌形式的作品则更为典型。在这些作品中祷告英勇的自我牺牲与预感灭亡形影相随。即便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取得了成就,波兰浪漫主义在这一时期却已日薄西山。它在形式上也趋于枯竭,模仿的趋势占据了上风。在书刊检查制度的压迫下,波兰诗歌从未如此广泛地推广寓意语言。在这种寓意语言中牢牢地固定了许多象征符号,它们经常演化为刻板的模式。

在这种文学环境下,对民间口头创作,尤其是民歌的加工则成为了诗歌创作的重要趋势,因为民歌是最具有宣传和动员效果的体裁。当时在这一领域活跃着两位著名的诗人——莱纳尔托维奇和塞罗科姆拉。

特奥菲利·莱纳尔托维奇(1822—1893)在波兰文学中被称为"马佐夫舍的里拉[①]歌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莱纳尔托维奇在马佐夫舍收集民间文学,而这些收集成果也决定了诗人创作的最重要特征。民间的视角和民歌的诗体使得诗人避免了多愁善感,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抒情的亲切感。这种情感在他最著名的诗集《里拉》(1855)和《新里拉》(1859)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863年起义的题材则出现在诗人最激进的一篇作品——《马尔钦·博列里约夫斯基列列维里》(1865)中。莱纳尔托维奇翻译过普希金和缪塞的作品,还翻译过但丁的《神曲》。这位波兰诗人侨居法国和意大利并最终客死他乡,他的作品在这些地方被翻译的数量最多。

弗拉季斯拉夫·塞罗科姆拉(真实姓名路德维希·康德拉托维奇,1823—1862年)自称"农村的里拉歌手"。诗人出生在并不富裕的小贵族家庭,大半生的时间都生活在农村。诗人初登诗坛便以加温达诗《邮递员》(1844)一鸣惊人,诗歌的俄语译本《当我还是一名邮局的驿站车夫……》也备受人们的喜爱。

加温达诗是一种模仿口头叙述、通常以诗体形式出现的文学体裁,也是波兰浪漫主义作家最喜爱的体裁。当反动作家经常在加温达诗中颂扬小贵族的旧传统时,塞罗科姆拉则在诗中揭露社会的不公。诗人描写农奴悲惨

---

① 东欧的一种弦乐器。——译注

命运的叙事诗以及所有六篇组诗《加温达诗和诗篇》(1853—1860)都充满了社会批判，这明显遵循了训诫教育讽刺作品的传统。

与加温达诗的创作同时，塞罗科姆拉和莱纳尔托维奇还热衷于“插画体”诗歌的创作，后者则成为了科诺普尼茨卡现实主义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除了这种诗歌与散文在体裁上的契合之外，在塞罗科姆拉的创作中现实主义趋势还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对民间诗学的探索，在诗歌中补充口语语调，以及用词、形式的朴实等等。但是总体上他的作品还是属于浪漫主义，他的诗作《疯人院的旋律》(1862)充满了辛酸的哀痛，成为了浪漫主义在诗人创作中的最佳体现。塞罗科姆拉的众多诗歌翻译促进了波兰与西欧、俄罗斯的文学交流。

奇普里安·卡米利·诺尔维德(1821—1883)在波兰第二代浪漫主义作家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在诺尔维德同时代的波兰诗坛中，他的创作可谓是独树一帜。他出生在小贵族家庭，并在华沙的一家贵族中学接受了教育。1842 年诗人迁居国外，自此过上了在世界各地漂泊的日子。他拿过雕刻家的刻刀、画家的画笔、伐木工人的斧凿，以此来维持生计。他在巴黎生活了三十多年。在巴黎这位耳聋、孤苦无依、被世人遗忘的老人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在这之前诗人还去过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英国，1852 年他还去美国碰过运气。1847—1848 年他在罗马与克拉辛斯基为友，然而在这几年教权主义圈子里的人对他的影响更大。在巴黎诺尔维德还结识了傅立叶、圣西门、蒲鲁东等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家，这一思想在诺尔维德身上与基督教人文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在巴黎诗人还与密茨凯维奇、斯洛伐茨基、肖邦有过交往，为了纪念这份友情诗人在 1856 年写了回忆诗集《黑花》。在那里诺尔维德还结识了巴枯宁、赫尔岑、屠格涅夫、黑尔韦格等作家。与世界民主侨民人士的交往削弱了诗人与教权主义贵族们的联系，但却没有使诗人根本地改变自己的看法。诺尔维德努力使自身独立于侨民组织之外，这是同胞与他疏远的原因之一。

· 474

为了响应欧洲人民的起义，诺尔维德创作了长诗《还有话》、《前夜》(1848)。虽然诺尔维德也指责专制独裁与农奴制，但与密茨凯维奇不同，他却否定了革命暴力的必要性，并把个性的道德自我完善视为进步的保证。诗人认为在人类自我完善中艺术以及艺术与劳动的结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普罗密特迪安》,1851 年)。他发表的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攻击，被人指责为“风格模糊”和“错综复杂”。诺尔维德只出版了不多的作品，许多出色的作品生前都未能付印：抒情诗集《小手册》(1865—1866 年，部分内容于 1901 年才问世)；哲理史诗《阿松塔》(1870 年，出版于 1907 年)；短篇随笔《辛格里沃尔特勋爵的秘密》(1877 年，出版于 1902 年)；《印章》

(1883年,出版于1904年)以及一系列未完成的长诗和剧本。

诺尔维德遗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抒情诗,特别是那些歌颂杰出人物和卓越事迹的诗歌。这些人和事象征了崇高的文化和对人类的挚爱:《拜姆记忆中的哀曲》(1851年,出版于1910年);为纪念密茨凯维奇而写的诗《你为雅典做了什么……》(1856年,出版于1908年)、《斯巴达》(1857年,出版于1907年);为悼念美洲黑人的保护者逝世而写的《约翰·布朗》(1863),以及《肖邦的钢琴》等等。

捍卫真正的人类品质的豪迈气概与对无情践踏这些品质的当今社会的讽刺是诺尔维德笔下的两个极端。诺尔维德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并没有触动他的同胞,与其说这些人受苦于资本主义的祸害,不如说他们是在遭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罪。

与其他同时代的波兰浪漫主义作家一样,诺尔维德自诩为密茨凯维奇、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的追随者,但却不是模仿者。他的作品的的确确是原创的,甚至在对于爱国主义的理解上。在诗歌《我的祖国》(1861)中,波兰对于诗人来说只是整个宇宙家园的一部分。诺尔维德是一位深受欧洲文化历史鼓舞的诗人,也是一位在往昔的岁月中洞察现实生活的浪漫主义作家,更是一位把全人类的道德基石看得与对波兰的忠诚同样重要的道德说教者。因此,波兰政府长时间地与他断绝了关系。

诺尔维德好奇地观察着文明世界的弊病,然而折磨着诗人的各种思考却因为语言的复杂性而不为人们理解。诺尔维德语言多义,像一条抛物线一般,确实非常难懂。诺尔维德的诗句略显粗糙,带着独特的递降的语调,这与其说让人印象深刻,不如说使人感到惊讶。另外,他个人对韵和传统作诗法的其他条条框框的摒弃也使读者感到讶异。然而,对奇谈怪论的青睐,智力游戏,对思想的形象化展开进行出人意料的省略或是增加,言简意赅却又冗长累赘,少量的暗示与演说交替出现,所有这些技巧在后来对于波兰文学界都是受益匪浅的。

诺尔维德非常了解法国高蹈派诗人,使诗歌意象饱含雕塑艺术的印象也使得诺尔维德与他们格外亲近。诺尔维德还研究过诗歌手段的结合性,早在兰波之前他就在《琴斯托霍瓦诗集》(1851)中将字母与物体外形、概念与颜色联系在了一起。他比法国诗人更早地开始广泛实践无韵诗,并在马拉美之前就提出了"沉默理论"。在寻找新的体裁形式时他还形成了自己的戏剧理论,在这些新的体裁形式中他把将现实性与诗歌融为一体的"高喜剧"看成是与自己最为亲近的体裁(例如他的短剧《贵妇人的钻戒》,1872年,出版于1933年)。

诺尔维德是一位杰出的创新者,他引领了波兰诗歌的发展。作为波兰

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自己的祖国诺尔维德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初才得见天日。自此诺尔维德才开始影响波兰诗歌，他在国外的声誉才被承认。（里尔克、纪德等评论）

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波兰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内心需求要求首先阐述日常生活，洞察现实环境。这促使一大批作家转向现实主义立场，把散文视为首选体裁，促进了大型叙事文体的发展。

· 475

波兰文学现实主义流派的奠基人是克拉谢夫斯基和科热尼约夫斯基。

约瑟夫·伊戈纳茨·克拉谢夫斯基（1812—1887）一生著书五百余卷。作为一位散文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他不仅是世界文坛著述最丰富的作家之一，还是一名出色的文学评论家、政论家、学者、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他的遗著中最珍贵的当属中篇和长篇小说（一百四十四部社会生活小说和八十八部历史小说）。

克拉谢夫斯基饱览巴尔扎克、狄更斯、果戈理的作品，这极大地巩固了作家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为了使日常生活的画面在“后世”永垂不朽，克拉谢夫斯基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变化，他在自己创造的社会关系中寻找着一把打开人类奥秘的钥匙。在波兰散文领域现实主义流派始于克拉谢夫斯基的中篇和长篇小说，作者在其中缅怀了农奴的苦难生活（《萨夫卡的故事》，1842 年；《乌兰娜》，1843 年）。

在批判农奴制的同时克拉谢夫斯基也担心资产阶级习气的侵蚀。然而他批判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了封建贵族阶级。他的许多作品都揭露了封建贵族阶级的道德败坏、寄生退化。较之其他的作品，长篇小说《神奇的灯笼》（1843—1844）、《两个世界》（1855）、《世纪的病痛》（1856）更大地促进了现实主义的确立。一般来说，克拉谢夫斯基的散文形式多样，融合了不同的创作倾向（他的创作中有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甚至还有自然主义的作品）。

克拉谢夫斯基以一系列的半报道式的中篇小说回应了 1861—1864 年波兰王国的动乱。这些作品是作者侨居德累斯顿时所作，从华沙被驱逐了以后作者就在 1863 年迁居到了这里。其中最著名的是中篇小说《老城的孩子》（1863）。

在遭遇了十九世纪里第三次起义失败以后，克拉谢夫斯基开始将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救国方案对立起来，后者与实证主义论点有着紧密的联系。克拉谢夫斯基没有停止抨击专制制度、封建贵族和教会反动势力，他在一些所谓的政治小说集（《杂种》，1867—1868 年；《在浑水中》，1869 年等作品）中坚决地号召同压迫者进行道德斗争。

克拉谢夫斯基最出色的历史艺术作品要数以十八世纪撒克逊王朝为题


安得留里为克拉谢夫斯基《古老的传说》所作的插图 版画 1900 年

材的小说：《科索伯爵夫人》(1873)、《布吕尔》(1874)、《华沙村长》(1875—1876)。克拉谢夫斯基的历史散文以文献性和对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历史的批判性解读而著称。历史特集由二十九部小说组成，写于1876—1886年间。其中第一部小说《古老的传说》(1876)讲述了发生在公元九世纪的波兰人祖先与入侵的日耳曼人之间的战斗。在压迫波兰文化的时代，克拉谢夫斯基从事的将历史小说化的事业替代了波兰民族学校所起的作用。他的作品具有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在克拉谢夫斯基1863年后创作的当代生活题材的作品中也不乏佳作，值得关注的有讲述贵族阶级衰败的长篇小说《垂死之人》(1872—1873)，还有中篇小说《疯狂的女人》(1880)。后者讲述了一位伸张人权的波兰妇女的故事，在小说的结尾女主人公在巴黎公社的保卫战中英勇牺牲。克拉谢夫斯基塑造了许多不同时期的现实主义类型的贵族、农民和小市民。克拉谢夫斯基在文坛是一位公认的德高望重的人，十九世纪的波兰现实主义作家都将其尊为导师。

476 ·

另一位波兰散文现实主义的首创者是尤瑟夫·科热尼约夫斯基(1797—1863)。科热尼约夫斯基的两部最出色的小说(《投机商》，1846年；《骗子》，1847年)奠定了作家的现实主义道路。在他之后的作品中《无名的塔德乌什》(1851—1852)和《亲戚》(1856)创造了一种实证主义的"带论题的中篇小说"体裁。

现实主义元素在杨·查哈里亚塞维奇(1825—1906)和其他一些波兰散文作家的创作中也有体现。

2. 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波兰文学

六十年代初期爆发了一股新的社会热潮，这与同一时期俄国的革命形

势密切相关。1863 年 1 月 23 日在华沙爆发了以民族独立和废除封建秩序为目的的起义。为期一年半的武装斗争并未取得胜利。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了失利的起义军并消灭了波兰王国的民族自治残余势力。然而，起义却带来了农村改革，也为封建制度画上了句号。

正是围绕 1863 年起义悲剧性后果的思考斗争开启了波兰文学的新时期。这一阶段结束于九十年代初，兴起的工人运动改变了对于波兰发展的历史前景的旧观念。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主要内容是诞生于四十年代的现实主义流派转变为文学的占统治地位的流派。

波兰国土的分裂依然是波兰民族历史状况的主要特点。在丧失民族权利和保留封建残余的环境下资本主义制度在波兰土地上蓬勃地发展起来，这使得保守的贵族阶级与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异常尖锐。在波兰王国这次冲突以最“纯粹”、最经典的形式爆发，因此被称为“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较量。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波兰王国本土成为了波兰文学生活的大本营。

“年轻人”的阵营中涌现了一支政论家和作家组成的战斗分队，他们在实证主义的旗帜下与保守阵营进行斗争。

不同于西欧，波兰的实证主义带有功利的、实用的特点。它首先是资产阶级对 1863 年起义失败的回应。波兰的实证主义批判组织起义来争取民族独立的传统，并视之为浪漫主义的、有害的斗争方式，它把这种旧的斗争方式与发展波兰经济的理念对立起来。“年轻人”最激进的组织是《每周评述》杂志社，带头人是亚历山大·斯文托霍夫斯基(1849—1938)。

这一时期波兰文学的国际联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对波兰现实主义作家影响最大的国外文人有作家狄更斯、诗人海涅、左拉(开始于八十年代)。六十至八十年代在波兰最受关注的俄国作家是屠格涅夫，而且，读者一般选择阅读他的原著。此外，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以及民粹派作家也享誉波兰。

这一时期波兰文学向其他国家，尤其是斯拉夫国家的渗入十分猛烈。例如，在俄国就出版了许多显克微支、奥热什科娃、科诺普尼茨卡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波兰文学对乌克兰，尤其是白俄罗斯的影响非常深刻，以至于有些现象(例如在白俄罗斯诗歌史中)在无视其与波兰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解释。

波兰文学生活的变化还体现在体裁体系的改革上。1863 年后散文体裁已经将诗歌排挤到第二的位置。而这一时期波兰戏剧的发展仍然滞后。

1863 年后一部分作家继续浪漫主义传统，把与民族机会主义妥协情绪做斗争，以及分析灾难的原因视为主要目的(这部分人被称为“顽固派”)，

另一部分作家努力适应现实生活，分析新的社会环境（这部分被称为“实证派”）。

波兰散文浪漫主义的伟大接班人是齐格蒙特·米尔科夫斯基（1824—1915），笔名特奥多尔·托马斯·叶日。在踏入文坛之前叶日有过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还在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战场上英勇战斗过。童年和青年时期在乌克兰生活的印象以及对巴尔干人民生活的体察成为了叶日绝大部分作品的基础。甚至叶日的文风最能让人联想起雨果，在同辈作家中还无人能像叶日那样如此分明地将浪漫主义手法与“传统对象”的塑造独立开来。在他的创作中“传统对象”指的是民族独立运动的主题。

477·

在叶日的遗作中最有价值的是“斯拉夫”小说以及1848年匈牙利革命时期的中篇小说。小说《伏击》（1870）被公认为“斯拉夫集”中最出色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十六与十七世纪之交波斯尼亚农民反抗土耳其人压迫的故事，同时也饱含了对波兰人民处境的暗示。

在浪漫主义作家中叶日是“顽固派”意识形态最杰出的代表，起初这一阵营还包括巴鲁茨基、拉姆、纳日姆斯基等等。

在“顽固派”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发现，由于不妥协于现实，这些作家比实证主义者更早地对资产阶级关系对人性的侵蚀有了正确的理解。正是在“顽固派”作家中诞生了1863年后最强大的讽刺流派，同时也促进了现实主义的确立。这一流派的奠基人杨·拉姆（1838—1886）生活在加利奇，那里的畸形生活也成为了令作者声名鹊起的小品文、讽刺小说里的主角。他的佳作有《科兹利希上流社会》（1869）、《镀金头》（1873）、《惊人的事业》（1880）等。

实证主义者把揭露封建残余和教权主义视为首要任务，这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相契合。实践这部分实证主义纲领的文学萌生于反映现实生活的土壤，并渴望认知生活中的新现象。因此，此类文学具有艺术创新的特征，即寻找描绘思想、感情变化的新方法。六十至七十年代波兰现实主义发展的主流在思想上依赖实证主义。在实证主义的旗帜下步入文坛的十九世纪著名波兰现实主义作家有奥热什科娃、显克微支和普鲁斯。

六十至七十年代寄希望于工业革命的氛围里，几乎所有的波兰进步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批判性思想自然而然地受限于守旧思想的残余，他们只是十分粗浅地理解了新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而且对“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的幼稚信仰经常使那些亲实证主义潮流的作家（七十年代初大多数“顽固派”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对商业时代的人物进行了片面的修饰。被理想化的不仅有与时俱进的劳动者（手工业者、医生、工程师），还有精明强干的地主、资本家，甚至包括那些在社会舞台上表现积极的大地主阶级。

功利主义美学导致了所谓的倾向文学的发展："带论题"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短剧，甚至诗歌。这些体裁都带有图解、说教的特征。这类文学作品包括奥热什科娃、巴鲁茨基早期的中、长篇小说、斯文托霍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集《为了生活》以及其他一些作品。

实证主义倾向对长篇小说的影响比对短篇小说更为明显。因此，在波兰现实主义确立的第一阶段小体裁作品发展得更为成功。在短篇小说这种形式中，文学实现了向描绘底层人民生活的最猛烈的转变。甚至在奥热什科娃这位以中、长篇小说见长的作家的作品中，向成熟的现实主义手法过渡也最明显地体现在短篇小说体裁中(《来自不同的阶层》，1880—1882年)。中篇小说在波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中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功利主义美学把思想的直接表达以及在形象中举例说明它们定为准则，而随笔和半报道式体裁则最为充分地契合了功利主义美学的精神。斯文托霍夫斯基是撰写尖锐的政论文章的高手。而普鲁斯则毕其一生为不同的报纸和杂志提供他著名的"时评"。在不同时期的出版物上显克微支阐明了"目前的问题"。拉姆则凭借着小品文《利沃夫时事》享有盛名。

实证主义理想的彻底破灭才为彻底克服功利主义美学以及现实主义本质上的进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到八十年代初这一时刻才最终到来，这一时期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高涨的民族反抗情绪使许多作家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想，而资产阶级乐观主义也被一种对工业和科学进步医治社会能力的不信任所取代。

·478

波兰实证主义者的片面性把文学引向了死胡同，为了走出这条死胡同评论界开始向法国文学借鉴经验，首先便是学习左拉。然而《卢贡·马卡尔家族》的作者的学说整体上并未得到支持。只有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左拉文学理论中的部分论点才被接受，其中包括研究生活"素材"以及对其进行"科学"分析的必要性、不考虑任何道德教育要求的绝对客观性。

八十年代现实主义手法发展的标志是对倾向性文学简易化方法的摒弃。透过主人公的认识折射现实的原则坚决地取代了纠缠不休的、带有不可分离的说教性质的作者评论。作家们追求对人物进行客观描写，努力达到形象的逼真。在当时作家们也经常使用上述方法暗示人物的典型性，将人物幼稚地划分为正面和反面人物的方法已经被淘汰。波兰现实主义作家效法狄更斯、果戈理，细致地描绘了将主人公形象与物质生活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环境，正是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主人公的思想、感觉、体验以及整个性格特征。饱含日常生活的详细说明也是那时代现实主义风格的典型特征。这时在上阶段由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体裁培养起来的宏大庄重的概括描写进一步得到推广。短篇小说体裁取得的成就在中篇和长篇小说中得到

了合成，另外，讽刺愈加猛烈地出现在社会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中，使之成为当时现实主义散文中最具代表性的体裁。社会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波兰文学中的发展最应当归功于奥热什科娃和普鲁斯。

艾丽查·奥热什科娃(1841—1910)出生在富裕、有文化的地主家庭。以波兰启蒙主义者、法国百科全书派分子、英国实证主义者(巴克尔、斯宾塞、穆勒)的作品为读物的家庭教育使奥热什科娃以一位民主、人道、技术进步的捍卫者的姿态步入文坛。她的第一部作品《荒年》(1866)讲述了一对农村热恋男女之死，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已经开始号召作家们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然而实证主义者的运动也使奥热什科娃深陷其中，上流社会的沙龙、商业世界的事务所长时间的限制了她的创作热情。

奥热什科娃的早期创作是实证主义倾向性散文最鲜明的例证，在这些作品中充斥着滔滔不绝的说教和教训。年轻的女作家激烈地抨击了传统家庭教育的弊端(《瓦茨拉娃的日记》)，以及致使贵族阶层加速衰败的游手好闲、挥霍无度等习性(《艾利·马克威尔》，1875 年；《波洛赫维奇一家》，1876 年)。奥热什科娃愤怒攻击的对象包括地方小市民阶层的愚笨(《笼中》，1869 年)、贵族阶层的傲慢和道德低下(《波姆帕林斯基家》，1876 年)等。无论是在政论作品还是在许多中、长篇小说中奥热什科娃都在捍卫解放妇女的思想(《马尔达》等，1873 年)。她还关心波兰境内犹太人的疾苦，除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外，作者还以此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梅厄·叶佐弗维奇》，这部作品与《马尔达》在全欧洲都享有盛名。

对资产阶级改革的实证主义信念与作家的实际生活感受之间的分歧在七十年代末更加激化了，这使得作家的创作发生了巨变。奥热什科娃从颂扬资产阶级文明的福利转变为对其进行批判。奥热什科娃创作了一整部长篇小说集(《幽灵》等，1880 年)来回应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排斥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她充满敬意地评论了新一代幻想着社会变革的暴动者的自我牺牲。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得奥热什科娃重新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奥热什科娃在自己著名的中篇小说《底层》(1884)、《久尔济一家》(1885)、《无耻之徒》(1886)里首先关注的是白俄罗斯农民。随着对现实态度的转变奥热什科娃的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作者散文中的公式化现象、图例说明、道德说教消失了，人物表现的客观性、画面的可塑性、性格刻画的细致性都得到了提高，心理学上的深度也加深了。

所有这些变化都鲜明地表现在了长篇小说《涅曼河畔》(1887)中，这部小说综合了这位女作家最高的创作成就，成为了波兰批判现实主义的佳作之一。许多元素使得小说充满了诗意的亲切感，并赋予了小说史诗般的气派，例如，思想的崇高性与情节的戏剧性，色彩鲜明的各类人物(颓化的贵

族、吝啬的地主、勤劳的农民)，对经济结构、封建领地和农村的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细致的刻画，生动的场景与迷人的白俄风光的描绘。奥热什科娃在自己这部篇幅最大的作品中将革命后涅曼河流域土地上的波兰生活尽收其中。

波兰社会爱国情绪的高涨使得过去对于1863年事件的实证主义反应失去了立足之地。奥热什科娃对社会意识中的变化十分敏感，她第一次在作品中追忆了起义者。在昔日战斗的岁月里奥热什科娃也是这场运动积极的参与者，她那令人不安的期望和失败的痛苦使自己与起义者紧紧相连。这位小说家将对于1863年起义者传统的态度看作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和公民价值观的准绳。小说《涅曼河畔》以敌对势力在忠于贵族解放运动传统的基础上的妥协而告终。

对腐蚀人的道德、摧残人的心灵和生活的城市文化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关系的谴责几乎充斥在奥热什科娃后期的所有小说中。短篇小说《被征服的荣耀》(1910)被公认为是奥热什科娃后期作品中的佳作，在回忆1863年起义者的英勇的同时，她将爱国主义理想与争取民族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奥热什科娃对波兰文学的主要功绩在于对社会生活小说体裁的研究。她的创作加强了波兰文学与法国文学、捷克文学、俄罗斯文学、乌克兰文学、白俄罗斯文学以及其他一些民族文学的联系。奥热什科娃在充分发挥自己的现实主义天赋的年代里保持着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联系。同时她还促进了将托尔斯泰的发现引入本国艺术的进程，这一点她做的并不比普鲁斯少。她所创造的白俄罗斯各阶层的生活画面，尤其是农民生活，成为了二十世纪初白俄罗斯作家学习现实主义手法的特殊教材。

在奥热什科娃创作思想的进化过程中可以发现波兰文学发展的两条主线的交叉：一条是“顽固派”走过的道路，另一条则是克服了自身局限性的实证主义者走过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对接点上诞生了波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一些作品，其中包括显克微支和普鲁斯的作品。

亨利克·显克微支(1846—1916)生前就已广为人知，至今他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波兰古典作家。显克微支出身于衰败的贵族家庭，他在大学里接受过教育，毕业后选择了记者职业。他在开始自己创作生涯之时也是一位“年轻人”的追随者。然而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景象的观察使得显克微支脱离了实证主义队伍。1876—1879年间他周游了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进了作品《旅行书信》(1876—1878)中。实证主义的乐观在显克微支身上很快被对资产阶级文明深刻的怀疑所取代。这也唤醒了显克微支去复兴“保持精神”的思想，这一思想渗透了一种对热爱


艾丽查·奥热什科娃像

祖国大地的崇拜，并随着“顽固派”浪漫主义诗歌的日落而最终失去光辉。波兰浪漫主义逐渐成为显克微支所有作品的基调，同时也成为了评价自己笔下主人公们的人道和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无论是何种题材的作品，我们都能听到一位因祖国沦丧而悲伤的波兰人的控诉，例如，反映波兰学校的俄罗斯化和德意志化（《一位波兹南教师的回忆》，1879 年），描写农村孩子的不幸遭遇（短篇小说《小音乐家杨科》，1879 年；《天使》，1880 年），描写农民的迁居（《为了面包》，1880 年），描写波兰起义者漂泊异乡（《灯塔看守》，1881 年），讲述普鲁士军人嘲弄波兰农夫（《胜利者巴尔代克》，1882 年）以及刻画美洲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酋长》，1883 年）等。

显克微支短篇小说中的人物生动而多彩，他们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并且几乎总是在冲突中真实地展现出来，在从叙述的抒情语调向讽刺、从幽默向悲剧的过渡中作者在分寸的把握上做得十分到位。

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三部曲标志着他与实证主义的彻底决裂。其中第一部（长篇小说《火与剑》，1884 年）描写的是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贵族同赫梅尔尼茨基领导的乌克兰起义军之间的斗争；第二部（《洪流》，1886 年）则讲述了 1655—1656 年间波兰人民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同瑞典武装干涉军的斗争；第三部（《沃罗迪约夫斯基先生》，1888 年）讲述了 1672—1673 年间同土耳其侵略军的战争。

三部曲的情节设置与大仲马的小说十分相似，它们都结合了史诗般的人物描绘，这种人物描绘在显克微支的三部曲中是通过波兰骑士的理解折射历史事件的方法实现的。这种对叙事的模仿方法使得显克微支的作品格外的引人入胜，然而这也强化了作者理解波兰地主入侵乌克兰这一事件的民族主义倾向。为了保持住同胞们的精神，小说家显克微支在很大程度上理想化了祖国的过去，他在描述十七世纪的事件时仅仅站在贵族看待自己和周围世界的观念之上，因此，三部曲也包含了一些被歪曲的历史，而这些

却符合这些主角们的处世态度。在精彩而鲜明的叙事中显克微支歌颂了骑士阶层的爱国主义忘我精神，赋予了主人公们真正的勇士般的力量和勇气。通过运用许多国外小说家的经验，三部曲的作者在这些作品中综合运用了民族历史散文的所有重要成就，并以此使波兰沃尔特·司各特式的历史小说踏上了更高的台阶。

显克微支的小说《毫无宗旨》(1890)同样是波兰古典著作中的精品。这部小说标志着波兰批判现实主义在心理小说体裁上的最高成就。此时正在形成的颓废知识分子这类人成为了作家关注的焦点，而显克微支通过塑造世袭贵族普罗肖夫斯基家族的代表的形象来刻画这类人。显克微支对新一代人的病态心理做了诊断，他把产生这种疾病的原因归咎于人们信仰的缺失。这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生活观念，意识到应该为人民的福利而努力奋斗，同时，他们却怀有对资产阶级狭隘实用主义的不可抗拒的厌恶感，因此，他们苦于过多的反思，导致丧失了意志，无法找到自身才能的用武之地。在这部以主人公日记的形式写成的小说中显克微支发展了波兰中篇心理小说的传统(顺便提一句，这一传统并不丰富)，在借鉴其他民族经验的基础上，尤其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和保罗·布尔热(《弟子》)，创作了这部可以作为十九世纪"年轻人"形象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载入世界文学史的作品。确实，在波兰本土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十分谨慎，然而列·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却把《毫无宗旨》列入了当时欧洲小说的最高成就。

如果说在波兰读者的心目中显克微支的三部曲最为成功，那么在国外最受欢迎的作品要数《你往何处去》(1896)，这部作品获得了19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作品以尼禄迫害基督徒为历史背景显然是为了赞颂天主教。然而世界各个角落的读者被这部小说吸引的首要原因是小说中对异教罗马的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的生动描写，以及反抗尼禄暴政的强烈感情。

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中最具现实主义特色的无疑要数《十字军骑士》(1900)，这部史诗讲述了十四与十五世纪之交波兰人民同条顿骑士团做斗争的历史。这部小说虽不如之前的那些小说出彩，但却是为了激起全民对日耳曼扩张的反抗而创作的。这部小说在作者生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然而后来在希特勒发动侵略的年代却赢得了巨大的思想教育意义。

在当时的波兰散文家中显克微支为文学语言以及形象塑造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最为卓著的贡献。对于历史小说体裁的发展而言显克微支制订的选择使用古代词汇和句式的原则也极其富有成效。

博列斯拉夫·普鲁斯(1847—1912年，真实姓名为亚历山大·格罗瓦茨基)被公正地评价为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波兰散文作家。出生于没落贵族

家庭的普鲁斯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就参加了1863年波兰起义，不久便被捕入狱。之后他进了华沙一所学校的数学物理系学习，但却未能完成学业，为生计考虑他不得不辍学寻找工作。普鲁斯的文学事业是以撰写短篇幽默小说和政论文章起家的。

普鲁斯不如显克微支有名望，生前的国际影响力甚至不如克拉谢夫斯基和奥热什科娃。然而从在本国文学中确立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普鲁斯的功绩是最大的。普鲁斯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是一名温和的实证主义者，他坚信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正常发展再加上必要的、基本的社会变革一定会带来人人平等和社会公平。为了这些理想他凭借着政论家的笔尖和艺术家的语言奋斗了一生。在普鲁斯的创作中政论作品所占有的地位比显克微支更高，这些作品也成为了学习创作技巧的学校。从仅供娱乐的幽默小说起步，普鲁斯转向了创作"带论题的"反映社会迫切问题的短篇小说(《农村与城市》,1875年)。很快他便摆脱了训导式的实证主义倾向，开始关注(尤其是在1878—1884年间他的短篇小说体裁作品大放异彩的时代)艺术归纳的客观性，而作者归纳的素材是从自身对普通人现实生活的观察中汲取的。作者观察到这些普通人被蒙蔽在对美好未来的期望中，他们的人格尊严受尽了社会的侮辱和欺凌。在选题方面普鲁斯的创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相似，虽然波兰作家固有的幽默感，以及贯穿作家极其细腻的社会心理分析的亲切语气使得普鲁斯短篇小说的情感氛围与契诃夫晚期短篇小说更为亲近。在普鲁斯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优美的乡间图景，以及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农民和地主典型。但是普鲁斯作品中的主要写作对象仍然是资本主义城市。在波兰文学史上普鲁斯是第一个尝试展现工厂工人罢工的作家(《回浪》,1880年)。普鲁斯将城市贫民代表广泛带入到文学，按照显克微支的话，"将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描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以及幸运与不幸，还第一个表现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普鲁斯比显克微支更担心孩童的命运，像狄更斯一样，摹拟孩童眼中的周围世界的景象几乎是普鲁斯创作手法最典型的特征(《孤儿的命运》,1876年;《斯塔斯历险记》,1879年;《阿内尔卡》,1880年;《童年的罪恶》,1883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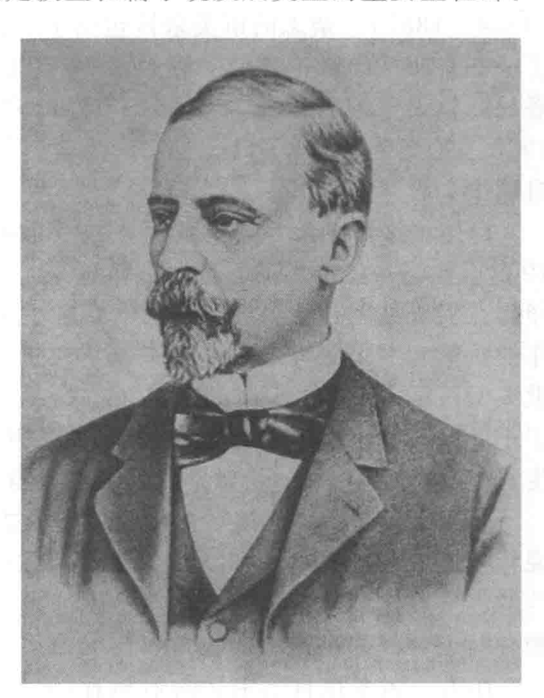
普鲁斯对实证主义的失望在短篇小说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然而在他的中、长篇小说中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中篇小说《前哨》(1885)中，作者描绘了资本主义化的波兰贵族庄园已不再是爱国主义的堡垒，相反，却在德国殖民者面前卑躬屈膝，在新环境下只有农民才有能力阻止德国对波兰的暴力同化。

在《前哨》(农村题材的波兰经典佳作之一)之后，普鲁斯出版了自己最

重要的作品，即长篇小说《玩偶》(1889)。普鲁斯在探究资本主义在波兰确立的历史以及这一进程对人类内心的影响时的深刻性和敏锐性使得这部社会小说成为了波兰文学划时代的作品。《玩偶》的主人公沃库尔斯基的经历正是一部物质富裕与精神匮乏共存、个体强化与个性衰败共存的历史。资本家沃库尔斯基不满资产阶级的现实情况，在他心中并未泯灭的对爱国主义者和起义者的同情造就了他矛盾的性格。而普鲁斯自己也像爱国主义者一样从未停止幻想人民的解放。残存的青年时代的爱国主义理想使沃库尔斯基成为了资本家中不合群的“白乌鸦”。这一状况与主人公对一位感情麻木的上流社会交际花的不幸爱情使沃库尔斯基最终走向自杀的结局。小说《玩偶》展现了一幅宽广的、史诗般的时代画卷，描绘了那一时代的社会和道德生活，并点明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变化的重要阶段。1848年这一意识形态尚处于十分激进的状态，然而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经走入了毫无出路的死胡同。普鲁斯在描写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理时既精确又具有深度。小说《玩偶》是一部革新作品，也是波兰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 482

历史哲学小说《法老》(1896)是普鲁斯的又一杰出成就。作者讲述了一场发生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古埃及的权力斗争风波，揭示了国家的阶级职能和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些都与传统的沃尔特·司各特式的小说纲要截然不同，赋予了《法老》这部小说完美的现实主义深刻性。这一特征的轮廓在克拉谢夫斯基的一系列作品中也能勉强找到。这一创新特点不仅仅在波兰对于历史小说体裁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正因为这一特点《法老》被列为了波兰古典著作中的杰作之一。



亨利克·显克微支像

九十年代初奥热什科娃的创作在思想和审美上开始下滑(《两极》，1893年;《澳大利亚人》，1895年等)。在普鲁斯的《解放了的妇女》(1893)中反映出作者无力摆脱世界观上

的矛盾，在小说中遗留了一些来自现代生活的神秘主义残渣。显克微支在《毫无宗旨》中批判了悲观主义和颓废情绪，然而在小说《波拉涅茨基一家》中他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追求家庭幸福的庸人理想同悲观主义、颓废情绪进行了比较后，仍然无法找到更好的灵丹妙药。

波兰小说在八十年代繁盛一时之后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便十分明显地陷入危机之中。

3. 自然主义流派 迪加辛斯基

一些作家在这个邪恶主宰的王国里找不到出路，渴望着与小市民阶级的辩护者唱对台戏，并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所有最畸形的一面。他们迫不得已把描绘这个畸形社会作为创作的最终目的，并最终选择了自然主义路线。

在波兰对左拉诗学的积极加工开始于戈鲁舍茨基的杂志《流浪者》（1884—1887）。杂志的审美宗旨包括了实验小说理论的个别元素，也包含了一些实质性的修正意见。然而，一些有影响力的评论家的言论，例如，斯塔尼斯拉夫·维特凯维奇（1851—1915）和安东尼·希赫金斯基（1850—1923），尤其是迪加辛斯基以及《流浪者》团队其他成员的文学实践促进了自然主义思潮的发展。

自然主义流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要数阿多尔夫·迪加辛斯基（1839—1902），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政论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他的译作在促进波兰社会各界认识西欧实证主义者的作品以及达尔文的学说中作的贡献几乎是最大的。迪加辛斯基四十五岁才开始小说创作，然而却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迪加辛斯基也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参加了 1863 年的起义，在这之后一种对农民历史使命的信仰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也把波兰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了农民身上。

迪加辛斯基的文学遗产中最为珍贵的要数他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将欧洲古典短篇小说和波兰加温达诗歌的结构原则融于一身，丰富了波兰的经典著作。他的大部分短篇小说都再现了边远乡村的日常生活，而动物有时也会成为小说中的主角（《狗的命运》，1887 年）。

作为一名左拉自然主义的追随者，迪加辛斯基却锻炼出一种叙事的独创风格。这种风格不仅把日常生活的细腻描绘与抒情的景物写生结合在了一起，同时还闪现着一种朴素的幽默感，使得作者在描写最令他反感的现象时依旧能保持适度的审美感。在迪加辛斯基大部分的中、短篇小说中都叙述了两类人物，一类是始终能博得作者同情的“弱势群体”；另一类是道

德败坏、如野兽般凶残的“强势群体”。这些作品是依靠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原则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来艺术地阐释畸形人际关系的独特尝试。这些尝试导致了思想和结构上的蓄意性，同时，它们夸大了生物学起源对人类的作用，从而掩盖了人类关系的社会本性。这些特征甚至体现在迪加辛斯基最出色的一些短篇作品(《狼、狗、人》，1883 年；《在鸟巢里发生了什么》，1883 年；《院子里的悲剧》，1886 年)以及中篇小说《马尔戈利亚和马尔戈利卡》(1901)中。然而作为对求生法则统治下的动物王国的补充，分析“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本性的创作目的却带来了辉煌的艺术效果。在飞禽走兽的描绘艺术、表现动物习性的准确性以及对动物性格的幽默评价等方面迪加辛斯基是不可模仿的。迪加辛斯基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农场与厨房”的世界，塑造了一批地主奴仆的形象，能够在国民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中察觉一些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所未能发现或不敢论及的现象和弊病。他的创作成为了从奥热什科娃、显克微支和普鲁斯的艺术向热罗姆斯基、莱蒙特和奥尔坎的现实主义过渡的阶梯。

· 483

除了迪加辛斯基，这一时期倾心于自然主义的还有希赫金斯基、查波尔斯卡娅等作家。由于这些作家与小市民阶级的辩护者抗衡，他们的创作也起到了广为人知的进步作用。尽管自然主义方法存在着缺陷，然而它的信徒们却能够拓宽社会环境的描写范围，着重关注资产阶级社会深陷道德生活腐化的现实。在与资产阶级幻想决裂的道路上这些自然主义的首创者们又向前跨出了一步，然而，他们同时丧失了对人，以及人的斗争和克服能力的信念。

4. 科诺普尼茨卡诗歌创作的发展

随着贵族阶级解放运动的落幕，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也走向了穷途末路。在起义平息之后波兰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里在诗歌领域仅有阿斯内克和果姆利茨基两位诗人走出了浪漫主义的仿造和实证主义的低产的困境。

亚当·阿斯内克(1838—1897)是一位斯洛伐茨基诗才的崇拜者，在科诺普尼茨卡步入文坛之前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诗人。阿斯内克获得了吟唱哀思的歌手的美名。他创作了幻想长诗《坟墓的梦》(1865)，在这首诗中能够找到但丁、斯洛伐茨基以及海涅的印记。阿斯内克深信令他奉献上全部青春的一月起义是逝去的英雄时代最后的一闪亮光。然而，同浪漫主义的追随者不同的是他相信进步的不可逃避性，他懂得“应当同生者一同前进”(《枉然的抱怨》，1877 年)。这位思想家的内心为过去所羁绊，而理智却使他认识到回到现实的必要性，在生活中他并没有看到进步的动力，但却没

有为了财富而接受庸俗的安宁。这位高尚而善于思考的诗人坚持的这种立场使得他的诗歌在理性主义的时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阿斯内克充满爱意的、风景画般的抒情诗(《在塔特拉山上》,1880年)以及哲学十四行诗集《深处之上》(1894)博得了同时代人独特的青睐。

同阿斯内克的抒情诗相比维克多·果姆利茨基(1848—1919)的诗歌《古华沙城的歌手》在对生活的哲学理解的深度方面显得毫不逊色。除了八部诗集、一些长诗还有众多普希金、涅克拉索夫、雨果、缪塞、伏尔赫利茨基等作家作品的译本之外,果姆利茨基还写过许多短、中、长篇小说以及一些科学出版物。波兰诗人中果姆利茨基是第一位有名望的大都市主义派分子。诗人大声控诉这个充满了侮辱性的资产阶级不公正的世界(《华沙曲》等)。

在这一时期的波兰诗歌以及散文中讽刺流派在加利奇地区取得了最快的发展。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以尼古拉·贝尔纳茨基(笔名为洛多茨)为首的一批民主诗人。洛多茨被称为"波兰的贝朗瑞",他天生的机智幽默,再加上一个满怀热情的爱国者和公民所具有的目的性,使得他的讽刺作品具备了精确的破坏力。

玛利亚·科诺普尼茨卡(1842—1910)在确立波兰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倾向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的父亲是位律师,十分注重培养孩子们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兴趣。然而,她的丈夫却是一位平庸的贵族,他的兴趣与科诺普尼茨卡格格不入,因此,1878年她选择了与丈夫断绝夫妻关系,带着六个孩子搬到了华沙的父亲家里。第二年父亲死后这位刚刚出道的女诗人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不得不去教书。

科诺普尼茨卡的世界观是在实证主义的思想自由和启蒙运动倾向的影响下形成的。然而,实证主义的幻想却未能拖累女诗人,因为在科诺普尼茨卡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之时实证主义幻想已经濒临破灭。科诺普尼茨卡充满暴动和渴望精神的诗歌很快就赢得了新一代(科什维茨基称之为"社会造反派的一代人")诗人的认可。

科诺普尼茨卡接过了阿斯内克和果姆利茨基未竟的事业,即从反映现实与其承载的期望之间的不协调性这一主题起步。在这一点上科诺普尼茨卡遵循了浪漫主义的反抗传统(她崇拜的诗人有斯洛伐茨基、密茨凯维奇和雨果)。科诺普尼茨卡的早期诗歌无法摆脱夸张的演说和多愁善感。在掌握了作诗艺术的同时女诗人也很快地找到了那把"原创的钥匙",这也帮助她翻开了波兰诗歌史的新篇章。

虽然科诺普尼茨卡创作了一系列戏剧"片段"以及长诗,还写过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品、旅行随笔和文学短评,然而她却是作为一位抒情诗人


科诺普尼茨卡像

而载入波兰文学史册的。首先，她是三卷《诗集》（1881年、1883年、1887年）的作者，之后诗人又添入了第四卷（1896）和诗歌集《线与音》（1897）等。在这些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是揭示出将人类分为“压迫者”和“赤贫者”的那道鸿沟，即自古以来社会内部的裂痕。这道鸿沟给劳动者带来了无数的苦难和辛酸，致使他们最终起来反抗这种不公，反抗君王、教会，甚至上帝（《在忧伤的日子里》、《他们幻想过吗》、《请不要吃惊》等等）。

为何你像大洋般一望无际，
又如裂开的伤口那样可怖？
鸿沟啊，你随意地将人类，
撕扯成“压迫者”和“赤贫者”。

——《在忧伤的日子里》

在科诺普尼茨卡的诗句中这一主题不仅体现在演说式的问句中，还体现在格言里，甚至是分隔符中。尖锐的讽刺、充满激情的高涨情绪以及隐喻的对比度等都强调了这一主题。在女诗人笔下这一主题还伴生了一些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民领袖和解放者，这些人物都充满了将自由与奴役对立起来的历史和神话的浪漫主义传统。科诺普尼茨卡的创作中“插画体”诗歌最受欢迎。虽然这种以诗歌或民谣形式出现的短篇小说早已不是新鲜的用里拉伴奏的宏大体裁，却仍然是在诗歌中发展现实主义倾向的十分恰当的形式。尝试过这种体裁的还有涅克拉索夫、聂鲁达等现实主义诗人。虽然粗俗的人民生活才刚刚真正开始成为精巧的抒情诗的素材，然而对人民生活的描述却与诗歌的崇高的艺术文化融合到了一起。科诺普尼茨卡创作的“插画体”诗歌（《自由的雇农》、《审判之前》、《亚斯没有等到》、《农民之心》

等)的意义恰恰在于这些诗歌很少放宽诗歌的内容。

民族抒情诗也是科诺普尼茨卡的重要成就之一,这些诗歌主要收录入第二和第三卷《诗集》(《傍晚的歌》、《吹笛》、《从草地和田园中来》等组诗)中。暴露社会"景象"的热情在这里与人民内心的抒情流露结合在了一起。热罗姆斯基证实道,波兰诗人中还没有人能像科诺普尼茨卡那样如此深入地洞察农民的不幸。在这里体现出了科诺普尼茨卡诗歌的标新立异,诗人强调音节格律作诗法,而这一特点在总体上既不是波兰诗歌所惯有的,也不是波兰"插画体"诗歌的典型特征,因为在波兰诗歌中主要还是采用音节作诗法。除了对人民日常生活的积极观察,女诗人的创新还依靠对民间文学风格的广泛运用,这一点对于浪漫主义作家来说是典型特征。如果说民间文学对于浪漫主义的首创者主要是创作民族诗歌的源泉,并且因为对民间文学的吸收使得诗歌带上了人民大众的精神,那么无论是科诺普尼茨卡,还是涅克拉索夫都在民间文学中寻找能够符合人民大众情绪的形式。

485 ·

在自己文学生涯的晚期科诺普尼茨卡创作了长篇史诗《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并最终走向了工农阶级联手反抗的革命思想,这种思想的转变也是理所当然的。

科诺普尼茨卡的诗歌不仅在波兰国内十分流行,在国外也享有盛名。她亲自翻译过海涅、豪普特曼、伏尔赫利茨基等作家的作品,为波兰吸收世界文学的宝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波兰无产阶级诗歌也走向了成熟,1882 年出版于日内瓦的讽刺诗和革命歌曲集《他们想要什么?》成为了这一流派的第一只春燕。

几乎与无产阶级流派同时,在波兰诗歌中又出现了颓废派诗歌。这些流派的形成和斗争历史我们将在下一时期的文学史中进行介绍。

第二章　捷克文学

1. 五十年代的文学

1848 年的革命事件对捷克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成为了社会艺术意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促进了对民族生活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1848 年革命被镇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为期十年的残酷的政治反动和镇压,捷克民主主义者萨宾纳、弗里奇、阿诺德·霍霍劳舍克等受到多年监禁;博罗夫斯基·哈弗里切克被流放,五十年代中期被迫迁居,长期生活在国外。但是,在被扬·聂鲁达称为"被活埋的时间"的反动时期内,进步文

学仍然顽强地抵抗着反动保守势力的压迫。

1848 年革命的经验及其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封建专制的观念开始动摇，并第一次引起了建立统一捷克民族的幻想的破灭。对民族精神、民族顽强性、民主及民族自由的理想的支持成为了五十年代捷克文学的总体特征。

在革命前，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哈弗里切克的政论和讽刺诗歌以及狄尔的戏剧作品和散文在捷克文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些作家在政治反动时期仍然坚持创作。

约瑟夫·瓦茨拉夫·弗里奇的浪漫主义诗歌反映了这一年代文学发展的趋势，他继承发扬了马哈的传统。他在狱中创作的诗歌在二十五年后才得以出版（《堡垒之歌》，1881 年）。革命失败带来的悲剧性经历和为了自由和民族利益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的主题奠定了弗里奇诗歌的基调。

卡雷尔·爱尔本（1811—1870）的诗集《花束集》的出版是政治反动时期文坛的重要事件。在这部诗集中他赞颂了人民不朽的创造力和高尚的道德。爱尔本出生于穷苦的鞋匠家庭，他在布拉格接受了大学教育，之后成为了民间文学大师。《花束集》是在很多首民歌的基础上形成的，这部诗集的主人公面临着选择，对道德约束的打破成为了一系列悲剧性后果的根源。在诗集的开篇诗歌中，祖国这一概念被拟人化为母亲的形象，继而整部诗集的主题都和这一关键性的隐喻相关联。民歌的内容唤起了读者忠于祖国和人民的情感。

·486

由于受到马哈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爱尔本也和欧洲浪漫派诗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诗人关注民间文学，哥德尔认为民间文学是民族精神的宝库。《花束集》对民歌体裁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体裁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捷克诗歌中十分常见。

鲍日娜·聂姆佐娃的创作在巩固散文的现实主义传统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聂姆佐娃兴趣爱好广泛，教育背景多样，内心丰富，她不仅是作家，更是充满热情的政论家，是民主爱国观念的传播者。聂姆佐娃对社会的不公平非常敏感，她信奉空想社会主义，希望通过道德教育来改变社会，因此，她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道德教育的特点。聂姆佐娃的特写为她日后大规模的作品奠定了基础（《来自多马日利采城》，1847 年；《斯洛伐克人生活之图景》，1859 年），通过这些特写和对捷克、斯洛伐克民间童话的加工，聂姆佐娃表达了普通民众、农民是社会和道德伦理价值的主要承载者的观点，表达了对社会不平等的抗议。聂姆佐娃的长篇和中篇小说（《野姑娘芭拉》，1856 年；《庄园内外》，1857 年）都具有一种特别的诗意的氛围，这些小说描绘的是普通人民的生活，同时又具有社会批判性。作家最重要的作品小说《外祖母》在捷克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伟大的农民形象，这一形象表

现了人民生活的诗意，成为了普通人的智慧和高尚道德的象征。小说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她所有的行为都是和小说中的民族诗歌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形象是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巨大成就。

聂姆佐娃巧妙地使用了生动的民间语言，并通过民间的词汇和短语使其更加丰富。她的作品开创了捷克小说的新语言，尤·伏契克称她为“语言的革命者”。

2. 捷克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　扬·聂鲁达

六十至八十年代是捷克文学现实主义流派的形成期，伴随着新流派的产生，上一时期文学的特点也得以继续保留和发展。

1848 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未完结，仍有继续的可能性。和过去一样，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民族问题、建立民族国家和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问题仍然亟待解决。因此，革命前希望发展浪漫主义的情绪在革命后获得了新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几乎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家都经历了浪漫主义的创作阶段，由于肩负着自由斗争的任务，这一时期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表现出革命浪漫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在诗人斯·捷赫(1846—1908)、约瑟夫·瓦茨拉夫·斯拉德克(1845—1912)和维捷兹斯拉夫·哈列克(1835—1847)的爱国公民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对人民生活的描写有时保留了感伤的旧时的特点，对社会冲突的本质认识得不够深刻，在作家的认识中，这些社会冲突只是单纯的民族或道德矛盾(古斯塔夫·普弗列吉尔-莫拉夫斯基的小说，哈列克、阿尔别斯、斯维亚特拉的一些作品)。

487·

同时，四十至五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主义也得以快速发展，现实主义越来越积极地在文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六十年代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分界，六十年代是社会民族热情高涨的年代，这一时期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爱国示威游行，这些游行通常具有鲜明的社会内容。在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八小时工作制和普选权的要求被提出。在这一时期，民族的精神力量得以加强，出现了民族爱国文体组织“艺术座谈会”和“雄鹰体育协会”。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捷克的社会政治矛盾更加尖锐，出现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1878 年社会—民主党成立。七十至八十年代，捷克的资产阶级政权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其反人民的本质，只能同维也纳政府进行争论以获得。

1858 年，一批年轻诗人和作家团结在《五月》文艺丛刊的周围(聂鲁达、哈列克、斯维特拉、普弗列吉尔-莫拉夫斯基，老一辈的作家有弗里奇、萨宾

纳、聂姆佐娃)，他们成为了正在形成的现实主义流派的核心力量。《五月》丛刊开创了新的文学语言，引起了“五月派”作家和官方文学阵营代表的激烈争论，后者主张保留民族复兴时期的民族爱国浪漫主义传统。

现实主义的确立使捷克文学获得了空间的广度，作家们力求全面理解和反映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当代现实，重建当代人丰富的精神世界。首先被提出的是人民的问题，这一时期的作家认为，人民不仅是民族观念和爱国理想的承载者(民族复兴时期浪漫主义作家是这样认为的)，而且首先是具有自身复杂性的社会基本组成部分。



鲍日娜·聂姆佐娃

聂鲁达、哈列克和他们的同盟者强烈反对对捷克文学的独特性进行局限性的理解，这种理解认为捷克文学首先是对现实进行民俗民族学的描绘，他们反对一味地效仿民族复兴时期文学的形式。聂鲁达及其同伴广泛地宣传像朗费罗、雨果、贝朗瑞、裴多菲这样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促进了捷克读者对欧洲文学精神价值的了解。捷克爱国知识分子努力抵制强行灌输的德国文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海涅、伯尔尼和莱瑙的作品广为流传，“青年德意志”团体的活动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捷克文学和俄国文学有着十分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聂鲁达和他的同伴试图使捷克文学朝着深刻认识社会现实的方向发展，这正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正是五月派的作家向捷克读者展示了俄国文学深刻的思想性，人文诉求及高度的艺术性。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不仅被广为阅读，更是成为了捷克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成为了促进捷克文学中的进步力量成熟的催化剂。

扬·聂鲁达(1834—1891)是这一时期捷克文学的中心人物。他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贫苦家庭，一生都深爱着自己的家乡。中学毕业后，聂鲁达进入布拉格大学哲学系学习，后做过一段时间的中学教师，五十年代末

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作为诗人、文学家、戏剧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聂鲁达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评论性文章，内容涉及捷克戏剧、音乐、造型艺术的发展，他对捷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文化史学家把六十至八十年代称为“聂鲁达时代”。聂鲁达始终坚持艺术应该具有提供知识的作用，他认为，艺术的客体首先应该是现实世界。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聂鲁达认为，生活本身就是美。因为提出了这样的诉求，在捷克文学史中，聂鲁达第一次确定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即对现实进行典型的概括就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准则。聂鲁达十分关注艺术中的民族特性的问题，他坚信，只有“带有自己的声音”“穿着自己民族服装”的诗人才能进入“世界诗人”之列。

聂鲁达的短篇故事集《小城故事》，中篇小说《衣衫褴褛的人们》代表着对浪漫主义幻想，充满理想化倾向的感伤主义和民族爱国主题的脱离，这些都是聂鲁达之前的小说，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散文所具有的特点。聂鲁达的小说使得现实主义的原则在捷克文学中占据了优势。

在中篇小说《衣衫褴褛的人们》中，聂鲁达在捷克文学中第一次创造了劳动群众的概括形象，第一次使用了工人的民间创作。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季节工人，劳动人民以他们的社会命运、心灵财富和道德准则和普通的捷克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聂鲁达的很多中篇和短篇故事中，都能看到作者和讲述故事的庸人之间的同一性，作者似乎同意了这些人的老生常谈的处世态度，而同时，故事真正的主人公正是从中凸显出来的。通过揭露捷克这些庸人空虚的存在，作家满怀深情地向我们展示了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形象，展示了人民的优秀品质。捷克散文作家第一次完成了多样、灵活、精炼、简洁的叙述，显示了其处理大量艺术细节的能力。

聂鲁达死后，捷克评论家指出，正如果戈理的《外套》开启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时代一样，聂鲁达的《小城故事》标志着捷克文学现实主义时代的来临。和果戈理描写的密尔格拉德县一样，布拉格的“小城”也成为了庸俗和混乱的代表。《小城故事》的现实主义特点不仅使聂鲁达和果戈理有了相似之处，还使聂鲁达和狄更斯具有了可比性。和伟大的俄国和英国现实主义大师一样，聂鲁达擅长揭露人性中所有卑微和庸俗的东西，擅长在不破坏可信度的情况下，用讽刺和幽默夸张的手法表现人物的主要性格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人物形象。把对生活进行巧妙细微地描写作为社会分析的手段，这是聂鲁达创作的一大特点。果戈理和狄更斯创造了一种叙述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了讽刺和抒情两种相对立的创作风格，把“笑”和“泪”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叙述形式在二十世纪被广泛应用（哈谢克、恰佩

克、波拉切克)，而聂鲁达的短篇和中篇小说为捷克文学中这一形式散文的出现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聂鲁达诗歌(《诗册》，1868 年;《宇宙之歌》，1878 年;《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1883 年;《礼拜五之歌》，1896 年，去世后出版)的主要特点是崇高的公民热情、抒情性、批判性、讽刺性和怀疑态度的结合。九十年代的诗人(马赫、什拉麦克)继承并发扬了这些特点，二十世纪的许多诗人都学习了这些特点。在聂鲁达的诗歌中，伟大的祖国和人民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甚至是亲切的回应。聂鲁达的诗有着整体的抒情氛围，其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和普通人的世界相统一的。

> 我的母亲去世了，只留下记忆，
> 我的爱情过去了，是那么短暂——
> 为了这一切我都曾痛哭流涕，
> 但又归于平静——
> 可是你，我的民族，我不能失去你！

聂鲁达的抒情诗使捷克诗歌的抒情性获得了具体的意义，丰富了捷克诗歌的语言，使其更加接近民间口语，并使对捷克自然景色的描写上升到新的高度。在聂鲁达的公民、哲学、风景抒情诗中，我们可以发现多样的诗歌结构和不同的创作风格。

3. 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捷克散文　阿洛伊斯·伊拉塞克

聂鲁达的现实主义观念在维·姆什蒂克(1863—1912)和霍斯廷斯基(1847—1910)的作品中得到了发扬，这两位评论家深化了现实主义的概念，并从理论上论证了更适合八十至九十年代捷克文学发展的现实主义美学框架。在《论艺术中的现实主义》(1890)中，霍斯廷斯基试图对现实主义做出哲学性的解释，比如“美”、“艺术的真理”、“倾向性”、“典型性”等。姆什蒂克积极宣扬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他翻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冈察洛夫的作品)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观念，特别是“批评家之王”别林斯基的观念。

· 489

这两位批评家都评价了当时十分流行的左拉的自然主义宣言书中的艺术的认知作用。1887—1891 年间，捷克的文学刊物被关于自然主义的激烈争论所充斥，这些争论反映了当时基本的审美意识的碰撞。

正在形成的捷克现实主义美学观点向文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艺

术地掌握和理解当代社会现实，而灵活多变的社会—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散文的短小形式——特写、短篇和中篇小说，恰好完全实现了这一任务。特写体裁建立在对生活直接观察的基础之上，这一体裁成为了很多捷克作家掌握现实主义原则和理解社会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初级阶段。聂姆佐娃在创作长篇小说之前，已经完成了大量的特写。聂鲁达的关于布拉格生活的随笔为《小城故事》打下了基础，同样，伊拉塞克的随笔也为他的历史小说奠定了基石。雅库布·阿尔别斯（1840—1914）在政论特写（支持社会运动）中描绘了捷克 1848 年革命的片段、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塑造了科苏特、加里波第等人肖像，所有这些都为他在十九世纪末创作的长篇社会—日常生活小说《现代吸血鬼》、《和平的天使》做好了准备。

随笔、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有助于作家积累综合概括现实图景的经验。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捷克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短小文学体裁的作品（伊拉塞克《山区的故事》，斯维特拉《耶什捷德剪影》，聂鲁达《小城故事》等）。这一系列作品为作家日后大型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捷克现实主义文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是金钱的统治地位，金钱的至高无上使人性泯灭，这首先反映在农村的物质生活上。在斯维特拉、哈列克、莱斯等人以爱尔本和聂姆佐娃为传统的作品中都展示了捷克农民的高尚道德和民族特性，但这一时期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田园诗般的美好，而更多的是对正在资本化的农村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一时期的农村中，人们的关系是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钱基础之上的，人们已经抛弃了过去的家庭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悲剧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绝。

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出现了城市这一主题，在城市中，资产阶级世界的矛盾最为尖锐和赤裸。这类主题的主人公多为城市底层的人们、流氓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安达尔·斯塔谢克的短篇小说《马图什鞋匠》，1843—1931 年，半个世纪后被作家改编为长篇小说；聂鲁达的中篇小说《衣衫褴褛的人们》）。揭露捷克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小市民性、庸俗作风和寄生性成为了这一时期捷克散文的主要任务之一。聂鲁达在自己的短篇小说和《小城故事》中塑造了捷克的庸人的典型形象。捷赫的中篇小说《布鲁切克先生月球旅行记》（1888）的主人公，一个实际的捷克资产阶级分子，以奇妙的方式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英雄的胡斯军时代，在那里他为了自己的生活和利益出卖了祖国。而伊拉塞克中篇小说《哲学生的故事》（1878）的主人公在 1848 年的革命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和随笔、中短篇小说不同的是，捷克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现实社会—心理小说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哈列克的《荒山下》、《在庄园和小木舍里》，

斯维雅特拉的《乡村故事》、《弗朗蒂纳》，赫尔曼《被吃光了的商店》，斯塔谢克的《未完成的图画》等小说可以看作是向社会—心理小说这一体裁迈进的第一步。但这些小说本质上只是内容丰富的中篇小说，还不具备规模宏大的对社会现实的概括和叙述的多层次性。但是这些作家所运用的心理分析的手法使捷克文学得以丰富，他们的作品说明了人物激烈碰撞中的社会准则，展现了这些作家构建小说的复合结构的能力。

现实主义历史小说标志着真正的捷克现实主义小说的诞生。阿洛伊斯·伊拉塞克(1851—1930)是整个捷克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创作的巅峰。 ·490 伊拉塞克出生于纳霍德地区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对家乡历史和民俗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十分喜爱代代相传的民族起义的故事和胡斯军的传说。从布拉格大学的历史系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历史老师。伊拉塞克的作品包含了很多民族历史的重要事件。他认为，人民群众永远是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和主要力量。他的作品经常和官方资产阶级的历史相对立。伊拉塞克试图在历史中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特别是民族解放斗争问题的答案。"我们现在的生活锁链中的环是和过去的环相联系的，不是所有逝去的东西都是死的过去。斗争者已逝，而斗争仍然存在"。伊拉塞克经常选取捷克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关键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时刻作为描写的对象。伊拉塞克对大量的充满时代感的史料做了详尽的研究，他所有小说的创作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七十至八十年代，伊拉塞克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农民起义的小说，其中最值得称颂的是《斯卡拉克一家》(1875)和《狗头军》(1884)。伊拉塞克能够从历史的片段中洞察整个时代的特点，了解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人民群众成为了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

八十至九十年代末是伊拉塞克创作的高峰期。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关于胡斯运动的一系列小说，后来发展成为民族史诗三部曲：《在激流中》(1887—1890)，《反对一切》(1893)，《兄弟军》(1899—1908)。在这部史诗中，伊拉塞克塑造了胡斯时代波澜壮阔、宏伟雄壮的历史影像。在伊拉塞克眼中，胡斯运动是真正的人民政权的代表，是社会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相统一的典范，是自由理想的化身。作家把胡斯军的英雄历史、他们对新生活的虔诚信仰、斗争目标以及团结的精神和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民主运动的任务相对比，试图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唤起每个人都应该为民族命运而斗争的责任感。

伊拉塞克根据历史事件的发展顺序来构建小说的情节发展，把上百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国王、贵族到普通农民和商人，他创造出了复杂的多层次的小说情节，展现了精湛的叙述技巧。

伊拉塞克是描写战争场面的大师，阅读他的作品，读者不仅能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战争情景，仿佛还能听到战争残酷的声音：武器碰撞的声音，马的嘶鸣。而在所有这些的背后，人、人的命运、他在大规模的民族事件中的位置、他的个人品质始终贯穿于整个小说之中。

在五卷本小说《弗·勒·维克》(1888—1906)和四卷本编年史小说《在我们这里》(1896—1903)中，伊拉塞克展示了胡斯运动(还有西欧革命运动，包括法国大革命)对民族复兴时期(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捷克民族精神的提升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两部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宏大规模，描绘了社会各阶层生活的广阔景象。小说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捷克文化活动家，现实中的启蒙者(作家佩尔茨尔、多布罗夫斯基，捷克第一所印刷厂的建立者克拉麦利乌斯等)，同时也有很多不知名的爱国者，他们的忘我工作促进了捷克的民族复兴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家是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情节设置和掌握叙述节奏的，小说的情节并没有尖锐的戏剧冲突，但却充满了内在戏剧性，真实的历史占据了小说内容的很大一部分。伊拉塞克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很多原则和特点都来源于沃尔特·司各特。

在很多后世的作家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伊拉塞克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痕迹，比如，安·萨波托茨基、玛·普依玛诺娃等。

伊拉塞克在戏剧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约·卡·狄尔之后的几十年中，捷克戏剧都没有获得很大的发展。1883年，捷克人民筹资建立的民族剧院在布拉格正式揭幕，它的开幕为捷克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捷克农村题材的戏剧首先在此上演。和拉·斯特鲁佩日尼斯基(喜剧《我们的那些傲慢者》)、加·普列索娃(戏剧《前夫的女儿》)、姆什蒂克兄弟(戏剧《玛丽霞》)一样，伊拉塞克在戏剧《父亲》(1894)和《沃伊拉尔卡》(1890)中也塑造了捷克农民的典型形象，塑造了自己的同时代人，揭露了资本主义化的农村的激烈冲突。伊拉塞克的历史剧《扬·胡斯》(1903)、《扬·日什卡》(1911)和《扬·罗哈奇》(1914)也成为了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些剧作中，他成功塑造了胡斯运动领袖的宏伟形象。

4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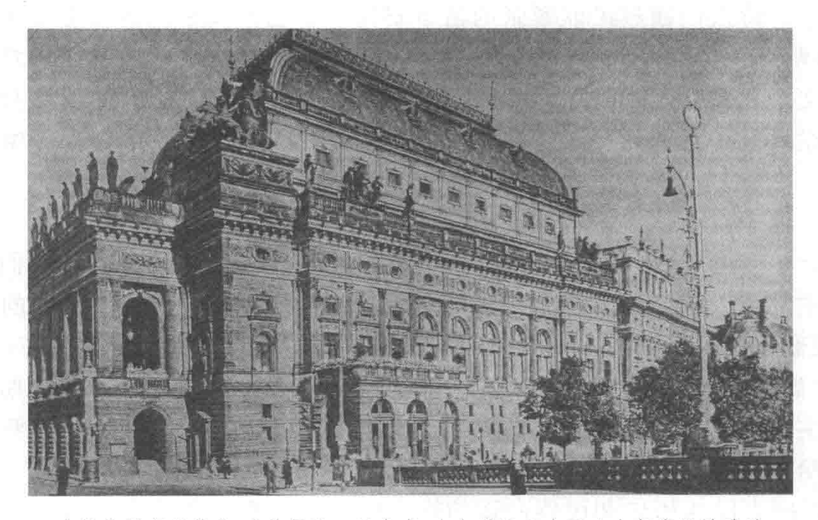
4. 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捷克诗歌

诗歌在捷克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很多时候甚至超越了散文。主题的广泛性和体裁的多样性成为了六十至八十年代诗歌的特点。这一时代很多伟大的作家既是诗人，也是小说家，并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聂鲁达、捷赫、哈列克、尤·泽耶尔)。新一代的杰

出诗人登上了诗歌舞台——约瑟夫·瓦茨拉夫·斯拉德克(1845—1912),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1853—1912),斯瓦托普卢克·捷赫(1846—1908)。

这一时期的诗歌中最重要的是爱国公民抒情诗,它们表达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理想和希望——聂鲁达的诗集、捷赫的《晨曦之歌》(1887)和《新歌》(1888)、斯拉德克的诗集《农夫曲和捷克十四行诗》(1889)和《捷克之歌》(1892)。

这一时期的公民抒情诗的特点是对捷克民族历史的回溯,首先是对胡斯运动的回溯,诗人们把胡斯运动看作是革命人民政权的典范。诗歌中关于爱国的问题是和希望捷克、斯洛伐克统一的愿望相联系的(聂鲁达《斯洛伐克书信》、捷赫《在瓦赫河上》、阿·海杜克《扬琴与小提琴》等)。俄土战争、南斯拉夫针对土耳其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俄国对南斯拉夫的帮助,这些都唤起了捷克民众对俄国的强烈好感和对为自由而战的斯拉夫同胞的同情(捷赫、肖尔茨、克拉什诺霍尔斯卡的诗)。在捷克民族对其他斯拉夫民族充满同情之时,波兰正在进行民族解放运动。杨科拉尔斯拉夫的关于斯拉夫民族相互联系性的思想在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捷克民主主义诗歌中得到了新的阐释和深化。 ·492



布拉格国家博物馆 建筑师约·兹泰克 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设计建造

这一时期的公民抒情诗充满了作家个人对祖国和同胞命运的责任感,融合了诗人的个人经历和人民对自由人权的崇高追求。这些诗歌具有呼吁和宣传的色彩,高度的浪漫主义热情和鲜明的浪漫主义形象。有一些诗歌失去了直接的情感表达,取而代之的是激情洋溢的演讲风格特点。最能表

现此特点的是以《卢米尔》杂志为阵地的“卢米尔派”诗人的诗歌。捷赫、斯拉德克、伏尔赫利茨基及其追随者的诗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这些爱国抒情诗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捷克诗歌开始关注普通人的世界，普通人的苦恼和幸福。工人形象第一次出现在捷克诗歌中，这一形象自信地走上了捷克社会生活的舞台。斯拉德克在《独眼龙》中塑造了一个矿工形象，这样的工人形象在后来的彼得·贝兹鲁奇和一些早期无产阶级诗人的诗中也得到了体现。

七十至八十年代，社会民主运动的活动家们（拉·萨波托茨基、博·佩茨卡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都是革命诗歌和歌曲的作者，他们的作品成为了政治宣传的有效手段。在他们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对世界重大革命事件的回应，尤其是对英雄的巴黎公社的回应。但是从艺术角度来说，这些诗歌则是对捷克民主诗歌，首先是对聂鲁达和捷赫诗歌不成熟的模仿。

和散文一样，这一时期的诗歌也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低级”领域。民歌成为了最受欢迎的诗歌形式之一，这一形式起源于爱尔本的浪漫主义民歌，并发展出了新的特点。由于民歌能够把抒情风格、诗人的主观体验和对现实世界的客观描述结合在一起，因此哈列克、聂鲁达、斯拉德克、伏尔赫利茨基等诗人都选择用这种形式进行写作。诗人们通过民歌紧张的情节安排和对话形式来揭露社会现实的悲剧性（哈列克的《一锤定音》；斯拉德克的《收割》；伏尔赫利茨基的《农民的主祷文》，取自《农家的民间故事诗》诗集）。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社会民歌体裁在贝兹鲁奇和无产阶级诗人沃尔凯尔、比布尔的诗歌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十九世纪末，诗歌作品表现出愈加强烈的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它们揭露资本主义反人道主义的本质，虚假的慈善性和对自由、平等、团结的亵渎（斯拉德克《我不相信！》，伏尔赫利茨基《韦列夏金》，捷赫的讽刺诗《哈鲁曼》、《奴隶之歌》(1895)等）。捷克诗歌继承了哈弗里切克·博罗夫斯基对教权主义的批判，揭露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反动本质（聂鲁达《致罗马教廷》，哈列克《你——梵蒂冈的夸口》，捷赫《波罗的海的胡斯分子》等）。

对捷克民族历史和民族命运的探索促使了更宏大的诗歌体裁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出现，代表诗人有：捷赫（讽刺、哲学诗《欧罗巴》、《斯拉维亚》，历史诗《亚当分子》、《米哈罗维茨的瓦茨拉夫》，社会诗《莱塞金斯基的铁匠》）；尤利乌斯·泽耶尔(1841—1901)，他创作了一组叙事诗《维谢堡》，讴歌了古捷克的英雄事迹；伏尔赫利茨基，他发表了名为《史诗片段》的系列诗集。

哈列克的抒情诗《黄昏曲》(1858)、《大自然中》(1872—1874)以及聂鲁达、斯拉德克、伏尔赫利茨基的抒情诗是捷克现实主义诗歌的开端,在他们的诗歌中出现了新的抒情主人公,这些主人公不再是高傲的、孤独的、一对一和命运进行抗争的浪漫主义者,而是变成了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整个民族的一部分,看作是千千万万被压迫人民中的一分子。

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抒情诗促进了更加自由的诗歌形式的产生。这为捷克诗歌带来了诗歌情调的多样化、诗歌表现力的新手段,使得捷克诗歌在二十世纪发展中硕果累累。 ·493

第三章 斯洛伐克文学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什图尔及其同盟、什图尔浪漫派的诗人、散文家为斯洛伐克美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十九世纪中叶到后二十年,斯洛伐克文学在美学思想方面继续巩固民族创作力量,

受到奥地利帝国社会政治局势变动的影响,斯洛伐克文学发展不太稳定:五十年代反抗时期几乎终止发展,六十年代政局宽松时期又出现短暂发展阶段。然而,什图尔派在七十年代末期完全终结,八十年代随着现代派的确立,斯洛伐克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1848—1849 年的历史经验让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家、活动家感到失望,但重要的是,这样的尝试证明了多数农民尚未准备好为捍卫民族权益而积极行动。什图尔分子在革命初期组织进行了激烈的反封建解放运动,这些运动构成的民主进步社会改革思想进一步发展成捍卫斯洛伐克民族生活方式的理念。

六十年代,在政府就民族问题让步的背景下,斯洛伐克和捷克的民族运动开始高涨,建立了文化启蒙组织斯洛伐克社(1863—1875),斯洛伐克学校中出现了许多定期出版物,其中包括文学出版物。表面上民族文学火热发展,实际上其思想内容远达不到高水平范畴。意识形态方面,在教会的深刻影响下,积极改革的斗争热情被保皇法制观念所取代,什图尔派的道德伦理理想发展成基督教教义。六十至七十年代随着资本关系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社会分化过程,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在此背景下,什图尔的继承者于 1872 年建立了民族党,其主要成员包括约瑟夫·库尔班(1817—1888)、扬·巴拉里克(1822—1870)、扬·弗朗切斯(1822—1905)。他们的民族纲领表现出更为具体的资本主义思想,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四十年代的民主主义有所不同。

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在斯洛伐克文学中也有所体现。事实上,大作家

中仅有为数不多的人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四十年代浪漫派作家中还积极创作是那些远离现实政治，仍相信什图尔最初民族纲领的人（斯拉德科维奇、卡林恰克、哈鲁普卡），还有关注现实社会时事的那些作家。

这一时期诗歌、散文中的浪漫派创作动力远没有消亡。在反抗时代的黑暗岁月中诞生了斯洛伐克浪漫派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扬·博托（1829—1881）的诗歌《扬诺什卡之死》（发表于1862年）。诗人在作品中刻画了传奇强盗扬诺什卡的形象，描绘了当时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理想的最终灭亡为作品塑造出悲剧的氛围。安德烈·斯拉德科维奇（1820—1872）充满公民意识的抒情诗和萨莫·哈鲁普卡（1812—1883）在六十年代创作的民间叙事诗都是文学技艺成熟的作品。但总体而言，在诗歌创作中存在着大量机械模仿浪漫主义的作品。导致诗歌艺术水平降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主观抒情内容的表达方式有向叙事靠近的趋势，如果不是这样，那至少也是向抒情叙事靠近。这一时期作家努力追求在形式、什图尔美学观点和内容之间的平衡。应该注意的是，其内容是用象征和寓喻表达，这些象征符号是有限的，且象征的思想、情感意义单一。这样的尝试导致诗人艺术创作手法的趋同。

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散文也有所发展。历史题材仍然受到欢迎（如：胡尔班的散文《上帝仆人》讲述十一世纪波罗的海地区斯拉夫人与德国封建主斗争的故事；扬·卡林恰克的《爱情与复仇》，1858年；《僧侣》，1864年；《奥拉瓦》，1870年，等）。也是在这一时期，斯洛伐克文学浪漫散文体裁的奠基人卡林恰克以现实题材创作了《选举》（1860）。作品中展现了小贵族谋求私利与时代进步民主浪潮的尖锐对立。虽然小说正面人物依旧是具有浪漫主义激情的理想式主人公，但描写代表社会之恶的人物时，作者力求赋予人物鲜明的特点，让他们既有阶级特征，又有独特的个性。卡林恰克用独特的语言生动描绘了真实生活的典型。

在小说《选举》中已表现出浪漫主义创作方式的危机。在柳达维特·库巴尼（1830—1869）的短篇小说中更明显地表现出这一危机，作品关注了社会问题。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主人公是知识界的“小人物”，这些主人公与其说是理想人物的象征，不如说是浪漫主义的理想追求在与资产阶级小市民实用主义的庸俗现实中产生对立而牺牲的象征，况且这样的矛盾最终以悲剧收场。

在浪漫主义盛行的时期，有启蒙运动唯物唯理美学传统的文学也得到发展，在喜剧和散文中多见这样的代表作。约纳什·扎巴尔斯基（1812—1876）是斯洛伐克文学这一流派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启蒙中篇小说和讽刺小说（《弃儿》）中初次尝试了用民主观点来评价复杂的现代社会政

治格局。扎巴尔斯基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虽然他大部分作品在生前并未出版），他的创作力图关注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在艺术手法方面，扎巴尔斯基德作品中用到不少传统元素，比如，情节的展开多用描述、人物性格静态等，他用辛辣讽刺的笔触对充满现代社会矛盾的现实（如对国家主导体制）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解倾向让扎巴尔斯基成为斯洛伐克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驱。

六十至七十年代业余剧团的活跃促进了戏剧的发展。本土文学中最流行的剧目是扬·巴拉里克（1822—1870）的喜剧《匿名》（1858）、《德罗达》（1860）、《和解，或挂镰节的悲剧》（1862），他的作品接近扬·哈鲁普卡的传统，他力图在作品中展现“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好的一面、坏的一面”，他将普通人民的习惯、俗语和崇高的道德价值搬上舞台，而不是展现生活富裕的上层人士的生活。

1875年开始的马扎尔政权时期，斯洛伐克社、斯洛伐克学校被关闭，大多数定期出版物被查封。这样的法令终结了什图尔派的活动，而斯洛伐克的浪漫主义发展又与什图尔派的活动有着关联。

浪漫主义是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它深入研究了人民性是文学独特性始终不渝的先决条件这一思想，高举公民意识原则的旗帜，用新的体裁形式丰富了本土文学。在七十年代，浪漫主义的主要地位逐渐被现实主义所取代。

八十至九十年代是斯洛伐克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代表人物有瓦扬斯基、赫维兹多斯拉夫、库库钦。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没有完全脱离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对民族理想化的认识，对民族压迫有揭露性的基调。

· 495

文学仍旧是民族爱国力量和民族利益代表者的唯一活动舞台，这决定了世纪末前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内容和独特性。但文学的哲学和美学基础却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斯洛伐克现实主义作家反对浪漫主义用主观原则理解客观现实和复杂的现代社会矛盾，人被看作是具有社会性的人，其性格、生活方式和行为都反映着特定的社会环境。评价艺术性的标准是要忠实于真实生活，而不是与古典或民间文学的表达方式相符。在诗歌领域，现实主义作家不再遵从民间文学的形象，不遵守“音节诗作诗法”，不使用民间文学的情节和人物，不按照浪漫主义情怀使用抽象概括的哲学思考和寓喻。现实主义诗歌关注的是现实问题，展现的是现代人的生活、思想和遭遇，因此现实主义诗歌有了新的文学原则：在生动但精巧的语言基础上使用“音强音节体作诗法”，正是这一原则把斯洛伐克文学推向同时代欧洲文学高度。

与欧洲文学接触，与捷克、匈牙利、德国、波兰，特别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接触，这对斯洛伐克文学新一代艺术审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从八十年代开始俄罗斯文学作品定期被翻译成斯洛伐克语。瓦扬斯基、什库里杰特、弗尔切克积极地文学评论促进了本国文学与更为成熟的他国文学的接触、学习和思考。杂志《斯洛文尼亚的注视》(1881 年出版至今)在本国文学生活中有着主导地位，是诗歌、散文进步文学力量的活动舞台。伟大作家瓦扬斯基、赫维兹多斯拉夫、库库钦的作品可以勾勒出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斯洛伐克文学概况和发展特征。

诗人巴维尔·奥尔萨格·赫维兹多斯拉夫(1849—1921)是斯洛伐克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诗人。他是小贵族家庭的儿子，获得了法律教育，从事律师工作多年，自出生起一直住在斯洛伐克西北部。他近乎五十年来的创作历程有许多阶段，这些阶段也是斯洛伐克文学发展所经历的阶段。他被称作是本国新诗歌的奠基人。在他的抒情诗中，从浪漫主义发端的个性解放完成了向现实主义转变的过程。在大型组诗《十四行诗》(1882—1886)、《圣诗和国歌》(1882—1886)、《夏日嫩芽》(1885—1896)、长诗《守林人的妻子》(1884—1886)等作品中，他展开了一幅现代人在情感、心理和精神层面种种表现的大画卷。他主要的创作思想是个人、民族的社会和心灵的自由，为了这目标他揭露当时社会的真实现象。他认为诗人应该是民族理想、道德，特别是社会道德的捍卫者。

斯维塔扎尔·库尔班·瓦扬斯基(1847—1916)是什图尔的战友库尔班的儿子。库尔班是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斯洛伐克文学的中心人物之一。瓦扬斯基和赫维兹多斯拉夫一起被称为是本国诗歌的改革者，为本国诗歌带来了新的创作原则，新的诗节学和韵法。他的抒情诗(诗集《鞑靼人与海》，1879 年；《脱离枷锁》，1884 年)的主要内容是抒发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为他们多舛的命运而忧虑。他用一颗真实敏感的心来表达这样的情感，没有使用浪漫主义空洞、过分华丽的辞藻。他的诗歌创作过程、诗歌形象的诞生本身就是其诗歌创作的主题。(《诗集》，1890 年)。

瓦扬斯基在创作散文时有这样的宏大目标——囊括几乎所有的表达方式，表现真实社会政治、家庭生活、情感思想、社会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的各个维度。对他来说最主要的领域是社会关系中的高层——那些有特权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他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关注民族爱国和道德问题的社会心理中篇小说(《百合花》，1880 年；《飞驰的影子》，1883 年等)和长篇小说(《干树枝》，1884 年等)。作家为社会不稳定、资产阶级化和社会上层对民族利益的忽视感到担忧。他希望加强各民族“统一”的愿望在知识分子代表的形象中得以体现，他们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

瓦扬斯基的散文有多主题的叙事方式，切合实际观察了人物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他创造具有复杂性格，且行为、情感有内在辩证逻辑的文学人物，这为斯洛伐克文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他的作品具有优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语言运用、体裁选择和形象创作的特点。

但在思想方面，作为民族党的领头人物，瓦扬斯基对现代社会发展持有保守、空想的世界观。在文艺方面，他过分拘泥于善与恶的和谐比例，对本国的热爱太过于理想化，导致在表现本国阵营时常常变得很死板，而敌对阵营总是充满灰暗的色彩。因此他的作品没有能克服现实主义初期的局限性，在思想方面，他的作品与十九世纪末的进步思想产生碰撞。

斯洛伐克女性作家特雷莎·万索娃(1857—1942)受瓦扬斯基的影响，作品主题大都是日常生活。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波德戈拉茨基家的孤儿》(1889)，作品中再现了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一家人的家庭内部生活。

马尔金·库库钦(1860—1928)是和瓦扬斯基齐名的在浪漫主义第一阶段著名的斯洛伐克散文家。出身于农民家庭，他接受了医学教育，八十年代中期他成为民主派的作家，是首个为本国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打下厚实基础的作家。他的作品情节简单，人物不多，但就是这样简单的情节和人物组成了典型的日常生活短剧。在他的笔下农夫生存艰难，有着繁重的活计，生活环境限制了他的思想和情感，但却展现出最本质、最典型的一面——顽强、机灵、狡黠、天生的善良和粗俗但善意的幽默感。在这样的民族性格中沉积着几个世纪所受的压迫，他文化水平低，思维局限——迷信、偏见、被动。而这样一个普通的农夫的身上能看到对生活、对自然、对他周围的人的真实道德态度(《棕色的牝牛》，1884 年；《醉汉》，1886 年；《关于米哈伊尔》，1886 年)。

八十年代斯洛伐克文学全面转向现实主义，开始寻找能切实反映真实生活的文学体裁。

第四章 保加利亚文学

保加利亚文学在历史倒退时期发展不均衡。在保加利亚迎来了民族独立之后，从十九世纪中叶到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结束，保加利亚文学在奥斯曼帝国严酷的压迫下发展起来。在保加利亚本国境内文学刚有发展的势头。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成了启蒙和文化生活的源头。在君士坦丁堡出版了一些保加利亚社会文学杂志，但大部分杂志、报纸还是在奥斯曼帝国境外出版，或是在罗马尼亚的文化中心、塞尔维亚或是俄罗斯。尽管如此，

文学艺术的民族、美学思想发展迅速。斯拉维伊科夫、卡拉维罗夫和波特夫等大文学家的作品共同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期保加利亚文学概貌。

七十年代末期，在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和普罗夫迪夫出现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心，在这里定期出版物得到发行，也开始出版保加利亚作家的作品。文学成了社会思想的主要传播形式。

497·　五十至七十年代，保加利亚文学完成了民族复兴的最后阶段。文学紧密地与社会政治进程联系在一起，作家本人同时也是为民族自由而战的斗士。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保加利亚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密切接触。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卡拉维罗夫、任吉福夫、米拉基诺夫兄弟、邦切夫曾在莫斯科学习和发表作品。六十年代，波特夫在敖德萨学习，德鲁梅夫在基辅学习。保加利亚作家文艺品味和美学观点，是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们和别林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批评家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这些作家的作品内容是具有深刻民族性的，因为这些内容都取材于保加利亚真实生活，表现了民族传统和民族历史。五十至六十年代出现了对民间口头创作的兴趣。拉科夫斯基、斯拉维伊科夫和格洛夫为整理和出版民间文学作品作出了许多贡献。这一期间出版了一些民歌集，其中以米拉丁诺夫兄弟在萨格勒布出版的《保加利亚民歌集》最为著名。

五十至六十年代的诗歌以公民抒情诗和爱国革命抒情诗为主。多布里·钦图洛夫(1823—1886)的作品描绘了解放运动高涨时的各种情绪。他在敖德萨中学接受教育，然后在保加利亚一所中学任教。他创作了一系列哀诗(《老母亲挥别儿子》、《来自敖德萨的保加利亚人电报》)和充满民族爱国主义情怀的诗歌(《起来吧，起来吧，巴尔干的勇士》、《你在哪儿，真挚的、人民的爱》、《在巴尔干》)。他的诗歌运用生动的口语，这是其革新之处。诗歌浪漫的特征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这些诗歌十分流行，其中一些还成了民歌。

这一时期保加利亚社会政治和文学生活中另一个活跃人物是格奥尔基·卡科夫斯基(1821—1867)。他是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思想家、报纸编辑、政论家和诗人。他最著名的诗歌作品是浪漫主义长诗《森林的旅客》(1856)。该作品讲述了反抗奥斯曼压迫的哈伊杜克结拜兄弟的故事，和民间英雄壮士歌接近。拉科夫斯基并没有很高的诗歌天赋，他的诗歌运用了许多陈旧的语言。尽管如此，《森林的旅客》在至今仍享有盛名。诗人呼吁国人行动起来，他对未来的解放充满了信心。

佩特科·帕切夫·斯拉维伊科夫(1828—1895)是保加利亚第一个伟大的诗人、社会活动家、出版家和启蒙教育家。1852 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了三本他的诗集：《五颜六色的花束》、《歌唱家》和《预言家》。在这些作品

中可以发现希腊和塞尔维亚诗人感伤主义抒情诗的影响，作品集中还出现了翻译作品和模仿作品。在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想要展现保加利亚人的内心世界、内心情感的尝试。斯拉维伊科夫的爱情抒情诗和风景抒情诗充满了民族爱国主题。后来作家的艺术手法逐渐成熟，不仅成功翻译了俄罗斯古典诗歌，还吸取了这些诗歌和保加利亚民间口头文学的经验。他在《新歌唱家》(1857)、《歌唱家》(1870)等诗集中，是一个抒情诗诗人、民主诗人、讽刺诗人，鞭笞各种社会、道德问题。他的作品中寓言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根据保加利亚的现实翻译并改写了伊索、拉封丹、克雷洛夫的寓言作品。在自己的寓言中诗人嘲笑了愚昧无知、掠夺、寄生的现象。在七十年代，斯拉维伊科夫创作了不少作品，其中《贝罗诺加的泉水》(1873)被列入了保加利亚文学经典。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身上汇集了保加利亚民族的特征：对爱情忠贞、热爱劳动、拥有崇高的道德。和作家其他作品一样，诗歌充满了爱国主义灵魂。斯拉维伊科夫还是《风笛报》和《马其顿报》的编辑。1877—1878年俄土战争时，斯拉维伊科夫参与战事，帮助了俄国军队。他的社会活动、启蒙教育活动和文学活动成就堪称同时代作家中的典范。伐佐夫称他为自己的老师。

瓦西尔·德鲁梅夫(1840—1901)是保加利亚科学院前身，保加利亚文学团体创始人之一。他积极参与启蒙和民族教会运动。在他的第一本中篇小说《不幸的世家》(1860)中，作家把目光投向十九世纪初的事件。他致力于写一篇"真正的保加利亚短篇小说"，描写了因亚内恰尔和土耳其军官而产生的"苦难的不幸"。但作为刚出道的散文家，他受限于维尔特曼、施密特、欧仁·苏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的影响。作品对比了拥有崇高民族道德感的保加利亚男子和阴险的亚内恰尔。作家没有塑造出独立的人物形象，叙述风格是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的。

· 498

德鲁梅夫还创作了中篇小说《学生和恩人》(1864)和历史戏剧《伊凡柯》(1872)，《伊凡柯》的内容根据十二世纪末的保加利亚历史写成。主人公性格中充满了矛盾，这是保加利亚戏剧向现实主义道路发展的重大跨步。作家对人民这个主题也给予关切。在这一方面德鲁梅夫学习了俄罗斯文学，特别是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研究者还发现了这两部戏剧在主题学和文本学上的相近之处。

在德鲁梅夫这里发端的现实主义倾向在留宾·卡拉维罗夫(1834—1879)那里得到发展。他的初次文学尝试是在俄罗斯，他在俄罗斯生活近十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出版他的特写、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868年出版了他的选集《保加利亚苦难日记》。卡拉维罗夫尝试将俄罗斯社会介绍给自己被奴役的祖国。他讲述被苦难命运唤醒的主人公如何同土耳其人斗

争的故事(《保加利亚强盗阿塔曼》),讲述被土耳其人彻底破坏的家庭(《涅塔》、《悲惨的家庭》),他颂扬同土耳其人作战的哈伊杜克(《多乔》)。他的部分短篇小说与乌克兰作家沃夫乔克有相似之处。《旧日恶保加利亚人》是他最著名的中篇小说之一。这篇小说最初用俄语在 1867 年的《祖国札记》上发表。这篇小说鲜明地体现出保加利亚散文的现实主义技法,使用了果戈理描绘人物和事件的手法。

卡拉维罗夫因追随俄罗斯革命者而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在这里用塞尔维亚语出版了一些之前在俄罗斯出版过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还出版了新的中篇小说《命运有罪吗?》,小说主人公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笔下的"新人"有相似之处。这部作品在保加利亚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卡拉维罗夫用塞尔维亚语写作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引起了塞尔维亚文坛的兴趣,后来塞尔维亚评论称"这位保加利亚兄弟"为塞尔维亚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从 1869 年到去世,卡拉维罗夫都在罗马尼亚生活,当时在那里聚集了许多保加利亚革命移民。他参与了保加利亚革命中心委员会的活动,视将保加利亚民族从奥斯曼压迫中解放出来为己任,创办了《自由报》和《独立报》,这是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刊物。他立场鲜明的政论文、讽刺小品和文学评论在同时代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这些年间卡拉维罗夫创作了中篇小说《有钱的穷人》、《哈吉·尼乔》、《保加利亚生活三景》。在这些作品中这位现实主义作家尖锐地批评了保加利亚的乔尔巴吉,与土耳其进行贸易的商人。这些作品为保加利亚揭露讽刺文学发展打下基础。

1873 年,他的战友、杰出的革命家列夫斯基被土耳其人逮捕并惨遭杀害。这一惨案之后,卡拉维罗夫经历了一次意识形态的危机,转向启蒙主义的立场。在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期间,卡拉维罗夫和俄罗斯士兵一道回到了祖国,并开始了新的文学活动。但遗憾的是,作家晚年身患重病,于 1879 年离开人世,他的文学活动也因此而中断。

赫里斯托·波特夫(1848—1876)的大部分革命社会活动也是在罗马尼亚进行的。波特夫与卡拉维罗夫作为多年的志同道合者,有着相同的政治立场,对民族解放运动持相同的观点,对民族文学和保加利亚批评文学也有着自己的观点。当卡拉维罗夫停止参与革命运动后,波特夫开始领导保加利亚民族革命和爱国力量。

波特夫是农村启蒙教师的儿子,于 1863—1865 年在敖德萨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熟读俄罗斯文学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屠格涅夫的《前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反复阅读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

赫尔岑的作品。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和革命民主思想影响了这位保加利亚 ·499 未来政论家和诗人的文学立场以及品味。

从1868年起，波特夫成为流落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移民。他全身心投入革命和文学活动中，参与了卡拉维罗夫主编的《自由报》和《独立报》，成为《保加利亚移民之声》、《旗帜》和《新保加利亚》等报纸的出版人和编辑，撰写了多篇政论文章。

波特夫将自己全部的社会和文学活动都献给保加利亚的独立斗争。他坚信"革命是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此外，作为一名革命民主主义者，他逐渐意识到民族、社会和阶级利益。在《代纲领》一文中，他写道："保加利亚人不仅憎恨土耳其人，甚至对乔尔巴吉和神职人员充满更深的仇恨。"

作为政论家的波特夫持有先于自己时代的政见，他参加了巴黎公社。由他起草的《保加利亚公社信念的象征》(1871)是对保加利亚革命思想的阐释。保加利亚研究者证实，波特夫和卡尔·马克思相识，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有所了解。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他仍停留在空想社会主义阶段，他的讽刺小品文和特写充满了革命的情怀、坚定的意识形态。

波特夫诗歌中最主要的形象是饱受奥斯曼压迫的保加利亚人，他们明白斗争的必要性，即使为民族解放牺牲也在所不辞。

在波特夫早期的诗歌《致我的母亲》、《致兄弟》、《哀歌》、《给我的第一个恋人》中，他用坦诚的语气直接表达保加利亚人心中的苦难、忧愁和悲伤。逐渐在他的诗歌中出现了紧张和冲突，这一点在诗歌《离别》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抒情主人公与亲人离别，加入哈伊杜克，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母亲，我已成为哈伊杜克，不要哭泣，不要悲伤。"对他而言，最大的奖赏就是获得自由，而人们会传诵："可怜的人，他为真理和自由而牺牲！"高尔基高度赞扬了这首诗歌，并对诗歌前几行倒背如流。波特夫的诗歌有着民间文学的形象体系和节律体系的特点。

波特夫还是一位尖刻的讽刺作家。如同在政论文章中一样，他揭露那些为了发财而抛弃人性的人："无耻的乔尔巴吉，小商人，还有收特税的神甫，贪求财富。"(《在酒馆》)他批判那些软弱的自由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颂扬"自由之火"，他幻想，他和他的战友"无畏地投入到与压迫人民的敌人的战斗中"(《我的祈祷》)。波特夫最著名的诗歌作品是叙事曲《哈基·迪米特尔》，未完成的诗歌作品《哈伊杜克》和《瓦西尔·列夫斯基的绞刑》。叙事曲的抒情主人公是为自由而战的爱国主义者，这一永不屈服的保卫者形象永远留在了人民的心中。周围的一切——人、传说、神话、大自然让逝去的英雄的形象鲜活了起来。"在可怕的战争中为自由而牺牲的人，他永垂不朽"——这些话成为了每个保加利亚人神圣的宣言。

波特夫的创作是保加利亚革命诗歌的高峰。在他的诗歌中，将浪漫主500・义的英勇精神和现实主义的紧张与冲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产生在保加利亚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土壤中的现实主义。


赫里斯托・波特夫像

在六十至七十年代，保加利亚批评文学逐渐形成，确立了描写民族活动的现实主义原则。卡拉维罗夫、波特夫、邦切夫的文学批评思想在俄罗斯文学和革命民主批评的良好影响下形成。

在1878年保加利亚人民民族解放运动之后，社会、政治、文学、文化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主要的思潮是批评现实主义。

在解放之后，民族解放运动继续激励着保加利亚作家。他们力争记录下人民的功绩和在这场战争中杰出活动家的英勇事迹。同时，斗争的热情、时代进步的理想同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些社会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而不断加深。

伊凡・伐佐夫(1850—1921)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剧作家。他成为保加利亚文学和文化活动中新思潮的代言人。伐佐夫是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在罗马尼亚的时候他就与卡拉维罗夫、波特夫相识，并参与了1876年四月起义的准备活动。他的第一批诗歌集《旗帜与古斯里琴》(1876)和《保加利亚的苦难》(1877)在布加勒斯特出版。这些诗歌传达了保加利亚人在四月起义前夕的爱国主义激情及其惨遭血腥镇压的悲剧。战争结束后不久，另一本诗集《摆脱》问世。该诗集中表达了民族的欢乐以及他们对参与解放保加利亚的俄罗斯士兵的感激之情。在战后的岁月里，伐佐夫在普罗夫迪夫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并出版杂志《科学》和《黎明》；他还同韦利奇科夫一道发行了一份名为《人民之声》的报纸；他发表新的诗歌、小说、文学批评文章。1881年《科学》杂志出版了伐佐夫的回忆录《不久前》——这是关于四月起义前期的回忆。他的诗歌《格罗马达》

(1879)颂扬普通保加利亚人身上的爱国主义的力量。《扎戈尔卡》为伐佐夫戏剧《鲁斯卡》提供了素材。这部戏剧的同名主人公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节,杀死了土耳其军官,然后加入哈伊杜克。

伐佐夫的抒情诗系列《被遗忘的史诗》(1881—1883)描写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活动者,载入保加利亚文学宝库。这些诗歌让列夫斯基、拉科夫斯基、任科维和米拉基诺夫兄弟等形象得到复活。伐佐夫的短篇浪漫英雄主义诗歌中充满了深刻的戏剧性。这些诗歌能激发起读者的公民意识与爱国思想。这些形象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保加利亚人。

在小说《被排斥者》(1883—1884)中,伐佐夫开始描写在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移民的生活。这些人生活困苦,食不果腹,并且为土耳其政府和保加利亚暴富者所不容。就像作者所言,产生了新的衣衫褴褛的无产者。但他们因自己的丰功伟绩而不朽。他们盼望祖国的解放,很多人甚至为这一理想而献出了生命。作家在小说中融合了真实史料,因此作品具有非凡的表现力。他是史诗的见证者,并对其进行了文学的概述。在这部作品中,伐佐夫表现出一位敏锐的心理学家的特质,和现实主义抒情作品大师的才华。

随着保加利亚独裁体制和反俄罗斯政策的加强,伐佐夫面临生命危险。他被迫移民俄罗斯,在敖德萨创作了许多诗歌、随笔、短篇小说和保加利亚文学中的第一部叙事作品《在压迫下》。回到祖国之后,他先将这部作品分次发表(1889—1890),然后再出版完整版本(1894)。小说不仅受到保加利亚读者的欢迎,同时在欧洲国家也不乏读者。伐佐夫也因这部小说而被载入世界文学史。

关于作品的构思,伐佐夫写道:“我打算描写保加利亚人遭受的奴役生活和四月起义的革命精神……小说的很多情节都是我自己的回忆和观察。”作者的这一目标具有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叫做博伊乔·奥格尼扬诺夫的革命者。就自身而言,小说展现了宏大的艺术画面。作品中描述了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活,习俗以及心态。

小说中融合了不同的艺术创作风格,在描写爱国者时,用的是激昂的浪漫主义;当描写保加利亚的财富被土耳其人掠夺时,用的是尖刻的讽刺手法。作者看似平静的语言掩饰不了他对所描述事件的激情。生活在作品中表现出各种形式:英雄主义的、喜剧的、日常的,但是作品的内部发展线索却是高昂的革命激情。这正是保加利亚人民在四月起义中所经历的。

从八十年代初起,伐佐夫的创作中开始关注现代问题。这位人道主义作家,对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很多现象都无法接受。在诗歌集《古斯里琴》(1881)、《田野和森林》(1884)中,越来越多地描述的是作家对社会的

批判。作家认为钱币的叮当声成为了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小说《米特罗凡和杰尔米多利斯基》、《舅舅们》充满了讽刺的基调，描述的是保加利亚父权制度下小市民阶层的生活。

从俄罗斯回到祖国之后，伐佐夫对保加利亚的现实表现出更强烈的批评态度。在他的各种作品中，他揭露资本主义的习俗，奠定了保加利亚现实主义文学中的讽刺基调。

伐佐夫在九十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散文集：三卷本的《中短小说》(1891—1893)，短篇小说和特写集《伤痕和污渍》(1895)、《看见的和听见的》(1901)、《多彩的世界》(1902)等等。这些作品奠定了保加利亚文学中描写小人物形象的传统。作家能够简练而生动地传达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和性格。他升华了这种小体裁的艺术水准，并成为保加利亚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的鼻祖。

伐佐夫的长篇小说《新土地》(1896)、《卡扎拉尔斯卡娅的女皇》(1903)描述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保加利亚社会、保加利亚人的精神生活。这两部小说揭露了当时的外省习气和保加利亚资本家的精神匮乏。然而作品中也表现出作家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理想的不确定性。作家力图确立现代社会的民族爱国主义形象，这一想法激励他创作了一系列描写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历史小说和戏剧，这一时期是保加利亚的第二代王朝。

当时的革命斗争的一位积极分子、社会活动家、作家扎哈里·斯托扬诺夫(1851—1889)在其作品《保加利亚起义笔记》中描写了保加利亚人民在祖国解放前夕进行斗争的英勇精神。虽然作品主要描写的是七十年代的历史事件和为保加利亚自由而献身的革命烈士，但这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叙事作品；虽然《保加利亚起义笔记》是基于作者的切身感受和解放之后搜集的大量材料，但却不是普通的回忆录。这是一部独特的充满感情的作品，同时又是一部文献叙述作品。它描写的是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人物、事件。社会心理和遭遇。斯托扬诺夫继承了卡拉维罗夫的现实主义传统，后者忠于对事件和人物的如实描述，并将其和浪漫主义的形象性以及高昂的激情结合在一起。斯托扬诺夫的《笔记》成为保加利亚文学中那个英雄时代的独特的丰碑。

保加利亚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另一条线索是和对现实的批评相联系的。这条线索始于伐佐夫，并在诗人斯托扬·米哈伊洛夫斯基(1856—1927)和散文家阿列科·康斯坦丁诺夫(1863—1897)处得到发扬。同伐佐夫一样，这两位作家对保加利亚的独裁制度也持不妥协的态度，并相信国内健康的民主力量。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创作大部分是寓言。诗人嘲笑虚荣和傲慢(《蜜蜂和苍蝇》、《孔雀和燕子》)，不学无术者的暴力和蒙昧无知(《雕枭和

萤火虫》)，以及资本主义刊物的背信弃义(《厄喀德那和鹰》)。米哈伊洛夫斯基还写了讽刺哲学的诗歌：《恶之歌》(1889)、《保加利亚之书》(1897)，后者是用历史寓喻的形式写成的。虽然作品的意义比较隐晦，但当时的读者也能发现作品中对保加利亚君主体制的无情讽刺。

康斯坦丁诺夫作品中的讽刺对象是新兴的保加利亚资产阶级。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小说《巴依·加纽》(1895)。这部作品是由一些单独的杂文组成。书中的主人公加纽身上集中了一个保加利亚企业家身上典型的社会特征。布拉戈耶夫高度评价了这位杰出的讽刺作家的创作，准确地将主人公的本质定义为"因光天化日之下在法律和政权的庇护下掠夺得利、头脑简单小市民的幼稚无知与因放高利贷而获利的'新强盗'无耻行为的综合体"。巴依·加纽这个名字成为了保加利亚具有典型概括意义的名字，康斯坦丁诺夫对游记题材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芝加哥来回》这本书里，他展现了在美国繁荣背后，也有其罪恶的一面，指出，正是资本主义扼杀了自己的孕育者——个人自由。 ·502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保加利亚文学中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同时资本主义文化催生了现代派和颓废派潮流。所有这一切使得文学发展过程更为复杂，在文学发展新阶段产生了不同思想和艺术流派的碰撞。

第五章　塞尔维亚及黑山文学

1848 年之后塞尔维亚文学在民族政治和领土分裂的条件下继续在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塞尔维亚(在十九世纪初民族解放斗争中获得国家独立)以及在以诺维萨德为中心的沃耶沃季诺(已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自治省)发展。民族问题尚未解决成为其社会历史条件的典型特征，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促进了浪漫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自五十年代末开始，延续整个六十年代浪漫主义成为文学的主流。同时文学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趋势不断壮大(很多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也呈现这种特点)，并在六七十年代尖锐的文学斗争中得以巩固。在现实主义已经成为文学的主流之后，浪漫主义继续对其产生影响，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不断地发掘其未尽的潜能。

黑山成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文学发展的独立区域。与塞尔维亚在语言和民族根源上的共同性、部分历史和文化传统上的相似性，使得黑山文学同其他斯拉夫民族(特别是塞尔维亚)文学有着紧密互动，并且这一特点成为其发展的主要特点。与塞尔维亚文学的共同发展成为十九世纪上半叶黑山文学的主要趋势，这个趋势一直持续整个二十世纪。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浪漫主义思潮的发端成为其最为显著的特点。

在塞尔维亚文学中主要的成就与三位伟大作家的创作和诗篇紧密相连：兹玛依(1833—1904)(约万·约万诺维奇的笔名)、久拉·亚克希奇(1832—1878)和拉扎·科斯蒂奇(1845—1910)。三人均来自沃耶沃季诺。兹玛依才华横溢，创作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对诗歌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他的民间抒情诗和政治讽刺作品上。他是当时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著名的活动家，担任过塞尔维亚历史上著名讽刺幽默杂志的编辑，同时也是翻译家(翻译了莱蒙托夫、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海涅、裴多菲等人的著作)，以及儿童文学奠基人。亚克希奇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和画家，其作品大大丰富了塞尔维亚民族绘画艺术宝库。科斯蒂奇——诗人、剧作家，在将莎士比亚作品翻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方面，他是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并且在理想主义美学方面撰有很多著作。

这三位诗人有着共同的创作根源——均继承了四十年代浪漫主义诗人先驱拉基切维奇的特点，致力于追寻民族艺术的根源，继承了欧洲浪漫主义中叛逆、崇尚自由的一面(年轻一代诗人便是如此看待拜伦、海涅、莱蒙托夫、裴多菲的诗作，尤其是裴多菲因其斗争的一生更是引起了塞尔维亚诗人的强烈共鸣)。

新一代浪漫主义诗人继续发扬传统，将文学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起来。这一代作家具有高度的公民积极性、社会责任感以及对人民的热爱。随着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文学和文化生活上塞尔维亚和沃耶沃季诺之间地域的孤立性开始逐渐被打破。

在此基础上当时两个领先的文化中心——诺维萨德和贝尔格莱德——503·逐步形成，两个城市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密。诺维萨德是浪漫主义时代最重要的文化起源的聚集地。1861年这里有了塞尔维亚第一家常设剧院——1868年开设的贝尔格莱德人民剧院；1864年文化启蒙团体塞尔维亚文化协会和其杂志(《塞尔维亚年纪》)从佩斯州迁至此。但是贝尔格莱德作为独立国家的首都，它的优势不言自明，因此从六十年代末作为主要的文化中心它就一直在不断发展。

受到“青年意大利”、“青年德国”的鼓舞，1866年在维也纳和佩斯州塞尔维亚学生团体的倡议下在诺维萨德成立了文化启蒙和社会政治组织“统一塞尔维亚青年”(“奥姆拉金娜”)。该组织在塞尔维亚人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大多数六十年代战斗在解放运动一线的作家都与该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1879年在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的领导下，该组织内形成了民主革命潮流。但是在1871年由于内部矛盾以及来自奥地利匈牙利政权以及塞尔维亚当权者的迫害，该组织解散。

被奴役的祖国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解放斗争，以及探寻人民大众在斗争

中的作用和民族性格的根源等问题使得浪漫主义诗歌的中心形势尤为严峻。以民间文学、神话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那些科索沃平原上的战役以及马尔科·克拉列维奇、米洛斯·奥比利奇等人民英雄的卓越战绩的历史成为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要素材(在当时的氛围下对民间的文学创作非常崇拜——科斯蒂奇将民间文学称为"塞尔维亚的福音书",这个定义成为奥姆拉金娜组织成员的信条)。在对民间文学中的情节和原型再加工时,诗人们特别注重英勇的开头和过去的解放斗争与现实之间的深层联系。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勇精神,在兹玛依、亚克西奇的诸多作品中主人公身上都浓缩成为了自由而不惜自我的牺牲精神等优秀品质,这一特点在科斯蒂奇的作品《亚德里亚的普罗米修斯》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且发展成为黑山诗歌文学的传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描写尼古拉·彼特罗维奇·涅戈什大公的作品中表现最为突出。

抒情诗中的英雄形象也在逐渐地形成,例如爱国主义者以及与民族利益、理想血肉相连的人等。个人自由与集体的自由密不可分(个人的悲剧和失望也常常由于集体的命运造成)。对于塞尔维亚浪漫主义诗歌的主人公来说,其反抗精神集中体现在其反民族压迫斗争中。这类诗歌的主人公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在浪漫主义诗作的代表作之一兹玛依的《光明的坟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敢于接受命运的打击,为自己的理想坚持到最后一刻(《我——悬崖》、《路》,亚克希奇)。

浪漫主义诗人不断追求灵活多样的开端,不断寻找更为扼要紧凑的抒情史诗形式——相比之下,宏大体裁、史诗在塞尔维亚文学中不是很常见。植根于民间创作形式多样的民间歌曲也不断发展。浪漫主义者留下了许多抒情诗作的光辉典范。在他们的作品中融合了崇高的精神、纯净和真诚的情感,尤其是在兹玛依的组诗《玫瑰》(1864)和《枯萎的玫瑰》(1882)中,用精致优雅的形式表现了这个特点。科斯蒂奇的抒情诗(其作品《Santa Maria della Salute》在十世纪末被誉为塞尔维亚抒情诗的典范)发展道路最为曲折,直到近来研究者才开始着手对其研究,将他看作是二十世纪诗歌的先声。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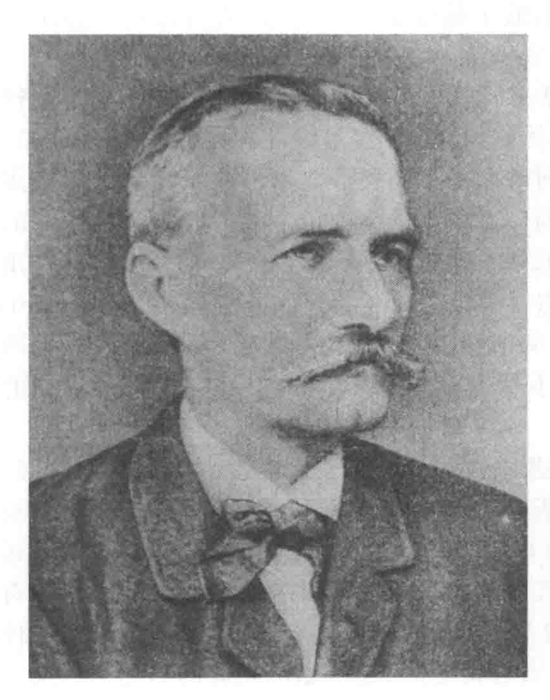
民族命运不寻常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变故激发了浪漫主义戏剧的发展。最为著名的便是亚克希奇和科斯蒂奇的历史悲剧和喜剧作品,前者的代表作有《塞尔维亚人的迁徙》(1864)、《伊丽莎白,黑山女皇》(1868)及《斯塔诺耶·格拉瓦什》,后者最著名的代表作则为戏剧《马克西姆·茨尔耶诺维奇的婚姻》。这部作品以民间歌曲为基础,把作品的情节建立在爱情和责任的冲突之上。尖锐的戏剧冲突、富有诗意的想法,感情充沛的对话——这一切使得科斯蒂奇的这部悲剧成为民族浪漫主义戏剧的代表之作。

六十年代末针对浪漫主义文学进一步创作道路的发展问题文学内部展开了争论，随着争论的加剧逐渐分化出两个趋势。其中一个趋势是追求绝对个性化的浪漫主义开端并且把美丽作为创作精神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这一趋势集中体现在科斯蒂奇的艺术尝试之中。

另一个趋势则在兹玛依和亚克希奇的创作中表现最为明显，他们将文学朝着更贴近人民生活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对现实的幽默讽刺。

对专制和暴政的反抗体现在讽刺诗中，兹玛依在六十年代就已经对君主官僚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后来七十至八十年代塞尔维亚具体的历史事件成为了讽刺诗歌的主要内容。作家们着力揭露暴力统治制度、警察的专横和社会的不公平（《塞尔维亚的新选举》等作品），嘲笑奴隶的屈从，嘲笑反抗君主制度的拥护者和进步力量的对立者（《最忠诚公民之歌》）。同时社会思想基础不断加深，民族形象不断具体化。七十至八十年代的诗歌开始将注意力投向社会的底层人民——他们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却忍受着贫穷、无权利和高利贷的盘剥（《桑树》、《高利贷者》、《第三份》，兹玛依；《土地》、《庄稼人》、《女裁缝》，亚克希奇）。

浪漫主义诗歌不但提升了人们对于自身力量的信心，还捕捉到了民族积极性的高涨（在兹玛依七十至八十年代的诗歌中出现了民族起义的题材，包括献给法国巴黎公社成员流血惨案的《巴黎野火》和《致仁慈的欧洲》）。



兹玛依像

浪漫主义诗歌与生活的贴近改变了体裁修辞体系。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作便是兹玛依六十年代的幽默长诗（《浓汤之诗》、《地窖钥匙之试》等）。这些诗歌的对象都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在对这些物品的歌颂中诗人表达了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有时诗歌也传达了尖锐的社会声音）。由此使人们开始追求具体的意象、日常的词汇，并且用幽默的内容和语调降低诗歌体系中长诗体

裁的成分。在这种变化之中体现的不仅是浪漫主义与古典赞美诗之间的论战，更是浪漫主义文学内部抽象崇高的开端的消亡。

在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中散文体裁明显逊于诗歌。历史题材散文的发展总是缺乏自主性并且囿于伤感主义和田园散文的范畴之内。

斯捷潘·米特洛夫·柳比沙(1824—1878)的散文风格独树一帜。他是黑山作家、社会政治活动家，在达尔马提亚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柳比沙和涅戈什的创作均是塞尔维亚和黑山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柳比沙以自己的艺术思维为基础，继承了口头故事的传统，延续了卡拉季奇等作家开创的先河，创造了鲜明的英雄人民的性格，在栩栩如生的描绘中刻画了黑山人民的生活(《乌克·多伊切维奇小说集》,1871年)。

塞尔维亚散文开始着力对现实生活中迫切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分析，随后开始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雅科夫·伊戈尼亚多维奇(1822—1888)的小说最能体现这个趋势，他的作品有《米兰·纳兰季奇》(1860)、《奇怪的世界》(1869)、《瓦萨·列什别克特》(1875)、《永远的未婚夫》(1878)等。伊戈尼亚多维奇是作家、批评家、社会活动家，他继承了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民族启蒙散文家的经验，其中包括小说家韦达科维奇以及喜剧作家、讽刺小说《没有爱情的小说》的作者斯特勒·波波维奇等人。伊戈尼亚多维奇的小说继承了欧洲"骗子小说"的传统。出生于奥地利的乡村，他对奥地利塞尔维亚人的乡村生活十分了解，并且以此为素材，写了不少的优秀作品，勇于刻画塞尔维亚现实主义文学之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发达的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包括对农村和农民沉重的处境的关注)、主人公社会性格的尖锐性，对日常生活诗意化的描写以及幽默等特点融合在伊戈尼亚多维奇的风格中，同时作家还擅长对人物性格进行有目的的静态描写以及创作冒险幽默的叙事诗。伊戈尼亚多维奇用几种塞尔维亚城市地区的古代语言进行写作，这些地区一直在外民族(匈牙利)的包围之中发展，隔绝了与丰富的塞尔维亚民族语根源的直接联系。这种情况使得他的影响在当时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以及斯列马茨的创作在九十年代末期到十世纪初塞尔维亚小说的形成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在塞尔维亚现实主义文学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却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创作，这一派作家包括米洛·格里希奇(1847—1908)、丽莎·拉扎雷维奇(1851—1890)、杨科·维塞利诺维奇(1862—1905)。在七十年代亚克希奇也开始现实主义的创作，同时保加利亚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卡拉维罗夫的作品也与现实主义紧密相关，因为他在六十年代末侨居塞尔维亚并且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从事创作。这些作品中主要的题材是描写农民以及

城市中产阶级的中、短篇小说(所谓的"农村故事"),小型体裁成为塞尔维亚散文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大的体裁。

这一代现实主义作家的形成深受革命民主主义者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1846—1875)的思想和个人的影响。他的文章《诗歌与思维》(1868)、《现实与诗歌》(1870)、《人民与作家》(1872)奠定了塞尔维亚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前景。以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皮萨列夫的美学思想为基础(马尔科维奇曾在圣彼得堡学习,熟知这些人物的著作),他呼吁作家应客观反映现实。"人民的生活就是诗歌的内容和现实",马尔科维奇曾说道。他肯定了文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且高度评价了其尖锐批评和讽刺的导向性。他认为最能达到该目的的题材便是社会小说。

民间口头故事是这一类作品的民族创作根源。在现实主义文学形成的过程中,青年作家对于国外文学,尤其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熟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俄罗斯文学在该时期南斯拉夫文学的发展中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果戈理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塞尔维亚文学的发展中影响尤为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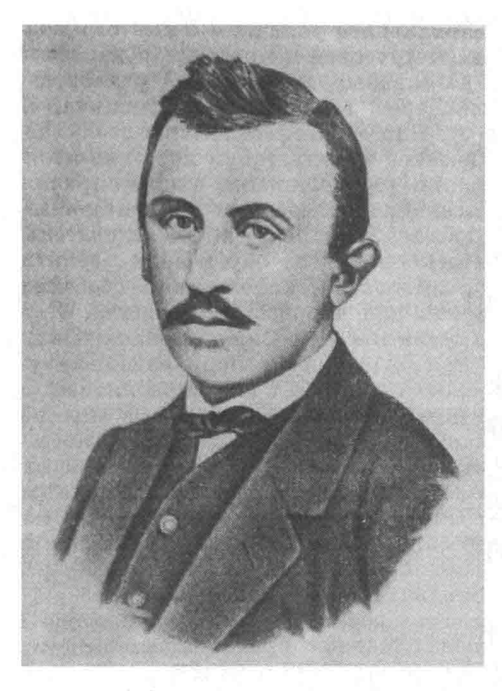
对现实日益尖锐的批评成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在当时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关系不断入侵,瓦解了父权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人民的道德和审美价值观。在格里希奇和亚克希奇的小说中,农村中充满了对抗冲突、农场主和高利贷者掠夺式的开采,在这里穷人毫无权利可言,而地方官员则专横霸道。故事的辛辣性和连贯性是早期批判现实作品的特点,这些特点促进了以格里希奇和亚克希奇为代表的讽刺幽默派文学的发展。

另外一些作家(拉扎雷维奇、维塞利诺维奇)则用另一种间接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反资本主义倾向——通过对父权社会生活方式的诗意化描写。这些对父权社会大家庭理想化的幻想限制了人们对于早期现实主义者的认识,狭隘了他们的生活视野(在拉扎雷维奇的小说《学校的圣象》中对"新人类"提出了批评)。

现实主义作家总是倾向于描写普通人的生活,这些普通人遵从自己的民族精神和道德基础,如仁爱、集体主义,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作和实践的开端。正是这种环境激发了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最初的自发的反抗活动(《糖的首领》,1875年,格里希奇;《塞尔维亚牧羊少年》,亚克希奇)。在这种环境之下,文学在受苦难折磨、被现实蹂躏的人们身上不断发掘自己真实的道德价值(《与父亲的初次晨祷》,拉扎列维奇)。拉扎雷维奇、维塞利诺维奇的论文继承了感伤田园派作品的传统,往往具有说教意味。同时叙

事的手法也在不断成熟(拉扎雷维奇奠定了心理现实主义在塞尔维亚文学中的基础)。

八十年代斯玛·玛塔乌里(1852—1980)的创作把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跳》(1892)、《巴克尼亚·弗拉·布尔涅》(1892),同时他写了大量肯定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他在民间口头文学上有着很高的造诣,同时对欧洲文学,尤其是法国和俄罗斯(文章《契诃夫》,1904 年)深感兴趣,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大大地扩展了其创作的领域。对达尔马提亚、黑山以及贝尔格莱德各阶层人民生活深入的洞察使得玛塔乌里的作品所触及的主题和问题具有很强的多样性,这对塞尔维亚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作品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属《巴克尼亚·弗拉·布尔涅》,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反教权主义倾向(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天主教修道院),因为故事与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联系,加之作者对主人公性格有血有肉的刻画以及乐观幽默的笔触,使得这部作品影响尤为深远。玛塔乌里的叙事风格简单而轻快,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这样的行文风格贯穿其作品的情节,将不同的人物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而这正是玛塔乌里的艺术天才之所在,并且安德里奇认为,这种风格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像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杰出的剧作家布莱尼斯拉夫·努希奇也开始投入文学和戏剧的创作中,并且其创作生涯长达五十多年之久。他不仅是杰出的剧作家,并且是散文家,创作了大量幽默短篇故事和小品文(《叶子》,1889 年),以及描写战争中普通士兵命运的小说(《一个下士的故事》,1886 年)。而《人民代表》(1883)、《可疑的人》(1887)、《徇私》(1889)则使其声名鹊起。努希奇延续了斯特勒·波波维奇所开创的批判讽刺传统,并且借鉴了特里夫科维奇的经验(特里夫科维奇是六十年代剧作家,以沃耶沃季诺地区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幅剧目)。努希奇创作了大

量抨击现实的作品，果戈理在其创作过程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钦差大臣》在当时塞尔维亚的作家和青年知识分子中享有极高的声誉。“那个时代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官僚，与《钦差大臣》中的描写太像了，以至于我们差点以为果戈理是我国的作家。”努希奇机智地对国家的君主官僚制度，对相互猜忌、追逐暴利的社会氛围，对官员的争名逐利以及人民的愚钝发出了嘲讽，在其之后便是九十年代末十世纪初的讽刺文学的繁荣。

沃伊斯拉夫·伊利奇（1860—1894）的创作正好处于塞尔维亚诗歌史上的转折时期，其作品收录在作品集《诗》（1887 年，1889 年，1892 年）中。他的诗继承了浪漫主义的传统，并在八十年代受到热烈的追捧，他对诗歌的主题和语言进行了创新，重新恢复了诗歌语言的内涵丰富性。

507 ·

在过去十年的诗歌中惯有的民族民间文学的主题和形象让位于其他国家与民族（希腊、罗马、西班牙等）的故事和传说中的主题和形象。伊利奇遵循的古希腊抒情诗的传统风格使他的诗歌具有一些典型性，比如：富有艺术表现力的具体的诗歌形象、经典的简洁的文字。伊利奇认为自己主人公内敛克制，较之浪漫主义者情绪的不羁显得更为专注。他的诗歌中最好的部分是他洋溢着伤感情绪的现实主义抒情诗。

伊利奇的创作促进了塞尔维亚文学与欧洲文学，尤其是与俄罗斯文学（他的诗歌与普希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进一步交融。而伊利奇与民族诗歌传统的联系也足够紧密。诗人虽与浪漫主义背道而驰，却继承了浪漫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高尚的公民性。在伊利奇的抒情诗和讽刺作品中这个传统通过很多形式表现出来，如对现实的尖锐批判，对暴政的抗议，对诞生在塞尔维亚的无产阶级未来的信念。同时，伊利奇的诗歌表现了当代人艰难的精神探索，这是 1883 年的季莫克起义失败后塞尔维亚解放运动的衰落和包括诗人在内的国内进步力量受到的迫害造成的。伊利奇作品中的个人主题和他对人的力量的怀疑就与此相关。在自己最后的没有能完成的诗作（《克里昂和他的学生》）中，他提出了诗歌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并如最新研究表明的那样，转向了象征主义。对艺术真谛的艰难探寻，对事物和现象的深入了解，可以期许的新发现——伊利奇将这并不轻松的任务留给了诗歌界后辈。

第六章　克罗地亚文学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克罗地亚确立了巴赫专制制度。五十年代，克罗地亚大地（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伊斯特拉、军事边境）也被并入了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这一时期是克罗地亚文学史上的困难时期，

当时，拥有进步思想的民族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德国文化和德语被强行植入，克罗地亚社会文化阶层被去民族化，克罗地亚文学虽然在四十年代随着“伊利里亚运动”曾经迎来过繁荣发展，却在这一时期遭到了严重阻碍。即便如此，文学传统并未中断，文学虽然特征多样，但依然是人民反抗情绪的主要传导者、民族自我觉醒意识的启蒙者。典型的文学作品包括米尔科·博戈维奇(1816—1893)创作的浪漫历史戏剧，尤其是《马季雅·古贝茨，农民国王》(1859)。这部作品是为了纪念1573年民族起义的领袖，具有反奥地利之意，涉及了尖锐的社会问题，被奥地利统治政权禁演。还有浪漫主义作家鲁加·伯蒂奇(1830—1863)的叙事抒情诗《结拜兄弟》(1854)和《白色迷雾》(1861)，这两部作品以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民间传统为基础写就。

尤尔科维奇、别尔克瓦茨、维别尔-特卡利切维奇等注重反映当代人的生活。他们的作品(主要是散文和戏剧)对资产阶级市侩的社会环境进行了纪实和批判，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

奥古斯特·谢诺阿(1838—1881)在克罗地亚文学向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是六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发展的中心人物。

谢诺阿有多重身份：诗人、散文家、评论家和出版家、翻译家、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维也纳茨》(1869—1903)的编辑(1874—1881)、萨格勒布剧院艺术总监。他的活动伴随着克罗地亚自治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文化生活的革新——萨格勒布剧院、科学院(1867)、大学(1874)的开放、出版业的发展都是文化生活革新的重要体现。

谢诺阿是以浪漫诗人的身份开始自己的创作道路的，他发扬了伊利里亚主义诗人的优秀传统，继承了他们作品的公民性，同时，他在自己的爱国抒情诗和历史叙事曲(《神甫和割麦人》、《该死的笼子》等)中歌颂了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沉痛揭露了封建主的恶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在谢诺阿的文学批判演讲中，形成了克罗地亚现实主义的主题思想，这种主题思想在作家的纲领性文章《我们的文学》(1865)和《论克罗地亚戏剧》(1866)中奠定了基础，并在随后十年的一些文章中得到了发展和加深。谢诺阿(像当时塞尔维亚文学中的斯·马尔科维奇一样)批判散文的伪历史和浪漫爱情主题倾向，反对爱国诗歌中华丽的辞藻，要求作家们向当代、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转变，对现实的社会进程进行深入、严肃的思考。谢诺阿呼吁：“身为作家，要研究我们的人民!”他继承前辈(包括斯·弗拉兹)的事业，坚决地与肤浅作品做斗争，认真地关注文学的艺术层面。他认为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主要体裁。要完成谢诺阿所提出的任务，就要加强克罗地亚文学戏剧与欧洲文学的联系，在欧洲文学中，他高度评价了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果

·508

戈理和屠格涅夫的作品。

谢诺阿在尖锐的文学斗争中坚持现实主义主题,并在自己散文作品中着力体现这一主题。谢诺阿的散文主题多样,作家既关注当代,也关注过去,关注克罗地亚社会不同阶层——从农民阶层到"上流社会"。

当代性通常体现在社会批判层面。谢诺阿是克罗地亚文学中第一位反映资本主义关系在农村传统世界中的破坏性渗透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在一个建立在暴力和压迫之上,被地主、放高利贷者和官员统治的社会中人民的悲剧命运(中篇小说《朋友拉夫罗》,1873 年;《巴伦·伊维查》,1874 年;《乞丐卢卡》,1879 年)。他在中篇小说《鱼缸里》(1878)和《弗拉基米尔》(1879)中勇敢揭露了上流社会虚伪的道德。在这些作品中,当代性和当代的迫切问题借助丰满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得以呈现,尽管当时对当代性的现实性理解的经验刚刚开始,在这个方向的初级阶段缺少说教和概念化也是行不通的。

归根结底,谢诺阿的名字首先与历史散文和历史长篇小说体裁相联系。在此领域中,作家不仅代表了克罗地亚的,也代表了十九世纪整个南斯拉夫文学的最高成就。谢诺阿的长篇小说《珠宝商的黄金》(1871)、《农民起义》(1877)、《珍惜谢妮亚的手》(1879)、《诅咒》(1881)中包含丰富的十四至十八世纪的民族历史材料。作家重点关注克罗地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其中包括那些著名的事件,如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起义和 1573 年马季雅·古贝茨领导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农民反对封建主的起义)。

谢诺阿的历史作品以反映尖锐社会问题为大方向,这些作品的基础是社会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珠宝商的黄金》中新兴资产阶级与上流社会和贵族封建主之间、《农民起义》中农民和地主之间等)的冲突。在评价历史现象时,作家从民主立场出发,尖锐地批判了封建主,是克罗地亚散文中第一个将人民塑造成争取自由和公正的斗争中的主要力量的作家。

受到压迫而奋起反抗的起义人民的形象是谢诺阿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农民起义》的核心。正如苏联学者里亚博娃所评价的那样,在描写一系列形象各异的自由斗士时,谢诺阿"深刻地描绘出每个人物和冲突的每个细节",描摹了农民领袖马季雅·古贝茨的高大形象,突出了他对自由的热爱,对共同事业的忠诚、杰出的智慧和高尚的品格。

谢诺阿的历史作品建立在事实和可靠的资料之上,在研究这些事实和资料时,作者的态度格外谨慎。对历史现实的忠实反映了作者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作者可以描绘久远的历史时期,反映出历史的多样性和生动具体性,小到日常生活和景物,大到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宗教氛围。谢诺阿对待历史材料,包括过往的英雄事迹时把眼光对准当代,对准坚持权利和具有

反抗精神的人民。此外，陈述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时，历史资料给了作家相对较大的自由度（例如，研究者们不止一次注意到，作家在自己的作品，包括《诅咒》中歌颂了旧萨格勒布，但旧萨格勒布的形象并不只是作家最喜欢的城市，也是克罗地亚的中心）。

在谢诺阿的创作时期，克罗地亚文学刚刚掌握客观反映现实的方法，所以在他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呈现出浪漫主义开端（体现在个别形象和场景的虚构与说教方面）并不奇怪。但通常来说，浪漫主义手法是作为情绪影响的工具来使用的。此外，作家对于和平解决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的冲突抱有幻想，这体现了作家社会立场的某种局限性（比如，长篇小说《农民起义》的结尾；中篇小说《乞丐卢卡》中，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以对抗双方的和解作为结局）。 · 509

谢诺阿在世时，他的作品的一些缺陷就遭到了年轻一代文学家的尖锐批评。批评者认为，谢诺阿并没有坚持现实主义原则，虽然这些原则是他自己提出的，且正因为坚持了这些原则，他的作品才成为克罗地亚现实主义的重要成就；同时也认为，谢诺阿没有忠实地描绘人民生活的全部复杂性。

八十年代，一些年轻的散文家非常活跃，大部分是谢诺阿的直接继承者和学生，其中包括：叶·库米契奇、安·科瓦契奇、约·科扎拉茨、克·山·雅尔斯基、文·诺瓦克、诗人西·克兰切维奇。现实主义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是库埃那·赫德尔瓦利总督统治时期，他的“铁腕”制度和对克罗地亚人民自由解放斗争的镇压使他臭名昭著。他的统治引起了克罗地亚进步力量的坚决反抗，其中包括以作家为首的民族知识分子。对现实主义未来发展道路的多样探寻，引发了热烈的文学争论（四十年代克罗地亚人文学批判性思想的发达对其产生了影响）。一些作家追随左拉的自然派理论，叶甫盖尼·库米契奇（1850—1904）在《论长篇小说》（1883）中就对自然派的原则有所阐释（作家曾在法国住过几年，对法国的文学生活足够熟悉）。与谢诺阿的经验不同，库米契奇认为文学的任务在于展现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一面，这引起了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批评家的坚决反对。库米契奇的作品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批判资本主义和贵族，批判他们道德（长篇小说《奥尔加和丽娜》，1881 年；《莎比娜女士》，1883 年；《受惊的亲家》，1883 年；《孤儿》，1885 年等）。但在解释上层社会的缺陷及社会生活阴暗面时，作家认同浪漫主义的观点，将民族生活中的宗法制基础和外国对社会上层致命的影响对立起来。浪漫主义观点在库米契奇的历史长篇小说中也有所体现，在这些作品中将克罗地亚贵族的作用理想

化了(《兹林斯基和弗兰科班的阴谋》,1892—1893 年),这自然削弱了作家的现实主义。

作为八十至九十年代克罗地亚现实主义作品体裁特点的范例,库米契奇的作品具有重要意义。作家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认为体裁的特点与取材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发展相关,这就与以短篇小说为主要体裁的塞尔维亚散文有所区别。

曾在萨格勒布生活过的年轻的保加利亚批评家米拉洛夫在自己的论战文章《关于俄罗斯社会和文学发展的观点》(1881)中呼吁作家们将俄国革命民主派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的思想的批判性文学原则作为方向。但与塞尔维亚现实主义文学不同,俄罗斯革命民主派在思想方面对八十年代克罗地亚文学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书刊审查影响了俄罗斯批评的传播),而在艺术方面的影响更加明显,尤其是屠格涅夫(他的作品于六十年代被翻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此外,谢诺阿的文学批判文章也引起了年轻作家对屠格涅夫的关注)。

在克罗地亚现实主义作品中,关于年轻知识分子的小说类型非常典型。克罗地亚研究者认为,这种类型缘于屠格涅夫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的传统(约·科扎拉茨、列斯科瓦尔、图里奇),但尤其是克萨维尔·山道尔·雅尔斯基(1854—1935 年;笔名柳博米尔·巴比奇),他常被称为"克罗地亚的屠格涅夫")。

510·

克萨维尔·山道尔·雅尔斯基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在古老的屋檐下》,1886 年;《三个无题的故事》,1891 年等)、社会心理长篇小说(《夜》,1886 年;《科·鲍里斯拉维奇》,1887 年;《秋尔金查·阿基奇》,1889 年;《拉德米洛维奇》,1894 年等)、历史长篇小说(《黎明》,1892 年;《为了亲切的话语》,1906 年),体现了八十至九十年代克罗地亚现实主义文学在主题思想和体裁类型上的多样性。雅尔斯基投身文学将近半个世纪,然而他的创作活动到了八十至九十年代才迎来繁荣时期。作为那些反对奥匈帝国统治的资产阶级贵族反对党的积极拥护者,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广泛涉及民族斗争的主题。同时,他能够对现实进行尖锐的社会批判,揭露现实,讽刺官僚和上层社会,展现"小人物"的遭遇(《三个无题的故事》),揭示民族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雅尔斯基的名字还与社会心理小说体裁的形成有关。作为古代贵族的后裔,作家在评论现实时持保守立场。他(常常以一种很动情的方式)所歌颂的正在消亡的贵族,对他来说是民族精神、崇高道德传统和爱国主义的凝结(雅尔斯基作品的最新研究的作者认为,从已有的《贵族之家》的诗化、屠格涅夫的散文的修辞特点、所谓的"诗意的现实主义"中,都能看出克罗地亚作家和俄罗斯作家碰撞的一个基本点。屠格涅

夫散文的社会分析的深度在雅尔斯基对创作的理解之外)。作家的悲观主义情绪,尤其是他晚期作品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引起了一些克罗地亚现代派代表的关注。

安特·科瓦契奇(1854—1889)与社会揭露的趋势的显著加强息息相关。科瓦契奇农民出身,生活坎坷,对当代现实的阴暗面有着犀利的认识。他携三部描写不同社会阶层的长篇小说进入文坛——《男爵夫人的爱》(1877)、《律师》(1882)和《在登记处》(1888)。《在登记处》在十九世纪克罗地亚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小说的主题在科瓦契奇的现代散文中非常典型,讲述了资产阶级世界中个人的命运。作品的开头,小说的主人公伊维查·吉斯曼诺维奇进城时,是一个农村小男孩,充满对生活、对自己力量的信仰;在作品的结尾,他饱受生活摧残,成了庞大行政机器中的一个平凡的小官员。这个小人物悲剧命运的故事是在不同社会阶层的鲜明生活图景中展开的,科瓦契奇破坏了乡村诗化的传统,展现了一个充斥着社会矛盾和个人本能的世界(在九十年代末兰科维奇的作品中展现出的塞尔维亚乡村也是这样)。科瓦契奇没有进行任何粉饰(就像他的同辈人和前人们做过的那样),他从不幻想。小说的最后一幕是主人公在登记处纵火。登记处是秩序主导的象征,这是克罗地亚现实主义文学向反映受压迫群众对社会不公的抗议(暂时是自发的、个别的)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在科瓦契奇的长篇小说中,生动具体的描写与幻想和讽刺怪诞的手法结合起来,其风格结构具有勇敢创新(和对于"诗意的现实主义"的论战性)的特点。同时,这部作品的语言具有民间口头语言的特点。

社会典型化的力量,批判的尖锐性和不妥协性,使科瓦契奇的长篇小说《在登记处》成为十九世纪克罗地亚文学史中最重要且独树一帜的现象之一。

约西普·科扎拉茨(1858—1906)在创作中延续着对现实的尖锐的社会性批判。在他的短篇小说(《尼基爷爷的故事》,1878 年;《美人卡塔》,1884 年;《杰娜》,1894 年等)和长篇小说《呆滞的资本》(1889)、《光明与黑暗》(1891)中,讲述了作家故乡斯拉沃尼亚的覆灭和资本主义对乡村的渗透。然而与科瓦契奇不同,科扎拉茨无法克服幻想,这表现在作家持有健康的民族开端与扩散的资本主义影响相矛盾的观点。作家相信,彻底推行农业生产,知识分子从城市返回乡间,现实便能有所改变。这使他的作品带上了说教色彩,在长篇小说《呆滞的资本》中尤为明显。作家的艺术造诣在对斯拉沃尼亚农民、鲜明的女性特点和故土风景的描写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文采斯拉夫·诺瓦克(1854—1905)是成果最丰硕的散文家之一,他绘

制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克罗地亚现实的宏伟画卷。他的作品仿佛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终结和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新阶段的开端。作为一位拥有矛盾的思想和艺术追求的作家，一方面，诺瓦克顺应自然派，这体现在作家用遗传理论解释社会现象的尝试(长篇小说《蒂托·多拉契奇》，1906年)和一些写实的描写中；另一方面，在诺瓦克的作品中，民主的和现实主义的原则仍然占据上风。在主题各异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集(《帕瓦奥·舍戈塔》，1888年；《小城》，1894年；《末代的斯捷潘契奇》，1899年；《两个世界》，1901年)中，作者关注了很多当代问题，如农村的阶级分层、人民大众的贫困、贵族的退化和资产阶级的形成、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悲剧等等。作者继承了克罗地亚文学最好的传统，即谢诺阿的传统，创作了长篇小说《涅哈伊》(1892)，主题是依然迫切的克罗地亚的民族解放斗争问题。与前人相比，在反映十九世纪初广大社会阶层反对奥地利压迫者的爱国运动时，诺瓦克强化了对这次运动的社会层面的反映。在南斯拉夫现实主义散文中，诺瓦克是尝试塑造工人形象的第一人(作品集《在城市的贫民窟中》，1905年)。他的作品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思想对克罗地亚现实主义文学所产生的影响的鲜明例证。

后来成为杰出的剧作家的伊沃·沃伊诺维奇(1857—1929)早期的短篇小说《老鹤草》(1886)和短篇小说集《钢笔和铅笔》(1884)，以及抒情心理长篇小说(《庄园的破产》(1896)和短篇小说的作者扬科·拉斯科瓦拉(1861—1949)的作品，预示了克罗地亚散文从艺术分析到个人内心世界转变的新进程。

杰出诗人西尔维·斯特拉希米尔·克兰切维奇(1865—1908)的作品促成了克罗地亚诗歌在新阶段的成功。克兰切维奇的创作活动始于谢诺阿的传统，他的第一部爱国主义诗歌集《十五音阶诗歌》(1885)就是为了纪念老师。诗人鲜明的个人特色稍后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体现，这些诗歌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收录在诗集《诗选》(1898)、《烦恼》(1902)和《诗》(1908)中。社会反响的力量是克兰切维奇诗歌的主要特点之一，他的诗歌反映了很多具体的当代问题。在克罗地亚诗歌中，诗人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他不安分、不断抗议、不断追寻、号召改变现实。克兰切维奇不仅是克罗地亚文学，也是南斯拉夫文学中首先将社会进步与工人阶级联系起来的作家之一，他的诗歌《工人》(1885年，新版本1898年)是无产者的赞歌，是他对劳动的颂扬和力量的证明。对人类未来的信仰是他的诗歌的特点之一。

同时，克兰切维奇是一位对人生持悲观主义态度的诗人。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他曾在这里度过了几年艰难的岁月)被奴役的事实不仅带给他

的作品斗争和抗议的倾向，也带来了强烈的世界失和、悲剧命运的意识。克兰切维奇的抒情主人公有复杂的世界观和紧张的内心追求，能预感到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他的诗才将尖锐的批判主义和对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结合起来，因此它的诗歌语言的特点是具体现实与哲学概括紧密融合（日常画面伴有常用《圣经》形象表达的寓意）。概括的规模性在他的诗歌的体裁体系特点中也有所体现，他的诗歌接近于抒情叙事诗的形式和独特的诗歌清唱剧。

克兰切维奇的作品代表了十九世纪克罗地亚诗歌发展的完成，为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开创了道路。

第七章　斯洛文尼亚文学

·512

与同属于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相同，斯洛文尼亚的政治文化生活在消除专制制度并颁布宪法（1860）后明显地活跃起来。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始，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开始努力团结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力量，试图在与异族（德国和意大利）影响的抗衡中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在这方面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是在各个城市和大型居民点建立阅览室组织。1864年，以卢布尔雅那中央阅览室为基础成立了出版、发行书籍的社团——“斯洛文尼亚社”；1867年又成立了“戏剧社团”。几年之内，文化启蒙和文学社团遍布整个斯洛文尼亚。

在斯洛文尼亚相当不均衡的民族文化运动中，弗朗·莱夫斯蒂克（1831—1887）坚持自由、民主的文化概念与奥匈帝国的统治、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保守派和天主教反动派进行力量悬殊的斗争。莱夫蒂斯克出身于农民家庭。他的一生经常在与贫困做斗争。他的一切活动，包括政治、文学批评、文学方面，都是为确立斯洛文尼亚民族独立的思想而服务。在德语的强制影响下（当时国家机关、学校、文学创作中都使用德语），莱夫蒂斯克付出艰辛的努力来恢复母语的地位，使文学成为斯洛文尼亚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自己的文章中，他经常唤起读者对民间创作的关注。他自己则以弗科·卡拉季奇为榜样，收集民间创作并出版民间文学作品集。他认为，民间文学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为后者提供来自原始民间生活的主题和题材；更重要的是，民间文学是民族语言的积淀，它是纯净的，没有受到异族文化的侵蚀。

莱夫斯蒂克的大部分作品都只残留下片断，唯有《从利几亚到查代什旅行记》（1858）和《来自弗尔哈的马丁·克尔班》（1858）保存完整。莱夫斯蒂克的散文通过大量现实细节来细致描绘农民的生活、风俗、习惯，和他们经

常针对自己国家和异族的权利压迫而进行的秘密灵活的反抗(特别是在《马丁·克尔班》中)。莱夫斯蒂克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正是作为一名思想家,他在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奠基者的角色。

莱夫斯蒂克在他创办的杂志《钟声》(1870 年,1876—1880 年,该名称在斯洛文尼亚语中意为"钟声",其选取受到赫尔岑创办的杂志的影响)中就民族问题发表的见解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可谓毁誉参半。杂志的编辑者除了莱夫斯蒂克之外,还有约西普·斯特里达尔和约西普·尤尔切奇。斯特里达尔的文学批评文章为斯洛文尼亚的美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六十年代,莱夫斯蒂克和斯特里达尔、尤尔切奇一起又完成了一项创举——出版了斯洛文尼亚经典名著系列。该系列的开篇是民间文学经典作家普列舍伦的诗歌。莱夫斯蒂克任该书的编辑,斯特里达尔撰写序言。在序言中,他详细分析了普列什尔的诗歌,并指出它对文学发展的意义。

莱夫斯蒂克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在文章中大致勾画出了重兴民族独特文学的计划。这促进了今后文学运动朝着现实主义方向发展。

然而,应该指出,多个世纪以来斯洛文尼亚民族受制于奥地利,经济发展的"普鲁士模式"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教权主义的强大影响和斯洛文尼亚自由派的软弱——这些都不可能不反映在斯洛文尼亚现实主义的特点中。在斯洛文尼亚,批判现实主义并未成为重要传统。即便是在现实主义最盛行的八十年代,文学创作中仍清晰可见浪漫主义趋势。许多斯洛文尼亚的文学家将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称为"诗意的"。

现实主义趋势诞生于六十年代。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叙事散文代替诗歌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文学创作实践中,现实主义趋势首先体现在与莱夫斯蒂克亲近的作家笔下。

513· 莱夫斯蒂克的文学计划、有时是批评性的评论和意见均在约西普·尤尔切奇(1844—1881)的作品中付诸实施。尤尔切奇所创早期中篇小说(《尤里·郭兹雅克,斯洛文尼亚亲兵》,1864 年;《城市法官的女儿》,1866 年)的素材来自民间文学。在斯洛文尼亚第一部长篇小说《第十个兄弟》(1867)中,作家转向当代生活。他塑造了一系列现实人物,但在情节的设置和冲突(以致命激情的碰撞为基础)的解决上仍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在尤尔切奇献给当代农民生活(《邻居家的儿子》,1868 年)和"小人物"命运(《波吉达尔·基尔杰里》,1867 年;《特鲁布卡·塔巴库》,1870 年)的作品中,现实主义的趋势体现得最为显著。但是,在尤尔切奇的作品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直接碰撞,甚至在他晚年的中篇和长篇小说(《索贝尔医生》,1876 年;《两把椅子之间》,1876 年;《美丽的薇达》)中也很难分清两者的

界限。

弗朗·艾利亚维茨(1834—1887)是莱夫斯蒂克的政治文化计划的支持者。该作家的民主情绪与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相近,特别是果戈理的创作。在中篇小说《阿弗古什金·奥采别克》中,作家讲述了一个穷困潦倒的公务员的命运。故事的主人公被斯洛文尼亚的评论称作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①]的"亲"兄弟。果戈理对艾利亚维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试图理解"小人物",展现受尽折磨和侮辱的人的内心世界,而且也表现在创作方法中,擅长刻画性格,注重文学细节。

在散文领域,莱夫斯蒂克最亲密的战友是约西普·斯特里达尔(1836—1923)。在这位作家的评论文章中也体现了他复杂矛盾的观点。作为一名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他呼吁描绘理想世界,而不是愚蠢的日常生活。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他却不时违背自己宣扬的原则。他认为,解决斯洛文尼亚文学主要任务的办法是接近西方文学。在他的短篇小说(《斯维基诺娃·梅特卡》,1868 年;《罗萨娜》,1877 年)和长篇小说(《索林》,1870 年;《米洛朵斯基先生》,1876 年)中,许多主题都令人想起卢梭的《爱弥尔》,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斯特里达尔在这里思考艺术的使命,大自然宽慰人的力量,人类的痛苦,梦想和现实的差距。斯特里达尔有时转向当时的社会冲突,例如长篇小说《索特尼基》(1878)。在这部作品中,作家远离了逝去的父权社会乌托邦式理想图景,描绘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乡村生活。

七十年代,斯特里达尔是斯洛文尼亚文学生活中的中心人物。但是,当现实和民族文化需要另一种文学创作时,社会理想的薄弱、当时对浪漫主义的维护都成为了他在八十年代初失去领导地位的原因。代替斯特里达尔的是新一代的作家。年轻的作家们不仅赋予文字上的现实主义新的特点,而且从理论角度论证它。现实主义理论基础发展中的功臣是列维茨和采列斯京。

弗朗·列维茨(1846—1890)在献给伟大的斯洛文尼亚作家的文章中捍卫进步艺术和现实主义。

弗朗·采列斯京(1843—1895)的政论批评活动促使斯洛文尼亚人认识了俄罗斯的文化生活、民主批评家的论著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采列斯京借鉴俄罗斯文学和革命民主批评的经验,号召作家反映当代社会政治和社会问题,更深入地研究生

---

① 果戈理短篇小说《外套》的主人公。——译注

活;他对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给出了批评意见,指出了他们的软弱性。凭借屠格涅夫的创作,批评家确信,作品中最主要的不是浪漫主义引人入胜的叙述,而是阐明当代社会的重要思想。采列斯京的批评论著加强了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关注。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其他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被译成斯洛文尼亚语。几乎所有十九世纪斯洛文尼亚的大作家和诗人的创作都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八十至九十年代斯洛文尼亚文学的概貌及其发展的特点由散文家塔夫查尔、盖尔斯尼克和诗人阿什克尔茨的创作确定。

在伊万·塔夫查尔(1851—1923)的早期创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与尤尔切奇和斯特里达尔的散文的联系。塔夫查尔与尤尔切奇的相似处在于对历史问题的兴趣;与斯特里塔尔的相似处在于对爱情冲突的迷恋,且两位作家都以浪漫、感伤的笔调来刻画。

514·

追求现实主义的运动在塔夫查尔的创作中体现为农民主题的加工。这一主题在当时的斯洛文尼亚文学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他在系列作品《在山上》(1876—1888)、《在礼堂里》(1894)中以极强的文艺手法表现农民的生活;在后一部作品中触及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包括斯洛文尼亚农民移居美国的问题。在这些短篇小说中,塔夫查尔和从前一样对尖锐的戏剧化场景和不寻常的悲剧命运感兴趣。但是,作家为自己笔下的浪漫主义主人公勾画出清晰具体的轮廓,选取鲜明的生活场景,使其成为富有表现力的现实主义人物。

现实主义的端倪更体现在塔夫查尔后期的历史中篇小说中,如《我一生的生活》(1883)和《城堡里来的文书》(1889),还有讽刺作品《4000》(1891);在《4000》中,作家预言,如果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构想全部实现,那么到4000年首都卢布尔雅那将仍然存在于世上。

十九世纪斯洛文尼亚现实主义散文的巅峰是扬科·盖尔斯尼克(1852—1897)的创作。他出生于富裕之家,在维也纳和格拉茨接受教育。盖尔斯尼克最早期的作品(长篇小说《在热林》,1876年;中篇小说《柳代尔朗娜》,1882年)借鉴了尤尔切奇的散文,以错综复杂的浪漫主义情节为基础,穿插着复杂的戏剧化技巧。在之后的创作中,受到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特别是屠格涅夫的作品,盖尔斯尼克很快掌握了现实主义的手法。

在长篇小说《仙客来》中,盖尔斯尼克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这切合了采列斯金的理论。在这部作品和与之情节相关联的长篇小说《鼓动者》(1885)中,还有在中篇小说《罗什林和弗里扬科》(1889)、长篇小说《好出风头的人》(1893)中,作家刻画了斯洛文尼亚社会各个不同

阶层的代表人物：资本地主、外省官员、知识分子；他刻画了他们的受小市民习俗影响下的日常工作，残酷的选举前之战。作家在自己笔下的主人公身上没有运用任何幻想。他们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团体（自由派、教权主义派和保守派、亲奥派、也被称作"涅姆什库塔尔"），但都远离人民，对人民的命运冷漠置之；在他们表面上的爱国主义下隐藏着非常个人的、自私的利益。

与力图刻画浪漫主义性格的前辈们和同时代人不同，盖尔斯尼克将新型主人公引入到文学中。他们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一群没有崇高的理想和激情，只关心自己的前途，与周围庸俗环境和谐共处的人。

盖尔斯尼克笔下的冲突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社会冲突代替了爱情冲突。这在斯洛文尼亚文学中开创了社会分析及理解社会和时代关系的道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是盖尔斯尼克的农民散文。在中篇小说《遗嘱》（1887）、《父亲之罪》（1894），特别是短篇小说系列《农民生活图景》（1882—1890）中，作家真实地展现了受资本主义影响而濒临衰亡的乡村。农民的道德美德（他们的勤劳、热爱土地、乐观和生命力旺盛）并没有使作家忽视他们的自私心理，而这正是由土地和财产引发恐惧的原因。盖尔斯尼克的农村题材散文与同时代人相比，其突出特点是：深入触及人物内心，提出重要的伦理问题，批评主义力量的加强。

九十年代，在斯洛文尼亚文学中与现实主义共同发展普及的还有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者追随左拉的思想，将人视作个体，受命中注定的"自然"（遗传、疾病、天性）的影响，用自然规律代替社会规律。类似的创作手法在散文家兼剧作家弗朗·郭菲卡尔（1871—1949）的长篇小说《在血泊里》中得以应用。郭菲卡尔是斯洛文尼亚自然主义派的领导者和理论家。属于这一派别的有拉多·穆尔尼克、索夫卡·克韦德洛娃、安东·冯代克、艾格尔别尔特·刚克等。但是，自然主义并没有在文学中广泛普及。

与散文不同，诗歌中仍然保留了浪漫主义。

天才的抒情诗人西蒙·延科（1835—1869）初次发表爱国主义幽默长诗《奥格涅普拉姆季奇》（1855），以外省浪子的爱情奇遇与浪漫主义长诗的英雄业绩相对立。在通往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迈出的下一步是幽默短篇小说。它们的创作毫无疑问都受到了果戈理的影响。此后延科再也没有创作过散文。他的抒情诗在诗人的思想艺术追寻方面各不相同，但都属于浪漫主义。

延科的诗歌主题非常多样化。在他的诗歌里满怀真诚、直率地表现着对受奴役的祖国的爱这一主题。诗人创作的爱国主义诗歌中最杰出的一首《前进，光荣的旗帜》成为了斯洛文尼亚的国歌。在政治讽刺诗领域，他取

得了更大的成功。延科的个人抒情诗以精神上的丰富、热爱自由的秉性、为祖国所遭受的苦难而深感痛苦，以及通过自己的漂泊不定和孤独(《第三次苦难》)来表现内心世界。依靠抒情民族歌谣的传统与海涅和莱蒙托夫的经验，延科建立了简单纯朴的诗歌形式，其间又有富于变化的、悦耳动听的、丰富的色调、半色调，显得抑扬顿挫。他经常被称作印象派抒情诗的先驱。

类似的主题(对世界的不满、孤独)也出现在另一位伟大的诗人西蒙·格里高里切奇(1844—1906)的创作中。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些主题产生自诗人并不复杂的命运。迫于贫困，他不得不进入神学院学习，成为了一名神职人员。他的一生都饱受着教权阶层的恶意压迫。但是，比起个人的悲剧，祖国的命运更加使诗人感到苦恼。他为祖国写了许多诗歌，后来都成为众所周知的名作，例如，《索奇河》、《祖国》、《让鲜血溅满我的心吧》。诗人的许多诗歌都被谱曲，成为了民族歌谣。

斯特里达尔也在诗歌领域做出了一番独特的贡献。他创作了抒情诗、史诗和讽刺诗。其中最有意义的是《维也纳十四行诗》(1872)，它揭露了保守领袖和丑恶的资本主义行径。

八十年代早期出现了第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安东·阿什盖尔茨(1856—1912)。他出身于并不富裕的农民家庭，曾是一位天主教神职人员。辞去职务并与教会决裂后，阿什克尔茨用自己的作品为祖国的民族社会解放而英勇斗争。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他最喜爱的诗人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造就了这样一位独特的诗人。阿什盖尔茨诗歌中深刻的民主主义不仅体现在内容上，而且体现在作品的形式中。他天赋中的庄重特点表现在大量的叙事诗和抒情诗、独具风格的诗体短篇小说和讽刺寓言中；他那勇敢的、强有力的诗歌充满了光彩，诗中的形象优美生动，在诗歌中反映了世纪之交斯洛文尼亚的生活和它曾经的历史。

九十年代中期，阿什盖尔茨关注工人运动。他是斯洛文尼亚文学中第一位描绘工人生活的诗人，为无产阶级诗歌奠定了基础。阿什盖尔茨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理解并不彻底，还残留着一些资本自由主义的色彩。尽管如此，阿什盖尔茨仍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二十世纪伟大的斯洛文尼亚诗人伊万·仓卡尔曾经写到阿什盖尔茨，“他的读者可以读到真实的当代生活：受压迫者为自由和真理的无功之战；可以读到对虚伪者和自私者高傲的嘲讽……”的确，阿什盖尔茨的诗歌涵盖了十九世纪斯洛文尼亚现实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

阿什盖尔茨的第一部文集《叙事诗和抒情诗》(1890)贯彻了爱国主义和为民族自由而战的思想。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系列叙事诗《古老的真

理》。它歌颂了在“农民的国王”马丁·古贝茨领导下的农民起义。在《抒情诗和史诗》(1896)一书中阿什盖尔茨转向尖锐的社会问题，表达了他对剥削制度的反对(《来自无名穷人的歌谣》系列)。这一系列的诗歌，如《工人的煤之歌》、《穷人的春天之歌》、《工人的女儿》，在斯洛文尼亚民主和社会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农民劳动和生活习俗的描写(《边界上的石头》、《在洛加的婚礼》)以现实主义、可塑性和深度为特点。《穷人的晚祷》充满愤怒和激情地揭露了虚伪的教权道德。用仓卡尔的话来说，在斯洛文尼亚，这些诗歌“像战斗的号角般被四处传诵”。这一切都使得阿什盖尔茨成为进步青年的代言人，确立了他对下一代诗人的影响。

六十至九十年代，斯洛文尼亚戏剧的发展明显滞后于诗歌和散文。它主要是为业余剧团提供剧目。斯特里达尔尖锐地批评了这些肤浅的、缺乏文艺性的剧作。他认为民族戏剧艺术应该向欧洲古典戏剧靠拢。本着使斯洛文尼亚戏剧“欧洲化”的目标，斯特里达尔创作了一些富有欧洲浪漫主义精神的戏剧(《俄瑞斯忒斯》，1869 年；《美狄亚》，1870 年；《克拉拉》，1880 年，等等)。

当时受观众盛赞的剧目是由米罗斯拉夫·菲里哈尔所作的描写乡村生活的喜剧《省长》(1871)和由约西普·奥格林茨所作的《边界在哪里》。前者尖锐地批判了德国迷；后者讲述的是两位农民因为一小块土地而引发争讼的故事。在这些简单而富有幽默性的戏剧中闪现着现实主义的元素。但是，现实主义戏剧发展的基础仍未打好。 ·516

这一时期，斯洛文尼亚戏剧的巅峰之作是尤尔切奇和莱夫斯蒂克的浪漫主义悲剧。其中，由他们创作的历史悲剧《图格美尔》讲述了斯洛文尼亚王公图格美尔的悲剧性命运。他被法国侵略者所骗，不自觉地造成了自己国家的民族灾难。该悲剧饱含的民族解放激情与奥匈政权迫使斯洛文尼亚民族德国化相对立。因此，这部悲剧被奥匈书刊检查机关禁演至 1914 年。

1892 年，尤尔切奇的悲剧《维罗妮卡·戴森尼茨卡娅》(1886)在柳布良那的上演拉开了斯洛文尼亚民族剧院首个演出季的序幕。戏剧社团在 1867—1892 年间的活动和戏剧文化中心的建立为斯洛文尼亚戏剧进入二十世纪之初发展的高潮奠定了基础。

第八章　卢日昌塞尔维亚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卢日昌塞尔维亚文学继续在自己积累的经验和与德国及斯拉夫邻邦的相互影响作用下向前发展。在民族和社会愤怒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卢日昌塞尔维亚文化的活动家力图克服方言和宗教的差异，从

而保存和巩固民族自觉意识。该民族的人口很少,在十九世纪中叶约有十五万人。拿破仑溃败后,德国的土地划分发生了变化。这对于卢日昌塞尔维亚人并不是特别有利。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保留了萨克松国籍(而正是与萨克松的历史文化渊源最为久远、原始),其他人随着土地归辖的变化转由普鲁士统治。据统计,卢日昌塞尔维亚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获得普鲁士国籍,因此他们讲两种语言(高级卢日昌语和低级卢日昌语)。毫不惊讶,在这里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遭遇了特别的困难。

卢日昌塞尔维亚文学的奠基人是哈德里·塞伊莱尔(1804—1872)。他是第一位真正的民族诗人、人道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学者。1845 年,塞伊莱尔成为进步小组的代表人物。该小组旨在建立卢日昌知识分子阶层的科学出版和启蒙教育社团“卢日昌社”(1847—1933)。塞伊莱尔是高级卢日昌文学中民族浪漫情绪的最佳代言人。塞伊莱尔的许多诗歌都由作曲家科索尔谱曲,成为卢日昌的民族歌曲。塞伊莱尔也创作了大型叙事诗《四季》(1845—1860),刻画了卢日昌人民的现实生活。至今,这部作品仍在民间节日期间作为清唱剧(由科索尔作曲)广为流传。《卢日昌歌谣》汇编使塞伊莱尔成为了卢日昌最著名的寓言作家;他广泛运用民俗题材和平凡的生活场景,以寓言的形式表现出民族生活的广阔图景。

塞伊莱尔领导年轻的卢日昌文学几十年,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继承者。其中最出名的有扬·韦利亚(拉德谢尔布)(1822—1907),第一位卢日昌女诗人盖尔塔·维查塞茨(1819—1885),扬·博古维尔·穆钦克(1821—1904),米哈尔·戈尔尼克(1833—1894),克热斯仓·博古维尔·普夫里(1825—1889),米哈尔·多玛什卡(1820—1897),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属于左翼民主派,并参与 1848—1849 年间的革命风潮。民族复兴的活动家为十九世纪伟大的卢日昌诗人雅各布·巴尔特-琴什斯基(1856—1909)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他于塞伊莱尔逝世三年后登上诗歌的舞台。

与塞伊莱尔并肩齐名的还有一位伟大的卢日昌民族复兴活动家——扬·阿尔诺什特·斯莫列尔(1816—1884)。他的一生都在积极收集和研究卢日昌民俗文化。

517· 斯莫列尔曾担任多份杂志的编辑工作:1847 年至 1852 年担任《塞尔维亚社杂志》的首位编辑;1848 年至 1868 年任《斯拉夫文学、文化及科学年鉴》编辑;1861 年起主持编辑文学杂志《卢日昌人》(1882 年该杂志与《青年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椴树》合并为《卢日昌》);1872 年起担任“塞尔维亚社”主席。为获取充足的资金以维持杂志社的正常运行,斯莫列尔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努力争取各斯拉夫团体的支持。他曾数次前往俄罗斯(1859—1860 年,1867 年,1873 年,1881—1883 年)并在建

立卢日昌文化之家（"社团之家"，成立于 1904 年）项目上得到了俄罗斯斯拉夫派的支持，斯莫列尔也因此遭到了德国沙文主义者所谓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的尖锐指责。当代著名的卢日昌塞尔维亚诗人洛伦茨称斯莫列尔"完整地提出了卢日昌民族复兴的实质；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卢日昌塞尔维亚资本主义民族性的形成：从 1848 年革命前民族精神、文化、政治和体制的加强到俾斯曼德国时期的进一步巩固"。斯莫列尔在卢日昌民族复兴事业上最亲密的战友是扬·彼得·约尔丹（1818—1891）和米哈尔·戈尔尼克。约尔丹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前奉行民主教育路线（其积极参与捷克和奥地利杂志的编辑工作，1860 年移居维也纳）。戈尔尼克自 1882 年起担任"塞尔维亚社"主席，致力于促进斯拉夫各族文化及人民之间的交流。

扬·韦利亚是十九世纪卢日昌塞尔维亚文学最著名的革命民主派代表人物，与较年长的塞伊莱尔是同代人。韦利亚是一名教师，又是诗人、散文家和学者。拉德谢尔布是韦利亚的笔名（意为"愿为塞尔维亚人"）。1848—1849 年革命时期，韦利亚是为数不多的从支持君主立宪转而拥护民主共和的卢日昌知识分子。1848 年他与扬·巴尔特科（1821—1900）一同创办了《塞尔维亚消息》周刊，但该周刊宣传的民主观点十分激进，半年后便被迫关闭。韦利亚是天才的人民作家，自 1847 年起出版了九部散文集、诗集和寓言集。他是卢日昌文化史上一位无法超越的博学大家，是孜孜不倦的人民智慧收集者：他在 1902 年出版了《塞尔维亚谚语》集（共计一万条谚语），1909 年出版《民间隐喻》集，1907 年出版《谜语》集（共计九百个谜语）。这些素材被大量使用到作家自己的小说、歌曲、民谣及长诗中。韦利亚既写历史小说，也写现代小说。其最著名的小说《扬·马尼亚》描写了移民加利福尼亚的卢日昌人思念家乡最终回归故里的故事（十九世纪末数以百计的卢日昌人移民海外，其中包括下卢日昌的天才诗人马托·科瑟克，1853—1940 年）。

卢日昌民族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克服了各地区政治、宗教、方言差异的障碍，从而促使了十九世纪中叶卢日昌塞尔维亚标准语的逐步形成。然而，将书面语和方言融合成统一的卢日昌塞尔维亚标准书面语这一过程在十九世纪未能完成。

十九世纪卢日昌塞尔维亚最伟大的古典主义作家是雅各布·巴尔特-琴什斯基（1856—1909），其作品反映了作家对卢日昌民族复兴的渴望，并将卢日昌文学的艺术水平提升到了欧洲文学的水平。巴尔特-琴什斯基掌握多门欧洲语言，翻译了荷马、福斯、歌德的六部格诗，莎士比亚、密茨凯维奇、伏尔赫利茨基的十四行诗以及莱蒙托夫、席勒、扬·聂鲁达、扬·科勒

等人的诗歌。对于巴尔特-琴什斯基而言,政治文化最主要的任务在于使精神文化深入人民群众,使之民主化,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的声音"。这一思想明确体现在作家于1877—1878年发表在《塞尔维亚椴树》杂志上的随笔《来自卢日昌的声音》。文章获得了"青年塞尔维亚人"的大力支持,却遭到了以普富利为首的"老年塞尔维亚人"的反对,且大部分"塞尔维亚社"成员都支持后者。"青年塞尔维亚人"主张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必须保持卢日昌民族及其文化的完整性,1871年以普鲁士王国为首的德意志帝国的形成使得他们的这种要求变得更为强烈。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民族及社会压迫,还破坏了传统的宗法制——由于民族歧视,工业化和农村公社的消亡首先导致了卢日昌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不复存在,并最终使之彻底灭亡。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塞尔维亚人"主张把人民和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加强民族的自我觉悟。巴尔特齐申斯基的许多文学作品"为农民而作,取材于民间",如民谣《未婚夫》(1877),历史诗剧《老塞尔维亚人》(1878)及《在要塞》(1880)——讲述传说中塞尔维亚国王米利杜赫(死于805年或806年)为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故事。《在要塞》是巴尔特-琴什斯基未完成的三部曲的第一部,该三部曲讲述了拉巴河地区和塞尔维亚地区的斯拉夫人联合抗击法兰克人的故事。历史小说《士官生》(1873—1874)讲述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故事,而"当代"小说《爱国者与叛徒》(1878—1879)则勾勒出了真正的民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不论在政论性作品还是日常活动中,巴尔特-琴什斯基一贯坚持保守—反资本主义的人民性的观点。公民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使得民主与保守、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在巴尔特-琴什斯基身上都得到了体现。为维护卢日昌农民的利益,他写过许多辛辣讽刺大地主和资本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然而,在挽救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作家断然否定一切新的哲学及文学流派(如自然主义)。巴尔特-琴什斯基认为只有摆脱精神和文化上的排外性并认识到民族独立的权利,才能达到民族艺术文化的最高水平。从社会经济角度看,这种理想无疑是乌托邦式的,但对巴尔特-琴什斯基的个人创作而言,却富有成效,因为它促使作家不断地探寻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巴尔特-琴什斯基最著名的诗集有:《十四行诗集》(1884)、《形式》(1888)、《塞尔维亚的声音》(1897)等。此时的卢日昌诗歌文化在哲学、风景、恋爱抒情及遵循古典主义的形式、韵律等方面已十分完善。巴尔特齐申斯基最优秀的诗歌作品通常反映诗人内心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担忧。巴尔特-琴什斯基的创作掀起了卢日昌民族复兴运动的高潮,他也是这一时期卢日昌塞尔维亚文学的最后一位作家。

518・

第九章 匈牙利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匈牙利，浪漫主义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在社会及艺术活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批判现实主义逐渐兴起并于二十世纪初在匈牙利文学中最终确立。

匈牙利浪漫主义的主题是民族自由，而非个人自由。倘若从民族的角度理解自由，那么浪漫主义将越发合乎历史主义；而这种历史主义将直接导致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由于危机及自由派贵族思想的蜕变，浪漫主义对民族自由的追求遭遇了极大阻碍。这样的蜕变披着空泛过时的爱国主义的外衣。很多人甚至还没有发现，他们的理想如何变成了虚无的幻景。这便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矛盾和悖论，而人们对此要么毫无意识，要么悲观承受。

那些在文学、社会思想方面坚持永恒"天然"的匈牙利民族性格，对都市化、民族分化、农奴和贵族视而不见的人，即使其创作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具有充分的"叙事性"，甚至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他们仍旧滞留在粗俗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世界观——宗法制的民族主义世界观中。这便是以评论家兼作家帕尔·久莱(1826—1909)为首的主流文学流派"人民—民族派"的历史命运，虽然学派为现实主义美学做出了最初的贡献。久莱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老庄园的最后一位主人》(1857)，小说通过展现现实环境与主人公疯狂固执的处世态度之间的尖锐矛盾，刻画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因循守旧的地主形象。那些认为社会反抗比温和的民族"责任感"更有力，意识到宗法制幻想与现实生活之间无法逾越的人，比"人民民族派"的作家们更清醒，虽然从创作手法上看，他们仍是浪漫主义者，却为现实主义拓宽了道路。

·519

在此，有必要介绍两位著名作家：伊姆列·马达奇和亚诺什·瓦依达。二者的作品均带有悲剧色彩。作为非主流文学，他们的作品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的时代特征。悲剧性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悲观主义，它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的萧条、停滞：一方面，人们对贵族阶级自私自利的妥协行为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人们对生活充满绝望，内心无法平衡，丧失了积极性和进取心。

出身于古老贵族家庭的伊姆列·马达奇(1823—1864)参与了革命前的一系列改革运动。他最著名的作品《人的悲剧》(1861)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哲学诗剧，曾影响过青年时期的高尔基。作家通过一系列富有寓意的图景展示了人类从远古(古埃及)到未来(冰川时期)的发展历程。这些图景

是对资本主义功利至上、社会蛊惑宣传、乌托邦式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观点)及欧洲、匈牙利不幸的社会历史的辛辣讽刺。

抑齐费尔是《人的悲剧》中的三位主人公之一,他把亚当和夏娃分别送到了君主专政的古代时期、道德败坏的古希腊时期、黑暗的中世纪、恐怖笼罩的革命时期的法国和唯利是图的英国,向亚当展示了法伦斯泰尔的平均主义王国及人类重返野蛮状态的穴居时期生活。抑齐费尔反复强调人类历史的封闭性,认为它在残酷的自然经验面前周而复始、毫无出路,企图暗示人们美好的愿望永远无法成为现实。这位冷酷无情的说教者和忧郁固执的催眠术士似乎代表了讲求实利的机械决定论,同时,他也是一位善于思考的仁爱之人,而幻想家亚当却幻想着现实之外的自由。他们二者皆是片面的。前者过分拘泥于问题,而后者似乎对问题"视而不见",正如调色,前者将色彩过分浓缩了,后者又稀释得太厉害了。然而,马达奇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游移不定。该剧中夏娃的形象虽未完全展现,但富有创造性。她使得亚当不再绝望,以怀孕为由拒绝了抑齐费尔冷酷的空想论。这纯洁的生命之声是最高真理,虽然看似并不理智,甚至与结局相矛盾,却是对抑齐费尔的有力反驳:人类啊,抛弃并相信吧!作者正是通过夏娃的形象传递了自己崇高的道德观,强调了信念的重要性并阐释了历史变革的真正意义。

在创作《人的悲剧》和《摩西》(1862)之前,马达奇还写过许多哲学抒情诗。在戏剧《摩西》中,作者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匈牙利民族英雄科苏特比作带领人民摆脱埃及人奴役的摩西。马达奇的部分美学观点与"人民—民族"派一致。

亚诺什·瓦依达(1827—1897)是匈牙利文学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是一名小官吏,父亲是伐木工。1848年,瓦依达参加了匈牙利共和国军并对贵族自由派见风使舵的做法深感失望。五十至六十年代,特别是匈牙利上层统治阶级与奥地利协议结成联盟后(1867),瓦依达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变化。他的抒情诗中充斥着痛苦和悲伤,带有莱蒙托夫式诗歌的特点。

520·

1867年,匈牙利对奥地利妥协,同意组成奥匈二元君主帝国联盟,瓦伊达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不满马达奇强制性的道德观和盲目的希望。他总能清醒地看待自然界、宇宙和生活,洞悉自己所处时代的全部真理。他的抒情诗中没有上帝,没有其他一切幻想;诗中的主人公不是"日有所忧"、恪守戒律的苦行僧,而是备受折磨,却始终高昂着头颅,不肯屈服的奴隶。瓦伊达的爱情诗(著于五十至六十年代的《爱的谴责》及《回忆吉娜》)流露出悲伤的宿命论观点,标志着诗人后期诗歌创作的变化。诗里所描述的不贞、背叛的情节似乎是对当时的匈牙利贵族为了自身利益而背叛解放事业的控诉。年老的诗人仰望天空,那里曾经群星闪耀,共和主义事业蓬勃发

展，如今却只有暗淡的彗星孤独地划过天际(《彗星》，1882 年)。诗人虽然孤独，却从未放弃斗争，在他看来，哪怕毫无希望，但至少要努力过。诗人正是从斗争中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从斗争中看清自己未来的文学道路。

主流文学认为诗人悲观、自闭、好怀疑、歪曲现实，倾向于象征浪漫主义形象派，他们批判甚至迫害诗人。而所有这些都背离了人民性。然而宗法制下的“人民性”却逐渐终结了自己。因此，甚至“人民民族派”本身的艺术家们也迟早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束缚住自己。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雅诺什·阿兰尼(1817—1882)便是其中之一。阿兰尼出生于农民家庭，青年时期与裴多菲交好。阿兰尼对民间创作充满了兴趣，并试图创作传奇式的英雄史诗，裴多菲对此大加赞赏。革命结束后，阿兰尼仍坚持民主派立场，等待出现转机。他认为情况正在改变，一切都将步入正轨。但不久诗人便意识到这样的等待毫无希望，因而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回望过去》(1852)和《失去知觉的路人》(1853)是阿兰尼著名的抒情诗。它们与山陀尔·裴多菲的《乌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阿兰尼所坚持的精神道德上的出路更富悲剧性。与一味依靠悲剧教育人们的“人民民族派”相比，阿兰尼在寻求精神出路的问题上显得更清醒。

以诗人著名的歌谣《威尔士的行吟诗人》(1857)为例。一方面，诗歌充满了反抗精神：五百名威尔士的行吟诗人宁被烧死也不向侵略者屈服。由于该诗作于奥地利国王巡视匈牙利前夕，所以作品的反抗意味十分明显。另一方面，雅诺什·阿兰尼对现实主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现实主义本身应富有精神内涵，而非形式；现实主义应为民族和文学复兴创造条件，而非屈从命运。那五百名为了国家而舍身赴死的行吟诗人在当时的匈牙利当然是不存在的。然而，难道所有的精神、勇气以及 1848 年的革命队伍都凭空消失了吗？难道匈牙利民族的尊严和荣誉，它们的力量和源泉也都耗尽了吗？对于这些问题，浪漫主义诗人(马达齐，瓦伊达)要么讳莫如深，要么含糊其辞。而阿兰尼将现实主义视为摆脱绝境的正确出路。在革命失败、政府妥协签订协议的情况下，阿兰尼认为应当客观分析现状，积极思考匈牙利人民及匈牙利民族的出路。

然而，阿兰尼本人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们应一分为二来看待。一方面，阿兰尼的不少悲剧和悲喜剧作品客观描述了社会日常生活。尤其是以农民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诗，如《傻子伊什特瓦》(1850)。主人公自幼被父母遗弃，穷困潦倒；诗人笔下的农村生活充满艰辛。《傻子伊什特瓦》与《夜莺》(1854)一诗的思想内容十分相似。该诗以辛辣的笔触刻画了荒唐的宗法制社会中可笑的地主形象。与此同时，诗人对农村日常生活的描绘总带有危机意识。诗人创作了一系列著名的民俗题材的叙事谣曲：

《阿格涅什姑娘》(1853)、《孤儿》(1855)、《剥玉米》(1877)、《列别克·韦列什》(1877)、《开桥》(1877)。诗人的晚期作品《秋水仙》(1877—1880)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空虚及摆脱人道主义价值观的企图。诗人谦虚真诚,但在晚年受到排挤,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

另一方面,诗人的部分作品脱离实际,诗人企图概括出匈牙利人民的民族特点,并以此来解释人民的悲剧。如英雄史诗《布达之死》(1863)及《托尔季的爱情》(1879)。不可否认,在长诗《托尔季的爱情》中,作者在描绘主人公的爱情,刻画主人公内心矛盾等方面超越了匈牙利小说。诗人虽然现实地分析了人物间的相互关系(平凡却高尚的托尔季与卑躬屈膝、堕落腐化的王公贵族),但却将主人公的悲剧归咎于匈牙利人轻率、缺乏责任感的民族天性。

日格蒙德·克缅的历史小说,拉斯洛·阿兰尼(雅诺什·阿兰尼之子)的诗歌及莱奥什·托尔奈的小说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日格蒙德·克缅(1814—1875)批判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一切事物。在他看来,这一切都脱离实际,对个人和民族发展极为不利。拉斯洛·阿兰尼(1844—1898)创作了著名的诗体长篇小说《幻想的英雄》(1872)。小说通过描写贵族青年追逐梦想却屡屡受阻,最后灰心丧气,终日无所事事,告诫人们不可沉湎于幻想,应当积极行动起来。莱奥什·托尔奈(1837—1902)早年曾模仿雅诺什·阿兰尼的诗歌创作风格,最后形成了独特的讽刺风格,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小说。托尔奈的早期作品大多描写穷人,作家对他们的遭遇感同身受。其晚期作品则转而刻画地主践踏、剥削农民的丑恶嘴脸。

随着对匈牙利人民及人类命运思考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日常生活,这为具体分析及概括现实生活准备了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匈牙利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莫尔·约卡伊(1825—1904)。约卡伊出生于小贵族家庭,参加过1848年革命,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浪漫主义作家。约卡伊在革命失败后的奥地利统治时期就已在文坛上享有较高声誉。

约卡伊在早期创作时曾模仿过欧仁·苏、雨果、裴多菲,但匈牙利民族的不幸使其意识到自身的艺术使命,促使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如著名的长篇小说《匈牙利富翁》(1854)和《佐尔坦·卡尔巴季》(1855)。在这两部作品中,约卡伊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鼓励人们积极思考,

勇于革新。作者对匈牙利式的“野蛮现象”(恣意妄为的“匈牙利富翁”的形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同时,对欧洲资本主义丑陋现象(挥霍无度的侄子和出卖亲生女儿的岳母)进行了辛辣讽刺。约卡伊同情那些饱受屈辱,却

心怀善意，值得尊敬的人们（富翁年轻的妻子，生活贫困却充满爱心的姑娘）。

当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革命失败的阴霾中时，约卡伊鼓励人们积极面对。不同于久莱、克缅和雅·阿兰尼，约卡伊主张积极的文学。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具有健全的人格。如果说马达奇只注重道德上的救赎（“抛弃并相信”），那么约卡伊则善于从实际出发，寻找出路。约卡伊创作的许多长篇小说，如《当我们老去》（1865）、《铁石心肠者的儿子们》（1869）、《拉巴河的囚徒》（1879）、《土皇帝们》（1885）等通过描绘1848年革命，燃起人们的希望，促使人们积极地思考生活。与此同时，约卡伊对新的社会现象也进行了回应。小说《黑钻石》（1870）和《金人》（1872）以十九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背景，描绘了资本家们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通过投机倒把来发家致富的丑恶现象，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贫苦生活。

约卡伊所具有的并不是一般资产阶级意义上平淡无奇的自由主义世界观。他忠于全人类的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起源，这一点使他的作品在很长时间里很受欢迎（也包括在国外）。与此同时在他的作品中也产生了某种对立，如现实主义和父权制启蒙主义空想的对立，对旨在美化、完善理想的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手法的模仿。当强烈的民主主义和约卡伊的丰富观察超越了有时是空想的目标时，便形成了最强力的、生活素材所特有的社会批评力量，重建了时代的真实氛围，复原了意识和风俗的状态。例如，就地方行政官员的丰富多样性而言，《囚徒拉比》或许超越了《一个匈牙利富翁》，这些行政官员将穷人们洗劫一空并以邪恶的计谋追捕异见者和不合心意的人。《小国王们》，特别是第一章（独具特色的对城市旅馆的描写可以同果戈理的一些作品相媲美）中充满了各种极具特色的，革命前夕的匈牙利省城的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和场景，有时甚至是幽默地对它们进行强调。

但是，理想的艺术具体性却得到了提升。这种理想表现在作者饱含热情、认真细致地刻画的活动家、民间成功人士、过着教徒生活的贵族启蒙者和各阶层知识分子的形象中。这些人物全部忠于自己的思想，并处于历史事件的中心。正是这些历史事件唤起了主人公的行动，也促使作者客观地论证和分析性地描写了人物的感受。例如，长篇小说《当我们一起变老》中类似的一幕：揭露了卑鄙之人的行径，此人将自己具有反奥地利思想倾向的同窗出卖给了当权者。被出卖者的弟弟披露了这件事，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而这些思想情感与主题相关联，并因此具有了在约卡伊之前不为人知的纯真和直率，它们重塑了心灵纯洁、有着美好追求的1848年青年改革家和革命者形象。马加什·拉比（《囚徒拉比》）的形象

稍显苍白，内心刻画也更为单薄。这一人物让人想起了裴多菲《使徒》中的西尔维斯特，他们同样都是被追捕的、不被理解的、孤独的人民的保护者。约卡伊在人物性格的心理刻画上造诣很深，既有专横残暴的匈牙利“小国王们”和“富翁”，也有保守势力的中坚力量，还有追寻真理和公正的热忱人士。各种类型的描写——仿佛是崇高的浪漫主义誓言和成熟的现实主义之间的衔接环，这些形象也因此未被置于情节之上，而是融入其中，被包含在典型的情境之内，而这种情境或是支撑它们，或是毁灭它们。

另一位伟大的匈牙利散文家米克沙特(1847—1910)，更有资格被称作现实主义大师。他继承了约卡伊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其对于生活真理的追求。米克沙特的早期作品描写了喀尔巴阡山脉附近的农奴(《善良的波洛茨人》，1882年；《洛心草》，1886年；《会说话的长外衣》，1889年)，善良的老贵族的往昔岁月(《可敬的老爷们》)，此外还有许多善意的幽默创作和静静地怀念遥远过往的作品。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很快占据上风，超越了对光荣往昔的温和诙谐的理想化。米克沙特现代作品中的大多数都描写了城市生活，如银行、股份团体、报纸、疗养地、居民的客厅、议会走廊、胆大妄为的投机行为和有利可逐的美差。他的成熟期创作中伴有或是讽刺，或是幽默的叙述。资本化和道德败坏的世界成为了米克沙特以趣闻轶事进行创作的根基，他这种在社会分析方面完善了的技艺承袭自约卡伊。

523·

这个世界总是惊扰这位受过古老的、与人为善的自由启蒙主义传统的教育的作家：从伟大到嘲弄的转变；对其而言伤感，而就历史本质而言却是荒唐惹眼的言和行、陈旧的和公认的、理想和“利益”的不一致；滑稽可笑之极的所有贵重真品的货币贬值等。米克沙特跟随约卡伊的脚步记叙了自己的半荒诞事件，更着重强调它们严肃的、令人气愤的、刺痛心灵的社会内在基础。人类的浅薄庸俗以及掩藏在礼仪和漂亮的空话下，日常生活中人们(包括贵族)的嗜财如命，是米克沙特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早期的“历史”阶级，不久前还在为独立而奋战的光荣族裔的后人，启蒙传统的“继承者”们争先恐后地追逐利益和充满个人主义的幸福，如同丢掉废旧垃圾一样，抛弃了父辈的理想。没良知、不正派的撰稿人；臭名昭著的贵族市长和伯爵省长；精打细算、毫无原则，却有着显赫姓氏的政客，在虚情假意的高层会议——议会上演戏，此类人物形象出现在长篇小说《在匈牙利的两次选举》(1893—1897)和《新兹里尼阿斯》(1898)中。

事实上，另一些作品仍在试图唤起风暴，却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出现已经晚了几百年。这些作品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同纷至沓来的不幸做斗争(中篇小说《围攻别斯特尔采城》，1895年)。这部小说的情节荒诞：一个长着青苔的顽固分子是远古的热情拥护者，他打算发动一场真正的反对政权的战

争。故事是悲剧的：他是孤独的悬崖，是污浊肮脏的浪潮中注定灭亡的废墟。小说其余人物中的大多数，或是成为骗子的牺牲品，或是竭尽全力去寻找富有的未婚妻，试图在交易所和其他方面取得成就，他们不再看重搏斗和打猎的功绩。在不加掩饰的讽刺后深深地隐藏着带有抒情色彩的忧愁。政治上体面的伪装有时和讽刺的光环结合在一起，如《在匈牙利的两次选举》中的主人公——议员柯坦希，虽然他的故事非常特殊，满是荒诞离奇——从结婚时开始，双方便出于个人目的在财产问题上相互欺骗，直到用上好的雪茄贿赂最具影响力的骄奢淫逸的选举人。米克斯特的荒诞主义不仅仅是单调的消遣娱乐，其中更流露出了其对小人当道的社会形势的痛苦的沮丧之情。

相较于约卡伊，米克沙特更加深入地筛选偶然出现的，并没有逻辑联系的人物形象、行为方式以及情节情境。他的典型化完全建立在人物性格、环境和情景相互联系统一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社会生活性和历史性来形容米克沙特的长篇作品，其中浪漫启蒙主义的痕迹已经淡化了。虽然米克沙特的成就中也有各种不足，但是同平和、善良甚至热情洋溢的约卡伊相比，他显然更富有批判性，更善于清醒地讽刺，同时也更加敏锐。但在观察的广度和丰富性方面米克沙特比约卡伊逊色——约卡伊有时尽管混乱，但却有极富魅力的观察力，非常贴切地描写了纷繁复杂的生活。同样是对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描写，米克沙特刻画了他们在首都以及省城乡间的活动，并没有掺入既非反动，也非自由主义的全新理想。这使他的嘲讽有时带有怀疑和同情的意味，有时却又赋予了其一种和世道不济时期的文学作品相似的凄凉惨淡的色彩。孩子气的人民出现在米克沙特的作品中：各种追名逐利的人利用多变、直率、固执的人群的轻信，支配、摆布他们。当十九世纪末迅速形成各阶层民主主义的、对工人阶级深切同情的知识分子群体时，匈牙利文学带着通往社会舞台的新出路转向了人民，将其作为历史变革的主体和人文主义希望的依托。

第十章　罗马尼亚文学

· 524

1848 年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内，多瑙河公国的文学仍处于革命激情的影响之下，这种激情推动了所谓的“巴沙浦主义”运动。多数时间在国外侨居的作家，好像一直在全方面思考、探索那些曾在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使他们激动不已的想法。1850 年，伯尔切斯库（1819—1852）在国外发表了自己的作品《罗马尼亚历史和革命运动》以及《多瑙河公国的经济问题》。同一年在巴黎用法语发表了献给鲁索（1819—1859）的著名的《罗马尼亚之

歌》，就爱国主义和政治热忱的力量（这大概是 1848 年革命所特有的心灵波动的浪漫主义实质）而言，这是一部非凡的作品。但是整个多瑙河公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在革命失败后急剧变化——改良主义时期到来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扩张，取代了反动大贵族们的地位。

浪漫主义改变了自己的基调，从热情奔放转为悲情哀歌。从文学作品中消失的不仅是奔放的热情，还有公民颂歌体裁。1859 年成立的公国联盟；1864 年的土地改革（将世俗化的修道院财产分配给农民）；通过 1877—1878 年的俄土战争宣告完全的独立和主权，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军事力量共同参与了这场战争。所有这些都是罗马尼亚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历史形成时期。但是上述事件却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得到预期的广泛和激情洋溢的描写。只有亚历山德里在自己的组诗《我们的战士》中颂扬了 1877—1878 年反土耳其战争中的罗马尼亚军队。但即使是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也对民族爱国主义激情进行了“修正”；在诗篇《大兵》中作者描写了人民对于战争的感受，这场战争对于全民族设想而言是解放性的，但对于农民大众而言则是严酷的考验。

农民劳动者在社会意识层面所起作用的变化，引起了艺术思想的改变；人民不再被视为在历史进程中起作用的现实力量，但他们的伦理观却越来越多地作为社会审判力出现。

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理想的全新的观念具有阶级含义，这一点尤为明显地反映在波格单·哈什德乌（1838—1907）的创作中。哈什德乌是十八世纪被迫迁徙到波兰的古老贵族的分支的后代。1812 年后哈什德乌的祖父重新获得了自己在比萨拉比亚的土地所有权，家人获得了俄罗斯国籍。哈什德乌的父亲，亚历山大·哈什德乌是一名律师，曾在乌克兰不同城市的贵族中学里担任老师，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波格单·哈什德乌追随了父亲的脚步，没有结束哈尔科夫大学的学业，在军队中服役了很短时间后退伍，他于 1857 年迁居到多瑙河公国便迅速在这里积极投身于社会和文学生活中。哈什德乌既是作家，也是出版人，同时还是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他的多领域工作不仅体现了后革命时期特有的文化发展的不同趋向，同时也反映了由革命失败带来的“思想和情感的混乱”。

哈什德乌在《人民面前的贵族》这篇文章中塑造了后革命时期社会的混乱无序。关于人民和大贵族间、“被压迫的与压迫者”间不可调和的敌意的主题，正如哈什德乌直言，这一主旨贯穿了他的全部作品。尽管彻底抨击贵族，以及后来的封建主义，哈什德乌仍看到了在全民选举权这方面推行社会制度民主化的可行性以及分配给农民土地的可能性。这两点要求紧密联系，因为没有土地的农民不可能成为享有全部权利的公民，也不可能是

选举人。谁能够实现这些要求?“谁?我们的答案显而易见”,哈什德乌写道,“不是大贵族!他们不希望这样,也不可能希望这样,因此,他们自然什么都不会做。只有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行使权力的人才可能实现这些要求。”注定的循环往复:无权的民众只能从同样是由没有权力的人民选举出的当权者那里获得全民选举权。

这时的哈什德乌不再在社会运动中,而是在文明化进程中探索人民的重要意义的明证。前革命时期的哈什德乌曾认为浪漫主义总是和社会变革密不可分,而现在他则完全倾注在艺术上,将其作为社会生活的形式。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对民间口头创作、民族学、考古学的极大关注。亚历山德里出版了富有诗意的民间创作;佩特列·伊斯普列斯库收集和出版童话、俗语和谜语;哈什德乌着手编撰和出版详解字典;奥多贝斯库则从事民族学和考古学工作。

但是作为人民希望的反映出现的罗马尼亚文学,在这段时期内仍然是高高在上的树立人民期许的讲台。文学像先前一样被看作是变革社会生活的力量,如果不是在社会政治方面,则至少是在道德层面。这一新主题出现在奥多贝斯库、亚历山德里和阿里切斯库的诗作中。

亚历山德鲁·奥多贝斯库(1834—1895),将军之子,在巴黎学习期间进入了罗马尼亚革命侨民的圈子,从那里接收到了 1848 年的理想,并因此认为自己是“巴沙浦者”(四八年代者),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考古学家、诗人、历史小说作家,撰写关于历史艺术问题的文章,1851 年发表了《罗马尼亚未来艺术》。作者赋予了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意义:艺术应该有助于实现精神的统一性、道德的共同性,重新恢复随着革命失败而崩溃瓦解的一切。“艺术是全民情感的表现”,奥多贝斯库强调。

根据作者的看法,如果艺术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特殊角色,那么诗人和国家间的关系也就随之变化。诗人已经不再崇拜祖国,不再盲目地为它效劳,而是因祖国而痛苦,因为忘我地深爱着它。诗人的新立场在亚历山德里《歌曲和亲吻》、西赫梁努《什么是世间最甜美的?》、波·哈什德乌《真正的诗人》等作品中得到体现。在诗歌中,痛苦、沉思、虔诚、充满怀疑的抒情主人公替代了社会理想的服务者和公民主人公。永恒的问题控制了他:生活、死亡、永生、人类历史进程以及微不足道的“我”在其中的地位。前革命时期诗歌的思索几乎完全局限于国家,局限于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诗歌都被圈定在民族问题的范围内。现在可以体察到强烈的,将历史和当今的国内生活同其他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相对比的意愿。阿里切斯库的诗作《沉思》(1850)表现了这条包含着沉思和诗意哲学的主线。康斯坦金·阿里切斯库,酋长之子(掌握中等权势的贵族之子),他参与了 1848 年的革

命,并在七十年代成为了最早研究多瑙河公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收集并出版这一时期的文献和资料。五十年代,在自己的诗作中他首先在哲学意义上提出了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在诗人的内心视域前,全人类的历史逐渐展开,国家的名称和伟人的姓名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诗人进行这次“检阅”,是为了得出如下结论:所有一切,人民和民族,都衰落了,消逝了。但是还存在着某些超自然法律的事物。阿里切斯库将人类内心力量和死亡以及自然法则对立起来。这些问题将由波利金尼扬努和爱明内斯库解决,也就是说所有后革命时期的浪漫主义者都希望通过解决这一问题以探索生命的意义。

德米特里·波利金扬努(1819? 1825? —1872)——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佃户之子。1848年革命中的活跃分子,革命失败后仍以人民教育部部长的身份为其所树立的社会理想而奋斗。1867年,他发表了长诗《康拉德》。抒情主人公的思索过程和阿里切斯库笔下的人物相似,只不过波利金扬努对其进行了补充,加入了对故乡和时代性的思索。他是罗马尼亚作家中窥探资产阶级现实世界的第一人,他笔下的人物游览了伦敦并且客观公正地评价了这个城市“给予”普通民众的一切:资产阶级文明并没有终结人民的苦难,没有赋予人民更崇高的信仰,没有给人民带来对未来的信心,甚至没有为人民提供他们最迫切需要的面包。旧时的恶,仅仅变换了形式,仍旧是恶。但和阿里切斯库一样,波利金扬努并没有无条件地服从现存万物的法则——死亡。波利金扬努在诗歌中看到了永生。

革命后时期复杂的对世界的认知以及五十至六十年代诗人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集中反映在罗马尼亚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创作中。

526·

佃农出身的小地主的儿子,米哈伊尔·爱明内斯库(1850—1889)按照父亲的意愿在维也纳和柏林的大学中学习。对哲学的研究,对泛社会人文领域的兴趣,以及对底层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的深刻认知,共同决定了其诗歌特点。

爱明内斯库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创作表现出,当资产阶级关系和封建主义关系紧密融合,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农商而非工业生产者的利益时,罗马尼亚自身的发展特点即已得到清晰的展现。爱明内斯库是蓬勃发展的社会民主运动,以及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的见证者。所有这些都使他试图理解人类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民族历史进程,形成属于自己的对世界的诗意哲学观,以“统一的活跃阶层”,即诗人所谓的农民阶级的视角评定罗马尼亚社会。诗人发表的未完成长诗《死亡象征》正是遵循了这条关于万物全是枉然的思索主线,这条线

索自阿里切斯库起，在波利金扬努的长诗《康拉德》中进一步发展。爱明内斯库描绘了伟大帝国衰落后的场景，希望将这条线索延续到当时的时代，为淹没在血泊中的巴黎公社谱写安魂曲，这一点在其名为《时代画布上的暗影》的草稿片段中也有所体现。但是诗人并没有满足于这一消极的主题，长诗《天使和恶魔》(1873)即是证明。在这部长诗中作者提升了社会的愤怒情绪并为其辩护。尽管巴黎公社最终失败了，但它却使诗人推翻了一切试图改变现有秩序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现存观念，并推动他创作了洋溢着历史乐观情绪的长诗《皇帝和无产者》(1874)。诗人运用自己最喜欢的对比手法，将两种对十九世纪末期的资产阶级而言非常典型的历史力量相对立。诗人以具体的历史环境——巴黎公社为根基，把这些力量用浪漫主义象征的形式表达出来，说明了专制和独裁的必然灭亡，证明了无产阶级的社会愤怒情绪的合理性。

从“假浪漫主义”(雨果的定义)到揭示并解决具体社会和个人生活问题的浪漫主义，在爱明内斯库的诗歌演变过程中，诗作《生活》(1879)具有特殊意义。诗人坚决捍卫劳动人民，并最终找到了内在支点。

对爱明内斯库而言，世界不仅仅局限于社会问题。从最初的以社会为主题的作品(《天使和恶魔》、《皇帝和无产者》)起，在爱明内斯库的创作中同样也涉及各种生活问题(《死亡象征》)和爱情问题(《维纳斯和圣母》)，艺术创作者的社会地位问题也困扰着爱明内斯库(《后继者》)。爱明内斯库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集中反映在他的组诗《书函》(1881)中，在这部作品中他依次展开了一系列主题，证明真正的思维(科学)、诗歌、爱情和美好是同资产阶级社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社会对人民的仇视是这部作品的中心主题。爱明内斯库在《书函》中展开了所有这些主题，在结构上形成了“日心说体系”，人民像太阳一样处在这一体系的中心。诗人代表人民号召烧毁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监狱和精神病院”。爱明内斯库自然没有看到解决社会冲突的现实历史道路，但诗歌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却并未因此而减弱，他对于这一社会秩序必将走向灭亡的预见使他身处当时社会上最具洞察力的智者行列。

诗歌和资产阶级社会不相容的思想，诗人和其所处社会的疏远，成为爱明内斯库对自己个人命运富有讽喻色彩的思考，反映在其一系列杰出作品中，如长诗《金星》(1883)和《黑海蝶》(1883)。但这并不是一个努力捍卫自己的人民并为他们疾呼的人的疏离。爱明内斯库不是徒然地给所有后代作家们留下遗言：“……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时代中存在着永恒更新的源泉——人民的诗歌，既是我们自己的，也是我们周围的人民的。”

爱明内斯库创作生涯的结束标志了浪漫主义作为罗马尼亚文学分支的

终结，现实主义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流派。

所谓的“风俗随笔”是最初的推动力，它标志了现实主义在罗马尼亚文学中的诞生。风俗随笔首先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现在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中，如亚历山德里、鲁索、科加尔尼恰努、涅格鲁齐等，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的影响。当时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罗马尼亚文学自身也体察到了对这种文体的需求。

527·

大贵族和与农民相对的，代表了历史陈规陋习的形象是“风俗随笔”最初的“研究对象”。因此在罗马尼亚“风俗随笔”中最先出现了社会对比，后期才被视为社会冲突，而现实主义文学直到十九世纪末期才开始对其进行描写。在一系列“风俗随笔”的人物中单独分出了一类形象——趋炎附势之徒，即高攀的人。他们曾经是仆从，竭尽全力地挤进贵族社会。这些趋炎附势之人、新贵和其他守财奴一起先是被作为中篇小说《一个仆人的灾难，或者斯洛波茨科伊的贵族》(1861)中的人物形象，后来又被写入了尼古拉·菲力蒙的长篇小说《新老地主们》(1863)，这部作品也被认为是罗马尼亚文学史中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

尼古拉·菲力蒙(1819—1865)出生于神职人员家庭，和宗教圈子有紧密联系，曾是唱诗班歌手，也担任过教民组长，还曾是宗教厅的文书，这些经历使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罗马尼亚社会中级阶层的生活、习俗和社会的变形。趋炎附势之人和新形成的守财奴是资产阶级化过程的标志，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罗马尼亚浪漫主义文学(爱明内斯库的讽刺诗《美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文学(菲力蒙、卡拉迦列)对这一点都有所披露。在罗马尼亚历史中，高攀之人是一种产生于资本主义压制下的封建主义变革时期的社会现象。管理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形象类型的引入(议会制君主立宪、通过选举产生的城市和乡村的自治权)使所有“官卑职微”的人都可以参与的政治赌博，其中包括文书、司法稽查官、办报人、教师、一心想成为市政长官的人、城市的官员、议会代表甚至是部长，这也为从当权者处赚取钱财提供了可能，权力成为了无所不能的不公正的政治手段。

对罗马尼亚“社会生活”机制的研究激起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上涨狂潮，喜剧成为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一狂潮的顶峰。

瓦西里·亚历山德里(1818？1821？—1890)是社会政治喜剧的奠基人。他是御马官的儿子，曾被送到巴黎学习，但对于戏剧和诗歌的热爱决定了他的生活道路。在后革命时期，他创立了嘲讽小贵族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喜剧，并借用了法国的服饰、举止和语言，在讽刺的框架中展现了蛊惑人心的自由主义(《吉利查太太在雅西》，1850 年；《吉利查太太在外省》，1852 年；《克列米涅村庄，或者邪恶的仙女》，1863 年)。后期他创作了最初的深

入揭示人物心理的戏剧《奥维德》和《布兰度西亚的清泉》(1883),并根据人民的通俗情节创作了政治喜剧《森简娜和灰烬》(1883)。

与喜剧艺术的急速腾飞相伴的是卡拉迦列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约安·卢卡·卡拉迦列(1852—1912),律师之子,年轻时曾是一名演员,著名的演员和剧作家约尔库·卡拉迦列和科斯达克·卡拉迦列的侄子。约安·卢卡曾在自己的舅舅那里,即布加勒斯特音乐学院的朗诵表演系学习。

•528

卡拉迦列最早的作品是描写日常生活的爱情荒诞喜剧《暴风雨之夜》(1879),他的代表作是《一封遗失的信》。在这部喜剧中,他将所有参与到罗马尼亚制宪委员会政治生活中的典型形象全部搬上舞台。卡拉迦列嘲笑了臭名昭著的自由选举,刻画了无原则的夸夸其谈之人、阴谋家和煽动者的形象,而正是由这些人执掌权力。以亚历山德里的喜剧创作为出发点,卡拉迦列在描写人物心理的戏剧《冤狱》(1890)中向前迈进了一步。他描写了农民的性格,并以此传承了和克良格的名字相关的文学主线。

克良格(1839—1889),是农民之子,最初在宗教学校学习并获得了助祭的教职。他希望获得教师的文凭,于是自 1864 年起开始在"师范学校"(培养教师的学术机构)听课。由于没有对宗教事务的热情并和教会高层发生了争执,克良格辞去了助祭的职务。克良格以短篇小说家的身份进入文学领域。在自己的作品——童话、几篇短篇小说和自传体小说《童年回忆》中,他的行为举止是农民,但与此同时也是位艺术家,是给人民讲故事的人。克良格将民间故事所特有的叙述者和被叙述内容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引入了文学领域。他的创作具有内在统一性,无论是在其以譬喻(童话形式)表达自己世界观时,还是在其叙述其听来的故事(短篇小说《约翰·劳塔爷爷与公国合并》,1800 年;《约翰·劳塔爷爷与库扎国王》,1883 年)时,还是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在罗马尼亚文学总的发展背景下,克良格的创作仿佛正处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交界点上,作为一个现象只能够是浪漫主义对民间文学和农民表现出极大关注的结果。克良格的创作中的农民,是浪漫主义作家在民间文学中发见的,这些作家在评判其当时现实时倾向于农民的世界观,这样的农民从只在文学中存在的人物,成为积极行动的人物。克良格的作品所奠定的艺术动机,是农民主题开始发展,成为后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最重要的主题。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罗马尼亚文学标志着其一个文化高潮和对国家统一的自然追求。如果说在各公国统一前,罗马尼亚文学和文化具有在瓦拉西亚和摩尔达维亚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内三个共处、但终究是分立的发展中心的话,那么在统一后,首先是依仗卡拉迦列、爱明内斯库、克良格、科施布克等人的创作得到了民族统一。

第十一章 希腊文学

1830年,希腊获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独立地位得到承认。但二十年过后,它仍是落后的封建制国家,命运掌握在英国、法国、俄国等强国兼其"庇护者"手中,包括伊庇鲁斯和色萨利两大区在内的一些希腊领土仍处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此外,希腊本土延续着巴伐利亚的统治,其王位直到1862年一直被巴伐利亚国王奥顿所占据。

杰出的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巴夫洛斯·卡利加斯(1814—1896)在其长篇小说《塔诺斯·弗列卡斯》(1855)中生动地展示了年轻希腊的苦难状态。在其中,他用确信无疑的口吻讲述希腊外省贫困寥落、陷于专制的悲惨命运,讲述掌权者如何侵占公共财产与滥用职权,以及国家司法与法制的沦丧。然而,这一严肃尖锐的社会批评却是绝无仅有的。总体而言,多数情况下,对国内状况的不满、失望乃至绝望没能激励希腊的文学家们对现实做出批判性的分析,而是使得他们转向个体化的诗歌创作。更通常的是,他们从不久之前的英雄事迹中寻找灵感,或是转向理想化的中世纪乃至更久远的过去。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对古希腊社会、文化及语言的过分崇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这无疑是民族自我肯定的一种病态形式。

非诗歌创作领域中,历史小说获得广泛传播,它们中的代表作有阿·朗加维斯的《统治者马列依》(1850)、克谢诺思的《希腊革命女英雄》(1852)、拉姆福斯的《卡察恩托尼斯》(1860)及《阿里·帕夏最后的日子》(1862)。如同时期诞生的历史文献研究一样(1860—1874年间,著名历史学家康斯坦丁·帕帕里戈普洛斯的研究巨著《古往今来的希腊民族历史》问世),历史小说也被认为在巩固民族统一和恢复被践踏的民族自尊感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在诗歌创作领域,雅典浪漫派仍坚持自己的创作立场与主张。六十年代登上文坛的雅典浪漫派一代,如Д.帕帕里戈普洛斯(1843—1877)、瓦西里亚基斯(1844—1874),已不再体会到那些国家利益与人物之间的血肉联系,而正是这些联系激励了他们的先辈。他们的创作中充满了孤独和心灵无助的悲剧感,以及对现实讽刺性的且有时残酷的排斥。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是如此之远,以至于诗人们常有"撕毁纸张与折断笔尖"(十九世纪的Д.帕帕里戈普洛斯语)的冲动。

希腊浪漫派诗歌创作在六十年代步入了死胡同,埃曼努伊尔·罗伊基斯(1836—1904)在其长篇小说《女教宗琼安》中将这一现象尖锐无情地展

现出来。作者抨击了浪漫派诗歌的萎靡不振、情节的凭空臆造、描写的夸大虚实,他认为这一派的创作过于死气沉沉、内容老生常谈,只会引起读者的厌恶。他倡导本质上全新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这种诗歌旨在描绘赤裸的、未经雕饰的真实,展现生活的本来面目。

与此同时,在浪漫主义内部又逐渐发展出新的流派。在1864年伊奥尼亚群岛(今土耳其安那托利亚)与希腊重新合并后,雅典派与伊奥尼亚派之间开始相互接近融合。如果说雅典派几近固执地推行符合古希腊语法的现代希腊语(1821—1876)的话,那么伊奥尼亚派则延续着诗人狄奥尼修斯·索罗莫斯(1798—1857)的传统——忠于并坚持使用人民大众的语言即通俗希腊语。正是这一传统构成了八十年代希腊民族复兴浪潮高涨的决定性因素。诗人们成为了伊奥尼亚派在雅典造成影响的传播者,他们的创作明显地跳出了浪漫主义诗歌的框架。

安德里亚斯·拉斯卡拉托斯(1811—1901)的浪漫讽刺作品是对伊奥尼亚群岛尤其是家乡凯法利尼亚岛现实的批判性反映,是希腊文学迈向现实主义的重要一步。拉斯卡拉托斯认为通过"见证今日"可达到克服危机的目的。

诗人阿里斯托杰里斯·瓦劳里蒂斯(1824—1879)同样在伊奥尼亚和雅典两派之间扮演了沟通者的角色。他力求借助历史题材和民族爱国主义主题达成吸取过去教训以作今日之鉴的诉求(长诗《弗洛西尼》,1859年;《阿法纳西奥斯·贾克斯》,1867年;《弗季诺思》,1870—1879年)。借由瓦劳里蒂斯的诗歌,他的文学后辈们不仅学习了通俗大众的言语表达和民间诗歌的生动形象,而且学会了如何史诗性地再现人民大众的生活。

七十年代希腊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进展为八十年代的根本性转折奏响了前奏——国民工业复苏,城市人口比重增加,资产阶级大大活跃起来。1862年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是颁布了新的宪法,建立了一院制议会并通过了全民选举权。但这些举措并没能解决社会生活的全部问题。七十至八十年代在雅典出版的大量讽刺性杂志尖锐地批判了希腊社会的痼疾并拥护民主改革。当时正兴起的第二次民族复兴浪潮应当解决困扰希腊半世纪久的文化难题——将生动的口语引入到文学中,掌握民间口头创作,并创造性地领会本国传统及西欧发达国家的审美经验。

1880年被认为是"新雅典派"的诞生元年。这一年有两本诗集问世,它们是卡姆巴斯(1857—1932)的《诗》及德罗西尼斯(1859—1951)的《蛛丝》。正如之后德罗西尼斯说的那样,他们的诗是"快乐的生活之歌",是"对浪漫性忧郁的反映"。年轻的诗人们将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主题,重视当时还不够深刻但极为现实的生活细节。且重要的是,这种对于希腊诗歌

来说全新的作者姿态是伴随着对于民间语言的重视而出现的。

"新雅典派"的理论为波里基斯(1852—1921)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是一位卓越的语文学家和民族学家,同时是民间创作的收集者与研究者。波里基斯的作品为年轻的希腊知识分子阶层开辟了人民自觉的起源,正是这种自觉意识帮助希腊克服了多世纪以来民族历史上的磨难与考验。在柯斯基斯·帕拉马斯(1859—1943)的诗集《祖国之歌》(1886)中充分而集中地展现出八十年代希腊文学一代所具有的新气象。这本书可称得上是这一代集体经验的结晶。

组成文集的一组作品《祖国之歌》、《湖泊之歌》、《心灵与生活之歌》、《军旅之歌》充分说明了作者对生活包罗万象的接受与容纳,这其中有隐秘私情、日常生活、美妙自然、民间风俗、民族历史等等内容。四年之后,在谈及诗歌中的爱国主义主题时,帕拉马斯认为爱国情怀是一种"最高尚"的感情;虽然他承认自新希腊国建立以来已有不少对爱国主题滥用的事例,但坚持认为"祖国主题是创作灵感取之不竭的源泉",这一点对于处于形成期的民族而言尤其正确。

希腊历史的继承性、民族的持续发展、民族精神价值的承载者与保护者,这一系列主题思想是帕拉马斯主要构思的核心与创作的推动力之所在。古希腊罗马文化、拜占庭文化、克里特诗歌的复兴、克莱夫特[①]民间创作、1821年革命的歌手——索罗莫斯和卡利沃斯、瓦劳里蒂斯的史诗,这些希腊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以独特的形式折射在帕拉马斯的诗歌中。与此同时,帕拉马斯及其他希腊年轻诗人们积极地消化了同时代西欧诗歌的成就(主要是法国的帕纳斯派及其后的象征派),成果表现在他们的诗律中。

再次高涨的民族复兴的激情赋予了帕拉马斯的创作及所有八十年代的诗歌以强烈的浪漫主义情调。高度的象征概括性、广博的意象、鲜明的主体、个性化的开篇及生气勃勃、热情奔放的风格,这一切诗学特征使帕拉马斯的作品染上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应注意的是,帕拉马斯的浪漫主义具有全新的历史性,而这首先和他所渴求的理想——自由不仅是民族的与精神上的,而且是社会的——所包含的历史内容相关联。他一方面关注未来,一方面意识到人民命运发生社会性变革的必然性,并敏锐地觉察到那时刻压迫他的落后保守的现实。理想成为帕拉马斯评价现实的标准,被浪漫化粉饰的同旧世界的冲突牢固地建立在具有充分现实性的社会现象的基础之上。

---

① 希腊山贼、爱国者。——译注

在诗歌创作转向的同时期，散文领域同样发生着一场变革，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开始向描写日常生活的中短篇小说过渡。标志这一转变的代表作是Д.维凯拉斯的中篇小说《鲁基斯·拉拉斯》(1879)、维基伊诺斯的心理短篇小说及其他作品。其时仍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农村开始成为作家们笔下的创作对象。

描写日常生活的短篇小说的演化发展推动着散文领域语言的变革。在诗歌领域，这一问题在卓越的帕拉马斯文学一代初登文坛时即已得到解决。扬尼斯·普西哈里斯于1889年创作的《我的旅行》一书在这一变革过程中起到了强力催化剂的作用。作者是巴黎的语文学教授，他在这本书中叙述了自己在去伊斯坦布尔及希腊行程中的见闻感受。但这本书爆炸性的力量并非体现在这些见闻的奇特之上，而是在与通俗性语言的使用，这种语言带着其语言学的准确性均匀地分布在文本的整个叙述之中。因为《我的旅行》一书的发表，普西哈里斯一跃成为希腊文学乃至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内通俗性语言确立运动的领军人物。

在描写日常生活文学的作品中，对于人民生活图景的描绘起初是安闲雅逸、田园牧歌式的，但在这类文学作品内部，现实主义描写趋势逐渐显露出来。这种倾向是受西欧文学的影响，在与自然主义密切的相互影响中形成的。作家们在抨击社会现实的同时，开始逐步摆脱封建父权制幻象的束缚。希腊第一份充分展开论述的现实主义文学纲领受到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左拉的长篇小说《娜娜》的启发，由扬诺普洛斯撰写的这部小说的前言事实上成为了希腊文学的“现实主义宣言”。

扬诺普洛斯在承认希腊历史之路的一系列特点，尤以民族解放为重的民族任务的特色的同时，鲜明地反对了希腊的精神方面的闭关自守。照扬诺普洛斯的看法，希腊文学应做到以下几方面以吸取西欧先进文学的经验教训：拒绝将世界理想化，深入理解社会生活，描绘发展变化中的人物性格。

由扬诺普洛斯提出的文学纲领受到了具有创造力的先进知识分子阶层的热烈赞赏，但它的贯彻实施从九十年代才真正开始，其时资本主义制度的涉入开始打破父权制社会的旧秩序。正是在那时，希腊文学出现了真正洞察社会现实复杂性的作品。帕帕加曼基斯(1851—1911)、卡尔卡维察斯(1866—1922)、克谢诺布洛斯(1867—1951)等作家在这一方面展开了他们的艺术探索。

帕帕加曼基斯在七十年代末以一系列历史冒险小说初登文坛，之后将注意力投向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他依靠翻译糊口度日，勉强支撑在希腊文学圈的外围，并心系他所生活其中的穷人团体。在其所创作的短篇小说

中，作家再现了他的故乡斯基亚索斯岛的普通人的世界。通过叙述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们繁重的工作日及罕见的节假日的生活，作家力图展现并诗化他们的诸如热爱劳动、无私、仁爱、善良及与无休止的顽强抗争苦难等一系列美好品质。繁重的劳动、迫使穷人去异国他乡寻求成功的极端贫苦、落后的风俗皆给他的主人公们——尤其是那些最无生活保障的妇女们——带来无尽的痛苦，有时甚至是死亡。作家目睹了资产阶级秩序对于希腊外省生活的侵入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塑造了那些从同乡人身上榨取利益的高利贷者的形象。他笔下的低级庸俗、冷酷无情、一味沉浸在自身利益与享受中的小官吏都是这种新秩序得以建立维持的坚强后盾。在这些作品中，帕帕加曼基斯已然用毫不掩饰的冷嘲热讽与抨击性的口吻来揭露政客们的玩弄权术及充满贿买现象的选举制度。

531・

1903 年帕帕加曼基斯出版中篇小说《杀手》，此书拟定为女性主题，聚焦于此主题内作家最为关注的一些问题。小说的主人公名叫哈杜拉，她的一生都在为父母、丈夫、孩子操忙，始终活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在精神错乱的时刻，她决定杀掉自己患病的孙女，以使她摆脱现今及将来所要遭受的无穷困难——妇女从出生起即被痛苦困扰终生。哈杜拉受发狂念头的驱使，造成了包括这起在内的一系列凶杀惨剧，作家以自然主义的笔触精细地描写了这些凶杀发生的场景。帕帕加曼基斯充分调动自然主义的写作元素，将其作为实现社会批判最有力的工具。作家力求揭示出环境是如何影响女主人公的性格的，并借此说明，不是遗传疾病或生理本能，而是灭绝人性的社会环境将哈杜拉推上犯罪之路并最终给她带来了灭亡。

可以大致认定，在深度的社会及心理分析层面，作品有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痕迹。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帕帕拉曼基斯恰巧也是十分熟悉的。

卡尔卡维察斯的创作在许多方面发生了与帕帕拉曼基斯相似的转变。卡氏是一名医生，起初在舰队上任职，随后调到陆军。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普通民众。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都是日常生活题材的，以第一人称写成。这些人物通常被赋予了一个英雄水手的名字，作者将他们与自己等量齐观，把自身的生活经历投射到他们的命运中去。在其稍晚些的《舰船上的故事》(1899)中，海洋式的罗曼蒂克情调便再难以遮掩那些具体的并通常戏剧化的生活式场景及冲突描写的锋芒。

在将注意力投向乡村题材创作后，卡尔卡维察斯早在其第一部中篇小说《利盖尔》中便描绘了与宗法制田园诗相去甚远的现实生活的图景。随后，作家对人物社会性的进一步关注及对日渐分裂瓦解的农村公社生活的强烈批判在 1896 年的《乞丐》中鲜明地显露出来。在这部中篇小说中，作

家用传统的自然主义笔法描写展示了希腊农村生活方式的原始落后、农民们精神上的贫瘠及他们对兽性本能的屈从，与此同时，他避免了以生物决定论思想来对这些现象进行探讨。卡尔卡维察斯在《乞丐》中的社会批判明显地超出了农民题材的框架束缚，而上升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广泛概括性的现实主义艺术。

城市题材的开拓者是格里高利奥斯·克谢诺布洛斯。他同时在一系列描写日常生活的短篇小说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乡扎金索斯岛，且在这些作品中便已展现了新旧生活方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扎金索斯岛隶属于伊奥尼亚群岛，伊奥尼亚群岛先后从威尼斯人落至法国人手中，而从法国人至英国人的转手则使它与希腊本土大陆相比在经济方面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发展，这一现实促使作家做了详尽全面的社会观察。正是在这一成果之上诞生了《斯捷夫的玛格丽特》这部被认为是希腊文学中第一部社会日常生活题材小说的作品。克谢诺布洛斯的短篇、长篇、戏剧为读者们展现了希腊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其中更有对于希腊文学全新的第三等级世界的描绘。克谢诺布洛斯的创作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这种特色不仅体现在作家对于现实生活中新现象的敏锐发现，而且表现在他对于西欧文学的熟知及其技法的运用之上。克谢诺布洛斯定期发表的评论文章同样佐证了他先前确立的现实主义纲领。

革新的浪潮同样席卷了戏剧界。在维尔纳尔达基斯（1837—1907）的古典主义悲剧常演不衰的同时，滑稽通俗喜剧在八十年代同样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对于民间文学的普遍热情加强了戏剧的民间口头创作色彩，但与散文领域相同，戏剧在九十年代同样彰显出现实主义（带有自然主义元素）的发展趋向。1895 年，克谢诺布洛斯将自己的第一部戏剧——现实主义喜剧《监管者》搬上舞台。在这部作品中出现了新的文学典型——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的代表，精明强干、恬不知耻、冷酷无情的商人，及戴着道貌岸然的面具为他人谋福利的关怀者形象。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希腊发生了一系列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1893 年的国家破产、1895 年的第一次工人阶级大罢工、1896 年雅典奥运会所引起的短暂的民族热情高涨、1897 年被视作国家耻辱的希土战争的失败——所有这些皆使得希腊文学加强了社会批判性，并使现实主义的阵地得到巩固。与此同时，希腊国内对于欧洲文学最新发展趋势的兴趣在不断提升。希腊诗歌也将出现新的发展进程，不过这已超出本卷的时间范畴，故暂不作介绍。 ·532

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是希腊文学紧张探索、高速发展、并可以说是神速飞跃向前的一个时期。在弥补上过去错过的东西、快速完成民族复兴任

务、克服了长久被先进文学排除在外的历史阶段后，希腊文学步入了与全欧文学共同发展的新时期。

第十二章　阿尔巴尼亚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阿尔巴尼亚新文学开始形成，这与当时阿尔巴尼亚民族意识的觉醒有着紧密联系。同时，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也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

在奥斯曼帝国长达几个世纪的封建军事统治下，阿尔巴尼亚民族意识的觉醒非常缓慢。在十九世纪之前，阿尔巴尼亚还是一个经济落后，没有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国家。国内有三大宗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这也使得阿尔巴尼亚的文化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并不统一。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既没有文字，也没有文学流派，民间诗歌文学和民间口头创作构成了这一阶段民族文化的精髓。

在1878—1881年间，普里兹伦同盟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广泛的反抗奥斯曼帝国封建统治的运动。在其推动下，本国的民族运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尽管奥斯曼政权镇压了普里兹伦同盟，并接连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民族自觉意识已无法被扑灭。

十九世纪下半叶，阿尔巴尼亚的民族复兴运动蓬勃发展，新文学也开始兴起。在民族复兴运动中，活动家们的主要任务是唤醒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自觉意识，他们希望实现文字统一，出版书籍和开办用母语教学的学校。

1879年，单行本《字母表》的出版建立了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同年，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了一个旨在进行文化启蒙的阿尔巴尼亚出版协会。但是，该协会步履维艰，尤其是在普里兹伦同盟解散以后。随后，其组织中心转移到了布加勒斯特。从1884年起，在该地出版了大量的阿尔巴尼亚语杂志和书籍，在巨大的努力之下，这些出版物被送到了阿尔巴尼亚。后来，在保加利亚和埃及也有一些阿尔巴尼亚的民族文化组织兴起。

爱尔巴桑的语文学家康斯坦丁·克里斯托福里迪（1830—1895），早年曾先后在约阿尼纳（希腊）和英国接受古典教育，其多年的工作成绩卓著。克里斯托福里迪曾用长达数年的时间为编纂《阿尔巴尼亚—希腊语辞典》搜集材料，这本词典在其去世后才得以出版。而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并在后来发表的文学作品《高地人打猎》则是其尝试用阿尔巴尼亚语进行文学创作的见证。

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第一批阿尔巴尼亚语的民间创作出版物。五十至六十年代，文学家、政论家泽夫·尤巴尼（1818—1880）曾在阿尔巴尼

亚北部地区从事民间创作的收集工作，其收集的一小部分民歌作品于1871年在的里亚斯特（意大利）发表。而在1878年，一本内容更为丰富的民间创作集《阿尔巴尼亚蜜蜂》在亚历山大（埃及）出版，该书的大部分材料是由语文学爱好者费米·米特科（1820—1890）收集的。

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发展始于诗歌和政论作品。在十九世纪头几十年，斯库台派文学占据重要地位。法国僧侣彼耶德尔·查里什（1806—1866）和莱奥纳多·马尔蒂诺（1830—1923）的创作为该派文学奠定了基础。他们的作品主要为宗教题材的诗歌，同时也涉及了民族主题。比如，马尔蒂诺就在寓意深刻的诗作《守财奴的笼中鸟》（以"鸟"喻阿尔巴尼亚，以"守财奴"喻奥斯曼帝国）中对当时的政治事件进行了回应。此外，查里什，尤其是马尔蒂诺还将大量意大利的作品翻译成了阿尔巴尼亚语，而他们的作品也反映着意大利诗歌对他们产生的影响。

七十至八十年代，随着民族运动的不断高涨，旨在唤醒人民联合起来斗争的政治题材诗脍炙人口。而早在六十年代末，民间创作的收集者费·米特科就曾试图说服阿尔巴尼亚同胞："联合起来吧，土耳其人和基督徒们，去争取自由吧。"后来，米特科根据在阿尔巴尼亚所发生的政治事件改写了《马赛曲》的歌词，并将其印在传单上发表。在这一时期，有着重要影响的还有瓦索·帕夏（1825—1892）的诗歌创作。他是斯库台人，学识渊博，曾于1848—1849年间在意大利参加革命活动，七十年代投身于阿尔巴尼亚解放运动。帕夏的诗作《啊，阿尔巴尼亚》同样以传单的形式在政治斗争时期广为流传。、

· 533

阿尔巴尼亚新文学真正发端于纳伊姆·弗拉舍里的诗歌和他弟弟萨米·弗拉舍里的政论作品。

纳伊姆·弗拉舍里（1846—1900）的创作明显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他曾在希腊约阿尼纳的一所中学念书。从十八世纪起，法国的启蒙思想就体现在了那里的教学之中。在纳伊姆年轻的时候，他就将对世界的唯物主义认识与其童年时期从贝克塔什派那里接受的泛神论结合起来，同时，诗人还酷爱波斯诗人鲁米和萨迪的诗作。苏菲派泛神论认为神存在于一切存在之中，人是神的最高化身，这一思想也成为了纳·弗拉舍里最主要的宗教哲学世界观。他的创作，既充满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思想，同时也宣扬着道德完善，呼唤着人性、大爱、团结，号召人们掌握更多的知识。

纳·弗拉舍里的文学活动始于用土耳其语和波斯语的创作。1884年，他用土耳其语写成的短篇讽喻小说《一年四季》在伊斯坦布尔出版。次年，他在同一城市发表了用波斯语创作的抒情诗集《梦想》。1886—1899年，纳·弗拉舍里在阿尔巴尼亚出版协会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阿尔巴尼亚语作

品，其中包括：《畜群与大地》(1886)，诗集《写给小学生的诗》(1886)、《夏天的花》(1890)、《伊利亚特》第一卷译文(1896)，两部史诗《斯坎德培的一生》和《卡尔巴拉》(1898)，用散文和诗歌阐述贝克塔什派宗教伦理学说的《贝克塔什笔记》(1896)，《历史汇编》(1886)，《阿尔巴尼亚历史》(1899)，等等。

无所不在的且不具备人格的神是纳·弗拉舍里诗歌创作的一大主题，虽然诗人自己是穆斯林，但他却从不把神称为"阿拉"，而只是将其称为"真正的伟大的神灵"。在波斯语作品(《天空》、《哲学》、《太阳》、《月亮》)和阿尔巴尼亚语作品(《神》、《宇宙》、《知识》、《真理》等)中，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绘着宇宙图景。弗拉舍里用诗歌讲述着无边无际的星辰、天体的运动、诞生和殒灭，讲述着四季更替和浩瀚的物质存在，讲述着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诞生、存在、消亡和再生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弗拉舍里并不是通过陈述自己关于世界的想象来表现整个宇宙主题的，而是通过充满激情地讲述着伟大的神话故事，启发着读者。

在纳·弗拉舍里的诗歌创作中，人的主题是与宇宙的主题并行的。诗人一直找寻着的神的化身，或在群星之中，或在水滴之中，不过首先还是在人的身上："我曾到处找寻他/我曾问，神在那里？/后来我明白/他就存在于我身/而我却不曾知晓！"在诗人的宗教观念中，宇宙存在的永恒性是以物质存在的各种形式具有一致性为前提的："没有什么会死亡，因为宇宙/永远是鲜活的/我曾是太阳，曾是月亮/我曾是星星、飞鸟、绵羊/我曾经历多次人生。"后来还有这样的诗句："我之为人，正如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

根据纳·弗拉舍里的伦理观念，人是神的化身，所以，就不应去寻找其他的圣物。人应该认识自身。而最主要的是，充满神性的人，应力求克服自身的罪恶，并帮助他人克服罪恶，同时应充满仁爱、智慧、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故土的热爱。

在一些作品中，诗人虽然通过鲜明而又形象的诗歌结构表达了其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但难免限于片面的说教，如在长诗《畜群和大地》中：

> 啊，阿尔巴尼亚的群山之巅，啊，年轻的橡树林，
> 啊，繁花盛开的山谷。我日夜把你们铭记心头。
> 你们，是那布满鲜花微笑着的山冈，
> 我想歌颂羊群，牧场，它们在星辰之下……

纳·弗拉舍里曾在伊斯坦布尔生活多年，他喜欢赞美故土的风光和歌颂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动的牧人和庄稼人。诗人将大自然神化，并把它和

田间劳作一起看成是宇宙的一部分，看成是美与和谐的体现。诗人把劳动视为人类生活最主要的法则，这一思想也贯穿于整部长诗之中。

纳·弗拉舍里的抒情诗也受到了拉尔马丁的感伤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在自己所熟知的十九世纪欧洲诗人中，弗拉舍里曾把拉尔马丁排在首位。同时，在弗拉舍里的创作中还能发现波斯古典诗歌的痕迹，例如，诗歌《长笛》就是对鲁米的名作《长笛之歌》的改写。不过，弗拉舍里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却是毋庸置疑的。

在寓言创作上，纳·弗拉舍里善于借鉴伟大先辈的经验。他的一些寓言作品就效仿了拉封丹和鲁米的作品。在垂暮之年，同时也是文学生涯的晚期，纳·弗拉舍里将兴趣转移到了史诗的创作上。在长诗《斯坎德培的一生》中作者讲述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的一生。长诗《卡尔巴拉》则描写了伊斯兰教早期历史中的悲剧事件。这些长诗的创新之处在于，诗人完全没有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外语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这些长诗，与诗人早年的创作一样，为阿尔巴尼亚的新诗创作和现代阿尔巴尼亚标准语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萨米·弗拉舍里（1850—1904）的文学生涯是从在伊斯坦布尔的众多进步报刊当记者和编辑开始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这座城市度过的。他曾用土耳其语创作了一部小说和三部戏剧。萨·弗拉舍里还将众多欧洲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了土耳其语，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同时，他还为科学知识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出版了一套科普手册，其中涵盖了星源学、地理学、人类学、伊斯兰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此外，他还编写了一部六卷本的百科全书。

萨·弗拉舍里曾参与阿尔巴尼亚语字母表的创立工作，并领导阿尔巴尼亚出版协会。他还于1884—1885年间担任了在伊斯坦布尔出版的第一本阿尔巴尼亚语杂志的编辑工作。

论著《阿尔巴尼亚，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被视为萨·弗拉舍里政论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也成为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和纲领性文件。同时，这部论著还促进了阿尔巴尼亚文学中政论文体裁的进一步发展。不论是从文风的优美程度，还是从语言的表现力和纯洁性来看，这部作品都算得上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阿尔巴尼亚文学的经典之作。

十九世纪阿尔巴尼亚文学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大区的阿尔巴尼亚村落形成的。阿尔布莱什（又称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的诗人的创作，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思潮的鼓舞。阿尔巴尼亚民

族文化复兴运动的最初成就正是在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氛围中取得的。

阿尔布莱什诗歌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其发展明显受到了欧洲、尤其是意大利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然而，阿尔布莱什诗歌最显著的特征则是其中的民族浪漫主义成分，表现为对阿尔巴尼亚民族历史的崇拜，以及关于阿尔巴尼亚在十五世纪勇敢抵抗土耳其侵略者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对民族历史和伟大战争进行浪漫主义理想化的同时，这些作品也表达出了为争取阿尔巴尼亚挣脱土耳其统治而斗争的思想。

对民族历史的崇拜表现在民间文学之中。民间文学的艺术原则非常贴近阿尔布莱什作家的创作。而抒情诗歌就是在一系列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阿尔布莱什人的歌唱风俗，充斥着农民阶层惯用语的生活题材戏剧，含有历史或非历史情节的民间浪漫主义叙事长诗。

由于阿尔布莱什人对民间文学的巨大兴趣，以及对民间诗歌的大量收集，因而出现了"民间化的文学"，继承和发展着民族文化传统。

因此，对于十九世纪的阿尔布莱什人来说，民间创作与书面文学之间无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而这一联系不仅决定了阿尔布莱什浪漫主义诗歌的民间创作性，同时还决定了阿尔布莱什的民间创作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诗人德·拉达(1814—1903)是阿尔布莱什文学的杰出代表。其过人的天赋早在青年时期的作品《米辽萨奥之歌》中就已崭露。但拉达得以成名还是因为他收集和出版了大量阿尔布莱什民间文学，并担任了一些定期刊物的编辑工作，发表了众多与政治、文化相关的作品。同时，他还写下了一些将中世纪的阿尔巴尼亚理想化的浪漫主义长诗。

535·

1866年，德·拉达出版了一部附有意大利文翻译的阿尔巴尼亚语民间创作集，他将这个集子命名为《阿尔巴尼亚长诗狂想曲》。与在阿尔巴尼亚收集到的民间文学相比，阿尔布莱什民间文学与希腊—拜占庭民间文学传统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一特点也反映在了拉达所收集到的文本之中。

长诗《不幸的斯坎德培》(1877)是德·拉达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这部作品之中，拉达深刻展现了十五世纪上半叶阿尔巴尼亚的社会生活和斗争场面。这首长诗共有三十二篇，并通过斯坎德培这一形象联系起来。虽然在这部作品中一些情节和修辞手法具有很明显的民间文学性，但德·拉达并没有刻意模仿民间叙事诗体裁。

阿尔布莱什诗人小加弗里尔·达拉，毕业于法律专业，曾参与1848年的革命活动，后来投身于加里波第运动，之后在罗马担任多种行政工作，从事报刊出版，晚年回到西西里岛。达拉一生用意大利语和阿尔巴尼亚语进行诗歌创作。他的长诗《巴拉最后的歌》(1885)讲述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一个年轻骑士和一个美丽的公爵女儿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故事的主

人公尼克·贝塔和他的对手巴尔·戈列米都是取自于阿尔布莱什民间创作的人物形象。在长诗中还有众多历史人物,其中就包括了斯坎德培。长诗具有阿尔布莱什民谣的性质,虚构的传奇歌手、老战士巴拉被认为是这些民谣的创作者。达拉将巴拉视为是“阿尔巴尼亚的奥西恩”,并为长诗写了内容丰富的前言和诗体序。不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部长诗才得以发表和为人熟知。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上,长诗《巴拉最后的歌》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被视为是对古代叙事文学的模仿,更被看作是具有最鲜明民族浪漫主义特色的杰作之一。

生活在卡拉布里亚的安东·森多利(1819—1894)不仅是一位抒情诗人,同时还是出色的戏剧家和小说家,此外,他还曾从事民间创作的收集工作。森多利出身贫寒,在担任村里的牧师时,他接触过很多在卡拉布里亚居住的阿尔巴尼亚农民,因此他的作品时常反映普通农民的苦与乐。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剧本《埃米拉》,这部作品用现实主义的笔调描绘了当时的生活。长诗《政治犯》(1848),如剧本《埃米拉》一样,讲述了在卡拉布里亚的农村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冲突。

才华横溢的卡拉布里亚—阿尔巴尼亚诗人泽夫·塞伦佩(1843—1901)的一生是悲剧性的。爱情的不幸和贫困迫使三十岁的诗人移民巴西,然而在那里生活了不到一年就又回到了家乡,此时的诗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去了巴西,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塞伦佩的大部分作品在漂泊的过程中丢失。比之于同时代的其他阿尔布莱什诗人,塞伦佩与当时意大利的文学发展潮流联系更为紧密。在他的抒情诗中,不仅渗透着解放和统一意大利的思想,还融合了阿尔巴尼人移民想要解放先辈生存的故土这一世代梦想,如诗作《为威尼斯的自由而战》就歌颂了生活在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投身于加里波第运动的英勇事迹,并将加里波第本人比肩于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

塞伦佩的爱情诗和忏悔诗更富于情感的流露和艺术表现的张力。塞伦佩借鉴了欧洲抒情诗的篇幅和形式,极大地丰富了阿尔巴尼亚的诗歌创作体系。他的十四行诗就将严谨和优美的形式同深刻的思想内容结合起来。同时,他还是写景大师。他的十四行诗《幻想》不愧是阿尔巴尼亚诗歌文学的瑰宝。

威琴茨·斯特拉济科(1822—1886)的诗歌创作在阿尔布莱什文学中也占有特殊地位。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军功卓著的阿尔布莱什家族,生于卡拉布里亚的一个盛产盐的阿尔巴尼亚族大村庄,并在那里长大。诗人从小就懂得制盐工人劳动的艰辛,对卡拉布里亚农民的贫穷生活深有感触。斯特拉济科家族世代都有着革命思想,斯特拉济科也继承了这一思想。在

那不勒斯读大学期间，斯特拉济科就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1860年，诗人 536· 更是在自己的家乡召集村民组成了一支加里波第运动的革命小分队，并亲自领导了这支队伍。在革命之后，斯特拉济科曾当过几年军人，并获得了很高的军衔。但后来他离开了军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开始从事政治评论工作，在报刊中维护工人阶级和意大利南部农民阶级的权利和利益。斯特拉济科是加里波第革命派人物，他和这一派别的其他人一样，在期待民主自由和社会公平中失望，同时也无法接受意大利统一之后所确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君主制。

斯特拉济科留下的文学作品并不多，总共只有几篇描写尖锐社会矛盾的诗作，如《穷人的哀歌》、《士兵》、《俄罗斯农民》（写于1873年，但至今未发表）、《阿尔巴尼亚人》（意大利文）。在颂诗《穷人的哀歌》中，斯特拉济科运用民间口头形式的临葬哀歌，塑造了一个集合了乡村雇佣农民、制盐工人、劳工特点的"穷人"形象。斯特拉济科的一些抒情诗作后来还被编成了民歌。

泽夫·斯基洛（1865—1925）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与众不同。除民间文学体裁的《阿尔巴尼亚狂想曲》外，斯基洛还创作了两部长诗。长诗《米罗和海德》（1891）安静恬淡地讲述了阿尔布莱什年轻人之间的爱恋和牺牲，这一故事情节似乎让人想起了德·拉达青年时期的代表作《米辽萨奥之歌》，但与之不同的是，在斯基洛的作品之中，主人公的牺牲并不是由艺术构想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由此可见，艺术构想在作品中处于次要的位置。长诗《在异乡》（1900）再现了阿尔布莱什村落的父系民族生活，同时，诗人也从历史和民族的维度进行了大量评论。民族浪漫主义诗歌在十九世纪的繁荣，得益于迁居至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侨民所保存下来民族文化传统，而斯基洛可谓是这一派别最后的代表人物。

第四编　美国及加拿大文学

第一章　美国文学

在1860年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人、积极的废奴主义者亚伯拉罕·林肯获胜，随后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六个南部州宣布脱离美国。1861年，反叛州的邦联建立，两个月后美国内战爆发。经过四年残酷的战争，在双方都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后，1865年4月9日，叛军在阿坡马托克城投降。

美国内战的历史意义在于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消除了美国境内的奴隶制，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阻碍终于被扫清。

美国资本主义不寻常的高速发展时期随之开始。国家剧烈和痛苦的变革由新兴的社会矛盾凸显出来。战争年代的民主热潮很快就被深深的失望所取代；就如同马克·吐温所描述的，镀金时代的现实打消了人们对废除奴隶制后美国伟大未来的幻想。

美国的发展道路使之在十九世纪末跻身于世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但这建立在对劳苦大众（尤其是被正式解放了的黑人）残酷的剥削和政治经济领域的贪污腐败之上。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工业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人们迅速地掠夺着国家西部无人居住的土地，美国居民的民族结构显著改变，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从东欧、斯堪的那维亚、爱尔兰和意大利涌进美国。在这个时期美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宣告了工人阶级与剥削和社会不公平的首次斗争。国家的社会发展也从根本上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艺术使命。十九世纪最后的四个十年对于美国文学来说，是一个独特的、具有自己的内部逻辑完整性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进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现实主义的形成。它以一种特殊的力量渗透于美国的文学，也具有许多具体的特点。

1. 内战时期的文学

南方的种植园奴隶制度与北方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这构成了美国内战前最主要的政治矛盾。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这个矛盾尤其具有现实意义，这主要与1850年的《逃亡奴隶法案》以及约翰·布朗的处决有关，约翰·布朗在1859年领导了哈伯斯费里渡口武装起义，鼓动奴隶们反抗他们的奴隶主。

这时期的文学和国家的公众意识一样，也分成了两个阵营——支持废除奴隶制或者反对废除奴隶制。五十年代是废奴主义文学的繁荣时期，从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上来讲，五十年代在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也是一个较为活跃的时期。废奴文学的作家的创作一直有具体的宣传任务。政论的元素，毫不掩饰的说教与废奴主义作品是有区别的。废奴主义及其文学主要是从道德方面批判奴隶制。只有梭罗将美国政府支持的无耻的奴隶主的行为和杰弗逊模式的民主危机的其他现象联系在了一起，他在文章《马塞诸州的奴隶制》(1854)一文中说道，《逃亡奴隶法案》颁布后，他就"失去了家园"。

538·

废奴主义作家的艺术成就并不出奇，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在为民主文学繁荣的铺垫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并且内战时期也正是以民主文学的繁荣而著称。支持奴隶制的各州所发动的暴乱强烈地激发了这个时代的大文豪的创作。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果断地支持北方。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北方同盟的政论作品和诗篇中谈的就不仅仅是镇压暴乱，而是刻不容缓地解放黑奴，这是这个时代迫切的需求。内战文学的特色是战斗的民主主义和战斗的激昂热情，它强调大众关心的主题，这并不妨碍文风的浪漫色彩和生动性。这是美国浪漫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阶段。

这个时期主要的文学体裁当数诗歌和讽刺体裁作品。有关内战的小说，除了一些过早出现的不成熟的作品外，都出现在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内战小说的体裁被认为是那些宣称自己是构建美国现实主义的体裁之一。这些小说多多少少都是以战争时期的讽刺文学为基础的。

这些文学的创始人是纽约报纸以及外省报纸的讽刺小品文作家。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动机主要以鼓舞英勇精神、对光明未来的希望和在同盟破裂之后对美国的期望为主。内战时期的文学中交织着残酷的嘲弄和浪漫主义的激情，这其中还显露着战争本身的历史矛盾性。北方的士兵在为消除奴隶制而战的同时，也在为以后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无限空间而战斗。

内战时期诗歌的最高成就就是进入了美国民俗学黄金领域的民间歌曲。爱国主义的激情将内战时期的诗歌和民间歌曲拉得很近。这些年间美国浪漫主义诗歌经历了自己的巅峰期之一。但是美国战争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和往常一样，诉诸古老的诗歌词汇和《圣经》的意象，把一些普遍意义上的思想放入他们喜爱的自由、幸福、罪恶、真理等等概念之中。

这种趋势在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洛威尔是一位歌唱乡村风景和理想化的和谐质朴的歌手，作为华兹华斯的追随者和田园诗的创造者（这种田园诗中有着和文明社会中追求虚荣的忙碌相反的限于大自然的生活），洛威尔却转向政治主体的创作，尖刻地批评美国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他的诗歌中的两种不同倾向之间矛盾很多，意识到这一点，他选择了自己的文学面具——离现实生活不远的，诚实和真诚的农民比格罗，他十分聪明，虽然有时会很天真，对美国历史中重大事件作评论，比如1848年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比格罗诗篇》第一篇，1849年），以及国内战争（第二篇，1867年）。

在《比格罗诗篇》中作者描绘了一个半文盲式的，说着杂乱的方言和行话的人物，诗行真实可靠地再现了比格罗的想法和他的外省的周围环境，这些人虽然因为自己大量的诚实行为而受苦，但仍然学不会只讲究实用的道德，对事物保持"现实的"的看法。主人公自己显然在这种环境中占到了便宜。这就是有着不可动摇的民主信念的人，通过自己的质朴的双眼可以发现美国政治生活中话语和行为之间的不一致，自私利益带来无上权力。

《比格罗诗篇》的第二篇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和讽刺手法的综合创作的尝试，浪漫主义和讽刺手法是内战文学中两种主要的艺术趋势。主人公说出了不少痛苦的真相：司令部的拖沓和错误决策，军队招来的蛮横无理的投机商，许多北方人存有种族主义的偏见。书中也含有诗歌，歌颂普通人的英雄主义，和他们慷慨的内心和高尚的行为。这些不同方面的诗歌的细致结合令人信服地塑造了一个普通农民的行为处事，对他来说战争本身是伟大的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但是战争时期的日常工作是劳累而且平淡无奇的。它们根本不像一些诗人描写战争时被歌颂的理想那样一片欢欣鼓舞，如作家布莱恩特、霍姆斯和惠蒂尔，其中惠蒂尔是著名叙事曲《巴巴拉弗里奇》的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他尝试塑造真正的英雄主义性格，避免浪漫主义的陈词滥调。 ·539

和《比格罗诗篇》不同，洛威尔的其他作品以倾向于古老的艺术规范为特征，显示了作者诗歌意识的不连贯性。在洛威尔的战后作品中，没有了那种民间幽默的描写和真实可靠的日常生活描写。洛威尔之后经典作品的声誉就固定下来了。在战后的十年里新英格兰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命运是典

型的。

战后的十七年中，虽然朗费罗继续一部一部地发表作品，包括出色的诗歌，特别是诗集《潘多拉的面具》中的十四行诗，但仍然还是仅仅以不多的几大艺术成就为标志。在战争时期，在朗费罗不断地写出以大众关心的事件为题材的诗歌，他的工作重点还是在写作小说《路边酒店的故事》，这部作品是以薄伽丘的《十日谈》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为学习榜样的，这些故事的大部分的水平没有超越榜样的伟大模范的技艺精湛的手法。

朗费罗创作后期的抒情作品基本上和美国生活没有什么关联。在这些抒情作品中主要的创作动机是疲惫和对死亡的期待，事件的变幻无常和艺术真理的不朽与伟大。这些动机在他死后发表的诗剧《米开朗琪罗》(1883)中也占据了中心地位。朗费罗有过几次去欧洲的凯旋式的旅行，在那里他被称作和雨果同样的伟大诗人。他被选作许多外国社团和研究院的荣誉成员，包括俄罗斯的；而在美国，歌手海华沙才被尊为是真正的民族艺术家。但是事实上，从内战结束后朗费罗是离美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路径很遥远的，而他创作的黄金时期还远没有到来。

布莱恩特在战后的三十年间没有什么出色的作品，他将全部精力都花在了翻译荷马的作品上；而霍尔姆斯企图复兴浪漫叙事曲这种衰败的文学形式的努力都是徒劳，他出版了新的关于概括和论述多样主题的作品集，这个多样主题就是将杂文、日常速写和哲学随笔别出心裁地综合在一起，所有的这些都是以他书中的主人公在波士顿一个寄宿学校饭桌上的谈话的形式展现的。霍尔姆斯的主题多样性和机智锐敏让他为当时的人所认可，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作者思想的浅显性，和只停留在事件表面的特点。

霍尔姆斯试图在这些席间谈话中表明新英格兰依然是美洲野蛮文化中唯一的文明的摇篮。然而这一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在新英格兰诗人的作品中，尤其在惠蒂尔的晚期作品中流露出思乡的情愫。惠蒂尔的长诗《被大雪覆盖的》(1866)以及七十至八十年代的自传体诗令读者惊叹：诗中深刻的抒情性、作者对于那些在小村庄和深藏于马萨诸塞州森林中的农场发生的童年小事的清晰感受，以及对于遵守着那时联系着新英格兰乡村居民的自然的律动和善良法则，对于虽艰苦却自由和浪漫的生活的记忆。惠蒂尔在那个时代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诗歌主题，它令惠蒂尔晚年(1807—1892)所作的诗歌获得了生动感人的口碑。

与浪漫主义紧密相连的新英格兰诗歌传统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便开始衰退。然而这段时间在另一个文学流派——早期的美国现实主义——中却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

由参与南北战争的作家们创作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小说中鲜明地体现出

了现实主义倾向，其中最优秀的作品《罗渥奈尔小姐走向北方》创作于1867年，作者是约翰·德福雷斯特（1826—1906）。德福雷斯特在前线待了近三年，对于这段时期的印象为他的这部主要的小说提供了素材。

小说中引人入胜的情节以及公式化的主题和人物都是当时的小说文学中的典型元素，表明德福雷斯特把握住了当时的艺术审美趣味。然而这部小说的主题——小说主角科尔别伦大尉在战争期间因生活的磨炼而获得内心的成长——是作者独创的并具有现实主义意味的。

德福雷斯特强调在自己的小说中不能加入著名的历史人物，他在展现普通军官及其军事环境时谨慎地避免了浪漫效果。小说中有关战场和后方生活的情节说明作者追求对人物和事件做出尽量真实的描写，并不避讳在艺术作品中描写"低层次的"、"黑暗"的现实。 · 540

德福雷斯特是美国最早赞赏托尔斯泰之天才造诣的人之一。他把鲍罗廷的剧《战争与和平》誉为是对战争无与伦比的真实描绘。他自己就曾希望能为"罗渥奈尔小姐"工作。但是他的现实主义还是肤浅的，他对美国社会进程本质的看法时时显现出天真和过分的崇高，而他毫无根据的希望也很快在"镀金时代"的现实中倒塌。尽管如此，小说《罗渥奈尔小姐走向北方》，与他之后关于政治腐败的小说《诚实的约翰·韦恩》（1875）等一样，为美国文学的新方向做了铺垫。

德福雷斯特自己清楚地认识到了其创作追求的不平凡之处。在写出《罗渥奈尔小姐走向北方》一年之后他号召美国作家们创作"一些令人回想起英国萨克雷和特罗洛普或者是法国的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作品"，这一现实主义的宣言很快就等来了追随者。

最晚到九十年代，散文和诗歌的发展依然以现实主义趋势的强化为特点。这一进程在战后十年里惠特曼的创作中尤为活跃。

2. 瓦尔特·惠特曼

《草叶集》的作者瓦尔特·惠特曼成长在农庄主家庭，这个家族的族谱上溯至十八世纪中叶。瓦尔特·惠特曼（1819—1891）很晚才发现自己的创作才能，在这之前他游历了美国的不少地方并从事了许多不同的职业。当因农庄效益不佳而被迫将其卖掉之后，全家迁居到纽约下面的布鲁克林镇，惠特曼同他的兄弟们一起帮助父亲从事建筑包工的工作。惠特曼曾做过教师、排字工人、记者以及一些城市报刊的编辑。也许，惠特曼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为这些短期的刊物而写的，因为作为编辑他有义务如此。起初，惠特曼成为了布莱恩特和爱伦·坡的模范学生，但其锋芒还不至于崭露头

角。仅在 1850 年,他就出版了《欧罗巴》以及三本诗集,这标志了十九世纪一位伟大诗人的诞生。

据传,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惠特曼经受了某种非常强烈的心灵震撼,这一震撼决定了他的世界观和诗歌创作特点。此外,关于这一神秘的顿悟的地点和时间还有一种说法是在 1848 年的新爱尔兰(惠特曼当时担任地方报纸的编辑)。当然,这不过是传记作者们未经证实的想象。这一传说的产生有其源头:在昨日平庸的记者的精神和文学创作发展道路上发生的转变过于突然,以至于被蒙上了神秘的纱罩。实际上,年轻时期的惠特曼的思想探索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都为这一转变的形成打下的基础。

欧洲 1848 年革命和美国本土上的废除农奴制运动这两个因素对惠特曼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惠特曼的父亲是持有杰斐逊思想的民主党派人士,而惠特曼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激进的观点和对社会公正的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念。早在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规范完全占据了他的文学创作构思时,惠特曼如同街头的报童一般展现出强大的精力,不遗余力地揭露金融寡头和种族主义的劣行,并维护“上百万的工人、农场主和手工业主”的利益。虽然他对于自己的信念并不始终如一,但在四十年代他确实一直坚持着民主主义的立场。同时,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以及美国的废除农奴运动事件的发展,促使惠特曼采取更加尖锐与明确的语气发表自己的见解。

惠特曼成为了傅立叶主义者,他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却又不能始终公正地评价欧洲的傅立叶的继承者们在四十年代创建数十个公社这一行为。社会观念和世界观的基本原则上的不同使他与爱默生分道扬镳。然而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爱默生的哲学思想都在体现着惠特曼的文学思想的《草叶集》中打下了鲜明的烙印。

诗集《欧罗巴》——对在 1848 年阵亡的革命烈士的挽歌——表达了惠特曼对终将获得全面胜利的自由的坚定信念(“从这颗种子里成长出新的幼苗”)。之后的所有创作中都包含了诗人关于建立“广泛并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兄弟姐妹和爱人们的公社”的理想——这一主题鲜明地标明了惠特曼 541· 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亲近程度。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将《草叶集》的创作激情定义为人类团结的激情,以及“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激情,包括“通过合作团结起来的人们相互平等”。1909 年,在谈及那些最初具有“个人主义和清净无为思想”而后来勇于克服这些情绪、消除个人因素并向社会主义靠拢的西方作家时,高尔基首先就提到了惠特曼。

惠特曼的诗表达了十九世纪最为强烈的革命激情。惠特曼后来将表明了其创作信仰的《自我之歌》(1867)添入了《草叶集》:

我歌唱“自己”，一个单一的、脱离的人，
然而也说出“民主”这个词，“全体”这个词。
……
歌唱包含热情、脉搏和力量的广阔“生活”，
心情愉快，支持那些神圣法则指导下形成的、最自由的行动，
我歌唱“现代人”。

这一宣言总结了惠特曼所有的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这些主题在早期的诗集《草叶集》中就已显露出来。惠特曼既是“普通的个人”的歌颂者、民主主义的坚定的捍卫者和宣传者、全人类团结友爱的新时代的预言者，同时也是宣扬快乐的人，他将各式各样的生活融入于自己的创作之中。关于诗集《草叶集》的主要基调，卢那察尔斯基做了出色的描述：“在共同起点上的兄弟情谊——全宇宙的兄弟情谊，或者说，它类似于亲兄弟般团结的社会，在包容了个人的同时也开始了解整个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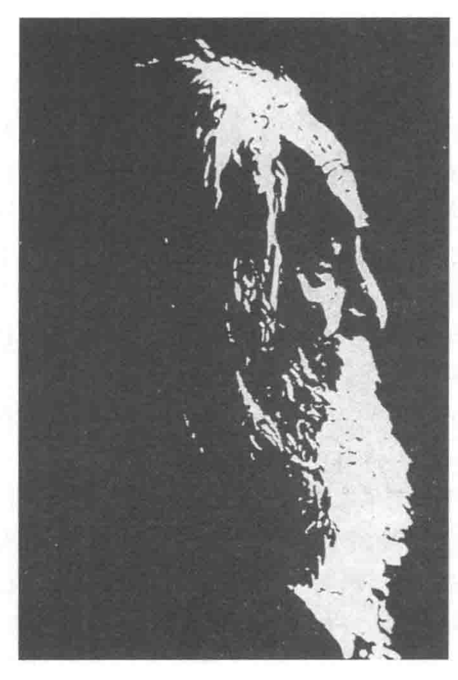
更为饱满和深邃的团结的思想、全人类的自然的平衡以及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宇宙自然生活的有限的融合体现在诗作《自我之歌》(1855)中——这是惠特曼最伟大的作品，它是《草叶集》第一版的首篇诗作。《草叶集》的第一版仅收纳了十二首诗，这本书为惠特曼的现代读者所熟悉，其原型存在于囊括了一百多首诗的第三版(1860)中。惠特曼在世时，《草叶集》就已再版多次，每一版都收入新的诗篇，并重新编排诗集的构架。《桴鼓集》(1865)、《典型的日子》(1882)和《草叶集》通过不断收录新的诗篇而成为惠特曼全部诗歌创作的汇编。

《自我之歌》在《草叶集》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是一首无主题的诗歌，诗中表达了惠特曼最为重要的美学原则——主人公“我”、人类以及整个世界的统一和平等，诗歌主人公和他所遇见的人们，与充满着辩证可变性的生活，与富饶广阔的自然界完全融合。《自我之歌》凭借其世界观和艺术结构在十九世纪的美国诗歌史中脱颖而出。

同时，在《自我之歌》中首次出现了惠特曼式的意象，这些意象令《草叶集》成为诗歌历史上真正具有创新意味的作品。惠特曼创作出的并不是经过精准描绘的细节，而是具有宇宙宏观式规模的形象，他试图延展诗歌的画面，尽可能多地捕获最丰富多彩的生活事件——社会、自然、精神——并抛弃所有关于“诗性”与“非诗性”的假定性概念。丘科夫斯基公正地评价道：“惠特曼的最核心的特征……他全部的创作力量就在于那极为鲜活、稳固并从未远离他的浩瀚如烟的宇宙。”甚至在他的爱情散文诗、哲学思索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特写中都能体会到那“宇宙空间的辽阔无垠”。不论是具

· 542

体的观察，还是没有伪装的政治性抨击都伴随着他那些宏大的象征一起出现，眼下与永恒并不是分离的，就像惠特曼诗歌中的主人公并不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隔离开一样（“瓦尔特·惠特曼，宇宙，曼哈顿的儿子”），对于惠特曼而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瓦尔特·惠特曼肖像 克莱克 1898 年

惠特曼诗中的“我”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不论以何种方式呈现，它都能够不断地转变形象——不仅能转变为其他人，还能变成某些自然现象，仿佛自然界与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壁垒。平等的万事万物在其永恒的运动中相互融合是惠特曼最为重要的理念。这一源自于超验主义的理念体现在惠特曼的诗中，但这并不仅仅受到爱默生的直接影响。1855 年，爱默生对《草叶集》的出版表示热烈欢迎，然而当惠特曼逐渐开始研究美国生活中具体的社会问题之后，爱默生又带有强烈怀疑的语气评论了这一诗集。五十年代的惠特曼能够轻而易举地攫取他人的欢乐与悲伤，在这一时期，惠特曼的宇宙观与泛神论中形成了对自然和人的理解与认知，这一感受与浪漫主义的本质是相通的，但是那时的惠特曼的浪漫主义理念在《草叶集》中却以一种非传统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自我之歌》始，惠特曼将创作一部真正包含广阔的现实图景的人民史诗视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从而传达出占据诗人身心的灵感，它与在美利坚乃至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有着直接的联系。个性和被惠特曼所珍视的“全体”应紧密地融合在宣扬能够实现这一联合的民主的史诗中。

这一人物要求诗人具备现实主义的诗风。惠特曼对浪漫诗歌的结构做了根本性的改造，他在自己的诗作中引入了形式自由的诗句，呈现出生活本身运动的韵律，通过领会原本不被传统的诗歌世界关注的多彩万千的生活现象而无限拓宽诗人的“自我”与现实间的交流平台。惠特曼力求创作出能够真正地展现出全景式时空的诗篇，通过这样的诗篇本能地传达出为诗人所感受到的与生活的一切表现之间的血缘关系。

惠特曼的自由诗成为了现实主义诗歌形成与发展的一条主干道，如维

尔哈伦和C.桑德伯格等诗人都继承了惠特曼的诗风并发展了现实主义诗歌。惠特曼在哲学和艺术方面的许多兴趣注定了他在诗歌领域的创新。惠特曼的自由诗吸收了英语版的《圣经》与爱默生散文的格律特点、惠特曼所在时代的美国的传教士和演说家话语中所特有的排比结构、印第安民间文学中独特的诗歌创作手法,以及布莱克在《先知书》中采用的创新式格律。然而惠特曼的自由诗首先是属于惠特曼本人的创新的诗学主张,这一主张与《草叶集》的内容要求相符。

惠特曼的诗中的内容已不仅仅限于浪漫主义的框架之内:他对于日常生活的兴趣与关注,他所描绘的丰富多样的具体的生活细节,以及他涉足"毫无诗意"的生活领域——所有这些都预示了现实主义诗歌的诞生。惠特曼的诗歌作品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起点,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即使他的创作已经远远超越了浪漫主义的许多美学准则。惠特曼的诗性的"我"在《自我之歌》、《大路歌》、《阔斧歌》、《欢乐之歌》,长诗《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以及他在五十年代的杰作中再现,在实质上这仅仅是个人与大众之间的表面上的联系,而不是个人与人民命运的内在的融合,后者才是现实主义诗歌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惠特曼的诗中似乎能够听见自然的声音——草原、城市、海洋、森林,以及皮鞋匠、水手、瓦匠和木匠的声音,然而他的诗并不具有复调性的特征,因为这些声音实际上不过是由惠特曼本人的声音变换而来的。

抨击惠特曼的文人(包括后来的汉姆生在《美国的精神生活》上发表了一些针对《草叶集》的讽刺挖苦文章)将惠特曼诗作中的假定性的"多声部"解释为对体现了美国文明实质的"无个性"的赞歌。在《自我之歌》和《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中的"我"被视为除去了清晰可见而特殊的事物及精神世界的共同个性。这些指责是不公平的:创作了不同版本的《草叶集》的"瓦尔特·惠特曼"是一位典型的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主人公,他处于世界的中心,他肩负着时空的所有忧虑、不安、欢乐和希望,这些情感在惠特曼看来都是诗歌所应当表现的。当然,这一主人公是经过设定的,正如同任何一个主人公一样,他们体现的是某一确定的思想,而不是具体的个性,但同时他也带有着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民族的某些特征。"所有一切都围绕着我,集中在我的身上,并源自于我,"关于《草叶集》的创作原则惠特曼这样解释道。"我只有一个中心人物,那就是通过我本人而获得典型化的全人类的个性。但是我的书让……每一位读者都将自己置于中心,成为一个生动的源泉与诗中的主角,并感受书中的每一页、每一份灵感、每一行诗。"

· 543

惠特曼晚年的见解无从考证,因为《草叶集》所呈现出的思想实际上是美国南北内战前夕典型的概括性的浪漫主义思想,而非"每一个读者"的世

界观。《草叶集》提供给读者的是惠特曼关于"相信自己"的先验主义、精神的独立性、个体"我"的神性,以及人和生命的泛神论感悟之间的自然的平等关系的思想,同时还包括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深刻印迹、对于废奴主义的热衷,以及对民主胜利的坚信。南北冲突爆发的前十年及内战时期的美国国内发生着巨大的历史性变化,民主主义思想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唯独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上所述的惠特曼的思想主张才能形成。

在《草叶集》的第一版中所体现出的矛盾还十分明显。在充斥着惠特曼所重视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诗篇中便能感受到这一矛盾。1855 年版的诗集包含了作者的长篇前言,其中宣称:"美利坚合众国是一部最伟大的史诗。从世界历史的起源直到当今时代所能找到的最强大、最躁动不安的人物同时也是温和与高尚的……美国就是开放式心灵的例子,这样的心灵永远能创造出英雄人物……"

惠特曼将自己的同胞们称作"各民族的人民",他认为,美国理应是一部伟大的诗篇,它拥有"与世界的那些普遍的联系,这些联系创造了并还将创造那些业绩"。同样,在惠特曼创作的早期,作为美国典型特征的"超心灵"与资产阶级民主都属于同一个自然的现象。由惠特曼汇集起来的对民主的颂歌,实质上就是对惠特曼理想化了的美国的赞美。

或许,《草叶集》就是对美国的历史使命的特殊性,对建立在 1776 年《独立宣言》基础上的"美国理想"的信仰的最和谐、最具有鲜明艺术特性的见证。然而,惠特曼在后来对"富有的上层"不满,并对"穷人——工人、黑人和所有分享他们的命运的人"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这与《草叶集》早期的版本中所体现的主题形成了激烈的冲突。作者在《草叶集》首版的前言中写道:"为了产生伟大的大师,实现政治自由是完全必要的……伟大的诗人是那些赞美受压迫的人们并给暴君带去恐惧的人。"惠特曼在此指的是经历过 1848 年革命冲击过后的欧洲,以及关于真理和作为民主的必要条件的普遍的自由理念,因而也客观地暗指了美国的情况,并在他于五十年代创作的带有强烈的废奴主义激情的诗歌以及他对所有企图破坏创建生活的民主原则的行为坚决抗争中找到了具体的证据。

于是,不同版本的《草叶集》里的驳杂的思想和艺术原则相互碰撞,并与诗人创造的世界的整体形象相矛盾。

国内战争时期创作的《桴鼓集》中,惠特曼对于美国前景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在后方医院里当过几个月的卫生员并上过前线,在他的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倾向越发明显。以往在诗歌内容中受到强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如今已不再那么明显,人民的形象和民主主义得到了具体化。惠特曼开始在诗中仔细地描摹战场上真实的人物形象(如诗作《从地里上来吧,父亲》)。早

在惠特曼早期的作品中，如《我歌唱那带电的肉体》、《向世界致敬》和1855年版的《草叶集》的其他诗篇，诗人的废奴主义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却由此形成了与惠特曼自己的民主观点的新一轮冲突。

在这些年中，为悼念在阿波马托克斯之后被受雇于南方人的凶手刺杀的林肯总统，惠特曼发表了《林肯总统纪念组诗》，这部作品连同《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成为惠特曼诗歌创作的顶峰之作。何塞·马蒂说："也许，现代诗中最优秀的作品就是惠特曼悼念林肯时的哭泣……在这首诗的末尾，似乎整个世界都处在一种悲恸的哀悼中。"惠特曼的挽歌将死亡和春天的形象、被"黑雾"所遮挡的"硕星"的象征，以及"每片叶子上都是奇迹"的紫丁香交织在一起，不断重复着亘古的永恒理念，就如同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生命一般，同时这也是献给所有为了自由在战场上牺牲，以此表明自己对民主事业的坚定信念的斗士的挽歌。

《林肯总统纪念组诗》的诗体风格吸收了由惠特曼在五十年代总结概括出的浪漫主义传统中的所有精华：诗学观点中的宇宙观、宏大的概括、死亡与重生主题的紧张对抗、符号所具有的哲学内涵以及诗歌艺术结构中的音乐性。瓦尔特·惠特曼在这部作品中不论以何种形象出现，他都代表了全体的美国人民。对他而言，射中林肯的子弹就是毁灭民主的尝试。此时此刻的民主已不是那个凸显于《自我之歌》中的实现了的"美国梦想"，而是真正的公正、平等与道德的人民的理想。因而，《林肯总统纪念组诗》中诗人从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最为明显。

在惠特曼创作的最后一个时期里，诗人对美国的社会结构越发感到失望，他在社会评论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同时坚守着《林肯总统纪念组诗》所宣扬的自由理想。总体而言，惠特曼的诗歌仍是浪漫主义流派的——他在后期创作的作品即可证明了这一点。例如，长诗《啊，法兰西之星》（1871）包含了诗人对1870—1871年在法国发生一系列事件的思考，表达了诗人对群众的无法遏制的革命激情的坚定信念；惠特曼被战后统治着美国的"暴利长龙"所震惊。《神秘的小号吹奏者》（1872）充斥着诗人痛苦与悲伤的音调（"我看见了全世界那些受奴役，被颠覆，受伤害，受压迫的人们"），但总体上这首诗最重要的还是预言了光明的未来：人人都有快乐的生活，"智慧、纯洁、健康"成为永远消除了不公正现象的社会的准则。惠特曼不知疲倦地号召奏起革命风暴的"雄伟的音乐"，而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团结就在这音乐中得以生成。

虽然惠特曼的诗性的"我"依旧带有浪漫主义的特点，但现实主义的特征在他的创作中不断得到了强化。大都市主义是晚年的惠特曼诗歌创作中

的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他和波德莱尔都是城市诗歌主题的开拓者。《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尤其是《展览会之歌》(1871)、《致冬天的一个火车头》(1876)和最后十年的其他诗作都是与工业科技时代相呼应的城市抒情诗，并使用了全新的诗歌意象和语言。惠特曼歌颂了蒸汽机的"黑色的圆柱体机身"和"神圣的工业"所创造的奇迹，并对那个时代的技术主义的幻想予以充分的重视。惠特曼笔下的城市具有多面性和紧张生活的对比性，它为惠特曼的诗歌带来了大量鲜活可信的形象以及长期以来经过艺术观察的丰富的原型。正是从这些形象原型中逐渐形成了战后十年内一个快速发展却又受社会对立问题困扰的资产阶级制度下的美国肖像。对于二十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而言，晚年的惠特曼的城市抒情诗还保留着其中一个重要的灵感源泉。

在惠特曼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创作中，社会因素和批评因素占据了主要地位。1871年，他出版了政论书籍《民主的远景》，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民主的新约……不仅在社会层面，还在宗教、道德和文学发展方面都遭遇了破产的境况。"美国国内的政治腐败深深激怒了惠特曼，他明确指责美国资本主义扩张的野心。他否定了在当时美国国内作为生活准则的"唯物主义与庸俗"，倡议借助文学来对抗弥漫全社会的腐败、下流之风以及精神空虚的现象，同时培养人们的和谐理想，阻止民族精神世界的衰落。

545 •

惠特曼相信，借助真诚的诗歌对当下逃避责任的美国文学的指责能够实现上述的目标，这也是他创作《草叶集》的意图之一。然而，诗人与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他在孤独与贫穷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瓦尔特·惠特曼的名声远播海外：在英国，拉斐尔前派艺术家们支持并宣传他的作品；在德国，自六十年代起就出版了由弗赖利格拉特翻译而来的德语版《草叶集》；在俄国，1861年《祖国纪事》刊载了第一篇关于惠特曼的文章，而屠格涅夫则首次将惠特曼的作品翻译成俄文，惠特曼的名字也由此开始为俄罗斯人所知。然而在自己的祖国，惠特曼并未获得任何的对他的理解与兴趣。事实上，唯独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诗人们接受了惠特曼，并把他称为自己的导师。

惠特曼为现实主义诗歌打下了基础，指明了现实主义诗歌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发展道路。他是文学史中一位伟大的创新者，以及十九世纪民主与革命理想的忠实的信徒。他是真正的美国人民的诗人、十九世纪美国文学推崇备至的最伟大的诗人。

浪漫主义激情与现实主义艺术构思的独特结合决定了惠特曼的诗歌具有鲜明而深刻的特质，而这一结合的产生源自贯穿于整个十九世纪美国历

史的最为激烈的民主运动浪潮。

国内战争结束后，美国文学面临着新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遭受毁坏的时期，创建客观与全面地反映民族—历史生活的图景。惠特曼最早意识到了这一任务的迫切性，并因此创作了许多作品。虽然他的作品从整体而言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但是这些作品鲜明地体现了新的艺术主题，对这一主题的思索理应在新的美学体系框架中进行，那便是现实主义。

3. 最后的浪漫主义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当内战中鼓舞人心的英雄业绩被资产阶级世界的单调乏味的生活所取代时，浪漫派诗歌与战后文学的新需求之间不相适应的关系开始显露出来。然而，作为文学发展的两条主要流派中的一条，浪漫主义在随后的至少二十年的时间里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然，浪漫主义的辉煌时期早已过去——它仅存在于南北内战时期。七十至八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显露出了仿造的特征和日益加速的衰退痕迹。然而，即便是处于末期的浪漫主义也有它自己的"明星"：梅尔维尔的《水手比利・巴德》(1891)、惠特曼的《神秘的小号吹奏者》和《啊，法兰西之星》，以及艾米莉・狄金森的抒情诗都属于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决定了现实主义在美国的形成晚于欧洲的命运，以及浪漫主义存在较长时期的美国文学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首先，美国的民族文学以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浪漫主义的形成都相对较晚；其次，与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发展相伴随的还有乡土派文学。

美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文学形成于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民族文化意识的自觉以及从英国传来的岛国心理与艺术气质在美国的浪漫主义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对于欧洲文学而言，浪漫主义是历史发展链条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于美国文学而言，浪漫主义则是民族文学传统的源泉，这源于美国浪漫主义自身的特性以及它比欧洲浪漫主义拥有的更大的时间跨度。

实际上，浪漫主义在美国文学的发展中涵盖了整个十九世纪。1895年，就连新流派的杰出代表马克・吐温也不得不动笔写下《费尼莫尔・库柏的文学错误》一文，嘲笑库柏"皮袜子"小说五部曲里夸张的言辞、简单的人物形象以及苍白无力的矛盾冲突。并且，这一抨击性文章的恶毒风格本身也表明，马克・吐温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是充满活力的强大对手。

当年伟大的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家们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但是他们的美学思想依旧存在，并继续滋养着新的文学后生。马克·吐温反对悲剧中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情节和主人公，并嘲弄情景剧和库柏式的激情。然而马克·吐温攻击的真正对象与其说是《最后的莫希干人》的作者，倒不如说是浪漫主义者们对所谓“理想”的追求以及他们拒绝描写现实的态度。应该说，马克·吐温的评价是过激和有失公正的，但这又是新老文学流派碰撞时期无法避免的事情。马克·吐温准确无误地指出了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美国文学界的美学辩论的实质。他明白，执著于“理想”的浪漫主义不仅仅是一个过时了的文学现象，它是由美国社会与文学生活的某些特殊情况所造成的。

这里不单只有朗费罗、爱默生和其他浪漫主义文学优秀代表的不可置疑的权威，还有那些文学发展中因地方主义而表现出的特性同样十分显眼。美国不同地区之间（新英格兰、西部、南部）发展的不平衡，历史性地决定了那些融合了从欧洲迁移过来的精神遗产以及美洲本土的风俗、心理和文化的地区的形成特点。所有这一切都在美国文学和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内战结束之后，地区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差异开始迅速消失，然而直到十九世纪末这些差异依然鲜明地呈现在文学作品中。此外，浪漫主义后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这与现实主义形成初期的情况一致。

新英格兰岛以及南部的部分地区拥有丰富的浪漫主义传统，正是这些地方成为了内战后的浪漫主义最后的堡垒。战后的美国在全社会进行着病态的资本主义改革，同时却遭遇了形成于前资产阶级时代的相对古老的文明形态的阻碍。新英格兰岛及南部地区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所固有的对“理想”的追求则成为了对抗资产阶级现实的方式。七十至八十年代的浪漫主义虽然逐渐成为一种老旧的美学体系，但是它依然能够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与浪漫主义的世界图景相符的主题依旧存在着。

内战后的南方地区中最杰出的诗人西德尼·拉尼尔（1842—1881）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内战爆发后，他参加了南方军队，后被北方军队俘虏，并在军事监狱中度过了数月，而监狱的生活令他染上了肺结核。1868年，拉尼尔出版了《掠夺者的日子》——这是他关于内战结束后在南方地区进行的所谓“重建”项目创作的系列诗篇的第一篇。他在诗歌中表达了人民的哀伤与愤怒，在他们的眼中，在整个南方地区夺取权力的“掠夺者”——商人们是这场手足相残的战争当中最大的赢家。

拉尼尔否定了与他同时代的美国人对经商的兴趣，试图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寻找心灵上的安宁。《格林县的沼泽》（1878）是一首纪念正在远去

的保守的南方地区的长诗，它为拉尼尔赢得了“美国济慈”的美誉。拉尼尔与济慈之间确实有着相似性：拉尼尔在诗中传达给读者的与济慈对精神上的透明澄静的感受相同，人在这样的内心状态下得以亲近日常生活中美妙的大自然。对于已经无法实现的、作为灵魂唯一的庇护所存在的理想与完美事物的怀念——这始终是最后一批美国浪漫主义者的创作主题，这一主题同样生动鲜明地体现在《格林县的沼泽》：多愁善感的形象以及细腻的音乐旋律中——这些因素都使得拉尼尔的名字永久留在了美国诗歌历史的长河中。

拉尼尔去世之后，南方在之后的数十年里成为了美国文学发展的盲区。虽然新英格兰地区内依旧进行着热闹的文学活动，但是在新英格兰作家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文艺理念中浪漫主义衰落的迹象却最为明显。包括托马斯·培尔·阿尔德里奇(1836—1907)、埃德蒙德·克拉伦斯·斯泰德曼(1833—1908)以及其他几位文学家的后期浪漫主义者自称为“精致传统”的信徒。

·547

这一立场实质上表明了他们坚决反对内战之后形成的、宣告“粗俗”与“平庸”的令人厌恶的时代到来的现实主义。在论文《诗歌的性质与元素》(1892)中，斯泰德曼将“精致优雅”的原则视为真正的艺术的标准：艺术应遵循美与真实的原则，而美与真实在最终的层面上是同义的。现实主义者仅仅在现象的表面传递“真实”，却忽视了美的感受，因而现实主义者们无法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真实。

阿尔德里奇与斯泰德蒙让式微的浪漫主义传统焕发新生命的努力只不过为文学植入了公式化与苍白单调的结构，而现实的所有“愚蠢”方面则不配受到真正的艺术家的关注。斯泰德曼很清楚，他的美学理念不会得到多数美国作家们的呼应。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古典文学，而同时代的人则选择其他的途径。斯泰德曼本可以通过吸取身边的现实生活源泉来使自己的理念更有分量，然而他和他的追随者、反对者们却都没能注意到这一源泉。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久居于距波士顿不远的阿默斯特镇，她的诗歌是浪漫抒情诗的经典之作，但只有其中八首诗得以在她去世前出版。1890年出版了第一本狄金森的诗集，但是这本书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直到二十世纪这位女诗人才获得了她迟到的荣誉。

艾米莉·狄金森的生平事迹至今仍有许多谜。从表面上看，她的生活稀疏平常，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狄金森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后曾做阿默斯特学院司库。狄金森平日将精力放在了持家上，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都知道她写诗。从青年时期起，她的性格便十分孤僻，内心的孤

独感伴随了她的一生。

只有三个人与狄金森建立起了灵魂上的交流，并且每个人都在她的创作中留下了痕迹。其中的一个人帮助狄金森的父亲处理司法案件，在他的带领下，当时只有十七岁的神学院大学生狄金森开始接触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学作品，其中勃朗特三姐妹的小说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另一个是长老宗教堂的有家室的老神父，据研究者的猜测，狄金森的爱情抒情诗正是写给这位神父的。最后一位是来自波士顿的作家托马斯·希金森（1823—1911），这位作家在某些程度上将美国的隐士与时代的精神和文学生活联系起来。希金森与狄金森从 1860 年成为朋友，同时他还是狄金森的长期笔友与诗歌的编辑。

希金森对于狄金森的诗歌生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希金森试图在狄金森的诗中加入为阿尔德里奇和斯泰德蒙所推崇的贫瘠的“精致优雅”；狄金森去世之后，希金森准备出版她的诗集，但他不仅没有选择优秀的诗作（这些诗所蕴含的紧张的焦虑、担忧与激情让希金森感到震惊，狄金森喜爱的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邓恩与赫伯特的诗中同样有这些情感），还自行对诗进行改动，以便让这些诗更加悦耳平缓。

单调的小镇生活与孤僻、封闭的性格都在狄金森的诗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在狄金森看来，历史似乎从未变动，就连南北战争也只是以间接的方式呈现于诗中——通过对从充满了力量和希望的人的生活中抽离出来的命运的转折与无常的思考呈现。狄金森对于精神世界的兴趣是极为广泛的，但是不论是她的诗歌主题范围，还是引起她思索的问题都未曾变动过。1955 年，按年代顺序收录的完整版诗集终于出版，人们从这本诗集中发现，狄金森在三十五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逐渐深化了诗歌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在她最初的作品中便已呈现。

这些主题远不同于与当时充斥着的仇恨。狄金森生长于清教徒家庭，从小便深刻领会了罪孽与赎罪的含义，新英格兰人自第一批定居者起，便世世代代都在这些教诲中生活着。《圣经》意象在狄金森的诗中占据了极

其重要的地位，但这种意象并不是某种图像式的雷同——通过它始终能感受到诗人以《圣经》式语言表达的、充满了生动思想的自身经验的直观性与深刻性。故乡的自然风景、日常生活中难以察觉的小事等都会成为狄金森的短诗的写作对象，而这些诗永远都包含了第二层含义——对于心灵、宇宙、美、死亡与永生的哲学思考，同时每一件经过最准确精细地描绘出来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获得了特殊的含义与分量，其中包含了信仰与怀疑的永恒争论，这便是狄金森最重要诗歌的主题。

信仰与怀疑并不只出现在宗教性质的诗歌里，尽管这类诗歌对于狄金

森而言非常重要。狄金森在最后的二十五年里几乎断绝了与外人的联系（她的绝大多数作品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她如同一个隐修士般，一年四季都身着白裙，不向外界表露内心的感受，然而她却又能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紧张动乱，其中她个人与正常生活的世代联系遭到破坏，她开始怀疑自己在人群中存在的必要性与不可替代性，同时也对能够体现世代人之间的心灵纽带的自身独特性产生怀疑。甚至在清教徒堡垒的阿默斯特，这一崇高的精神传统与现实生活的唯一联系也崩塌了，取而代之的分裂状态对狄金森而言是难以忍受的痛苦：

> 我会知道——为何？——时间何时停止——
> 我也会停止猜测——为何
> 在天上学校里我会明白——只要听老师讲课
> 每个痛苦的根源和起因。

创作于1860前后年的诗歌带有鲜明的狄金森式的脉动韵律（她从不在诗中使用逗号，而是广泛地使用破折号，以便给诗行分段），这一时期的诗可被视为标题诗。信仰与怀疑是狄金森诗歌中最重要的主题，并为她的诗歌添加了其他后期的美国浪漫主义者们所没有的二元论思想。狄金森同其他浪漫主义者一样——歌唱完美的事物，然而她是最不能为“精致”所打动的诗人，即便她对“低俗、粗野”避而不谈。她的诗非常公开地描述了时常惊扰诗人孤独而不肯在求索真理的途中妥协的心灵的痛苦时刻。

狄金森有着异常丰富的情感世界：热烈的激情有时转化为受压抑的情感；与自然相融而幸福，却又因无法融于自然而绝望；时而充满希望，时而丧失信念。

面对这些相互矛盾对抗的情绪，评论家们不止一次地试图通过狄金森的某些生平经历来解释。然而这些努力只是无用之功：个人生活经历是无法限制心灵的飞翔的。诗人试图要理解的痛苦，是属于清教徒意识深处的痛苦，它遭遇了十九世纪末期美国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冲突，诗人从中感受到了不和谐，正如同她自身的命运一般。

狄金森曾表现过内战后的美国国内典型的美学与精神冲突，但是这远不是她的作品内容所关注的主题。狄金森的诗歌具有浓厚的清教主义色彩，其中充斥着如此大规模的矛盾以及狂暴的精神斗争，以至于最初的概念在诗中获得了新的全人类的普遍意义，特别涉及了人在达到信仰、美学以及行为的完整统一方面的能力或者无力，同时也提及人在追求心灵和谐的途中所要克服的无数障碍。在自己的文学导师中，狄金森最重视爱默

生，她不仅接受了爱默生诠释自然的主要原则，更仿效了这位超验主义先驱的某些创作特点：喜好使用能够传递自然风景所蕴含的虚幻哲学思想的符号；为突出关键诗行而破坏句法结构。然而，狄金森的诗学观念并不源于爱默生，而是源自布莱克和济慈，以及当时几乎被遗忘了的英国"形而上学"诗人们。

如同这些前人一般，在狄金森的思想中，私人化的部分逐渐转化为带有普遍性质的部分，同时，在那个人隐秘的感受深处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人的形象，反映了人与周围紧张多变的环境以及自身的软弱之间的搏斗，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艺术世界：

我们的世界——还未完成——
那里——在更远处——还有新的疆界——
肉眼看不见——如同音乐——
可触摸的——如同声音

"这是我给世界的一封信，却从未得到回音"——狄金森如此形容自己的诗歌。寄信人去世多年后，这封"信"才开始被认真地阅读。她的诗歌跻入了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的行列。作为惠特曼的同时代人，狄金森在客观上与惠特曼的最主要的文学理念是一致的，虽然狄金森并不知晓《草叶集》的存在。这两位诗人的共同之处在对于宇宙观、思想的哲学性意义的追求，以及在诗歌韵律方面的大胆实验，而这些实验和创新后来则成为了二十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艾米莉·狄金森是美国文学史中最后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890 年出版的狄金森小诗集和一年之后出版的梅尔维尔的《水手比利·巴德》共同为浪漫主义时期画上了句号，并成为这一时期当之无愧的，同时也是最终的顶峰。

549·

4. 现实主义形成初期

在美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新的题材，从七十年代才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美国文学的发展中较值得关注的特点是，现实主义仍处于发展的较为初级的阶段，并且浪漫主义文学对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仍有较重要的影响。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形成初期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它的发展并非源自于浪漫主义文学，甚至可以说，它的发展是独立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而这种在文学作品中逐渐由浪漫主义幻象向现实主义思维转变的方式在欧洲文学

中却是十分司空见惯的。

美国的几位浪漫主义文学大家，像库柏、惠特曼和狄金森，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很接近现实主义的美学观，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作品从初创到最后的完成，仍是归属于浪漫主义文学这一类。在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形成初期，尽管不少作者有极强的浪漫主义倾向，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被视作浪漫主义作家。甚至是在现实主义产生的最初时期，当它还不被特别视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时候，这些作品也已不能归入浪漫主义文学之列。这些作品虽从其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上看仍具有（浪漫主义文学）的经典模式，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些作品已不具备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了。

在形成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三个特征，则是它的多层次性以及其迅猛的发展态势。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受到欧洲（主要是英国、法国和俄国）艺术作品的影响，以及区域性文学作品的影响，追求真实地表现出地方特有的情调和色彩。它主张在文学作品中更真实地表现美国的社会现实，改变了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象。在作品中对新的社会状态"镀金时代"的典型化的需求日益凸显，这些特征具体表现在：资产阶级矛盾加剧，工业迅猛发展，传统生活方式剧变，数以百万计的移民的到来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美国梦"危机的加深。当时的社会现实为现实主义成为美国文学主要发展道路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一时期的发展高潮是在八十年代，以马克·吐温的作品为代表。马克·吐温，是十九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和伟大代表人物。

但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以六十年代下半期德福雷斯特所发表的《莱菲涅尔小姐》为开端，而在美国的另一边，加利福尼亚州，哈特所发表的《咆哮营的幸运儿》，作为具有地方色彩的经典文学作品，对美国现实主义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到了七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时代到来。在这一时期地方色彩文学依旧流行，而同时，马克·吐温也开始了他的幽默文学的创作（《艰难岁月》，1872 年）。而地方色彩文学的作品在一些拥护者的支持之下，其创作也一直持续到了十九世纪末。

这样一来，在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区域性趋势超过了内战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可以说，美国文学的形成有三种模式，它们几乎同时开始，并且一起发展直至十九世纪末。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第一种模式是有地方主义倾向的"地方色彩文学"的发展，这类作品中较杰出的作品的灵感主要是源于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追求。而第二种模式，则是试图客观地呈现十九世纪末期美国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些社会现象；德福雷斯特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最先尝试这方面

· 550

的内容，在他之后豪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对在这一类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最后是第三种模式，主要是指一些以内战后人民生活中所发生的剧变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叙事文学，以马克·吐温的作品为代表。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内战以后的一些新兴的州，比如芝加哥等，发展得更为成功。除了豪威尔斯和马克·吐温的作品，这一时期的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与新英格兰的联系不大，而斯泰德曼和阿尔德里奇在推广它们的文学思想的尝试，在当时的美国国内也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就这样，哈特在他名声最盛的时期被从加利福尼亚邀请去波士顿的时候，也与当地的艺术鉴赏的领头人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早期的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只有散文的发展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这一时期美国的戏剧创作还没有独立，而诗歌的创作中，尽管当时发生了惠特曼的改革，但浪漫主义仍处于主流地位，其中以朗费罗的作品最被推崇，并且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而与日常现实最为接近的散文作品则迅速地影响着美国，而它发展的主线，就是新产生的现实主义方向。

作为与浪漫主义对应的一支文学流派，美国浪漫主义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但是在其内部又有一些分支："地方色彩文学"的作家，既不同于现实主义流派中的豪威尔斯或是亨利·詹姆斯，也不同于马克·吐温。"地方色彩文学"作为现实主义流派发展的早期推动力，仅仅被认知为其艺术体系已逐渐发展成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原型。因此，致力于地方色彩文学创作的人往往将自己的创作定性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初期阶段，尽管实际上这类文学一直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并且颇受关注。

"地方色彩文学"派旨在真实地表现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发生了一定的演变，逐渐摆脱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其早期作品中还表现得十分明显——它们明显地表露出了对尚无人居住的西部地区的单调生活和严苛的环境的抵触和排斥。

比彻·斯托夫人是"地方色彩文学"的奠基者。她的创作从《奥尔岛上的明珠》开始，以说教者的语调表达了废奴主义激情，此后她又相继发表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德雷德》。现在她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那些美好的，关于新英格兰生活的随笔的创作上。在《老镇上的人们》和《壁炉旁的奥达乌因通话》中，比彻·斯托夫人成功地反映出当时特有的因循守旧的特征逐渐流入美国大西洋沿岸的现象。作者对其特征的美学观察、对外省居住着居住特点的生动刻画以及其中对当地传统和风俗不无幽默的描绘，这些都成为比彻·斯托夫人晚期作品中出现的新的艺术手法。像这样以多情的、带有说教意义的文字表达自身感受的写作方式在其之前的《汤姆叔叔

的小屋》一书中虽已有所使用，但是比彻·斯托夫人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体现现实主义特征，并更准确地描绘具体的细节，以此进一步推动“地方色彩文学”的发展。

随着现实主义的发展，又一位新英格兰女作家代表逐渐步入大众的视野，她就是萨拉·朱厄特(1849—1909)。她在其1877发表的《基部何文》小说集中描绘了马恩岛沿岸荒凉的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叙述中加入许多有教育意义的格言。然而，朱厄特的作品逐渐变得越来越注重其情节的精确性。在这些作品中往往会呈现出一种宗法和谐无法长久的脆弱感。因此，作者往往会美化那些心理比较坚强的人物。朱厄特的代表作之一是长篇小说《针枞之乡》(1896)，作者在该作品中切实重建了一个海边小村的日常生活。朱厄特自己童年时光中那明亮、欢快的新英格兰的世界取代了平淡无奇的像统治登纳特那一类的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以沙丘和老云杉林切断了其与大城市的联系。

乔治·凯布尔(1844—1925)也创作了以新奥尔良为素材的“乡村色彩”作品，在新奥尔良法国和西班牙的传统交织在一起，这里的主人公们务实、设法争取棉花贸易的主动权并努力推广务实精神和商业化思想。在1879年创作的《老的克里奥尔时光》中，凯布尔歌颂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新奥尔良生活，并在作品中详细描述了战前几年的奥尔良生活。然而，新的艺术潮流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别具一格的明快的作品、诚信高于一切的思想，以及由于历史遗留的南方人民不平等的命运所引发的尖锐矛盾等等，都在凯布尔的作品中有所呈现。 ·551

现实主义作家的“地方色彩文学”中，在准确性和真实性方面很少超出美国不同地区的特征。“地方色彩文学”不仅借助全国各地不同生活状况掌握了丰富的素材，更扩展了文学创作在社会经验方面的素材，大大拓宽了创作者的视野。这样一来，“地方色彩文学”真正地在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中，开拓出了一条反映黑人生活的新的创作路线。南方作家哈里斯(1848—1908)的中篇小说，尤其是其作品《雷姆斯大叔的故事》，是黑人民间故事的代表作品，在这部小说中第一次，黑人不再是美国社会中的邪恶因素，作者把他们作为一个正常的个体，描绘了他们的内心的和平、道德、文化生活和人格特质。

在哈里斯的影响之下，查尔斯·切斯纳特(1858—1932)和保罗·邓巴(1872—1906)，作为最先在美国得到承认的黑人作家，开始了他们的写作生涯。他们作品的艺术风格都很接近“地方色彩文学”，其中切斯纳特主要从事的是短篇和长篇小说方面的创作，而邓巴则主要是创作一些浪漫、凄美的诗歌。切斯纳特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女巫》(1899)以及长篇小

说《房子,隐藏的雪松》(1900);而邓巴的作品主要是诗歌和短篇小说,其中包括《迪克西亚国的人民》(1898),尽管这可能无法改变种族隔离和黑人权利被剥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两个作家奠定了一个传统:活在当下。

"地方色彩文学"的代表作家还为美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个黄金的艺术收获:城市和村庄人们的生活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从中更可反映出美国所经历的巨大历史变革。在这里最为重要的要数西部的"地方色彩文学"。其中最为有名的要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爱德华·埃格尔斯顿(1837—1902)、埃德加·豪(1853—1937)、约瑟夫·柯克兰(1830—1894)等作家的作品,包括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地方色彩"大大削弱了浪漫的陈词滥调,而其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埃格尔斯顿坚信"地方色彩文学"最关键的美学信条,即真实和公正地写人,体现出"他们真正是什么",以便证明并非只有新英格兰可以创建这种文学形式。因为"生命状态的无趣和浪漫",优先于"现实的荒谬和怪诞的方面"。

埃格尔斯顿在他的小说中,描述了十九世纪中叶印第安纳人民对社会不公正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他的作品最为显著的意义,就是展现社会冲突以及对环境无所不能的想象。

埃德加·豪是土生土长的印第安纳州人,深受埃格尔斯顿关于维护个人的命运思想的影响。其作品《乡村小镇的历史》(1883),使其在美国文学界一举成名。这篇小说是一个回水的自传故事,旨在反映那里精神上的贫困和道德的缺失。由豪刻画的阴沉的画面,先于舍伍德·安德森的《俄亥俄州温斯堡》以及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而他的长篇小说《祖里》也获得了德莱塞的高度评价。

"地方色彩文学"另一个现实主义的发展方向最早创始于"淘金热"的发源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弗朗西斯·布莱特·哈特(1836—1902)。他在1854年来到加州,花了六年时间:勘探黄金,做教师,做一个快递员。在这期间所掌握的丰富的生活素材支撑了他的文学创作。其中,《压缩小说》(1867),讽刺了当时文学创作中很多共同的弊病。1868年他出版了《咆哮营的幸运儿》,其中收录了《密格尔丝》、《扑克滩被放逐的人们》、《田纳西的伙伴》和其他加州的故事,使作者声名大噪。

过了一些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读了这些短篇小说中的一篇《密格尔丝》,评论道:"尽管他有很多缺点,但布莱特·哈特的力量在于,他是一个具有丰富自然智慧的人,具有高尚心灵的人。"布莱特·哈特写的是真正的和虚假的价值,是十九世纪探险者的冷酷生活帮助人们分清它们的真正面目。他的主人公脱胎自百万大众,站在贪婪利己的对立

面，能勇敢地直面失败。他们最优秀的性格是自信、慷慨。作家认为，美国人的人生观最大的缺陷就是追求成功，他试图展现人生应如何适应道德水平的沦丧。这是他的现实主义最犀利的一面，与狄更斯有不少相似之处。

布赖特·哈特坚定地捍卫“地方色彩”，他认为美国作家有责任展现所有典型的“美国生活，美国道德观念和美国思想”，“观察中层美国人的生活经历”，“跟随他们的足迹，探寻他们独有的表达方式”。他自己也在践行着这套美学观念——既体现在他的优点中，也体现在他的缺点中。布赖特·哈特描绘了形象鲜明、深刻的十九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生活画卷，展现了淘金热时代的戏剧色彩和伟大磅礴。除了运用典型化手法外，他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教育意义、感伤主义、程式化比他的小说更能称之为他的特色。

小说《加百列·康罗伊》(1876)的背景是激烈的社会矛盾：旧金山银行家垄断了所有淘金者村庄的专卖权，一大批淘金者沦为奴隶境地。布赖特·哈特力图描写没有良心的人。但是这种品质过于概括化，如同他那些品德高尚的主人公的反面。《加百列·康罗伊》和《一座矿山的故事》(1878)都突出了社会主题，体现作者无法超越自己早年的世界观。脱胎于早期作品的这些小说已经与新的问题和矛盾不相符合。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是哈特创作的枯萎期。“地方色彩”流派限制了创作，对他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像其他很多“地方色彩作家”一样，哈特不能对文学原则做出让步，虽然这些原则在他生前就已经过时了。时代要求把社会进程放在历史运动中研究，即使如哈特般天才的“地方色彩作家”也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地方色彩”流派的创作领域较为狭窄，该流派中的现实主义倾向首先体现在真实的描述中，而不是对真实生活的艺术概括。不过该流派在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

5. 现实主义形成的第二阶段

豪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品见证了这个时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即从单纯的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转向多方面地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展现若干重要的社会现实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冲突。

不论是豪威尔斯还是亨利·詹姆斯，都不赞成对“地方色彩小说”的过度迷恋。这一点深刻地影响到了这两位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使其具有了一些与马克·吐温式的现实主义文学所显著不同的特征。马克·吐温式的现实主义汲取了“乡土派”作家创作中的所有优点，提出恢宏博大的创

作宗旨,完成了史诗一般地、真切地反映美国生活的一系列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而这样的创作宗旨对于豪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来说都是无法达成的。当然,个人天赋有别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文学环境对于两位作家的美学观念的影响。

两位作家都与波士顿和纽约这两个城市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整个十九世纪,波士顿和纽约都是美国浪漫主义艺术发展的中心。因此在这里,豪威尔斯和詹姆斯充分吸收了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经验,从他们那里借鉴了若干创作主题和题材,并将其发展为之后自己创作中的最主要的部分。在这一点上,比尔斯是和他们十分接近的作家。不过,这些继承来的浪漫主义的主题和题材都在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中得以重新表现——即现实主义文学。

553·

不论是豪威尔斯还是亨利·詹姆斯都是抱着这样一种信念进入文坛的,即作家的使命应在于描绘现实。1888年,亨利·詹姆斯明确地表示道:"小说唯一的辩白就在于它尝试着去反映生活。"

豪威尔斯对于现实主义孜孜不倦的追求在其六十年代写就的游记作品中就得以确立,而从《一次偶然的相识》(1873)这部作品开始,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追求逐渐成为了豪威尔斯艺术创作探索的基础。威廉·迪恩·豪威尔斯(1837—1920)是当之无愧的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暂且不论其思想的矛盾性和艺术创作上的不足,豪威尔斯作为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为美国奠定了现实主义理论基础的评论家,作为托尔斯泰、易卜生、马克·吐温的宣传者,已经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崛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起初,豪威尔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仅仅局限在不懈地去尝试描写日常的、"无趣的"、平庸的生活现象。此时的豪威尔斯还完全地信任着"美国梦",将美国看作是象征进步的明灯,几乎没有发觉美国社会的黑暗面。豪威尔斯的早期作品流露出一种矫揉造作的"高雅"情调,作家极力避免所有的"庸俗",尽管这些作品被用来宣扬其现实主义的观点:"现实主义——这仅仅是对生活材料的艺术地忠实地再现,不增加一分,也不减少一分。"豪威尔斯忠实地塑造细节,用可信的现实主义笔法描绘人物,展现存在于"与生俱来"的天真和表面的风度遮掩下的冷酷的精细之间的矛盾冲突。尽管可以看出,在这些作品里豪威尔斯似乎机械地效法了其青年时代的偶像简·奥斯丁的手法,在此基础之上填充进了美国式的内容。

然而,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豪威尔斯的创作和真正的现实主义社会小说的题材和所探索的问题都有着很大的距离。他坚信"健康、欢愉、成功、幸福的生活,这些才是美国社会的主要特质",因此"大部分曾经给美国

的历史带来阴影的灾祸和不幸，都会在将来通过安分守己的劳动和大公无私的品行而被避免”。虽然豪威尔斯一生都对美国的“例外性”抱有这种幻想，然而作家本人所持的创作态度则要求他客观可信地反映现实生活，并迫使他逐渐地开始关注社会层面的种种冲突。

在这个过程中，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后者曾以其对“自私自利的生活”毫不妥协的批判和“伦理道德和美学的高度统一”震惊了豪威尔斯。豪威尔斯八十年代的作品——《现代婚姻》、《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均是现实主义“事业小说”的典型代表，均触及了复杂而尖锐的社会伦理问题。《现代婚姻》中的巴特莱·哈伯德用尽一切手段想要成为一个体面的、有地位的资产阶级职业新闻工作者，而彻底的道德沦丧则成为了他必然的结局。塞拉斯·拉帕姆出生于贫困的农场主家庭，靠加工矿物颜料积攒资本，虽说他将所有的一切归功于自己的聪明能干，但却怎么也无法参透“生意人”这个概念，最终商业世界的种种规范和准则将他拒之门外，主人公就此走向了破产。

这两部“事业小说”均提出了关于取得成功所要付出的道德代价的问题。豪威尔斯将这个“走在发迹的路上”的主人公的故事讲述得朴实无华、真实可信，几乎就是采用事实罗列式的写法。作家直接从身边的现实生活中取材，这和他的创作信念保持了一致。他坚持认为在文学和现实生活之间（1902 年出版的豪威尔斯文集恰恰就叫《文学与生活》）不应该有明显的距离。

早在《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豪威尔斯对于现实主义的宣传就和托尔斯泰的观点颇为相近。这一点在小说《安妮·基尔博恩》中更加显而易见，在这部小说里出现了库柏[①]式的主题，即一个长时间旅居欧洲的美国人回到家乡，想要进行“新的开拓”，却被触目惊心的社会不公和人们精神世界的贫乏所震惊。

与此同时，怀着对于托尔斯泰的景仰，豪威尔斯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在深度上还有所欠缺。他被这位俄罗斯作家的勇气所折服（豪威尔斯曾严肃地建议读者将《安娜·卡列尼娜》的译本藏好而不要给女孩儿们看到），并且也曾将托尔斯泰的论述中的众多社会思想与同情不幸的人们的要求相联系。至少在小说《时来运转》中可以发现，他确实继承了托尔斯泰的一些经验，使得其作品中的社会批评倾向得以深化。豪威尔斯成功地展现了紧张的阶级矛盾，描绘了纽约的生活，勾勒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中值得引起

---

① 译者推测可能指美国作家詹姆斯·库柏 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91 年。——译注

注意的种种特征。而在此之前,豪威尔斯对于资本主义繁荣的批判都没有上升到如此彻底而本质的层面上。

554· 然后豪威尔斯对于美国社会所抱有的种种幻想也影响到了《时来运转》以及随后的一部小说《冒险的世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虽然表露出必须要在社会主义因素的基础之上才可能重建社会生活的想法,但总体的思想又与之相左。即使考虑到作品中所展现的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尖锐的冲突矛盾,豪威尔斯仍然认为未来的公正的国家将会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演化而成,因为根据他的看法,促成公正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似乎已经在美国社会制度的特性中先验地存在了。而那些为现代美国生活带来不光彩的阴影的罪恶和灾祸在豪威尔斯看来,还是与以往一样,与其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不如说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现象。他甚而与托尔斯泰展开了辩论,他的小说的主人公断言道:“如果将自己置身于所处世界的法则之外,就不可能拯救这个世界。”

豪威尔斯立场的这种自相矛盾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的产生正在于他对于“美国例外性”的坚持,这与作为作家的他对现实生活中社会冲突的描绘的客观性要求是相矛盾的,也与他心中不断滋长的对于未来美国的担忧相矛盾。这种担忧在1886年芝加哥农贸市场骚乱的工人领袖被执行绞刑之后尤甚,并且随后豪威尔斯开始为芝加哥农贸市场骚乱的牺牲者辩驳。其九十年代的小说作品很明显地表现了他的转变,作家接受了美国社会的生存法则并且与以往相比更加具有批判性。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吸引了豪威尔斯,他密切关注着这些将自己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这项事业的人们。但是豪威尔斯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还停留在一种局限并且幼稚的阶段,他的观点并没有超出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框架。他自己对这点也心知肚明,并且在1890年的一封信中将自己和马克·吐温称为“理论上的社会主义者,实践中的贵族”。

这种思想上的怪异的矛盾性决定了豪威尔斯的两部作品《来自利他国的旅客》(1894)和《穿过针眼》(1907)的乌托邦小说的性质。此时美国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芝加哥农贸市场骚乱事件”均给予了乌托邦体裁作品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乌托邦小说在十九世纪末的文学中得以广泛地出现。其中最有名的作品当属爱德华·贝拉米(1850—1898)的《回顾:2000—1887年》(初译为《回头看记略》,后易名《百年一觉》),这部长篇小说呈现了2000年的美国所具有的“人类合作式联邦的新文明”,描绘了光明的未来和无忧无虑的生活图景,作者主要是寄希望于技术的进步和鼓励道德完善的说教。作者根本不去考虑发生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这部作品中还是展现了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矛盾,这种矛盾在

故事的主人公经历过美丽的梦幻回到1887年现实中的波士顿时强烈地震慑了他。

豪威尔斯笔下的“利他国”派遣了一个国民亚里斯泰迪兹·霍默思(英文名来源于拉丁语“homo”)来访美国,并且和作家特维德墨进行了交谈。“利他国”也走向了社会主义,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地避免了暴力和社会震荡——仅仅是唤醒了人类心中“利他的天性”就取得了成功。在这个国家,劳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科学和艺术蓬勃地发展。国家节日被称为“进化日”,标志着所有的社会矛盾都通过道德教育,而不是暴力的手段得到彻底的根除。豪威尔斯相信,关于善的宣扬最终会遏止财阀政治所主导的强制性政策的实施,从而实现他的完美社会。

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豪威尔斯领导着美国最大的几家文学杂志,积极地推行着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为此,他也通过积极的对相关作品的评论来巩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地位,这些作品多属于与他在艺术追求上志同道合的美国作家。他最为关注的作家当属亨利·詹姆斯(1843—1916)。这并不是一个偶然,这两位作家在对现实主义文学所共有的不懈追求,以及他们作品中所展现出的现实主义的具体风格的共通之处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然而,相比豪威尔斯而言,詹姆斯展现出更加出色的艺术才华,并且一般来说,他所关注的问题也与豪威尔斯有别。

詹姆斯给我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学遗产,然而即使他的创作如此之多样化,我们也可以从中归纳出三个最为主要的题材。第一个主要的题材,就是作家和社会的关系,艺术的意义和使命,以及其对于创作的要求。这种要求与作家自身想要创造美的创作动机相冲突,也与作家不能完完全全置身其外的社会生活相冲突。此题材发端于詹姆斯最早期的作品《罗德里克·赫德森》(1875),在《阿斯本文稿》(1888)、《悲剧缪斯》(1890)、《大师的教诲》(1892)中得到具体显现,而在《地毯上的图案》(1896)和《金碗》(1904)中则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詹姆斯的这些作品从其艺术风格上来说已经属于二十世纪的文学,并且多多少少在诗学风格上启发了后来的美国现代主义诗歌。

紧随小说《罗德里克·赫德森》之后写成的《美国人》(1877)则确立了詹姆斯小说的第二个重要的题材:大西洋两岸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对遗失在欧洲旧大陆的“过去的家园”的寻找,美国的“天真幼稚”与欧洲的“文明世故”之间的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在詹姆斯其后的一些作品中得到了作家广泛的关注。这些作品包括《黛茜·米勒》(1878)、《欧洲人》(1878),还包括八十到九十年代间创作的大量短篇小说,以及宏大精深的

长篇小说《大使》(1902)[1]和《鸽翼》(1902)。另一类詹姆斯经常涉及的问题在其小说《华盛顿广场》(1880)中得以确立,这部小说是此后一系列这类作品中的第一部(这一类型作品还包括《波士顿人》[1886]、《波士顿的珍藏品》[1897]以及其他一些作品)。这类小说常常描写由社会的虚伪和片面发展的美国生活的精神传统所引起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幸,表现充斥着美国社会的追名逐利的功利和虚伪,展示了这样的社会氛围所带给那些困囿在自我的世界里、白白抛弃了道德力量的人们所带来的严酷的后果。

毫无疑问,以上的这些主题在詹姆斯每一部著名的作品中都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并且因为采用了多样而独特的笔调而更加内涵丰富。

有时,詹姆斯也会尝试一些甚至是他并不熟悉的主题和人物形象。比如《卡萨玛西玛王妃》(1886)的主人公就是一群英雄革命者,而詹姆斯创作的目的就在于将自己的"反虚无主义"小说搬到欧洲生活的舞台上来。但小说中所呈现出的主要冲突仍然是那些早在詹姆斯七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就占主导地位的人的冲突和人们思想的矛盾。詹姆斯和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和艺术传统的紧密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这些主题的选取。这些联系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纳撒尼尔·霍桑,这位作家所涉及的几乎所有的伦理和哲学问题都深深影响到了他年轻的同代人詹姆斯。

与豪威尔斯一样,詹姆斯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也深化和反思了浪漫主义文学所提出的矛盾冲突,并且相对于浪漫主义文学家,展现出了不一样的艺术主张和关注点。詹姆斯在为其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摇旗呐喊时显露出更为锐利的锋芒,甚至连同属现实主义阵营的豪威尔斯也受到其指责。他认为豪威尔斯有挥之不去的"浪漫主义的空想和对矫揉造作的粉饰的热情"。然而就文学创作中所关注的问题而言,詹姆斯比豪威尔斯更加接近浪漫主义文学家,这一点影响了詹姆斯所有文学创作的特点和其现实主义的特征。在一本写于1879年的关于霍桑的小书中,詹姆斯指出霍桑"在融合想象的自然直率和对于道德问题永不枯竭的热情方面的令人惊异的能力"。而这一点同样也在詹姆斯本人的作品中得以体现。詹姆斯的作品中没有马克·吐温式的平和叙事,而是常常涉及和美国的精神传统以及民族的自我意识所紧密相连的,哲学的、美学的、伦理道德范畴内的冲突矛盾。詹姆斯所选择的主题常常带有一些抽象的特征,不过在他最成功的作品中这些主题得以深刻地表现,并且显得独树一帜。

詹姆斯出生于纽约的一个文化精英家庭。这个家庭不仅为美国贡献了

---

① 原文作者标注为1898年,资料显示实际上写成、出版于1902年,疑为原作者之误。——译注

一个杰出的作家，同时也贡献了一个杰出的哲学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正是实用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威廉·詹姆斯。这位未来的小说家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在家中见到了英国作家萨克雷和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作家爱默生，并且在欧洲广泛游历，后又在波士顿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正是在这座城市，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1861年，詹姆斯有一次因为参加救火而受伤，这使得他不能像自己的哥哥们一样参加到南北战争的厮杀中去。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和所引起的种种后果并没有被詹姆斯所忽略。小说《波士顿人》的主人公就是一个昔日的南方邦联军军官，直到战争开始之前他都是一贫如洗的种植园主和一个坚定的反动分子。他在波士顿寻找靠律师工作发家的机会，想要靠从报社获得的稿费和有利可图的婚姻来发达。主人公巴西尔·兰塞姆的对立面则是一群昔日的废奴主义者，而如今也只有靠着民主之下的往日的功绩和波士顿的出身——这一能够自然而然地提升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的标识——来干一些投机倒把的事。詹姆斯的这部小说当属现代美国最具有揭露性质的作品之一，小说从两方面描绘了一场由一个离真实的生活并不遥远却很真诚的女主人公所引发的不甚体面的争斗。尽管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将胜利赐予了兰塞姆，但他却更多地表达出了对波士顿人的同情和眷恋，因为他们是“新英格兰州英雄时代”的最后的代表，是那个“生活简朴却思想崇高，充满纯粹的理想和诚实的劳动，充满道德的激情和高尚的追求的年代”的最后的代表。

在詹姆斯的青年时期，这个时代已经处处都在试图引起这个刚刚起步的波士顿作家的注意，然而詹姆斯的目光却更多地投向大洋的彼岸。霍桑早在其作品《玉石雕像》(1860)的前言中就认为美国只有“平庸的繁荣”，并因此将自己小说的故事场景设置在了罗马，而在旅英散文集《我们的故土》(1863)中则将美国式的生活和英国式的生活同时表现出来，并且有别于爱默生和梅尔维尔的做法，并不试图一味地强调美国的优越之处，甚至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美国道德中的庸俗、功利和国人的不学无术。詹姆斯也有类似的思想倾向。1869年他远赴欧洲游历，时隔一年之后重返美国，为祖国大地上的“空虚”所震惊：美国人的生活被商业和低俗的娱乐所充满，而真正的文化却缺失了。1875年他永远地抛弃了自己的家乡。 ·556

这一年正是作家真正意义上初登文坛的一年，他在小说《罗德里克·赫德森》中提出了对他自己而言都极为复杂的矛盾冲突。一个才华出众的雕塑家在一个边远的外省得不到一丝一毫的理解和同情，因此为了艺术而决定远赴欧洲，但与故土的割裂导致了才华的枯竭、道德的败坏，最终引发了雕塑家自杀的悲剧。而为了艺术献身也是詹姆斯本人所做出的选择。

关于詹姆斯的传记作品和评论在谈及那些影响了作家创作道路的事件和其导致的具体影响时，往往不能给出统一的评价。四十年远离故土的生活毫无疑问地在詹姆斯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记，使得他不可避免地孤立于马克·吐温、诺里斯、德莱塞这些名字所标志着的美国文学中的主要美学潮流。但与此同时，长期的旅居生活为作家提供了必要的距离感，给他带来一种特别的精神体验，这种精神体验使得詹姆斯能够在其作品中着重探讨若干最为重要的主题中关键的一个，而且这个主题对于美国文学而言的迫切性正变得日益显著——这就是在积淀了无比深厚的文化层次的各种古老的文明中考验美国的道德伦理标准，同时用美洲新大陆的人们的毫无偏见的意识去检验这些旧的文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寻找到了丰富、复杂和充满了戏剧性冲突的，前人从未触及的艺术创作素材。由于远离故土所做出的牺牲最终由名副其实的巨大的艺术成就所抵偿。

《美国人》和《欧洲人》这两部作品即是詹姆斯在这个新领域里打下的两个地标。在这两部作品中，矛盾冲突均起源于两个不同大陆上的生活中精神状态的相互抵触。美国人克里斯多弗·纽曼因为开发美国西部富饶的土地而成为百万富翁，遵循着对他来说传统的美国信条，即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追求个人的幸福。然而在欧洲贵族们僵化的观念和原则面前，他的这种天真的想法（不过却也不妨碍他拥有很强的实干能力）显得软弱无力。这些欧洲贵族不仅维持着贵族阶层的种种繁文缛节和阶级偏见，同时也掌控着主人公心爱的姑娘克莱尔。而欧洲人尤金妮娅和弟弟菲利克斯·杨遭到家庭的放逐，来到了美国新英格兰州，却被这里的因循守旧的协调一致和人际关系的微妙细致所震惊，但他们对于幸福的追求也遭到了教条的阻挠——不过这一次的旧教条却是英国式的过分严肃审慎。

这种对于自由的追求和虽死板却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的条条框框之间的矛盾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式的，这种矛盾冲突在以上两部作品所描绘的不同情形中，均被詹姆斯用新的情节内容来表现：主人公所经历的悲剧的必然性，已经是来源于新的内容安排，即因为他们面临的不同文明和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与其说是来源于各个角色个体的差异，不如说是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广义上的文化体系的冲突。詹姆斯的美学信条是现实主义，这就促使他另辟蹊径地阐释浪漫主义的故事情节。中篇小说《黛茜·米勒》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部作品里，与定居欧洲并且沾染了这个“真正文明的世界”的风尚中所有恶习的美国同胞相比，年轻的美国女孩儿黛茜则因为她的“质朴纯真”而显得更为高尚，但也正是这“质朴纯真”为她带去了死亡。

与《罗德里克·赫德森》相比，《欧洲人》和《黛茜·米勒》在艺术成就上

无疑要高出许多。从中可以感受到詹姆斯从巴尔扎克和屠格涅夫的创作中所汲取的有益的经验。这两位作家均对詹姆斯有着极其显著的深刻影响。对于詹姆斯而言，巴尔扎克不论是在展现社会背景方面，还是在对于个体的性格、社会的环境等复杂问题的研究方面，都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典范。而屠格涅夫与詹姆斯相识于1875年，那是后者在巴黎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屠格涅夫以他“对人类内心世界令人惊异的复杂性的深刻和富有同情的理解”震撼了詹姆斯，同时屠格涅夫具有民族性的创造力和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的多样化也使他印象颇深。在巴尔扎克和屠格涅夫的创作经验中，詹姆斯找到了自己文学创作原则的基石：首要的目标在于揭示事件和行为的“道德含义”，通过对深藏在表面之下的、怪异的、精细晦涩的内心世界的描摹来展现人物。

《华盛顿广场》和《贵妇的肖像》这两部写就于英国——詹姆斯1877年移居于此直至逝世——的长篇小说印证了作家这些艺术追求的巨大的创作前景。从创作的题材上来看，这两部小说都显得极为局限：两个典型的美国女孩的精神成长历程。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她们“对命运发起了挑战”，不得不为自己所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而饱尝希望破碎、生活失败的悲伤的苦果。不论是对于《华盛顿广场》中的凯瑟琳·斯洛普小姐，还是对于《贵妇的肖像》中的伊莎贝尔·阿切尔，这所谓的“决定性的一步”都和婚姻有关，两位主人公都由于自己天生的朴素单纯而没有察觉到她们赋予芳心的人的精神匮乏和自私自利，因此悲剧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凯瑟琳的婚姻并不是命运造就的：她的父亲，成功的纽约医生，清教徒式美德的化身，干扰了这段婚姻。他试图揭露那个自私自利的骗子，却让自己的女儿陷入了一辈子的不幸之中，因为对于女儿凯瑟琳而言，她对于这个世俗的花花公子的爱恋就是她的全部，是她心里唯一的牵挂。而伊莎贝尔尝到了资本主义婚姻的甜头，但却在结局中痛哭哀叹，现实无情地嘲笑了她的幻想。

《华盛顿广场》的情节在纽约展开，而《贵妇的肖像》的故事却发生在欧洲。这个差别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是预先设计的对同一主题的两种不同加工。在前一个故事中，詹姆斯所关心的是貌似最为无可指摘的道德标准和真正的精神上的修养之间的不合甚至是矛盾：从现实角度来说，斯洛普医生的每一个举动都是正确的，但其一言一行背后却从没有人道和同情的痕迹——只有清一色的无可辩驳的僵硬的教条和极端实用主义的算计。而凯瑟琳被作者赋予了众多他尤为珍重的品质：诚恳率真、高尚的情操和道德上的坚忍克己，但由于她的轻信和天真，詹姆斯眼中无比珍贵的这些卓越的精神品质被白白浪费了，这也正是因为凯瑟琳恰恰缺少那种“老成世故”，没有了这种素质就不可能在这个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横行的，因为虚

伪而变得僵化的世界中站住脚跟。《华盛顿广场》中所展现的这样一幕具体的场景实际上也涵盖了一种生活定式的全部特征，而且詹姆斯对于自己女主人公的同情和对于女主人公所属的那个时代的畸形所进行的嘲讽、表面的抒情性和潜在的讽刺性都微妙地交织在作品的基调之中。

这种道德上坚忍克己的特质在伊莎贝尔·阿切尔的身上更加明显，但《贵妇的肖像》并不是一部关于美国的作品，而是一部关于欧洲的作品，这又是詹姆斯对于其传统主题的一次回归。与上一部作品中相同的矛盾冲突，在此部中又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女主人公的丈夫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远比《华盛顿广场》中那个凯瑟琳的失败的追求者"文明"得多也风雅得多，但在这部小说里道德的堕落也被更加尖刻地强调了出来。"质朴天真"和"文明世故"、心灵的卓越和仅仅是表面上的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对伊莎贝尔而言是巨大的悲剧，但悲剧的产生恰恰源于她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轻信和无法看透事物的本质。产生奥斯蒙德这样的人的欧洲式的文明和在斯洛普医生身上所展现出的美国式的文明实际上都是一样残缺而畸形的，"质朴天真"和"文明世故"都会招致不幸。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詹姆斯的创作进入第二阶段的时期，这个时期深切的、广泛扩大的、既针对欧洲也针对美国的怀疑主义构成了詹姆斯的主要思想倾向。

《波士顿人》已经可以让人感受到这种新的思想倾向，这部作品描绘了战后美国整个社会的唯利是图和精神空虚的景象，其中包含着对于詹姆斯来说极端尖锐的讽刺，但在这个意义上更加值得关注的却是长篇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这部关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说是詹姆斯创作中极为独特的作品——因为政治对于詹姆斯的艺术世界来说向来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话题。但是就如豪威尔斯在"芝加哥农贸市场骚乱"之后的反应一样，詹姆斯也不能不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作出回应，这就包括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和急剧尖锐化的社会矛盾。《卡萨玛西玛公主》这部作品就表达了在如此严酷的时代背景之下，作家心中不断增长的对人类命运前景的担忧和不安。

这部长篇小说以海森斯·罗宾逊的命运为主线，这个人物会让人联想起巴尔扎克小说的主人公。海森斯·罗宾逊是一个装订工人，他坚信自己的父亲曾是英国的贵族，并且为一种愿望激动不已：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的力量，并且为自己在社会中争取到一个当之无愧的位置。接近卡萨玛西玛公主似乎能够实现罗宾逊的美梦，但是最终为了公主周围的人，也为了公主本人，罗宾逊并没有改变其原来的角色，还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罗宾逊于是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与其说是出于政治信仰，不如说是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报复这个因为不能肯定其才能、不承认其高贵的出

身而侮辱了他的世俗的社会。

罗宾逊后来成了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一员，这个组织被詹姆斯用怪诞的笔调勾画出来。詹姆斯自己和激进的政治活动保持着很远的距离，甚至和影响到豪威尔斯的改革派的热潮之间也是这样。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詹姆斯将这位革命者仅仅塑造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一个冒险主义者，一个幻想着军队式的公平和建立在实用主义的整齐划一之上的未来社会的人。他这样塑造人物，明显是想要将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斗争从思想的高位上拉下来。但客观地说，《卡萨玛西玛公主》的价值应当被承认。这首先是一个冷静清醒、有理有据的警告，提醒人们注意那些由对于"腐朽"的文明中所有有价值的部分的虚无主义态度和不负责任的"革命"行动、无谓的不经考虑的流血牺牲所带来的潜在的危险性。但是由于詹姆斯没有注意到当时那些无产阶级组织的活动中的任何其他特质，因此他所塑造的社会景象从整体上来说是有偏误的。不过与此同时，他在小说中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社会运动中的那些恐怖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并且给予了公正批评，这与马克思的思想相一致。

· 558

罗宾逊不愿意为了那份他不再相信的事业而奋斗，因而即使选择自杀也不选择去面对这种奋斗的必要性。《卡萨玛西玛公主》中没有哪怕一个明亮的音符，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元素就是讽刺，是作者带着一种关于真正的文化、道德和精神将遭受灭亡的威胁的阴郁的预感而发出的挖苦和讽刺。不论是"革命者"，还是小说的女主人公穿梭其中的那个世界，这两者对于作者来说都是一样的不可接受，如今其创作的动机在于保护艺术这个被践踏的人类文明的最后的避难所。"艺术和'世俗'的社会之间的冲突"——在《悲剧缪斯》的前言中作者这样指出其作品的本质所在。在这部作品里他塑造了一个为了艺术创作的独立而拒绝了成功的诱惑的艺术家形象，同时也塑造了类似的女演员，她拒绝了一个要求她离开表演事业的贵族的爱情。英国文学在十九世纪末所表现出的唯美主义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詹姆斯，但这并没有改变其作品的本质：《悲剧缪斯》中所塑造的加布里埃尔·纳什，是一个贪图享乐的势利小人的形象，其中奥斯卡·王尔德式的艺术特征清晰可辨，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对于詹姆斯来说，艺术创作一直是对于个人全部精神力量的最为严肃的考验，是一种在道德上自我牺牲的行为。詹姆斯从多种视角反映作家和社会之间的冲突的一系列中篇小说（包括写于1894年的《狮子的死》，写于1895年的《下一次》等等），造就了第二阶段的艺术创作的成功。这些作品又重新展现了较为明显的巴尔扎克的影响，包括其作品《无人知道的杰作》的影响。货真价实的有意义的作品和一波三折的成功，艺术家在艺术面前

的责任和日常生活的辛酸，这些迫使艺术家要么不得不妥协于大众的庸俗的口味，要么被迫接受自己潦倒一生、默默无闻、一贫如洗的命运——这样的情节成了詹姆斯八十到九十年代在海外创作的小说的主流。其中《大师的教诲》(1892)是突出的典型。作品描写了一个著名作家多年来一直用尽全力追求他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成功，可在老年的时候残酷地对自己、对这种追求多年的“理想中的成功”大失所望。小说的主人公说出了詹姆斯深藏的想法：创作的职责，首先在于对并不承认生活的忧虑的艺术的忠诚。在作品《阿斯本文稿》(1888)中回顾性地重现了一位伟大诗人的一生，作者赋予了这位诗人拜伦和雪莱的特性，詹姆斯的美学信仰在这里得到了非常明确的阐释：“在那些年代，我们的国家还只是一个野蛮、粗鲁、充满土气的国度……在那样的年代，他能够成功地生活和写作，成为那些先行者中的一个，保持自由、广泛的思考，毫无畏惧，感知并且理解一切，并且找到了表达着一切的方法。”

詹姆斯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时光是其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作家在叙事形式上进行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探索，并且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人物个人生活中深深掩藏的悲剧，这种悲剧在人们的意识中潜在地形成，使人们经受痛苦的思想的分裂。这一主题从《螺丝在拧紧》(1898)开始，就渐渐在詹姆斯的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成为其主要特征，而且这些小说重新开始探讨美国人在“欧洲故土”这一题材。詹姆斯晚期的作品受到了颓废派的影响，不过这也没能从本质上动摇作家的艺术追寻，这些艺术探索很大程度上开创了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些晚期作品更加明显地接近浪漫主义文学的主题——尤其是和霍桑的短篇小说相似，詹姆斯甚至从这位小说家那里直接借用了一些特定的诗学手法。

还有一位与浪漫主义文学遗产同样渊源深厚的作家是安布罗斯·比尔斯(1842—1914?)。他在1913年底作为记者被派往墨西哥，并在那里四起的革命风潮中失去了音讯。内战塑造了比尔斯的精神世界，因为他曾在前线度过四年的战争生活，并且参加了几乎所有著名的战斗。他最早的作品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写成，但比尔斯无法将它们出版，并且不得不为此等了二十年。直到后来受人出资捐助，他才得以出版自己最为著名的作品集《士兵和百姓的故事》(1892)和《这种事情可能吗?》(1893)。这几十年中比尔斯一直忙于在伦敦和旧金山的新闻记者的工作，并且成为了当时最有名的专栏记者之一：他对美国财阀和担任公职却偷盗国家财产的人的刻毒的讽刺和厌恶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一些人多次尝试买通他，有人还用身体上的迫害来威胁他，但这些都没有让比尔斯的揭发有丝毫的

动摇。

比尔斯对自由主义的幻想不屑一顾。与此对立的是他那种由战后美国的社会现实所引起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逐渐发展为一种对整个人类的天性,甚至对这个世界的所有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厌恶。比尔斯在反复阅读爱伦·坡的作品之后,找到了一些与自己的思想倾向相近的东西,比尔斯最为著名的作品《士兵和百姓的故事》分明地与"精神失常的埃德加"的短篇小说和诗歌遥相呼应。

在极端精确的细节和令人信服的心理勾画的框架下,比尔斯的战争故事中也集中了若干不可思议的、不合逻辑的、荒诞的元素。作家竭力塑造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性,以及不真实的、可怕的事情的切实的存在感。他非常具体可感地描摹出一个被冷酷的自相残杀的战争所震惊的士兵的心理体验,并且更进一步——描绘出了一种内心的麻木的状态,这正是在前线的岁月给这一代人的心理所造成的后果。比尔斯采用了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冲突,甚至借用了浪漫主义文学家的艺术特点(比如对于大规模使用象征符号的偏好)来帮助其完成这些现实主义的概观性的任务。无怪乎他关于战争的小说作品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得到真正的重视——这些作品直接影响到了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的创作。

比尔斯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十分特殊的,因为在他的作品中交织着爱伦·坡的影响和十九世纪末报纸幽默文章的典型特征。这种幽默文章的风格近似于民间文学,并且成为了马克·吐温和其他众多的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的艺术理念和叙事形式的源头。这种幽默文章作家的典型的、与众不同的特质就在于其情节设置的无比尖锐性,其中毫无间隙地拼合了真实可行的东西和无稽之谈——这种风格也影响了比尔斯的作品,尤其是在故事集《这种事情可能吗?》之中。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展现了其作为一个新式的幻想故事大师的才华:这些故事中充满了末世论的预感,同时也带有具体命运中的,由当时美国的现实所导致的悲剧因素。由于故事集《这种事情可能吗?》在最初创作构思时就具有的被设定好的目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处不在的死亡,这部作品从多方面影响到了舍伍德·安德森的创作,特别是一系列通过怪诞的手法表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半真实半虚幻,同时也是死一般的单调和庸俗的世界——"单层的美国"。

这些作品所体现出的比尔斯的创作特色与詹姆斯后期的作品以及马克·吐温九十年代的部分作品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这三个作家都没有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生活向他们展示的那种困境中找到出路,这是一个腐败的、庸俗的、缺失了精神和灵魂的王国。这三个作家都滑向了神秘主

义，抑或时而仅仅是颓废主义式地描摹生活的现实。比尔斯的作品中这一迹象最为明显。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作品集《怪异故事集》(1899)和《魔鬼辞典》(1906)，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向古老的寓言故事和箴言警句这种艺术形式的转向，不过比尔斯是抱着讽刺的目的使用了这种形式而已，并且常常取得出众的艺术效果。比尔斯最后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所写成的作品就其艺术性质而言，与先前相比又有了内在的差异。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抨击了那些声称有权判决整个人类社会的厌世者的观点。比尔斯不止一次地尝试显现出一些现代主义流派所特有的艺术特征，不过就其创作的那些最为优秀的作品而言，几乎都还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财富，并且也是多样的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6. 马克·吐温

萨缪尔·克莱门斯出生于密苏里州佛罗里达的一个小乡村，但作家出生后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汉尼拔城度过的，这座城市也就成为日后作家在有关汤姆·索耶和哈克贝利·芬的小说中提到的城市圣彼得堡的灵感来源。作家在不到四岁的时候就移居到了这座城市。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而在这座城市中的见闻，也积累成了一座无价的宝库，多年来为作家提供着创作素材。

马克·吐温(1835—1910)的生平，交织着急速发展的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作为一名往返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年轻的领航员，他细致地观察偏远地区的日常生活，另外保留奴隶制的南方在很早时也为他所熟知——虽然在河对岸的伊利诺伊州已经是自由州，但是汉尼拔城还是属于奴隶占有制的合法地区。国内战争让马克·吐温产生了一时的爱国热情，并参加了邦联的民兵部队，但他只在军队里待了一个月就同哥哥一起西进，到了淘银热的内华达州，但是很快这股风潮就被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所取代。淘金不成的作家自此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在1862年的《企业报》(弗吉尼亚城)上刊登了第一批以马克·吐温为笔名所写的幽默故事及随笔。当年到内华达州的著名幽默作家阿尔特姆斯·沃德无意间看到这些作品，并预言了马克·吐温的光明前景。又过了两年，在圣弗朗西斯科，布雷特·哈特也说了同样的话。

560·

马克·吐温的第一部作品集出版于1867年，他的第一部巨著——《傻子国外旅行记》则出版于1869年。战后的美国出现了虚假繁荣现象，马克·吐温也用他的作品《镀金时代》影射了这个时代。此后的八十年代初

则成为了他的创作巅峰期。这个小地方的随笔作家一跃成为了世界驰名的作家，美国的艺术象征（在后世也为汉姆生与高尔基所继承）。在作家当时的每一部作品中都饱含了“镀金时代”的美国的真实图景，而这却也是作家生活的年代。

八十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作家的生活和创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真的商业想法破产，又伴随着命运的沉重打击，他已经无法令人回想起当年那个画面，那时的他还是顶着无数光环的文学家，是幸福的一家之主，并且拥有私人的出版社。

在九十年代作家开始关注周围的现实，而之后作家的作品已然成为社会讽刺文学的艺术瑰宝。作家在作品中强烈地讽刺了美国在新世纪来临时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及侵略。作家本身也已经从当年的那个杰出的幽默作家转型为被愤怒和鄙视所驱动的“咆哮的激进派”。

而在同时，作家的创作中也加深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他激进地、讽刺地否定现代社会的一切：社会制度，政治方针，道德准则，哲学观点，价值取向。这些都反映出在马克·吐温心里越发强烈的悲观主义倾向，甚至是对生活和人的厌恶，根据作家的自白（同样的自白充斥于作家晚年的作品和信件中），这些人“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值得尊敬的生命了”。

从满怀乐观情绪的幽默故事《傻子国外旅行记》到1906年佚名发表的忧伤的哲学论文《何谓人》以及1968年才完整出版的、包含最复杂的哲学伦理问题的《神秘的陌生人》，马克·吐温的转变让人难以理解。但是在其中有着自己的逻辑、原因和结果。作家所处的年代正值美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以及美利坚民族觉醒时期。依照作者的看法，他还是属于童年那个宗法制根深蒂固的美国，但是为了不使自己在领航员时期所形成的，在创作“密西西比河三部曲”时也未发生重大改变的对世界、对自己国家、对美利坚民族的道德本质的认识产生动摇，作者已经不敢去面对现在的一切了。社会矛盾在世纪之交愈演愈烈，以至于集中了美国民众最优秀的社会、精神方面的经验的深刻民主观念，在美国的现实中已经没有了基础。

马克·吐温表达人民对生活的理解的理想与二十世纪初期已成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美国的社会现实之间急剧尖锐化的矛盾决定了作家走过的道路。马克·吐温的转变标志着他艺术观点的逐步改变，而这些转变——特别是在“密西西比河三部曲”和八十至九十年代的历史小说中——也是十九世纪美国现实主义中的显著成果（当然，可以说是伟大成就）；而在创作晚期，作家已经倾向于新世纪的艺术手法。

早期的马克·吐温——在《汤姆·索耶历险记》发表前（1876）——属于美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作家之列。马克·吐温以幽默作家的身份开始自

己的文学生涯，立即带给人一种接近于美国西部文学的感觉。马克·吐温在西部留下了青春的印记，这里的氛围、传统、信仰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作家的思想特征和创作意图。

马克·吐温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幽默短篇，与十七和十八世纪之交第一561·批拓荒者的时代所形成的民间文学十分相似。在这些作品中充满了怪诞的元素，甚至违反了生活常理。在这些虚构故事中发生的完全难以置信的事件，使人们相信，对于真正的拓荒英雄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力所不及之事，而在那时，拓荒者的对头们机关算尽也对付不了这些英雄。在虚构故事中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情节中，读者可以轻易地以怪诞的方式了解西部的真实生活：经常发生的危险，原始却雄伟的大自然，需要力量、勇敢、坚不可摧的精神才能将其征服，十分粗糙的原始生产方式，相信自身经受的各种考验都会有完美结局的信念，天然的强烈的正义感以及对一切非正义的事物的厌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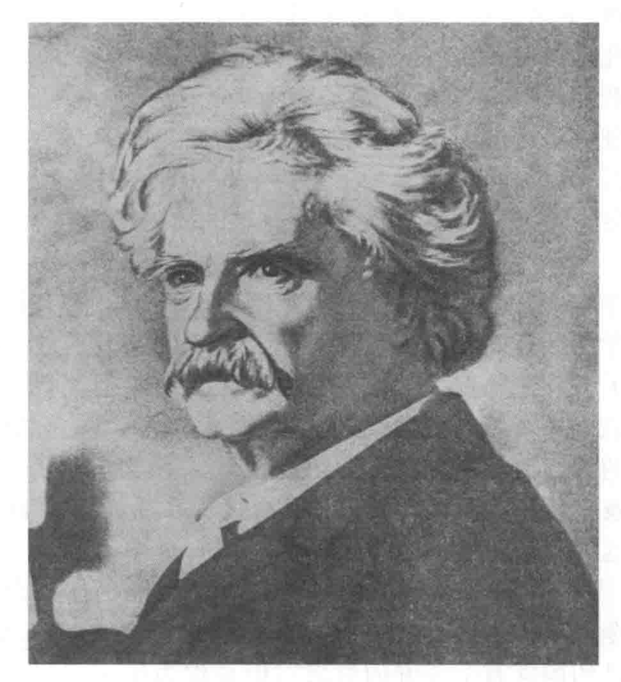
美国西部几十年来都是"美国梦"的最有力的证明，因为这里真正是"个人英雄、勤恳劳动和互相信任"的广阔舞台，就像福克纳对"美国梦"的本质的描写："梦想即是与他人拥有平等开始的自由"。马克·吐温在晚年却认识到，这一系列想法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但现实美国的特点却又是"美国梦"的最终产物。作家晚期作品中的痛苦，正是这种社会预见的见证。

562· 但与此同时，在美国西部，这些美利坚民族自我觉醒的基本民主特征显得越发明显。这些特征被马克·吐温深刻地展现出来，并且赋予他的作品叙述人民生活的意义。马克·吐温的理想，本质上讲是一种启蒙式的理想，关乎自然的仁慈、人类的理智、社会的和谐与善念的胜利。除了惠特曼，没有一个美国作家像马克·吐温这样坚定不移地、极富深度地表现这一理想，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毫不动摇地支持着这一理想。虽然惠特曼和马克·吐温在创作美学方面有所差异，但他们有共同的基础，就是将美国建立者们的激进思想、卢梭主义者的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同渴求真正公平与人情的美国劳动人民的世界观相融合。

差异是注定的，马克·吐温在自己跨入文坛的初期就完全不涉及浪漫主义主题与形象，而这也是西部对作者所有创作思路的影响的明显体现。在西部的民间文学中，甚至连虚构故事中都一定存在真实生活的元素，而其中完全不含有怪诞的成分。西部生活本身交织着平淡庸碌与让人难以置信的事物，而虚构故事的风格正好以这种神奇的共生手法反映现实，使题材更贴近生活。

在马克·吐温的早期作品中，在保留民间文学的优秀之处的同时，这种

虚构风格成为了文学作品的真实材料。他早期作品中的中心人物——民间文学式的“傻瓜”，带有天真和善念，以及虽然有些肤浅，但总体上讲常是正确的对人与事的评价。与这些包含西部人民特征的主人公同时进入马克·吐温作品中的，还有这些刚被开发的地带的多姿多彩的现实，而在这些新的州中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与处事方法。作为记者成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马克·吐温，舍弃了浪漫主义作品中占统治地位的各类成规，从1865年经布雷特·哈特发表的《卡城名蛙》开始，作家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蕴含着对文学陈规的挑战。但是他讽刺作品的讽刺对象，不仅是那些庸俗文学的作者，还有偏离西部民主法制的、抑制鲜活生命力的人为的一切。



马克·吐温像

讽刺的主题有时也会在马克·吐温的第一批小说中出现，但总体来说这些小说描写的还是无忧无虑乐观向上的艺术世界。作家在他1867年迁居纽约后的这些著作中展现了他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美国梦”的执著。马克·吐温以记者的身份陪同游客乘船到欧洲、巴勒斯坦以及俄罗斯旅行，而作者的一系列旅行随笔也首先表现了对欧洲生活秩序、思想和文化的反讽。仿佛是对始于狄更斯的在美国采风的欧洲作家所描写的毫无乐趣的美国图景的报复，马克·吐温严酷地讥讽那些自以为是的“旧世界”，主要是那些所谓的贵族派头，僵化的等级制度，对“傻子”来说荒谬的规矩以及对毫无生趣的文化的痴迷等等。马克·吐温把自己的同路人也描写得并不是那么聪明，甚至是粗俗的，但至少他确信无疑，这些人与那些欧洲人比起来代表的是自由人。

《艰苦岁月》(1872)是一部回忆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作品，该作品在欧洲出版时取名为“傻子在家”，而在最近一部俄文版中则以“轻装上

路”命名。在这部作品中马克·吐温对于美国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改变:“非凡的人民,美好的人民!”在淘金者的生活图景中并不仅仅展现了无尽的幽默感,还有着对真理的绝对执著。马克·吐温没有去粉饰生活,而作家亲身经历过的困苦和不幸,对他来说只是机体在变强健的过程中的一点挫折,就像他在《艰苦岁月》中所描写的美国那样。“傻子”不会怀疑,最终善良与理智将会占上风,并在自己的故土成为自然的关系准则。

这种启蒙式的乐观主义精神,在《镀金时代》(1873)中有所动摇。这是作家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1829—1900)共同完成的作品,在后者所创作的品行端正的资本家与他天使般的女儿的故事背景上,我们尤其感受到了马克·吐温成熟的现实主义以及讽刺基调,而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独立完成的篇章,则是讲述了发生在西部名为拿破仑的城市中的一个建筑工程中的大规模投机钻营行为。环绕着未来文明中心的邪恶欲望、政治阴谋,以及投机钻营者的花招,一幅幅骗子和受贿者的肖像在读者面前闪过,所有这些都极好地表现出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

563·

虽然作家们让诚实和善良占据上风,但《镀金时代》的结尾却并不那么令人信服。虽然在英国版的前言中马克·吐温及时地指出了,他“坚信自己的国家有个美好的将来”,但是作为作家,他的注意力却在此后长久地集中在了国家的过去。确实,作者记忆中的年轻时代的世界与七十年代这个“镀金时代”相比,差距非常显著,尚未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腐蚀。

写汤姆·索耶和哈克贝利·芬的小说,和在这两部之间所完成的《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构成了一个三部曲,尽管深受作者喜爱的这两个主人公并未出现在中间这部小说中。三部曲构思的统一并不只体现在主线联系性上,甚至也不只体现在对宗法制美国的叙述描写上,而是首先体现在马克·吐温式的理想人物性格上,同时它也代表了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三部曲”中的现实主义特质。

《汤姆·索耶历险记》开创了作者的第二个创作阶段,这时作家已经超越了“地方色彩”的文学美学,在大范围的艺术形象中实现对“美国梦”的具体形式和结果的探索,而这种探索在那个时代看来是十分深刻的。

马克·吐温所写的“密西西比河三部曲”首次塑造出几乎是田园诗般的旧时图景:平和有序的乡村生活,人与人之间不懂得出卖,不会互相残害——而这些却是在《镀金时代》中习以为常的现象。但是在描写童年的汉尼拔城时,马克·吐温却无法完成既定的目标,去塑造和谐幸福的理想国度。现实主义典型化法则需要作者有完全另一种基调。

最接近作者理想的应该就是那个在《汤姆·索耶历险记》中刻画的宗法制美国了。马克·吐温在给豪威尔斯的信中写到,他“切断了自己讽刺的

利爪”，因为这是给孩子们写的书。作者这方面的努力可以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但是整体上讲，作者还是没有完成。在《汤姆·索耶历险记》中已经存在了讽刺元素。马克·吐温笔下的偏远小城不仅反映了单纯、无私、民主秩序和道德，还表现了这里居民的兴趣和追求的卑微。在作品中到处都能找到这样的细节，它们让读者感到甚至在这样一部最光明最快乐的作品中，马克·吐温也完全不会放弃生活的真理。

业余学校的片段，波利阿姨或是寡妇道格拉斯的无聊教导，很小却是一副伪善面孔的席德，对“体面家庭”贫困圈子的讽刺式描写，所有这些都是马克·吐温作品所固有的，在他的作品里往往交织着浪漫与幽默，抒情与讽刺。然而乐观主义情调还是占优势的。马克·吐温已然相信，生命固有的自然本性是幸福的前提。主人公们的世界没有被矛盾和残酷笼罩得阴云密布，虽然他们遇到了真实的杀戮，这种杀戮也应该会将汤姆和哈克贝利的游戏世界击个粉碎，但他们不想也不会将印第安人乔的犯罪，当成在他们已经习惯的现实中黑暗的毁灭性的力量。

马克·吐温讽刺性地模仿了劝谕性的儿童文学中毫无生气的人物和虚伪做作的文字。他用来对抗这种小说作品的是真正的解析性和对真理的信念，这也使作者能够创作形象极为鲜明的画卷，从而引出最难把握的儿童世界观中的细微差别。在《汤姆·索耶历险记》中马克·吐温的小说艺术达到了自己创作中的第一个巅峰——美国文学中还没有这种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写作手法，也没有这种对每个细节的真实刻画。但是此时在马克·吐温的观念变化中还没有产生实质性的进展。创作世界中的所有形象的出发点还是在于卢梭主义者的那种性善的思想，在该作品的最终章节里，主人公们找到自己埋藏的宝藏时，便引出了对这样的教育主题的典型的美国式理解：生活要同自然保持一致，以“傻子”的道德标准，遵循心底自然的声音，就一定会取得实际的成功，即赢得财富。 ·564

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特别是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1885)中，世界的面貌变得复杂化了。读者很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内心的冲突，这种冲突则给他的晚期作品带来昏暗的基调：马克·吐温心中充满了“美国梦”的执著，以及对建立在那套思想体系中的所有人与社会的启蒙哲学的信任，但是他的作品却恰恰见证了在美国客观现实下理想的崩塌。他极其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个已经成为三部曲主题的矛盾，并且这个矛盾也无法解决，因此作家渐渐地失去了他创作早期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汤姆·索耶历险记》中，马克·吐温理解过去时所带有的温柔已经逐渐消失。《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这部作品中，只有前几章能使人想起《汤姆·索耶历险记》。领航员，这个“独一无二的，不受任何束缚的，绝对



马克·吐温 N.列维斯·哈克芬形象的漫画
1890—1900年

独立的人类的代表”，在这里代表着同库柏笔下的纳蒂·班波作品中一样的“新亚当”。自由的河流像极了这个马克·吐温自传式的主人公不羁的内心世界。而到处出现的“优雅的，长长的，飞速的小艇”根本不会破坏和谐。人、自然和文明是一体的，所以美国将引领进步的潮流，并且在潮流中不会带来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人类活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人们还服从于与自由美妙的自然和谐相处的“新亚当”的意志时，美国的“天堂”只会因技术革新而更加美好完善。

但是在1882年开始创作的描写归乡感受的第三部分中，作者客观地驳斥了自己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第一章中的所有思想。出现了全面失去特色的图景以及给人们带来不幸的残酷争夺。文明与自然的结合遭到破坏，而“新亚当”也变成了一个与自然生活背道而驰的猛兽。作品的最后部分充满了无法实现愿望的痛苦与绝望。着手写《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时，马克·吐温致力于找寻美国生活和民族性格中的这种悲剧变化的源泉，这种变化在《汤姆·索耶历险记》中尚未使作家产生严重的动摇并使其开始怀疑自己的仁爱。与《汤姆·索耶历险记》相比，所有的创作任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也成为了深刻描写美国生活本质的一部作品，以至于许多年后，海明威称这部作品为美国文学的开端。

在作品的中心部分，描写的是密西西比河的面貌，像惠特曼一样，作者作了形象的概括，但是却完全没有浪漫主义激情和抽象性描写。在马克·吐温的小说中，密西西比河体现了自由、自然和纷繁复杂的生活的主题，这和作品的另一个主题——具体描写河岸城市的真实——极其不符，在这些地方，实用主义思想、种族主义偏见、不良风气以及道德衰败占据上风。在小说的结构方面，哈克贝利作为一个线索人物，像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堂·吉诃德》、《汤姆·琼斯》、《死魂灵》中的人物一样，引领了主题的发展。哈克贝利和逃跑的奴隶吉姆在木筏上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他们见证并参与了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些事件总体上创造了一幅正在消逝的美国

全景图。

马克·吐温在解决摆在自己面前的、与惠特曼同样的艺术任务，但是他的创作原则是大面积地抓住现实性以及问题的广泛性的现实主义手法，然而与此同时，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又有着每个章节中的严格的生活真实性以及在琳琅满目的人物长廊中的社会众生相。这是全新美学高度上的现实主义，这时的作者已经不再是那个追逐“地方风情”的风俗作家，也不具有像豪威尔斯与詹姆斯一样与浪漫主义碰撞紧密联系的艺术世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开创了二十世纪美国现实主义叙事文体的主线，而其代表作家则是海明威、斯坦贝克、伍尔夫。

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那些已经在《汤姆·索耶历险记》中出现的主题与冲突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哈克贝利，三部曲中第一部中的“傻子”，在这里是有着民族意识中最优秀品质的代表，这种民族意识对马克·吐温来讲已经成为了衡量所有价值和生活矛盾的真正标尺，并且已经代替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的条件下显得有些时代错乱的卢梭主义观念。在《汤姆·索耶历险记》中现实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是马克·吐温用自己的技巧写就的基本冲突的可有可无的背景，但是现在则具有对庞大的物质感观的概括，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对国家社会客观矛盾冲突的忧虑，以及对已经被种族主义和利己主义所笼罩的那个时代的最民主的理想信念的呼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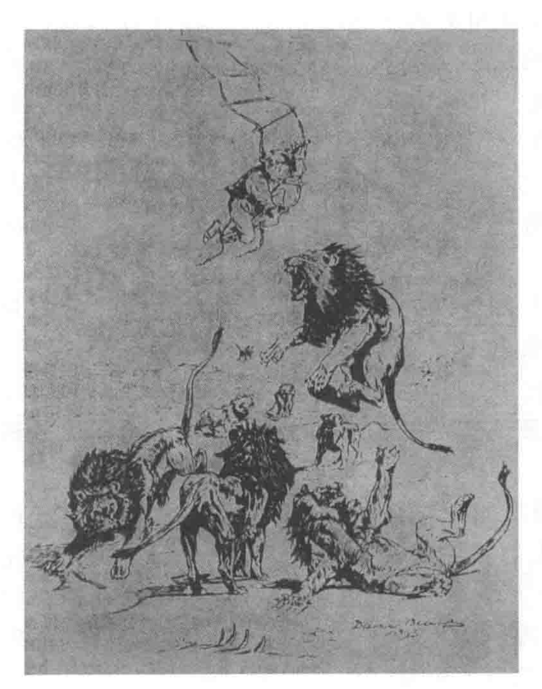
在《汤姆·索耶历险记》中十分重要的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已经成为了人性和资本主义生活准则的冲突。而这部作品也是在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将中心矛盾上升为整个美国社会的客观矛盾，深刻地触及了民族性格的本质的作品。这是马克·吐温在创作中的最重要的成就。

顽童与逃跑的奴隶乘木筏顺流而下穿越美洲，这是绝对的人性升华的象征，可以战胜一切偏见，问心无愧地脱离任何美国生活的残酷现实。“密西西比河三部曲”以欢快的音符为结尾，但是这样的结局却并没有消除社会、历史以及人类本身的诸多矛盾。马克·吐温在自己的历史小说中回归到这些矛盾上，这些历史小说也成为了作家创作第二阶段的宝贵遗产。

马克·吐温首次接触历史题材是在作品《王子与贫儿》(1882)中。在作家的所有作品中，这一部是最为接近启蒙传统的，这体现在作品的艺术结构上，它像是一个哲理寓言，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对虚伪的暗喻。爱德华·都铎和没有亲人的汤姆·坎迪是典型的马克·吐温式“傻子”，他们天性向往善良、公平与理智。每个人的心脏都同样在跳动，不管是伦敦来的衣着破烂的流浪汉，还是身着烫金天鹅绒外衣的英国君主。但同时他

们却相继成为了等级制度的牺牲品，这使他们本身完美的本质有了缺陷，566·统治与被排挤的关系并不因人生而平等而变得和谐。在描述中世纪英国的同时，马克·吐温实际上正是斥责了社会的等级制度，将它与人人平等的启蒙学说相对立。善念将会战胜荒谬的规矩和残酷的社会等级制度。

在《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1889)中，这种启蒙的乐观主义正在消失，而越发明显的是马克·吐温的探索，正是它使得马克·吐温在晚年出现厌恶人类的情绪。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编入了从托马斯·马洛里处借鉴来的亚瑟王传奇，马克·吐温的想法就是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作比较。作者将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技师神奇地搬到了亚瑟王时代的英国，希望再一次证明以美国人表现出的美国式民主优于饱受束缚的欧洲封建秩序。但是《傻子国外旅行记》的主题这次则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在读者眼前。



马克·吐温中篇小说《汤姆·索耶历险记》插图
贝尔德 1893 年

美国人成为了亚瑟王朝的真正主人，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代表更高一层的人类文明，而是因为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来自人民的，拥有真正的民主思想和美利坚民族特质的同哈克贝利·芬一样的人。这位主人公的善念，并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1886年劳动群众的世界观和道德观的反映。马克·吐温为此献上了著名的言论："劳动的先锋——新的王朝"，在这里工人被称为十九世纪"最优秀、最名副其实的"产物。因此主人公并不是简单地重建了王朝中的秩序，而是在简单和善良的理智支配下，乐于改变死气沉沉的阻碍新生的一切。他不可能不反对奴役和剥削的制度本身，与亚瑟王朝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进行抗争，而这恰恰和他在祖国已然适应的社会关系几乎完全一样。豪威尔斯也提到了马克·吐温笔下的亚瑟王朝时期英国和当代美国的相似性，而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重要

的思想焦点。

“进步”的时代显得比黑暗的封建时代更加残酷和反人道，而回到自己时代的想法一直困扰着主人公，因为在他的时代里，工人从来不是自己命运和国家命运的主人。资本主义文明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当关系到“进步”理应给大众带来的幸福时，十九世纪的自负显得毫无根据。马克·吐温所描写的美国现实是残酷的，人民的精神世界受到限制并逐渐丧失。该作品中的主人公代表了民族性格的最好方面，同时他又具有已经深深扎根于广大美国人民心中的简单的实用主义和对追求成功的通俗理解。他在亚瑟王朝中的所作所为不仅破坏了封建秩序，而且建立起了竞争关系，破除了传统社会不可更改的观念。

历史的进程对马克·吐温来说，与浪漫主义者不同，是不可逆的，而这也是他现实主义深度的证明。但在《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这部作品中他已经对整个历史进程作了悲观主义的理解，而且他晚年作品中的悲剧情绪也可以提前被感受到。《圣女贞德传》(1896)是历史系列小说的封山之作，这是马克·吐温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完成的，也是作者对表现真正的英雄性格的最后一次尝试。作者笔下的贞德是“这个世纪乃至后世的奇异现象”(就像萧伯纳，还有法朗士，他们都涉及这个主题)，她成为人民强大的精神力量的象征：“她是一个农民。这就是所有答案。”

贞德的死对马克·吐温来说是悲情的，但却有其合理性：在主人公的周遭世界没有老实、真诚以及马克·吐温在前言中提到人民世界观中未消失的价值时所指的人性优点的栖身之地。贞德的悲剧就在于，这些品质在周围的人看来就是“异于常人的”，也就是背离既定准则的。抛开对这位“奥尔良姑娘”形象的神秘理解，马克·吐温剖析了民族意识同自私自利和出卖灵魂的世界的矛盾。矛盾的解决注定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但是发展越深越会偏离自然平等的理想，并且必然会进入绝境。被马克·吐温认为是自己最好作品的《圣女贞德传》，极其明显地展现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发展幻想的破灭。这种破灭现在已经被作者意识到，而且这种破灭也是历史循环的主要结果。

在九十年代描写现代社会的作品中，马克·吐温的幽默中则带有越来越多的苦涩。悲观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马克·吐温的现实主义变成另外一个模样。在《美国申请人》、《傻瓜威尔逊》中，特别是在作家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晚期创作中，叙事性的开头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最显著的批判现实主义特征的讽刺。与豪威尔斯在九十年代所写的社会小说一样，马克·吐温的作品标志着批判现实主义作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特殊流派的形成。

· 5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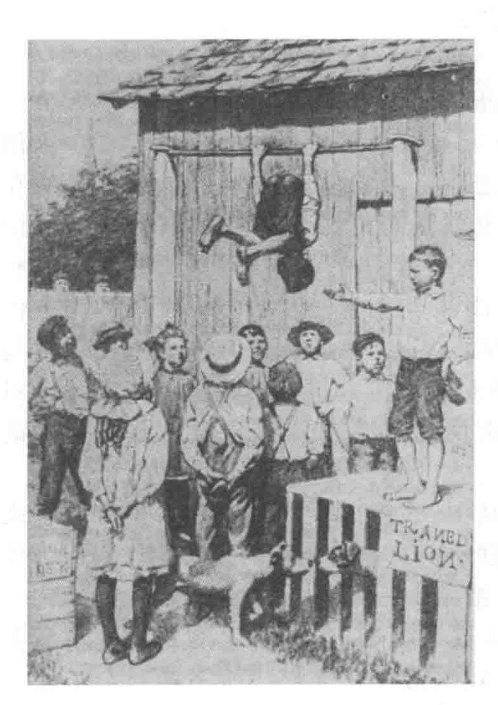
马克·吐温晚年的许多手稿并没有在作家生前出版：自己作为幽默作家名声在外，加之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作者害怕把这些作品发表出来，因为这些作品表达了对美国社会制度的深切失望，同时又包含对人类存在和历史法则的悲观理解。

马克·吐温在晚年生活和创作中的立场带有双重性。日益增长的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理解，使得作家发表了一些探讨悲观的哲学问题的著作，如《什么是人》和《神秘的陌生人》，但同时又掩藏起自己尖锐的笔触，并时而对社会观点进行让步。

但是马克·吐温在世纪之交写成的作品中也带有一种社会批评的意味，以至于作者同时代的矛盾变得不可避免。在《美国申请人》中，出现了读者熟悉的、在《镀金时代》中出场的塞勒斯，他现在发明了一种电击疗法，这也代表了作家晚期的创作基调——麻木的生活只会让人们在道德上更加麻木，疯狂地贪婪地追求任何有价值的财富。

568·

现实与抽象的交融，全新的对虚伪的隐喻，这是《傻瓜威尔逊》的讽刺风格的原则，这部小说展现了当初作者在《汤姆·索耶历险记》中赋予同情的偏远地区居民，在种族主义理论的支配下变得如何畸形。个人特质和优秀精神品质的消失，所有人对财富的崇拜，使得人们道德感消失，变成了机器，这也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系列著名讽刺小说的主题（《百万英镑》、《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马克·吐温《汤姆·索耶历险记》插图
布雷赫姆 1911 年

晚年的马克·吐温给美国文学带来的主题、情节、风格，对整个二十世纪都影响巨大，给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帮助。随笔集《赤道环游记》(1897)，是马克·吐温在环球演讲后有感而发的。这部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大国的殖民主义政治，成为了他九十年代反帝国主义讽刺小品的先声（《给行走于黑暗中的人》，《利奥波德换地的独白》以及其他），是美国进步文学的杰出代表。作家用这样一些作品结束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这些

作品见证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不相容的。

马克·吐温深入而多方面地展现了美国社会现实的重要矛盾冲突，这比他同时代的人都要突出。他的经验对于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是无价之宝，为美国文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他的创作中，包含了美国文学的整个时代进程，涵盖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并且展露出二十世纪大规模艺术革新的主要特征。

第二章　加拿大文学

1. 英语文学

在创始期的加拿大英语文学中，主流的政治倾向是：保王党主义、忠于英王、抵抗美国扩张。托马斯·哈利伯顿（1796—1865）的作品即反映了保王党主义。

哈利伯顿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作品以收集北美幽默故事著称。他从北美报刊中的琐碎小事和零散报道中发掘不寻常的故事，逐渐收集起材料，写成两部作品：《美国人的幽默特点》（1852）和《美国人在家》（1854）。哈利伯顿被誉为“北美幽默之父”，他也是无可争议的加拿大幽默文学先驱者。很有意思的是，比起在他自己的祖国，哈利伯顿在美国和英国更为著名（1858 年，他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学位）。出现这样的情况，与稳固的加拿大殖民群体有关，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不相信本地文学的潜力，而更喜欢经过“考验”的外国文学。

在 1837 年的魁北克起义之后，加拿大社会走向反抗英国统治的一面，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改革。改革以英王批准《不列颠北美法案》（1867）告终，根据这个法案，加拿大领地合并为一个统一国家——联邦。受此影响，加拿大民族意识得到加强。基于统一的加拿大文化这一观念，在知识界，“加拿大第一”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开设了大学，出版事业也大有发展。一系列新杂志问世了，其中最杰出的是《周刊》，该周刊网罗了一批作家。1881 年加拿大皇家学会成立，其目的是推动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民族意识在一系列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加拿大浪漫主义的先锋是查尔斯·梅尔，他发表了抒情诗集《梦境》（1868），其中最杰出的诗句描写了加拿大的自然风光。浪漫主义的领军人物是查尔斯·罗伯茨。他的作品《奥利昂和其他作品》（1880）让读者们相信加拿大有自己的艺术。

罗伯茨的诗描写加拿大具体、真实的形象。罗伯茨并不擅长于哲学与宗教题材的抒情诗，他的爱国主义颂歌也千篇一律。他的声誉来自对农民

日常生活的描述及风景速写。

如果说罗伯茨擅长写叙事诗，那么兰普曼（1861—1899）擅长的题材就是十四行诗。他与济慈一样，将古希腊视为理想的、不可摧毁的完美。济慈是他最喜欢的诗人。“我感到，我是他逊色的再造。”他这样谦虚地写道。然而有时，常常是在对冬季的描绘中，兰普曼摆脱了华丽辞藻的雕饰，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英年早逝，这也成就了他的未完成作品《精灵》的传奇。

对工业文明的拒绝使得加拿大浪漫主义诗人们忽视中世纪，也不关注东方（欧洲），而是关注本国的真实。“自然的人”的主题反映在关于印第安人生活的诗中。波林·约翰逊（她自己有一半的印第安人血统）在《印第安妻子的哭泣》一诗中，用独白的形式，讲述了印第安人戏剧般的历史。另一个女诗人伊莎贝拉·克劳福德的诗作的特点是用神话描写自然。理想的爱情是她诗歌的第一主题，但她就像其他加拿大浪漫主义诗人一样，也缺乏心理描写。邓肯·司各特描写了印第安人在保留地的生活，警告说这个民族将受到灭绝的威胁。

569·

几乎所有上述诗人也写非诗歌体作品。罗伯茨创作了一系列动物童话（《大地之谜》，1896年）和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最流行的小说题材。联邦的建立为加拿大历史小说注入了新的动力。最著名的历史题材作家是威廉·科尔比（1817—1906）和J.帕克（1862—1932）。

科尔比希望建立一种统一的加拿大文学，吸收英法文学的所有精华。他的其他政治观点是非常保守的。他对自己的小说主人公的评判取决于他们对英王的忠诚。小说《金狗》（1877）中的故事发生在魁北克，发生在路易十五加冕日当天。类似于科尔比，帕克在加拿大法语区古代的族长社会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那是严苛的道德，对传统的爱，对历史传说的尊重。沉着稳健的加拿大浪漫主义作家寻求稳定，这对于浪漫主义来说是很罕见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既没有道德怀疑，也没有反抗观念。观察战胜了行动。

十九世纪末，加拿大联邦建立之初的美好幻想消失了。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各省间就开始了激烈的竞争，事态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开始讨论加入美国版图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的停滞出现了。1896年，文学社会主导刊物《周刊》停办。包括不少作家在内，很多加拿大人开始离开自己的国家。于是，凭借浪漫主义作品兴起的加拿大文学“黄金时代”（这一提法有所夸张）结束了。

2. 法语文学

法语文学自存在初期便提出其主要的思想：保存民族特性、爱国主义

以及天主教的精神财富。与此同时，在法语文学中还有另外一个对于整个加拿大文学而言共同的主题——人和自然，后者还包含了以下主题：大地的美、北方气候的严酷无情、开拓者的英勇无畏以及农民劳动的艰辛。

在1837年的起义中，法裔加拿大人民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这一情绪则促使了民族文学的发展。民族文学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兴起，在形成初期共有三种文学形式扮演了重要角色：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加拿大政论性作品（特别是1837年起义的领导者路易·约瑟夫·帕皮诺的演讲发言）、关于民族历史的作品。

弗朗索瓦-格扎维尔·加尔诺（1809—1866）同样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写就了三卷本的《加拿大史》（1845—1848）。

宣扬自由与反教权主义的报刊媒体在这部巨著中注意到了作者对于北美洲土著居民的同情（正如加尔诺在书中所写，对于他们而言，欧洲人开辟新大陆的做法是毁灭性的），而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小说作家们则将其视为创作灵感的源泉。

如果说米歇尔·比伯在1830年出版的首部法裔加拿大人的诗集遵循的是法国古典主义的原则的话，那么奥塔夫·克雷玛齐（1827—1879）作为法兰西—加拿大诗歌的奠基者，则为其增添了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克雷玛齐是激进的亲法派，他创作的诗篇（《加拿大老战士》、《卡里戎的旗帜》等）歌颂了法国与加拿大的友谊。这些诗在魁北克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也因此确立了克雷玛齐的民族诗人的称号。

然而，当克雷玛齐于1862年移居法国之后，他停止了写作：现实中的资产阶级法国令诗人感到失望。除了诗歌之外，克雷玛齐还因记述了他于1870年在巴黎的每日生活的《巴黎围困日记》一书而闻名。正如加拿大的研究学者们所指出的，克雷玛齐的诗歌成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但是诗中所体现的爱国激情却决定了魁北克的诗人们未来的发展。

富有才华的路易·弗雷谢（1839—1908）成为了克雷玛齐在诗歌创作领域的接班人，他被同时代人称为“小维克多·雨果”。浪漫主义诗人缪塞对他的影响体现在他的首部诗集《我的消遣》（1863）中。六十年代中期弗雷谢迁居到了芝加哥，这被诗人视为流放（在这里诗人将自己与雨果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在此期间诗人创作了讽刺诗集《流放者之声》（1868）。回到加拿大后，弗雷谢积极投入新诗集的出版工作，并成为了获得法国科学院奖的首位加拿大作家（1880）。1887年，他在巴黎出版了自己的重要作品——史诗《人民传奇》，其主题与加尔诺的创作主题相似。这部史诗的序言部分：“啊，我们的历史！——你是神秘的珍珠匣子，/怀着诚挚的爱，我亲吻你的光辉的篇章”，体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弗雷谢采取了一个大 ·570

胆举措：创作了法兰西—加拿大版的《奥德赛》，不过情节的推动者并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历史事件。与弗雷谢一样，在诗歌中发展爱国主义的诗人还有庞菲尔·勒美（1837—1918）和N. 波什曼（1850—1931）。

到了六十年代，魁北克的文学界变得十分活跃，并出现了诸如亨利·雷蒙·卡斯格兰（1831—1904）这样个性鲜明而充满矛盾色彩的人物。这位年轻的神甫将一群诗人和散文作家（其中包括克雷玛齐、弗雷谢、庞菲尔·勒美等人）集中在自己的周围，并赋予了这个文学小组一个共同的名称："魁北克爱国学社"。卡斯格兰本人是加拿大文学的评论家、印第安文学的整理者以及历史小说的作者。他的创作风格以诗性的张扬与夸张而著称："庄严肃穆的十二月的一个夜晚。这些夜晚似乎是逝去的一年为了迎接今年以及那不为南方的人们所知的美妙与壮观而造出的。"十九世纪末，伴随着现实主义潮流的形成，卡斯格兰逐渐成为了反动的角色，他宣告与现实主义之间展开斗争。

欧贝尔·德·加斯佩父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加拿大散文早期的发展。1863年，父亲菲利普·欧贝尔·德·加斯佩（1786—1871）出版了小说《昔日的加拿大人》。作者在小说前言中提醒读者，他的意图是创作具有"加拿大风格"的作品。初看之下，这是一部情节紧张刺激的小说，并受到了加拿大读者的青睐，然而这部小说的重点并非陷入传统"三角关系"的女主角内心的情感与责任之争，而是流动着类似的激情的背景环境。正是因为对法国战败时期的描写的准确与精细化（从菜单上的菜名到军事战争中的具体细节），《昔日的加拿大人》成为了加拿大文学的经典之作。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兰西—加拿大文学以历史爱国主义小说为主流（包括安东·热兰-拉茹瓦、拿破仑·蒲拉萨、J. de. 邦什瓦尔、J. 摩尔莫特、E. 鲁索等人的作品）。然而这些作品的质量尚不能令人满意，在历史背景下发展的小说情节常常是刻板呆滞的：几乎每一部小说中的年轻男主角都冒着生命危险将女主角解救于危难之中。

直到十九世纪末，这类小说中增加了讽刺小说系列，后者对魁北克的工业化、"上层社会"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抨击，其中以J. P. 塔德维尔的"基督教战争小说"（此为作者本人下的定义）《为祖国而战》（1895）最为著名。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认识到了四分五裂的欧洲的缺陷的1845年的魁北克，小说中的自由党人和无神论者全都被描写为骗子，作者的民族主义情绪呈现出分离的特征。作者在这部基督教"反乌托邦式"的小说前言中写道："上帝在每一个法兰西—加拿大爱国者心里都种下了一株希望之花，希望加拿大能够在美洲的土地上留守住基督教文明。"

这部小说获得了官方批评家的赞许，然而，它却因反教权主义的特写激

怒了亚瑟·布伊(1840—1901)。亚瑟·布伊是加拿大支持言论自由的第一人,也是宣传国外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一人。之前所提及的神甫卡斯格兰描绘了民族文学的理想模型:"纯洁朴素,如同严寒冬季的少女的面纱",他认为,在这样的文学中不应该有"体现了罪孽的和唯物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的一丝痕迹"。另一位教会评论家、神甫拉卡斯在著作《在敌方的阵营里》(1893)中公开号召读者烧掉那些"有罪的书籍"。当时的一个评论家指出,在人人知道巴尔扎克、司汤达和左拉的魁北克,"没有人敢称赞他们,更不要说模仿他们"。现实主义作家们被指责仅描绘低俗下贱的现实,而不追求美与理想的事物。至于自然主义,由于其反对道德说教,教权主义者们称自然主义为对异教的回归。新兴的法国文学流派立刻受到了强烈的斥责。1888年,《加拿大评论》撰文评论法国的印象派诗人,认为他们"假装在为同时代人传递艺术的遗言,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在叙述怪人的遗言"。十九世纪末期,剧院受到了强烈打压,导致民族的戏剧艺术根本无法得到发展。

在新的文学形式受到压迫、先锋历史小说占据主流的背景下,洛尔·科南(菲利西泰·昂热尔的笔名,1845—1924)的创作道路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571

1881年,洛尔·科南出版了第一部加拿大心理小说《勃朗峰的昂热琳》,并立刻获得了读者与评论家的关注。这部小说结合了书信体、客观叙述以及女主角的私密日记,因而在创作风格上便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所区别。小说故事发生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叙述的中心并非传奇式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在与心爱的人订婚前夜懦弱、胆怯和不自信的十八岁少女。然而昂热琳的心并不只属于迷人的莫里斯·达尔维勒,还属于——并且首先属于她的父亲。母亲在她小时候便去世了,成为鳏夫的父亲则独自承担起抚养昂热琳的义务。她最终失去了这两个人。父亲死于意外,此后不久她又因不慎跌倒惨遭毁容,这令未婚夫陷入绝望。然而此时他们已经订婚,这份难以推卸的责任感要求未婚夫必须娶这位毁容的姑娘为妻。昂热琳心里清楚,未婚夫不再爱她,于是她拒绝成婚,并只身独处于曾与父亲一起欢度童年的家中。小说的女主人公形成了对已故父亲的崇拜,并最终在内心深处燃起了对人民的过去的爱,也就是新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昂热琳将写作和宗教的禁欲生活视为自己为祖先的奉献,虽然她那有所缺失的生命力对于禁欲生活而言依旧过于旺盛。

在给予自己热切关怀的卡斯格兰的影响下,洛尔·科南得出结论,这类风格的小说"引起道德上的不安",因而她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跟随其他许多作家和女主人公昂热琳的脚步,将眼光转向了历史题材。她创作

了诸如《献给劳动和考验》(1891)、《被忘却的》(1902)等一系列作品，作品中描绘了父亲的形象——法兰西—加拿大的开拓者，但与此同时，其作品中菲利西泰·昂热尔的不幸爱情的悲伤主题仍然隐约可见。菲利西泰·昂热尔是洛尔·科南晚期的夸张的道德训诫作品中唯一一个生动的主题。如果菲利西泰·昂热尔没有受到卡斯格兰神甫的影响，她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她是否会成为一名杰出的作家，或者她的创作的唯一源泉——不幸的爱情仅在《勃朗峰的昂热琳》中才得以令小说充满真情实感的活水？当今的评论界提出了以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也表明，上个世纪的法兰西—加拿大文学史尽管以爱国主义题材为主流，但它仍然是一段失去了许多机会的、充满了未完成作品的文学史。

第五编　拉丁美洲文学

本编序言

拉丁美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战争结束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它的胜利带来一股巨大的革新力量。战争旋风般地席卷美洲，打破了殖民统治的链条。但是战争并没有铲除根深蒂固的殖民社会根基。因此，由战争而获得的国家独立只是通向所有领域（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解放路程中的第一步。在数十年之后，内乱才得以平息，而它几乎摧毁了所有战后成立的独立共和国。

拉丁美洲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思想运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最先充当思想家和理论家角色的是作家。恩里克斯·乌连尼亚写道："从1810年开始一直到1890年，每一个卓越的克里奥尔人都是三种身份的综合：国务活动家、知识分子、文学家，而我们最优秀的作品大部分都产生于这些多面人才的笔下。"阿根廷作家、思想家、国务活动家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11—1888）的创作开启了拉丁美洲十九世纪下半叶文学的历史。结束这个时期的历史的是古巴诗人、革命家何塞·马蒂。

尚在反抗西班牙统治、争夺自由的战争时期，以及在随后极其重要的时刻，独立的思想体系中就已确立了新大陆民族的历史—文化独特性。"美洲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不仅认同之前殖民地的政治和精神自决，而且也确认了成长于民族文化融合之中的世界的特征。

与此同时，伊比利亚殖民地区的民族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抗争，也使得其自身开始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

年轻的民族沿袭着形成于十九世纪初的传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引进、吸收欧洲先进国家（首先是法国、英国）的社会和艺术思想。在整个十九世纪，所谓的欧洲主义是"美洲主义"必要的历史性依托，也是民族自我觉醒的工具。基于1848年的法国革命，阿根廷杰出的诗人、思想家艾斯杰邦·

艾齐切维利阿写道："至于我们美洲人，我们不可以，也不愿意从美洲观点以外的其他角度来看待这个大事件，也就是说这个事件迟早会影响到南美洲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命运。"于是在年轻的共和国的文化形成过程中，他倡导一种结合美洲和欧洲因素的独特表述："我们的智力活动的风格将会同时是民族的和全人类的。"而半世纪过后，何塞・马蒂强调："要对所有流派都了然于心——不局限于其中的任何一种。"

直到十九世纪末，"美洲主义"都是在实证哲学的基础上发展的。该哲学体系成为"自我认识的最初时刻，是对自我的寻找"（X. 阿别皮扬），它对抗着过去留存下来的遗产——经院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传统。然而，当建构于实证哲学基础之上，以观照社会问题为内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出现时，实证哲学内部的矛盾也就随之暴露了。在欧洲民族学家、种族主义者著作的影响下，在拉丁美洲产生了一种悲观看法，即认为这块土地上的民族先天缺乏进步的能力。

机械模仿而来的实证主义在消耗殆尽之后，激起了新生一代的不满。代表这个群体发声的是何塞・马蒂。他攻击那些怀疑新大陆民族才能的人，这种才能指向的是自我发展的道路以及对世界文学与众不同的贡献。

文学在"美洲主义"思想领域中发展着，它的整体和主导性趋势呈现为对自身民族性价值的寻找和确定。十九世纪中叶之前，诞生于浪漫主义潮流中的趋势成为美学纲领，被称为"文学的美洲主义"或者"文学的民族主义"。

浪漫主义对于拉丁美洲而言不单单是一种文学现象，它意味着更多。573・浪漫主义思想最先凭借其社会功能以及它与爱国主义的结合而被接受。据此，那些满足了上述要求的欧洲化的文学形象脱颖而出。在这些形象的塑造中借用了拉丁美洲以外的形式、形象化手段，但是所引用的一切已融会在拉丁美洲自己的语境中，因此，它们获得了独具一格的特色。

新大陆的现实中最具情感渲染力的因素是大自然，它的雄伟和能量能够唤起对拉丁美洲自身独特性和重要价值的认识。与这种感觉相对应的是浪漫主义世界观，而原始自然图景就被赋予了浪漫主义世界观的色彩。作家们受到了大自然美丽与神秘的感召，转而求教于欧洲的大师——夏多布里昂，他树立了描绘新大陆自然的典范。但是夏多布里昂的宗教哲学确实不在拉丁美洲作家们的世界观接受范围之内。对于他们而言，逃离文明是不现实的，也非他们所期盼的。他们从夏多布里昂身上学会了描绘自己的现实世界，而这个世界在法国作家眼中只是遥远的异国情调。

历史是激发拉丁美洲早期浪漫主义作家灵感的另外一个源头。那些选择历史题材的作家的第一个老师是沃尔特・司各特。寻求自我肯定的文学

自然地转向自己民族的过去。在此前殖民地民族刚刚获得独立的时期，有关西班牙征服中、南美洲时期以及移民的伟大历史剧，产生了新的意义，成为年轻的民族在艺术上自我认知和自我肯定的要素之一。

浪漫主义作家对历史的关注使得印第安词语获得生机。在浪漫主义时期，印第安人被视为民族传统始终如一的承载者。对印第安人的浪漫主义诠释与对美洲古老传统的赞扬有关，其中包含着明显的爱国主义情怀，有助于确认民族自身的与众不同。

因此，大自然、新大陆的历史以及它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最具特征的要素，它们构成了诗歌和散文中“文学的美洲主义”。与此同时，文学体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长篇小说体裁几乎在各处积极地发展着，墨西哥的第一部民族长篇小说产生于1816年（费尔南德斯·利萨尔迪的《佩里基略·萨尼恩托》），秘鲁和委内瑞拉的长篇小说出现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而在古巴，这种体裁最重要的作品则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问世的。起初，长篇小说体裁是在浪漫主义轨道中形成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生活观始终充斥着两种源头的斗争，其中占优势的是压倒一切的强烈情感，贯穿着反暴君的主题。以欧洲文学作品（夏多布里昂、雨果、大仲马、沃尔特·司各特）为支撑，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作家在同一时期发现了自身立场的新奇性。在此，个性的过度发展以及个体针对社会的暴动，表现为公民高涨的爱国激情；在拉丁美洲浪漫主义作家的视线中闪现的不是个体性，而是民族性。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拉丁美洲的长篇小说中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学走向——所谓的风俗派或者日常生活描写。恢复的风俗、习俗、生活方式（包括全民族性的，如政治斗争图景和社会矛盾）成为长篇小说的素材，因此，这时的长篇小说既是浪漫的又是风俗化的。在拉丁美洲散文中，这些趋势没有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融合：风俗派赋予浪漫主义叙述以民族独特性和某种地方色彩。

在拉丁美洲长篇小说发展的最初阶段，风俗派就已显现端倪（在第一部描写流浪生活的小说《佩里基略·萨尼恩托》中，对风俗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而且，在二十世纪的散文中还留存着风俗派的印迹。风俗派作为一种具有超强生命力的潮流，连接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加速发展的新大陆的年轻文学中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完全不同的文学思潮。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指出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长篇小说的典型特征：“在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中，浪漫主义因素与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其他元素互相调和。”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浪漫主义思潮几乎消退，现实主义元素得到最鲜明的彰显。作家们追求具体细致的社会分析，倾向于对道德心理问题

作批判性研究。但是,在全面看待现实以及理解其深层矛盾的方面,作家
574· 们还是缺乏足够的支撑。当时在拉丁美洲的国家中,针对现实主义的充分和自然的发展,尚未出现足够的历史文化前提。因此,在散文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左拉学派影响下的自然美学和实证主义的基本观念。

七八十年代的诗歌开始了思想美学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改革,现代主义步入了新大陆的文学进程。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系列历史文化、经济、民族和语言因素的作用下,随着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内社会生活逐渐趋于稳定,文学进程中的民族和地区特征日益凸显。最早实现文学地区性统一的国家有拉普拉塔——乌拉圭、阿根廷,安第斯国家——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稍晚实现的国家有地处安的列斯山脉和中美洲的国家。墨西哥的文学进程在民族特征上独具一格,这个国家拥有最为丰富的文化传统,民族融合也实现得最为充分。

最后,巴西的文化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从十六世纪开始,鉴于巴西在葡萄牙殖民历史和语言方面的独特性,它的文学发展在实质上不同于西班牙影响下的美洲国家。因此,我们会撇开巴西文学,单独研究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西班牙式美洲的文学。

第一章 西班牙语圈拉丁美洲文学

1. 散文

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语圈拉丁美洲文学浪漫主义散文的特点在两部著名的小说——阿根廷作家何塞·马莫尔(1817—1871)的《阿玛莉亚》和哥伦比亚作家豪尔赫·伊萨克斯(1837—1896)的《玛丽亚》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对暴政义愤填膺的抨击(《阿玛莉亚》),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歌颂(《玛丽亚》),这些主题都带有当时文学的鲜明烙印。受罗萨斯独裁统治的迫害,何塞·马莫尔不得不流亡国外。在流亡期间,他开始创作小说《阿玛莉亚》,在独裁统治被推翻后回国并完成了这部小说。小说的第一部于1851年在蒙得维的亚问世,完整版则于1855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

作为小说多层次结构的基础的爱情故事展现了阿根廷的国内局势,并最终沦为独裁暴政和联邦派(以罗萨斯为首,代表保守势力,主张保留过去的制度)与统一派(代表进步和民族统一)血腥斗争的牺牲品。作者不惜笔墨地鞭笞所谓"创始人"(罗萨斯自称)和其随从的残暴行为。他在对比两派时爱憎分明,毫不含糊——统一派英勇、高尚,而独裁者阵营中充满背叛、卑鄙与恶习。罗萨斯暴政呈现出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甚至在对罗萨斯

和其同党的外貌描写中，读者也能感受到神秘的恐惧和憎恶。用夸张激昂的辞藻来揭露独裁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的两个本源——野蛮与文明的观念冲突在文体上的体现。马莫尔小说中鲜明的两极力量、直接的善恶明暗冲突等种种特点都反映了《法昆多》的作者萨米恩托主张的“野蛮与文明”的对立。马莫尔在对高乔人——潘帕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受联邦派召集而作战——的态度上是拥护萨米恩托的。马莫尔认为他们在人种和气候的力量面前是充满复仇欲的，是残暴的，这里体现了他作为实证主义者的决定论。

作者的浪漫主义世界观在他的主人公形象中得以体现。阿玛莉亚如天空般美丽、纯洁、高尚，她所爱的统一派成员爱德华多勇敢、高贵，执著追求崇高的公民理想。作者用高昂的激情渲染主人公年轻美好的情感。他们不屑于生活中的琐屑，置身于追求理想价值的世界中，阅读拉马丁和拜伦等人的欧洲文学作品。当警察夺门而入时，阿玛莉亚将英国作家们的书籍扔进火堆。

主人公阿玛莉亚缺乏个性，本质上是高贵和善行的单一静态的象征。作者并未提供足够真实可靠的民族或社会特点。然而在公开撤军的反动派形象中却能读到属于那个年代的理智与情感。作家在世时，这部作品就得到了读者的强烈反响。小说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1868 年在俄国出版。

在《玛丽亚》(1867)中的庄园世界里充溢着恬淡安闲的田园风情。安第斯山麓的平静与安宁孕育和滋养着两个天真生命之间纯洁美好的爱情。玛丽亚之死令这首田园诗戛然而止。小说的艺术世界中另有一个主人公，即美好的大自然。作者笔下这一富于灵性的形象在西班牙语圈拉丁美洲散文中是第一个浪漫主义泛神论的体现。

《玛丽亚》中两个无辜的大自然之子的田园爱情、致命的结尾、宗教上的顺从等特点，无不印证了伊萨克斯与《阿拉达》的作者夏多布里昂在精神上的契合。这一点在伊萨克斯的小说文本中便可以找到证据：埃佛拉因与玛丽亚经常阅读这个著名的法国浪漫主义者的作品，靠近他的形象和思想世界。

然而相似性并未抹杀拉丁美洲小说中不可复制的民族特点。小说中有不少自传色彩，作为故事背景的庄园有着象征性的含义：天堂。对作者而言，安第斯山脉的瑰丽风光不是异域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因此《玛丽亚》中并没有法国导师作品中神秘主义的影子。安徒生·因培特(阿根廷文学史学家)认为夏多布里昂描写了理想中的美洲，而伊萨克斯描写了具体的、他所置身于其间工作和斗争的美洲。

小说中除了对民族环境的具体刻画之外，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和社会的问题。作者舒缓、深情地描写着天堂里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长

老制的善行原则运行的，包括在家中寄宿的黑人奴仆。风俗派的素描与大自然、与主人公的爱情融为一体。小环境的浪漫主义理想化也背负着美学理想上的义务。《玛丽亚》的作者为现实中的新世界提供了模型，在那里人与土地保持着天然的联系。作品的这一特点成为此后拉丁美洲散文的潮流。这也使得这部被称作“哥伦比亚大地交响曲”、“美洲史诗”的小说，标志着西班牙语圈文学向现实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对新世界中大自然力量的描写上堪与伊萨克斯的小说相提并论的，当属西班牙语圈拉丁美洲浪漫主义小说的另一代表作《库曼达》(1883)，作者是厄瓜多尔热带雨林养育的胡安·莱昂·梅拉(1832—1894)。《库曼达》情节跌宕，讲述了白人青年卡洛斯与印第安少女库曼达之间遭遇命运阻挠的爱情。然而小说真正的艺术成就在于对大自然形象的如画性和灵性的描绘。美洲热带雨林雄浑的力量令读者倾倒。在胡安·莱昂·梅拉的作品中也能感受到《阿拉达》的影响，也难怪他被称为“厄瓜多尔的夏多布里昂”。

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品中，古巴作家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1812—1894)的小说《塞西利娅·巴尔德斯》占据独特地位。作为古巴奴隶解放运动积极参与者的作者本人的命运也颇为引人注目。

576·

小说仿佛一幅十九世纪初古巴社会的风俗画。作家认真细致地描写着古巴首都的街道、公园和名胜，还包括哈瓦那居民的衣、食、住。古巴社会生活中的主要冲突是种族的不平等。最上层是白人，最下层是黑人，而介于中间的是穆拉托人，即黑白混血儿。作者最为关心的也正是这个中间阶层。在对混血美女塞西利娅和富裕的欧洲殖民者家族后裔莱昂纳多这两个主人公的描绘中，作者强调了他所认为的有色人种和白人的典型特征。前者是积极的，充满激情、能量和才华，而处于社会阶层顶端的后者则是消极的，意志薄弱的。

外号“青铜处女”的塞西利娅·巴尔德斯与富商家纨绔子弟莱昂纳多之恋以悲剧告终。得知自己的爱人将与同阶级的女子结婚后，因痛苦而丧失理智的塞西利娅暗派杀手去杀害自己的爱人，而她本人被送往精神病院。小说中典型的浪漫主义情节设置，大量安排的秘密和母女命运致命的巧合之外，其冲突仍然由有力的社会论据作支撑。

《塞西利娅·巴尔德斯》的第一部问世于1839年。作者在四十年后完成了自己的小说，并于1882年将其出版。在这部扩充版中比利亚维尔德批判地描绘了生产蔗糖的奴隶主庄园的生活。比利亚维尔德的小说是对存在至1888年的古巴奴隶制的严厉声讨。作者本人声称，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他在美国流亡期间读到的比彻·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然而这两部反映解放黑奴思想的作品在叙事风格和哲学基础上仍存在着迥异的差别。

比利亚维尔德认为他的小说是现实的。对他而言现实主义即是对"本性"的忠诚，换言之，是对"人物形象和其生活方式的所有细节"的忠诚。在这样的阐释中重要的是作家对它的态度，而不是他利用"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的合法性。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堪称真正的风俗派作家。



坐着的女人像 黏土 十九世纪 斯塔文哈根收藏

浪漫风俗派小说在墨西哥的典型代表作是路易斯·冈萨加·因克兰（1816—1875）的《阿斯杜西亚》（1865）。一群乡村走私贩为反对不公平奔走疾呼，经历奇遇探险的情节，与米却肯州农民的生活图景交相辉映。对节日、农民游戏、村舍、食物的描写构成了小说的风俗层面。对人民生活氛围重建的真实性多方面弥补了黑白画面的单一和对绿林兄弟情谊的浪漫主义理想化。

墨西哥的浪漫风俗派小说通过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1834—1893）的创作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效应。身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阿尔塔米拉诺是"文学墨西哥化"的主要理论家，主张民族传统、民族真实的美学价值。他的两部小说《克莱门西娅》（1869）、《萨尔科》（1888）的时代背景均为以墨西哥为主战场的重大历史事件爆发的十九世纪中叶。《克莱门西娅》戏剧化的爱情故事在与法国侵略者斗争的背景中展开，并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克莱门西娅所爱的青年军官恩里克·弗洛雷斯是上流社会的浪子、奸诈的懦夫，而具有高尚、勇敢的品格的另一名军官费南多·巴列的求爱却被女主人公拒绝。弗洛雷斯理应受到背叛祖国的惩罚，而对追求自己的幸福感到失望的巴列却代人受过，入狱受死。克莱门西娅追悔莫及，结果进了修道院。

无论在性格的冲突还是在情节上，《克莱门西娅》依然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然而作品与当时典型的小说《阿玛莉亚》和《玛丽亚》之间的差异也是显

而易见的。后两部作品中主人公被束缚在命运的捉弄之中，而《克莱门西娅》中却没有不可避免的命运，命运都是由自身的性格决定的。巴列是个拜伦式的青年。他不善交际，不被周围人理解，经常感到孤独。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他冲破保守父辈的樊篱。他的悲剧结局与浪漫主义主人公的特征相吻合，这与他的性格也不无关联。

对现实更加逼真的刻画当属墨西哥作家埃米利奥·拉巴萨。他于1887—1888年出版了四部曲《造反》、《伟大的科学》、《第四种权力》、《伪币》。作者并没有刻意追求某种艺术准则。作为具备批判思维和天赋的政治家，他提笔是为了说教的目的，以根除社会制度的缺陷。

577·

四部小说都与同一主人公和他的冒险相关。他背井离乡，首先到达州首府，接着是国家的首都，历尽坎坷后回到故土。随着爱人之死，一并消亡的是令他踏上征程的所有希望、幻想与梦想。

拉巴萨的叙述带有讥笑和讽刺，但并不愤怒。唯有一个现象令他恼怒，即盲目主义，地方首脑的暴动，俗称“流星锤”。“改革是和平进步之子，暴动是无知之子，是落后民族不可避免之鞭”。

拉巴萨对国内社会制度的分析颇为严肃和深刻。作家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加清醒。拉巴萨展现了社会矛盾、滥用权力和不公正的全部图景，而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1910年的革命。作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国家制度，因此他对性格的塑造和个性的追求并不执著。

在从未经历无政府状态的智利，国家秩序很早形成，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散文传统在浪漫主义轨道之外发展。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登上文坛的小说家霍塔比切从根本上拒绝了浪漫主义美学。他创造了通俗体的一种类型，来描写民众生活中最平常的现象，最普通的人物。他的笔下固有讽刺和对社会恶习的公开揭露。霍塔比切风俗派的衣钵由阿尔维托·布莱斯特·加纳（1830—1920）接过，他为推动现实主义迈出了关键一步。自认为师从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他在六十年代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中展现了智利社会方方面面的特点和缺陷，并将这些小说称作“社会调查”。这些作品在民族文学的历史中被认为是“智利的人间喜剧”。

这个系列的核心小说是《马丁·里瓦斯》，它以达马索·恩西纳一家为例展现了智利上层社会的形成。作者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主人公马丁·里瓦斯身上。马丁是穷人家出身的才华横溢的少年，具有强烈崇高的自尊。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奋成为恩西纳的得力助手。马丁·里瓦斯在内心深处爱慕着恩西纳的女儿丽奥娜，并逐渐得到肯定的答复。几经犹豫后丽奥娜的父亲终于答应了这桩婚事，他觉得这对自己事业的繁荣有利。主人公们的爱情中不乏浪漫主义激情的影子，但最终理智获胜，故事顺利落幕。

阿尔维托·布莱斯特·加纳有分寸地刻画了智利的社会生活，情节中糅进大段风俗描写，更加接近现实。加纳成功地展现了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社会趋势和智利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与拉丁美洲散文的发展同时兴起的是历史小说。它与当时主流的浪漫主义之间的契合是显而易见的。拉丁美洲历史小说的方向总体上和欧洲历史小说的轨迹相同。作家们立足现实，回首过往，寻找直接或间接的历史的重合。列伊佐夫认为，法国历史小说家的写作是自我确立的手段，这个看法更大程度上也可以用来说明拉丁美洲作家的创作。

坚持民族自尊，拒绝精神殖民的历史小说作家从欧洲先例——尤其是从"欧洲历史小说之父"沃尔特·司各特那里借来了方法。仅三百余年前，拉丁美洲各民族在自己的大陆目睹了两种种族文明势力戏剧化的血腥斗争，其结果是伊比利亚半岛征服了印第安人，令他们沦为被殖民者。因此历史小说的首要对象成了征服者和他们发动的残酷的战争。

在墨西哥诞生了第一部历史小说《希克滕卡尔》(1826 年匿名出版于费城)。这种体裁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在阿兹台克人的土地上充斥着征服者酿成的悲剧。由于在墨西哥已经存在民族融合的历史基础，新的民族繁衍在这里迅速蔓延开来。 ·578

墨西哥的历史小说家们(埃里希奥·安科纳、伊利尼奥·帕斯)将印第安人描写得勇敢、高尚和慷慨，将入侵者描写得冲动、奸诈和愚昧。在当时，展现复杂真实的历史过程的做法已经超出了浪漫主义的范围。讲述殖民时代历史的墨西哥作家们无不痛斥西班牙的统治手段，尤其是审查制(J. 塞拉·奥莱利、V. 里瓦·帕拉西奥)。

多米尼加出身的曼努埃尔·赫苏斯·德·加尔万(1834—1910)是晚期浪漫主义历史小说《恩里基约》的作者。作者自称作品受启发于废除奴隶制的波多黎各。他学习沃尔特·司各特，在小说中充分描写了真实与虚构的人物参与的戏剧化事件。如同司各特笔下的艾凡赫一样，恩里基约同属于征战和应战两个世界。主人公的选择反映了他的思想态度。与广大作家同行不同，加尔万试图将残酷的征服者和征服本身分开，他认为后者是进步的。在展示西班牙人野蛮、欺瞒统治的同时，他也看到了天主教传播和西班牙政权建立的积极文明的因素。圆满的结局，爱情关系中感伤的主人公性格以及对"卡尔五世的英明政策"的粉饰，令小说具有浓厚的诗意。然而在多米尼加第一部小说中也不难找到印第安人的爱国激情和民族觉醒。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小说中也出现了十九世纪初反对西班牙的独立

解放运动的主题。在这些小说中赞扬了刚过去的英雄时代的高尚品德，而这正是当时人们所缺少并值得学习的榜样。此类小说有墨西哥作家胡安·迪亚斯·科瓦鲁维亚斯的小说《起义者希尔·戈麦斯》(1858)，委内瑞拉作家布兰科的散文叙述系列《英勇的委内瑞拉》(1883)，乌拉圭作家阿塞维多·迪亚斯浪漫三部曲中最为著名的第一部《伊斯马埃尔》。1892年描写反殖民爱国独立运动的多卷本史诗——智利作家阿尔维托·布莱斯特·加纳的《在光复时期》，为历史小说画上了句号。

秘鲁小说家里卡多·帕尔马的创作开创了新的体裁。他的创作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出版了多篇描写秘鲁过去生活的短篇速写，合称《秘鲁传说》。他的每个短篇都是有历史根据的，来自他曾任馆长的国家图书馆的档案资料。在《秘鲁传说》中帕尔马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民俗描写家，讽刺的对象是官僚、牧师。在重塑不久前的历史片段时，帕尔马创造了秘鲁生活的典型形象。和十八世纪秘鲁著名的民族讽刺大师卡维埃德斯一样，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嘲讽了偏见、愚昧和专制。

十九世纪末，拉丁美洲散文中出现了新的动态。尚未成熟的现实主义开始接受欧洲自然主义美学。有时这种动态直接出现在同一本小说中，如委内瑞拉作家曼努埃尔·罗梅罗加西亚的小说《苦工》。积极投身政治斗争的罗梅罗加西亚把自己的小说当作对文明思想的宣传。作为《玛丽亚》的作者豪尔赫·伊萨克斯的狂热崇拜者，他在给伊萨克斯的信中阐明了自己对模仿"故土精神"的坚持。然而与《玛丽亚》不同的是，《苦工》没有也不能具有纯浪漫主义文学范畴内才可以存在的天然和谐的意识。在《苦工》中除了感伤的爱情线外，也包含着对丑恶的封建暴行的揭露。从艺术的角度看，《苦工》是浪漫主义激情、自然主义描写、辛辣的讽刺和必然存在的风俗派的杂糅。

在所谓的印第安人小说中，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激烈碰撞。秘鲁女作家马托·德·图内尔的小说《没有窝的鸟》在印第安人问题上与往常的浪漫主义理想化不同，她写出了印第安人被歧视、受窘迫的境遇，第一次除去了他们英雄的光环。秘鲁土著居民的日常生活被自然主义描写得细致入微，印第安人被表现为受欺凌的牺牲品。即使在艺术性方面小说并不出众，但对于印第安人问题的新的处理方式令它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拉丁美洲散文中出现了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出现了自然主义特有的对生活黑暗肮脏面的暴露。

579·

批判民族生活以求人民觉醒的散文家们也开始关注印第安人问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冈萨雷斯·普拉德笔下标志性的秘鲁政论批评《自由的国度》(1884)。作者放眼国内现实，关注了尚未摆脱被殖民境遇的国

民，其中包括受歧视的印第安人。另一位散文大师厄瓜多尔的胡安·蒙塔尔沃是反对暴政的执著斗士。作为《终生独裁》的作者，蒙塔尔沃有句名言："如果我的笔能够哭泣，那么我将写作名为'印第安人'的书，它会令全世界放声大哭。"用这句话来描述整个印第安人小说也无可厚非。

2. 诗歌

十九世纪下半叶，诗歌和散文一样遵循着浪漫主义的原则。浪漫主义诗歌起步时就充满对民族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念。在对自然、历史、拉丁美洲民族生活的特色的关注中都渗透着爱国主义情感。浪漫主义诗人对客观的外部世界敞开胸怀。诗人与现实的这种关系促使诗歌向史诗发展，并试图从民族诗歌中获取经验。在拉丁美洲各国，和民间文学发展相似的土壤令专业诗人们开始关注民间创作。与此同时，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诗歌中也出现了抒情性增加的倾向。

各个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的政治生活的不稳定性和突发性令人惶恐和悲观。在敌人的力量面前，个人显得孤立无援。然而，不论这种"宇宙性的悲观"有多么强烈，没有哪个浪漫主义年代的诗人会因个人的遭遇而无视民族的不幸，二者是分不开的。直到十九世纪末，诗歌才开始关注独立于整体的个体。十九世纪末的诗歌创作先于散文进入了现代主义，开始探索新的艺术表达手段。总体上，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诗歌相比散文而言成果更多，获得了独特的成就。

十九世纪中叶，哥伦比亚和古巴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两大著名宝地。哥伦比亚诗坛的先驱何塞·欧塞维奥·卡罗（1817—1853）是具有雄厚哲学底蕴的抒情诗人，他曾在移民生活中经历内战。

在他的公民抒情诗中，诗意的真实性和高雅性表现在死亡和痛苦主题（《二十年后》、《现象》）以及爱国和流亡主题（《在远洋》、《祖国的形象》、《流亡者的火炬》）上，夹杂着宗教道义和形而上的思维。试图在远方寻找精神依托令卡罗的爱情诗和后期的叙事长诗具有抽象寓言式的特征（如《婚礼祝福》）。

与卡罗同时创作的胡里奥·阿尔波莱达（1817—1862）既是政治家、军人，又是评论家、演讲家。在这位曾经留学伦敦的诗人的爱情诗和公民诗中，可以听到英国和西班牙浪漫主义诗歌的回声。1862 年阿尔波莱达被任命为保守派军队将军和共和国总统，却未能上任便被人暗杀，他的叙事长诗《龚萨罗·德·奥雍》的手稿也被销毁。这部作品仅以部分片段为世人所知。诗中提到了重要的印第安人解放主题。它讲的是对西班牙内讧战争

感到失望的西班牙征服者龚萨罗·德·奥雍与印第安酋长的女儿相爱的故事,作者从历史档案中得到了灵感。龚萨罗·德·奥雍是高尚的骑士精神的化身,而用浪漫理想主义笔触描绘的酋长与骑士的兄弟阿尔伯特·德·奥雍(历史人物)的下流低俗形成鲜明对比。酋长在英国冒险家沃尔特的帮助下掀起了反抗统治的起义。在艺术性方面,长诗遵循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雄冒险长诗和司各特小说的传统。浪漫主义文学常见的题材——征服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爱情,在诗中是两个人种联盟的象征。

杰出诗人拉法埃尔·蓬博(1833—1912)的创作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经历了内战的蓬博在早期创作了一些谴责暴政的作品。在反对上帝的长诗《黑暗的时辰》(1855)中流露出怀疑主义情绪,它将世界理解为混乱,将人的生活看成是无限灵肉冲突中的不和谐。他追随西班牙作家埃斯普龙赛达,将一切怪罪于对人类冷漠无情的上帝。五六十年代,蓬博因外交任务居住在美国。这一时期的作品有长诗《海盗们》(1865),其内容是谴责美国对待南美洲各国的强盗政策。这部作品是拉丁美洲诗歌中反帝国主义的最早先例。此类作品还有美国内战时所写的废奴主义诗歌《罗伯特·李》。

诗歌的史诗性特点在格雷戈里奥·古铁雷斯·冈萨雷斯(1826—1872)的创作中尤为突出。他的诗歌以抒情性和深入人心的笔调著称,最有影响的是长诗《在安蒂奥基亚种植玉米的回忆》(1869)。作者详细描写玉米的种植过程,歌颂大自然和养育哥伦比亚人的植物——玉米。作者笔下的大自然充满诗意的同时又是现实、具体的,很多"美洲主义"词汇被有机地融入叙述中。

浪漫主义诗歌的另一盛产地是古巴,它是唯一一个西班牙殖民持续到十九世纪末(1888)并存在奴隶制的拉丁美洲国家。十九世纪初在古巴已经出现了诸多浪漫主义诗歌作品,到了五六十年代,为了迎合民族运动而掀起了第二波浪潮。然而这一次随着诗人表现抒情自我程度的深化,对祖国形象的探索也更加丰富。永恒的人生问题,对生活的失望——这些主题都以不同形式与尚未摆脱殖民和奴隶制枷锁的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然而诗歌和生活的联系仍需调节,有时异常复杂,这些特点在拉斐尔·马里亚·门迪维(1821—1886)的创作中尤为突出。他是"重建高雅品位"运动的发起者,反对对亲密和谐情感的崇拜和过分描写。他歌颂祖国大自然的杰出牧歌(《露珠》、《傍晚的祈祷》等)令读者联想到古巴的现实。在悠扬的哀诗《棕榈曲》中,不可求的幸福的主题与被欺凌的祖国命运直接关联,大自然的形象是祖国的抒情化身,个体的感受具有普遍性。门迪维的这种诗歌与国家生活的直接关系还表现在他的公民爱国作品中(《献给意大利哀悼加富尔之死》,1861年;《给本尼托·胡阿雷斯》,1873年;《沉睡者》等)。

他的学生何塞·马蒂总是亲切地回忆起门迪维，并在自己的诗中秉承了老师的衣钵。

胡安·克莱门特·塞内亚（1832—1871）擅长当时流行的流亡题材和对脆弱生活的描写。和其他许多诗人一样，他参加了解放战争，被西班牙人所杀。在他的作品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政治公民题材（《第十六个八月》、《致古巴同胞》、《回忆》等），而他的才能在哀歌中得到了极致的发挥。在他的哀歌中不难发现欧洲浪漫主义者的影响。诗中反映了与枷锁中的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诗人的一生（《在奴隶制的日子里》、《回忆》、在狱中所写的《烈士日记》系列）。《在奴隶制的日子里》一诗中展现了传统的拜伦式情节，即失望的诗人乘船离开祖国，他的心头弥漫着对故乡的哀伤之爱。



阿尔卡拉圣迭戈头像 木制 十九世纪
墨西哥宗教艺术博物馆

戏剧家、阿那克里翁诗体抒情诗人霍阿金·罗伦索·鲁阿塞斯（1826—1867）所创作的爱国作品富有能量和高昂情绪。在严厉的审查制度下，鲁阿塞斯运用希腊历史上的英雄故事、《圣经》中的形象、东方题材创作颂歌和圣歌（《迈索隆吉翁的陷落》，1856年）。

鲁阿塞斯与诗人何塞·福尔纳里斯（1827—1890）共同创办了文学杂志《独木舟》（1856—1857），它为新的诗歌流派“西博内[1]主义”奠定了基础。

印第安人浪漫、理想化的形象是西博内主义者创作的中心。这显然是受到了欧洲卢梭主义者传统的影响，即把印第安人描写成阿卡狄亚土地先天的主人。严厉的审查制度是印第安人形象出现的直接原因。正如福尔纳里斯所写：“诗人只有通过象征性的方式才能够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爱意，反

① 西博内：西班牙统治前印第安当地部落的名称。——译注

抗不公平和不堪忍受的统治手段。”在这层面具的掩护下，古巴诗歌中隐藏了古巴农民，而风景、自然与印第安人的生活被具体、可靠地加以描绘。

福尔纳里斯在诗集《西博内之歌》(1855)中，通过诗意地将古巴印第安人的形象与现状联系起来，将诗集的革命爱国主义倾向表露无遗。以解放为主题的古巴印第安式阿那克里翁诗体诗(《最后的西博内》、《独木舟》、《酋长之歌》)尤其引起读者与后人的注目。

在胡安·法哈尔多(1829—1862)仅有的诗集《潺潺的奥尔米格河》(1856)中，结合了西博内主义对民族生活特色、主题的重塑与古巴农民的民间诗歌传统。法哈尔多诗作的基础，是诗人向往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简单淳朴生活的道德理想与“城市放荡生活”的恶习之间的对立。诗人的态度体现在诗集的第二章《古巴之歌》当中。他化身为古巴农民，运用民间诗歌中最常用的体裁——杰西玛。

这种歌曲体裁(八音节九行，按 abbaacddc 方式押韵)是由专业的西班牙诗歌传入古巴民间创作的。高度抒情和反复的诗歌形式在变成民间口头形式时改变了自身功能，变成了对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件的即兴回应方式。代表民间即兴弹唱艺人的法哈尔多将这种体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些歌唱自然、爱情、农民生活的诗歌强调了和谐的劳动生活才是理想的民族生活。特别的、典型的古巴情调与西博内主义相符。田园牧歌般的印第安主人公(《阿杜埃与古阿丽娜》、《卡西库·马尼阿伯纳》等)与农民形象重合，仿佛成了祖国充满生机的和谐自然的一部分。法哈尔多的这些诗歌在十年战争中受到热烈追捧，他的作品为民间歌手所演唱，其诗歌形象也成为描写民族生活的蓝本，确立于诗歌象征体系内。

与十九世纪上半叶已然形成的古巴及整个拉丁美洲诗歌的一些发展路线相似，在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形成了对民间创作经验的普遍依赖。在阿根廷，“1837 年一代”寻找地方特色的接力棒传给了写有长诗《拉萨罗》的里卡多·古铁雷斯(1838—1896)。乌拉圭诗人、散文家阿列汉德罗·马加林奥斯·塞万提斯在长诗《谢利纳尔》(1852)中描绘了民族风俗传统图景。然而在阿根廷文学中对民族的自我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当属高乔文学，它在拉丁美洲文学发展过程中意义非凡。

这种十九世纪头十年出现的与高乔农民民间文学紧密相连的文学流派，与阿根廷人民族自我认同的形成、与试图在诗歌中确立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方式的需求有关。

在流派的创始人伊达尔戈所处的时期，高乔诗人的身份如同民间歌手。为传达农民语言的原汁原味，他们力争成为“人民的声音”，表现他们的情感和视野。他们借用了民间艺术的形式，但并没有囿于对传统的简单复

制。据说民间歌手巴雅多尔们掌握了即兴讲述和演唱自己的生活故事的艺术,然而十九世纪并没有出现民歌和历史民谣。拉丁美洲的民间口头文学是在史诗传统消失后才形成的。高乔诗人们运用已被削弱的史诗传统和西班牙浪漫曲叙事艺术(梅内德斯·皮达尔将其定义为“信息浪漫曲”),创造了之前的民间口头文学所不知的新形式。他们发展为“书面的巴雅多尔”,起到了民族史诗歌者的作用。高乔诗歌的史诗特点体现在它记录般准确的历史真实性和鲜明的非文学针对性上,因为诗歌成为了作为政治家、内战参与者的高乔诗人斗争和宣传的手段。到了三十至五十年代,这个流派在保持特有的艺术体系的同时,借鉴了浪漫主义诗歌而不断丰富起来。

在十九世纪中叶颇负盛名的高乔诗人有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1807—1875)。在三四十年代,他因创办讽刺诗歌杂志及创作文艺小品文而闻名。在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中心地蒙特维的亚,他以高乔巴雅多尔的名义用对话、叙述、对联等形式发表了许多诗歌小品文,来讲述战争中的事件,评说政治黑幕。同时阿斯卡苏比也是个性鲜明的艺术家,在相当数量的作品中用真实和严谨的记录,描绘了同胞自相残杀的战争的恐怖。1851 年发表的《保林诺·卢塞罗(阿斯卡苏比的笔名)之歌》与《乡村风格诗集》都体现了阿斯卡苏比式的历史歌谣集的特色。在讲述冒险浪漫主义故事的最后一部对话长诗作品《桑托斯·维加》(1872)中,阿斯卡苏比完成了风俗描写的任务。

浪漫主义诗人坎波(1848—1928)的创作是从用高乔风格写作政治讽刺文章开始的。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收入 1870 年诗集的对话长诗《浮士德》。作品用诙谐的口吻讲述了两个高乔人到首都剧场观看古诺的浪漫主义歌剧《浮士德》之后的谈话。

乌拉圭诗人安东尼奥·卢西赫(1848—1928)的对话长诗《三个东部高乔人》(1872)引领了高乔诗歌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卢西赫为诗歌体系带来了新的元素,即引入了歌谣中常见的“邪恶高乔”——被统治势力追杀的叛逆逃亡者。

卢西赫的长诗所提出的社会批判性主题针对的是乌拉圭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件。高乔人是第一个牺牲品。统治势力的镇压政策来源于认为高乔人无法适应文明的看法。这种看法在萨米恩托的《法昆多》(1845)所表达的观念中可以找到例证,高乔人被看作是“蛮人”、有缺陷的人种。

民族民主主义伟大诗人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为受迫害的高乔人辩护。与其他高乔诗人一样,他首先是政治家、内战参与者和记者。在他 1869—1870 年创办的《银河日报》中严厉谴责了试图灭绝高乔人的不

合法统治。在长诗《马丁·菲耶罗》中他反对了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代表 583· 者对高乔现状的叙述,呼吁社会反抗对高乔人的迫害。《马丁·菲耶罗》是真实的、史诗性的画布,展现了拉丁美洲走向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民族生活全景。

长诗的第一部发表于 1872 年。埃尔南德斯同时化身为高乔巴雅多尔和“邪恶高乔”,其作品的形式仿佛民间歌手将自己的人生境遇对听众娓娓道来。谙熟高乔民间文学的诗人运用了所有传统的即兴创作方式,并增加了对“邪恶高乔”的描写——与权力、逃跑、追逐、士兵等的冲突。埃尔南德斯与萨米恩托一样取材于民间创作,但前者反对后者将高乔人刻画成无政府主义者、“蛮人”和暴力民族。在埃尔南德斯笔下,马丁·菲耶罗是受统治势力迫害而颠沛流离的民族英雄。作者与萨米恩托进行论战,揭露了令“温顺高乔”变成“邪恶高乔”的社会根源。马丁·菲耶罗的转变正是因为他被强制从军,家园被毁,家人不知去向。然而同时主人公为自己的自尊和自由而战,为反对将人与属于自己的大地强制剥离的社会制度而战。在马丁·菲耶罗的叙述中有两个主题,一是社会批判,二是农民思维中固有的所谓“永恒”。被神话化的造物观念令主人公把个人生活经验变成全民族的经验。被统治势力追杀,这是厄运,高乔人的不幸——农民原本自由劳动、和平生活的天堂变成了非人的地狱,则是命运。

作品中通过历史中直接的民族生活冲突所反映的人道主义问题具有英雄主义的回声。从菲耶罗身上的史诗性英雄主义特征中,可以看出暴动者题材的诗歌传统和文学中对骑士主人公的看法。

第一部的结尾和关于“邪恶高乔”的典型结尾极其相似,即马丁·菲耶罗和兄弟克鲁斯永远离开已经不属于自己的故土,隐匿于潘帕斯草原。在隐居前,菲耶罗将自己的吉他摔向地面,以示他的故事宣告落幕,他的唱功将后无来者。作者用同是高乔英雄的第三者的视角写下《歌曲中的歌曲》,结束了长诗。这些诗句在第二部——《马丁·菲耶罗归来》(1879)中再次出现。第二部中埃尔南德斯试图帮助高乔人开始崭新的生活,缓解矛盾,然而现实主义的嗅觉并没有改变诗人,对给人民带来社会不平等的秩序进行坚决反抗的主题在第二部中得到了延续。同时鲜明展现的是作者力图创造民族史诗——一部属于人民的作品的愿望。诗句中强烈表达了人们应该主动出击,掌握自己命运的观点:

我们需行动起来
并且一定要知道
为得到熊熊火焰

必须从底部放火

在埃尔南德斯的长诗中，各民族生活的主要社会历史冲突被艺术地展现出来，这在拉丁美洲文学中是首创性的。无论是在诗歌表达方式、艺术哲学范畴（全民族历史高度上的人道主义问题、反资本主义倾向），还是在诗歌体裁（作者意识与民族意识相融的史诗性特点，大量借鉴民间诗歌的原生态元素）中，都体现了二十世纪小说的某些特征。

何塞·埃尔南德斯的长诗中所体现的具有特色的艺术思维重构，在秘鲁社会活动家、诗人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德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他的传统印第安人题材中不可缺少的是新的社会批评主题。在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主要系列作品《秘鲁传说》（直到1935年才合集出版）中，对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世界的塑造并没有遵循传统的或浪漫的基调，诗人站在现实主义者的立场，反对种族和社会性迫害。

乌拉圭诗人胡安·索里利亚·德·圣马丁（1855—1931）的哲学历史题材叙事长诗《塔瓦雷》（1888）是拉丁美洲晚期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作之一。作品追求造型美、韵律性，可见受到了贝克尔、帕纳斯派、象征主义者等的新影响。作品取材于乌拉圭历史中混血儿塔瓦雷与征服者之女伯兰卡传奇般的爱情故事。深沉抒情的意境是作品的特色，其中偶尔夹杂着宗教神秘主义色彩。

诗人在诗中思考乌拉圭土著印第安查鲁阿族人的命运。他们在与侵略者的战斗中牺牲，并为拉丁美洲土地上出现的新的人类社会而流血。西班牙人误会了塔瓦雷，以为他劫走了伯兰卡而将他杀死。伯兰卡抱着塔瓦雷的尸体痛哭——这是拉丁美洲两个人种无法分割的历史渊源和统一的象征。 ·584

晚期的浪漫主义诗歌带有历史上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新诗歌流派的烙印。它产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艺术认识上的深入和进步，是一系列社会文化因素复杂结合的产物。诗歌尖锐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现象，诸如寡头政治秩序的稳固、成为西方扩张对象的发达拉丁美洲国家中越发浓厚的资本主义气息。为摆脱过时的浪漫主义观念，反对实证自然主义观念，置身新世界的诗人们像往常一样把目光转向了欧洲文学，然而这一阶段的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圈诗歌的主要发展道路仍然在坚持属于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失去人道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扩张时代，拉丁美洲世界在精神上的坚持与对资本主义世界观和非人道主义倾向的厌恶紧密相连。这也关系到与西欧艺术动向的关系。拉丁美洲诗歌接受了欧洲资本主义经历精神危机时期产生的艺术（象征主义者、帕纳斯派）与新元素，借

鉴了它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价值观。

在这个复杂阶段,对拉丁美洲诗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是革命家、古巴反西班牙独立解放战争(1895—1898)领袖、思想家、政论家、诗人何塞·马蒂(1853—1895)的创作。

马蒂的诗歌创作与革命事业不可分割,体现了诗人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追求民主解放的哲学世界观。逃避追捕和流浪(墨西哥、西班牙、法国、委内瑞拉、美国)的日子以及身为记者工作的时期,见证了他的思想积累成熟的过程。接受了大量哲学、美学、文学思想的他把全部知识用来服务于两个相互统一的目的,即实现拉丁美洲精神独立和解放斗争的胜利,并把这当作毕生的使命。何塞·马蒂文学观的核心是他对文学的社会作用的看法,即文学应该承担表达集体和全人类、民族的心声和追求的使命。"不代表人民的诗人犹如在寒冷气候中的热带植物,并不能开花结果。""为了被群众听见……诗人应该听到所有叹息,见证所有痛苦,感受所有快乐,并从所有人的激情中获取灵感。"正是秉承这样一种态度,马蒂在面对西欧与北美文学时批判个人主义倾向,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成果。同时他也广泛运用和宣传这些文学中的美学经验。马蒂的诗歌将来自法国的新气息与浪漫主义的形象塑造传统、西班牙正统文学遗产结合统一起来。

在马蒂的创作中第一次出现全新文学动向(相应地,也是整个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圈诗歌美学重构的源头)的时期是1875—1880年。1879年,马蒂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宣传了新的原则,如形象的绘画造型美、词句的音乐性、颜色和声音的作用、艺术家对待语言的所有词汇层时应全面自由的看法。在马蒂看来,这些原则都是为创作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思想传达的纯粹性服务的。

然而马蒂更为重要的成就并非对这些诗歌原则的形式上的掌握,而是将它们运用于新的目的。马蒂的诗歌有别于后浪漫主义时期典型的抒情主观化、精神生活指向。然而他的抒情主人公从未在个体的感受中故步自 585 · 封。马蒂的美学哲学观体现为个人的痛苦和折磨总是能够代表与和谐共生的理想背道而驰的生活所产生的全民的痛苦。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主人公具有坚决抗恶的信念,以及诗人们常用的自我牺牲主题,即对本该幸福的人们充满同情的、人道主义的态度。马蒂的美学哲学世界观通常以象征的方式出现,如他的诗歌系列《伊斯马埃利约》。《伊斯马埃利约》以独立诗集的形式于1882年在纽约出版,印刷数量有限,仅供熟人和朋友阅读。然而它在艺术圈中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并被认为是南美诗歌的新声。

《伊斯马埃利约》是马蒂献给儿子的诗集。在与妻子分别后,他迫于颠沛流离的生活困境而与儿子分开。位于这一诗歌系列中心的是父子的关

系，通常被解释为是《圣经》神话中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故事的翻版，即父亲为崇高的理想和义务（这里指解放者的义务）献出了儿子。然而诗歌所要表达的远超出了寓言的框架，它是表现诗人对待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态度和戏剧化人生境遇中所产生的情感、思想、形象的复杂组合。它的形象体系建立在象征性的转化和中心形象——化身道德、善良和人类存在理想的可爱纯洁的孩子——的变换之上。这既是具体的顽皮快乐的孩子，又是鼓舞抒情主人公进行与邪恶的抗争和创作的“小王子”、“带翅膀的骑士”。

诗人拒绝按照传统把缪斯塑造成美丽的女性，而是把带着翅膀的“温柔的小淘气鬼”当作是灵感的象征。在缪斯的世界中畅游的孩子时而化身带着翅膀的风，时而化身雪般的白鸽（《在我的肩头》）。这个道德、纯洁、富有灵感、和谐的世界与充满邪恶、痛苦、背叛、下流的世界相对。勇敢、纯洁、不畏邪恶却又弱小无辜的“带翅膀的骑士”与黑暗世界的碰撞带来了戏剧化的效果。两个世界的对立不仅体现在纯洁的道德性上，也体现在它的社会思想性上。禽兽恶魔般的人类世界是被“黄色的上帝”（《我的小王子》）——即金钱所主宰的。

这种史诗般的激情与作为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马蒂的生活目标以及他对文学使命的高度理解紧密相连。这正体现在他写于 1878—1882 年（出版于 1913 年）的《自由的诗》和写于 1882—1891 年（出版于 1933 年）的诗集《流放的花朵》之中。

正如马蒂在前言中提到的，《自由的诗》产生于“巨大的恐惧和伟大的希望，对自由的不可战胜之爱和对美的哀伤之爱”。毫不掩饰和真诚的痛苦（“诗歌的真诚有时令人感觉愚蠢”）成为马蒂的创作格言。在这个诗集中用痛苦这种抒情感受所呈现的内容范围有所扩大，私人的感受与公民的感受相融合，诗人精神世界中最微小的变化也与社会生活相呼应。马蒂的创作题材较之以前也变得更加宽泛。诗人走出以道德为主的范围，从思想解放、革命氛围和对西班牙统治下的古巴悲惨命运的思索中找到了新的题材。

在诗人那里，人类和谐共生的理想与全人类的、民族的劳动生活相连，和“见钱眼开”、漠视“与土地共生的交响曲”的富人世界截然对立。作为反暴政诗人，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与争取社会解放的斗士形象相结合。在《铁》中诗人把自己看作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呵护大地母亲，期盼公平的到来。

从诗集的题目中就足见作者对自由的热爱和对诗歌感受的开放态度，他拒绝一切妨碍完整真诚的自我表露的元素。与《流放的花朵》中的许多诗篇一样，这部诗集的作品以古老的西班牙十一音节自由诗，帮助作者动态地、深刻地传达苦难的所有参数。诗人“真诚的愚蠢”成为自由奔腾的形

象之洪流，他试图在复杂的句式和韵律中传达感情和观点的色调。这一系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思考生活悲剧、思考祖国苦难及悲伤和牺牲性的诗歌使命的自由诗人形象，如《断裂的翅膀》、《带翅膀的碗》等诗篇中的形象。诗人本身和他自由的诗篇中都承载着人类和未来世界和平的理想。在诗篇《与华丽浮夸的辞藻抗衡》中，诗歌、真诚、梦想、自由、火焰、精神与矫揉造作、虚伪、黑暗、平庸针锋相对。

然而人用翅膀的一击
横扫这一切。穿过炙热的空气
他飞向高空。作为人他会死
但能成为辉煌明亮的太阳
崇高的诗歌正是这样
也应该这样。正如生活！

586· 马蒂的最后一部诗集《纯朴的诗》(1891)是他诗歌创作的总结，也是他在预感到死亡后留下的精神遗嘱(独立运动领袖马蒂1895年牺牲于一次军事行动)。他毫不犹豫、毫不怀疑地，平静简单地准备死亡。这是一部有特色的抒情日记，展现了诗人的痛苦，综合了他所钟爱的所有思想和感受。对抒情情感的淋漓尽致的刻画与公民爱国主题相结合。马蒂常用的对人类的爱与为解放祖国和人民时刻准备牺牲的英雄主义主题，在这部诗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马蒂的诗歌理想，即“绝对的真诚”，在高度纯粹的形象、韵脚和词汇等“真诚的”形式中得到了回应。为了给寓言式的、具体现实的形象让路，象征在马蒂的诗中被简化，有时完全消失。

我愿那样简单地死去
如同田野里的小草
头上不是蜡烛而是星辰
安息之所便是大地

忏悔和训诫性的主题令《纯朴的诗》具有“民族智慧之书”(埃尔南德斯语)的美誉。同时诗集是马蒂在1891年的随笔《我们的美洲》中创立的“美洲主义”在诗歌上的呼应。在这篇随笔中，马蒂在美洲帝国主义扩张前夕写下了西班牙语圈美洲的历史和血的统一，强调了“美洲主义”的基础——新型人类社会的理想，即反资产阶级、民族性和人道主义。

马蒂充满人道主义和解放热情的创作对拉丁美洲文化事业的从事者们

起到了深远和积极的影响。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登上文坛的新流派诗人们，从马蒂和他宣传精神独立思想和新艺术原则的抒情政论文中吸收了养分。

然而在与马蒂同时代的诗人和晚辈诗人的创作中，却缺乏这位古巴革命家所特有的世界观的完整性，在他们的美学中经常登场的是社会批评和对小资产阶级的抵抗，在周围世界之外——古代、异域东方、日本、"彬彬有礼的法国"中间进行"对美的寻找"。然而尽管世纪末西欧颓废派文学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情形特点使得这里的文学延续着集体主义的激情。从西欧艺术宝库中借鉴来的很多元素，都被拉丁美洲诗人用来当作表现年轻民族创作传统特色的手段。沉浸于精神世界和"象牙塔"里，在与落后的拉丁美洲现实相反的远方世界中寻求美，成为了很多知名诗人创作中对人道主义追寻的矛盾形式。

墨西哥诗人曼努埃尔·古铁雷斯·纳赫拉（1859—1895）在反对愚蠢的物质主义和颓废美学观念方面与马蒂相似。在以艺术精湛著称的很多散文作品中，纳赫拉提出，在资产阶级唯利主义腐蚀的世界里，"纯净的美洲"应该成为纯净的精神世界的守护地。他在美中找到了抗衡这个世界的力量。然而有时对美的崇拜在他那里成为对形式美的崇拜，绚烂的结构成为过分的修饰。"像纳赫拉一样写作"成为当时流行口号，传遍整个美洲。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他于1894年创办的《蓝色》杂志，这里刊登了许多优秀的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其中也包括何塞·马蒂。

极富特色的古巴抒情诗人胡利安·德尔·卡萨尔（1863—1893）体现了现代主义的广度。得到魏尔伦高度评价的卡萨尔的艺术世界充满了极度的沮丧、现实中信仰的缺失甚至对信仰的厌恶。与"撒旦体"、对恶的审美相连的波德莱尔对他产生了最大影响。

· 587

诗人将可恨可鄙的现实与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海市蜃楼般的异域世界相对立。深刻的悲观和尤为突出的死亡主题反映在卡萨尔的最后一部诗集《半身像与诗韵》之中。这部作品在他死后才发表。

马蒂的《伊斯马埃利约》对哥伦比亚诗人何塞·阿松森·席尔瓦（1865—1896）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席尔瓦后期的诗歌充满了对生活的悲观感受等未来派的主题。对现实极度敏感的诗人（死于自杀）在充满童话和幻想的童年及精湛奥妙的艺术中，寻找对于祖国扭曲的现实、"世界性悲哀"的超脱。在形式和结构领域，席尔瓦是大胆的开拓者。他的诗歌所具有的音乐性和延展性在西班牙语圈诗歌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他的代表作是为纪念挚爱的妹妹之死所写的《夜曲Ⅲ》。

尼加拉瓜诗人卢文·达里奥是马蒂的同时代诗人中年龄最小的，自称是马蒂精神遗产的继承者。达里奥将马蒂视为自己的导师，是马蒂作品的狂热追捧者。最新研究表明，达里奥的形象修辞手法受到了马蒂很大的影响，同时也糅合了卡萨尔、纳赫拉等人创作的风格。达里奥成为了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名副其实的领袖。

第二章 巴西文学

巴西终于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结束了长达近三十年（在1822年宣告国家独立之后）的国内战争和起义的动乱时期。巴西的君主制获得稳定，国内和平的到来促进了年轻国家文学的长足发展。但是，关于不久前起义和战争的记忆保存了下来，并形成了稳定的革命共和传统，该传统对于巴西民族的自我认识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发生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中的一些起义具有激进色彩和民族特征，从以下名称中可以得知："卡巴那达"（来自于葡萄牙语"简陋小屋"）、"法拉波斯之战"（流浪汉的）。伟大的意大利革命家朱塞佩·加里波第参加了最后一次起义，此次起义宣告了巴西南部共和国的成立，共和国与王室的军队在激战中僵持了十年。尽管起义失败，保守的巴西君主制保留了许多殖民制度的特征（黑人奴隶制、农民和大地产主大庄园主半封建的从属地位、经济的依赖性特征），但是共和和自由的理想之光照亮了之后的民族精神旅程。这些理想是在最初数十年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逐渐形成的。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巴西，浪漫主义展现了独特的面貌。在培育民族意识的探寻之路上，浪漫主义作家将印第安人视作巴西民族自古以来的一部分。一种被称为"印第安主义"的文学流派产生。第一个印第安主义的诗人是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迪亚斯（1823—1864）。《美洲组诗》收录在他的《诗歌初集》（1846）中，《诗歌二集》（1848）和《诗歌末集》（1851），以及长篇叙事诗《廷比拉人》成为众多诗人模仿的对象。何塞·德·阿伦卡尔（1829—1877）于1856年在《里约热内卢日报》上以杂文形式刊登了长篇小说《瓜拉尼人》，开启了散文中浪漫的印第安主义。第二年，成书出版。之后，阿伦卡尔继续创作了两部印第安主义的长篇小说——《伊拉塞玛》（1865）和《乌比拉雅拉》（1874）。印第安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当时大部分巴西作家的实践。但是，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的诗歌和阿伦卡尔的长篇小说不论在文学造诣上，还是在美学理念上，都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以及后继人的作品。被列入印第安主义的浪漫主义作家恪守着自己的使命——为祖国贡献民族文学，它能帮助人们感受到这样的事实：巴西自身

是一个有着统一历史,有着自己的传统、神话、民俗的民族。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的诗歌劝导巴西人不要将印第安习俗视为奇特的迷信,而应视为祖先的风俗,每个人都应该知晓和尊重。《美洲组诗》中大部分都是独白,来自印第安战士、被心爱人遗弃的印第安女人、萨满巫师等等。这些诗歌的独白性特征具有本质意义:贡萨尔维斯·迪亚斯试图让印第安人发声。诗人渴望从内部再现印第安人的感受方式、接受特点和信仰结构,并破解专属于他们语言的形象创造逻辑。贡萨尔维斯·迪亚斯诗歌中的热情源于他对祖国美景的迷恋、对自古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高尚人格的崇拜,以及对它的风俗干净、纯粹的欣赏。每一个巴西人自童年起都可背诵他那首《流放之歌》,这也成为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国歌。

何塞·德·阿伦卡尔在更大程度上展开和论证了印第安主义的思想和美学纲领。他的第一个文学宣言是评判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塔莫约人的联盟》(1855—1856)的一系列文章。阿伦卡尔坚信,那些以殖民化国家中的事件、印第安人与占领者之间最初的相遇及冲突为素材的作家,应该对事件的场面作宏伟性描述,而塑造的英雄印第安人应该与荷马的英雄相似。阿伦卡尔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伊拉塞玛》和《乌比拉雅拉》都是根据印第安传说改写而成的;《瓜拉尼人》融合了传说和历史长篇小说的特性,中间引用了确定的时间(1604)和地点(巴西的东北部),借用了历史编年史中真正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和事件。巴西殖民化局面的许多特征在长篇小说中都得到了准确的展现(新地主掠夺者的霸道、与当地部落的血腥冲突、从葡萄牙聚集到新大陆的探险家疯狂地敛财,等等)。但是,阿伦卡尔有意识地掩盖了历史进程中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之前国家的主人转变为贫困潦倒、受人鄙视的贱民,这部分史实被搁置。处于阿伦卡尔长篇小说中心位置的始终是印第安人和白皮肤姑娘以及印第安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恋情或者友情。《瓜拉尼人》的主人公印第安人以崇高的情感喜欢着葡萄牙贵族安东尼奥·德·马里斯的女儿塞西莉亚。他的高尚气度和英勇气概得到了同样高尚的安东尼奥老爷和阿尔瓦罗先生的认可。《瓜拉尼人》的反面人物是以发财为目的来到新大陆的冒险家罗列唐诺一帮人。佩里和品德高尚的葡萄牙人之间的兄弟情谊正是要反映两个种族融合的思想,对于这部分葡萄牙人而言,巴西已成为他们的故乡。在《伊拉塞玛》中,同样的观念分别体现在葡萄牙武士马尔丁和伊拉塞玛的恋爱中,他们的儿子莫阿西尔的出世中(在印第安人的方言中,图皮人即“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人”)以及马尔丁和印第安人波蒂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中。在《乌比拉雅拉》中,同样的观念以两个敌对部落联合的传说形式展开:“他们两个部落享有同样的声誉,联合成一个强大的民族,河流、山脉、森林汇

聚到一起。”

从这个进步思想的角度可以理解印第安人形象的现代化。阿伦卡尔与其他印第安主义践行者与其说用现代化改进了印第安人的行为，不如说对其行为的内在根据进行了现代化阐释。在真实可靠地描写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的同时，作家们希望找到他们每一个行为对应的道德范畴和内心活动，而且这些在十九世纪的人们眼中必须是正面的，换句话说，即按照欧洲精神文明准则的要求，对印第安人形象进行高尚化处理。阿伦卡尔与贡萨尔维斯·迪亚斯并没有掩饰印第安人所造成的人类的牺牲，然而，他们旋即说明，支配自身写作的始终是对印第安人军人气概的钦佩（在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的长诗《伊·尤卡·皮拉马》中，方言中“图皮人”意味着“光荣牺牲之人”）。印第安主义者将自己对爱情、对忠诚、对骑士气节的理解寄托在印第安人身上，只有在个人同原始集体分离的时期，这些品质才能在人类社会中形成。在殖民地时期，巴西的印第安人处于原始社会制度相当早期的阶段。

589· 在对印第安人的心理建构进行现代化处理的同时，作家们利用当时民族学的资料，力求忠实描绘。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编辑出版了第一部《图比语字典》。阿伦卡尔利用文献精细地论证自己的著作，他援引研究者和旅行者的资料，细致地描写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日常器具、风俗和宗教仪式。印第安主义者特殊的困难是转译印第安人的语言。贡萨尔维斯·迪亚斯按照自己对印第安人亲近大自然以及他们内心世界的观照，建立了印第安人语言的形象性，因此，他诗歌中的形象有时显得过于精巧和象征化。阿伦卡尔选择了另一个方向，他从印第安人的感觉中提炼转喻，为此他利用了地名、动植物名称、复合词、词源学资料。阿伦卡尔在这些自然的语言隐喻中构造了人物。“这本书（阿伦卡尔指的是《伊拉塞玛》）是经验或者形象的汇总。其中实现了我对民族文学的设想，你们在此发现的诗篇是巴西化的，它是从方言中成长起来的。”

在浪漫主义作家印第安主义者的创作中形成了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性，这被随后的巴西文学所继承：阿伦卡尔和贡萨尔维斯·迪亚斯认为，巴西的自然是民族情感最高意义上的化身。迪亚斯写道：“……大自然是纯净的、伟大的、崇高的，看起来几乎是完美的。”因此，在巴西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大自然成为文化独特性的源头和镜子。这是新生国家的第一个真实存在，人们将其视为共同的财富。浪漫主义作家在巴西的自然中体现的不仅是美学理想，还有道德伦理理想。它的雄浑、辽阔、强壮的生命力，就是浪漫主义作家观念中人和社会的原型。在阿伦卡尔所有的著作中（不只是印第安主义式的，还包括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长篇小说），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自由简单的生活比城市生活更具吸引力，后者被阶层偏见所拘囿，背负着一成不变的欲望。巴西人构想了独特的形式以表现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试图建立一种可以体现其艺术理想的生活，其中欧洲社会中最富有道德规范的传统（体现在崇高骑士的虚构形象中）和被欧洲人所遗忘的自由、与自然的亲近（体现在印第安人的理想化形象中）和谐相融。

阿伦卡尔创作了二十部小说和六个剧本。在他的著作中展示了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巴西的过去，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的最初接触，殖民社会的历史（《银矿》、《耶稣会教士》），最后是宣布独立之前的时期。他在长篇小说中所展现的巴西大部分地区在日常生活结构方面极具独特性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加乌乔》(1870)中描绘了祖国的南部，《腹地人》(1875)描绘了东北部。这是阿伦卡尔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在巴西文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发起了一个全新的文学运动——"腹地主义"，该思潮脱胎于浪漫主义，但是之后演变为对生活的现实主义刻画。随着殖民化过去逐渐成为历史，文学开始呼唤新的主人公，他是民族独特性理念的承载者；文学同时也需要可以展示国家当代现实的人物，所指的现实就是印第安人要么已经被同化，要么被排挤到遥远的外省，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参与民族生活。阿伦卡尔通过腹地人的形象创造了全新的主人公，腹地人是生活在腹地（巴西内陆草原地区）的居民。腹地人通常都是混血儿，他们自古以来就吸收着印第安文化和葡萄牙文化。他们长期与自然灾难抗争着，唯有对自然的爱和尊重才使其得以存活下来。除此之外，只有在远离沿岸、移民不易到达的地方，还保留着专属于第一批移民的生活方式、习性，甚至是古老的语言。这曾经是最真实的，是自古以来属于巴西的，它长时间抗拒着大规模欧洲移民的同一化影响。故农民—腹地人被推至巴西文学道德范型的位置。阿伦卡尔的长篇小说是最优秀的，同时也是最后的腹地主义式浪漫主义作品。在其他腹地主义者的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已经占上风，尽管其中还保留有浪漫主义的情节构思。在过渡阶段（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众多的作品中，阿尔弗雷多·德·埃斯克拉格诺尔·陶恩斯特的长篇小说《伊诺森西亚》独树一帜。

何塞·德·阿伦卡尔在巴西散文的创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主要依赖的是沃尔特·司各特的经验，其次也参考了夏多布里昂的创作。但是，在这些年中，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巴西小说模式的尝试也颇有成效。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德·阿尔梅达(1830—1866)将目光转向了更早期的文学资料——西班牙、葡萄牙的长篇小说。他从葡萄牙长篇小说中借用 · 590

了结构和主人公，这些构成要素组合了对里约热内卢日常生活零散的、杂乱的观察，同时进入这个观察视界的还有出现于刚刚建立的、喧闹的国家中的人物类型。在阿尔梅达的长篇小说《军士莱昂纳尔多的一生》中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纠葛、强烈的感情、秘密和危险，而这些元素对于阿伦卡尔的著作及其流派而言却是典型的。这部作品于1852年开始在报纸上连载，1854—1855年，成书出版，但它很快便淹没在《瓜拉尼人》成功的喧嚣中。直到二十世纪，《军士莱昂纳尔多的一生》才获得公正的评价。

西班牙、葡萄牙的长篇小说不仅描绘了一幅关于旧世界的讽刺性画卷，还以皮卡尔的形象为例透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巴西流浪汉小说的作家绝不缺乏社会批判态度：他嘲笑古时荒诞的风俗，贪财和打官司之风，以及富人的虚荣心。但是，作家在巴西的现实中找不到材料以对现代人类性格以及形成过程中社会的作用作批判性分析。莱昂纳尔多的遭遇构成了小说自由、平实的情节，直到故事结尾，他依然是善良的、老实忠厚的、顽皮的人，他是巴西欢乐大街的自由之子。阿尔梅达小说的总基调完全不同于西班牙的流浪汉模式，不是苦涩讥讽的，而是明亮和喜气洋洋的。阿尔梅达将历史与日常生活作对比，将特殊情况与寻常事件作对比，不论他的美学纲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浪漫主义的背景下看起来是多么新奇、独特，总之，在思维结构上，他仍旧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浪漫主义世界观首先体现在对民族、巴西的热恋中。阿尔梅达总是（即使在嘲笑时刻）欣赏着自己的城市、居民以及风俗的独特和美丽。

阿尔梅达与印第安主义者一同被划归到浪漫主义作家的特殊组群，在巴西通常被称为“第一代”或者“最老一代”。他们认为，民族自我意识是国家快速发展的保障，而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创建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塑造理想人物，其中种族要和谐共处，文明要回归自然，旧世界的社会恶习必须根除。但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了所谓的第二代浪漫主义，它既不赞成民族自我认同的积极热情，也不遵从其文学前辈代表性的空想主义。这一代绝没有放弃为独立而战的英勇精神，只是将它作为失落的、已经不可实现的理想移至过去（如阿尔瓦雷斯·德·阿塞维多的长诗《佩德罗·伊沃》等等）。现在，他们看不到任何力量、斗争、思想的闪现，他们在巴西社会死气沉沉、土里土气而庸俗的氛围中烦闷至极，而如此这般的社会境况出现在十九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自由运动遭受镇压之后。

阿尔瓦雷斯·德·阿塞维多（1832—1852）、路易斯·若泽·戒克拉·弗雷雷（1832—1855）、卡济米罗·德·阿布雷乌（1839—1860）不仅在世界观和文学纲领方面具有共同性，而且命运也很相似。他们都和大学圈子有关联，这点可以由从他们诗歌中感受到的多种文学影响得到证实。但是，

与此相伴随的还有生活阅历的艰辛和酸楚，这种感受通过他们诗歌中的封闭式抒情传达出来。他们都英年早逝，这同样反映在他们诗歌的主题中，尤其是三人中天赋最高的阿尔瓦雷斯·德·阿塞维多，他唯一的一部诗集《二十年的抒情诗》在诗人患肺结核离世后才出版。他们诗歌的基本情调是希望的幻灭、梦想稍纵即逝的苦涩。阿尔瓦雷斯·德·阿塞维多以悲剧的笔调抒发少年的忧伤，笔下的少年体验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只是在幻想中)，如爱情、奇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死亡一步步临近的感知与对平淡生活乏味枯燥的理解有机地结合。这些感受的冲突使得少年有时陷入病态的绝望，有时恶毒地嘲笑"浪漫的孤岛"和"爱情的乐园"，这里的孤岛和乐园是由少年和诗人的想象力所虚构的。

卡济米罗·德·阿布雷乌在忧郁的情调中感受着现实与梦想的错位。他的理想是穿梭在家乡巴西的田野和花园中的童年时光。巴西人格外喜爱阿布雷乌诗集《春天》中的诗歌以及《我八岁那年》，前者被认为模仿自贡萨尔维斯·迪亚斯，后者语调亲切，音调和谐，二者都成为文选作品。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诗人属于拜伦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影响下的巴西浪漫主义界。阿尔瓦雷斯·德·阿塞维多进行了新颖的浪漫主义散文实验，尽管并未完成，包括神话色彩浓厚的短篇小说集《小酒馆之夜》和含有浪漫主义心理分析元素的《马卡里奥》对话片段。

· 591

六十年代中期，巴西社会中出现了新的动荡迹象。奴隶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竭力维护大庄园主奴隶主特权的帝制严重阻碍了社会进程。知识分子小组出现，他们宣传最先进的欧洲思想。当时最著名的团体是在累西腓大学，以未来伟大思想家托比亚斯·巴雷托(1837—1889)为中心组建的，他勇敢地攻击宗教的蒙昧主义，他也是首个向巴西知识分子介绍德国唯物主义的人。在"大学生时代"，这个小组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杰出的诗人安东尼奥·卡斯特罗·阿尔维斯(1847—1871)。

阿尔维斯为巴西文学引入了激昂的音符。他的诗歌具有号召性，被公开宣传，适于在人群聚集的大会和喧闹的广场上朗诵。阿尔维斯是共和以及废奴运动最积极的参与者，同时也是累西腓市第一个废奴主义协会的组织者。在世期间，阿尔维斯仅出版了《浮沫集》，但是，在其去世之后，他的诗歌分别被收录进《保罗·阿方索的瀑布》(1876)、《奴隶集》(1883)、《赤道赞歌》(1921)。这些诗歌因诗人的公开朗诵而为同代人所知晓，手抄本也广为流传。废奴主义和共和主义是阿尔维斯狂热激情的两个组成要素。在其众多抨击奴隶制的诗歌中，《黑奴船》是代表作。这首诗建构在自由的海洋空间和甲板上"但丁笔下的地狱"的尖锐对照之上。这是一艘向巴西运送奴隶的船：昨天还拥有自由身的人们今天却沦为奴隶，他们的苦不堪言

的抱怨与诗人激愤的质问前后交替，金绿色国旗遮盖了奴隶主的兽行，作家为此感到屈辱："我的旗帜，你在战斗中的洗礼是多么无谓/你对人民而言却变成了裹尸布！"阿尔维斯废奴主义诗歌的主要语调并不是痛苦、哀怨式的，而是激狂的，它们是对起义的预言。他的诗歌《黑人复仇者》中有这样的诗句："你，复仇的霞光再高些，再高些，红色的处女地再高些"，乔治·阿马杜之后将其作为一部取材于巴西革命运动历史的长篇小说的标题。

在世界诗坛中，阿尔维斯最接近极具舞台热情的公民抒情诗人雨果。他以全新的角度阅读拜伦的作品，称其为"战斗的导师"，而非"绝望的导师"。根据某些创作上的雷同判断，这位巴西诗人应该非常了解并且喜爱亨利·海涅的诗歌和散文。阿尔维斯的风格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节奏断断续续，好像被呛住了似的，节奏模式经常更换，感叹词丰富。富有表现力的描写或者积极的评价间或被猛烈的抨击和直面观众的转向所打断。形象很充裕，几乎总是很高大，并且过分夸张。中间穿插很多《圣经》中的内容。阿尔维斯对民族历史的兴趣同样引人注目。在他的诗歌中出现了众多在巴西为自由而战的英雄，以奴隶起义者（他们曾于十七世纪建立了黑人共和国——帕尔马里斯）为开端。他创作的唯一一部历史剧《贡萨加或米纳斯吉拉斯州的革命》（1868）是专门献给托马斯·安东尼奥·贡扎加的，后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十八世纪末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阿尔维斯的任何一部抒情类作品在十九世纪的巴西诗歌背景下都具有无可置疑的独特性。在作品中，对于爱情没有任何得不到满足的需求，而恰如其分地描写爱情一直是阿尔瓦雷斯·德·阿塞维多的难题。阿尔维斯在其诗歌中坦然地描述着尘世间欢乐的情感。即使是在与恋人分别的戏剧性时刻，在英年早逝的前一天，阿尔维斯的诗篇也在歌颂真真切切的爱情与幸福，而非幻想中的。

阿尔维斯的盟友和追随者在巴伊亚城市创建了一个诗歌流派，他们自称"山鹰派"。山鹰是阿尔维斯钟爱的形象：翱翔于高空是他在诗歌中、生活中的理想。阿尔维斯短暂的创作生涯促成了巴西的浪漫主义雄鹰展翅般的腾飞。

阿尔维斯及其战友的诗歌加强了文学中高涨的废奴情绪。巴西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受欢迎的作品是贝尔纳多·吉马朗埃斯（1825—1884）的长篇小说《女奴伊左拉》（1875），他是高产的、历史题材的浪漫主义作家，也是阿伦卡尔的模仿者。美丽的穆拉托女孩伊左拉被残暴的、卑鄙的庄园主追赶，这个感人的故事经常被称为巴西版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吉马朗埃斯长篇小说中的某些情节转折，看起来参考了比彻·斯托夫人的作品（伊左拉从巴西的一个州逃到另一个州，等等）。《女奴伊左拉》引起了大量模仿。

与废奴主题相关的两部作品在1881年同时出版。它们的面世开启了巴西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阶段，它们是阿卢伊西奥·阿塞维多的长篇小说《姆拉托》和若阿金·马利亚·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这两部作品标识了巴西现实主义形成中的两条路径，巴西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境况和社会气候的某些特征揭示了这两条路径的并存和相互作用。 ·592

在奴隶制君主制瓦解之前的二十年中(1888年，在社会抗议的压力之下，巴西颁布了废除奴隶制的法律；1889年，拥护共和制的军官们逼迫君主退位，离开巴西)，全国出现了各种哲学小组和秘密的共和制协会，成员大体相同。人们反对陈旧过时、墨守成规的旧思想，探寻新的精神支撑，而且这种寻找紧密联系着废奴和反抗君主制运动中的实际任务。巴西社会精神的滞后，体现在真正的科学思想体系和真正的革命体系无法同时赢得人们的重视。然而，矛盾重重的实证主义携带着科学激情和神秘倾向征服了巴西，它拥有狂热的支持者和宣传者。1889年不流血的共和主义政变的领导者正来自于实证主义团体。

在巴西，实证主义不只是哲学思潮或者科学方法，它更多地表现为与天主教教条相抗衡的信仰，它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巴西的大学、中小学和日常生活中。实证主义要求对事实、对现实的关注，考虑本性的客观需求，其中包括人的天性，因此它是社会发展的保障，也是治愈巴西长久以来滞后状态的灵丹妙药。实证主义者促进了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复兴，尤其是向巴西知识分子介绍了达尔文学说。实证主义的广泛传播提升了人们对所有自然主义理论的兴趣，包括文学中的自然主义。资料显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哲学小组聚会中，人们同时谈论着达尔文理论和埃米尔·左拉的小说。

阿卢伊西奥·阿塞维多(1857—1913)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形成的。他是新闻记者、反抗教权和废奴运动的参与者，他是在浪漫主义机械模仿的轨道上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的，但是他很快意识到需要一种新的艺术手法以处理他所收集的生活材料。在写作《姆拉托》的过程中，阿卢伊西奥·阿塞维多俨然已转换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追求典型化和归纳。他加工材料，并且有胆识地组合材料，在省城编年史中添加幻想和口头传说。在拉伊蒙多的爱情和死亡事件中，作者将自己所目睹的真实故事与诗人贡萨尔维斯·迪亚斯近乎神话的爱情传奇结合在一起：作者的朋友是一位出色的律师，在一桩控告贵妇人虐待黑人孩子的案件中他是起诉人，他被奴隶主们和神职人员肆无忌惮地追捕，最后在饥寒交迫中了结此生。贡萨尔维斯·迪亚斯卓尔不群，在欧洲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但是他的

母亲是一个姆拉托女人。虽然他所喜爱的女子的父母是稳重的商人，但是他们拒绝接纳奴隶的后代。两个生命被毁灭了。阿塞维多小说中的拉伊蒙多不是著名的诗人，而是一个刚刚起步、颇有才华的学者。但是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的命运赋予小说家支配人物身份的权利，拉伊蒙多成为先进欧洲文化培育的文明人，相对愚昧的省城社会而言，拉伊蒙多在智力水平上处于无可比拟的高度。

阿塞维多的基本方针无疑是现实主义：他渴望也确实在许多地方忠实地反映了巴西社会历史中的转折时刻。与此同时，在《姆拉托》中不同的文学思潮相互碰撞。作者依然采用了晚期浪漫主义的惯常手法（将阴沉的歹徒迪奥戈神父与集所有善良品德于一身的拉伊蒙多作对比，女奴多明戈斯与庄园主所生的儿子在夜晚同母亲相遇时，却不认得精神错乱的生母，等等）。效果明显的夸张在省城简朴的日常生活图卷中显得很突兀。阿塞维多受到了自然主义的强烈影响。在《姆拉托》中的阿娜·罗莎的形象刻画中，存在着对其行为中的生物冲动因素的强调，并且一再出现对生理学的关注。但是最主要的，也是这个年轻的巴西人最钦佩埃米尔·左拉并向其学习之处，是处理敏感社会主题时的勇敢，即社会批判主义。

在《姆拉托》之后，阿塞维多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其中包括《寄宿公寓》 593· (1884)和《贫民窟》(1890)，这两部作品在现实主义成就方面丝毫不逊色于《姆拉托》。二者描绘了巴西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肖像，他们被那个时代重要的社会冲突所波及。但阿塞维多仍无法摆脱自然主义教条的影响，屈从于自然主义的成规戒律，阿塞维多笔下的人物经常沦为热带环境中悲惨的牺牲品，这个环境承袭着世世代代的酗酒传统和与生俱来的高度敏感性。

自然主义对其他巴西作家创作的影响更显著（如因格莱斯·德·索萨、阿多尔弗·卡米尼亚和儒利奥·里贝罗）。他们的作品，尤其是儒利奥·里贝罗名噪一时的小说《肉欲》(1888)，成为自然主义论题的文学例证。

在巴西文学中现实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巴西作家开始认识、了解讲求实效的自然主义。因此，自然主义对巴西文学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自然主义使得作家对人类内在世界、社会中个体行为动机的观照过于肤浅和庸俗，但另一方面，自然主义赐予巴西文学新的测量维度——社会学，对包含着冲突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现代社会进行深入研究。正是左拉的小说迫使阿塞维多和其他一些巴西散文作家放弃主导的历史题材，转向社会学视点中的现实性。自然主义如此自相矛盾的双重影响并没有削弱或者摧毁现实主义，相反地，它加速了现实主义的形成。在这个起始阶段，现实主义无疑发挥着酵素的作用。

然而，在巴西现实主义形成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在完全不同的影响力作

用下的另一条路径。正如阿塞维多那样，若阿金·马利亚·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1908)也是从机械模仿浪漫主义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的。在马查多写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中，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泾渭分明，他们有着高雅的感受和矫揉造作的语言。但是，作家对主人公内心体验的复杂深入的分析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马查多的基本命题带有自传色彩：主人公期望挣脱周围环境，冲破社会等级制度(马查多是贫穷的姆拉托画家的儿子)。但是，在"生活之战"中取胜的只是精打细算的自私鬼……马查多自学成才，他阅读了许多书籍，在欧洲文学中坚定地寻找着自己的导师。在最初时期，他无比钦佩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在生命接近尾声时，他转向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远离了之前对自然主义作家的探寻。他的视角称不上严格社会学的，他所研究的对象是个体以及在无数次会面、生活坎坷和失望压力下不断变化的人类性格。马查多在成长中的巴西现实主义果树上嫁接了新树枝——他从经典现实主义大师那里所习得的心理分析。

《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1881)是马查多大部头的现实主义小说之一。它是巴西版的《奥勃洛摩夫》，探讨了毫无意义、了无生趣的生活。布拉斯·库巴斯是奴隶制度的产物，这一制度摧残了奴隶主和奴隶的灵魂。布拉斯·库巴斯在个人生活和仕途中都不得志：他的一切感受都很细微、短暂，他无所事事的习性麻痹了意志，扼杀了他萌芽状态的意图和创举。奴隶主的精神赤贫对应着奴隶的精神堕落：他的仆人在获得自由之后，花钱买了奴隶，通过折磨奴隶以发泄自己所经受的痛苦。

马查多的第二部大型长篇小说是《金卡斯·博尔巴》(1888)，这部小说是以《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中的人物名字命名的。这个疯疯癫癫的哲学家构想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依照这种学说，依次发生的、为生存而奋起的战斗是人类生活的必要因素。马查多希望能够展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真实特征是如此远离超时间的、虚幻的哲学理论，这种理论无疑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小说的主人公——偏远地区的年轻人卢比昂，意外地继承了巨额财产。金卡斯·博尔巴的哲学观念激发了卢比昂对个人威力的向往。年轻人坚信，自己正是金卡斯·博尔巴歌颂的成功者。但事实上，在生活中占上风的是那些品行低劣的人。最后，卢比昂破产了，不仅失去了爱人，而且丧失了理智。

马查多小说的外在的"室内性"(有限的出场人物，集中于一个主人公的生活旅程以及他细微的心理和世界观的变化)，并不妨碍读者认识到在一种生活、一种命运的过程中袒露了本质的社会规律，反映着那个时期巴西社会生活的特殊性。通过金卡斯·博尔巴的形象以及他荒诞的学说，作家

批判了实证主义宗教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狂热。嘲讽是马查多的批判方式，也是他的叙述语调。嘲讽尤其揭示了八十年代的巴西浪漫主义作家优先向自斯泰恩开始的英国人学习的风气（《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的反常形式看起来是《项狄传》的体裁变体）。马查多的讽刺充满了苦涩，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消极的冷嘲热讽。马查多所鄙视和抗拒的现代社会道德在他眼中却是永恒的、难于摆脱的。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强烈地影响着作家，表现为马查多小说中厌恶人类的语气。马查多的怀疑论在《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和《金卡斯·博尔巴》中得到了直接体现，有时出现在讽刺性的格言警句中。后来，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小说中，怀疑论好像已经深入到叙述中，溶化在人物的心理图景中。

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巴西的现实主义已经植根于文学中，尽管浪漫主义的程式依旧长时间出现在小说文学中。巴西文学的典型特征——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日常生活描写在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就是所谓的“地方色彩主义”。产生于浪漫主义形式中的地方色彩主义逐渐演变为针对巴西不同地区生活的现实主义研究。文学中地方色彩主义的高峰出现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

第六编　澳大利亚文学

澳大利亚文学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即英国开始对此大陆移民时期。直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澳大利亚文学创作仅限于白人移民。五百种土著部族的语言中有四分之三以上随着部族的消亡而消失。

澳大利亚开发（从1788年到十九世纪中叶它都是英国殖民流放地）的特点，决定了澳大利亚人民族自我意识形成及其文学形成的特点。流放犯中，除刑事犯之外还有政治犯，其中的许多人对早期移民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出版的基本上是纪实的、民族志的、历史的和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其中一些著作，如《威廉·巴克利的生活和冒险》（1852年出版，俄译本书名为《澳大利亚的鲁滨逊》，这是一个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中生活了三十二年的白人苦刑犯写的回忆录）等，至今都不失其认识价值。

服苦役以及艰难的服役之路，是亨利·萨弗里（1791—1842）的《昆塔斯·塞文顿》（1830—1831）和约翰·塔克（1808—1888）的《拉尔夫·莱斯利的冒险》（1829—1845）等长篇小说以及一些特写、日记的基本主题。

所有这些作品在揭示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现实状况时，都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历史问题，建立起澳大利亚散文创作的民族传统。

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显现出澳大利亚殖民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民主的和保守的两大倾向。保守倾向的作家创作作品，主要是面向英国的读者和澳大利亚高级行政官僚阶层。例如迈克尔·罗宾逊（1747—1826），一个因受贿而被流放的英国律师，成为了新南威尔士总督身边的宫廷诗人。他在《悉尼报》上发表了许多献给王室成员的颂诗。诗人兼政治活动家威廉·温特沃斯（1791—1872）以乐观精神歌颂澳大利亚未来会成为繁荣昌盛的"新不列颠"（长诗《澳大利亚颂》，1823年）。查尔斯·劳克罗夫特

(1771—1850)的《殖民地的故事,或移民者的冒险》(1843)、《寻找殖民地的移民乔治·梅福特》(1851)等作品,模仿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充满大量的浪漫冒险和澳大利亚奇异的生活图景,留下了对宗主国的社会历史和心理上的依赖性的印记。这些长篇小说有助于"幸福的澳洲"是人间乐土的资产阶级神话的形成。

澳大利亚民主阶层思想观点最重要的代表,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诗人查尔斯·哈珀(1813—1868)。作为爱尔兰苦刑犯的后代,他怀着儿子的情思,把澳大利亚土地看作是父亲"永恒安宁之地",看作是"自由的摇篮",并且幻想有一天"所有人平等地、骄傲地站在广阔的天穹下"。哈珀的公民诗歌汲取了弥尔顿和早期华兹华斯的反叛激情。在评价哈珀在民族诗歌史上的地位时,澳大利亚的评论家们指出,是他奠定了将英国诗歌传统应用于澳大利亚现实的基础。

哈珀庞大的文学遗产公开发表的不多,也不是最好的(《思想录:十四行诗集》,1845 年;《丛林大盗:戏剧和诗歌》,1858 年;《诗人避难所》,1862 年;《梦幻城堡》,1865 年)。而绝大多数的作品(二十五卷手稿)保存在悉尼的米切尔图书馆。哈珀的诗歌是澳大利亚民主主义文学的起源。

在正在形成中的民族文学民主分支的萌发阶段,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澳大利亚远离海岸的内陆的丛林。

丛林是民族传说的摇篮,许多艺术家从中吸取了自己作品的故事情节。民间口头创作中表现了苦刑犯、农业工人、淘金者的社会精神和审美追求。其最有代表性的体裁是歌曲和谣曲。

这些歌曲和谣曲多种多样,部分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引入澳大利亚的,部分是移民们创作的,既有偷盗者之歌(如《少年小偷之歌》),也有类似《群马山中》一类的天真的抒情歌曲,还有水手冒险的歌谣(《麦基·麦依》、《美国水手之歌》)。苦刑犯所唱的诸如《波塔尼·贝》、《凡·戴蒙的土地》、《莫顿·贝》、《反叛的移民》等歌谣,是对用奴役锁链禁锢精神自由的人们的社会发出的挑战。这些谣曲常常是伦敦街头歌谣和爱尔兰"反抗歌曲"的再加工。

歌谣中最有意义的是一些描写丛林大盗(侠盗)的系列歌谣。在澳大利亚民族文学以后的各个阶段,许多进步作家把许多侠盗形象当作澳大利亚人民主理想的象征。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了澳大利亚英国殖民史上的新阶段。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发现黄金储藏(1851)所引发的"淘金热",推动了经济的迅疾发展,带来了大量的移民。这导致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国内阶级分化

的加剧。强大起来的澳大利亚资产阶级取得了殖民地处理地方自治事务权力的扩大、宗主国保护权的限制。

1854年淘金者自发的起义，提出了针对澳大利亚的现实修订的宪章运动纲领，成为人民革命传统的摇篮。在五十至八十年代酝酿的那些经济和政治前提，导致了九十年代劳动和资本在澳大利亚、在联合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和予以其独立的斗争中的全面对抗。

这些年代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进程促进了澳大利亚文化在艺术方面的自我确立。在民族思想的形成中起到相当重要作用的是一些定期出版物。进步文学力量的中心是《公报》周刊(1880)，它领导了人民争取自由艺术权利的斗争。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是澳大利亚文学的求学时代，但是已经有了可以感觉到的独立审美思维的表现，有了对其艺术体现的民族素材和民族原则的探索。在这一阶段，澳大利亚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体现了强大民间文学传统的诗歌。

十九世纪下半叶文学进程的基本特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形成，二者相互共存，有时又汇聚为一个艺术整体。

浪漫主义的艺术创作观念，其对自我个性肯定的精神追求，符合澳大利亚人在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心理、思想情绪。这一时期的生活非常动荡，充满紧张的对抗、人的命运的悲剧性转折、对新土地上新机会的期待、对澳大利亚社会政治发展特殊性的幻想以及与资本主义现实矛盾激化相关联的失望。

澳大利亚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发展，不仅是社会历史因素决定的，而且也是英国浪漫主义美学影响的结果。

澳大利亚民族现实主义萌芽的土壤，是其开发时代的客观现实：是普通劳动者英勇的努力、意志和勇气造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澳大利亚民间文学在口头故事、丛林歌谣等体裁中，记录了澳大利亚人民的生活画卷和人民性格，成为民族文学现实主义倾向发展的催化剂。

在“淘金热”时代，广泛传播的是人种学(研究人们的习俗、性格和习性)性质的谣曲(如《比利·巴劳在澳大利亚》、《勤快的澳大利亚人》等)。身为淘金人的流浪歌手查尔斯·泰彻(1831—1878)所写就的日常歌曲，讽刺性地刻画了维护富有者权利的警察，其讽刺诗的锋芒也指向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当局(《你们的许可在哪里?》)。也就是在这些年代，从民间口头文学谣曲中发展出一种所谓专业创作的歌谣。这些歌谣的主人公多种多样，但却有共同的职业或社会特征。其作者有牧人、剪羊毛工人、驯马人、水手

·597

等。专业歌谣的创作者大多是半匿名的,作品印刷出版时有姓名缩写或化名。"丛林歌谣"从口头文学性质的抒情叙事体裁进化为文学体裁。

第一个掌握了民间诗歌创作所产生的主题和形象的澳大利亚诗人是亚当·林赛·戈登(1833—1870),他二十岁时从英国来到澳大利亚。戈登的创作方法形成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斗争之中。浪漫主义美学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戏剧体长诗《阿斯塔尔忒》(1867)以及第一部诗集《海沫与烟环》(1867)中。在其第二本诗集《丛林歌谣与跃马曲》(1870)中,现实主义倾向占了主导。

诗人的道德伦理和哲学美学观点是折中和矛盾的。其中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到勃朗宁美学观念的影响。但是,尽管他的诗歌中存在维多利亚式的理想,诗人还是一直在自己的意识中尝试克服这些观念,以寻找新的积极价值。戈登道德观念的基础是澳大利亚丛林人的伦理信条,其主要原则是勤劳、互助、做人的尊严和勇敢。除沉思体抒情诗外,戈登还创作了大量歌谣。

在发扬歌谣诗学传统创作原则、借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创作经验(《罪人》、《潺潺溪水》、《疲倦的路人》等)的同时,戈登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行。作品集《丛林歌谣与跃马曲》收录的一些歌谣(《患病的牧人》、《翻船之后》、《我们如何超赶爱马》、《狼与猎犬》),其基础便是澳大利亚丛林人戏剧化的生活。在这些作品里,戈登也利用了澳大利亚口头歌谣。最接近口头文学传统的是《患病的牧人》,在这首歌谣中,传统的民谣风格与抒情诗特性结合到了一起。民间诗歌所特有的富有弹性的节奏,通过戈登的诗歌渗透到澳大利亚诗歌中,构成了民族诗歌歌曲自由体结构的基础。与民族民间文学相联系,决定了戈登的诗歌具有民主主义特点,这一民主性在后继者更加具有尖锐的社会性的创作中得到强化。在将英国经典诗歌和澳大利亚口头文学传统相融合方面,戈登指出了一条将丛林歌谣进化为澳大利亚一种文学体裁的道路,决定了澳大利亚诗歌的走向,直到十九世纪末。

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是诗歌经验积累的时代。这些经验与一群模仿戈登而又没有在文学发展中留下明显足迹的诗人的活动密不可分。这些诗人的作品收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生活让人想起的澳大利亚歌谣和长诗》(1888)这一诗集中。只有巴克罗夫特·鲍克没有继承戈登的传统,而是大大扩展了对澳大利亚生活的艺术掌握的范围,创造了思想歌谣体裁,他著有谣曲集《在死者安息之地,以及其他一些诗作》(1897)。

鲍克的所有谣曲仿佛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作品,其核心是一个接着一个替换的戏剧场景,真实再现了澳大利亚现实生活的英雄精神和戏剧性。作品的主要角色是普通的澳大利亚人:一个牧人死在酷热的草原上一处干涸

的水洼旁(《在死者安息之地》);一个永远留在荒漠的流浪工人,一生颠沛流离,从澳洲大陆的一端被赶到另一端去寻找工作(《来自遥远的西方》);一个剪羊毛工人在连连暴雨后咆哮的河床中找到最后的安身之地(《顺流而下》)。然而,鲍克还是没能明白其同时代生活社会矛盾的根源。他的诗歌思考的特点是悲观主义,病态地集中在死亡主题上。

亨利·肯德尔(1839—1882)的诗歌走的是另一个方向。他的浪漫主义与民主主义传统没有联系,丛林所诞生的民间诗歌主题和形象与他的诗歌格格不入。"遁入大自然"寻找与自然界的抒情性的融合,是他全部三本诗集(《诗与歌》,1862 年;《来自澳洲森林的树叶》,1869 年;《大山之歌》,1880 年)的基本主题。在其作品的风格、语言中,在诗歌话语的组织中,明显感觉得到来自"湖畔诗人"以及雪莱、爱伦·坡,还有丁尼生和斯温伯恩的推动。肯德尔指明了一条在澳洲的条件下重新思考欧洲文学传统之路,用诗歌的形象性丰富了澳大利亚人的艺术意识。澳大利亚宏伟而独特的大自然赋予诗人的主观情感世界以一种民族色彩。肯德尔笔下的风景充满了哲理,有时是神秘主义的内涵。在发展澳大利亚拓荒者英雄主义主题的同时,肯德尔在其中突出了与自然搏斗、令人疲惫不堪的渴望、远离绿洲的死亡等方面,这让他能表达出徒劳无功地寻找美妙乌托邦所带来的痛苦,以及内心世界的不和谐(《群山》,1862 年;《布卢河》,1865 年;《莱卡特》,1888 年等)。 ·598

澳大利亚文学一条特殊的、独立的路线的代表,是亨利·劳森(1867—1922)的公民诗歌。他的诗歌是澳大利亚革命者们发出的最早的、还不自信的声音。劳森用进行曲节奏写就的纲领性作品(《街上的面孔》,1888 年;《后方大军》,1888 年;《社会主义者颂》,1889 年),表达了时代跳动的脉搏。这些作品具有高度炽热的革命激情。诗人对未来的思考渗透着社会乐观精神。同时他笔下的抽象形象中显现了诗人社会理想的不确定性。对社会政治变革的急迫期待,催生了劳森诗歌的宣言性,他的诗充满过多的演讲言辞、标语口号。激昂诗歌、进行曲中的革命人道主义与诗人的民族爱国主义追求结合在一起(《南方之子》)。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与意识到自己是新澳大利亚一分子(到七十年代末,百分之六十三的殖民地居民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的自我确立的个体思想日益发展的同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也在发展。

在亨利·金斯利(1830—1876)的长篇小说《杰弗里·哈姆林回忆录》(1859)中,包含着一整套移民者们所具有的美学和社会思想,这些移民者忠诚于不列颠,被"幸福的澳洲"是"无限可能性"的国度的资产阶级神话而

吸引到澳洲大陆。

罗尔夫·伯德伍德(笔名为托马斯·亚历山大·布朗,1826—1915 年)也用同样的情调从事写作,他将已经成为过去的圈占土地时期的澳大利亚理想化。同时伯德伍德的长篇小说《飞升与坠落》(1878)、《武装抢劫:澳大利亚丛林与金矿生活与冒险史》(1888)、《殖民地改革者》(1890)、《采金权》(1890)等,中篇小说《萨克斯在悉尼》(1891),是澳大利亚小说形成的新阶段。尽管情节具有冒险文学所特有的假定性,这些作品还是清晰地再现了时代特征、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图景,其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对现实主义地研究澳大利亚现实的追求,对把十九世纪后半叶澳大利亚的个别现象与国家社会生活相联系的追求。

类似的倾向,与将形象个性心理化的尝试相结合,也在不同程度上作为创作方法,体现在卡塔琳娜·斯宾斯(1825—1910 年;著有《克拉拉·莫里森:淘金时代南澳的故事》,1854 年),以及露丝·坎贝尔·普莱德(1851—1935 年;著有长篇小说《政治与情欲》,1881 年)的作品中。

艺术掌握澳大利亚人民的历史和心理经验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是马克斯·克拉克(1846—1881)的《无期徒刑》(1874 年;俄译本名为《英国苦役》,1903 年)。这部充满情节剧场景的冒险小说,再现了当时英国苦役犯在澳大利亚的真实生活景象,揭露了反人道的英国法律手段。这部小说促进了澳大利亚国民自我意识的觉醒。

总之,十九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已经奠定了促进澳大利亚文学的自发形成的诸多美学基础。

第七编　近东及中东文学

本编序言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本地区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从十八世纪初即开始的社会及文化革新进程仍在继续。出现了新的印刷厂、期刊及一批中高等院校。在世界市场的影响下，金钱商品关系活跃起来，农业出口总额增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素继续积累。

欧洲的成功经验促使如土耳其、埃及、叙利亚等国家理解了社会政治机构的意义。因为相互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改变，在世界舞台上，本地区的国家只能通过对国家机构经营管理及军事部门组织的方式进行理智的重新审视，来抵抗欧洲不断迫近的重压。在对落后的封建制进行改革的进程中，欧洲模式尽管有许多积极的方面，但未被作为典范而全部照搬。在东西方一系列相关联因素的复杂的相互影响过程中，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形式综合了起来。

这种结合带有此地区国家发展特点所具有的独特性。在西欧，资产阶级是由与封建主长期斗争的自由市民发展而来的，而在十九世纪的近、中东地区，如苏联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情况大不相同。此地区的资产阶级主要由商人发展而来，他们的利益与封建主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存在，便可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此地区的封建贵族阶级的地位如此牢固，去除旧秩序的斗争方针总是执行得缓慢且不彻底，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在进行政治及社会改革时总是犹豫不决，以及为什么已经经过有特色改造的传统因素仍在本时期的精神文化革新中起着那样举足轻重的作用。

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政治性历史。对于像土耳其、埃及和叙利亚这样经历过较为持续的经济及文化繁荣时期的国家来说，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

年的发展停滞及封建反动势力的崛起具有典型性。在土耳其，在坦齐马特[1]运动(1856—1876)的第二阶段，顺从资产阶级发展道路的国家生活重组仍在继续。然而，资产阶级改革最终没能抵过封建神权力量的强烈阻挠，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的封建专制政权(1876—1908)得以确立。阿拉伯国家力求从土耳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越来越深陷于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影响之中。六十至七十年代，埃及资产阶级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强，遂而遇到封建地主上层统治集团的阻抗，这使得国家在欧洲殖民者面前处于劣势。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及克罗默[2]制度(1883—1907)的推行，在较长时间内中止了埃及的资产阶级发展，并在客观上促进了封建政权的巩固加强。在叙利亚，坦齐马特改革运动影响下产生的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繁荣，被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的苏丹专制制度所中止。

在本时期，伊朗的国家生活未出现任何重大转变，但这里同样出现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力量与封建反动势力的尖锐对抗。而在伊拉克，特别是阿富汗，显要的封建主们的地位尤其稳固。在库尔德地区，部落制组织开始解体，出现了一批强大的世俗及宗教封建主。

另外，本时期所有地区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点是，启蒙运动以不同形式传播开来。在土耳其、埃及、叙利亚、突尼斯和伊朗，这一运动发展得较为明显，但就算在伊拉克、阿富汗甚至是库尔德斯坦等地，这一运动同样可见。在评价这一现象时应该指出，这些国家自身的发展为启蒙思想的出现孕育了必要的条件，西方的影响只不过是进一步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快速传播。

600· 启蒙者们强烈地感受到他们与西方之间的差距，因而更加不知疲倦地宣传西欧的科技成就及政治、社会体制的先进性。与此同时，他们意识到必须抵制西方意欲控制东方国家经济、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殖民企图。由此便可明白为何近东及中东地区的启蒙思想宣传具有双重性。但原因还不仅限于此。本地区的革新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依仗于封建专制团体，又同时局限于资产阶级自身的改革，因而本身便具备了双重性——一种传统与新式、东方与西方的有特色的辩证矛盾式的结合体。

近东、中东地区国家独特的文化历史及社会经济因素，使得这里的启蒙运动思想带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启蒙因素与穆斯林宗教改革(伊斯兰教的现代化)思想的特色结合。

近东、中东地区的启蒙思想虽然来源于法国的启蒙运动，但通常与伊斯

① 意为改革。——译注
② 英国驻埃及总督。——译注

兰教紧密相连，或更准确地说，依据的是现代化改革后的伊斯兰教的教义。即使是在这一地区最发达的国家土耳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启蒙运动最为蓬勃兴盛的时期，宗教改革思想仍起着首要的作用。纳默克·凯马尔(1840—1888)是这一时期土耳其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他的创作中，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对具有典范性的欧洲国家社会政治体制先进原则的宣传与穆斯林教义和谐共存。埃及人雷法阿·塔赫塔维(1801—1873)是阿拉伯世界宣传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政治观点的"普罗米修斯"，但在1834年，他也曾尝试将自由、平等、正义的观念与宗教改革家们重新确立、诠释的《古兰经》和《逊奈》相协调。晚些时候，1879—1882年，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艾哈迈德·奥拉比(1841—1911)在穆斯林宗教经典中找到他们所遵奉的共和政体理念的根源。

在本时期，穆斯林的宗教改革在客观上具备大量可推动此地区国家进步的正面因素，从这方面也许可以解释为何穆斯林的现代主义思想与同期在社会生活领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非穆斯林启蒙运动者们(如阿吉卜·伊斯哈克，雅库布·萨努，扎米里·穆达瓦尔)的思想十分接近。

启蒙及宗教改革的理想在文学中体现出来，这一点在土耳其、叙利亚和埃及等国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这些理想典范对于波斯、突尼斯和另一些国家的文学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在近、中东地区最发达的文学中，启蒙思想的引入伴随着对于中世纪文学类型的明显背离，在文学体裁系统的变革中，随着传统体裁地位的下降，出现了新的文学体裁，如小说、戏剧等。除了这种最为显著的特征，还应注意到传统体裁的变形(日常生活描写、史实、主人公行为的心理动机及启蒙说教等元素增多)、文学民主化趋势的加强等。后一种变化与作家及读者群体社会组成的扩大息息相关，表现为文学语言的简化与现代化。

近、中东国家新型文学的产生主要受逐渐增强的欧洲文学(首先是法国文学)影响的推动。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文艺作品的译介量显著增大。译文多大幅改动原著，使之适应所在国读者的欣赏能力与口味。这些改写式翻译通常由著名作家完成，它们事实上成为了合格且有价值的接受文学作品。

在本时期的近、中东地区，不同国家间文学发展水平的脱节现象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例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土耳其文学已初现现实主义特征，而在阿富汗及库尔德地区，中世纪文学传统仍一统江山，只受到政论作品及文学语言改革的轻微冲击。这种地区间文学发展的不平衡趋势将一直延伸至下一时期。

601·

第一章 土耳其文学

1. 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土耳其经历过1839—1856年改革，直接进入下一时期，开启了国家历史上坦齐马特改革运动的第二阶段。

为消除不断迫近的奥斯曼帝国政治垮台危机，由一批有远见的国家大官僚积极倡导而推行了自上而下的坦齐马特改革运动，这一运动客观上反映了正在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开始于坦齐马特改革第一阶段（四十至五十年代中期）的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兴旺，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国家开办了一批新的世俗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接收男孩，也接收女孩就读。1850年按法国科学院的模式创建了“知识委员会”，接着成立了文化部（1857）及一系列启蒙主义团体，并组织建立了公共图书馆和阅览室。外国演员及剧团的巡演更加频繁，而从1858年起，土耳其第一家专业剧院也开始运营。政府派遣年轻学子赴欧洲接受教育，邀请外国名师来土耳其任教。1871年，第一所大学在伊斯坦布尔成立。

得益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翻译活动的兴盛（启蒙主义原则“地方化倾向”在翻译中居主导），土耳其的读者窥探到欧洲文学的广阔天地——弗朗索瓦·费奈隆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拉辛及莫里哀的戏剧，拉封丹的寓言，拉马丁的诗歌，雨果及大仲马的小说。

不仅是国家的，也包括其反对派的——私人的，成为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传播工具的——媒体，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与作用。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来自新知识分子阶层的启蒙运动者们为实行社会改革而愈发活跃起来。1865年，他们成立了秘密的政治组织“新奥斯曼”，将行动目标确定为与封建专制作斗争及把奥斯曼帝国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这场斗争的特色在于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及当时形势的复杂性。

在追求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土耳其身负坦齐马特改革运动没有能消除的社会及政治矛盾：苏丹体制依凭着仍然十分强势的封建专制力量，土耳其越来越依赖西方国家（从六十年代起实际上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与此同时，土耳其自身仍是殖民者，但对其来说有害的殖民政策已使得这种统治摇摇欲坠（在巴尔干半岛及克里特岛上，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浪潮；在英法开始入主的阿拉伯各行省地区，奥斯曼的统治日渐衰落）。

年轻弱小的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始终与其力求保存国家在奥斯曼帝国框架内的完整性的努力紧密相连，同时，它还在不断抗击着西

方对其国家的殖民奴役。因此，土耳其的启蒙主义者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倾心于西欧的政治国家机构、科学文化及文学成就；另一方面，则是一开始无意识、随后有意识地将西方视为威胁土耳其独立地位的敌人。

在与日益扩大影响的西方作反抗的斗争中，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开始诉诸伊斯兰教，企图寻得助益。从伊斯兰教那里，他们发现了既能同西方资产阶级的扩张运动相抗争，又能对付本国专制的思想工具。因此，土耳其的启蒙主义者们把自己"推行宪法，建立议会"的政治要求与伊斯兰教义相捆绑，将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社会政治观念同反殖民斗争及宗教改革运动的思想结合起来。

易卜拉欣·锡纳西、纳默克·凯马尔、阿卜杜尔哈米德·齐亚帕夏等土耳其新文学的奠基人成为了"新奥斯曼"运动的精神领袖。

土耳其新文学的创始者易卜拉欣·锡纳西（1826—1871）是一位天才政论家、诗人、剧作家与社会活动家。青年时代，他曾被伟大的"维齐尔"[①]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送往法国继续攻读学业。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锡纳西与拉马丁、欧内斯特·勒南及其他一些作家、学者走得很近，成为法国文化的狂热崇拜者与宣传者。 ·602

易卜拉欣·锡纳西以诗人身份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1859 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及译文诗选集，后者收录了拉辛、费讷隆、拉封丹、吉尔伯及拉马丁的作品。锡纳西的诗歌依托于纯理性主义美学原则，闪耀着启蒙思想的光辉，盛赞坦齐马特改革是"理性的对社会有益的法律"。借助传统意象，诗人时而将法国作家（拉辛、莫里哀等）的引文、释文嵌入自己的诗作中；而收录在诗集中的寓言诗则对拉封丹寓言中的情节作了本土化改编处理。

土耳其作家戏剧的诞生是同锡纳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859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民族喜剧《诗人的婚姻》。滑稽剧式的情节、独特的结构、语言，特别是主要人物（年轻的诗人，他的理智的朋友，亲家及伊斯兰教教长）的选择设置，均体现出此剧同土耳其传统剧院上演的民族戏剧的直接的根源性联系。然而，因为收受贿赂的伊斯兰教教长这一人物身上表现出尖锐的讽刺性，教权主义团体勒令禁演此剧，直到 1908 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后，它才再次出现在舞台上。

土耳其新闻业的发展也应主要归功于锡纳西。他推动了私人媒体的诞

① 近、中东国家政府部门领导人。——译注

生，为启蒙主义者们提供了宣扬思想的平台。在自己的报纸《释真报》与《叙思报》中，他第一次发出“人民应获得言论自由权”及“社会言论具有重要作用”的呼声，同时呼吁积极借鉴那些“借教育发展智力的文明国家”的先进经验，并论证了欧洲社会机构及广泛普及教育的优越性。他以笔为枪，用饱含激情的政论文章反击封建统治，捍卫人权。因为锡纳西及其后来者对于新闻界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无私奉献，政论作品成为土耳其启蒙文学的代表性体裁之一。

政论作品为新文学的诞生、新式文学语言的创立准备了条件。这种新文学语言将能被各阶层人民所理解，并同时能清楚表达出当代科学及社会政治理念。锡纳西在他的报刊政论文章中对于创立新式文学语言问题的首次提出，被认为是争取社会进步及民族文化发展斗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纳默克·凯马尔(1840—1888)是锡纳西思想的继承人。他出身贵族，成为“新奥斯曼”立宪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积极地参与出版与政论活动，后来发表了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矢志不渝地与苏丹独裁统治作斗争。

在反政府的密谋暴露后，凯马尔与其他“新奥斯曼”运动的参与者们被迫离开祖国，但即使在侨居欧洲时期，他仍未停下斗争的脚步。在“新奥斯曼协会”于伦敦刊印出版的《通讯者报》(1867—1870)及《自由报》(1868—1870)上，他发表文章提出改革的新要求，登载宪法管理纲领，指责专制政体为“全部社会灾难与不幸的罪魁祸首”。因特赦回到伊斯坦布尔后，凯马尔充满愤怒的抨击语调仍未有丝毫减弱，这点通过他主管的《教导报》的文章可得到充分生动的证明。作家经历过监禁的艰辛(在狱中写下包括反暴君体裁的《居尔尼哈尔》在内的最优秀的剧作及长篇小说《阿里老爹的奇遇》)及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掌权后判罚的常年流放，最终在流放地走向生命尽头。

纳默克·凯马尔的哲学及社会政治观点同“新奥斯曼”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表现为穆斯林教义与欧洲启蒙思想的交织杂糅。他将所接受的适用于当时具体环境条件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原则、孟德斯鸠及康·弗·沃尔涅的国家管理思想(凯马尔曾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沃尔涅的《废墟，或者关于帝国兴亡的沉思》翻译成土耳其语)与伊斯兰教《辩护》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思想同“土耳其民族高于奥斯曼帝国内其他民族”的国家论结合到一起。

603·

纳默克·凯马尔尝试用各种不同的体裁进行创作。在诗歌方面，他用旧瓶换新酒的方法，以旧的形式表达新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内容。像锡纳西那样一味歌颂坦齐马特改革已不能使诗人满意。他批评国家内盛行的独断专横，指摘苏丹政府对其他民族的滥施武力及不法行为。与此同时，同所有启蒙主义者一样，他极其抽象地理解平等与自由的理想，将资产阶级议

会制理想化。诗人写于抄本上的大部分诗歌，在1908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得以问世。这些狂热的诗行中常间杂着泛伊斯兰主义的主题与情节，这些元素在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反动统治年代的诗人的第二个创作阶段中得到了加强。为了宣传新文学的任务及其社会使命，纳默克·凯马尔致力于首先摧毁传统的文学体系。他抨击古老的诗歌，认为其难以理解，且与人民格格不入，指责"前坦齐马特"散文创作"与真正的文学毫无共同之处"，传统戏剧也一并遭到了否定。民族传统为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吸收接纳与新文学的诞生准备了土壤，这一作用当时凯马尔还未意识到。

凯马尔认为戏剧艺术与新的演出法具有独特的作用，他要求戏剧必须"再现生活"，称其为"所有娱乐活动中最有益的消遣"。1872年，他创立了土耳其第一家戏剧协会。

在戏剧创作(共六部)中，纳默克·凯马尔最倾心于浪漫主义戏剧。他 •604 创作的第一个剧本是四幕剧《祖国或是锡利斯特拉》(1873)，主要事件设置在1828—1829年俄罗斯、土耳其第八次战争背景之下，其中渗透着浓郁的爱国主义思想。主人公名叫伊斯兰老爷，这一名字颇具象征意味的土耳其军官充当了作者思想的传声筒，剧作家通过这一形象歌颂了祖国，歌颂了伊斯兰旗帜下的赫赫战功。



ترجمان احوال

حوادث داخليه



تصوير افكار

١٢٧٨

حوادث داخليه

土耳其报纸《释真报》和《叙思报》

在其他戏剧作品中，纳默克·凯马尔探讨了所处时代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在社会日常生活剧（商人剧）《不幸的孩子》（1873）中，他反对妇女不平等地位（土耳其最为人诟病却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强迫婚姻、成年子女一味依赖父母等现象；1874 年的《居里尼哈尔》则提出了政府与人民间的相互关系及人民的报复等问题。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入侵中亚的事件构成了《札兰丁——花剌子模国沙赫》（1882）一剧的史实基础，但对这一事件的探讨与现代性的任务有关，并多被认为是举例说明了作者一味声明的“只有开明君主和伊斯兰教才能将国家从异族奴役下拯救出来”的观点。

凯马尔为此剧所作的前言十分著名，在其中，他借助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阐述了浪漫主义艺术的原则。在土耳其文学的加速发展时期，各种不同的流派思潮——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几乎同时出现，但浪漫主义成为了首要的文艺方法。在凯马尔的创作实践中，浪漫主义的主导性表现得尤其鲜明。

纳默克·凯马尔同样是散文领域的革新者。他极大地扩展了如社会性乌托邦著作（他受沃尔涅的《废墟》影响，创作了《梦》一书，抒发了“自由国”即将出现的信念）、历史论著（如《零散的叶子》，这是一组关于土耳其苏丹和伊斯兰活动家的历史生平的随笔，这些被理想化了的形象成为了启蒙主义者们眼中开明君主的化身）、论战抨击文（宣扬取得民族自决权是伊斯兰教历史使命的《反驳欧内斯特·勒南》）等传统体裁的艺术思想表现力。

纳默克·凯马尔的散文性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社会日常生活题材的《阿里老爹的奇遇》（1876）及未完成的历史小说《杰兹米》（1880）。

这两部作品是土耳其文学中此类体裁（长篇小说）的第一批典范之作，其中皆充满着启蒙主义式的说教。同时，凯马尔书中的教训色彩同他对诗歌日益提升的兴趣结合了起来，且这种兴趣主要不是在于感伤主义（尽管其小说中密布此类元素），而是如同其喜剧一样，依托于浪漫主义的美学原则。作者在《阿里老爹的奇遇》中，对落入阴险的上流社会交际花之网的高尚、敏感的青年的心碎经历作了广义的探讨阐释，书中展现的道德冲突反映了社会因果制约性及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对峙。

《杰兹米》中的事件发生在十六世纪。在这部历史小说中，作家将人民权利的实现建立在推翻暴君的基础之上，表达出对于开明正义的君王的渴望。小说中这一理想的化身是克里米亚战争的指挥吉列依，他在土耳其—伊朗战争期间曾沦为伊朗沙赫的阶下囚。书中花费很大篇幅描写了与政治串通相关的宫廷密谋，而谋害对象即是吉列依。同时，这一事件还与小说中的爱情线索交织在一起，后者是为作品总的劝谕目的服务的。尽管这条

爱情线建立在已写好的提纲之上，主人公也是为体现各种道德伦理原则而设，小说中仍不难发现从心理角度对人物行为进行理解诠释的尝试。

纳默克·凯马尔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政论家、作家，阿卜杜尔哈米德·齐亚帕夏（1825—1880）是他们中较突出的一位。他是"新奥斯曼"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在土耳其及随后侨居国外的许多年里都与凯马尔共事。在自己的哲学及政治诗中，齐亚帕夏发展了"自然权利"、个人自由、道德教育等诸多思想。他尝试把欧洲启蒙思想同苏菲主义结合起来。

尽管始终停留在传统文学形式的框架内，齐亚帕夏在自己的颂歌及讽刺作品中表现了极高的社会激情与感召力，如在1868年的《胜利长诗》中，他精湛地运用了讽刺抨击文的创作方法。然而与此同时，虽然他揭露了国家各级达官显贵的不法行为，却始终未提升到批判苏丹专制的高度。他积极地拥护立宪运动，只将其作为压制国家内滥用职权现象的手段，未看出其对最高权力的限制作用。齐亚帕夏的哲理性中篇小说《梦》（1869）具有鲜明的政论色彩，通篇以作者和苏丹统治者及维齐尔的对话展开，以启蒙立场探讨的"贤明君主"和"凶恶大臣"的概念最大限度地、艺术地反映在其中。

在大力呼吁倡导以欧洲为模板建立新文化，以及以翻译法国经典著作（莫里哀的《伪君子》、卢梭的《爱弥尔》及伏尔泰的《小大人》）来丰富本国文学的同时，齐亚帕夏十分珍视民族文化传统。与纳默克·凯马尔不同，他高度评价土耳其过去的诗人，并编纂了一本近东诗歌选集。

在土耳其新诗发展的探索之路上，阿卜杜尔·哈克·哈米德（1852—1937）开拓了一个新的时期。他出身贵族，因为父亲任外交官且自己常年生活在国外（法国、伊朗、希腊、印度、英国、比利时、奥地利）而精通多门外语。按哈米德的话说，他走的是与自己的导师兼朋友纳默克·凯马尔"相同的道路"，但"由于担心因遭嘲笑致失足而走得更为缓慢"。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的早期诗歌中，他就声称自己是法国浪漫主义的捍卫者。诗集《我的疯狂，或城市》（1886）透出独属青年人的热情兴奋的味道，里面记录了诗人对巴黎的观感和印象。在收入戏剧《印度姑娘》（1875）及选集《沙漠》的诗歌中，哈米德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及通常是异国的自然风光。在经历了年轻妻子亡故的沉重打击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诗人的抒情诗表现的是哀悼的主题及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长诗《坟墓》，1885年；《亡妻》，1885年；诗选集《这就是他们》，1886年；《新婚夫妇的婚房》、《被摒弃者的痛苦》，1886年等），这些皆加剧了抒情诗主人公与现实的不协调，并表露出抵抗神祇与抗议社会的创作动机与基调。

受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拉马丁、缪塞的影响，阿卜杜尔·哈克·哈米德着手对本土诗歌进行改革。这场改革触及了土耳其诗歌的韵脚及节奏韵律等方面，尽管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对传统的“阿鲁兹”韵律系统给予了沉重打击，使得作诗者能更加深刻和直接地表达个人感情。在自己的艺术探索之路上，哈米德先是从民族形式着手，随后在二十世纪转向了自由体诗歌创作。

在体裁多样的戏剧创作中，阿卜杜尔·哈克·哈米德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启蒙主义理想的拥护支持。在社会日常生活题材的戏剧《敏感的姑娘》(1875)中，他指出了妇女不平等的问题；政治悲剧《涅斯捷连》(1876)立意于反抗专制统治与保护人民平等权。在讽喻性诗剧《里别尔特》(1876)中，被杰斯波特(即“专制君主”)囚禁在监狱中的斯沃博德(即“自由”)在里别拉尔(即“自由党人”)的帮助下挣脱了桎梏，回到了他所钟爱的娜罗德(即“人民”)身旁，他坚信“人民战胜暴君的一天终将到来”。

反暴君的主题同样典型地体现在阿卜杜尔·哈克·哈米德的悲剧《塔雷克，或是安达卢西亚》(1876)中。人的感情与爱国义务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萨尔丹那波尔》(1875)、《泰齐尔》(1878)、《艾施别尔》(1880)等悲剧的基础，其中《艾施别尔》表现的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的历史事件。哈米德运用历史材料时颇为轻松自如。而这一大类主题仍是为现代性的任务服务，过去的历史鉴戒应被视作对今日和未来的教训与警示。作家把争取民族进步的斗争同伊斯兰教的巩固相联系，赞美东方国家过去的强盛，颂扬阿拉伯人的远征(《泰齐尔》、《纳齐费》、《塔雷克》)。理想化了的阿拉伯统治者形象是新式开明君主的典范。

反殖民的思想倾向体现在浪漫主义散文化诗剧《印度姑娘》(1875)中，此剧谴责了压迫印度人民的英国殖民者的专制。

阿卜杜尔·哈克·哈米德是西欧文学勤勉的崇拜者，他积极而全面地吸收掌握了它的传统与精华。在政治悲剧创作方面，他倾心于法国的古典主义，尤其是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西欧戏剧家们的思想艺术经验在他提出的祖国文学的任务中折射出来。土耳其的戏剧刚迈出自己的第一步，但这加速而自信的步伐已使它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完成了其第一步规划，并成为启蒙主义典范最鲜明的体现者。

一批最优秀的作家、政论家——阿尔巴尼亚的启蒙运动者们顺应潮流，投入到戏剧创作中来，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了土耳其文学。他们是萨米·弗拉舍里(1850—1904)，艾布齐亚·泰菲克(1848—1913)，列扎伊扎德·马赫穆特·艾克列姆(1847—1913)，艾哈迈德·米德哈特(1844—1912)，萨米帕夏扎捷·塞扎伊(1858—1936)等。

在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中，许多不同的文学流派、风格、体裁共存并相互影响。历史题材的作品皆是古典主义悲剧和以历史或传说故事为蓝本、有强烈的反暴君色彩的浪漫主义戏剧（阿卜杜尔·哈克·哈米德的悲剧《赛义德·亚西亚》，1875年；萨米·弗拉舍里的《加维》，1877年），与之并驾齐驱的是受到广泛欢迎的日常生活题材的商人剧。这一剧种关注同时代生活，同时蕴含揭露性力量——反对阶级间的不平等、家庭专制、情感暴力等现象。构成此类戏剧的核心冲突靠悲剧性死亡来得到解决，并以不被允许依从心灵生活的年轻恋人的自杀为代表（纳默克·凯马尔的《不幸的孩子》，1873年；艾布齐亚·泰菲克的《注定的死亡》，1873年；马赫穆特·艾克列姆的《弗斯列特，或者短暂的快乐》，1875年）。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戏剧的发展主流是纳默克·凯马尔确立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浪漫主义戏剧。为了找到积极正面的理想形象，作家们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了“第四等级”——普通人民（如萨米·弗拉舍里的《贝萨，或是忠于信仰》，1875年）。与原创戏剧同时出现的还有占有重要地位的译作（译自拉辛、伏尔泰、哥尔多尼、雨果、大仲马等）、改编改写作品（脱胎于夏多布里昂同名中篇小说的马赫穆特·艾克列姆的剧作《阿塔拉》，艾布齐亚·泰菲克自由改编自雨果剧本《昂杰罗》的《恋爱的少女，或者宽宏大度的爱情》等）。这一时期形成了作为独立体裁的小戏剧，但其同样受到过法国小戏剧的影响。以流行的东方“达斯坦”为情节的剧作（《费尔哈德和什林》、《塔希尔及祖赫拉》等）可归入小戏剧类作品。

民族喜剧成功发展，它的开端由易卜拉欣·锡纳西的《诗人的婚姻》所奠定。土耳其喜剧作品总体而言具有大众化、社会性色彩鲜明的特点，它强调民族根基性，同在传统皮影剧院“卡拉古兹”和“奥尔塔—奥尤努”上演的民族戏剧有紧密联系。这两家传统剧院的剧作在风格类型（面具、方言、即兴创作、丑角表演）上与意大利的 commedia dell arte[①] 相近。

译介文学尤其是莫里哀的喜剧促进了土耳其作家喜剧的形成。莫里哀作品的第一位译者是著名的启蒙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戏剧活动家艾哈迈德·维菲克帕夏（1823—1891），他翻译并改编了前者的十六部剧作。莫里哀的喜剧在土耳其土壤上的移植可称得上是土耳其戏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现了一批兼具娱乐消遣性及道德说教性的原创喜剧——阿里别依的《被驱逐的客人》（1871）、《多嘴多舌的理发师》（1873），哈姆吉别依的《一个腋窝夹不住两个西瓜》（1871），马赫穆特·艾

① 即假面喜剧。——译注

克列姆的《多知者多犯错》(1875)等。

土耳其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散文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艾哈迈德·米德哈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出生于手工业者家庭,作家将自己的主要任务定为大力发展启蒙教育、普及知识,并贯彻到自己广泛的政论、出版事业(出版发行了大量的报纸、杂志、系列宣传册)及文艺创作活动中。与其他作家、活动家不同,他的政治观点较为温和,在推翻苏丹阿卜杜尔-阿齐兹后则走向了公开的保守立场,但他相信科技进步和社会道德改善的巨大力量。

艾哈迈德·米德哈特具有非凡的精力与工作才能,为后世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文学遗产:大量短篇小说,数十部长篇小说,科学论著,剧本,大仲马、欧仁·苏、保罗·德·科克及其他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家的译著(更准确地说是"改写")。他为广大的普通读者创作,在注重提供知识及说教的目的之外(艾哈迈德·米德哈特的散文有道德说教倾向,且其中充塞着大量来自各种学科领域的形形色色的信息),同样关心故事情节是否引人入胜。

艾哈迈德·米德哈特的散文中,民族文学传统(主要是民间故事人"麦达赫"的叙事艺术)同各种不同风格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艺术经验相交织。在他的短篇、中篇小说(结集为系列作品《有趣的故事》,总计二十五卷)及他本人十分熟悉的日常生活主题的道德说教类长篇小说中,探讨的是仍存在的奴隶制(《奴役》)、妇女不平等、家庭专制(《娶妻》、《青年时代》、长篇小说《凡间天使》,1879年;《不过十七岁》,1880年等)等现象。他的社会及美学理想灌注到主人公身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典型——小官吏出身的贫穷知识分子。这类人物精力充沛,热爱劳动,崇尚教育,为取得生活中的成功不断奋斗,但这种奋斗归根结底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迷信崇拜及对美满快乐的家庭生活的向往。为了达到直观的说教目的,其作品中会设置一组"对映体"(即天性、品行截然相反的人)——富人之子、不学无术之人及游手好闲之徒,这些人靠挥霍父辈的财产而活,并最终迎来人生的破产(短篇小说《金钱》、《幸福》,长篇小说《菲利亚图恩老爷和拉凯姆·艾芬吉》,1870年;《狂欢节》,1880年等)。

在长篇小说中,艾哈迈德·米德哈特乐于表现并赞美毅力、首创精神、对知识的向往,这些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旅行"传统的延续,例如《土耳其人去巴黎》(1876)、《漫游欧洲》(1889)、《世间奇迹》(1888)等。一些小说在欧洲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创作而成,例如,《哈萨恩》(1874)的情节来源于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芭蕾舞女演员》(1877)借鉴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像是后者的极简通读本),《世间奇迹》则脱胎于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

米德哈特同样关注历史题材：中篇小说《土耳其新军》(1871)记录的是十八世纪的历史事件；长篇小说《苏莱曼·穆斯里》(1871)及《重生，或伊斯坦布尔往事》(1875)反映的则是十字军东征。

俄罗斯文学亦在艾哈迈德·米德哈特的兴趣范围之内，正是在他的出力协助下，土耳其国内出版了以下作品的首批译本——普希金的短篇小说《暴风雪》、中篇小说《黑桃皇后》，列夫·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及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的选段。

2. 八十年代的文学

以积极的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与高涨的公民热情为标志的坦齐马特改革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没有及时进行革命"，卡尔·马克思如是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在坦齐马特运动和很大程度上由土耳其启蒙主义者们贡献力量的1908年革命之间，横贯着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的封建专制独裁时期，这也是国家历史上出名的暴政时代。土耳其沦为欧洲列强的半殖民地，处在它们的公开控制之下。

在恐怖暗杀盛行的环境下，社会及文化生活停滞了，文学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进步的政治活动家和作家遭到迫害与流放，引入并实行了最为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报纸和杂志——这些先前社会进步思想的传声筒、前沿阵地——丧失了自身的进步倾向。法国的启蒙主义文学被禁止流入与传播，图书市场充斥着译介过来的法国侦探类及爱情冒险类小说。

启蒙作家们逐渐远离了历史舞台，纷纷搁笔或转向出版事业。萨米·弗拉舍里、艾布齐亚·泰菲克等作家出版畅销的、持中立的政治立场的教育类书籍和小册子。艾哈迈德·米德哈特的观点更加右倾，他的创作中神学主题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辩护书》等)。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在很多方面具有过渡特征。一部分作家仍忠于坦齐马特运动原则，文学换代还没有像之后九十年代那样表现得那么急剧。然而，在八十年代作家们的创作中，既不见了坦齐马特时期文学的公民热情，也难觅积极上进的主人公形象。对于激进、彻底的社会变革的希望的破产，导致这一希望染上了愈加昏暗的色调。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逐渐被一些新的特征充实起来，最引人注目的是作家们加大了对"小人物"、心理问题及艺术技巧的关注。散文和诗歌成为最受欢迎的创作体裁，戏剧及政论作品则受到了冷落。因为书刊检查制度的限制，剧院上演的剧目日益减少，在1885年，根据苏丹的特别指示，

土耳其专业剧院被迫关闭。

在这一时期，新政权的拥护者们所进行的土耳其旧文学的创作活动活跃起来，他们拒绝采纳坦齐马特一代作家们在思想及艺术上的新成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生了这十年开始已初具规模的“西方派”与“东方派”之间的分裂运动，针对土耳其诗歌的进一步发展道路、对古老传统的诗歌形式和在欧洲影响下形成的诗歌样式哪个更应受到推崇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实质是两派的意识形态之争，而社会的主要问题受到了遮盖。

608・

“西方派”聚集在马赫穆特・艾克列姆的周围，他是阿卜杜尔・哈克・哈米德传统的继承者，发展了浪漫主义中较为温和的一派。他的诗的一大特色是忧郁，其中充满了幻想式的忧伤；同时这种音乐性的诗歌，相对于描绘自然或勾勒场景，更多的是传达某种感觉或心情（例如，汇编集《歌调》卷一至卷三，1881—1883 年；《青年时代》，1884 年；《沉思集》，1888 年等）。这些诗以“在法国浪漫主义诗歌影响下形成的新的母题、意象和对缪塞、苏利・普吕多姆等人诗歌的同义异说”丰富了土耳其本国的诗歌。

马赫穆特・艾克列姆的诗歌，尤其是他在《文学讲稿》（1880）中阐述的美学观念，很长时间内都是以诗人、散文家穆阿里姆・纳吉（1850—1893）为首的“东方派”攻击的靶子。

穆阿里姆・纳吉接受的是传统的穆斯林教育，他以书写历史性“达斯坦”和抒情诗歌（诗集《火花》，1884 年；《闪烁之光》，1886 年；《穗》，1890 年等）的作者的身份登上文坛。出于对“前坦齐马特”诗歌的艺术性的维护与捍卫，他竭力恢复“受欧化限制与损害”的独特民族风格。由此，他的诗歌与散文中（尤以 1890 年的中篇自传体小说《奥麦尔的童年》为代表）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对于伴有牢固的宗教基础和家庭传统的宗法制过去的理想化。

“东方派”中还有作家麦哈迈德・泰菲克・查拉克（1844—1898），一位民间笑话与趣闻的不知疲倦的收集者（《故事宝库》）。他模仿它们而创作了一系列轶闻故事，这些故事分成几类，皆围绕虚构人物布・阿达姆（即“这个人”）展开，收录在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书中（1882）。在中篇小说《伊斯坦布尔的一年》（1881—1888）中，作家以记录公文档案一样的细致笔法，精确地刻画了旧伊斯坦布尔那些已随时间流逝、属于过去的民间娱乐消遣一部分的民俗风情。

在一些作家竭力刻画描摹过去的民间传统与风俗的同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还存在与前者相接的另一条脉络——戏谑法国迷的讽刺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作品的开端是像艾哈迈德・米德哈特这样坚定的“西方派”奠定的，他曾在自己的政论文章和长篇小说《菲利亚图恩老爷和

拉凯姆·艾芬吉》中不留情面地抨击了追赶模仿欧洲时髦的现象。马赫穆特·艾克列姆延续了这一传统,他在用与自己的诗歌相同的语气写下忧郁感伤气氛浓厚的中篇小说《穆赫辛老爷,或一位诗人令人悲伤的死亡》(1888)之前,创作了具有社会性色彩的长篇小说《轻便马车之恋》(1887)。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不学无术、缺乏教养之人,他酷爱徒有其表的奢侈品,在西式时髦面前奴颜婢膝。通过这一形象,作家试图创造出上流社会不务正业的年轻人的一种概括性典型——法国迷。

对法国迷的讽刺构成了侯赛因·拉赫米(1864—1944)早期长篇小说的基础。作家在创作之初即与"东方派"相接近,作品包括《镜子,或华丽》(1888)及《家庭女教师》(1890)。不论是从思想还是风格层面来看,这些小说皆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启蒙文学和民族戏剧的讽刺传统。

萨米帕夏扎捷·塞扎伊的长篇小说《灾难》(1887)的出版,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生活中一桩轰动性事件。小说记叙了切尔克斯女奴的悲惨历史。作品因公开抗议奴隶制而与斯托夫人的名作《汤姆叔叔的小屋》遥相呼应。萨米帕夏扎捷·塞扎伊延续着坦齐马特一代文学家的传统,试图揭露人对人进行奴役的反人道主义本质。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作家基本使用的是现实主义的手法,不仅刻画了实在的日常生活背景,更重要的是挖掘了人的性格。小说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特征相交杂,这对于处于形成的开始阶段的现实主义手法是十分正常的。

萨米帕夏扎捷·塞扎伊的短篇小说(文集《微不足道》,1890 年等)标志着土耳其文学在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生活的道路上迈向了一个新阶段。这组短篇在土耳其文学中第一次提到"小人物",书写了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其背后展现的是大失所望、被欺骗的希望和难以承受的不幸人生。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批有才能的散文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路。纳比扎德·纳奇姆(1864—1893)著有关于土耳其农民沉重赋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卡拉·比比克》(1890)及长篇小说《采赫拉》(1893)。哈米德·齐亚·乌沙克雷吉里(1866—1945)在这一时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批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涅米捷》(1889)、《死者日记》(1889)、《禁断之恋》(1890)。这些作家的思想美学宗旨是在实证主义哲学及左拉和龚古尔兄弟的自然主义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的创作主要已属于土耳其文学史的下一时期(从九十年代开始)。

· 609

第二章 埃及和叙利亚文学

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在赫迪夫(埃及总督,1867—1914 年苏丹赐

予埃及统治者的封号）伊斯玛伊尔统治时期（1863—1883），埃及的经济继续着增长势头。封建制度逐步衰落，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业已萌芽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欧化范围继续扩大。伊斯玛伊尔拨出大笔资金用于发展国民教育：他在位期间开办了超过四千五百所学校，其中包括女子学校。1873 年，埃及创立了高等学校“科学研习院”，除神学外还教授世俗学科。1870 年，成立了以“赫迪夫”命名的埃及国家图书馆，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际建成开罗歌剧院，布拉克古代博物馆得到了豪华翻修。

伊斯玛伊尔为使国家最终从土耳其人手中独立出来而在各个方面投入大量精力，但与此同时，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凿通开航，埃及越来越置于英法资本家的剥削奴役之下。从七十年代中期起，欧洲列强开始公开地干涉埃及的内政，这引起了受穆斯林宗教界进步人士支持的最广大人民的不满。艾哈迈德·奥拉比、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等爱国军官领导发动了1879—1882 年解放运动，在推翻了赫迪夫伊斯玛伊尔的继任者陶菲克任总督之时，他们在政府中占据了领导层职位。他们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巩固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改革，并要求外国停止干涉埃及内政。受到新政策惊吓的封建地主阶级上层支持欧洲殖民者，1882 年 7 月，爱国主义势力被摧毁，英国军队占领了埃及。国家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到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梅尔勋爵手中。所谓的克罗梅尔体制（1883—1907）实质上意味着英国金融资本的专政及对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无情镇压。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坦齐马特改革之后，欧洲资本家在叙利亚各省同样扩大了势力范围，从而加剧了对农民的剥削。他们对封建主的武装反抗在法国领事的参与下发展成一场宗教大屠杀，结果是法国巩固了自己在叙利亚的地位。经受着双重压迫的叙利亚人民的境况变得愈加沉重悲苦。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在位时期建立的苏丹君主专制制度阻碍了叙利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给外国资本留下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叙利亚进步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易卜拉欣·雅齐吉，法里斯·尼姆尔等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立了秘密团体，其纲领旨在为谋求国家独立和进行民主改革而发动斗争。叙利亚国内猖獗的反动势力和艰难的经济状况导致了出国移民潮的加剧，大批人涌向埃及、南北美洲及欧洲。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期的许多进步作家和政论家在埃及工作和生活，在那儿他们不会因自己的反土耳其情绪而遭到折磨迫害。他们的活动对于两国同等重要。

十九世纪中叶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启蒙主义观念形成期。第一个此类观念诞生于毫无疑问深受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欧化程度较重的叙利亚知识分子阶层之中。它的核心是认同理性和科学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独特作

用，以及敌视一切阻碍人的个性自由得以实现的因素（首先是对于政治专制的谴责）。

此观念的部分论点在叙利亚启蒙协会的报告和文章中被提出，弗朗西斯·麦拉什（1836—1873）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它们表述得最为彻底。 ·610

麦拉什是阿勒颇的一个商人的儿子，他曾在巴黎学习医学，并积极自学其他方面的知识，对欧洲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有着很深的了解。麦拉什的社会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哲理小说《真理的丛林》（贝鲁特，1866年）、《奇贝珍珠》和随笔《看当下局势》（贝鲁特，1873年）中。麦拉什的小说，究其实质，是带有虚构情节的哲理论著。比如，在《真理的丛林》中，作者就讲述了自己的梦境。在梦境之中，"自由王国"依靠教育和开明的思想战胜了"奴隶王国"，在法庭上，在"自由王国"国王和"智慧王国"女王的见证下，哲学家作为法官，对战败的"奴隶王国"国王进行了裁决。

麦拉什尝试以大自然的基本规律来论述自己的自由理念。他认为大自然的基本规律是自然和社会之中的一切事物所必须遵从的法则。所以，若要在人类社会中实现自由，就应消除一切不必要的限制和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事物。由此他得出了结论：一切形式的奴役和暴政都是违背自然和理性的规律的，人类应该为了消灭它们而斗争。与此同时，每个想要享受自由权利的人，都应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

在麦拉什看来，理想的人类社会应当以正确的政策、思想启蒙、良好的社会风俗、人民安居乐业为基础。他还认为，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最佳的国家体制是开明的君主立宪制。这些观点也基本上契合了叙利亚所有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的思想。

埃及十九世纪下半叶启蒙思想的发展与伊斯兰教的改革运动（所谓的"伊斯兰教现代主义"或"伊斯兰教的革新"）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埃及的启蒙运动被这一改革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

这次改革运动的奠基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和穆罕默德·阿布笃（1849—1905）断言，要想在反抗欧洲殖民者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广大的穆斯林群众就应该联合成一个独立的哈里发政权。在他们看来，只有在真正信仰纯洁的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受到广泛启蒙的情况下，这一联合才可能实现。他们宣扬说，伊斯兰教是世界上唯一的宗教，是世世代代和各族人民的宗教，它赋予人理性。所以，它能使人的自然才能得到发展。但这些革命家在对《古兰经》的解读中也体现出了天真的一面，他们试图证明，《古兰经》中暗示了一切现代科学发明，暗示了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这些变革旨在推翻旧的封建秩序。而伊斯兰教的口号也被运用到了民族解放斗争之中。同时，新的伊斯兰教的启蒙思想，同之前叙利亚信

仰基督教的启蒙学家的学说一样，在形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欧洲社会思潮的影响，而首先就是法国的启蒙思想。

然而，伊斯兰教现代主义最主要的目的并不在于学习欧洲文化，而在于复兴过去的传统，让阿拉伯的文化遗产焕发生机。而最保守的改革者则对欧化完全持否定态度。对阿拉伯人的“光辉岁月”这一理想图景的描绘，在那些年间通过各种文学体裁在阿拉伯文学中得以普及，同时也具有特别的爱国意义。一方面，伊斯兰教现代主义后来被泛伊斯兰主义所运用，后者主张将土耳其苏丹推举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另一方面，随着伊斯兰教现代主义发展的深入，阿拉伯人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在慢慢地形成。

新学说在发展之初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这也使得埃及和叙利亚的启蒙思想家们有了合作的可能。阿富汗尼的思想常常受到一些非穆斯林（阿吉卜·伊斯哈克，雅库布·萨努，扎米里·穆达瓦尔）的追捧，这些人还把阿富汗尼视为自己的老师。所有阿拉伯的启蒙思想家，不管宗教信仰，都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凝聚在了一起，这个目标就是——在民众中普及启蒙意识，信仰社会进步，拥有高度的理性，合理地重新审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政治、管理原则、家族制度、教育制度等。

在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前期流行的定期刊物中，启蒙思想被广泛介绍。一些报纸甚至还在国外的巴黎、伦敦、伊斯坦布尔等地出版。埃及的新闻业在民族运动高涨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非常繁荣，各种报纸层出不穷，聚集了一批为独立和革命而奋斗的进步人士，其中就包括政论家阿吉卜·伊斯哈克（1856—1885）、阿卜达拉赫·纳基姆（1845—1896）、雅库布·萨努（1839—1912）。

611·

在被占领的初期，埃及报刊业一片静寂，因为所有进步记者不是深处牢狱之中，就是在流放中，或是被驱逐。很多报社，甚至是一些思想较为温和，宣扬自由主义的报社，都关闭了。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报刊杂志业才慢慢复苏。在当时，在报刊中与其讨论尖锐的政治问题，还不如关注教育、社会思想、宗教、文化、妇女解放等问题。

曾是政论文中最主要题材的公民和爱国主题在七十年代中期被运用到传统诗歌当中，从而给诗歌创作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赞成启蒙思想的诗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古代和新经典作家（九至十一世纪）的诗歌创作传统，主张摒弃民族衰落时期所盛行的复杂的诗歌形式，同时，他们的创作活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文学流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埃及人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1838—1904）。他是一名有着贵族血统的军人，是1879年至1882年间民

族运动的杰出活动家。他曾在革命政权中任军事部部长一职，其后任总理。在埃及被英国占领之后，他被流放到斯里兰卡，长达十七年。巴鲁迪通晓阿拉伯古典诗歌，在自己的创作初期，他用传统的体裁进行诗歌创作。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巴鲁迪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同时开始进行政治抒情诗的创作。诗人为埃及的悲惨处境而感到哀痛，他主张进行改革，建立议会制，并直接呼吁人民起义。在流放期间，诗人的作品主要为哀诗，他用传统的形式表达着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

巴鲁迪是新时代的埃及诗人之中第一个歌颂金字塔的，这一建筑是伟大先辈们智慧的结晶。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在诗作中描写现代文明成果的诗人，他曾写到蒸汽船、蒸汽火车头、电力等。

而在叙利亚，属于新文学流派的有易卜拉欣·雅齐吉（1847—1906），他是著名诗人、启蒙思想家纳绥夫·雅齐吉的儿子。他是第一位在诗作中表达阿拉伯爱国思想，而非伊斯兰教爱国思想的诗人。雅齐吉试图通过作品唤起自己的同胞对往昔的繁荣的追忆，并向他们预言了美好的未来。在一首秘密传播的诗中，雅齐吉号召人们通过起义来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只有剑才能使崇高的理想实现。/要想达到目标，就拿起剑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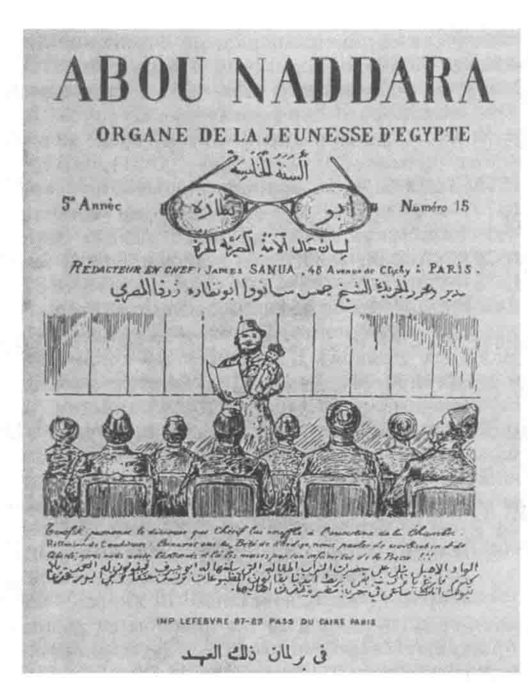
在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文学中出现了第一批女性诗人。她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例如：瓦尔达·图尔克（1797—1874）是尼古拉·图尔克的女儿，瓦尔达·雅齐吉（1838—1924）是纳绥夫·雅齐吉的女儿，玛丽亚娜·麦拉什（1838—1922）是弗朗西斯·麦拉什的妹妹，阿伊莎·台木尔（1840—1902）是埃及著名语言学家阿赫迈德·台木尔的妹妹。这些人之中，玛丽亚娜·麦拉什和阿伊莎·台木尔后来还成为了著名的记者。

在散文的创作中，新文学流派的产生同样与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阿拉伯长篇训诫历史小说诞生的时期，这些小说大都是由欧化的叙利亚作家创作的。黎巴嫩著名启蒙思想家布特鲁斯·布斯塔尼的儿子赛利姆·布斯塔尼（1848—1884）是阿拉伯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他创作了三部历史小说——《齐诺比亚》（1871）、《白杜尔》（1872）、《沙姆征战中的热恋》（1874），还有六部现代社会题材的作品——《叙利亚花园中的恋爱》（1870）、《艾斯玛》（1873）、《法蒂娜》（1874）、《摩登女郎》（1875）、《萨尔玛》（1878—1879）、《沙米娅》（1882—1884）。赛利姆认为，文学最主要的任务是改良社会风气。在现代题材的小说中，他大力宣传建立在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公正和理性之上的道德伦理标准。他还特别重视对青年的教育问题和家庭中的爱情问题。同时，他并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来进行创作，而是根据所要阐述的训诫思想来建构情节，因此，他小说中的情节只不过是为了论证某种精神而服务的，而在小说之中

·612

也一定会有可资借鉴的范例。几乎一致的主题，再加上千篇一律的表现方式，使赛利姆的小说的情节过度程式化，或是大同小异。而人物形象的展现也较为死板，在小说中描写人物的行为不是为了揭示其性格，而是为了论证某一公理。

在当时，展现历史主题的启蒙小说的产生，与那些年间普及的复兴阿拉伯世界的爱国思想有着重要联系。在进行历史主题创作时，赛利姆选取了阿拉伯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巴尔米拉反抗罗马帝国的斗争，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战，等等。虽然作者力求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但他还是将阿拉伯的过去理想化了，他在历史中找到了建筑在平等和人道主义之上的自由和公平的民主统治。



第一份阿拉伯讽刺性报刊
《阿布·纳达拉·扎尔卡》上的漫画

新的体裁很快在阿拉伯文学中流行起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政局较为稳定，家庭主题的小说脍炙人口，例如：埃及作家赛义德·布斯塔尼的《隐士》，黎巴嫩作家纳吉布·加尔古尔的《伊莲娜》、《女人心中的恶魔》、《女杀手》，等等。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有《巴格达的伊斯兰文明》(开罗，1883年)，这是一部描写哈伦·拉希德统治时期(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的书信体作品。该书的作者是黎巴嫩的侨民作家扎米里·穆达瓦尔(1862—1907)，他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太在意叙述是否有趣，而是站在与其志同道合的启蒙思想家扎马尔·阿迪恩的立场上描绘了整个历史事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长篇小说巨匠杰尔吉·宰丹(1861—1914)创作了自己的头几部历史小说。

埃及作家、国家图书馆的创始人阿里·穆巴拉克(1823—1893)也延续了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发展的训诫文学传统。他的四卷本小说《阿拉姆·阿迪恩》，讲述的是埃及的一个学识渊博的酋长阿拉姆·阿迪恩(小说就是

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他的儿子布尔汗·阿迪恩和一个英国的东方学家一起到巴黎旅行的故事,而这一情节在十九世纪阿拉伯文学中已成为了传统。整部小说是由旅行中的对话组成的:英国人向同伴介绍了欧洲文明的成果,而酋长则将东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介绍给了英国人,在旅途中他们探讨着大自然里的各种现象、植物、动物等。这部作品并不像真正的游记一样生动和引人入胜,但却向读者传达了许多有益的信息。而这也是当时的历史小说所具备的显著特征。

在这些年间,短篇小说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的确,虽然训诫题材的短篇小说经常刊登在各类杂志上,但在这一领域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出现。

与此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翻译作品。翻译活动不再像十九世纪中期那样仅仅涉及科技、教学文献,还拓展到了艺术领域。大多从法语和英语翻译过来的作品渐渐成为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翻译作品的开明态度得益于启蒙思想的传播。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与十八世纪欧洲的翻译活动一样,主要是根据内容和风格对作品进行改编和改写。阿拉伯的翻译工作者非常关注符合时代需求并适合改编的作品,如他们对大仲马、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就非常感兴趣。此外,他们还重视从好的作品中汲取各种各样有益的知识,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就是这样。

1870年,在伊斯玛伊尔总督的倡议下,在埃及创办了一个专业的剧院。而伊斯玛伊尔将这个剧院的组织工作交给了雅库布·萨努。非常熟悉欧洲剧院发展和欧洲戏剧的萨努亲力亲为,开始为新的剧院编排剧目。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他就写出了三十二个剧本,其中包括了许多五幕喜剧和一幕闹剧。剧本的故事情节常常取自于作者所熟知的欧洲戏剧,然后加以改编,使之具有阿拉伯文化特色,如将故事场景换到埃及,重新给故事人物命名,同时还加入了许多生活化的语言。剧本常常是讽刺喜剧,萨努通过这些作品讽刺了愚钝并且盛气凌人的帕夏和封建君主,对一夫多妻制等社会上的封建残余思想进行了批判,也嘲笑了自己的同代人的无知和落后。剧院取得了成功,总督对他非常尊敬,甚至将他封为"埃及的莫里哀"。但很快,尊敬变成了不满:伊斯玛伊尔认为戏剧《祖国和自由》是对他本人和赫迪夫制度的侮辱。于是,剧院被迫关闭。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两个叙利亚侨民——记者阿吉卜·伊斯哈克和阿拉伯第一位剧作家的侄子赛利姆·奈卡什在亚历山大市开办了一个剧院。在这个剧院里上演由马龙·奈卡什精心修改过的莫里哀的喜剧,其中《悭吝人》一剧大获成功。此外,该剧院的工作者还翻译了大量法国古典悲剧作品,如拉辛的《安德罗玛克》和《淮德拉》、高乃依的《贺拉斯》等。

而在叙利亚，当时是没有专业剧院的。但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大量的业余兴趣小组和叙利亚启蒙协会中，却排练表演了大量的戏剧作品。如在大马士革，1868 年就上演了诗人易卜拉欣·阿赫达布（1826—1891）的五幕诗体悲剧《亚历山大大帝》。阿·克雷姆斯基评价说，在该剧中作者的想象多于历史，他认为诗人的另外一部作品《伊本·扎伊顿在安达卢西亚》更为成功。

赛利姆·布斯塔尼同样是杰出的剧作家，他创作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剧本，并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不过，他最著名的剧作还是以马杰侬和莱拉的爱情故事这一传统情节为基础创作的《盖斯与莱拉》，而这部作品也明显受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影响。这部戏剧于 1868 年在贝鲁特被叙利亚启蒙协会的活动家们搬上了舞台。

十年之后，在贝鲁特的一个名为"文学之花"的文学戏剧协会，又一个悲剧作品成功上演，这便是哈里里·雅齐吉（1856—1889）在借鉴了阿拉伯传说之后所创作的《勇敢与忠诚》。哈里里·雅齐吉是易卜拉欣·雅齐吉的弟弟。《勇敢与忠诚》讲述的是主人公为已经被判死刑的朋友进行担保的故事。这部作品风格高雅，显然受到了法国古典主义剧作的影响。1884 年，这部作品首次发表。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戏剧依然按着喜剧和悲剧两条线继续发展。喜剧方面的杰出代表是埃及剧作家扎里亚里·穆罕默德·奥斯曼。他非常成功地改编了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女学究》、《太太学堂》、《丈夫学堂》。在这些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场景全部改到了十九世纪的开罗。剧本运用了口语化的语言，而一些埃及地名、《古兰经》中的语句、民间的笑话则赋予了作品埃及民族特色。但遗憾的是，扎里亚里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上演。

扎里亚里还翻译了许多古典悲剧，如拉辛的《亚历山大大帝》、《伊菲革尼亚》、《以斯帖》，高乃依的《熙德》、《贺拉斯》。而最擅长以充满诗意的语言翻译和改编欧洲戏剧的，则是生活在埃及的黎巴嫩侨民纳吉布·哈达德（1867—1898）。他的译作有：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高乃依的《熙德》、《西拿》，拉辛的《淮德拉》、《贝蕾妮丝》，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雨果的《欧那尼》。同时，他自己还创作了两部历史题材的悲剧：《萨拉赫·阿伊尤比特》（情节上借鉴了司各特的《护身符》）和《贝都因人的报复》（源自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历史）。

哈达德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古典主义的固定模式，在摒弃了三一律原则的同时，将一定的感伤主义情怀融入了作品之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的作品一直是埃及剧院舞台上最受欢迎的剧目。

第三章 伊拉克文学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伊拉克的经济开始好转。在这一时期，国际市场对出口的农业产品的需求增加，由此促进了伊拉克农业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和运输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文化的繁荣。在国内新建了许多学校，而原有的手稿形式作品已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对文学的需求。1856 年，伊拉克建立了第一批印刷厂：卡尔巴拉的伊斯兰教印刷厂和摩苏尔的基督教印刷厂。

1856 年 2 月 18 日苏丹颁布诏书，其中特别强调了各种经济活动和宗教平等的意义，正是这一诏书对伊拉克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伊拉克的知识分子不断地支持着经济、政治、文化改革。与此相关的一些作品值得注意，如巴士拉一名酷爱神学和诗歌的高官艾哈迈德·安萨里（1803—1885）写下的论著《巴士拉局势解读》（1861）。这部论著充满了公仆意识和启蒙思想。安萨里呼吁在巴士拉的土耳其总督在所有的管理事务中都要遵循正义的原则，保护人民免遭专横的官僚阶级的欺压和土匪猖獗的侵袭，创办学校，鼓励科学发展，修筑农田灌溉设施。在这部论著中，安萨里同时还试图提醒总督，应把公正管理自己的辖区看作是自己的公民义务。在反抗奥斯曼帝国独裁暴政的斗争中，安萨里并没有横冲直撞，而是采用迂回的间接手段，如倡议改革等。他断言，在伊拉克的总督不仅不会反对奥斯曼帝国，反而还会帮助巩固其政权。

安萨里的启蒙思想得到了他周围的一些诗人的支持。这些思想影响着伊拉克的社会意识，同时也影响着伊拉克的文学创作。作家们开始运用新的题材进行写作。在阿卜杜·巴吉·奥麦里的诗集《解药在明善恶的人的手中》（开罗，1896 年）的手稿中，作者一方面遵循了古代文学的风格形式并采用了传统的题材，另一方面也涉及了新时期的文明成就渗入伊拉克并产生深刻影响这一主题。在该诗集中还有阿拉伯文学中第一首描写新时代科学成就的诗作，在该诗中描写了 1861 年在伊斯坦布尔和巴格达之间开通电报线路的事件。在这首诗之后，越来越多的伊拉克诗人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宣扬科学技术的进步。例如，易卜拉欣·塔巴塔巴伊（1832—1901）和扎阿法尔·沙尔基（1842—1892）就描写了在伊拉克投入使用的蒸汽电车。但这些诗歌拘泥于中世纪的诗学理论，对技术革新的描写非常抽象。因此新的题材并没有跳出旧文学传统的窠臼，这些诗歌反倒让人觉得更像是字谜游戏。因为伊拉克电报线路的开通，伊拉克的诗歌文学曾试图创造一种新的体裁样式。这种体裁被称为“电报诗”，由两个押韵的诗行构

成。在寥寥数字中诗人应该像电报一样传达具体的信息。"电报诗"是伊拉克诗人穆罕默德·卡兹维尼(?—1916)创立的。通过这一体裁,诗人表现了多样的主题:颂辞、哀歌、祝贺,此外还有写给土耳其的统治阶级的,诗人在诗中请求他们帮助开通运河并在幼发拉底河修筑大坝。不过,"电报诗"在伊拉克只是昙花一现,这种体裁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启蒙思想渗透、体裁革新的同时,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伊拉克诗歌文学也保留了自身的传统特点,进一步影响着伊拉克人民的精神生活。

伊拉克诗人对于土耳其政权的不满源自于什叶派穆斯林的思想。在伊拉克,对什叶派受难者,尤其是对阿里和他的儿子侯赛因的崇拜是极为普遍的。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什叶派一直要求从阿里的后裔中选出一名哈里发。这样的要求不但被土耳其逊尼派首领看作是宗教异端,还被认为是充满敌意的政治宣传。而对于什叶派群众来说,为伟大的受难者报仇就是要反抗土耳其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什叶派的思想得到了众多阿拉伯诗人的支持。这些诗人信仰阿里,同时拥有"赛义德"这一光荣称号,说明其延续着穆罕默德世系。在这些诗人之中,"赛义德"哈伊达尔·希里(1830—1887)是杰出的代表。在诗集《举世无双的珍珠》(孟买,1885年)中,作者向世人呈现了多种体裁的阿拉伯古典诗歌文学,不过,诗人最为出名的作品还是带有悲观色彩的哀诗。而在充满宗教热忱并号召人们在战斗中自我牺牲的诗歌中,"赛义德"扎阿法尔·希里(1861—1898)和"赛义德"阿卜杜·穆特塔里布(?—1920)强烈要求土耳其统治者将宗教的统治权力和政权还给什叶派,并表达了反抗土耳其政权,打响解放战争的坚定决心。

615·

为了打压什叶派,奥斯曼政权千方百计地支持在伊拉克的苏菲主义秘密团体。许多诗人通过自己的作品传播苏菲主义学说,他们所创作的赞歌和抒情诗大多是描写苏菲主义各教派创始人的生活片段和神秘情欲的。意象的运用在伊拉克的苏菲主义诗人的创作中是非常普遍的。比如,易卜拉欣·塔巴塔巴伊的大部分诗作都遵循了苏菲主义的传统,从而具有两层结构。在第一层结构上,主题受到传统体裁样式的制约;但在诗中意象的背后还有第二层结构,反映着作者的苏菲主义观念。

阿拉伯著名诗人阿卜杜·穆赫辛·卡济米(1865—1935)是塔巴塔巴伊思想的继承者,曾获得"阿拉伯人诗人"荣誉称号。在他早年的作品《伊拉克诗集》(创作于1897年移民埃及之前)中,主要有四种体裁:爱情诗、颂辞、自夸诗、哀诗。在人们的身上,诗人只看到了三种美德:渊博的学识、豁达、勇敢。在自夸诗中,作者认为自己和亲人们都具备这些品质。在一系列颂辞中,诗人歌颂了出征远行的伊斯兰教军队统帅们,在诗人笔下,他们

骁勇善战，无所畏惧。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不过是朴素的人民，或是经营着小生意，或是在学校和清真寺里传播着伊斯兰教文化。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穷困潦倒，甚至无法养家糊口。

像在其他的阿拉伯圣城一样，在卡兹米耶，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而这些仪式也成为了诗人们展示才华的舞台。正是在这样的舞台上，人们发现了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卡济米，他能在创作中将贝都因部落的语言同传统诗歌中的古语巧妙地结合起来。

1891 年，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伊斯兰教改革家、启蒙思想家扎马尔·阿迪恩·阿富汗尼（1839—1897）造访了伊拉克，并与当地的神学家秘密会面。卡济米也有幸见到了阿富汗尼，并同他进行了交流。正是在这之后，卡济米的写作开始创新，启蒙思想开始融入他的诗歌之中。

与十九世纪的其他诗人一样，卡济米在创作中也遵循了旧文学的风格、体裁和主题传统。在其作品中有大量的同义词汇存在，这一现象与中世纪阿拉伯的诗歌文学一致，这是因为城市诗歌创作延续了从各部落方言中汲取词汇的传统。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的伊拉克文学中，还是出现了打破旧的思想艺术传统的革新，这一时期的诗歌宣传了民族解放斗争思想和阿拉伯世界的启蒙运动。

第四章　库尔德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库尔德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部落开始分化，贵族首领占领了大量土地。库尔德宗教特权进一步强化，这主要体现为宗教界代表本身作为封建大地主，还同时从奥斯曼当局获得了极大的权利。

当时的库尔德社会民不聊生，人民饱受饥饿和病痛的折磨，而名目繁多的苛税和征军更是加重了库尔德人民的负担，这也引发了人民的抗议。包括贝登尔汗、耶兹丹什、奥贝杜拉起义在内的众多反抗活动成为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近东历史上的大事。这些起义每次都被奥斯曼和伊朗当局在资本主义列强（主要是英国）的支持下残酷镇压。

· 616

在黑暗时期，库尔德人民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文学。杰出的诗人哈兹·卡德尔·柯伊（1816—1894）就歌颂和鼓舞了库尔德人民起义。他的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古典主义诗歌，另一种是社会题材诗。在古典诗歌的创作中，柯伊非常善于运用库尔德古典诗学的各种复杂的艺术手法和表达方式。而在他的社会题材诗中，语言却是简单明了的。为了便于普通民众接受，诗人努力简化了自己的作品：一方面试图摆脱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摒弃了古典诗歌中的一些生涩难懂的意象。

柯伊在自己的作品中鲜明地描绘着自己所处的时代，并勇敢地揭露了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真实面目："（土耳其的）统治者是进步的阻碍。/统治者在光天化日里偷盗。/官员们不过是一群狼。/而人民则是无辜的羊群！"

柯伊梦想有一天能够挣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建立一个有着繁荣科技和艺术的国家库尔德斯坦，在这个正义的国家里，人民拥有平等的权利。诗人还指出了实现这一梦想的几个重要阶段：消除部落间的矛盾，统一各部落，消除文盲，启蒙思想，最后是武装斗争。

土耳其的改革对柯伊的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从中明白，启蒙思想有着无穷的力量，它能够改变民族的命运。诗人在诗中由衷赞美了欧洲的最新科技发明，并号召库尔德人民掌握有益的新知识：

> 去掌握手艺吧，去认识科学吧，
> 何必去管它们由谁创造，是不信教的
> 　　　　是印度人还是犹太人？
> 天堂是不会属于（陷于无知泥淖中）
> 　　　　牧羊和放牛的人的，
> 只会属于那些掌握科学和知识的人。

柯伊的诗歌标志着库尔德的古典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充满了革命热情，还体现了在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支持下的国际主义情怀。

诗人梅拉·哈姆顿（1853—1915）和扎里里·艾哈迈德（1834—1904）同样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和社会现象。而库尔德讽刺诗歌的奠基人列萨·塔列巴尼（1842—1910）的创作直指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社会的不公正，因而具有特殊意义。

塔列巴尼的作品之中有着明显的矛盾之处：一方面，诗人作为苏菲教派领袖的儿子，写下了许多歌功颂德诗；同时，他也没有对那些利用宗教的伪君子视而不见。

> 教长应该早晨睡觉，像狼一样
> 　　（夜里的抢劫令其疲惫）
> 好让人们去说："教长是为苦行者，
> 深夜里精神抖擞地做祷告。"

塔列巴尼的讽刺作品对于库尔德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同时也促进了库尔德社会里进步思想的形成。

在这一时期的库尔德文学中还有另一个派别，这一派别的诗人的创作仅限于抒情诗和宗教神秘主义诗歌，这些诗歌既没有指出库尔德社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没有反映出新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思想。属于这一派别的有：萨利米·瑟恩（1846—1909）、马德吉（1849—1925）、马赫维（1830—1909）、哈里卡（1865—1909）、阿达布·米斯巴赫（1859—1916）。其中，哈里克是一名抒情大师，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米斯巴赫也同样善于抒情，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颂了世俗爱情、美好的情感、大自然以及生活中的喜乐。

总的说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库尔德文学中，启蒙思想、反教权主义和爱国题材作品及讽刺诗歌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反映了库尔德标准语的净化趋势。在这一阶段的文学中，革命精神也终于出现了萌芽，而这在后来也成为了二十世纪民主诗人创作的主导思想。

第五章　波斯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伊朗的经济持续衰落，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和反封建斗争也引发了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外来资本涌入伊朗，伊朗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列强在从伊朗攫取低价原料的同时，还试图把这里变为其商品的销售市场。这一进程使得许多大中小生产者破产。然而，外资企业、合资企业、银行的出现，工厂的建设，电话和电报的使用，在客观上也使得伊朗与欧洲国家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促进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同时也使得反封建的运动愈演愈烈，动摇着阻碍国家发展的旧秩序。

在当时的伊朗，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告诫人们，必须结束落后的封建统治，并进行进步的改革，来保障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

这一时期复杂的社会政治局势也反映在了文学之中。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波斯文学有两大趋势：一是歌功颂德式的文学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开始慢慢退出文学历史舞台；二是持反对观点的启蒙文学方兴未艾，随着民族解放思想在伊朗的普及和民主运动的深入，逐渐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

在当时，波斯启蒙文学不仅继承了之前文学的任务，还更加注重启迪伊朗人的思想，这也让文学家们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认为必须普及世俗教育，在国内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措施主要包括：修改税制、行政管理制度，发展民族工业，修筑铁路、大坝、医院、中小学校、高

等院校，等等。

进步文学家开始发表自然、地理和历史方面的通俗读物。除此之外，他们还发行了报纸，这些报纸在伊朗的一些大城市受到追捧。而后，政府对报刊实施了严格的监管，并开始追查传播启蒙思想的相关责任人，于是，波斯语的进步报刊便开始以个性鲜明的名称在国外各地发行，例如：在君士坦丁堡发行的《星辰》(1875—1896)，在伦敦发行的《法则》(1890—1892)，在开罗发行的《智慧》(1892)和《教育》(1900)，在加尔各答发行的《难以挣脱的枷锁》(1893)。这些外国的出版物还曾秘密地传入了伊拉克。在这些出版物中，伊朗的有识之士强烈谴责了政府官员的暴戾专横：他们压榨百姓，全然不顾老百姓的利益，表面上声称外国资本的流入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而暗地里却将国家的财富据为己有，并陷人民于饥寒交迫之中。

通常，私人进步报刊是由散文家和诗人主持发行的，同时他们也是报刊主要的撰稿人。例如，著名的启蒙诗人米尔扎·法拉汗尼(1861—1917)就于 1896 年开始在大不里士发行了报刊《作家》，而后他与德黑兰的报社《强国伊朗》合作，在巴库发行了报纸《教诲》的波斯语副刊。

既作为发行人，又作为编辑，使得诗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在诗歌和散文中去开启人们洞察生活的双眼。米尔扎·法拉汗尼写下了很多诗，在这些作品中，他表达了对贫困、不幸的人民的同情，揭露了统治者的独断专行，并号召人民为了真理、正义、进步、教育、文学、文化而斗争。同时，他还赞成受限的君主制。后来，伊朗出版了诗人的诗集。在诗集中可以发现，诗人并没有摆脱传统诗歌理论的影响，但他的诗风清新明快，并充满了深刻的社会思想。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评述一下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个较早时期的波斯诗歌文学。

诗人纳斯尔·舍伊巴尼(1826—1891)与雅各玛·扎恩达基齐名。他继承了前辈的思想，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比起扎恩达基，他的作品更加猛烈地抨击了专制制度。

舍伊巴尼出身于卡尚的一个显赫的家族，但其命运却是不幸的，他所继承的领地被无情地夺去。舍伊巴尼对国家彻底丧失了希望，晚年的时候他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当时在这里聚集了一批反对伊朗国王的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诗人在这里获得了自由，于是开始勇敢地创作。在作品中，诗人彻底揭露了伊朗统治阶级的丑恶行径。

舍伊巴尼一生创作了非常多的诗歌作品，他的诗虽然保留了古典体例，但在内容上却与之前的诗歌有着很大的不同，凸显出其对时局的清醒认

识、对国家衰落的哀痛和思想的无畏。如：

> 我的爱人心惊胆战，我的朋友也一样，
> 还有祖国，哪怕国王自己也一样。
> ……
> 花园在一片慌乱之中，柏树和松树也一样，
> 还有祖国，哪怕王位和皇冠也一样。

在舍伊巴尼之前，还没有一个伊朗诗人敢于如此直接地揭露国家的阴暗面，抨击国王和现行制度。

十九世纪后半叶，翻译活动在整个波斯文学中同样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如，阿塞拜疆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米尔扎·阿洪多夫的文学、哲学作品，批判类的文章、书信就对当时伊朗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 1877 年译为波斯语的剧本和哲理小说《被欺骗的星星》等。阿洪多夫的作品非常吸引伊朗的年轻知识分子，因为作家坚决反对落后的封建制度、专横的统治阶级以及宗教狂热。

启蒙思想家米尔扎·凯尔马尼（1853—1896）是阿洪多夫的追随者之一。他模仿阿洪多夫的《三封书信》，创作了两部论著（《三封书信》和《宣言一百条》）和很多其他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之中凯尔马尼同样激烈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国王纳赛尔丁·沙及其周围人的专制、暴政和专横，以及宗教界。凯尔马尼还在自由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伊朗社会的方案，在这项方案中作家要求对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彻底的改革。

伊朗当代作家阿达米亚特在评价凯尔马尼时非常客观地写道："（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同时不失文学性和艺术性……"凯尔马尼反对传统的波斯诗歌，因为他自己在这种艺术形式上有着很深的造诣。凯尔马尼在作品中维护女性的权利，要求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男女平等。

凯尔马尼毫不妥协的积极活动引起了伊朗国王及高官的愤怒。在伊朗当局的威胁和追捕之下，凯尔马尼被迫离开德黑兰，来到了土耳其。但在伊朗当局的一再要求下，土耳其政府出卖了凯尔马尼。在回德黑兰的途中，在大不里士，凯尔马尼被残忍杀害。

启蒙思想家们通过传播科学知识、普及世俗教育，动摇着宗教的地位，虽然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着宗教，一些反抗暴政、落后和愚昧的斗争活动就经常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的。比如，一本名为《正义之子》的著作就享誉整个伊朗，甚至名扬海外。有关资料显示，这部著作是由伊朗的传教士赛义德·贾马尔、纳斯罗拉·别赫什基·马列克·蒙塔卡莱明及其他两人

共同完成的。在经历了长久的波折之后，这部著作的波斯语版本于1903年1月出人意料地在彼得堡首次出版，但实际上，这部著作很早之前就已写成，并以手稿的形式迅速传播。在这部著作中讲到：一个普通人在劳动之后睡着了，他梦见了末日审判的地府，在这里他碰到了自己熟知的伊斯法罕市的名人。他首先看到了市长，在阳间的时候多少人在他跟前卑躬屈膝、跪拜叩首，而在这阴曹地府里，他却要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往日尊贵的市长，因为禁止启蒙思想的传播，禁止发展科技、普及知识，压榨人民，聚敛财富，如今变得软弱和可鄙。因为自己的罪行，市长被投进了地狱。在末日审判那天，包括伊斯法罕市市长在内的很多"达官显贵"都没有被宽恕。

619· 在作品的结尾，故事的主人公从睡梦中醒来，然后给自己的朋友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梦境。朋友听后感叹道："我亲爱的朋友，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现实，没有任何夸张。"

在波斯语的作品中，还有一本匿名发表的《伊朗旅行者与印度人的谈话》。在这部作品的前言之中可以发现，作者是从1884年开始进行观察的，而1894年，作者就已经开始分章节地在定期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作品了。作品中两个人的谈话，有些时候更像是争论，实际上触及世俗社会中的一些非常迫切的问题。伊朗人向印度人讲了许多伊朗的事，比如苛税重赋、法庭之上毫无正义可言，等等。印度人对伊朗的专制独裁感到非常惊讶，他向伊朗人讲述了欧洲国家的——尤其是英国的国家体制、法律等问题。

不难想象，在当时，这类作品极大地启迪了人民的心智。十九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的波斯文学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并为二十世纪初更为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第六章 阿富汗文学

十九世纪中叶，在内部封建割据和英国殖民者的外来入侵之下，阿富汗杜兰尼王国的繁荣不再，逐渐分裂为众多独立的公国。但在六十年代，又出现了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的统一趋势，而一些社会政治、文学活动也与这一趋势同步，开始变得活跃。在文学上，一些新的潮流出现，启蒙思想开始萌芽。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封建贵族出身的作家所写，实际上，并未脱离传统思想的樊篱。诗歌文学还是以模仿传统颂辞的歌功颂德诗为主（如法伊斯·穆罕默德·阿洪扎德、米尔扎·穆罕默德-詹的作品）。一些皇

室成员也加入到诗歌创作的行列之中，其作品格式较为死板，艺术手法陈旧。当时的阿富汗埃米尔多斯特·穆罕默德汗之子萨尔达尔·艾哈迈德汗(1827—1897)便是这一派人物的代表。

这一时期的文学中最有势力的是教权主义主题，具体体现在众多神学专著、正统学说注解，甚至是一些渗透着宗教神秘主义的散文和诗作中(多斯特·穆罕默德·哈达卡、巴瓦尔汗、姆拉达·阿里·卡玛维等人的作品)。而起源于杜兰尼王朝(十八世纪下半叶)的编年史创作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苏丹·穆罕默德·哈里斯·阿布达里、努尔·穆罕默德·康达加莱·努里、米尔扎·雅古布·阿里·哈维·喀布尔等人创作了大量的历史文学作品。

据众多阿富汗作家记载，虽然这一时期的阿富汗非常闭塞，国内四分五裂，还在1838—1842年的第一次英阿战争中遭到侵略，但关于欧洲工业革命和其他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的消息还是传入了阿富汗。在众多的阿富汗统治者中，阿里汗国王(1863—1879年在位)首先意识到了改革封建国家体制的必要性。

在当时的条件下，阿里汗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仅有一小部分成为了现实，如发展印刷业和发行定期刊物等，正是这一措施使得新的文学潮流得以进一步深入发展。1867年，国内的第一本杂志《喀布尔》开始发行。1871年，阿富汗的首份报纸《沙姆斯·那哈尔》开始发行(每两周发行一次)。而当时采用的还是石板印刷的技术。 ·620

在最早的石板印刷书籍中，有几部作品就违背正统伊斯兰教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哈基姆·沙赫和穆罕默德·伊斯哈格发表了论著《两海相汇或新旧思想对比》。1875年阿里汗自己也出版了一部作品，名为《射向背叛信仰者的天空之箭》。这些政论作品，不仅是对抽象的宗教神学的讨论，在当时，还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英国殖民者在1878—1880年间发动的第二次英阿战争，不仅使阿富汗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贸易减少、手工业衰落、众多文化财富毁于一旦，同时也阻碍了国内出版业的发展。二十多年之后，阿富汗的报刊发行才得以恢复。

1880年，阿卜杜·拉赫曼汗继位，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了1901年。在这一时期，阿富汗成为了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新的国王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千方百计把阿富汗变为一个封闭的国家。而英国殖民者在战争结束后控制着阿富汗的对外政策，这也阻碍了阿富汗人与周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阿富汗国内政治思想领域有着一

个突出的现象：封建君主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君主权力至高无上的思想被大肆鼓吹。

在阿卜杜·拉赫曼汗统治时期，总共有四十多本不同内容的书籍出版。在这些书籍中，最为重要的自然是关于专制政权本质的论著：《世俗和宗教教育》(1885)、《国家统治者宣传圣战》(1887)、《虔诚的信仰》(1888)、《智慧的明镜》(1893)，等等。

阿富汗出版业发展的第二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出版的刊物开始关注世俗文化和文学。所有准备出版的作品都必须经过国王本人严格的审查。1900年，《拿破仑一世传》出版，在这部作品中有大量阿卜杜·拉赫曼汗加入的注解，这也反映了国王对法兰西王国的关注。而《卡里莱和笛木乃》的出版也并非偶然，在这部作品中也有很多地方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而这部作品的选段则是以《世界之窗》的名字出版的。1887年，坎大哈女诗人阿伊莎·杜拉尼的《诗集》之所以能够出版，也是因为统治者的个人兴趣。1897年，扎米的长诗《优素福与祖莱哈》被译成了普什图语。在同时代的诗人之中，国王最为欣赏的是拉赫马特·巴达赫什(生于1863年)，因为他的诗歌创作不管从风格还是从内容来讲都遵循了传统。

虽然十九世纪末的阿富汗书面文学并没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也没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但民间文学仍在进一步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当地民间说书人的口头创作上。同时，国家的政治事件也在诗歌和民歌中得到了反映。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成为了这一时期阿富汗民族诗歌的主旋律。而在当时，与爱国主义诗歌并行的还有爱情诗。

第八编　南亚及东南亚文学

本编序言

十九世纪下半叶，南亚及东南亚进入殖民统治阶段。这一地区的文化或多或少继承了古印度文化的传统，古印度文化曾为中世纪南亚及东南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57—1859 年，英国殖民当局对著名的西帕依起义进行了镇压，并于 1885 年侵占阿瓦国首都——“金城”曼德勒，随后又将缅甸纳为印度的一省；八十年代末，英国殖民者侵占了马来半岛及北加里曼丹岛上的大部分马来公国及其附属国。1887 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布建立包括柬埔寨王国领属的越南地区在内的中印联盟，1893 年，又增加了法属老挝。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占领了位于加里曼丹岛西部和东南部沿岸地区及印度尼西亚其余岛屿的大部分公国，并将这些地区置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控制之下。即便如此，野心勃勃的荷兰殖民者仍不满足，企图侵占马来群岛的最后一个强国——亚奇苏丹国。

由于欧洲殖民当局并不急于按照西方模式对殖民地的文化、社会制度及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因此殖民地的民俗文化实际上并未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由于菲律宾皈依了基督教，故该地区除外)。罗阇、苏丹统治时代的传统文学也得以继承。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各个地区的文学发展并不平衡。这一时期，老挝文学日渐衰落，这与其动荡的国内局势不无关系。而此时大部分的宫廷文学通过模仿国外经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以克什米尔和尼泊尔为例，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宫廷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来自巴厘岛的大量佚名作家及许多优秀的乌尔都语诗人，如纳瓦布・米尔扎汗・达格、阿米尔・艾哈曼德・米纳伊。

此外，欧洲殖民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传统文学的发展，殖民统治下的许多国家试图通过发展传统文学来继承和复兴民族传统。这一时期，泰国、斯里兰卡、中爪哇及马来亚内苏丹国的文学发展别具特色。阿瓦

国国王敏东(1853—1878 年在位)在国内推行了“佛教复兴”改革,号召缅甸文学回归宗教,从民间创作中汲取精华(这一时期宫廷文学注重歌谣的创作)。佛本生记、布道及注释文学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形式。除此之外,还进行了诗歌语言的口语化改革,文学的民主化、现实化改革及戏剧改革(以吴邦雅为代表)。这些现象说明,十九世纪下半叶,当地文学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十分有限,各国已经开始摸索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

十九世纪末,以现代化为标志的南亚及东南亚各殖民地区的“欧化”进程显著加快,殖民地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地文学的艺术潜力为这些非西方类型的现代化提供了实体条件。这种类型的社会前提,应该被看作是当时形成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环境下(苏联民族学家 C. A. 阿鲁秋诺夫归纳其为一种连续性)能够产生对许多西方文化和文学现象的扬弃、再现、模仿以及最终结构上进行集成。这一环境自然而然会首先形成于当地文化和欧洲文化最剧烈和最长久接触的地区。占据首要位置的是印度(首当其冲的是孟加拉,其早在十八世纪就处在英国影响范围)及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几乎全部被西班牙人基督教化的斯里兰卡、菲律宾和荷兰治下的东印度。上述三个地区中这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主要集中于像加尔各答、马尼拉、雅加达这样的工业贸易及行政活动的前哨城市,这些活动涉及了外来的、当地的、混杂的、杂居的城市居民。

作为南亚及东南亚现代化的发源地,这三个地区具有鲜明的特点。教会学校、世俗学校的建立及定期出版物的发行,对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即新型读者和作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出版业的发展,阅读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精读代替了泛读,朗读代替了默读)。学习欧洲文化及文学对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当地知识分子崇拜欧洲文化也无可非议。苏联文化学家格·索·波梅兰茨曾说过:“欧化教育最大的意义在于启蒙:进步、发展、人权及公民权利。这是欧洲留给亚洲最大的财富……”当地作家热衷于批判一切与启蒙思想相矛盾的现象,如社会弊端(包括宗教蒙昧主义)、殖民主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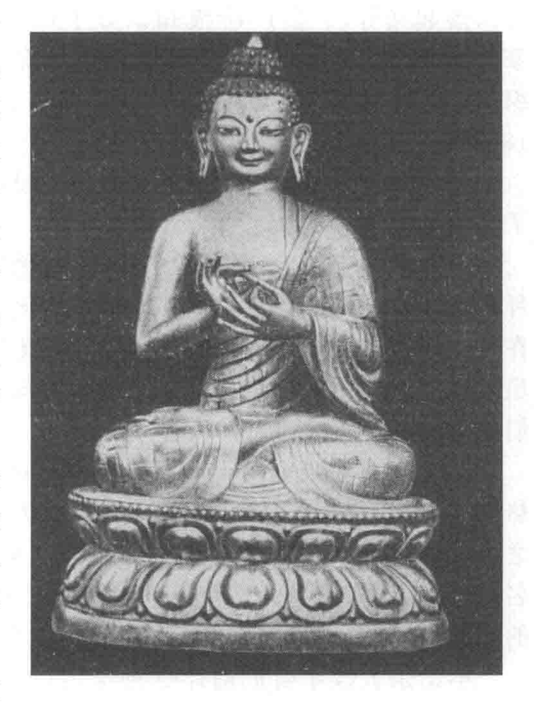
欧洲的理性主义与新时期当地文学发展的两个必然阶段——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奇妙结合。同时,在以丹尼尔·笛福、司各特、大仲马、儒勒·凡尔纳、雷诺兹、蓬松·杜泰拉伊、保罗·德·科克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欧洲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当地特有的价值标准。地方文学(包括其他亚洲地区)的现代化包括增强文学的信息功能,更新文学作品的题材(避免一味的说教),研究能够反映现实的文学语言,以及推进文学类型的结构性改革。

文学传统、文化背景及社会历史的不同使得各地区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时,不可能取得千篇一律的成效。

孟加拉语文学、马拉地语文学、古吉拉特语文学以及后来的印地语文学、乌尔都语文学，共同构成了一幅绚烂多彩的文学图景。而这离不开各民族自身的文学传统及共同的印度文化的推动，各社会阶层的共同努力，印度文学自身的发展以及对欧洲先进文化的学习借鉴。这一时期地方戏剧得以复兴，并且出现了揭露印度社会问题的新型戏剧(《蓝靛园之镜》，迪纳本图·米特拉)；此外，还产生了小说，虽然这时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模仿英国启蒙小说和历史小说；诗歌现代化的首次尝试也出现在这一时期。

由于荷兰人对殖民地采取文化隔离政策，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下的殖民地区的文学丝毫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直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当地才出现了那些使用"市井马来语"，向往欧洲文化并有机会间接接受世俗教育的"二等公民"。"市井马来语"的书面形式以拉丁语为基础，与传统的马来语并没有很大关系。但当地的出版物都采用这种语言，欧洲(大部分为荷兰语小说)及中国的惊险小说也被翻译成这种语言进行出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人们开始尝试着将"市井马来语"按传统诗歌语言的形式书面化。随后便诞生了第一部用"市井马来语"创作的音乐喜剧。

这一时期的菲律宾也经历着类似的情况。菲律宾在沦为殖民地前并没有书面语，接受基督教后，为了编纂经书，当地人将中世纪时期的西班牙语移植到本土语言上，创造了书面语。由于这种混合语的使用较为复杂，因此，十九世纪下半叶，部分菲律宾知识分子开始直接用西班牙语创作以加快菲律宾文学的发展，这一举动得到了殖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西班牙语创作诗歌、散文等。菲律宾文学和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学一样，也致力于反教权斗争，热衷于大仲马和欧仁·苏等人的作品。浪漫主义作家何塞·黎萨尔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代表作为《不许犯我》。



释迦牟尼 青铜像 十九世纪 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苏联科学院人类学及民族学博物馆

总的来说，十九世纪下半叶南亚及东南亚文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发展不平衡，且前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部分城市除外）。但624·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局面便被打破了。

第一章 印度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印度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日益复杂。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并蔓延到印度边疆地区及各封建公国。随着学院、大学在各地（如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拉合尔）的开办，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开始接受西式教育；社会政治类、文学类及宗教哲学类的出版机构大幅增多；各类文化教育协会及文学社团也大大增加。所有这些促进了印度各地不同文化中心、社会组织及文化活动家之间的联系。

印度此时的社会政治局势比较紧张，殖民政府与当地群众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857—1859 年爆发了著名的民族大起义，之后在不同地区又接连爆发了各种起义（"蓝靛园起义"、普哈德克农民起义、难陀利运动、土著部落起义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向当局提出抗议，要求自主管理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但没有形成暴力革命。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组织——印度联盟（孟买）、萨瓦尔贾尼克社（西印度）、全印穆斯林联盟等，1885 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印度国民大会——全印民族资产阶级党。

各种文化启蒙、文学、社会政治及宗教改革运动的蓬勃发展，共同构成了印度复杂的社会局势。

十九世纪下半叶，传统文化复辟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被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对欧洲文化的深入思考及创造性使用。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是全人类的精神家园"这一浪漫主义思想被广泛传播，虽然这一观点并不是印度人提出的，但却被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家们成功利用。

印度辉煌的历史及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人民起义唤起了印度人民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及历史的兴趣。这成为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印度人民喜欢怀念过去的原因。早在十九世纪初，印度就出现了著名的宗教改革团体——"梵社"，之后又出现了大批这样的团体，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创建于 1876 年的"雅利安社"，它们都致力于唤醒人民的思想。

不论宗教改革者们追捧哪种学说（吠陀经、中世纪毗湿奴教的学说、商羯罗或罗摩奴阇的吠檀多论），其目的只有一个——净化宗教思想。"净化思想"就是要在欧洲思想和现实要求的影响下实现宗教学说的改革和现代化。

宗教改革者们主要研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社会伦理道德。他们反对种姓歧视、童婚，主张男女平等，并提出了保持人的劳动积极性、社会积极性及公民积极性的思想依据。社会改革家和启蒙家们（如瑙罗吉、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马·戈·拉纳德、奇普伦卡尔、阿加尔卡尔、罗科马尼亚·提拉克等）共同营造了印度今后的思想及文化氛围。

穆斯林团体异常活跃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以赛义德·阿赫默德汗、阿尔塔夫·侯赛因·哈里为首的一批改革家强烈要求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伦理及文化。

在殖民当局的煽动下，这一时期印度教启蒙者和穆斯林派启蒙者之间的不信任和不满越发明显。双方的思想意识形态也通过宗教鲜明地体现出来。

印度意识形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及詹姆斯·穆勒的实证论，托马斯·卡莱尔的学说以及欧洲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

除了实证主义，印度人的思想还深受英国浪漫主义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实践的影响。印度人崇尚个人主义的浪漫情怀，追求个性崇拜。但印度启蒙者们认为个人主义应包括爱国主义和公民责任两方面的内容，他们将为国家和社会进步而作出的牺牲视为个性的体现。

复杂的思想政治形势在印度文学中得到了直接体现。印度文学此时正受到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艺术方法及艺术流派（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启蒙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共同影响。通过整合不同的艺术流派，印度文学形成了复杂的美学艺术体系。这不仅是十九世纪整个印度文学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二十世纪印度文学的特点。

印度人民一直致力于对精神问题的探究思考，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传统意识的革新，主要体现为扩大美学视野，以现实为导向发展文学，丰富文学体裁。人们认为文学应当公正地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弊端，培养读者高尚的道德情操及社会积极性和公民积极性。少数文学作品流露出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但这一时期的印度文学还是以反封建为主。那些反对殖民主义的作家们，甚至是激烈抨击殖民主义的作家，仍旧对殖民当局抱有幻想。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妄想通过参与国家管理来缓解殖民压迫。

以家庭生活及社会改革为题材的小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历史小说逐步确立，并出现了以社会政治生活为题材的讽刺剧及神话音乐剧——桑吉特。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在于国内的文学题材元素同欧洲文学有机结合。

虽然与孟加拉语文学、马拉地语文学、乌尔都语文学相比，欧洲文学比

较发达,但欧洲文学体裁在进入印度之初,并没有得到青睐,直到半个世纪
626・后,才真正流行起来。这是因为印度作家们已经习惯了与自身美学价值体系相符的印度传统文学中的各种创作形式及内容。这场斗争以欧洲文学的胜利告终,但欧洲文学在这一过程中也被削弱。梵语小说、乌尔都语达斯坦小说等传统文学体裁给印度现代小说打上了民族烙印。梵语戏剧对印度戏剧的影响则更为深刻。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兴趣的日益增长,许多梵语经典作品、神话、《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及中世纪的诗歌被译成印度民族语言,这也是印度人民反抗殖民文化的体现。与此同时,中世纪的宗教抒情诗也得到了继承发展。

那些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还停留在中世纪题材旧轨中的文学逐步进入"启蒙"阶段,由此产生了新的散文及诗歌题材。这些文学首先包括阿萨姆语文学、奥里亚语文学、马拉雅拉姆语文学、泰米尔语文学、泰卢固语文学和印地语文学。它们在欧洲文学和孟加拉语文学、马拉地语文学等相对发达的印度文学的影响下,经历了结构性的改革。

1. 孟加拉语文学

同十九世纪上半叶一样,孟加拉语文学仍然是全印文学中的先锋:它率先对印度现代社会最尖锐的问题作出回应,比其他地区文学更早确立起最为发达的和多种多样的艺术掌握现实的形式。孟加拉语文学以其对社会迫切需求的针对性、体裁体系的广泛性,对印度其他地区知识分子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政论性普遍体现在戏剧、诗歌和散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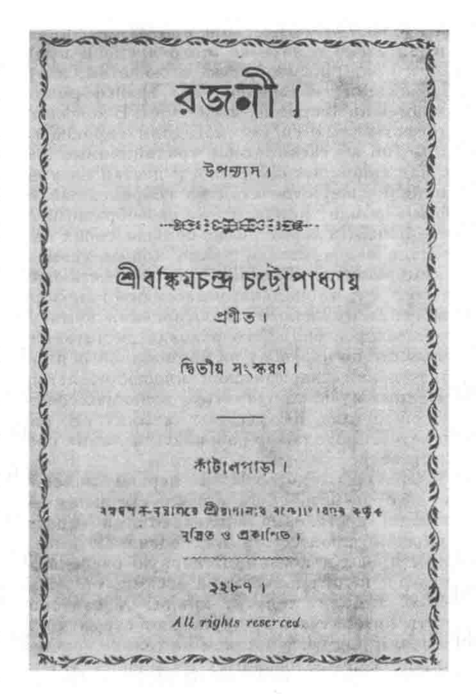
十九世纪,没有一部作品能像迪纳本图・米特拉(1829—1874)的《蓝靛园之镜》(1860)那样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该剧通过描写蓝靛园农民的悲惨命运及他们与白人蓝靛园主的斗争,揭露了殖民主义经济政策的残酷性。种植园主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农民的暴力反抗(蓝靛园起义)。在该剧的序言部分,作者寄希望于英国女王和印度总督能够"拿起权杖",惩治种植园主。当然,作者的希望落空了。但该剧引起的反响却远远超出了作者的预期。不久,该剧被禁,出版商隆格也被控"散布谣言诽谤政府"。

迪纳本图・米特拉的戏剧是十九世纪孟加拉现实主义戏剧的巨大成就,也正因为他,农民题材才得以在孟加拉语文学中确立,而其他印度文学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广泛涉猎该题材。《蓝靛园之镜》是印度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直接描写残酷的英国殖民政策的作品,这势必引起英国殖民当局恐慌。《蓝靛园之镜》对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产

生了深远影响。

迪纳本图·米特拉创作的《被迫守寡》(1866)、《疯老头的婚事》(1866)等戏剧批判了传统社会及道德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虽然这些戏剧也广受欢迎,但没有一部能像《蓝靛园之镜》那样具有如此深刻的社会意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孟加拉语文坛出现了讽喻剧。1873年,本多巴拉雅耶·提罗金德尔的戏剧《印度母亲》上演。戏剧的主人公是印度母亲和她的孩子们——印度各族人民和英国人。母亲埋怨儿子们不关心她,任其受苦、挨饿。但儿子们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无法为国家服务,也不能经商。于是,母亲请求维多利亚女王减轻儿子们的痛苦。最后,"善良的英国人"赶走了"恶毒的英国人"。


রজনী।

উপন্যাস।

শ্রীবঙ্কিমচন্দ্র চট্টোপাধ্যায়

প্রণীত।

দ্বিতীয় সংস্করণ।

কাঁটালপাড়া।

বঙ্গদর্শন-যন্ত্রালয়ে শ্রীরাধানাথ বন্দ্যোপাধ্যায় কর্তৃক

মুদ্রিত ও প্রকাশিত।

১২৮৭।

All rights reserced.

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小说《罗久妮》的扉页

该剧号召印度各族人民消除矛盾,走向统一。虽然该剧刻意掩饰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但仍体现了反抗殖民主义的思想。

部分作家还对柴明达尔地主阶级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启蒙者们认为在争取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反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远没有反殖民主义来得重要。启蒙主义道德观认为任何社会矛盾都可以通过道德的力量加以消除,社会压迫和殖民统治亦是如此。这种观点对印度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很大影响。

米尔·阿什拉夫·侯赛因(1847—1912)的《柴明达尔的镜子》(1873)和乌宾德拉纳特·达什(1848—1895)的《绍罗特和绍罗特们》、《舒连德罗和彼诺季尼》(1875)是以反封建、反殖民主义为题材的戏剧。其中,《柴明达尔的镜子》深受《蓝靛园之镜》的影响,该剧通过描写受尽压迫的农民们奋起反抗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孟加拉残酷的社会现实。

达什的戏剧在孟加拉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戏剧《绍罗特和绍罗特们》的主人公——年轻的地主绍罗特积极投身于印度的解放事业。他放弃了爱情和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孤独的主人公却发现,印度人民还没有

做好革命的准备。该剧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奇遇、暴行、枪击、凶杀等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情节。主人公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和完美无缺的道德品质，使得该剧深受孟加拉人民的喜爱。而戏剧《舒连德罗和彼诺季尼》则无情地批判了殖民统治下专断不公的司法体制。该剧中，达什并没有刻画殖民统治下受苦受难的印度人民的形象，而是塑造了敢于争取权利的斗士的形象。

戏剧成为了新时期最主要的艺术形式。由于戏剧相对简单易懂，所以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都能较好地理解和掌握。反殖民主义戏剧作品的大量出现使得殖民政府深感忧虑。英国殖民当局开始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并于 1876 年颁布了《演剧法》，禁止发表反殖民主义题材的作品。以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戏剧作品被禁后，越来越多的作家转而创作神话剧、历史剧以及宗教题材的戏剧。

这一时期，孟加拉语诗歌得到了很大发展。诗歌的思想内容、题材形式以及写作手段都得到了丰富。大部分诗歌都以爱国主义为题材。诗人们强烈要求复兴印度文明。一方面，他们为印度灿烂的历史文化感到骄傲，同时又为饱受殖民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感到痛心。海姆金德尔·本多巴拉雅耶(1838—1903)和诺比金德尔·申(1847—1909)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海姆金德尔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多托的继承者。他写过各种题材的诗歌，其中，爱国主义诗歌最出名，这些诗歌都收录在《诗歌集》(1870)中。《印度的哭泣》和《印度之歌》是其中最著名的诗歌。后者还成为了孟加拉民族解放运动之歌。“起来吧，愤怒的印度!”——这是诗人向同胞们发出的呼唤，如此坚定的呼唤在印度文学史上还从没有过。该诗歌随后便遭禁。

《弗利特伏诛记》是海姆金德尔·本多巴拉雅耶受多托《梅克纳之死》的影响而创作的神话题材的长诗。该诗由自由诗和韵律诗两部分组成，以印度传统神话中恶魔与上帝斗争的故事为情节，赋予了这场斗争新的意义。诗歌的主题思想与诗中达德希奇的形象紧密联系，圣人达德希奇为拯救上帝而献出了生命，诗人借此颂扬了舍身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海姆金德尔·本多巴拉雅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反映处于殖民制度和传统社会道德压迫下的人民的心态和感受。抒情长诗《思绪》反映了诗人对道德专制和个性丧失的不满。

诺比金德尔·申的诗歌中充满了诗人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印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时刻牵动着诗人的心。诗人塑造了印度母亲——女神迦利的形象(《为死者祈祷》)，她鼓励自己的骑士儿子们为国家荣誉而战。诗人认为印度的悲剧在于印度人民与世隔绝。在长诗《普拉西之战》(1875)中，诺比金德尔·申以史料为依据，讲述了孟加拉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故事。诗人认

为印度战败的原因并不在于英军力量强大，也不在于印度人民缺乏勇气，而在于人民不团结以及部分封建贵族的背叛。印度统一成为了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学创作题材。诺比金德尔·申依据该题材创作了诗歌三部曲《拉伊波托克》、《库卢克舍特罗》、《普罗布哈什》。“统一的宗教，统一的民族，统一的政治。如果不建立统一的印度，那么，母亲的身躯将被撕成碎片”——这是克里希纳神对印度的警告。克里希纳的形象贯穿于这三部诗歌，它是印度统一的象征。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描写人的内心世界的诗歌。十九世纪下半叶，诗人们开始关注人对自然界中美的感受，由此产生了风景抒情诗；而爱情作为重要的精神财富，也得到了普遍关注。当然，欧洲文学以其丰富的抒情诗题材，对此时的印度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民间抒情诗的创作也十分活跃。它们极大地丰富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印度文学。故乡的风景让诗人想起了伟大的祖国母亲，想起了祖国广阔的土地、巍峨的山脉和鲜花烂漫的山谷（《友谊和告别》）。诺比金德尔·申还创作了一系列热情洋溢的爱情诗。

崇拜自然，反对压制人内心的需求，在比哈里拉尔·恰格尔沃尔迪（1835—1874）的诗歌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诗人对人类细微的心理变化十分敏感，对大自然也有独到的领会。他的诗歌并不热情洋溢，而是充满了诚挚的忧伤。诗人痛恨自己面对受尽屈辱的祖国却无能为力：“祖国母亲啊，我们不是您的好儿子，/我们忘记了您受的苦——/敌人鞭打我们，侮辱我们，/我们却只能哭泣着默默忍受。”（《大海》）

比哈里拉尔的许多诗都流露出诗人对碌碌无为的生活的不满。诗人热情地歌颂祖国的自然风光，真挚地赞美孟加拉女性（《孟加拉美女》）。《沙罗德的记忆》（1870）是诗人最著名的抒情长诗。该诗创作于诗人的妻子和友人死后不久，比哈里拉尔怀着巨大的痛苦完成了这首诗，诗中融入了诗人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

这一时期的孟加拉语诗歌确立了新的体裁——讽喻性长诗。包括海姆金德尔·本多巴拉雅耶（《希望之林》，1876年）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哥哥季真德拉纳特（1840—1926）在内的许多诗人都加入了创作队伍。季真德拉纳特以讽喻长诗《梦之旅》（1875）出名。

十九世纪下半叶，孟加拉语散文在体裁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上都得到了丰富。此外，还出现了不同的风格流派。随着劝世作品的减少，孟加拉语文学中的讽刺作品大大增加。

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政论家和浪漫主义作家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孟加拉语文学最著名的作家。他广泛参与社会文化活

629· 动，整个十九世纪的印度文化都打上了般吉姆的烙印。他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孟加拉和印度其他地区的文学及社会思想的发展方向。

《邦戈德尔雄》(《孟加拉之镜》，1872年）和《普罗查尔》(《传教士》，1884年）是般吉姆创办的以探讨社会热点问题为主的两本杂志。作家就这些社会问题，与维护“祖先的宗教”的正统派和“英式印度人”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在传播西方先进科技成就的同时，般吉姆呼吁人们继承和发展印度独特的民族文化。他试图将圣西门、欧文、卢梭、蒲鲁东、孔德、穆勒等人的学说与奥义书、《梵歌》的思想结合起来。他反对欧洲篡改民族历史的行为。在宗教哲学论文《克里希纳传》(1886)和《宗教的本质》(1885)中，般吉姆从理性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传统宗教文化；般吉姆还援引《薄伽梵歌》的内容以论证宗教的最高职责在于培养人们的爱国热情。

般吉姆为孟加拉语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必须保持孟加拉语的纯洁性，赞成语言民主化，主张文学应贴近生活，注重培养艺术家的道德责任感和公民责任感。般吉姆确立了历史题材小说在孟加拉语文学中的地位，他一共创作了七部该题材的小说：《将军的女儿》(1862)、《穆里纳莉妮》(1869)、《钱德拉谢克尔》(1873)、《快乐的所在》(1882)、《阿难陀寺院》(1882)、《黛碧・乔图拉妮》(1883)、《西达拉姆》(1886)。

为了唤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般吉姆创作了一系列以印度历史和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他笔下的主人公英勇无畏，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般吉姆善于探究历史事件和人民运动产生的根源，分析失败的原因。

般吉姆的早期作品《穆里纳莉妮》歌颂了孟加拉人在抗击突厥部落时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精神。作者认为印度失败的原因在于封建割据和迷信。

般吉姆笔下的主人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罗阇和军事将领，也有普通士兵和妇女，但他们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小说《钱德拉谢克尔》讲述了孟加拉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故事。以普罗塔普为首的起义者们由于不满殖民当局的残酷压迫，奋起反抗。勇敢的普罗塔普在斗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与优柔寡断的纳瓦布米尔・卡西姆形成了鲜明对比。

《快乐的所在》和《黛碧・乔图拉妮》都是描写民族起义的小说。《快乐的所在》描述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爆发的“桑西起义”，塑造了英勇善战、勇于献身的普通农民的形象。小说引起了孟加拉社会的强烈反响，它的成功离不开农民起义者们传唱的《母亲之歌》。这首歌之后成为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之歌。《黛碧・乔图拉妮》讲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农民起义。由于无法忍受封建地主和殖民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以穷苦的农妇普拉弗罗为首的农民们组成了起义军，反抗压迫。普拉弗罗带领人们惩治压迫者，救

助穷苦百姓。十年后，普拉弗罗没有接受任何荣誉，默默地回到家乡，过起了平静的生活。

般吉姆的早期小说主要强调反殖民主义，但其晚期作品则转向社会阶级问题。《黛碧·乔图拉妮》中的起义者们认为印度各族人民是平等的。“在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面前，婆罗门和首陀罗是平等的”——起义者说道。般吉姆在自己的历史小说中成功塑造了人民的形象，泰戈尔曾称赞道：“（般吉姆）把笔下的主人公写进了历史。”

般吉姆笔下的女性形象独具特色。战争年代，她们是英勇善战的战士；和平年代，她们则是温柔善良、忠贞不渝的妻子。非同寻常的奇遇、不可思议的巧合、奇特的民族风情以及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和十恶不赦的负面形象，赋予了般吉姆历史小说浪漫主义的色彩。般吉姆的浪漫主义以启蒙主义道德观为基础，而这种道德观又混杂了宗教学究气息及新印度教的极端主义思想。这种道德观在般吉姆晚期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认为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应受到严格控制。

· 630

般吉姆著名的历史小说《阿难陀寺院》则讲述了中世纪后期阿难陀寺院中的拉齐普特人反抗莫卧儿帝国国王奥朗则布统治的事迹。作者以艺术化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阿难陀寺院与奥朗则布之间的斗争是正义与邪恶、宽容与残忍、真诚与背叛的对抗，而胜利永远属于智慧、善良的人。作者塑造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普通人的形象以及穆斯林英雄的形象（达利亚·比比、穆巴拉克）。虽然般吉姆强调该小说不具有反穆斯林的色彩，但再现印度教和穆斯林教派之间的斗争仍旧激起了人们的民族情绪，小说对印度教与穆斯林教的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

长篇小说《柯巴洛昆杜拉》（1866）、《毒树》（1872）及《克里什诺康托的遗嘱》（1875）则反映了处于传统生活方式和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矛盾作用下的社会现实。作者通过描写家庭日常生活及女性在印度社会中的地位来体现新旧制度之间的对抗。

般吉姆十分关注人的自由和自由的界限的问题。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认清资本主义道德罪恶本质的作家。般吉姆不赞成对个性的过分提倡，并认为宗教是克制极端个人主义的有效手段。

般吉姆善于展示人物的心理斗争。其社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富有悲剧色彩，她们在情感的驱使下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幸福，但都以悲剧收场：所有女性至死也没能得到幸福。般吉姆认为只有道德才能维护家庭幸福，确保夫妻间的忠诚，自由并不意味着恣意妄为。

关于个人自由，般吉姆首先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当时部分印度知识分子的影响颇大。在小说《克里什诺康托的遗嘱》、

《毒树》和《罗久妮》中，作者对这类知识分子进行了严厉批判。讽刺手法被广泛运用于般吉姆的文学作品。《民间游戏》(1874)和《柯摩拉康托》(1885)两部文集收录了包括讽刺模仿作品、杂文、抨击性小品文、讽喻童话、生活写生等在内的讽刺题材作品，它们反映了般吉姆对各类社会现实问题的广泛关注。

其中，《柯摩拉康托》是孟加拉讽刺文学的经典之作。主人公柯摩拉康托是一个沉溺于毒品却智慧、善良的流浪汉。作者借柯摩拉康托之口抨击残酷的殖民政策，揭露法庭的黑暗，对出卖灵魂的官员、欺骗民众的祭司及英国殖民文化的崇拜者们进行了无情批判。《民间游戏》和《柯摩拉康托》这两部作品的语言生动形象，继承了印度民间诗歌的特点。

2. 阿萨姆语文学与奥利萨语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阿萨姆与奥利萨的社会生活及文学生活都十分活跃。631・这两个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与孟加拉并不接近，但在行政上归属于“孟加拉行省”(包括阿萨姆的大部分区域)。因此，孟加拉地区的经济文化改革直接影响了阿萨姆和奥利萨。它们的民族文化也面临着被孟加拉文化侵蚀的危险。这时出现了第一批启蒙家，他们反对用孟加拉语来替代阿萨姆语和奥利萨语，号召人们继承和发展阿萨姆和奥利萨独特的文化传统。

海姆金德尔・伯鲁阿(1836—1896)和古纳皮拉姆・伯鲁阿(1837—1895)是这一时期阿萨姆语文学最著名的作家。他们促进了阿萨姆民族意识的觉醒，丰富了阿萨姆文学的艺术体裁。其中，古纳皮拉姆・伯鲁阿将口语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为阿萨姆民族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阿萨姆史》和《普坎传》是古纳皮拉姆・伯鲁阿用阿萨姆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社会生活剧《拉姆和纳瓦米》和《孟加拉男人与孟加拉女人》描写寡妇的悲惨命运，对阿萨姆语戏剧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海姆金德尔・伯鲁阿以笔触辛辣著称。话剧《新娘的祈祷》(1861)展现了传统道德的维护者们虚伪做作的一面。海姆金德尔・伯鲁阿一直不屑于向所谓的正统道德观念和社会偏见妥协，这一点在他的长篇小说《闪光的未必是金子》中得到了鲜明体现。作者以辛辣的笔触揭露了祭司们虚伪做作的本质，批判了所谓的传统宗教准则。

法吉尔莫哈纳・谢纳巴吉(1847—1918)、拉德哈纳特(1848—1908)与玛特扈苏丹(1853—1912)被称为奥利萨语文坛的“三人联盟”，他们为维护奥利萨语的民族语言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是“三人联盟”创作的鼎盛时期。事实上，在这之前，三位作家就

已经为奥利萨语文学的繁荣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3. 马拉地语文学与古吉拉特语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西印度地区的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地区构成了“孟买行省”，通用语言为马拉地语和古吉拉特语。省会孟买是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宗教改革社团及文化启蒙团体相继在此出现，例如著名的“雅利安社”、“圣社”、“全民联盟”等；许多社会活动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也汇聚于此，如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达达拜·瑙罗吉、马·戈·拉纳德、罗科马尼亚·提拉克等。

十九世纪下半叶，马拉地语文学和古吉拉特语文学不论在体裁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及思想主题上，都获得了发展（孟加拉语文学在此之前就已经历了这一过程）。随着印度民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全才作家。其中，纳尔默德·巽格尔（1833—1886）是这一时期马拉地语文学和古吉拉特语文学的代表人物。

纳尔默德·巽格尔不仅是政论家、散文家、诗人、剧作家，还是学者和社会改革家。他编写了第一部古吉拉特语词典《纳尔默德词典》，还编写了两卷本世界史、三卷本印度诗学论文和一系列伟人传；他用古吉拉特语改写了《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伊利亚特》等著作。纳尔默德·巽格尔很崇拜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也十分欣赏中世纪时期的印度诗人。他为古吉拉特语的系统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又承认印地语是全民族语言。纳尔默德·巽格尔号召人们向西方学习，将外国殖民者赶出印度。

虽然纳尔默德·巽格尔的作品数量有限，但他开创了新的文学题材：体现公民意识的诗歌。长诗《光荣属于你，伟大的古吉拉特！》成为了古吉拉特的民族之歌；长诗《季节》则歌颂了古吉拉特的自然风光，是风景抒情诗的典范。纳尔默德·巽格尔笃信印度教，他是第一位描写印度教青年与穆斯林姑娘相爱的印度作家。长诗《瓦吉桑特与昌德巴》描写了印度教青年与穆斯林姑娘之间的爱情以及他们在爱情道路上遭遇的阻碍。纳尔默德·巽格尔还开创了回忆录文学体裁——传记及自传。他对同时代的作家，如南达巽格尔（1835—1905）、纳沃勒拉姆·潘蒂亚（1838—1888）和乌代拉姆（1838—1923）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632

南达巽格尔的历史小说《卡兰·格赫洛》（1868）在古吉拉特语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小说再现了罗阇卡兰·格赫洛（十三世纪）统治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地方封建割据，古吉拉特公国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

十九世纪下半叶，剧作家古扎拉达和马扎拉什特雷也转而创作历史题材戏剧。这一时期的西印度出现了大量戏剧社和戏剧爱好者小组，戏剧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帕西人（古伊朗人——迁入西印度的拜火教徒）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

“帕西戏剧”吸引了一大批当地剧作家。这类戏剧通常取材于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阿拉伯及波斯文学作品（《列王记》、《一千零一夜》）、梵文经典，以及西欧戏剧作品（莎士比亚）。很难评价“帕西戏剧”的贡献：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十九世纪印度舞台艺术和戏剧艺术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剧本的写作和演员的表演均采用口语。“帕西戏剧”在古吉拉特语和印地语地区，特别是乌尔都语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新的戏剧社团，它们所主张的戏剧艺术思想与“帕西戏剧”相去甚远。其中的一个戏剧爱好者社团上演了纳沃勒拉姆·潘蒂亚的有关古吉拉特民族解放运动的诗体戏剧《英雄主义》（1869）和纳尔默德·巽格尔的好友达尔巴特拉姆（1833—1886）的社会剧。达尔巴特拉姆的戏剧《虚荣》和《维娜的一生》体现了解放妇女、改造社会的思想主题。

最受印度观众欢迎的古吉拉特语戏剧大多为传统题材戏剧。这些戏剧通过悉多、朵帕娣、达玛雅缇等传统形象来表现印度女性善良、聪慧、忠贞的美好品质。纳尔默德·巽格尔、乌代拉姆创作了不少类似的戏剧。

十九世纪下半叶，印度剧作家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戏剧体裁和表现手法。其中以马拉地语剧作家最为突出。他们在八十年代开创了新的体裁——桑吉特。桑吉特是一种音乐剧，它的发明对马拉地语戏剧和印度戏剧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部桑吉特《沙恭达罗》诞生于1880年，它的出现标志着现代马拉地语戏剧的形成。著名的戏剧家阿纳萨赫·吉尔罗斯卡尔（1843—1885）通过借鉴传统普罗那戏剧[①]、印度民间戏剧以及经典梵文戏剧的经验，创作了这部戏剧。作为一种音乐剧，桑吉特还吸收了南方民歌和乌尔都语民歌中的音乐元素。吉尔罗斯卡尔的第二部戏剧《萨乌哈德尔》（1882）则将史诗普罗那中阿周那迎娶克里希纳的妹妹的故事搬上了戏剧舞台。这部戏剧至今仍是马拉地人民最喜爱的戏剧之一。

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大量爱情题材的戏剧。这类“大众艺术”式的戏剧以其令人赞叹的视觉效果、美妙奇幻的舞台气氛及崇高的情感吸引着不

---

① 普罗那：古印度文学名著，被认为是印度教的经典。分为毗湿奴书、湿婆书、梵天书，内容与形式和古代印度史诗相近，包括一些神话和传说。——译注

少观众。它们与严肃正经的社会剧截然不同。奇塔姆的社会剧《马诺尔玛》(1871)通过描写年轻寡妇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当时社会道德反人性的罪恶本质。虽然《马诺尔玛》还停留在自然主义的窠臼中，在创作手法上也稍有不足，但它是第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戏剧。

吉尔丹(1840—1881)为马拉地历史剧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他创作的戏剧《派施华·马德哈夫·拉奥之死》(1861)是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剧。

·633

该剧讲述了派施华·马德哈夫·拉奥统治时期的历史事件。原本强大团结的马拉地国由于地方封建割据，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但马拉地王室仍然不思进取，安于享乐。而智慧的法官拉姆沙斯特里则清醒地意识到了国家的危险处境。

这一时期的马拉地文学出现了新的文学体裁——阿德布胡特卡达姆巴里(奇幻小说)。这类小说深受经典梵文小说、阿拉伯波斯神话及乌尔都达斯坦散文的影响。它们与社会日常生活题材的劝世小说(如《亚姆纳游记》，带有英语词汇的基督教传教士作品)截然不同。奇幻小说是由博学的婆罗门学者们开创的。

哈尔别(1831—1905)是奇幻小说的创立者之一。他创作了一系列奇幻小说，《穆克塔玛拉》(1861)便是其中之一。冒险经历、爱情故事、正义战胜邪恶，这些是奇幻小说的典型内容。小说还反映了某些时代特征，例如提倡知识与科学、允许寡妇再嫁等。

文学史家们对奇幻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类小说随后逐渐介入了印度启蒙运动，并以传统的方式默默影响着读者们。作为印度民族特有的文化财富，奇幻小说对尚未完全习惯西式启蒙的印度人民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4. 印地语文学

新时期的印度作家不得不面临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即语言问题。他们不得不重新确立文学散文作品的语言，因为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缺乏散文的传统，而在中世纪诗歌中使用的语言与现行的通用语差异颇大。

在这个问题上，印地语作家所面临的困难尤为棘手。克利方言(印度中部地区直至十八世纪仍在使用的通用语)完全缺乏文学性。用于诗歌创作的伯勒杰方言与人们生活中的口语仅有极少的共同点。语言问题成了印地语文学长期落后于印度其他文学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争取民族统一性，许多进步人士意识到必须使印地语成为印度的民族语言。来自古吉拉特的婆罗门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和他领导的雅利安社在这一思想的宣传过程

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在提高克利方言地位（该方言后来即被称作印地语）的工作中，没有人比得上伯勒登杜·赫里谢金德尔[①]（1850—1885）。他是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被誉为“印地文学之父”、“文化复兴时期的开创者”。

赫里谢金德尔的活动涉及多个领域，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戏剧。印地语文学正是从戏剧发展而来。与当时众多印度的启蒙者一样，赫里谢金德尔毫无疑问地受到了欧洲文学的影响。但对其世界观和文学品味的形成起到更大作用的，是梵语文学和孟加拉语文学。他关于戏剧艺术的最初经验即来自于翻译梵语、英语和孟加拉语的剧作。

赫里谢金德尔始终坚持艺术的社会功能。他在其理论著作《戏剧》中赞扬过去的艺术家，呼吁要珍视传统，同时指出，戏剧创作者只应该延续被当时社会所接受的民族传统。他要求当代作家尽可能使文学贴近生活，远离对待文字时不经思索的肤浅态度。

赫里谢金德尔创作中的现实趋向在他尖锐的讽刺作品和独幕剧《按吠陀杀生不算杀生》（1873）、《黑暗的城邑》（1881）中得以显现。上述作品描写了祭司阶层的伪善、假仁假义，贵族封建主的空虚无聊和殖民司法机关的不法行为。对驻印度的英国人的政治的惊人嘲讽出现在独白独幕剧（布哈那）《以毒攻毒》中。该剧展现了英国人是如何轻率地更换封建王国的统治者，鼓励显贵阶层的腐败和谄媚现象。

赫里谢金德尔创作了一系列神话和历史题材的作品。其中最杰出的是历史英雄剧作《尼勒德维》（1880）。该作品表现了拉齐普特人为自由英勇而战、印度女性的自我牺牲和精神世界的美丽。赫里谢金德尔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影响。与后者一样，赫里谢金德尔将拉齐普特人和他们的军事功绩视为印度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对奴隶地位不屈服的体现。赫里谢金德尔的美学思想在其讽喻戏剧《印度的惨状》中阐释得淋漓尽致。该部作品不仅是赫里谢金德尔创作的高峰，而且是十九世纪印度文学的扛鼎之作。在这部作品中，有对当时印度社会的精神和社会经济危机的痛苦思索。当时，印度社会受到宗教团体和社会道德法则的约束。剧作家创作了一系列讽喻形象，如懒惰、空虚、不学无术、分裂、惊恐、衰弱，来表现各种罪恶，正是它们将印度引入可耻的浑浑噩噩的状态之中。象征力量的诗人、出版者、马拉地人和孟加拉人，接受重生印度的号召，却不能采取根本措施，而忙于徒劳无益的争论。

---

① 伯勒登杜是后人对他的尊称，意为“印度之月”。——译注

可与戏剧《印度的惨状》相媲美的，还有赫里谢金德尔的另一部讽喻剧《印度母亲》(1878)。该作品改编自孟加拉作家提罗金德尔的同名剧作。在作者看来，印度贫困的原因不仅在于殖民统治，更为首要的原因是印度社会内部的罪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呼吁人们要学习掌握知识，经常进行自我完善。

与当时许多启蒙者不同，赫里谢金德尔不是彻底改变印度社会阶层和印度教的支持者。在政治问题上他属于温和自由派：在反对殖民统治丑恶行径的同时，他完全忠实于英国政权，真心地相信英国人的文明传播活动。但与此同时，在自己的政论文章和戏剧中，赫里谢金德尔激烈地批判宗教制度的庸俗残酷、社会团体的宗教狂热和缺乏忍耐以及女性的无权地位，嘲笑在殖民者面前卑躬屈膝的行为，公开地谈论政权的专横和无法无天。

许多启蒙者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同时借此影响同胞们的宗教观念，并帮助他们接受启蒙思想。赫里谢金德尔用传统诗歌语言——伯勒杰语创作了大量宗教诗歌。他大力提倡将克利方言作为文学创作用语，却又对其是否适合诗歌创作表示怀疑。

赫里谢金德尔以其创作规模的庞大一举超越同时代人。在“赫里谢金德尔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诗歌和散文体裁的初步尝试。赫里谢金德尔逝世后，这两种体裁自然得到了优先发展。

5. 乌尔都语文学

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乌尔都语文学发生了显著变化。它吸收了新的思想、美学观念和体裁形式。文学创新的过程在穆斯林改革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进行。这一运动由杰出的社会和宗教活动家赛义德·阿赫默德汗(1817—1888)领导，被称为“阿里格尔运动”。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宗教和科学思想领域，他的政论、科学文章和论战随笔丰富了正处于形成阶段的乌尔都语散文传统。这些文章均以生动的格言形式写成，运用了民族词汇和形象。他是乌尔都语文学史上首个倡导新的美学标准和文学创作任务的人。他将文学的笔锋转向反映社会的重要问题。他着手在使其合理化的计划下重新审视伊斯兰社会道德范畴，并使之符合理智和科学知识的需求。在乌尔都，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科学社团”和杂志《道德教育》在宣传启蒙思想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没有创作文学作品，但他的社会和美学思想体现在他的志同道合者及追随者，即新乌尔都语文学奠基者的创作中。他们是

艾赫默德·纳兹尔(1836—1912),阿尔塔夫·侯赛因·哈里(1837—1910),穆罕默德·侯赛因(1829—1910),穆罕默德·什布里·诺乌曼尼(笔名哈里,1857—1914)等等。

635· 艾赫默德·纳兹尔于1869年以家庭日常伦理小说《新娘的明镜》一举登上文学舞台。这部小说,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另一部小说《大熊星座》(1872)均旨在向女性宣传启蒙思想,确定她们的社会地位,谴责诸如隐居、多妻制等保守习俗。两部曲中反映了当时启蒙纲领的许多内容,清晰地体现出受欧洲启蒙文学影响的痕迹。这一影响在作者箴言和对主人公的谴责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它们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着逐字逐句的相似性。

艾赫默德·纳兹尔还创作了一系列以道德为主题的作品(《纳苏赫的忏悔》、《阿依亚玛》等)。与众多新时期的社会家庭日常小说相同,艾赫默德·纳兹尔的作品中,典型人物不是拥有极端品质者。典型的正面人物,是能抑制住狂热的人,是拥有平凡善良的人。然而,与此同时,在这个直观的"中庸之道"的美学观念中又有自己的主角——启蒙道德说教的智慧,它指引着人们从事日常琐碎的工作,并无私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印度的启蒙者重新审视宗教法规,但并没有推翻所有传统教义和道德准则。与传统决裂的意图不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启蒙者的活动中得到体现,尤其是德罗西奥和他的朋友。但是,这一意图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十九世纪下半叶,启蒙者熟练掌握了欧洲的科学知识,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开始关注民族遗产,并开始寻求将西方和祖国的思想相结合的合适尺度。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作品中最常见的主人公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奉行资本主义道德观下的个人主义,与自己周围的基本道德观念相冲突。例如,艾赫默德·纳兹尔所著小说《纳苏赫的忏悔》中的主人公卡利姆。卡利姆将生活视作永恒的欢宴、喧嚣的节日,而不是日复一日的辛劳、对公认价值的尊重。在其最著名的小说《伊本·努瓦格特》中,作家提出了一个对当时社会十分迫切的主题——即新型印度知识分子与英国政权以及与印度人民间的相互关系。艾赫默德·纳兹尔在主人公伊本·努瓦格特这一形象中充分展示了心理分析的高超技巧,和擅长设置与内心渴望相矛盾的人物性格的能力。在主人公的命运中,作者表现了一种虚幻的信仰,即相信印度人民与殖民政权可能在精神和思想上相互连通。

在乌尔都建立新的散文传统的过程中,拉登纳特·萨尔夏尔(1847—1903)的小说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他的创作中,拉克那乌文学流派的传统、欧洲文学和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启蒙政论复杂地交错在一起。萨尔夏尔创作了几部小说(《山区旅行》、《萨尔夏尔的酒杯》、《石头》等等),

但其中最赫赫有名的莫过于小说《阿扎德的故事》(1879)。小说将惊险的情节与民族自然主义,以及对拉克那乌和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细节和习俗的描写令人难以置信地结合在一起。作品中除了对主人公阿扎德和他的仆人霍奇程式化的描写外,还经常出现次要人物的鲜活形象。

通过该小说,我们可以了解到传统的达斯坦诗学(静态的特征、框架式的题材、幻象的情节)是如何与现实生活和习俗描写相互融合的。新旧融合的类似例证体现在阿尔塔夫·侯赛因·哈里的小说《妇女集会》中,不过该部作品的教育意义更为显著。

然而,真正为哈里带来声誉的是他的文学批评作品和诗歌创作。哈里在许多文章中阐明了自己对文学创作实质的观点,并在之后的《诗学导论》中加以概括总结。他为赋予艺术以崇高的社会地位而奋战。哈里在与传统诗学,尤其是与贵族诗歌的论战中批判其一味追求新形式和娱乐性,并同时表明自己的社会理念。哈里指出诗歌与生活的相互制约性,从而推翻了将创作视为自发无意识的过程的观点。"先有思想,然后才考虑形式",他这样写道。

哈里尝试在自己的创作中实现文学崇高理念的需求。他以多种体裁创作,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他的社会哲学诗和公民诗。他和阿扎德一起促进了对传统公开诗歌争论(穆沙伊尔)的改革,充分展示了它们,扩充了主题,创造并公开宣传新的诗歌形式、主题、思想的可能性。

在长诗《善良与公正的对话》中展现了一次这样的争论。哈里阐明了自己的社会美学观点。该观点基于启蒙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精神。具有讽喻意义的两位论敌(善良和公正)代表两种思维——即东方的和西方的。在长诗中,论敌间的争论由象征着最高真理的理智以第三法官的身份出面解决;理智似乎是综合性的一种和解力,它融合了善良和力量、东方的道德和西方的理性主义。 ·636

哈里用古典诗歌的体裁创作:凯达诗、鲁拜诗[①]、嘎扎勒诗[②]、喀西达诗[③];他促进了新公民诗形式的确立(喀乌米—纳斯姆)。他为传统诗歌的改革而战,主张摒弃列基夫[④],引入自由韵、欧洲体裁、自由诗,但最重要的是——他为追求诗歌主题的创新而斗争。哈里的许多诗作都包含呼吁妇女解放,使其摆脱家庭奴役的命运的内容(《寡妇的祈祷》、《沉默的赞颂》)。

① 东方各国诗歌中的一种四行诗,阿拉伯语。——译注
② 流行于中亚民族的一种源出于阿拉伯诗艺的抒情诗体。——译注
③ 东方诗歌的一种体裁,多为颂诗,阿拉伯语。——译注
④ 东方民族诗歌术语,以不变的形式反复出现于诗行末尾的单独的词或一组词。——译注

哈里相信进步和科学发展的力量。他将其与西方联系在一起，同时对自己民族的奴役地位提出抗议。哈里最著名的长诗《伊斯兰的兴衰》(1879)使他在新型知识分子眼中被推崇为精神导师，并引发了对正统宗教界的指责。在长诗中诗人以满腔热情极力号召追求自由，激烈批判宗教狂热和伪善、贪婪以及神职人员——舍伊赫、乌列姆、毛拉的自私，揭露封建贵族。与此同时，长诗充满对进入新的"伊斯兰兴盛时期"和人民生活昌盛时期的信仰。

英国小说家的美学原则对哈里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雪莱的《为诗辩护》和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中的思想，在哈里的《诗学导论》中得到延续；在《伊斯兰的兴衰》这一作品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的影响。然而，哈里利用前人遗产的同时，也创造性地将其改造，使之适应自己国家民族的条件，并满足时代的精神需求。乌尔都的诗歌文化继承了波斯和印度诗歌的古典传统，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因此，不假思索地重复异国的形象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西方诗歌极大促进了印度诗歌在思想主题上的创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古典的诗歌形式和形象方法的运用。

在诗歌创作的思想意识和特征方面，阿扎德与哈里非常相近。哈里、什布里和阿扎德的诗歌和美学观点对他们同时期的年轻一代而言意义非凡，对乌尔都下一代的艺术家也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

6. 南印度文学

在南印度地区(即安德赫拉、喀拉拉、卡尔纳塔克和泰米尔地区)，社会和文学发展的进程较为缓慢。南印度德拉维民族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更为残酷的种姓制度。这一制度的残酷性甚至让北方的印度教教徒都感到震惊。因此，不难理解启蒙改革者首先致力于缓和直至彻底根除传统社会的罪恶。

与社会的罪恶、愚昧作斗争的激情渗透进南印度启蒙者各自不同的活动中。他们中有来自泰米尔的拉玛林格·斯瓦米(1823—1874)，来自喀拉拉的那拉扬·古鲁(1854—1923)，以及来自安德赫拉的康杜古利·菲列沙林格姆(1849—1919)。拉玛林格·斯瓦米和那拉扬·古鲁主要关注宗教改革，力图确立"唯一上帝，唯一种姓，唯一宗教"的理念。菲列沙林格姆的活动则全部在世俗文化领域进行。

泰卢固人的文学中，许多体裁的诞生要归功于菲列沙林格姆。这些体裁包括：小说、日常生活和普罗那戏剧、讽刺戏剧、传记和自传、简短的抒情

长诗等等。菲列沙林格姆最重要的功绩在于他将泰卢固口语确立为文学语言，并使之与此前广为培养推行的文学语言相抗衡。作家嘲笑传统信仰和种姓制度的荒谬形式，在作品中创作了一些滑稽可笑的婆罗门祭司形象。菲列沙林格姆酷爱用怪诞夸张的手法。他是泰卢固文学中将有意义的当代生活现实引入到艺术中的首创者。他促进了对周围日常生活的把握和美学层面的理解。

菲列沙林格姆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时采用欧洲文学的题材。例如，他最杰出的小说《拉特扎什克哈尔的一生》和《萨奇亚拉特扎的旅行》的情节框架基础，即来自《菲克菲力神父》和《格列佛游记》。但是，作家是如此擅长给民族生活的素材套上他人的情节框架，以至于可以将后者视为《萨奇亚拉特扎的旅行》的英译本。旅行的主题使启蒙作家能够去描写不同社会阶层、种姓和团体中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在社会日常生活现实戏剧的形成过程中，菲列沙林格姆的剧作《婆罗门的婚礼》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部戏剧讽刺了传统社会中普遍的婚姻交易——富有年迈的婆罗门和出身贫穷的姑娘之间不平等的婚姻。

如果说在启蒙教育意义方面，菲列沙林格姆的优势在于讽刺作品，那么泰米尔小说作家菲达纳亚伽姆·比莱（1826—1889）的创作优势，则在于道德形象的直观展示。在小说《布拉丹·穆达里亚尔的一生》（1879）中，故事以第一主人公的口吻来讲述。他出身于婆罗门家族。作者赋予每位人物一种美好品德（如爱祖国、相信友谊、弃绝私欲），不可思议的情节场景中穿插着许多箴言。箴言的内容是教育的益处、妇女解放的必要性等。

这一时期，南印度文学小说体裁中最重要的作品是马拉雅利作家昌德·梅农（1864—1899）创作的《英杜莱赫》（1889）。场景和形象的现实主义性，该部小说主题的严肃性，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现实主义的重新定位。这不仅涉及散文体裁，而且还包括所有其他的马拉雅利文学。在并不复杂的情节中，梅农展示了传统社会里种姓狂热的丑恶面目。小说《英杜莱赫》于 1891 年被译成英语。在这一时期，南印度文学诞生了两部历史小说——由切吉所著，描写泰卢固人的《朗伽拉甲的一生》（1872），和由拉曼·比莱（1857—1921）所著，描写马拉雅利人的《玛尔坦达·瓦尔玛》（1881）。

用南印度语言创作的诗歌多包含宗教神秘和神话主题，或是中世纪后期诗歌的提炼。但是，诗歌逐渐地开始有了世俗化的趋势。在诗歌中开始触及当代问题，涉及现实生活。例如，在马拉雅利诗人小菲玛尼的长诗《普拉姆节的故事》中，以现实主义的笔调描绘了一年一度的普拉姆节。但这一时期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是泰米尔诗歌。以菲达纳亚伽姆·比莱的长诗《五个标记》为例，长诗讲述的是 1878 年发生在南印度的一场可怕的饥荒。

另有郭巴克利什·巴拉达的长诗《纳普丹的一生》(1861)为证。巴拉达的诗歌尤其出色,长诗的主人公是一位普通长工,这一形象在农村生活的背景下,在他简单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展现。

新泰米尔戏剧的源头中,对所有南印度戏剧艺术都产生影响的是传统民族戏剧(卡达卡拉克什—阿姆),在演出过程中引入许多源自传说和史诗的片段。

拉玛萨米·拉甲(1842—1887)的戏剧《普拉达伯·昌达朗》(1877)是建立泰米尔探讨问题式戏剧的最早尝试之一。在拉甲的剧本中,社会日常生活的主题与公民爱国的主题相结合。主人公之一是社会改革的狂热拥护者,是一名为印度的自由而战的斗士。

这一时期文学进程的主导趋势是继续世俗化,发展多种文学体裁。印度文学发生结构性根本变化的强大推动力,来自欧洲的社会思想和文学。但是,在精神和文学生活中的追寻和改变,则由社会历史民族中存在的迫切问题、使印度融入世界资本主义进程的诱惑和对新型资本主义式生活的追求来决定。

印度的作家掌握了对他们而言崭新的欧洲体裁,并向其中添加了来自民族生活的鲜活素材,创造性地重新理解西方文学的成就。他们试图有限制地将它们与传统的文学形式融合,从而反映印度的民族生活。

启蒙问题是印度文学家创作的基础。这在叙事体裁——特别是小说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这种体裁将传统叙事散文(达斯坦[1],框架故事)的形式与欧洲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相结合,正如在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创作中,在乌尔都语文学、马拉地语文学、南印度文学中那样。

然而,世俗化的进程并没有包含所有的文学创作形式。当时,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宗教神秘诗歌得以复兴。当然,宗教神秘诗歌并不一定意味着与世俗启蒙文学的对立。许多启蒙活动家,如赫里谢金德尔(印地)、布哈尔纳特(古吉拉特)、拉玛林格·斯瓦米、比莱(泰卢固)、布西玛·布霍伊(阿萨姆)、玛特扈苏丹(奥利萨)等等,都曾创作过宗教题材的作品。他们延续虔诚派民主运动的路线,推行反对派的宗教运动,指向不断变化的活动和在神学世界观的框架下思想的重新定位。

正如不是所有的文学都世俗化那样,也不是所有的文学活动都带有启蒙意义。许多启蒙者将印度文学的传统路线视作反动的、有缺陷的;遵循

① 东方各族人民文学和民间创作中的英雄叙事诗或浪漫作品。——译注

传统者则批评启蒙者违背了传统，一味膜拜欧洲文化。

传统主义以多种形式在文学中得以体现。通常，反革命主义是隐晦的，而有时会公开出现反英思想。类似的传统主义不是反动的，它允许对一些社会弊端（如早婚、卖新娘、屈尊俯就的婚姻）的批判，但更多时候它回避传统制度的缺陷，抨击渗透进印度社会的资本主义和欧洲文化的罪恶。

如果说传统主义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印度文化中只是表面的趋势，那么在例如克什米尔和旁遮普这样的文学中，拘泥传统成了主导的、涵盖一切的现象。在不同情况下，传统主义产生的原因是不同的。在克什米尔地区，传统主义没有成为积极的思想潮流，它更可以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该地区中世纪文学传统的自然延续，并没有受到新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潮的影响。在旁遮普情况则更为复杂。被英国人占领后，旁遮普分裂为几个封建公国，旁遮普语不再是官方语言，而让位于乌尔都语、波斯语和英语。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旁遮普语作为文学语言成为了一种公民行动，而关注著名的历史、神话传说主题和题材，意味着捍卫和保存旁遮普民族的精神遗产。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印度文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启蒙者的活动促成了印度人民的社会、美学观念的根本性变化，为今后印度艺术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印度的文学家以自己的创作活动打破传统陈规，美化现实生活、社会和自然现象。他们拓展了印度人的体裁观念，使之能更好地理解、把握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他们捕捉到了社会生活的历史形态，并反映在作品中。当然，此时的艺术文化还未制定出通用的方法，否则便可以全方位抓住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把握决定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主导力量。

第二章　尼泊尔文学

十九世纪中叶，在尼泊尔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它们决定了该国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长期命运。统一国家的首位执政者比姆·森·塔帕推行的政治独立方针没能让英国政府感到满意。根据伪造的指控，首相被投入监狱。于是，宫廷内开始上演公开的权力斗争。1864 年，倚仗英国驻尼泊尔总督的支持，封建家族的代表忠格·拉纳展开了血腥屠杀。几乎所有竞争家族的对手都被残杀。

由此开始了近一百年的拉纳封建专制王朝时期。他们统治着整个国家，剥夺了尼泊尔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在国内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专制和压迫，并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政府和社会机构完全符合正统印度教的

639· 教规，特别是种姓制度的规定。统治者试图利用种姓制度来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只有中世纪的劳动组织和奴隶债务制度得以保存。

在尼泊尔国内完全没有世俗教育机构（1894 年才开办了第一所世俗初等教育学校）。在修道院和教堂，人们只能学习梵语和印度宗教论著。因为害怕人民的民族自觉意识被唤醒，拉纳想方设法提升梵语学识的重要性，并试图使人们相信梵语是唯一适合文学创作的语言。自然地，所有试图将尼泊尔口语确立为文学语言的尝试都遭到了上层政权的极力反对，而且被视作是对已建成的法制的破坏行为。

然而，始于十九世纪初期的尼泊尔文学依旧继续向前发展。对民族语言的关注不仅体现了文学发展进程中趣味和内部需求的变化，还体现了尼泊尔作家高度的公民意识。

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帕努帕格德和十九世纪末的启蒙运动家莫吉拉姆·布哈特怀着同一个目标：他们都希望证明尼泊尔语能够成为建立美学价值的手段，都想确立这个时代的文学风貌。

帕努帕格德（1814—1868）真正可被称作是尼泊尔民族的“阿吉卡比”（第一诗人），尽管尼泊尔有许多卡比德拉（宫廷诗人）和玛哈卡比（大诗人）。他的前辈巴桑塔·雅杜纳特赫和钵颠阇利利用尼泊尔语写诗，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同胞能够读懂。但是，被梵语传统奉为神圣的诗歌表述的感召力仍然清晰可见，而且在创作中掺杂了许多梵语典范的元素，这些都是尼泊尔本土口语中所没有的。从邻国印度大量借用为尼泊尔人所熟知的文学语言（其中最主要的是阿法特和伯勒杰方言）更加剧了诗歌杂乱、“紊乱”的感觉。帕努帕格德凭借自己非凡的文学天赋，不仅改变了语言基础，而且为新的诗歌系统奠定了基础，从原则上拒绝使用上述老套的语言。

帕努帕格德意识到，在玛哈卡比（长篇颂诗）的框架下能更好地确立新的文学语言。首先，因为这是一种最基础的体裁，它在文学传统的长河中一直拥有权威地位。此外，与用梵语和其他语言创作的作品相比，它更容易突出尼泊尔语的特点。帕努帕格德在众多长诗中选择《罗摩衍那》不是偶然的。在重述罗摩王朝的历史时，他想提醒在英尼战争中饱受痛苦的同胞们：拥有大智慧和勇敢的心的人可以经受任何考验。

与前辈苏万达达斯和拉克胡纳特赫一样，帕努帕格德确立了尼泊尔文学的独特性。

正因为如此，“第一诗人”在保留主要情节的同时，尽力使他的《罗摩衍那》成为在尼泊尔大众中普及的作品。在作者看来，主人公的人格魅力必须唤起读者效仿的愿望。勇敢的罗摩和拉克希曼能够感动人心并触动人的心灵深处，而帕努帕格德笔下温柔的悉多在正义的愤怒中无法遏制住自

己，她的坚强让人不由想起现实中的尼泊尔女英雄，就连她们的敌人——英国人也不得不赞叹其英勇无畏。罗摩的故乡阿逾陀在帕努帕格德笔下是当时尼泊尔的象征。甚至在主人公的言语中也能发现对时事的反映：从想象中的人物（例如猴王）口中，可以听到诸如此类的话："军队命令"、"军事委员会"等等。多亏这一切才使得尼泊尔人重新思考久负盛名的罗摩的功绩。帕努帕格德正是以罗摩来映射当今时代的民族英雄。

在拉纳王朝的无限专制压迫下，正统的印度教依旧是全权决定尼泊尔人民生活和思想的意识形态。帕努帕格德试图确立民族自觉的努力受传统印度教世界观的制约，这一点毫不奇怪。这在诗人晚年较短篇幅的长诗《问与答的花环》、《祈祷的花环》和《对新娘的训诫》中，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

对当代尼泊尔社会的关注在帕努帕格德"偶然"创作的诗歌中更为明显。对于尼泊尔诗歌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诗歌体裁，以特别的魅力闪耀着帕努帕格德的天赋。世间万物在他眼中都是诗歌创作的素材。来自偏远山区的布扎努布哈克特第一次来到加德满都。他惊讶于喧嚣的首都生活与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并将这一切用充满惊奇和赞叹的诗句记录下来。但是，当诗人接触到城市生活表象之下的另一面（好打官司的官员，诉讼程序的无节制专横，以及诉讼程序依据的相当苛刻的法规——这些都是拉纳王朝统治者仿效古印度统治而设置的）时，诗人笔下的赞赏变成了嘲讽，之后又转变为毫不掩饰的痛苦。 · 640

诗人没能继续推动启蒙进程，为落后的社会指明一条通往进步的道路。然而，他首次将向人们说明真理和正义的实质列入文学创作的目标之一。出于对社会幸福的理解，他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为了给人民造福，他努力使自己在思想和文字上都更加接近人民。

第三章 斯里兰卡文学

十九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斯里兰卡的社会文化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这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进展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唤起了人们的民族自觉、爱国情感。随之而来的便是积极有效地汲取西方文化的时期，通常以冲突的形式进行。斯里兰卡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充满了矛盾、不同方向的趋势、观点的冲突：在这些年间，围绕哲学和宗教、道德、历史、语言、诗歌、教育、政府机构等问题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

斯里兰卡社会已经在生活的多个领域感受到了殖民统治的压迫。英国统治者施行的经济、政府和文化改革，确保了外国人在斯里兰卡的统治地

位，破坏了许多传统的社会制度或使之衰落，同时建立了全新的制度，从而改变了国民经济系统。斯里兰卡人民不仅感受到种植园或其他经济企业的建立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它们将导致广大农民阶层陷入贫困和破产的境地，不仅感受到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包括禁止进行宗教仪式，也感受到了生理上的残酷镇压，例如发生于1817—1818年和1848年的全民骚动。在文化领域，多多少少也能感受到明显的强制政策：它体现在对地方语言、知识、教育系统的蔑视中，体现在强力推行英语、推行不同的西方价值体系、价值观念和制度等行动中。这种压迫甚至使对异国文化元素的合理吸收变得复杂化。这一"对话"的辩论性有时会引发对反动的传统文化的辩护，但总体上它毫无疑问地促进了复杂进程的加速，完成了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化以及斯里兰卡人的社会心理的改变与革新，确立了新的社会思想。结果在社会结构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阶层，特别是出现了新型知识分子。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现了首份斯里兰卡报纸；而至十九世纪末，已有近十五份报纸和杂志出版。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当代社会政治和科学词汇。作家们第一次尝试使文学语言接近口语。学者们在语言的历史领域展开研究。1852年，阿里维斯出版了十三世纪古典斯里兰卡语法的译著（带注释）——《西达特—桑加拉法》。

在文学领域有两种趋势：一种是保留和复兴不同的传统文学创作的体裁与方式；另一种是转向源自西方文学的新体裁和方式。对于复兴传统知识文化包括文学创作活动的愿望，与十九世纪下半叶斯里兰卡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精神紧密相关。

641· 鉴于传统文化在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下已经走向没落，号召复兴传统的声音愈演愈烈。在当前的民族环境下，这就意味着复兴佛教。这一时期展开了增设佛教学校的运动，使之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相抗衡。一些传统的佛教机构理应在民族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里人们除了学习教规，还学习斯里兰卡的历史、语言和文学，许多未来的斯里兰卡作家就是在这里接受了教育。

与此同时，许多人呼吁应掌握欧洲科学技术的成就，培养全新知识领域的人才，革新教育系统。斯里兰卡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至十九世纪末，全国共有上千所不同类型的中学。斯里兰卡已经成为一个以国民受教育程度高而著称的国家。

与广泛普及的佛教启蒙思想紧密相连的有以下重要思想：国家独立、保留民族独特性、在与铺天盖地的资本主义影响的斗争中捍卫民族文化的崇高道德理念。在这一领域艰难地开展工作的不仅有宗教活动家（佛教学

者瓦兰奈·什里·希德哈尔特哈、拉特玛拉奈·什里·得哈尔玛拉玛、希卡杜芬·什里·苏曼伽拉,他们中最著名的是佛教改革家阿纳伽里卡·德哈尔玛巴拉),也有世俗学者(古纳瓦尔登那、吉姆斯·德·阿里维斯、扎雅吉拉卡等等)。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附带各种形式注释的佛教经典文集的新译作,确立了新的诗律。释迦牟尼的弟子和追随者的传记尤为流行。历史题材受到格外关注。1853 年以编年史《玛哈凡萨》、《拉扎法利亚》为素材的原创历史作品《斯里兰卡群岛王国》问世。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著称,没有使用大量古语和崇高语体。它的作者 G. 别列拉是一位有天赋的历史学家。西蒙·德·席尔瓦的作品《兰卡的故事》也带有历史色彩。1874 年,在希卡杜芬·什里·苏曼伽拉和巴杜凡杜达发的努力下,《玛哈凡萨》被译成斯里兰卡语;该作品的另一种译本由阿布哈雅尔拉特那完成。在这一时期,一种佛教文学创作体裁——论战(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这与佛教信徒和基督教徒关于信仰问题展开辩论有关。默霍基法台·古纳那达就是一位以论战体裁进行创作的著名作家。由巴特塔拉姆莱·萨布胡基出版的这类匿名言论汇编也很著名。

传统的伊斯兰文学世俗体裁曾经在斯里兰卡统治者的皇宫中大受鼓励。但随着最后一代王朝康提(1815)的没落,它们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然而,试图延续古老传统的尝试并未停止。作家们依照前几个世纪的范本来创作,其中主要是遵循梵语文学流派卡菲雅的作诗法,创作了许多书信体长诗(桑代什)、爱情和说教长诗。"注"[①]依旧是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古老的文学吸引了许多作家,例如库马拉通加、别列拉、玛兴达和阿玛拉塞那。

十九世纪下半叶,斯里兰卡文学开始汲取对于它的国家来说不同寻常的体裁: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然后是短篇小说。但是,对待这些新体裁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面性。新体裁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为反映和理解现实提供了新的契机。它也受到排斥,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文学必须反映现实日常生活,同时又与宗教教育密切相关。这样的偏见首先针对的就是长篇小说,认为其描写的都是些轻浮之事。短篇小说更为人所接受,原因可能是它效仿了在斯里兰卡非常流行的"注"这一传统体裁。

此状况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这一时期,许多英国作家的作品被译成斯里兰卡语。当然不是所有被挑选出来的作品都是最好的。但是,在大量基督教教育文学和市民感伤文学之中的确有一批真正的

---

① 古印度文学的一种体裁。——译注

杰作：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菲尔丁、华兹华斯、拜伦、司各特、狄更斯、萨克雷、丁尼生、哈代等等。尽管最初的翻译多为片断或是改编，并非总是能够传达出原作的精神，但是它们为斯里兰卡的读者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斯里兰卡社会接触到了被译成英语的法国和俄罗斯经典著作。伏尔泰、莫泊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在新斯里兰卡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642·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里，斯里兰卡对印度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印度史诗、普罗那传说、寓言、童话的翻译）。在新的叙事文学体裁的诞生中，阿拉伯童话《一千零一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作品首先以英译本引进，之后由卡鲁那拉特奈和西蒙·德·席尔瓦译成斯里兰卡语，译本以简洁、清晰著称。

首批斯里兰卡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由信仰基督教的作家创作。从1866年到1883年，出版了林达姆拉盖·伊萨克·德·席尔瓦的作品《两个家庭》。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家庭编年史，以对比的手法描写了模范的基督教家庭幸福美满的生活和“迷失的”偶像崇拜者（即佛教徒）家庭痛苦、充满悲剧的生活。基于同一思想基础，传教士卡纳伽拉创作了长篇小说《乡村的历史》，并于1876年出版。从文学角度看，这些都是拙劣的作品，构思过于直线化、公式化，充斥着矫揉造作的形象。但是，正是它们打开了斯里兰卡文学的新时代。

罗伦茨和阿里维斯以原创的诗歌、短篇小说和史诗登上文学舞台。他们的名字与斯里兰卡社会的政治和科学生活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综上所述，尽管在这一时期并没有诞生以新体裁创作的重要作品，但为新型斯里兰卡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章　缅 甸 文 学

第二次英缅战争（1852—1853）造成了封建贡榜王朝的分裂：在上（北）缅甸仍旧持续贡榜王朝的统治，下（南）缅甸则落入英国皇家政权手中。上缅甸在几十年中保持着政治独立，经济则逐渐受英国控制，直到后者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从而导致贡榜王朝的覆灭（1885）。殖民统治者将缅甸纳入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版图中，尽管北部的爱国运动和南部的民族起义与之不断抗争至1896年。

发生在缅甸国内的悲剧事件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留下了印记。第二次英缅战争的失败促成了佛教教权主义情绪的高涨。在敏东时期（1853—1878）宗教的地位得以提升。缅甸在这些年间集中建造了许多寺庙建筑群

(例如著名的库多朵寺),收集、校订了古代文献手稿,僧侣的文学和启蒙活动积极活跃起来。1871年,在当时的首都曼德勒召开了佛教界第五次结集大会。类似的风潮不可能不反映在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来临之际。这一时期,在被占领的下缅甸地区出现了西方文化影响的首批中心:在城市里英国人推行世俗教育系统,图书市场充斥着英语作品,开始出版报纸,国外剧团开始演出欧洲剧作家的作品。与此同时,正如在北方地区中世纪书面文字渐趋衰落一样,在南方地区出现了首批新型缅甸文学作品。

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显著趋势表明了人们对习以为常的体裁系统的改造和对文学所承担的任务的别样理解。如今,在文学作品中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对具体现实特点的反映,扩展了道德、政治、哲学问题的范畴,不仅从传统的、崇高的角度,还从批判的甚至是讽刺的角度来审视它们。合乎礼仪的体裁逐渐消失(这一类体裁包括纪念碑颂诗莫古、艾伊兴、卡奇兴,以雅达形式写的日历歌谣等等),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古典形式,采用更为灵活、易于被接受的新形式,散文重新发挥作用——这一切都在促进文学民主化的普遍发展。

几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如今产生了明显的转变。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广为流传的短小抒情歌谣,在宫廷诗人卢吴明、吴桑都、吴萨诺、吴基的笔下得以发展。除了一些著名的歌谣形式,例如果乌奇兴(哭诉)、巴比乌—基奇兴(由鼓伴奏的歌谣)、博莱(沉思曲)、赫列奇兴(船歌)等,还增加了一系列形式,并用统一术语“巴杰伊塔”(地方性的,即民族风格的歌谣)来命名;还有萨丹(男子的怨诉),双节诗德菲伊奇霍乌和四节诗列伊奇霍乌——这两者都以爱情为主题。抒情诗歌试图反映人们内心的隐秘感受和经历的世界,这对于在庆典颂诗雅达、安奇兴、路达中一度出现的激情奔放的奢华场面而言是陌生的。

“望着她从来也不会感到疲惫,/衣着简朴的她是如此美丽,/也许,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敢于和她一争高低!”——贡榜王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吴邦雅献给心上人之诗的开头是如此质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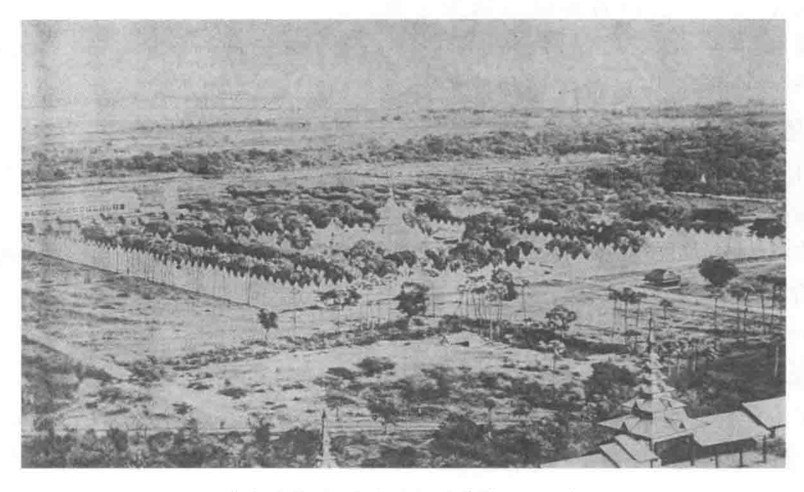
歌谣诗包括写景的静态抒情诗和日历抒情诗,这些都是传统缅甸古典诗歌的形式。在金福明吉(1821—1908)短小的阿伊奇兴(调子)、卢吴明(1800—1861)的四节诗列伊奇霍乌和吴基(生卒年不详)精致的船歌中,刻画了诗人们钟爱的朝圣和旅行,十二个月和每个月的花果、节日。

在上述时期,与之前几个世纪相同,下列体裁得到广泛应用:比乌、林加、雅刚,尽管它们的内容经过了明显的变化处理。情节叙述型长诗林加的古老形式在最近几百年间更多被用作非文学性的目的。即便是当今,在吴邦雅或金福明吉(“法律”林加系列的作者)的创作中仍然有类似的运用。

同时，在一些情况下，林加重新成为以教育、宗教为内容的史诗。典型的例子如曼莱斯哈雅多(1841—1919)的《关于伟大的智者玛伽杰伊法的新林加》(1871—1904)，其中指出了一系列道德和哲学问题。释迦牟尼的弟子们的传记长诗的形式比乌在十九世纪增加了冒险浪漫的特点：在吴飞秦(1798—约1858年)和金福明吉的作品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情节的引人入胜，教育意义仅仅是对传统习惯的一种保留。雅刚这一形式也被赋予全新的诠释。如果说在十八世纪，这是一种面面俱到的叙事诗(偶尔以书信体的形式)，主要不是以佛教题材为基础，而是以两位童话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为中心，那么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吴邦雅则开始用这一形式来写颂歌《里格菲达》。

644·

金福明吉是最后一位古典诗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将领和外交家。他的文学创作涵盖了缅甸诗歌的所有基本体裁形式——林加、比乌、默宫(庄严的颂诗)、艾伊奇兴(献给皇家后裔的颂辞)、一系列日历长诗雅达、塔奇兴(哀歌)、不同类型的抒情圣歌等等。其中占据独特地位的是广为流传的《关于涅伊米的雅甘》(1858)，这是极为少见的以讽刺的笔触写传记的作品。长诗以“注”第541号故事为基础，但是，困扰主人公僧人涅伊米的伦理道德问题只是他在遥远的神的居住之地幻想冒险的借口。神的生活，在英德拉神话般的宁静中的宫廷礼节，涅伊米在王宫中的惊慌不安——这些都是对曼德勒王宫的描写，嘲讽了宫廷制度的荒诞。在“供消遣”的讽喻中不仅讽刺性地模仿了现实状况，还一定程度上模仿了传统书面文学的形式。



寺庙建筑群“库多朵” 曼德勒 1860年

民族戏剧的鼎盛始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并在伟大的心理戏剧大师吴邦雅及其后继者的创作中得以延续。吴邦雅尝试去审视当时剧院的观众所关注的重要道德问题。在他的剧作中，忠贞的爱情与致命的狂热相对立(《巴东玛》)，私人生活与国家——统治者的责任相对立(《菲萨雅》)，忘我者的牺牲精神与王室的职责相对立(《菲塔达雅》)。在类似这样的"理念戏剧"中，与王室、高层贵族生活密切相关的道德问题的尖锐化和它们富于教育意义的解决方案，不时与具体事件相呼应，从而造成轰动效应。在吴邦雅的剧作中不止一次地阐明了统治者要热爱和平、"合法"统治的思想(《菲塔达雅》、《果塔拉》、《卖水郎》)，在当时的王室家族果乌巴乌内部不间断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这不但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也是非常大胆的。吴邦雅的创作毫无疑问地反映了敏东统治时期亲佛教情绪的加强，印证了剧作家试图接近佛教启蒙的明显尝试。逐渐抛弃奢华的装饰，繁多的人物，合成(言语的、声乐的、以舞表意的)戏剧比雅萨常用的以冒险情节吸引人的手法——吴邦雅通过这一切完成了对文学题材更镜头化、更深入的阐释。

在下缅甸，宫廷剧作家和演员的成就被接受得较晚。那里集中上演了以传统的史诗情节为基础的原创剧目。依靠广为流传的"注"，包括《拉玛扬纳》的场景或关于英阿乌纳的故事，并依靠地方民俗文化的作品，作家得以自由地组织情节，因此观众对舞台上演出的新戏剧非常感兴趣。当时，吴由(来自默乌美因那的斯哈雅·由，约 1833—约 1883 年)的《塔特霍乌纳》和吴古(1827—1895)的《猴子的孩儿们》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情节的引人入胜，令人头晕目眩的悲喜交替和军事、爱情冒险的场景，在这里也不排除确定的社会主题(例如，财产或职务上的不平等，妇女的悲惨命运)——这一切首先出现在吴邦雅的创作中，后来也出现在斯哈雅·斯胡特(生卒年不详)的喜剧中。斯胡特创作了名噪一时的戏剧《索布海和索梅》、《丁丁和青青》。他选择平民作为主人公，并将其中一位中心人物刻画成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老实人形象。他很新奇地有意贬低王室成员的形象，因为他们在善良的普通人面前丧失了道德良心。剧作家重复了著名的情节冲突，与此同时，也偶尔引入缅甸传统中前所未有的场景(《索布海和索梅》中，女主人公和自己的心上人秘密离家出逃)。人们据此认为他与来仰光巡回演出的西方剧团的导演相识。

从戏剧形式上看，吴金吴的戏剧与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戏剧比较接近。诗歌和散文的自由创作，以及在乐团的作用愈加重要的条件下丰富的歌曲和舞蹈曲目，造成了强烈的舞台印象，但是有时也降低了文学水准。十九世纪末，与"供演出的戏剧"一起创作的还有"供阅读的戏剧"。剧作家转向著名的文学源头，在个人叙述风格的限制下，并不改编情节或者自由

创作。不妨以吴古的创作为例。他以启蒙任务的名义推广著名的哀歌作品。他预料到自己在下缅甸出版的剧作将大受欢迎，并以可接受的方式使人们熟悉诸如此类的古典作品，如罗摩的故事，关于布扈里达特、卡卡弗尔耶、玛霍萨特海、别桑塔莱的佛本经故事，佛主的生平传记等等。

在缅甸古典文学的历史上，按照传统，散文语言只用于宗教哲学、历史、法律、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散文逐渐被文艺加工，促成了散文体裁的发展，如萨（注）和弗特胡（传记寓言），还有戏剧形式纳特菲萨多吉（为剧院而作的宫廷叙事文学）。缅甸散文发展的重要阶段是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这一时期，古典体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源自欧洲文学的新体裁。

在上缅甸，贡榜王朝覆灭之前，说教散文始终没有中断发展的历程。在一些著名文学家如吴邦雅、金福明吉、列基·斯哈雅多的创作中，仍可看到说教散文的身影。在寺院中仍继续着佛主弟子的传记、叙事萨和弗特胡的创作；世俗作家写传记寓言的极个别例子有吴邦雅的二十六篇弗特胡中的一个系列。在这一系列作品的创作中，吴邦雅既延续了传教的目的，又有纯粹的文学目的——用缅甸语转述来自小注、《德哈玛巴达》的注释以及其他佛教书籍中的故事。的确，作者常常表露出对宗教文学的兴趣，在他的作品中有大量布道辞塔雅—霍斯、注释（基奇）、有教益的书信（密达萨）。

吴邦雅的书信通常针对某个宗教事件而作，因此带有神学色彩。由僧人曼莱斯哈雅多和莱吉·斯哈雅多创作的书信式密达萨体却另具特色，它们维护佛教教规并揭露罪恶。

在这一时期，大量短小的幽默短篇小说充斥着道德说教散文领域。这些作品取材自某些出色的说俏皮话者的生活。这样的故事，用缅甸语来命名即是乌巴姆（有教育意义的范例）或克行（课）。它通常包含属于某一特定任务的格言和生活中的事件。后者经常带有趣闻性质，可作为俏皮话的由来。吴敖努创作了一系列类似的故事。其他创作此类故事的作者姓名不详。新的道德说教文学没有佛教文学弗特胡或密达萨中那样严格的说教性。主题具有任意性，不与宗教作品相关。这为各种轰动一时的讽喻、影射、直接嘲讽开辟了道路。在描写僧人金伽斯（他生活在贡榜王朝末期）生平的故事中，人们可以读到各种滑稽故事，描写的有敷衍了事的官员、因循守旧的书呆子、傲慢的英国迷等。这一切相对于在宫廷和寺院环境下创作出来的优雅的古典作品来说是不寻常的。

这一时期，得益于缅甸语报刊出版业的发展（第一批缅甸语报纸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缅甸北部出版），说教散文的政论性得以加强。依照英文期刊的范例（从五十年代起，在缅甸南部的毛淡棉、仰光等城市就开始出版

英文报纸），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政论作品，从而为文艺作品中散文体裁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新体裁逐渐被人们掌握。在当时，它们都带有启蒙的色彩，其中包括随笔、献词、日记等。在这里，值得称道的是缅甸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吴卡文（金福明吉）的日记。他曾于1872年率第一支外交使团赴欧洲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活动。吴卡文的《伦敦游记》和《法国游记》享有盛名。富有节律的散文中穿插着雅达、雅刚、列伊奇霍乌、斯特罗加和拉果尼其等诗行。这种认真细致不由令人想起宫廷编年史——雅萨菲。对会见、盛会、仪式的如实照录不时与对名胜古迹、海外奇旅更为展开的描写相得益彰。博物馆、收藏、技术新产品引起了作者显著的兴趣。当时的读者可以在日记中读到关于陌生城市、国家、民族的地理环境、文化、国家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知识。吴卡文和他的一些同时代人并不把自己的游记看作精致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在缅甸文学散文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五章　泰国（暹罗）文学

·646

这一时期的暹罗，其国内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统治者开始实施内部经济改革，并为保全国家主权的独立，不得不在政治上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作出屈辱性让步。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两位暹罗国君——拉玛四世蒙固（生于1804年，1851—1868年在位）和拉玛五世朱拉隆功（生于1853年，1868—1910年在位）的统治时期，有时被称为“皇宫启蒙”的开端。实际上，启蒙思想正如暹罗文学、科学、艺术发展中的其他重要思潮一样，形成于宫廷，并受其引导，在之后几百年时间里成为了国内上流文化的中坚力量。

由于“皇宫启蒙”几乎不包含反教权运动争端的局限性，这种思想倾向对暹罗民族文化的整体发展，尤其是对文学发展而言，十分重要且无疑是进步的。

这种自上而下的启蒙活动表现为在那段时期暹罗文化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变革和新措施。古典戏剧领域的改革十分富有成效。蒙固以自己的改革认可了在洛坤（泰国宫廷戏剧）的舞台实践中涌现并不断得以巩固的成就。因此，许多指令都涉及了歌剧的内容，如限制表现残暴的内容和自然主义的细节等。自此，不再只是男演员，女演员也可以参与舞台表演。朱拉隆功开始致力于在暹罗创建上流学校（第一所学校于1871年成立）甚至科学机构，1892年成立了教育部。朱拉隆功在促进知识传播的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书刊印刷业，他在皇宫内建立了第一座国家图书馆（1892）。此前不久，即七十年代中期，语言文学团体“瓦齐拉奄”成立。组织的成员从

事古代文献手稿、罕见刊物的收集工作，着手刊印著名的经典作品，首先是佛教经文和“皇家著作”合集。1884 年起开始出版周刊《瓦奇拉奄维塞》。在刊印了被奉为经典的古代文献后，出版者进一步将注意力放到了宫廷文学圈的当代作家的作品上。

十九世纪下半叶，暹罗文化生活方面的重大发展已经触及了所有文艺创作领域。各类文学作品——诗歌、戏剧、散文的数量和质量间的相互关系急剧变化。从前的韵文语体和诗歌规范的统治逐渐结束，诞生于实行“皇宫启蒙”政策时期、旨在强调文学的优美性的散文，占据了越来越稳固的地位。这一时期出现了使读者了解遥远的欧洲以及那里的生活、艺术和科学发明的作品。启蒙活动中出现了对暹罗文学而言全新的散文体裁——通俗科学论文、文章、旅行记、概述、日记、书简。当然，先前经典文学中的传统规范也仍在延续，但顽固地试图捍卫传统却使一系列经典形式明显变得死气沉沉。

诗歌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学进程中减弱了。一方面，相较于严肃的工作，诗歌更像是娱乐消遣；另一方面，诗歌愈发成为一种特权甚至是责任，而并非简单的自我表达的需要。在此期间，诗歌词汇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戏剧以及佛教仪式中——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两人重新审校并修订了宗教文本《论皇室生活》（佛教称为“本生注”），拉玛四世甚至用自由诗体“立律体”重新撰写了一系列最重要的章节，旨在简化仪式诵读。总的来说，拉玛四世致力于大众的宗教启蒙，除了关于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言行故事外，他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祈祷辞、布道辞和经文（不少情况下是用巴利文写成的）。上流社会的诗歌在宫廷创作中基本上被写成在舞台上朗读的诗篇：既有短小的“保克拉孔”（戏剧中富有情感的表演）和拉玛四世取材于《拉玛坚》的诗歌（关于拉玛和婆罗多的片段），也有两部拉玛五世为宫廷剧团创作的大部头的戏剧剧本。他的第一部长诗——《林中野游者》讲述了暹罗南部原始部落的生活，第二部长诗则是根据《一千零一夜》的情节改编的《律律梦醒诗》。拉玛五世的作品不仅以高超的艺术技巧著称，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将全新的情节引入了宫廷诗歌和戏剧创作范围。

647 •

普塔吕特拉（1808—1871）因其头衔克罗姆銮而闻名，他是一位多领域的全才，既是语言文学家，同时也是翻译家和诗人。他最重要的作品——诗体经文《钦达玛尼》是一部针对朝臣的、囊括了其日常工作准则的汇编，而纪行诗《普拉帕托姆》则在传统意识中包含了对前往暹罗最受景仰的圣地帕托姆的一次水上旅程的抒情叙述。

蒙拉措泰亲王（1819—1867）是另一位受欢迎的纪行诗人。他曾作为暹罗第一位大使到访英法（1857—1858）。回国后立刻发表了长诗《伦敦纪

行诗》。这部作品遵循了顺吞蒲的传统，内容独特。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运用了古典规范以起到启蒙作用，他以鲜活和通俗易懂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了对于暹罗人民而言全新的世界——既有激动人心的航海故事，也有对欧洲人生活习俗的幽默描述，还有饱含真挚敬意和兴奋之情的科技颂歌，赞颂了煤气照明、自来水管道和铁路。

在同时代所有纪行诗人（尼拉特）中，最著名的是文学巨匠、顺吞蒲的学生提阿克拉帕尼（1830—约 1890 年）。无论是在创作的规模还是原创性上，提阿克拉帕尼的哀歌体长诗都不能同“伦敦的”纪行诗人蒙拉措泰亲王相媲美。提阿克拉帕尼的诗篇更朴素、隐秘、传统，有时在其中甚至能体察到相对于当时的文学水平而言的古韵。但是读者却被提阿克拉帕尼诗作中真挚的情感、温婉的抒情和惯有的淡淡的愁绪俘获。提阿克拉帕尼的另一部关于前往佛统塔朝圣的作品中（1851）则充满了欢快明亮的处世之道。诗人带着真诚的愉悦观察河畔生活，描绘了一幅关于曼谷市郊的水上市场的生活写实画：

> 市场热闹熙攘，仿佛狂风下的大海；
> 小船，满载花园和田野的恩赐，
> 彼此靠拢，如一把把香蕉；几十种方言的嘈杂喧哗，
> 桨手嘹亮的歌声，清脆的啪嗒欢快愉悦
> 触动了听觉，嫉妒的目光已被
> 纷繁鲜艳的大地瑰宝深锁……

沉浸在声音、芳香和尘世诱惑的浪潮中，朝圣者暂时忘却了自己远行的虔诚意图。

如果没有一些其他古典体裁的成功之作，如西松顿 · 沃翰（1823—1892）的“克罗禅”（“令人欣慰的象之赞歌”，源于逮象时的祈求）、“赫雷阿”（“桨手之歌”，源于民间创作，为皇家水上出行和节庆创作的庆祝文本）和毕查禅亲王（1838—1885）的古老的“禅”（表现浪漫主义英勇精神的史诗）体风格的长诗《伊瑙》和纪行诗《那空是塔玛叻（洛坤府）游记》，那么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诗歌图景将是不完整的。在著名的语文学家萨基特丹隆亲王（1845—1890）的创作中，任意一首抒情诗都是“蒲莲谣”（“长歌”，和浪漫曲相近的抒情歌曲，通常献给女性）中的一组歌曲。

在蒙固和朱拉隆功时期，形成于十七世纪那莱王时期的宫廷中的集体创作的传统极为盛行。文学团体聚集在宁静安谧的宫廷中，但与此同时，却也产生了为数不少的更加私人甚至可以称之为隐秘的沙龙，例如宫廷公

寓中的女诗人坤普姆(约1815—约1860年)和坤素婉(约1820—约1880年)的沙龙。类似沙龙的参与者包括朝廷文雅诗歌的拥护者以及著名的诗人和音乐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歌曲的抒情体裁如蒲莲谣、达克索伊(抒情歌唱形式)、萨克拉瓦(抒情歌唱形式)得到了发展;在诗歌晚会中创作的诗篇甚至组诗经常带有辩论的特点。和坤普姆以及坤素婉同时参与到沙龙创作中的还有翁萨提拉特殿下以及巴姆拉帕巴拉巴克亲王(1819—1886)、平卡罗总督(1808—1886)等。

可以认为十九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是暹罗民族戏剧发展的转折时期。拉玛四世的改革、拉玛五世的革新以及对西欧戏剧的兴趣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总而言之,这一时期专门为剧院创作的原创作品并不多,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流行文本的改写、加工和修订。对于著名作家而言,戏剧创作并不是他们的强项,但是为洛坤而写的作品却流传广泛,它们或是匿名,或是署上非文学名家的姓名发表。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暹罗开始刊印最受观众喜爱的歌剧剧本以便于大众阅读。廉价书籍的销量很大,这些书通常只是选取冗长的戏剧结构中的几个片段为内容。此类大众读本的艺术水平一般而言是不高的,通常也不将其纳入优雅文学的范畴。

648・

泰国语文学传统将上面提到的蒙固和朱拉隆功的创作,以及数量极为有限的宫廷作家的创作,如毕查禅亲王(1838—1885)的格仑体长诗《普拉萨穆特》和巴姆拉帕巴拉巴克亲王的乐队伴奏组歌,视为暹罗舞台长诗(当时还没有出现针对宫廷剧院的散文创作)最优秀的范例。

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期,散文体语言获得了和诗体语言同样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具有与之前一样的辑合性(不同文化形式的合并)特点,小说文学以及语文学、历史学、法学、地理学、医药学、宗教学、占星术著作仍被归为文学创作领域。此类中包括了如下旨在启蒙的著作:翁萨提拉特殿下编著的药典《塔姆拉萨巴库尼亚》,蒙固、普拉西松单瓦汗(1805—1870)、提巴卡拉翁(1857—1915)、普拉查基特・卡拉察克所著的一系列历史编年书,朱拉隆功、萨基特丹隆、巴萨卡拉翁(1849—1920)、索莫特(1860—1915)、瓦奇拉扬・瓦拉洛特(1859—1921)等人的大量的关于哲学、民族学、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文章和概述。普拉雅・提巴康(普拉雅・普拉克朗加)的论文《关于各种现象的意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这类著作中占有特殊地位。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试图以理性主义的视角推翻佛教中一系列关于世界的看法,他特别批判了封建暹罗王朝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审美观点。提巴康力求科学地解释宇宙、自然、社会、国家的法则,他立志对年轻人进行启蒙教育,并证明道德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

追求更加严谨、系统、科学地描述事实、事件和现象这一特点,非常明显

地体现在传统的暹罗散文体历史、哲学、法理学著作中。历史作品渐渐失去了之前轻松消遣的特点。十九世纪末，正式的宫廷编年史“巴克萨瓦丹”已经不再是艺术散文体，尽管不久前它才开始以这种体裁出现：作者的虚构、神话传说的转述、民间传说及其中崇高的英雄人物、圣者、上帝，渐渐地从诸如学者提巴卡拉翁的宫廷编年史的历史著作中消失。

拉玛四世公布的法令受到泰国文学传统的尊崇，其作为“高级”散文的范例，绝不是关于君主观念的枯燥而单调的目录。《关于女子剧院的法令》(1855)中包含了一系列对舞台艺术的称颂，以耀眼、隆重的形式宣告了青睐戏剧表演的国王的恩惠、洛坤剧院的人道主义宗旨和对其实践领域的革新。国王的公众讲演仪式首次被纳入其中，拉玛五世的演讲不仅具备纯粹的启蒙意义，同时还具有文学艺术价值。

不同形式的回忆书信体散文、历史和风俗随笔、简短的讲演，在这一时期极为普及。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是该领域最有成就的散文家。写日记在宫廷中变得流行。人们时常将优秀的札记公之于众。“伦敦的”纪行诗人蒙拉措泰亲王的文章是对欧洲生活的最早的描写，它即是以此种摘录自旅行日记的形式出现在宫廷内的。

拉玛五世在其书信体文集和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即应当谨慎、冷静地接受异国的影响。这位国王游走各国。他有条理地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见闻，他经常在寄往家乡、写给亲人和亲密的高官的信件中记叙重要的事件。他游历欧洲期间和女儿(即公主)的书信集《远离家门》中有不少篇幅是对欧洲人的生活的描述。

如果说拉玛五世在信件和日记中主要讲述的是大海另一边的异国和那里的生活，那么他的另一部著作《皇家礼仪十二月》则记述了祖国的传统礼仪和习俗。拉玛五世详细地介绍了暹罗一年当中每个月进行的各种宫廷礼仪、庆典和节日，他试图考察每个仪式的历史，说明这些仪式的宗教基础，涉及佛教、婆罗门教和湿婆教的作用。拉玛五世效仿记录年度仪式的宫廷作品的传统模式，创作了一部在艺术水平和知识性方面都极具价值的作品。不久之后出现的萨基特丹隆亲王关于宫廷某些重要节日的概述丛书，可以作为拉玛五世作品的补充。

拉玛五世的活动也涉及暹罗最初的文学批评。在自己的第一篇文学批评(1884)中，国王同“纪实性散文”的拥护者进行争执，坚持维护作者在重构某些事件时进行艺术幻想的权利。

需要注意的是，在散文体文学中几乎没有带有情节的作品，这一时期流行随笔、概述和书简。事实上，研究者有时也会提及道·沃·娑宛那坡(又名天宛，1842—？年)的“揭露性”短篇小说，这部作品大胆讨论了却克里王

朝的专制制度，但是平民大众对于这位作家却知之甚少。在普通的读者——识字的农民和城里人——圈子中，民间故事极受欢迎，并随着出版业的发展被印刷成民间书籍，虽然根据业已确立的传统，进入宫廷文学的通道对于大众仍是关闭的。

启蒙运动和科学思想在暹罗的发展也促进了主要由宫廷作家进行的翻译活动。

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兴趣明显地增强了：不仅产生了对邻国的历史编年书（普拉西松单瓦汗译自高棉和蒙古语）和巴利文的佛教经文（蒙固，西松单瓦汗伊利）的翻译，同时还出现了译自英语的科学文章、概要和报刊消息。

第六章 柬埔寨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柬埔寨以法国殖民者愈演愈烈的坚决、连续的入侵为标志。最初是 1864 年 4 月签订了柬埔寨成为法国殖民当局的保护国的条约，随后是 1884 年柬埔寨的独立主权被彻底剥夺，最终在 1887 年，柬埔寨和其他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所属地一起组成了印度支那联盟。柬埔寨此前从来没有丧失过政治上的独立性（尽管近一百五十年来，柬埔寨一直处于两个政治和经济上更为强大的邻国——越南和暹罗的夹击之下），而从此之后却在很长时间里丧失了民族独立性。殖民化自然在整体上减缓了高棉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学方面。

殖民化时期的第一个文学发展阶段是从柬埔寨成为法国保护国起，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这一时期没有重要的文学作品。一方面，文学成就的匮乏是由于处在殖民地的附属状态的高棉文学受到抑制；另一方面，用于书写的材料十分脆弱（烘干的棕榈叶和地方生产的糙纸），在热带气候中很快腐败了。直到二十世纪，印刷业才在柬埔寨出现。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导致我们无法看到那个时代柬埔寨的全部标志性作品。

一部分作者仅以笔名或者以他们从事的职业作为称谓为人们所知晓，如《金色男孩》(1887)的作者克洪・桑托・品特，即“认真的检查官”。以真名为人所知的仅仅是为数不多的著名作家，如亨加、莫克、唐、乌克等。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高棉文学保留了自身传统体裁的地位。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神话长诗，如亨加的《提那冯克》(1856)，梅克的《别嘉达》(1857)，叶玛的《维米彦・天》(1858)，斯莱的《斯列伊・维杰伊》(1858)。这些作品讲述了旅行、战役和英雄的胜利，其中有上帝和超自

然力量的加入，用复杂的带有大量梵文和巴利文的词汇和极其考究的诗歌韵律写成。

莫克是这一时期杰出的诗人，他出生于磅士卑省，曾经是僧侣，后来成为西哈努克时期的重要官员。他以笔名桑托·沃哈·莫克（莫克，即兴创作的大师）进入高棉文坛。他特有的迅速敏锐、机智巧妙的即兴创作的能力使他扬名。他创作了篇幅不大的关于爱情以及自然之美的诗篇，同时也是长诗《东姆与狄欧》(1859)的作者。 ·650

自十九世纪之初起，作家们明显致力于更加深入地观察本国人民的生活，这也促使七十年代神话长诗文体内发生了变化。诗人们保留了原有的神话情节，将假想同现实相结合，把穷苦人民的生活作为关注的焦点，例如：乌克的《孤女》(1857)；作者不详，只知其使用笔名布罗莫巴列阿·普赫阿卡杰伊进行创作的《波特辛沃恩克》、《特别忠诚的婆罗贺摩》(1881)；前文述及的《金色男孩》(1887)；唐的《萨巴契特》(1890)；仅知道其作者是普列克普兰夫特教堂的祭司的《拉克西那沃恩特》(1890)等。道德高尚的、谦逊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忍受困苦以及因为亲人和之前朋友的阴险行为而遭受痛苦的人，成为那段时期高棉文学中的主人公。诗人试图复制现实，详细地叙述了主人公的家庭生活、折磨他们的饥饿和寒冷，以及他们用于蔽体的破衣烂衫。描写成分显然多于叙述成分，情节的进展非常缓慢。诗律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一时期的长诗相较之前的格律有所简化，改用七音节诗行进行创作。诗歌的语言也明显变得简单易懂。

乌克的长诗《孤女》在这方面是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的神话民间创作中，找到和这首长诗中的许多情节相雷同的部分。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被叫做卡玛尔的小女孩在母亲玛尔安·米耶特死后的悲惨生活，与俄罗斯的小母猪类似，这个女孩最终成为了国王的妻子。

必须强调，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高棉文学正如前期的文学创作一样，带有佛教伦理道德色彩，渗入了佛家道德说教的成分。长诗《裹着芭蕉叶的男孩》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是当时最受欢迎的长诗之一，也是诗人恩戈(1923 年去世)唯一保留下来的作品。这首长诗确切的创作时间无从考证，但其情节、风格以及主题的指向性都表明，它显然更像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作品。长诗清晰地反映了佛教的道德准则：人无须凭借努力，只要做到忍让、温和、无怨言地承担重负和忍受贫困，即可以在生活中取得崇高的荣誉。类似的强调自我完善，而不要求个人积极性和意志力的说教，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柬埔寨被殖民时期以及 1863 年后反动环境下的文学作品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神话长诗相较于其他体裁的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涉及注（古印度文学的体裁）的内容上（确切地说，指对“注”

的加工,这一点对于十七至十八世纪的高棉作家的创作而言非常典型),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也说明了十九世纪下半叶高棉文学中的“注”作为佛教体裁的传统的稳固性和持久性。

651·

第七章 越 南 文 学

1858年法国殖民者入侵后,越南开始了漫长的争取国家独立的战争。爱国志士虽然输掉了战争,但是并没有向殖民者屈服。法国人重新掌控其所占领的殖民地的第一个阶段由此开始。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当时越南文学的基本内容。文学作品中流露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客观公正的反封建主义倾向是越南改革者启蒙主义世界观的特点,它已经不能再同儒家学说相协调。阮长祚(1828—1871)宣称死记硬背地反复咀嚼古代著作,以及儒家对远古时期进行理想化,都是目光短浅的行为,他提出了承认历史的进步的思想:“直至今日仍有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事件和变革,而只是不遗余力地夸耀久远的古代,认定之后的时代不如过去。因为无论做什么,他们总希望能回到过去。因为儒家宋理把我们的国家指引上了错误的道路,使其变得不稳固,没能给它带来繁荣昌盛……事实上显而易见的是,过去的时代远比现在更糟。”



托马年·乌克《孤女》一书的封面

改革者在自己的政论中,将掌握实践科学的活动家的形象和无用的书呆子对立起来。但全新的内容却经常出现在旧的形式中:政论家阮界氏(1852—1895)沿袭了儒家写作手法,在过去的历史中寻找支点。他引用了历史类比的手法,但并没有采用儒家内容,而是取材于欧洲历史——他讲述了英国和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的历史。彼得大帝的形象作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参与到那一时代的先进理念的形成过程中。

阮长祚和与其思想一致的作家的戏剧作品,都取材于相

信万能的帝王意志的人民。这些作家在写给把儒家视为主要支点的帝王的书函中，推翻了儒家的经院哲学。

但这并不代表着同欧洲的联系表现在整个越南的文化规范中，天主教徒张荣记(1837—1898)在其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张荣记是一位学者，也是一系列欧洲科学组织的成员、政论家，通晓多种语言，曾和殖民者关系密切，并翻译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著作。他的名字和越南国内报纸印刷的开端相关：1865 年他在西贡出版了第一份报纸《嘉定报》。张荣记创建了最初的越南语语法学，最早按照欧洲范例介绍了越南历史。他促进了拉丁文书写字母表的普及，记录并发表了民间叙事故事，创作了随笔——这是全新的越南文学散文的前身。

但从根本上来说，文学仍在传统的形式范围内发展；在旧文体规范内部发生了变化，可以察觉到明显的文体更新。传统的关于奇闻怪事的故事完全消失了，基本上没有出现叙事长诗。呼吁和号召文体广为普及。政治辩论极其尖锐。这一时期总体上呈现出进一步文学民主化的趋势，语言更加口语化，尽管“罕旺”(越南化的文言)仍扮演重要角色。

同时也诞生了解放运动文学。这种文学以炽热的爱国主义情绪、对平凡人物的关注为特点，它号召人们统一起来反对侵略者。樊庆年(1803—1877)在给嗣德皇帝的文章中写道：“在豪华安宁的宫廷中，伟大的您，请想一想，想想南方边境平民百姓被敌人完全烧毁的农舍；欣赏着万年坟茔的富丽堂皇，请想一想南方边境被敌人夷为平地的平民百姓的墓碑；享受着饕餮盛宴，伟大的您，请回想一下，曾经富庶的南方边境现在空空如也……”

阮廷炤(1822—1888)的创作对于解放运动文学的形成发展有巨大的意义。他的长诗《蓼云仙》可能创作于法国入侵之前的 1854 年，并被译成法语。这是第一部被翻译介绍到欧洲的越南文学巨著。令人奇怪的是，第一部被翻译的作品的作者，正是反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的奠基人。不过，法国人在多次再版这部作品、发表不同译本的同时，却禁止出版该作者具有爱国主义内容的其他作品。 · 652

长诗《蓼云仙》的题目取自主人公的姓名，长诗沿袭了经典叙事诗的传统写作习惯，但引入的自传体特点多少已经破坏了这种传统。长诗渗透着高尚的道德力量：正如诗人自己一样，蓼云仙也因自己母亲的离世，因为强烈的爱母之情和丧母之痛而双目失明；和诗人一样，主人公的未婚妻的父母在得知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后，也拒绝把女儿嫁给他。相似之处不仅局限于此——主人公还表达了作者以说教者的一生证明的、自己所忠于的信念和观点。但蓼云仙并非第二个作者“我”，而是作者的想象经过艺术转化而

形成的形象。他是有学问的读书人、诗人，是从强盗手中拯救美丽的乔月娥的战士。

长诗盛大的结尾场面——它的终篇——英勇而乐观：重见光明的主人公（这也可以理解为引申含义——他意识到了之前隐藏在人们心中的事物）立下战功，赶走了敌人（“手握银枪，骑黑色骏马。一个人奔赴战场”），同乔月娥一起获得了幸福。长诗和民间传说相近，在越南南部尤其受到欢迎。

在持续了几十年的殖民者侵略战争开始后，阮廷炤的诗歌和以节奏甚至是韵脚为特点的散文诗作品清晰地回应了人民的苦难，号召他们奋起反抗奴役者。诗人的许多散文诗作品是生活和传统的复杂结合，例如《勤约义士祭文》(1861)。这部作品首先在越南文学中创立了暴动者——人民军的概括形象，他们不久前才放下木犁，拿起武器：“习惯了用铲子劳作，善于拿起锄头和铲子，熟练地在田间耙秧。”这部作品的戏剧性意味更加深刻，因为里面描述了牺牲的英雄。农民“甚至从不知道，该如何抛长矛，如何用武器射击，如何持长枪在旗帜下前进”。但是他们不惧怕殖民者和他们那“炮声轰隆的，用锡、铜铸成的军舰”。

在既是诗人又是医生的阮廷炤的作品集中，理应包括特别的《渔樵问答》。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融于情节描写之中的诗体医学论述。这部作品为没有文化的越南农民带来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实际好处，不仅仅教会了他们有关“医疗”技术的初步知识，更培养了他们对自己故乡的热爱。

讽喻性是阮廷炤爱国主义诗歌的特点。这些诗歌具有独特的纯理性主义诗意：

> 无论高尚的品德如何沉重，
> 小舟总能轻松滑行。
> 纵然毁坏了画笔，
> 也能正刺入叛者的喉头。

这些诗句可被视为诗人全部创作活动的纲领性诗句。

讽刺诗人的创作在那个时代占重要地位。畸形的殖民地秩序，对殖民者阿谀奉承的放肆行径，变为傀儡聚集地的帝王宫廷——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暴露性的讽刺诗歌及其全部流派产生的土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应属阮劝(1835—1909)和秀昌(1870—1907)。

阮劝认为所有殖民者带来的国内变革都是对“事物自然规律”的极端扭曲。他的几篇诗歌是以有生命和无生气、真实和虚假的对比讽刺手法创作而成。在诗歌《石头人》中，诗人将对国家命运无能为力、漠不关心的封建

政权，与英勇善战、保卫越南寺庙的雕像相对比。自阮劝起，越南开始出现了将失去权力的帝王宫廷比作一群无才无能，却妄自尊大地将自己视为国家命运主宰的演员的文学传统(《老演员妻子之言》)。阮劝同样创作了出类拔萃的风景抒情诗，他的诗作描写了农民的山谷，标志着越南诗歌民主化的新阶段。

秀昌在自己的诗作中描写了海滨城市生活中的变革——他的家乡南定早于其他地方出现了新的预兆。诗人意识到，生活中的一切仿佛都颠倒了，变成了另一番模样，他多多少少地追忆往昔，在那里看到了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和谐。他的诗作《填河》具有讽喻性的言外之意，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纲领性诗篇：

这里曾有条小河湾，
而现今——玉米和番薯。
我站着，忍不住惊诧：
这里的房屋和这片田野从何而来?
静谧……呱呱的蛙叫声入耳。
我颤抖，有人在耳边轻声。
我想，呼唤渡手，
他很快回应，驶近。

但秀昌在作品中并没有不顾一切地热衷于遥远的过去，在其中能够看到对于之前的道德和社会价值的过高评价，如在诗作《他们的新年愿望》中，讽刺性地表现了对诗人毫无吸引力的有关荣耀和福祉的愿望。秀昌的诗作中勾画了揭露性的形象：利用自己同殖民政权的亲密关系而骗光自己同僚的放高利贷的殖民官员，以及厚颜无耻的商贩和狡猾的骗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越南诗歌按照自己的发展方式逐渐向现代文学类型过渡，其中充满了新的生活内容、新的世界认知、新的思想，但却仍是在旧的文体规范框架中发展的。

第八章 印度尼西亚群岛和马来半岛文学

1860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争论性长篇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或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中，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穆尔塔图利(原名爱德华·戴维斯·德克)写道：“所谓的荷兰印度……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个是由部落组成，大公承认荷兰人的统治。那里统治权或多或少地

仍由当地的首领掌控。另一个部分，也就是爪哇所属之地，全部归属于荷兰，除去一个微不足道、也许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例外（中央爪哇公国）。”

荷兰人不断派遣军事考察团并在“外省”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垄断了外部商贸，彻底隔绝了外省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这些地区的文化生活按照自己的形式和意识形态内容勉强存在，符合前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即使在殖民地的中心——爪哇和马都拉，在精神文化领域实现重要变革的可能性也是极为有限的。在镇压了蒂博尼哥罗革命（1825—1830）后，国家农奴制下对自然和人类资源的开发方式最终得以确立，但是这种被列入封建高层职责范围的开发方式却并没有促进资产阶级因素在当地社会中的成熟（农民几乎是被要求无偿地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荷兰商贸团体种植咖啡、甘蔗和其他农作物）。

在这种环境下，欧洲1848年的狂飙突进运动并没有在印度尼西亚引起反响。但是这一事件却活跃了荷兰商会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当年取消了从宗主国引进印刷制品的禁令和允许在殖民地发展私人印刷业之后。荷兰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已经印度尼西亚化，或者它们本身就形成于印度尼西亚（以跨国婚姻的方式），这一点反映在同样描写当地冲突的所谓的殖民地文学中。它们诞生于不同于宗主国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并吸收了移民口头叙述的文体风格（席间的以及其他一些叙述），是荷兰文学自身的组成部分。它们受到了主要受众是听众而非读者的印度尼西亚传统文学（特别是散文）的影响，地方演讲艺术同样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这些文体特点在穆尔塔图利最优秀的（虽然在思想层面绝非最典型的）长篇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或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中得到体现。作者刻意在作品中表达了对马来语演说（在公众前发言）的赞颂。

654·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愤怒地揭发了“大胃口的弹丸小国”在其沿海领地的恶行，并呼吁终结落后保守的封建统治，这些都极大地加剧了这场旨在取缔“强制性文化”制度的斗争。由于这种制度显然已经不再有利于促进荷兰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殖民地市场内倾销自己的商品），七十年代初通过了一系列法案，这也为印度尼西亚的市场经营方式开辟了道路。所有这一切为使当地人民步入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了可能，虽然居住于当地的中国人担负着欧洲资本的中介职能这一障碍，为当地中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本身的形成划定了重要的界限。所以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觉醒过程和文学更新直到二十世纪才逐渐开始，也就是说晚于与其相邻的大多数殖民地国家。

出现于十八世纪末叶的离心倾向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印度尼西亚文学进程的总体特点。文学等级的出现（爪哇和马都拉的爪哇语，“低级马来语”：

外省的古典马来语，“高级马来语”）为让每一个部族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创作让出了明确的空间：苏丹语、马都拉语、亚齐语等。同时在海港城市爪哇和其他岛屿都延续了旧风俗，粗俗的（“低等的”）马来语（共同语）文学增加，并在二十世纪为印度尼西亚全民族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十九世纪下半叶以这种共同语根据阿拉伯书写法创作了沙伊尔（长诗），内容涉及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荷兰驻班贾尔马辛（加里曼丹岛）的军事考察队，还包括不少其他古文献手稿。同时也出现了以拉丁字体印刷的书籍：《圣经》的译本，传教士寓言故事的汇编集，以及穆罕默德·侯赛因的讽喻性训诫长诗沙伊尔《懒汉》（1863），赛义德·阿赫马德的沙伊尔《鱼》（1865），巴吉达·马拉扎兰纯正的醒世性的沙伊尔《官员……》（第二版，1881年）等。荷兰和中国联合商社的代表人为七十年代改革后明显活跃的“低级”马来语报刊和文学作出了主要贡献。其中大多数是对汉语和欧洲文学作品及诗作的转述。同时也创作了关于时事和重大功绩的“新闻性”沙伊尔，如多产的作家唐·腾吉的沙伊尔《铁路建设》（1890）。1884年，记者、文学家李金福（1853—1912）在“巴塔维马来”语法中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即规范“低级”马来语。他同时也创作了不少长篇小说，但故事情节却发生在作者从未到过的中国。地方现实散文自九十年代中期起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在最为发达和丰富的爪哇传统文学中，编撰的倾向变得更为明显。一个“独立”的中央爪哇公国的统治者，即著名诗人芒库纳格拉四世（1853—1881年在位）根据改编成剧本的爪哇化《摩诃婆罗多》创作了长诗《特里波莫》——封建时期的善行汇编，包括了军人对宗主无限忠诚的原则。他的另一部长诗《韦陀多莫》直至今日仍是最具权威的所谓爪哇神秘主义学说的汇编集，其中的秘密学说，吸收了本土的印度佛教和苏菲教派的元素，这也给爪哇人对世界的认知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以吸收囊括社会材料和创作的激情著称的最伟大的爪哇人民诗人朗格瓦尔斯托（1805—1847），在神秘主义的末世论主题和传统预言书所固有的传达材料的方式这两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在他数目众多的作品中包括了具有尖锐的批判色彩的长诗《天灾人祸的世纪》（1860）和未完成的散文体伪史著作《拉甲之书》。《拉甲之书》将本土的神话和故事与历史现实事件（虽然也经过了人民的意识加工）结合在一个共同的画面中。

诗人同编写了第一部爪哇语小学课本的荷兰裔爪哇人温特尔紧密合作，并参与了创立于1855年的爪哇语报纸《布拉摩尔丹尼》的发行活动，他的创作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最初印刷出版的作品。但是很难清楚描述朗格瓦尔斯托创作中的理性启蒙主义思想倾向，虽然他是新爪哇语散文的奠基人（从事散文创作是这一时期亚洲启蒙文学的特点）。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

语文学家以爪哇作家对传统形式、思想和形象的持久不变的喜爱，来解释655·朗格瓦尔斯托创作中的保守特点，而这也在今后妨碍了爪哇文学的重要革新——同依附于它并在类型上与它相近的文学相比。

拉登·哈吉·穆罕默德·穆萨(1815—1884)为规范苏丹文字和标准化语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创作了数目众多的醒世"瓦瓦禅"(长诗)和一部分散文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短篇小说《遗嘱》和《受辱的修道士》，作者在其中批判了封建迷信，并捍卫了对待现实的纯理性主义原则。

巴达克人维列姆·伊斯冈德拉(约1840—1876年)也许是印度尼西亚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文化和思想意识生活环境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人物。他以古老的、文字传统却很薄弱的巴达克语进行创作。1854—1861年间，他曾在荷兰学习，获得了小学教师的文凭。回到苏门答腊后在坦奥巴托主管规模极小的政府师范学院，并在这里为学生们编写了两部供阅读的书目(《欧洲人的知识和技能》、《五彩缤纷的历史》)，书中涉及了他在欧洲期间收集的材料，穿插着地方题材的有教育性的故事。维列姆·伊斯冈德拉的另一部作品《真诚与和解》中收录的诗歌(《父亲给上学的儿子的建议》等)值得关注，在这些诗歌中作者宣扬了自己对祖国边陲的热爱以及知识的益处。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古典("高级")马来语创作中，并没有出现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启蒙者阿卜杜拉·宾·阿卜杜·门希具有同等意义的人物。甚至在他的儿子和唯一的继承人穆罕默德·易卜拉欣(1845—1905)的作品《游泳的故事》(1872)中，也并未像他一样坚决地抨击封建蒙昧主义。这部作品讲述了易卜拉基姆作为将军省长的翻译出行雪兰莪公国和吡叻公国的经历。形成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柔佛、吉达、吉兰丹以及其他一些被英国"监管"的马六甲半岛公国的晚期家族史中，全部是虚构的内容，相较于史事记述，其中更经常提及的是神奇的散文体希卡亚特。诗体的沙伊尔仍是最受人喜爱的体裁，其中更加着重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例如，卡里苏姆和萨菲的姐姐的沙伊尔《愚蠢的商人》和沙伊尔《像因陀罗的熊蜂》。

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元素，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称为最后一个马来现实主义作家的佩恩盖特公国(荷兰属廖内群岛)的阿里·哈吉·易卜·拉吉·哈吉·阿赫玛特(1809—1870)的作品的特点。在他的散文《布吉人和马来人的宗谱》(1860)和《无价的恩赐》(1865)中，详细地评论了历史事实并流露出对古代编年史中的神奇情节的怀疑态度。著名的神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拉吉·阿里最反对直接接受欧洲启蒙思想。在指责风俗的衰落的同时，他并没有致力于彻底的变革，刚好相反，他呼吁稳固封建制度、重拾没有迷信和"新思想"成分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真正"的学说。但正是在这些

呼吁中，体现了马来的伊斯兰改革者的未来方针，这些人很快便将在马来（马来西亚）文学的革新源泉旁奋起。

第九章　菲律宾文学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有组织的、持有自由民族主义观点的解放运动，成为了菲律宾国内形势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此时的西班牙正在彻底丧失之前欧洲强国的地位。它不得不屈从于欧洲发达国家和北美合众国的商业资本的冲击。十九世纪中叶，大地主的权力受到一些限制，地方封建领主中的新阶级——卡西克逐渐形成。地方显贵和西班牙人一起组成了享有最大的特权的社会团体——显贵集团。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从中产生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社会分级和财产不均衡的问题加剧。出现了更多的联合婚姻和不同人种间的婚配。在民族发展中，菲律宾学者强调了他加禄人的领袖地位。 ·656

如果说在过去的整个殖民时期中，行政管理人员——特别是西班牙神职人员完全不承认绝大多数当地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甚至禁止他们学习西班牙语，那么自1863年起，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行，菲律宾引入了全民初等教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当地富人阶层，即显贵集团的代表的孩子有机会进入之前不对他们开放的、位于马尼拉的古老的圣托马斯多米尼加大学学习，同时也开始在西班牙的大学中完成自己的学业。作为最主要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解放思想体系的传播者之一，菲律宾不同阶级知识分子的出现在这一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四十年代出现的菲律宾期刊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促进了民族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普及。六十年代初期，在菲律宾一共有将近二十种期刊出版物，其中包括十份报纸。但是它们的发行量并不大，而只有小范围的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接触到西班牙语出版物。自1864年起，《厄尔帕西格》报纸与其他西班牙语材料开始刊登他加禄语（当时最普及的地方语言之一）文章。由著名文学家卡尔沃在1882年出版发行的《他加禄报》，是一份他加禄语和西班牙语的双语报纸。1889年，第一份伊洛科语报纸《他加禄人》筹备发行。

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和民族压迫给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带来了损失，民众的状况越来越糟。旨在开展温和自由主义革命的菲律宾地主、资产者、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发起的反对运动加剧了农民强烈的愤怒情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显现出令人恐惧的全社会不满情绪，以第一次严肃的起义——1872年爆发于甲米地的炮兵卫戍队和军械库的士兵、工人起义收尾。虽然染上了血迹，但这次起义却对后期的解放运动发展产生了极大

影响，直到1896—1898年的民族解放革命。

紧随着被镇压的甲米地起义，迫于异常严酷的压迫，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西班牙。身居海外的菲律宾人和西班牙自由主义者于1888年组成了西班牙菲律宾联盟，并在1889—1895年间创立了隔周发行的、在联合解放力量和战斗性的政论作品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团结报》。这一宣传运动的高峰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著名的菲律宾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作家何塞·黎萨尔(1861—1896)，政论家马尔萨洛·皮拉尔(1850—1896)和格拉西安诺·洛佩斯(1856—1896)，他们的反殖民主义和反教权运动的文章和抨击作品在唤醒同胞的民族自觉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实际参与到了团结国内爱国主义力量的活动中，培养了不同阶级的革命志士。在黎萨尔于1892年创立的、随后因其流放而解体的菲律宾同盟中，出现了由菲律宾联盟的成员安德烈·波尼法秀(他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活动家，被誉为"伟大的平民")领导的第一个秘密革命组织"卡蒂普南"(全称："最尊贵的民族儿女协会")。值得注意的是，1816年成立的第一个十二月党人团体同样也以类似的名称命名——"真诚和忠实的祖国之子团体"。

西班牙经典文学很早以前就以选取菲律宾精英的代表作为原型人物而著称，并对地方菲律宾语，特别是他加禄语文学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他加禄语文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基本上都是宗教和贵族内容的翻译作品，同时也有本土的民族化改写作品。

赫阿金·杜阿松(1843—1908)是一名记者，也是最高产的他加禄宗教作家之一，一生中创作了至少四十部不同的著作。其中除了新题材——《圣经》劝谕性选题的诗体文本，还有天主教圣徒(主要是菲律宾的)的生活记述、受他加禄人欢迎的传教文、基本的心灵真谛的叙述、道德伦理训导等；同时他笔下也诞生了分为两部头的他加禄变体《新鲁滨逊》(1879—1880)，以及"阿维特"(浪漫主义长诗)《埃里赛奥和阿尔丹西奥》(1872)。

这一时期的人们系统地翻译并上演了西班牙十六至十八世纪经典戏剧的剧本，推动了菲律宾戏剧和现代剧院的发展。西班牙民族音乐戏剧和音乐剧——萨苏埃拉自十九世纪中叶起在菲律宾得到了发展。1878年上演的戏剧《火之舞》是最早的西班牙语的菲律宾萨苏埃拉之一。同样也出现了民族语言的萨苏埃拉，最初是描写爱情冲突，在世纪末叶逐渐具有了社会意义。将文学作品搬上舞台，通常是使菲律宾人接触这些作品的唯一方式。

这一时期也是他加禄现代诗歌的奠基人弗朗西斯科·巴拉格塔斯(1788—1862)的创作晚期，他创作了很多喜剧、讽刺剧和摩罗摩罗。1861

年出版的他的第三部(生前的最后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一部)主要文学作品集——用"阿维特"形式写成的长诗《弗洛兰特与劳拉》堪称经典。巴拉塔格斯的创作对菲律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他加禄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可以将弗朗西斯科·巴拉格塔斯的创作视为菲律宾他加禄语文学散文的开端。但是真正的他加禄语散文的先驱和第一部他加禄语长篇小说的作者,却是出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神职人员莫杰斯托·德·卡斯特罗。他是著名的传教士和神学家。作为日常题材的书信形式劝诫体长篇小说《乌尔班和菲利斯的书信》(1863—1864)的作者,卡斯特罗在菲律宾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部渗透着神学思想的长篇小说中,非常清晰地刻画了两个女主人公的性格,引入了作者的同时代人自孩童时起便熟悉的环境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情景。这部作品以纯粹的,接近于日常口语的他加禄语写成。很久之后的 1895 年,革命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佩德罗·帕特诺(1857—1911)在移居西班牙期间发表了最早的他加禄语长篇小说之一《妮奈》。米格尔·卢西奥·布斯达门特的父亲的他加禄语长篇小说《老者帕西奥·马库纳特》(1885)同样也在菲律宾文学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雷昂·佛洛伦蒂诺的创作在十九世纪伊洛科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佛洛伦蒂诺(1849—1884)是戏剧家、抒情和讽刺风格的女诗人。创作了稍稍带有宗教神秘主义风格的诗作的神甫胡斯托·克拉乌季奥·福哈斯(生于 1855 年)同样也是早期伊洛科诗人中的代表。在八十年代后期,他们的后辈也进入了伊洛科文学领域,代表人物有国内的社会政治活动家恩科纳西奥·维尔莫尔(1863—1933)和伊莎贝拉·瑞斯(1864—1938)。维尔莫尔因其民俗风格的、以民间口头语创作的《智者言》而为众人所知,这部作品中包括了伊洛科人民的真知灼见。伊莎贝拉·瑞斯创作了伊洛科诗歌和散文。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还创作了以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生活为主题的故事,他们不再仅仅是和宗教有关的人物,同时也是有思想和感情的普通民众。

这一时期的宿务文学基本上是不同类型的民族戏剧:喜剧的、人民日常生活的、仪式的等等。班乃岛文学(希利盖农文学)的发展进程也与之类似。文学家别尔菲克托于 1884 年创作了班乃语的《耶酥受难记》,这是第一部由使用班乃岛语的人创作的班乃岛语作品(此前班乃岛语宗教作品都是由西班牙僧侣写作的)。道德说教作家科尔内罗·伊拉多(1837—1919)的创作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启蒙主义倾向。他创作了第一部班乃岛语戏剧《理想的女人》(1878),在九十年代他创作了关于各种道德伦理问题的劝谕性议论以及哲学著作。

著名作家胡安·克里索斯托莫·索托(笔名:克里索托,1867—1918年)是班乃岛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改写后名为《死者的婚约》)、歌德的《浮士德》等一系列作品。他是班乃岛萨苏埃拉的奠基人,创作了传统的塞纳库洛等作品。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西班牙语言文学研究的深入,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西班牙语菲律宾文学形成了统一的系统。文学经典(莎士比亚、莫里哀、大仲马、儒勒·凡尔纳、左拉)和社会政治文学的西班牙语译本的阅读巩固了这一系统。

658· 在众多的菲律宾的西班牙语文学家、记者和政论家中,还需提到地方神学家佩德罗·佩拉埃斯(1812—1863)和何塞·布尔加斯(1837—1872)(在甲米地起义被镇压后被处死)。何塞·布尔加斯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创作了第一部西班牙语的短篇小说《黑母狼》(1869),副标题为"历史小说"。小说的情节建立在取自菲律宾历史的真实的戏剧素材之上,内容涉及十八世纪初殖民地的贵族和宗教上层的尖锐冲突。作者不仅想要记录神职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揭露社会和民族的不平等,也同时旨在证明,是殖民宗教制度导致了起义运动并引发了反对无法律和不平等的暴力斗争。小说最后一章的章名"未来的菲律宾"具有深刻含义,在此章中作者阐述了自己思索后得出的去除社会恶习的方法,特别是通过"公平的统治政权"、推行教育,以及维护所有人"在上帝和法律面前"的平等的方式。

说西班牙语的菲律宾神甫并不仅仅局限于发表宗教和政论主题的文章,他们同样首次尝试创作菲律宾的西班牙语故事(加布里埃尔·瑞斯、塞维利安·维利耶那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最早的两部不太成功的西班牙语小说:何塞·坚戈的《天使的花园》和何塞·萨默尔的《无罪观的故事》。洛佩斯·哈恩纳(1856—1896)用西班牙语和他加禄语创作了讽刺短篇小说《博托德修道士》、长篇小说《修道士之女》和反教权运动主义倾向的《希望》,但这些作品在艺术性上同样薄弱。

杰出的菲律宾作家、思想家、学者、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何塞·黎萨尔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为世界范围内的西班牙语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何塞·黎萨尔于1861年出生于卡南巴镇(内湖省)。1872年起他在马尼拉的阿登尼奥耶稣会学校学习,1877年考入了圣托马斯大学,但在1882年被迫移居西班牙,因其诗歌和言论使人怀疑他的政治思想具有反动倾向。何塞·黎萨尔完成了在马德里大学医药学系(1884)和哲学系(1885)的课程。他是西班牙菲律宾联盟和《团结报》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参与者,并对自己的同胞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成为了本民族民族主义反殖民运动的公认的领袖。1892年回国后,他创建了第一个菲律

宾政治组织——菲律宾联盟，但很快被判三年流放。革命伊始他试图以医生的身份前往已经开战的古巴，但在途中被遣返，并在简短的装模作样的审判后，于1896年12月30日在马尼拉被执行枪决。

直至今日，仍能在菲律宾文化的各个不同领域中观察到黎萨尔的思想和审美影响，但首先，他是作家、政论家、翻译、编辑、教育家和持民族主义观念的改革家。他支持以和平方式进行争取民主改造的斗争，暗示了“西班牙母亲”对菲律宾诸岛的“同化”。事实上，黎萨尔在晚期生活中已经脱离了官方宗教，但他仍相信“自己的信仰”，他成为了自然神论者，信奉“理智的宗教”。

正如英国研究者奥斯汀·科茨指出的，何塞·黎萨尔的文学创作是他“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他的书信、政论性文章以及抨击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如《百年后的菲律宾》(1889—1890)、《论菲律宾人的怠惰》(1890)、《罗德里格斯兄长的幻象》(1889)、《电话旁》(1889)、《告菲律宾人民书》(1892)等。表现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手法的过渡的作品为黎萨尔带来了国际知名度。对他同时代的生活的真实描写和炽热的揭露性激情，立刻吸引了菲律宾本土以及国外的读者，虽然在这些地方他的小说《不许犯我》(1887)和《海盗》(1891)是非法发行的。



何塞·黎萨尔 照片 18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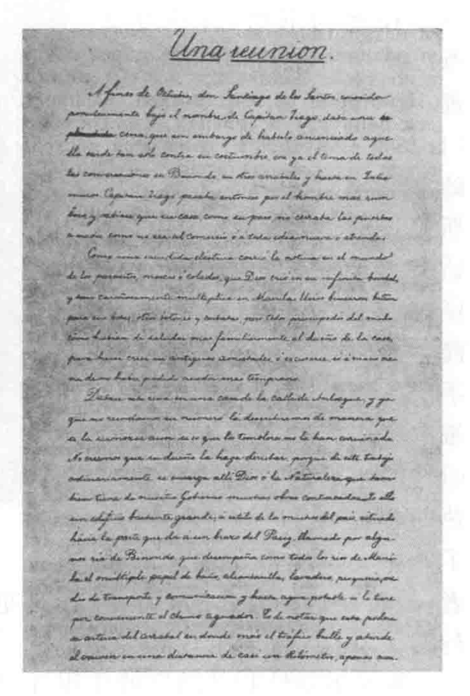
除了揭露性和鼓动性的作用外，黎萨尔的小说也是一部真正的十九世纪菲律宾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具有浪漫主义激情，作品中的事件急速发展，多少有些混乱的纠葛，包含大量的“神秘元素”，邪恶的意志和高尚、大度、勇敢相对立，正如他最喜欢的作家大仲马和欧仁·苏的作品一样。如果说在他的第一篇小说中，作者只是批判了菲律宾的殖民主义制度，那么在他的第二部作品中(事实上，是第一部作品的延续或第二部分)，作者则

试图找出使祖国摆脱殖民统治的道路。

崇尚自由的爱国主义抒情色彩是黎萨尔诗歌的基础。对国家、人民、故土的热爱的思想，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态度，几乎渗入他的全部诗作中。在诗作《献给菲律宾的青年》(1879)和《玛利亚·克拉腊之歌》中可以看到宣传鼓动的倾向。同样的情感也出现在《告菲律宾人民书》、《画家，用香桃木枝和椴树枝为故乡编织花环》、《请求我的诗篇》及其他一些诗歌中。这一特点甚至在总体上是抒情性质的 1886 年的风景描写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海德堡之花》、《我的栖身之处》等)。同时，身处异乡思念故土，梦想重回祖国的黎萨尔在他的诗作中也表达了爱国主义思想。这种忧愁表现在他的《漂泊者之歌》中。其中一些诗篇最初是以抄本的形式流行，后于 1890 年印制成册。1895 年他发表了最后一部颂歌体裁抒情诗——《塔利萨伊颂歌》，这部作品呼吁人们为菲律宾人民的幸福而战。黎萨尔在就义前夜创作的《我最后的告别》(最初于 1897 年 5 月在香港发表)享有盛名：

660·




Una reunion.

黎萨尔的《不许犯我》的手稿和独页的影印复制件

永别了，敬爱的祖国，晴空中的太阳，
您是东方的明珠，我们失去的天堂。
即使我终止生命，我也不会忧伤，

即使未来我还有千百条闪光的生命，
为了您，我都乐意把它们向您献上。

亲爱的菲律宾同胞，请听我诀别的赠言：
你们是我的痛苦和磨难，我的灵魂和肉体，
我要走了，留下爱情、亲切的面庞，
我去的地方没有刽子手欺压奴隶，
那儿名誉不是诅咒，统治者只有上帝。

何塞·黎萨尔在戏剧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880年他在马尼拉发表了反修道院的独幕讽刺喜剧《巴锡河畔》和《众神的忠告》。他先是唤醒了同胞对菲律宾民族创作的热情，并在欧洲对其进行宣扬，并于1889年在伦敦用英文发表作品。他同时于1890年发表了西班牙语的，由他自己根据传说改编的《玛利亚·马金玲》、《他加禄民间文学范本》和《东方故事二则》。黎萨尔的创作规范自十九世纪末起在菲律宾多语文学领域逐步发展。他的诗作和小说，以西班牙语和菲律宾的地方语言口头相传，鼓舞了1896—1898年革命的参与者。革命前夕，黎萨尔的诗歌创作极大地推动了菲律宾民众西班牙语和他加禄语的爱国主义抒情诗创作的发展。比如帕特诺于1880年在马德里出版了爱国主义抒情诗选《菲律宾的茉莉花》(菲律宾的民族象征)。他发表了科学政论文章以及关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纪实文学，在宣传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以西班牙语进行创作的诗人宣传者中还应提到玛利安诺·庞塞(1863—1918)和安东尼娅·吕娜(1866—1899)。

在西班牙语的报刊政论作家中，同何塞·黎萨尔齐名的是以笔名皮拉尔德里进行创作的马尔塞洛·伊萨里奥·德里·皮拉尔(1850—1896)、尖锐的文章和抨击作品的作者巴斯库奥利·鲍勃雷特(1858—1924)、何塞·马利亚·班贾尼班(1865—1895)等。黎萨尔以及同他持有一样思想的作家的作品，加速了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为1896—1898年发生于菲律宾的反西班牙的民族解放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需要注意的是，菲律宾西班牙语文学和民族解放运动无关，也没有经历狂风暴雨般的发展。所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文学中，只能提及创作集中于六十至七十年代末期的著名西班牙语抒情诗人胡安·德·阿塔伊杰(1838—1896)。

第九编　东亚及中央亚洲文学

本编序言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这一地区的国家中，社会与文学发展居首位的当属日本。这得益于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1867—1868）以及新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时期的开始，其典型特征是其技术以及文化向西方开放。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开始了宪法运动，最终在1889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天皇的权力得到实际巩固，但是两院议会被批准建立。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变化也表现在文学中。对于日本文化而言，最迫切的问题是接受西方文明会不会使自身文化传统受到同化，或是得以保存。明治维新之后的最初阶段，文学仍然停留在传统形式上，但是逐渐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学译作，起初是政论性的、启蒙性质的，后来也有了艺术作品（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等等）。有大量启蒙性质的杂志出版发行，使读者了解到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学的成就。日本文化发生转向，在此之前许多世纪以来，日本文化都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在八十年代末，作家、批评家、别林斯基思想的追随者二叶亭四迷翻译了屠格涅夫的作品，使日本人的艺术意识产生了真正的革命。在此之后的九十年代初，大量俄罗斯文学译作开始出现。日本叙事散文类型自身发生了变化，更接近于西方文学，作家关注的中心已经是个性化的人类性格。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也仍然有各种传统类型体裁的文学作品问世。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发生了某些改变：工业得以发展，出现了工人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发展特别快的是上海，它成为大工业中心。在上海开始出现大量启蒙性质的杂志（其中一部分是欧洲人用汉语出版的）。尽管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整体上典型的还是中世纪思想和艺术形式，但是新的因素在缓慢积累，政论文和诗歌中出现了新的主题。日本社会及其文学的飞速发展也开始吸引了中国文人的注意力，区域性文学交流的性质逐

渐改变：以前是从中国到日本，如今是从日本到中国。

这一时期处于清政府统治下的蒙古文学也有某些进步，出现了最早的几部蒙古长篇小说。但是文学发展还没有走上民族文学与西方接近的道路，文学传统仍只是与整个地区的远东传统相接近（这一点在与中国古典文学接近的新的诗歌形式的萌发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对于蒙古文学来说，由于满族急速汉化而几乎完全消失的满语文学依然具有其意义，满语是蒙古人的中介语言（经常从满语翻译中国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书面公文语言。只有西藏地区的文学暂时还完全停留在旧的中世纪喇嘛教传统范围内。

662·

第一章 日本文学

1. 历史形势

十九世纪下半叶，日本人相对平缓的生活进程被破坏了。西方列强迫使日本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并开始同他们进行贸易，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54—1859）。这对日本人产生了强烈影响。他们不打算放弃持续了两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政策，不顾有亲欧洲情绪的学者（兰学者）们的警告：这些学者冒着生命危险声明，不同欧洲接触，不利用欧洲文明的优点，日本就不能摆脱贫困状态。但就是这些学者也提议不要脱离传统的道路，而要依靠引进知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古代箴言“和魂汉才”中的“汉”字换成“洋”，而“才”换成“技术的完善”，即“洋才”。为与他们抗衡，与社会舆论站在一起的、具有传统情结的学者出言证明，西方及其机械文明破坏了自然的法则，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和毁灭，为了避免这一点，应该“把洋夷（他们这样称呼外国人）赶出去”。

但（幕府）将军别无选择。1847年，将军政府（幕府）首脑阿部正弘向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们（大名）求计：“我们想维持锁国祖法，但如果要维持它们，就不得不没有胜算地同外国开战，而且不知道如何弥补战争开支。”同外国人签订条约之后，幕府（时代）签署了给自己的判决书。“攘夷”运动成为“尊皇倒幕”的运动。

然而，对外交往的十年中，日本经济发生了惊人的转变，而与这些转变同时，对外国人的态度也改变了。排外情绪依旧强烈（1860年，朝廷要求幕府承担驱逐“洋夷”的义务，而1861年发生了袭击江户不列颠公使馆的事件）。但就是那些要求驱逐“洋夷”的武士，也从外国人那里购买武器和船只，为的是和自己国内的敌人以及后来和外来之敌算账。他们不仅购买船

只，而且还为未来工厂采购了设备，使人想起又一句古代的箴言："富国强兵"。

一方面，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经济活跃起来，另一方面，正如"开国"的反对者们预见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被破坏。1867 年 12 月，处在绝境中的幕府放弃政权，拥护天皇，并在 1868 年 1 月按以前的模式成立了由皇族成员、御前贵族及反幕府的大名部族组成的新政府。这些事件被称为"明治复辟"（王政复古），即"文明开化"。带有保守情绪的政变参与者意在革新制度，而不是改换制度。但是，对"现代化"的渴望、与欧洲列强平起平坐的企图以及因此而采取的改造整个政治经济制度的步骤，不可能不引起日本的资本主义化。然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加速的现代化进程的人为性质不能不导致新旧思想的并存。在一定的时期中，形式依旧，成为维新的某种条件。这很清楚地体现在日本文学的特点上，日本文学在二十年后才开始变化。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文学界依然一切如故，娱乐消遣文学——戏作（意思是"为消遣而作"）继续繁荣。普通群众读者满足于滑稽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讲坏人故事的短篇小说。文学的状况和性质再次证明，新思想在旧社会中还未成熟。旧文学戏作没有涉及社会的迫切问题。其功能由晚期江户时代（十八至十九世纪初）的传统所奠定：带来享受，让读者开心，并按照儒教的"劝善惩恶"的原则教导读者走向美德之路。在俏皮话（俳句）、生动的对话、滑稽的双关语（川柳）、"游郭"中的恋爱情节这些消遣文学领域，戏作的作家们掌握了很高的技巧，但没有越过前人给他们划定的界限。戏作文学等级中居首的是假名垣鲁文（1829—1894）。他本人掌握"逗乐的人"的技巧，还在年轻时就了解了俳谐的规则，在取笑国人的习俗这个意义上他还是具有现代性的。他不认为模仿自己的前辈式亭三马和十返舍一九是不体面的，并以前者的风格写成了《火锅杂谈》（1871），以后者的风格创作了《西洋徒步旅行记》。主人公仍然是十返舍一九笔下那两个倒霉的朋友，这次他们在欧洲旅行，不时陷入窘境。作者借此表达了自己对半欧洲化社会的态度，这样的社会穿戴着礼帽和木屐，把一切有用和没用的东西匆忙拿来仿效。作家按照滑稽散文的规则，与其说是在嘲笑，不如说是在逗笑，但这不能让读者满意。

那个年代游戏文学的另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高畠蓝泉（1838—1885）。他在将军府受教育，懂英语，精通俳句、书法、茶道艺术，并且坚守自己的艺术风格。1872 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并在这份报纸上宣传自己的观点。

总之，游戏文学的主要因素依然是讽刺和滑稽，虽然它也开始涉及时

事，但只是按传统的方法来阐明它们。如果说以前创作这类散文是自然的，那么现在，对泷泽马琴、十返舍一九、为永春水的模仿则与社会的利益发生了矛盾。

2. 启蒙思潮

毫不奇怪，新一代的作家们把游戏文学当成笑柄而鄙视它。刚刚起步的文学家们认为把时间耗费在轻松读物上是可耻的，而他们对明治时期(1868—1911)通常被称为"启蒙者"们的著作十分着迷。这些启蒙者明白，如果人们的思想、心理不改变，那么什么都不会改变，日本不会成为一个现代的独立国家。福泽谕吉(1834—1901)的著作非常受欢迎，他提出用西方的"实学"代替传统的学说、佛教和儒教，在《万国一览歌》、《劝学篇》、《文明论概略》之类的著作中通俗地阐述"实学"。相继出版的一些日本作者的著作——植木枝盛的《民权自由论》(1879)、《言论自由论》(1880)，其后松岛刚的《社会平权论》(1881)，马场辰猪的《天赋人权》(1882)——证明，信仰人类的自由和平等的时代到来了。

这一时期的青年们的偶像是斯迈尔斯、密尔、边沁、卡莱尔、爱默生。1871 年出版的斯迈尔斯的《自助论》(译名为《西方立志篇》)成为日本人的案头必备书。在人们对社会问题有如此兴趣的情况下，就需要有新的获得信息的手段。报业开始得到发展。报纸分为"大报"和"小报"。"大报"刊登抨击时弊的文章、政治和哲学论文，"小报"则完全不涉及政治斗争，仅报道城市中的事件，刊登游戏作品，即所谓的关于文明的故事。假名垣鲁文发表了模仿福泽谕吉的作品，模仿其《穷理图解》创作了《黄瓜使者》，模仿其《万国一览歌》创作了《苦界一览歌》，而就其最喜爱的座右铭"文明和启蒙"，假名垣鲁文在作品中借主人公之口说道："而追逐一切欧洲事物的风气是否仅仅是为了简单改变外表？"

由于日本自身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艺术文学，新知识分子转向了翻译文学。自然，其鉴赏能力影响到对作品的选择和诠释。引起人们对欧洲小说文学的重视的第一部作品是布沃-李顿的长篇小说《花柳春话》[①](1878)。这部小说非常受欢迎，以至于随后又出版了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费讷龙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司各特的《拉默摩尔的新娘》及《艾凡赫》、维尼埃的《追杀虚无主义者》、大仲马的《医生笔记》、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

① 即《恩涅斯特·马特拉沃斯》。——译注

钦斯基的《鬼啾啾》[①]、托马斯·莫尔的《良政府谈》[②]。1882年，启蒙者中江兆民认为自己有义务使卢梭的《民约译释》[③]成为日本人的财富。首先翻译的是那些对认识世界和国家体制有用处的东西。这一时期的翻译暂时带有滥译的性质。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坪内逍遥在《尤利乌斯·恺撒》译本(他把这部作品比作传统的木偶剧院净琉璃剧作)的前言中承认："由于剧本中的许多思想和原则与我们的不同，所以我改变了许多东西：一部分删掉了，一部分加了上去。"长篇小说被改变了的书名说明了本土文学的水平及读者的鉴赏力。例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当时的日本人从英文翻译俄文小说)成了《"泣花怨柳"北欧血战余尘》，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被称为《"露国奇闻"花心蝶思录》。Н. И. 康拉德在《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阶段》的概论中提到这一点。

一方面，读者还没有对"人情本"的感人、伤感风格感到陌生，另一方面，他们也憧憬着政治理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过"自由民权"民主运动的青年在文学中找到了确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方式。出现了起先译自国外，然后由本国原创的政治小说。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被译成了《自由大刀余波锐锋》，而司各特的《艾凡赫》的题目改为《政治小说》。


国木田独步像

处于自我确立中的阶级的任务确定了其对作品的选择和解释。未来的部长尾崎行雄在那个年代写道："把自己变成小说家是我们政治活动家现在的任务。"第一部日语政治小说是户田钦堂的《情海波澜》。讲述"民权"的短篇小说出现在1880年。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1883)非常受欢迎，小说讲述了忒拜反抗斯巴达统治的英

① 即《地下的俄罗斯》。——译注

② 即《乌托邦》。——译注

③ 即《社会契约论》。——译注

勇斗争。新情节时而与传统儒教完善治理的概念共存。总的来说,政治小说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政治现象,而不是一个文艺现象。在八十年代末"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政治小说退出了舞台。

随着错觉的消除,对翻译事业的实用观点也成为过去,文学的自身价值逐渐得到认识。1888 年,二叶亭四迷翻译了屠格涅夫的两部短篇小说《猎人笔记》和《三次会见》。日本的作家们承认,这些小说彻底转变了他们对作家使命的看法。但俄罗斯文学暂时还主要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1892 年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莱蒙托夫的《塔曼》,1893 年有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人》,1895 年有他的《克莱采奏鸣曲》。1896 年,二叶亭四迷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阿霞》,1897 年翻译了他的《罗亭》。法国文学也有很大影响,如雨果、左拉、莫泊桑,在二十世纪初还有福楼拜、龚古尔。人们通过笛福、斯威夫特、莎士比亚、拜伦、华兹华斯的作品认识英国。英国文学的影响很大,后来诸如尾崎红叶、山田美妙、北村透谷、岛崎藤村、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这样著名的作家都受到了它的影响。美国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如朗费罗、马克·吐温、惠特曼,特别是爱默生。森鸥外编译的诗集《面影》向日本人介绍了德国和英国的诗歌,该诗集收入了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曼弗莱德》的片段、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中的《迷娘曲》和《浮士德》中的《图莱国王》、海涅的《美丽的渔妇》等。这已经是高水平的翻译。

总之,明治早期文学的特点是有双重性的结构。一方面,游戏文学的作家热衷于古风、传统的体裁,思想简单,目的单一——取悦读者;另一方面则是截然相反的趋势:相信欧洲文化的解放使命,热衷于政论、政治论文,并且完全鄙视那种迎合大众读者低级趣味的文学。这两个层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不过,这两个层面都没有认识到,不重视形式使它们的设想注定不能成功。

665·

3. 文学改良运动

著名的英国文学专家坪内逍遥(1859—1935)就已经主张反对散文的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他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戏作的容易满足性和政治小说的功利主义。他在文学评论《小说神髓》(1885—1886)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评论的前言中他痛心道,人们对散文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大的兴趣,而散文也从来没有堕落到如此低的地步,刊物不分良莠地刊登一切东西,盲目地模仿泷泽马琴、柳亭种彦、为永春水、十返舍一九。但是,前言以充满希望的话结束:"我决定谈出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小说将不亚于欧洲的小说,并将在艺术的圣堂中与绘画、音乐和诗歌一道占据应有

的位置。”为了这个目的，坪内逍遥在评论中分两个部分讲述了散文的理论、实质、种类和意义，讲述了主人公应该是什么样的，讲述了叙述的方法、结构的规律。坪内逍遥明白，新型的散文不会凭空出现，因此他建议人们学习日本文学的优秀传统，利用“欧洲的描述技巧”。

坪内逍遥的功绩在于，他提出了散文艺术的独立性问题，反对把文学看成是娱乐和训诫的手段的传统观点。坪内逍遥不仅复活了散文，还强调了新方法、“逼真摹拟”的必要性，他把这个方法理解为“心理现实主义”的方法：“小说的主脑是人情”，而且这些情感要以心理分析家的精细性加以描绘。坪内逍遥承认日本传统与欧洲传统的根本区别，他相信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有益性：“有两种描写人的性格的方式，可以称之为阴的方式（模糊的、隐秘的）和阳的方式（明亮的、明显的）。当作家采用阴的方式时，人的性格不暴露出来，而是一步一步地显示出来。我国的作家主要采用的是这个方法。相反，阳的方式意味着在知识的基础上明显的、坦率的描写，向读者揭示性格。大多数欧洲作家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阳的方式需要有心理学、科学理论、相面学、骨相学的基本知识。然而不能说哪个方法更占优势。作家会逐渐认识到这一点，把两个描写方式结合起来。”

尽管对欧洲文学有不同寻常的认识，坪内逍遥仍然捕捉到了传统的原则互补性。然而，当他的想法得到实现时，已经过去了不少时间。至少，与该评论同时出版的坪内逍遥的中篇小说《当代学生性格》，与其说证实了其立论的正确性，倒不如说是证明了艺术陈规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虽然坪内逍遥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深入到心灵的最深处”，但他仍然局限于描写风俗习惯，采用习以为常的戏作情节手段和技巧手法。难怪人们称他的作品是“戏作的改良形式”。坪内逍遥实质上只是创建了对日本旧式文学稍加更新的形式。然而，正如中村光夫所指出的，那一时期取得成功的是迈出半步的人，而不是向前跨出一步的人。坪内逍遥没有摆脱对文学的传统态度，所以与同时代人相近，并因此而能够对同时代人的社会思想产生影响。

· 666

这一点就并未反映在日本第一部真正的新型小说的作者二叶亭四迷（1864—1909）的身上。作为坪内逍遥的学生，他并未全盘同意老师的文学理论，在《小说总论》（1886）一文中，他提出了自己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只反映生活外部形式，而不反映其意的文学作品，不能称之为真实的。”“形是偶然的、易变化的、反复无常的，意是必需的、经常的、永远存在的。难道不应该依靠始终不变的东西？可以依靠反复无常的东西吗？”二叶亭四迷与坪内逍遥进行辩论，认为坪内逍遥忽视了“意”，局限于描写感情和事件，没有深入理解它们的最终意义。“在现实世界的每个现象中都包含自然的



坪内逍遥像

意：我们不清楚这个意，因为它隐藏在现象的偶然外壳中……再现实际的小说的目的就在于借助词语，以艺术的形式清楚地表现隐藏在偶然外壳中的自然的意。这就赋予文学以生命力。”

二叶亭四迷是俄国文学专家，在他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别林斯基的思想，尽管有些日本化了。坪内逍遥回忆道：“我同二叶亭第一次见面是在1886年1月，那时他已经是最好的俄国文学专家。作为批评家，他是别林斯基的追随者；作为作家，他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的追随者。”但不论是文章还是二叶亭的小说《浮云》（1887—1889），都没有被读者所接受。小说本身、其主人公、白话文体都与读者所习惯理解的文学大相径庭。对下级官吏内海文三的日常生活情景、内心纠纷的描写暂时还没有打动读者。内海文三出身于贫困的武士家庭，来到了东京，但却没能适应它，他放弃了自己的荣誉并对上司奴颜婢膝，因而被解职。此后，他与心爱的女人幸福生活的希望破灭了，他不得不把她让给更走运的对手。读者恐怕并没有深入理解作者的意图——表现现代文明的“反面”：日益兴盛的明治社会实质上与人的幸福并不相干。小说中提出的人的个性、个体问题，在十年后成为日本文学的主题。

二叶亭四迷本人在《自白》中谈到小说的构思：“我对俄国作家所从事的那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换句话说，是对从文学立场研究社会现象的兴趣——对东方文学中完全缺乏的那些东西的兴趣……当我读俄国小说时，各种类型的俄国官吏让我感到深深的厌恶，日本的官吏引起我同样的感受。对官吏阶层的特权地位的愤怒大概就是小说的主题之一。”的确，日本传统文学中既没有客观的分析，也没有社会批评。

虽然二叶亭四迷说自己是在冈察洛夫的《悬崖》的影响下写成这部小说的，但他没有鄙视本国的传统，而是采用了江户晚期的体裁、式亭三马的所谓“洒落本”以及三游亭圆朝（1839—1900）的“落语”中的白话体。同时他

也明白，不采用新的风格是不可能创作出有时代精神的文学的，于是他与作家山田美妙一道主张用言文一体来革新文学风格。他摒弃了暗语、讽喻的诗体，提出遵循现实主义小说的手法，遵循逼真的、心理的真实。但二叶亭四迷如果不珍视民族根源的话，他也不会成为日本文化中的一个现象。他试图弄清日本的现代状况，特别是把它与俄国的彼得大帝的改革作比较："彼得大帝过于匆忙地接受了时髦的西方文化，结果是新老一代没有和睦相处，他们之间没有和谐。于是就滋生了罗亭类型的人们，他无所适从，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长期的民族传统阻碍着异族文化的推行。旧的信仰已经动摇了，新的还没有建立。社会失去了平衡。人们在寻找支撑点，但却找不到，于是就有了奥勃洛摩夫这样的人。"

二十年后，二叶亭四迷得到了承认。然而，即使是那个时候，日本作家回忆起的与其说是二叶亭的小说，不如说是屠格涅夫的小说《幽会》[①]和《三次会见》的翻译。日本的研究者认为，后来内田鲁庵和国木田独步学派的创作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路线是从《幽会》和《三次会见》发展起来的。中村光夫认为："二叶亭能够用日语传达从我们的传统文学观点看来完全不寻常的美，他内心认识到了这种美，并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找到了它。他再现了原作的'风格'，表达出了新的、以前不为我们的文学所知的对自然和人的态度。"除了屠格涅夫，二叶亭还翻译了果戈理、高尔基、迦尔洵、安德列耶夫的作品。日本的研究者承认，这些翻译对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田山花袋这样的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作家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被称为"自然主义"



二叶亭四迷像

① 即《猎人笔记》。——译注

的新流派的奠基人，这个流派成为二十世纪头十年日本文学的主流。

而在八十年代初，以白话体为基础的文学风格暂时还没有得到认同。相反，人们对比戏作更为古老的文学写作的传统方式产生了兴趣。对欧洲的极度热衷引起了反作用，这与其说是因为天皇的“教育敕语”(1891)使人们想起了国民的道德和祖先的习俗，不如说是因为日本文化确实受到了威胁。足够说明问题的是，文部大臣森有理建议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而小说《日本的未来》(1897)的作者们准备用英语取代日语。这引起了自然的反作用——“国体明征”和“国粹主义”运动。1888年，《日本人》杂志开始出版，提倡对日本古老艺术的重视。1890年，古典文学的两部大型系列——《日本文学全集》和《日本诗歌全集》开始出版。

在这个浪潮中，坪内逍遥的理论引起了看似出人意料的反映：它被它所针对的那些人所接受。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东京大学的学生尾崎红叶(1867—1903)和山田美妙(1868—1910)决定振兴日本小说的昔日荣耀。

4. 文学社团“砚友社”

1885年，两个年轻的作家山田美妙和尾崎红叶组成了一个文学社团“砚友社”。在《我乐多文库》杂志的第一期中，尾崎红叶以少年激情向读者宣告：“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出版月刊《我乐多文库》，为的是愉快地消磨时间和消遣。我们刊登所有的东西，什么也不漏掉，从古代日本诗歌到现代歌曲。”不过他们明白，像老一辈戏作代表那样按旧的方式写作是不可能的，坪内逍遥的批评是公正的：文学不仅是消遣。

“砚友社”反映了作家们使小说现代化的企图；文化的保守功能发挥了作用——“砚友社”的信徒追随坪内逍遥，承认文学的独立性、自我价值。已经不能把他们视为书写“游郭”中的娱乐情节来取悦公众的模仿者了。他们对风格很挑剔，并把元禄时代(1688—1703)——即市民文化的“黄金时代”——的井原西鹤的小说和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奉为典范。

依靠传统，他们给文学带来了其艺术内容所能承受的新东西。批评家认为尾崎红叶成功的原因是他复活了井原西鹤的风格，其中篇小说《两个比丘尼的色情忏悔》证明了这一点。小说的情节十分传统，远离现代：两个偶然相遇的尼姑发现，她们曾经爱过同一个人。但小说还是非常受欢迎。读者非常想念习以为常的风格和感人的情节，这在读者的内心引起了对过去的怅惘之情。

668·

尾崎红叶的中篇小说《香枕》也远离现代生活的问题，让人想起井原西鹤的中篇小说《好色一代女》。六十岁的风尘女子沙田优讲述了过去的事

情。她“不贪恋金子，哪怕男人再漂亮，也不会让她头脑发昏，并且是整个游郭中最固执的女子”。读者喜欢了解既精于情爱，又精通诗歌和音乐的艺妓的生活细节，传统的风格给读者带来满足，这种风格通常被称为“粹”或者“优雅”，即略带放肆的雅致。吸引读者的是对派头、肉体欢愉的喜爱，这些是突然暴富的人们所贪恋的。中村光夫认为，正是因为尾崎红叶高超地掌握了把优雅性与明亮的色彩和谐地结合起来的“粹”的风格，才使他取得了成功。

这些年里第二个受欢迎的作家是幸田露伴(1867—1947)。他在许多方面与尾崎红叶相抗衡。他的理想是塑造强烈的个性，诸如用自己的双手建成五层塔的木匠“慢腾腾的十兵卫”，或是小说《风流佛塔》(1889)中的雕刻家的那种类型。他的主人公们是有着无比坚强意志的人，为了自己选择的道路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这给了他们不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支配的超人的力量。作者想说的是，在失去了自己特征的当前的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他不接受欧洲化，他感到亲近的是道家和佛教的超然和自由思想，但他的主人公远离生活。作为修辞家，幸田露伴是井原西鹤的追随者，他高超地掌握了其手法。

尾崎红叶和幸田露伴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成功说明，同时代人的心理并未发生什么变化。那些“永恒的问题”暂时还没有触痛读者，这些问题他们可以从欧洲的著作中得知，而这些问题几年后对日本作家来说成了主要的问题。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坪内逍遥的写实主义及“砚友社”的作家们开始有了反应。

浪漫主义者北村透谷指责坪内逍遥说，他复活了过去文学中可疑的价值、淫荡的“粹”的艺术观点，但却忽略了真正永恒的、创造性的“国民热情”。他指责坪内逍遥道德上的冷漠、回避。在《〈香枕〉中的粹》和《粹论》两篇文章中，他宣称“砚友社”的“情色故事”远离真正的爱情。

森鸥外也反对坪内逍遥。文学界饶有兴趣地关注着两位作家之间愈演愈烈的争论，这场争论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但森鸥外实质上坚持的是决定着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存在的东西。不能说谁在争论中取得了胜利，但坪内逍遥再也没有写过小说并转向了戏剧，而森鸥外在1890年发表了中篇小说《舞姬》，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至于“砚友社”，或者是批评对尾崎红叶产生了影响，或者是他自己感到了变化的必要，1895年后在他的创作中才开始了转折。他放弃了传统的情节及传统的风格，并写成了对他来说完全不寻常的作品《多情多恨》(1896)——关于

失去了爱妻的鳏夫的悲伤命运。他以心理分析家的客观性描绘出孤独的、被痛苦压抑的男人的心灵苦难。此后，批评家们开始谈论起欧洲文学对尾崎红叶的影响。尾崎红叶确实对法国作家表示了尊敬，比如左拉、莫泊桑，尽管也有人说，他结合了江户人和古板的英国绅士的特点。

尾崎红叶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金色夜叉》(1897—1903)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被抛弃的少年——他的恋人嫁给了一个富人——成了一个冷酷的高利贷者，向爱情遭到践踏的社会施以报复。女主人公也很不幸，她为财富所诱惑，没能挽回爱情。但不论主题——金钱胜于情感——是如何迫切，引导着作家的不是生活，而是既定的思想和对形式的关心。1902年，国木田独步在《隐居者红叶》一文中预言了《金色夜叉》所代表的那种文学的终结，因为它“在现象的表面滑行，不深入到生活的深处”。国木田独步称这种文学是“穿着西装的日本文学”，像任何一种同类艺术一样，它注定要消亡。国木田独步的预言实现了。小说《金色夜叉》的生命并不比其作者长久多少。

“砚友社”昙花一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由于思想取向的迅速交替。“砚友社”是它所身处的时代、局势的产物，当时重要的是使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与现代化的急剧进程对立起来。转向过去有助于平衡局势。但一旦局势发生了变化，亲欧洲的和亲日本的极端倾向，穷尽了潜力，失去了魅力，对“砚友社”的兴趣也就失去了。



《菊花》歌川国贞(1786—1864)
《百花争艳》集中一页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新体裁可以被视作文学中根本变化的征兆：“观念”小说、“悲惨”小说和“家庭”小说。称为“观念”是因为小说中表达了某个亟待解决的“观念”；称为“悲惨”是因为故事有悲剧色彩。这些小说的作者——川上眉山、广津柳浪、泉镜花——所描绘的局势，证明了新观念与旧道德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感情与义务的冲突重新成为关注的中心，但已经处于另一个视角下：可以为义务而牺牲感情吗？

但作家们仍然在用旧语体、旧的方式写迫切的问题，反映"生活的阴暗面"。

到九十年代末，人们对这些体裁的兴趣也冷淡了。文学上的失败成为川上眉山自杀的原因之一(1903)，广津柳浪不再写作，而泉镜花开始以古代传说为题材写作幻想故事。

年轻的女作家樋口一叶(1872—1896)在文学界中独树一帜。她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以自己关于苦命妇女的小说赢得了读者的爱戴。自家及家外的贫困让她感到压抑，但从《埋没》(1892)这样的作品来看，这没有妨碍她思考高尚的问题。中篇小说《青梅竹马》(1895)中，到处是冷漠、被摧垮的心灵，生活没有给少年们预示任何好的东西，因为没有人认真考虑孩子们的未来，每个人都埋头于自己的事情、自己的贪欲，无论是对政治的贪欲，还是对成功的贪欲。 ·670

5. 诗歌

新思潮也影响到了诗歌。还在坪内逍遥的文学评论问世之前，就出现了新体诗运动。这场运动起始于东京大学三位教师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编集的《新体诗抄》(1882)。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向读者介绍欧洲诗歌，展示如何作诗，为此他们还展示了自己写的新体诗的范例。不过，本国诗歌还是占了诗集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是莎士比亚、格雷、丁尼生、朗费罗、金斯利的作品翻译，这些诗人被推荐作为模仿的典范。作者们让人相信，真正诗歌的时代到来了，而为此就需要抛弃旧的形式，因为，正如井上哲次郎所说的："明治的歌，应成为明治之歌，不应与古歌雷同。日本之歌应成为日本之歌，而不应与中国的雷同。"井上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已经写够了从八世纪就有的中国诗(汉诗)，到了转向西方的时候了。为了更具说服力，作者们开始用"poetry"称呼"诗歌"(就像坪内逍遥



《大塔宫护良亲王》一寿斋芳员(创作期为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 选自《本朝名将镜》

使用“novel”的概念，提议遵循“欧洲的描写技巧”一样）。传统的“花鸟风月”风格的日本和中国诗歌不符合现代的风格和新思想，新思想最珍视的是个人和民族的独立性，而欧洲诗歌提供了这个独立性的范例。而传统的短歌、俳句、连歌体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也不能满足现代人。而为此就首先要打破限制诗歌容量的旧的形式（短歌中是三十一个音节，俳句中是十七个音节）。

然而，尽管作者们极力主张革新诗歌，他们自己也没能摆脱传统的节拍（五词句和七词句的交替规律）和习惯的节律，他们自己写的诗就是明证。在外山正一的《出鞘剑之歌》中，虽然篇幅没有受限制，但诗歌的语言与古体相近，充斥着汉字、古词，并且在辞藻的华丽方面与古代战争史诗的黩武性有些相似。同时，在调性上可以让人感觉到丁尼生《轻骑兵进击》的影响，但其中的激情却是日本式的：

> 我们的荣耀重新显示给世界——
> 日本的强大。
> 敌人和我们自己
> 在疆场上死在剑下。
> 心中有大和魂的人们，
> 牺牲的时刻到来了！

简而言之，新颖之处仅表现在篇幅及以日本启蒙运动的精神来宣传新观念方面，这与诗人的另一首诗《题社会学原理》如出一辙。这些诗用古日本标准语“文语”写成，其他的语体还没有出现（前文提到过，“言文一致”运动是在更晚的时期开始的）。

671· 对这部诗集的反应可以说是消极的。诗歌行家们没有认真对待它，而且它不具有真正的艺术上的优点。在诗集中出现的与其说是职业诗人，不如说是新运动的思想家。不过，对新体诗的兴趣被唤醒了，文学界开始广泛讨论新体诗的原则。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山田美妙的《日本诗歌作品论》、矶贝云峰的《本国诗论》、宫崎湖处子的《对诗歌作品之思考》、小田和的《新体诗论》等。有关新体诗的性质和方法的争论激烈起来。外山正一在《论新体诗》（1887）中列举出新体诗的特征：自由的精神、不受局限的篇幅、广泛的词汇、现代的语言、乐观的风格、形象的新颖、关怀未来、不模糊隐晦、含义清晰。最后一条要求是针对传统诗作的暗示、意犹未尽的风格的，它用来唤起想象，引起情感反响（“余情”），为的是使人感受深藏在事物深处的内在美（“幽玄”）。

到八十年代末，争论各方达成了一致，其观点在当时流行的杂志《国民之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表述。文章的题目是《新体诗批判》，作者呼吁诗人们既要摆脱“汉语”，又要避免过分模仿欧洲的诗人，因为与欧洲人人为的构思美不同，日本人传统上珍视的是自然美。文章建议诗人们学习本国的传统，学习古代诗选《万叶集》（公元八世纪）中著名诗人们的“长歌”以及民间体裁。可以说，这个观点对争论作出了总结，反映了新体诗中的真正状况。它把用热爱自由的精神和对日本人不寻常的欧洲诗歌技巧——特别是欧洲浪漫主义诗歌技巧——加以革新的古代中国传统和古代日本传统综合起来，结出了自己的果实。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问世的山田美妙主编的《明治时期新体词选集》、《新体诗选》，森鸥外主编的《新体诗精华集》说明了新体诗的成熟。这些诗集表现了传统音部、听觉所习惯的音调旋律的稳定性（主要的音节单位依然是数百年来磨砺的、用停顿断开的五词或七词诗行，这是由日语的音节单位特点，即其中有高低音而没有重音所决定的）。不过，诗集中出现的不是倾向于长歌的五一七词音部，而是七一五词音律，这与中世纪的时髦歌曲或佛教赞歌（“偈文”）这样的民间诗歌相似（倾向于民俗的、歌曲式的开头是浪漫主义的特点）。



菊川英山（1787—1867）选自三折画《三美图》

这里不能不谈到基督教题材对新体诗的影响。自“开国”以后，日本取消了对基督教的禁令，许多作家曾对基督教义着迷并开始信奉基督教。诗歌中出现了《十二座石冢》这样的长诗，当时广受欢迎的基督教传教士植村正久为该诗作序。这首诗用古日语“和文”写成，其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古事记》（公元712年）的语言，另一方面，存在着对于但丁、弥尔顿和《圣经》中的赞歌（赞歌的初期译本在1874年就已经出现，1876年被再版）的模仿。当时许多人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包括浪漫派诗人北村透谷和现实主义的宣扬者国木田独步。在自己的诗集《独步吟》的前言中，国木田独步写道：“我是羡慕地看待欧洲诗人的作家中的一个。生活在明治时代，对

· 672

拜伦、丁尼生、席勒我也读得入了迷，所以我叹息，在我们的国家根本没有类似的东西……我们的血管中流动着天保年代（1830—1844）的先辈们的血液。在心灵的深处，我们是东方人，而在节拍上我们接受了欧洲人的洗礼。所以，在我们小小的胸膛中，西方与东方之间、继承的思想感情与教授给我们的东西之间进行着痛苦的斗争。看到朝霞时就想朗诵华兹华斯的诗，听到悠扬的晚钟时，就会思念西行的诗。”两种传统的交会就是如此的不简单，但却给人以希望。

无论如何，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运动是九十年代新体诗成功的条件。这时出现了以北村透谷为首的“文学界”；这时可以根据“新声”诗人团体编著的、由那时已经得到承认的森鸥外主编的翻译诗集《面影》来评判欧洲诗歌的长处；这时岛崎藤村的《嫩菜集》也终于问世了，这部诗集出版后已经没有谁怀疑新体诗的潜力了。

诗人们对传统的形式——短歌和俳句也恢复了兴趣，由于这些形式的改良者正冈子规（1867—1902）的才华，它们又恢复了生机。的确，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就曾试图革新传统的题材，原因是虽然按照旧习俗，在宫廷名下也举行了优秀和歌（日本歌曲）的比赛（这些歌曲被授予天皇奖），但这些歌曲无力保持诗歌的生命力。曾有一个时期，现代化的拥护者们鄙视传统文化，甚至连改良者坪内逍遥也怀疑过传统和歌的潜力：“古时，人们的感情更为简单，所以他们就用三十一个字的和歌表达自己的感受，而我们不能用几个词表达所有我们感受到的事物。”



《狮子》壁画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京都艺术博物馆藏

尽管诗人们热衷于新体诗，尽管存在诸如《新体诗抄》的作者外山正一的观点：“和歌或者川柳所能表达出的思想，不过是短暂的爆发，像线香烟火，像流星曳出

的火光”，仍然不能就此认为日本人可以放弃古老的文化。人们重新认识到传统不是那么无足轻重。1887 年，萩野由之的著作《和歌改良论》问世，在这部著作中他主张摒弃传统的“花鸟风月”风格、以往的审美观点和僵化的形象，借此对传统体裁进行革新。他在文学主张上并不孤单，八十年代末开始了“新体和歌”运动，新体和歌也旨在表达新时期人们的感情。

正冈子规的创作从俳句开始。1893 年，他发表了《芭蕉杂谈》，1895 年，发表了《俳谐大要》，出版《杜鹃》杂志，其中刊登了高浜虚子、夏目漱石，当然还有正冈子规的作品。他细致地研究了俳句的规律，并提出了自己对“写生”方法的解释。“写生”的概念借自绘画理论，它指的是“从实体上描绘下来”；对于松尾芭蕉来说，任何对实体的描绘就是深入理解事物的最高意义，通过认识事物内在的美而认识真理是豁然开朗之路。例如松尾芭蕉著名的诗《古池》：

闲寂古池旁，
青蛙跳进水中央，
扑通一声响。

俳句的新时代从此开始。在松尾芭蕉之前，俳句只是词语游戏，没有与生活联系起来。在 B. H. 马尔科娃的文章《芭蕉的诗“古池”》中引用了正冈子规对这首诗的评论：“其他任何一句首句都没有真正拥有这么广的知名度。但如果要问，它的意义是什么，俳人说：‘这是秘密，不可言传。’”一位现代欧洲派的学者作出如下的解释：“青蛙跳入了水中，搅乱了久已被遗忘了的水塘的平静水面。听到了骤然的水的拍击声。诗中没有一个直接表示寂静的词，但它还是让人深深感受到春天白日的宁静。我们明白，周围是一片荒凉的寂静，远处是轮子的敲击声和人们的说话声。在这个首句中修辞的一个原则得到了体现，这个原则教导我们，及时的沉默意味着加强人们对所说的话的印象。”很难说这首诗中是否有秘密，它也并非是无法解释的。欧洲派的学者可能相当忠实地传达了这首诗的总的含义，不过仍然没有把它解释透彻。这是既作为俳句和松尾芭蕉的研究专家，又作为欧洲文化的专家的学者们的典型看法。正冈子规遵循他所继承的道路，并同时寻找着通向当代现实的出路。他似乎与松尾芭蕉进行着内心的争论，他认为，“写生”应该把生活理解成它在今天的样子，他把日常情景引入诗歌：

铜币在黑暗中清脆作响。
穷人在数钱。

哎呀，冬天的夜多么地寒冷！
春天的雨四处飞溅，
整条船上上下下：
为雨伞遮盖。

674· 正冈子规就是这样理解“写生”的原则，也是这样在自己的文章中声明这个原则：“如果您认为某个景物或来自人的生活中的现象是有趣的，那就把这一切翻译成词语，以便让读者像您一样感到，这是有趣的。同时不需要使用词语粉饰，不需要夸大什么，您看到的现象和事物实际是什么样的，就应该怎样描绘。”这是蕴含着现实主义的时代趋势。正冈子规使“写生”方法接近了写实主义的方法。向他求教的有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等，他们被归为现实主义流派。在一段时期中，现实主义被理解成对事实的忠实，但这种流行于世纪末的朴素观念很快就被改变了。

在生命的末期，正冈子规急于确立日本人同样喜爱的短歌的新面貌，并在《致和歌作家书》(1898)中呼吁让传统的短歌与生活接近，用新思想取代旧思想，简化并丰富其手段，雅语、俗语、西语、汉语及形象都可采用。文学界中，综合的思想成熟了。他认为诗歌的使命在于找出美，正像以前的诗人们所做的那样，只不过他以现代的方式理解美，不把它理解成秘密的、隐藏的(用阴的风格)，而是外露的、生气勃勃的，或者，用他的话说，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正如坪内逍遥把欧洲散文与“阳”联系起来，而把日本散文与“阴”联系起来那样，正冈子规认为，东方诗歌倾向于“消极”的美和直觉，而西方诗歌倾向于“积极”的美和逻辑，并且两者在未来的统一是有益的。于是，散文和诗歌的改良者们开始主张对艺术的积极的、阳式的态度，主张把他们认为处在被动、消极状态中的东西活跃起来。这就使日本人的思维风格合理化了。

正像日本文学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的，在新文学典范化、形式化的时刻，诗人们追本溯源，求助于以民间素材见长的古老诗选《万叶集》。主张感情的简单和真实的正冈子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指出，短歌中蕴藏着许多尚未被挖掘出来的潜力：

春天女神！
我满怀忧郁地与你惜别，
明年你会再度归来，
鲜花又会开遍大地，
可我却恐怕不能目睹你的风采了。

至于戏剧的革新，或者说新戏剧的建立，发生在二十世纪初。当时坪内逍遥在与浪漫派激烈争论后转入戏剧界，与小山内薰在1906年组织了"文艺协会"。然而以前也曾有过使戏剧现代化的尝试。早在1885年，坪内逍遥就发表了《改良戏剧艺术之我见》一文，文中他提出用莎士比亚的精神使歌舞伎现代化，他本人甚至还以"新歌舞伎"的风格创作了剧本。但观众暂时更喜欢受到公认的歌舞伎剧作家河竹默阿弥（1816—1893）的历史剧和日常生活剧。假名垣鲁文把他的历史剧作戏称为"活历剧"，意思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但这些剧作有别于戏作文学作品的优点是，它们并不取悦读者，而是表现"活历史"中的实实在在的事件。河竹默阿弥的作品包括：《扬善惩恶：子孝赞》（1878），《人间万事金世中》（1879），《岛衛月白浪》（1881）。其实，对戏剧产生影响的，正是对散文产生影响的那些思潮，而且戏剧在其发展中也经历了相同的阶段。"戏剧改良协会"在1886年创办（几乎与"砚友社"同时）。协会成员关心的是与散文家们同样的问题。与作家一样，戏剧家从事的是高尚的、值得尊敬的事业。戏剧改良暂时表现为使歌舞伎现代化并"高尚起来"，这与文学领域，使戏作现代化并高尚起来的运动相一致。

自然，戏剧对"自由民权运动"不能无动于衷。运动失败后，1887年颁布了"维护社会秩序法"，斗争转到了戏剧舞台上。"政治斗士剧团"成立，而在1888年，"大日本政治变革戏剧协会"就已经在大阪进行了演出。这个剧团存在的时间与政治小说存在的时间一样短暂，但新派歌舞伎剧团继续了它的事业，由于福泽谕吉的学生川上音二郎（1864—1911）的热情参与，这个剧团取得了成功。他使剧团成功地上演了戏剧化的政治抨击作品和讽刺剧作，为此遭到了逮捕。但到了1891年，当人们对政治的兴趣趋于冷淡后，一群演员离开了他，宣布自己为"拯救艺术协会"。他们成立了新派剧团，这个剧团成功地维持到了今天。

·675

首先，这个剧团凭借历史和日常生活话剧以及以紧迫的现实问题为题材的剧作扩大了剧目。对情节剧的倾向、家庭故事的特性使它与"砚友社"相近。至少，这个剧团并非偶然地排演了根据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改变的话剧，这出话剧至今还在演出。剧团还上演了近松门左卫门的剧作，以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和《威尼斯商人》。剧团的风格是歌舞伎与欧洲戏剧的某种融合。

对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日本文学，可以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日本作家相当消极地看待这些年的文学。在加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文学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世代积攒下来的东西，但出现了以前所没有的特点：它开始面向具体的人，成为问题文学和批评文学。

当然，无论是方法还是技巧，都是借用不来的。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一个

潜在的积蓄过程。要使日本文学获得自身的形式尚需要时间。不过，在这个过渡时期，日本文学仍然是一个整体，各种现象相互制约。例如，明治初期戏作文学之所以繁荣，是因为这一时期没有任何其他的文学形式，而知识分子的亲欧洲情绪对它进行了否定，改良是不可避免的。

坪内逍遥的评论著作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戏作的垄断地位，否定并同时肯定后者。除了提议改革现有的文学形式之外，改良者没有其他的出路。"砚友社"的出现是对坪内逍遥的改良的回应，否定并同时肯定他的改良。浪漫主义者的许多特点可以解释为，它们既与坪内逍遥对立，又与"砚友社"对立。一个因素是另一个因素不可避免的后果，结果就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但又完整的画面，尽管其个别片段之间存在矛盾。每个现象都可以找到解释和它的位置。不仅如此，倘若把这个时期日本文学中的任何现象与另一个现象分开，或把它与整体隔开，就不能理解这个现象，它们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被认识到。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中的日本文学的特点大概就在于此：没有一个文学现象是完整的，这就造成了它们的彼此依赖及某种混杂性。但这是一个对世界的新认识、对人和社会的新态度逐渐形成、产生的统一而有活力的进程。

第二章 中国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总体上依然充满中世纪思想，继续使用传统体裁和形式。文学依旧在过去中寻找理想，作家在过去中寻找创作典范。模仿和形式主义在理论上得到提倡，在实践上得到大力实施。

正统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造成文学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正统派把高雅文学用作思想工具，影响社会舆论。中国文学仍然在自我再现自我，完全从内部资源出发，自我隔绝于其他国家的文学生活。

当然，文学不可能完全脱离国内所发生的政治事件。许多作家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自强"政策的兴起和破产、中西方接触的扩大、中法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对爱国题材和社会主题的关注促进了进步启蒙倾向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倾向在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潮流中积蓄力量，主要受到早期改革者思想的鼓励支持。

桐城派文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不仅保持了以往的权威地位，而且明显得到巩固，特别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文人曾国藩（1811—1872）承担了中兴这一流派的使命。在中国历史上，他有着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和王朝忠实走狗的恶名。曾国藩以正统儒家思想观点看世界、看社会。他著名的著作《曾国藩家书》可以说是其守旧儒家思想的

绝佳阐释。

曾国藩宣称自己是姚鼐的弟子，公开追随其文学主张，特别是大力宣扬姚鼐关于古文存在“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类型的思想。他以这种理论解释古人的创作，称古文的“神”、“理”、“气”、“味”四性是评价作品的可靠依据。

但是曾国藩不仅仅是重复和继承了自己先师的思想，而且还加以补充，有些方面偏离了桐城派旧习。例如，他清楚不同时代的作品彼此有差异，即便是其作者模仿的是同一范例，也是如此。这促使他产生了与正统桐城派相异的思想，他认为文学不可能只是复制和重复前人，常变是其发展的自然规律。与自己的先师们相左，曾国藩肯定骈文的长处，将其归入高级文体，认为它能够和古诗文一起载道。

与姚鼐以及方苞相比较，曾国藩表现出更为自由的文学观，在选择效法对象时不那么严格。但是事实上曾国藩并没有看到更合理的巩固桐城派威信的途径，只是作了一些小变革，甚至发展了桐城派领袖已经宣扬过了的文学理论，这最终帮助他扩充了桐城派拥护者和追随者的阵营。

曾国藩著述很多，但没有杰作。他最大的成就体现在呈奏皇帝的文告和公文体裁之中。古体散文中他喜爱写“序”和“跋”。在他死后不久就出版了他的诗文集（1874），后来又出版了他的全集（1874—1876）。

曾国藩遵循桐城派传统，利用文学来巩固儒家理想。他宣扬忠君思想（《湘乡昭忠祠记》），鼓吹强者能领导他人，匡正世风，从而定国安邦（《原才》）。

但是文学更经常地成为曾国藩政治观点的传声筒，因此他的古体散文创作具有时事政论的特征。例如，在《讨粤匪檄》（1854）中曾国藩诬蔑攻击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参加者，竭力将其丑化为强盗和传统道德的破坏者。曾国藩一面把太平天国起义者的观点描绘成西方邪教的孽种，同时却又认为在对付起义民众时任何手段都适用，包括与洋人联手。这时的曾国藩已经不考虑外人干政对于他如此信奉的儒家学说以及维护“世风纯正”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桐城派文人一致推崇曾国藩为所谓湘乡派的文学领袖。在他众多的弟子和志同道合者中间突出的有“曾门四弟子”：张裕钊（1823—1894）、黎庶昌（1837—1897）、薛福成（1838—1894）和吴汝纶（1840—1903）。阅读他们的作品，可以发现某些共同特征。首先是思想政治观点的单一性，他们都狂热维护君主制和等级制，忠实于统治王朝。他们四人都属于拥有特权的绅士阶层，仕途生涯中担任过各种行政和外交职务。

曾国藩的弟子们拥护其文学观点，遵循其创作典范。他典型的对“公

文”即时事政论的偏好在其“四弟子”的创作中也占据上风。他们对时代问题的反应相当灵敏，在这一点上保持了对桐城派教条的忠诚。

曾国藩最亲近的弟子们走了一条前人屡试不爽的稳妥的求取文学声誉的道路。但是在某些外界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已经有了一些与正统桐城派的偏离。在克服排外情绪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创作一些姚鼐、韩愈甚至孔子从来没有写过的东西——关于欧洲的著作。薛福成和黎庶昌作为中国外交使团成员出访过英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发表了一些日记，向国人讲述了对欧洲的印象。

677·

如果桐城派文人创作内容和形式都很传统的散记，如薛福成的《贞女马氏传》、张裕钊的《游浪山记》、黎庶昌的《读王弼老子注》等等，当时的人谁也不会感到吃惊。但是如今与之一同出现的是黎庶昌的《卜来敦记》和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这对桐城派忠实信徒来说似乎已经是异乎寻常的了。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现代发展的道路，这也开始吸引了曾门弟子的注意。吴汝纶曾写过以日本为题材的作品（《矢津昌永世界地理序》、《日本改制史序》）。日本人所进行的社会改革、日本与西方文明的合流，促使桐城派文人用另外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

对西方的强烈关注为桐城派文人产生改革思想创造了良好条件。吴汝纶和薛福成开始发表赞同改革传统教育体制的言论。比如，吴汝纶就怀疑学校是否必须死记硬背孔家信条，主张根据“中学为体、西学为辅”原则进行学校教育。

最终出现了最本质的变化。十九世纪末，桐城派文人率先走上与西方精神文明实际接触之路，开始从事翻译活动。桐城派文人严复（1853—1921）与改良派阵营接近后，以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书为发端。1897年严复的译本出版，由吴汝纶作序。对于桐城派信徒来说一切都是新的：议论的对象、完全不合常规的世界观、词汇等等。吴汝纶不得不使用孔夫子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词语：“天演”——“进化”、“天择”——“自然选择”、“物竞”——“生存斗争”。但这不是主要的。吴汝纶不得不承认他那个时代的文学交出了自己的大片阵地：“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

总的来说，桐城派文学对新创作作出了某些让步。但是这完全不意味着它准备交出自己的主要阵地。恰恰相反，它对此竭尽全力地加以维护和巩固。

在诗歌方面，十九世纪中叶，宋诗派最具盛名。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同光体诗人继承了其传统。对他们如此称谓，是因为他们是在同治和光绪当

政期间步入文坛的。这一流派的开创者是福建省的几位诗人陈宝琛(1848—1935)、陈衍(1856—1937)、郑孝胥(1860—1938)。与他们的创作原则多少有些接近的还有陈三立(1852—1937)、袁昶(1846—1900)、沈曾植(1850—1922)。同光派最重要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是以诗论而闻名的陈衍。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年轻的樊增祥(1846—1931)和易顺鼎(1858—1920)崭露头角。他们所代表的流派主要效仿中晚唐诗歌。

效仿汉魏六朝(公元前二世纪至六世纪)诗歌的第三个诗歌流派的领袖是诗人和散文家王闿运(1833—1916),他在政治上十分保守。

与上述流派无派别关系的有著名诗人李慈铭(1830—1896),他也精通骈文。李慈铭兼学众家,宣扬一种折中主义:"不名一家,不专一代"。李慈铭生前作品集《白华绛柎阁诗初集》出版于 1891 年。

十九世纪下半叶,各诗歌流派的区别首先是对不同模仿典范的选择。一些人推崇宋朝(十至十三世纪)诗人,一些人推崇中晚唐(七至九世纪)诗人,还有一些人推崇唐以前诗人。同时,推崇某一时代的诗人并不意味着绝对不接受其他时代的诗歌。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间,词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活跃的是常州词派。其代表人物有谭献(1831—1901)、王鹏运(1848—1904)、朱祖谋(1857—1931)[①]、况周颐(1859—1926)。他们主要以词艺精湛而著称。但是新的气息也不会不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痕迹。除了惯常的爱情和风景词作,在常州词派词人创作中也开始响起社会主题的声音。为常州词派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是《白雨斋词话》的作者、著名词人陈廷焯(1853—1892)。他在作品中确立了词的美学范畴,认为词的本质是"温厚沉郁",即他所说的"意在笔先"的境界。他主张无"温厚沉郁""无以显意之深厚",词作就会肤浅庸俗。陈廷焯主要受儒家思想熏陶,竭力把伦理成分带入美学范畴加以阐释。 · 678

总体来说,古体诗词仍然沿着传统轨道发展。在各种流派和风格诗人的创作中,占最重要位置的是风景诗和诗体游记。自然景色不仅被诗人以绘画造型手法以及最经常使用的观照手法再现出来,而且和哲理主题相呼应。永恒的大自然传达着人生如流水的思想。在陈三立和沈曾植的诗歌中,明显流露出佛家思想主题。但是有的时候,诗人会放弃观照手法甚至其他复杂手法,大胆而富有动感地再现自然景色。

---

① 一名朱孝臧。——译者注

诗人面前通常有两条途径,实践中经常彼此交叉。在依循正统文学中根深蒂固的形式主义的同时,诗人们有意将诗歌语言复杂化,使用冷僻字,使诗歌充满隐秘暗示。这是第一条途径。但是它不妨碍诗人同时运用第二条途径,即使用惯常的固定形象。例如沈曾植曾写过“白浪”、“白雪”、“白云”、“蓝天”、“孤舟”等等。两条途径同样为人们所接受,这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针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博学而富于记忆联想的读者。

人们依然认为对社会的冷漠不关心对诗歌有好处,但是生活不知不觉地将诗人推向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诗歌中就已经出现的新趋势进一步发展。公民主题和爱国主题甚至出现在那些偏好远离尖锐社会问题的诗人的作品中(易顺鼎、樊增祥、李慈铭、陈衍)。

当诗人们在描写与侵略中国的外国强敌的抗争的作品中持爱国立场时,他们无疑表现出进步倾向。但是总体上,他们通常持有文人官僚特权阶层典型具有的保守政治观点,这表现在他们对民众起义所持的公开敌视的态度上。

金和(1818—1885)的创作可以说是多种倾向共存的例证。在他的诗歌中包含有爱国主题。金和强烈反对外国侵略,沉重感受到民族尊严被践踏所带来的痛苦,他号召中国人起来抵御外敌(《围城纪事六咏》)。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积极反对太平天国运动,他带着仇恨和愤怒对其进行描写(组诗《痛定篇十三日》)。但是金和在仇视和贬低太平天国的同时,对官兵也无好感。他看到官府军队的软弱和弊病,嘲笑其将领的胆小和无能(《初五日纪事》),揭露士兵们趁火打劫和胡作非为。发出这样的批评是因为作者在为统治王朝的命运担忧,其忠实奴才们辜负了对他们的期望,只会污损儒家的仁义道德。

爱国主题最常见于描写中外战争的诗作之中。这些诗作大多数具有反帝色彩。诗人方玉润(1811—1883)、龚易图(1830—1888)、李光汉的作品回应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王闿运和李慈铭的一些长诗痛陈英法联军对北京城郊的圆明园的掠夺破坏,这些诗作广为人知。

许多爱国诗作都与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相关。许多诗人用不少激昂慷慨的诗句描写1895年的台湾起义。清政府同意把台湾割让日679· 本统治,这被具有爱国情绪的诗人们看作是极其严重的卖国行为和民族耻辱,而台湾爆发的爱国起义得到热烈的支持和同情。台湾起义领导者之一的丘逢甲(1864—1912)写过许多诗作描写这些激烈的战事。台湾主题也吸引了其他诗人的注意力。这些诗包括刘光汉的《台湾行》、陈季同总题为《吊台湾》的四首律诗、张秉铨的《哀台湾》。

在描写战争的诗人中,陈玉树(1853—1906)非常突出。他描写中法战

争的诗歌有《癸未冬有感》和《乙酉春杂感》，描写甲午战争的有两组大篇幅的组诗《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和《乙未夏拟李义山重有感》。这一时期还有他的《哀时事》。陈玉树的诗句慷慨激昂，但批判情绪明显占上风。他谴责了清朝陆海军将领的失败主义情绪。

与爱国主义主题同为新气象的特征的还有外国主题。郑孝胥在担任驻日外交官员期间，写了大量旅日观感的作品（《九日大阪登高》、《有马》、《自住吉游有马入山杂诗》等）。1889 年，傅云龙两部引人注目的诗集出版，记述对古巴和秘鲁的观感。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诗歌最光辉的成就是黄遵宪（1848—1905）的创作，他复活并大大发展了龚自珍的启蒙传统。黄遵宪的诗歌很大程度受到其驻外外交生涯的影响。他曾在日本待过五年。黄遵宪出色地描绘了日本风光、日本的节庆和风俗、日本历史传说中的人物。同样引人注意的是他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生活所发生的变化的描写。他觉得中国也可以接受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之路。日本给他的印象反映在他的《樱花歌》、《游箱根》、《都踊歌》、《不忍湖夜游记》等作品，以及单行本的《日本杂事诗》（1880）中。

在任驻旧金山领事一职时，黄遵宪与中国在美侨民有了紧密接触。在《逐客篇》中他描绘了华工穷困生活的情景。黄遵宪痛切感受到美国人对华人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的践踏。他对种族歧视表示愤慨。美国总统选举给黄遵宪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以"纪事"为题写下一组组诗。诗人不仅看到了美国式民主的表面，而且也看清了其内里——民主党和共和党"愤争传国玺"的选举大战，他们为了自己的候选人取胜而不惜去贿赂、欺骗甚至谋杀。

黄遵宪的诗歌还反映了他的英国之行（《温则宫朝会》、《伦敦大雾行》），以及游历新加坡、由英国经法国和埃及回国之行。国外的许多东西使黄遵宪感到惊讶和激动。他天真地欣赏海外"奇迹"——轮船、摄影艺术、埃菲尔铁塔，思考中国在过去以及现代世界中的位置（《锡兰岛卧佛》、《杂感》）。

在其创作道路的所有阶段，黄遵宪都十分关注中国所发生的政治事件。难怪他的诗歌遗产经常被称为"诗史"。他憎恶正统诗人对政治主题的公开的漠不关心。在反映 1894—1895 年中日战争的一组诗作中，最鲜明地表现出黄遵宪的公民激情和爱国激情（《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降将军歌》、《马关纪事》）。组诗的基本主题是对中国的军事失败的悲痛。与帝国正规军队的失败和无能相对立，黄遵宪在《台湾行》中颂扬了普通民众奋起捍卫宝岛的英勇顽强精神。

黄遵宪的诗歌总是迫近时事。这使他与同时期许多诗人有所区别。他奠定了中国文学进步新倾向的基础。他的诗歌在强力掌握新题材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赘语，特别是描写过度。如果只看到黄遵宪诗歌出色的一面而不注意其不足的一面，可能也是错误的。他无疑是一位爱国者，想看到中国强大独立，但有的时候，他的爱国主义带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

680·

黄遵宪也在诗歌语言和诗歌形式民主化方面向前实际跨出了一步。他倾向于所谓的对诗节行数、押韵规则、声调变化要求不太苛刻的古体诗。诗人成功模仿了南方民歌形式，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他的著名组诗《山歌》和《军歌》中。和其他许多诗人一样，他广泛运用了他所掌握的传统诗歌的词汇和形象（心理联想、惯用饰语、隐喻）等各种手段。但是同时，他大胆引进了现代口语词汇，使自己与尊古派教条者区分开来。黄遵宪使诗歌语言民主化的另一个大胆方法是使用新词，如自由、平等、总统、共和、甲必丹、氢气球以及外国一些人名（拿破仑、华盛顿、哥伦布）和地名（美利坚、巴黎、格兰脱）。

诗人生前出版过两部篇幅不大的诗集，在他死后才出版了著名的诗集《人境庐诗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黄遵宪卷入改良运动，与其并肩战斗、立场更极端的有诗人兼哲学家谭嗣同（1865—1898），他曾写过著名的《仁学》（1898）。无论在诗歌风格手法还是诗歌题材上，谭嗣同都有别于黄遵宪。他更为传统一些，但是同样代表着中国诗歌的进步潮流。

在西方影响对中国生活的缓慢而艰难，但又不可逆转的渗透的背景下，特别响亮而又使许多人坚信无疑的是对保持"民族精神纯洁"的号召。当然，无论这种号召如何诱人，人们都不能不在时代精神上作出让步，进而提出在保留固有儒家学说的基础上革新社会的思想。

这一思想在冯桂芬（1809—1874）的政论文，特别是在他广为人知的《校邠庐抗议》（1861）一书中，在后来留下《弢园文录外编》的作家和杂志出版家王韬（1828—1897）的文章和短评中，在郑观应（1842—1922）的《盛世危言》（1893）一书中，皆得到具体阐释。这些作者表达了早期改良派的思想。他们所关注的首先是如何利用西方文明成就使中国强大富强的问题。引进西方技术、改革传统科举制度、在学校教育中推进现代精确科学、变革军队训练和船舶制造，所有这些在他们看来似乎可以带来中国社会的复兴。同时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怀疑过中国现存秩序，无论是君主制度还是封建道德。在他们的意识中，进步的改革思想和政治上的保守相互并存。

太平天国的思想家对社会和文学问题的解决有所不同。从西方引进的基督教思想，和太平天国起义者思想中农民对均贫富、等贵贱基础上的天国正义的胜利信念融合在一起。在洪秀全（1814—1864）以及其他一些领

袖的诗歌尝试中，新内容体现为对基督教精神的平等、博爱和正义的宣传。这一点在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中非常明显。更重要的是新潮流触及了他们对文学使命的认识。在否定形式主义和奢靡文风——“舞文弄墨”的同时，他们认为文学的使命不在于释道，而在于“纪实”，即反映现实。这些思想在1861年颁布的、由太平天国思想家洪仁玕(1822—1864)及其战友签署的《戒浮文巧言谕》中得到阐释。

十九世纪下半叶，对新时代的气息最不敏感的是叙事散文(小说)。无论其体裁组成、世界观理想、描写人物的手法，还是情节结构原则，都无本质变化。叙事散文的主要形式是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作品汲取的营养来自民间文学化的中国历史和民间混合宗教信仰。采用历史人物和事件可以营造出中国一贯肯定的忠实性效果，而从民间宗教移入的幻想成分则加强了作品的趣味性。

叙事散文在当时的文学体系中处于外围，与诗歌和古体散文不同，它通常面向当时现实。其中描写的善与恶的冲突是用传统儒家精神来解释的。在其间可以感受到衰败的倾向：小说中派生的、僵化的东西多于艺术创新。这一点也完全表现在少数最重要的作品中。在十九世纪末出现的新的独创作品，远远少于对已经家喻户晓的作品的各种续作和模仿、改作。 ·681

这一时期成就最大的是侠义或者冒险小说，这类体裁中最有名、最典型的是《三侠五义》(1879)，该书作者通常署说书人石玉昆(1810?—1870?)之名。他加工改造了广为流传的民间和文学故事情节，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口头说书底本，后来他加工的文本被记录下来。小说中有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成分。石玉昆运用了民间说书形式，大部分人物具有道义和传奇英雄通常所具有的特点。

小说故事发生在宋仁宗时期(十一世纪)。小说的核心冲突是正义和非正义的斗争。人物角色都服从于解释这一冲突的目的，这些人物性格通常是单一的，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清正廉明”的包公，他因为这一优点以及其他优点而仕途发达——由县令逐渐升为内阁重臣，受到皇帝格外垂青。包公在小说中是民间传统理想化的“清官”典型，乐于而且善于除暴安良，不管对方地位高低。在小说中还有其他一些正面人物，与包公一起维护正义，如公孙策、颜查散、邵邦杰。

与这些对正义(和皇权!)忠心赤诚的仆从相对立的是一些自私、淫乱、胡作非为的人物。这些反面人物中首先包括一些掌握重权的大臣：宫廷总管郭槐和太师庞吉、庞太师的儿子——淫荡的、盗窃官物的庞昱，还有一些强盗的庇护者、采花大盗和恶徒马刚和马强。

第三类人物是绿林好汉。这类英雄讲义气，勇敢，机智灵活，乐于帮助

同伴或者恶行的受害者。由于各种情况，这些侠盗放弃了自由自在的生活，成为包公操劳除恶的帮手。许多侠客因其贡献而受到皇帝赏赐。

石玉昆运用传统手段描写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对于他来说，再现类型比揭示个性更重要。造型手段非常稀少，性格刻画也非常公式化。甚至在首次向读者介绍"五义"时，石玉昆更注意的是交代五英雄的出身和解释他们的绰号，而不是描写其外貌和性格的个性特征。

石玉昆的小说出现不久后，引起了著名文学家俞樾（1821—1906）的注意。他重写了第一回，作了某些文字订正，更名为《七侠五义》（1889）。随后出现了二十四个续本。其中最有名的有《小五义》（1890）和《续小五义》（1891）。这些续本中描写的后辈侠义之士，在各方面都与前辈相仿，也是四处冒险，行侠仗义。

与侠义小说相近的是公案小说。十九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公案小说是《彭公案》（1891），作者署名为贪梦道人。小说中描写了英明睿智的外省官吏彭鹏，他与十九世纪初的《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世纶相似。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英雄，享有"清官"美誉，忠心维护皇帝统治。平定骚乱是彭鹏的首要任务。在镇压一些强盗的同时，他乐于使用另外一些由于各种原因依附官府的强盗为其效劳。作者竭力美化这类英雄，赞扬其"功绩"。继《彭公案》后出现了二十个续本，但是效忠朝廷的精神全都占据主导地位，没有改变。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特别流行。《施公案》出了十多个续本。通行的还有据说是张广瑞[①]录哈辅源说本的《永庆升平》（1892）以及续本（1894）、《圣朝鼎盛万年青》（1893—1896）、唐芸洲的《七剑十三侠》。

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在内容上通常服从一个统一公式。根据这个公式，人物分布在三个等级上。最高一级是英明宽厚的圣上。他总是不受批评，总是自己臣下的最高和永恒正义的主宰。君主的圣明与仁德程度决定了其拥有什么样的臣属。

低一级的是官吏——京官和地方官、清官和贪官、好官和恶官。清官总是忠君的，维护正义（儒家精神）。再低一级的是绿林好汉。他们中一部分忠诚于皇权和自己的庇护者——那些清官，另一些则胡作非为，制造混乱，不与合法政权同流。通常，好官与醒悟了的并且为之效劳的好强盗共同反对坏强盗和恶官。对抗的结局事先已经预定：正义获得胜利，而邪恶被彻

---

① 应为郭广瑞，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译注

底根除。

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故事最常发生在政权相对稳定的帝王统治时期。吸引小说作者的首先是被官方儒教传统认为是中国社会通向和谐目标的历史时期，保证通向这一目标的是帝王的英明、官员的清廉和内心拥有为皇权服务的愿望的绿林好汉们给予的支持。

言情小说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叙事散文中占据明显突出的位置。这一体裁作品有仿曹雪芹的续作《红楼梦影》(1877)，还有一些才子佳人之作，但是占主要地位的是狭邪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青楼梦》(1878)。俞达(？—1884)的这部小说结构布局十分完整。小说主人公金挹香出身富贵之家。他常和朋友相伴，是青楼(妓院)常客。在一家青楼中，金挹香结识了三十六个美女，后来这三十六个美女被解说成玉帝从仙班谪贬到人间的仙女。她们全都眷爱金挹香，金挹香也把其中五人纳入府中。其中一个名为爱卿的成为他的妻子，其余的成为姬妾。家中幸福祥和。金挹香科举成名当上县令。主人公的善良高尚没有失落，作为奖赏，他老迈的双亲升入长生不死之国。在经历世事更迭后，金挹香本人以及三十六伎也都一同升天。小说的结尾场面是有情人幸福相会在云霄之间。小说的基本主题是最高幸福——永生是对人的善行的奖赏。在描写青楼时，俞达丝毫没有写出任何有失体面的不良语句。妓女和狭客都举止优雅，行为不逾规矩。

在十九世纪末，模仿也在爱情小说中流行，如邹弢的《海上尘天影》(1894)和西泠野樵的《绘芳录》(1894)、匿名写作于四十年代的《红闺春梦》(出版于1884年)等等关于妓女的小说。

在九十年代爱情小说中占有特殊位置的是作家和杂志出版家韩邦庆(1856—1894)的《海上花列传》。小说起初在他所办的杂志上分章节出版，后来成书若干卷(1892—1894)。小说中心是赵朴斋的故事，他是一个规矩人家出来的青年，来到上海想要创一番基业，成为家庭顶梁柱。结果他陷入淫邪，沦落底层。他的妹妹二宝携母亲来到上海，了解到其兄日夜驻留在妓院中。她对卖春女子极为愤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因境况所迫，二宝也落入风尘，明白了将不幸妇女推向娼妓之路的社会原因。 · 683

韩邦庆用他的小说继承了美化娼妓的传统倾向。但是与俞达的区别在于，他更加接近对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的认识，并且在小说中有所反映。韩邦庆与其文学前辈相比，无疑在体裁上向前迈了一步。他更为懂得散文刻画“人的性格的矛盾性”及其发展的使命和可能性。作者力求深入人物心灵，解释其行为动机，不仅考虑到外部环境(尽管这占主要位置)，而且有时还顾及人物内心的、精神的变化，性格的发展。

在韩邦庆看来，小说形式难就难在要求作者必须要做到“人物多样化”。

他在克服这一困难的过程中还不是十分统一连贯，但是总归还是努力寻找出、描绘出社会类型的共同特征，以及使人物彼此不同的个性特征。

最后还要提到一点，即韩邦庆从想要使文学和生活相接近的愿望出发，在中国长篇小说中首次对人物语言问题作出特殊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所有对话都采用了苏州方言。这一语言实验使小说具有地方特色。

十九世纪下半叶，其他长篇小说体裁都在衰落。对怪事奇谈和占卜问卦的兴趣产生出一些幻想性小说，如魏文中的《绣云阁》(1869)、匿名作者的《升仙记》(1881)以及张南庄的讽刺幻想譬喻小说《何典》(1878)。作家把故事放入神鬼世界，读者在其中可以辨认出其周围的现实社会秩序，四处是贪官酷吏，鱼肉百姓、为富不仁。

小说中的幻想也影响到情节的展开，因为主人公经常只有借助神奇力量，才能摆脱凡人无法摆脱的困境。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不太关心情节的合理程度。幻想没有体裁界限。石玉昆在侠义小说中广泛利用过幻想。幻想在俞达的爱情小说中的作用更为重要，这是使十九世纪下半叶小说与中世纪文学相接近的一个共同特点，再一次证明中国文学发展特有的滞后性。

对神奇幻想的热衷也波及短篇叙事散文作品的创作。短篇志怪小说十分流行。小说家们用文言进行写作，公开模仿蒲松龄、袁枚或者纪昀。这一时期出版了几部这类模仿小说的集子，如宣鼎的《夜雨秋灯录》(1855)、邹弢的《浇愁集》(1877)、李小奇的《思踪录》(1880)、王寅的《今古奇闻》(1887)、王韬的《淞滨琐话》(1887)。在这些魔幻小说中，替代蒲松龄笔下经常出现的狐仙充当诱惑者的通常是娼妓。

中国戏剧相较于叙事散文在更大程度上追循着中世纪传统。古典杂剧和传奇处于衰落时期。这一时期的戏剧偏向于从以往的文学中借用故事情节，墨守成规，只对固定形式的组成成分加以变化。在十九世纪中叶，戏剧界最突出的人物是杨恩寿(1834—1891)，他还是个诗人，写过戏剧理论文章。他的戏剧作品收入作品集《坦园六种曲》。作品集中的第一部作品是《姽婳封》(1870)，情节取自《红楼梦》的一章[①]。主要内容是恒王和林四娘的故事，林四娘被恒王授予“姽婳将军”这一不同寻常的称号。

杨恩寿的优秀剧作《再来人》描写一个福建书生陈仲英，他多次科举考试未能中第，贫困潦倒终生。不过再次投生后，他十七岁入京考中状元，进入翰林院。剧作《桂枝香》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品是杨恩寿根据陈森的长

① 据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一卷583页所记，该剧写于1860年，而且并非取材于《红楼梦》，而是流传很广的传说故事。——译注

篇小说《品花宝鉴》的情节而创作的，也就是说他把目光投向了十九世纪初的文学作品，这在当时的整体背景下是个创新（同是杨恩寿，他对《红楼梦》的改编则被看作是恪守传统的创作）。

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突出的戏剧家有陈烺（1814—1886）[①]，他以《玉狮堂四种曲》（1885）而闻名于世。他最著名的剧作是《燕子楼》。作品讲述了唐人张建封的爱妾关惜惜的悲惨故事。张建封死后关惜惜住进废弃的燕子楼中写诗吟咏。这些诗落到白居易手中，给其留下很深印象。他写诗给关惜惜责怪其不追随爱人去死。关惜惜沉重地感受到诗人对她的责难，觉得人们不会理解她的苦难，最后绝食而死。 • 684

与陈烺同时代的还有戏剧家许善长（1823—1889?）。他在1870—1885年间发表了六部剧作。当时正逢人们对蒲松龄的故事再度大感兴趣，许善长也投身于潮流中。他根据蒲松龄的小说情节创作了《胭脂狱》和《粉蝶》[②]。许善长有关戏剧和戏剧演出的论述收在杂记《碧声吟馆谈尘》之中。

十九世纪下半叶京剧演出剧目仍然充斥着历史和幻想内容的作品，其情节主要取自中世纪长篇巨作《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剧本通常由演员本人撰写。这一时期已经有人着手尝试出版京剧剧本。戏剧家余治（1809—1874）编集了剧本集《庶几堂今乐》（1880）。同时还出版了李世忠编集的《梨园集成》（1880）。

纵观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各个种类、体裁和流派，可以发现其中同时存在着两个倾向。一种倾向是向后看，表现为对中世纪文学传统和保守的儒家思想的遵循。这一倾向在整个十九世纪都占据主导地位。另一倾向脱胎于时代要求，表现为文学对中国所经历的各种事件作出反应，流露出一些启蒙思想观点，首先是变革和革新思想。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这一倾向占据上风，带来整个中国文学风貌的根本改变。

第三章　朝鲜文学

朝鲜封建社会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危机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更为加剧。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民众运动在1811—1812年起义失败后沉寂了一

① 关于陈烺的生卒年诸家说法不一，分别有1822—1894、1822—1903、1817—1898等等，参见《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一卷第550页注。下文中提到的作品集应为《玉狮堂十种曲》，而《燕子楼》的女主人公应为关盼盼。——译注

② 根据《聊斋》故事中的《粉蝶》改编的戏剧应为《神山引》。——译注

段时间后又重新积极起来。朝鲜社会越来越广泛地对政府和地方官吏的行为表示不满，特别是在农民中间。1862年，在二十多个县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最著名的一场起义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作“晋州风暴”。

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朝鲜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是开化运动的萌芽，这是实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改革者渴望能有实际行动，准备为自己的理想积极奋斗，希冀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既定的纲领。如果说实学是纯粹的思想潮流，那么开化运动则逐渐转变为政治运动。

社会冲突的加剧和反动封建势力的攻击，当然阻碍了朝鲜文化的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有足够影响力的进步运动(实学运动、开化运动)，这就使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不仅有可能继承以往的文化成就，而且能够为民族文化宝库作出重要贡献。

在构成真正民族财富的传统中，最重要的是实学运动思想，以及从日本的经验中汲取的明治维新思想和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思想。

总体来说，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朝鲜文学可以被看作旧文学的总结，是旧文学的最后发展阶段，在此之后开始了新的文学。在思想艺术方面，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前一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中世纪时期文学的主题、思想和表现方法在这时依然广泛应用。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符合传统儒家学说的理想人物，冲突和冲突的解决也是传统的。与此同时，前一时期的文学出现的某种质的改变有所加强，出现了一些现实主义描写的最初特征。

685 ·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文学名家相当少。当时广泛流行的是匿名创作，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反动封建势力猖獗而造成的。诗歌、小说以手写方式在民间流传，在城乡普通劳动者中间拥有特别积极的读者。最受欢迎的是那些讲述劳动群众悲惨命运、讲述其生计和操劳的作品。

在诗歌方面，替代三行诗体裁(时调)的是长时调和杂说(这一进程肇始于十八世纪)。例如申在孝(1812—1884)的爱情诗。但是这些诗歌体裁逐渐失去往昔的意义，重复着旧的主题(朴孝宽和安玟英编纂的诗集《南薰太平歌》、《歌曲源流》)。

散文的主要体裁是故事体小说。有一些新的创作问世，也有一些往往经过现代加工的旧作(如《春香传》、《兴夫传》)。这一时期特别流行的是匿名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青丘之小说》、《浪行记》，这些作品以传统手法描写了来自民间的一些趣闻乐事，嘲笑了许多人性恶习，如残忍、贪婪、虚伪等等。

但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小说创作中也渐渐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简单地模仿、直线地描写人的行为和事件已经无法满足文学需求。文学开始追求把人表现得更为现实，把人的行为表现为受周围环境所决定。

表面上看，金在国和朴天植[1]的作品与中世纪古典小说经典没有丝毫差别。这些作家的优点主要不在于宣扬某些新的思想，而在于完善表现这些思想的手段，在于追求更忠实地描绘现实，描写人物内心世界、人物心理（朴天植的《感恩割去恩人鼻子》、金在国的《全跟或者俗家卡》、《媒人争斗记》）。这些作家的作品或是仅有一个场景的极短篇作品（金在国的《乞讨》、《草帽换酒》，朴天植的《猎人》），或是接近中篇小说的多场景作品（金在国的《李金家族记事》）。

金在国和朴天植的大部分小说与以行骗性为主的民间小说相类似。但是这些作者的小说中的行骗通常不是为了谋求私利，而是对抗不公正，克服人性恶习。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在完善传统描写手段的同时，特别关注对人物活动的动机进行挖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朝鲜出现了心理小说的萌芽。

这一时期也是唱曲——这一靠演员（歌唱、演奏乐器、杂技）的歌曲自叙的抒情诗体裁的繁荣时期。十七至十八世纪就已成熟的表演技巧被许多优秀演员所继承。

在这一时期，唱曲渗透到戏剧舞台。唱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申在孝的改革活动，对唱曲的进一步发展和使其转变为真正的舞台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他研究和概括了前人的经验，制定了改组唱曲表演的纲领，记录和修订了最为流行的演出脚本，如《春香歌》、《沈清歌》、《兴夫歌》、《黄鸡歌》等等。申在孝率先在若干个男女演员中进行角色划分，培养了一批有艺术才华的演员。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改革运动的作用下，朝鲜文学出现了许多明显的推进。文学渐渐排斥合乎儒教教条的理想人物。文学开始注意具有世俗想法、弱点和挫折经历的普通人。中世纪晚期的朝鲜文学的这些新特点，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新潮文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686

第四章 蒙古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蒙古文学的发展，处于延续下来的清王朝统治和国家封建割据环境下。在这一时期，蒙古局势多次因爆发起义而趋尖锐化，而殖民化的强化也激活了民族的自我社会和精神意识。这一局势对文学发展产生独特影响。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潮流倾向。固有的中世纪文学的

[1] 这两位作家的姓名为音译。——译注

内容和性质发生改变。文明人把注意力投向蒙古人民的历史，投向《蒙古秘史》（十三世纪）中所记录的光辉的过去。

旺钦巴拉（1794—1847）的创作就取材于这部古代历史文献和艺术杰作。他构思并创作了大部头的民族编年史《大元盛世青史演义》，它的简称《青史演义》更广为人知。但是他只完成了构想中的前八章。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经二十年，最终由旺钦巴拉的儿子尹湛纳希（1837—1882）继续完成于 1882 年。

旺钦巴拉家族住在南蒙，家族首领在当地任地方长官。他认真钻研历史与文学。他的子女受到相当良好的家庭传统教育。尹湛纳希是其第七子。他的两个哥哥古拉兰萨（1820—1851）和贡纳楚克（1833—1866）都是诗人。最著名的作品有古拉兰萨创作于父亲率队出征期间的一些反战的诗歌，还有贡纳楚克写下的一些绝句（白居易风格的绝句）以及一些蒙古诗歌散论。不过旺钦巴拉的儿子中给蒙古文学留下最突出成就的还是尹湛纳希。他不知疲倦地研究蒙古、藏族、汉族、满族所有有关元朝时期蒙古人的史料、文学、传说、文献。

《青史演义》中的事件涵括国家七十四年的历史。叙事的中心是成吉思汗及其创立的国家。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蒙古秘史》的影响，也许正是后者激发了该作的构思。作者明显不只局限于表现成吉思汗家族，他最重要的思想首先是推动蒙古人反对清政府奴役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联合分散的蒙古部族。沿着由文学幻想加以丰富的历史线索，作品中描绘出整个蒙古人民的生活画卷。当然，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作为国家首脑、军事统帅的成吉思汗，但是除了真实的英雄人物外，作者还引进了许多虚构人物，许多勇敢的战士，许多充满睿智和善良的人。一些女性形象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有普普通通的姑娘洪古尔珠兰。她女扮男装参军，其骑术和射箭技艺不让须眉。女俘索隆高娃有女性的柔弱，富于抒情性。而在征服者面前，她却坚强不屈。在有些理想化地刻画成吉思汗形象（这对尹湛纳希来说是很自然的）的同时，作者也讲述了军事征伐的残忍恐怖。

在《青史演义》中散文与诗歌相交替。每章的开头和结尾都有诗歌讲述事件概要。诗歌片段经常出现在作者插叙、训诫言辞中，人物的语言也经常使用诗体。作品中还有许多民间赞歌体的赞词和祝词。尽管《青史演义》中不少篇幅是用编年体写成的，但是作者无疑发出了蒙古文学新的声音。这部宏伟巨著所体现出的艺术特点，使得许多研究者把它看成是蒙古历史小说的先声。

尹湛纳希还创作了两部曲作品——描写世俗生活的小说《一层楼》和《泣红亭》。两部作品直接受到了作者所熟悉的中国小说艺术的影响。头

一部是直接对曹雪芹的《红楼梦》加以改编创作而成，而后一部的情节是作者独立创作的。此外，尹湛纳希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小说（《道者的虚伪》、《论石枕》）和许多抒情诗，这些作品都受到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 ·687

十九世纪下半叶，"好汉"歌曲如鄂尔多斯的《强盗吉姆巴》、察哈尔的《财主老爷的守卫》、《艾台桑》、《胡恩胡图塔》非常流行。这些作品反映了蒙古牧民社会反抗情绪的增长，一些人物具有历史原型。特别流行和受到人们喜爱的是有关托罗班迪（真名南札德，1830—1904 年）的歌曲和传说，他长期抢掠汉族商人、蒙古王公和富贵牧主。对话体歌曲（好来宝）从托罗与和他相爱的沙曼尼（或吉戈吉德）的角度来演唱，这些歌曲组成了一个系列，反映了主人公传奇经历的一些片断。依照传统，其中某些歌曲的作者和演唱者就是托罗和沙曼尼。这一时期产生的这类"对话体"的抒情叙事体、歌谣体的歌曲还有一些，如题材与《托罗班迪》相近的《吉安的小儿子》，描写社会风俗的《苏米亚王公》、《旺力姑娘》、《十八岁的纳桑古艾》。

蒙古诗歌中传统的赞歌体裁——赞词和祝词继续得到发展。从事这方面创作的有哈拉哈诗人卢桑登杜巴（另有绰号卢将军，1854—1909 年）、沙戈达（或称扎巴，1846—1926 年），特别是哥力哥巴力桑（1846—1923）。他们创作了大量广为人知的作品，有些与民间和宗教礼仪相关，有些则不相关。这些诗人在诗歌中赞颂了家乡的大自然。

在这一时期，讲话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体裁的作品还接近于民间童话和寓言。作者中突出的有伊史桑布（1847—1906/1907），他的作品有诗歌《论酒害》、《第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赞》，还有教谕作品《戒除好色之道之良言》。根登梅林（1822—1882）的《狗、猫和老鼠的故事》也是用这一体裁写成的譬喻性故事。他用譬喻形式批判当时的社会。他在韵文体叙述中引入了戏剧性强烈的对话体。根登梅林还写有《野驴、乌鸦和狼的故事》、教谕文《明鉴》。 ·688

这一时期蒙古文学继续保持与西藏的联系，藏语文学仍然存在，这与喇嘛教寺院的活动不无关系。某些作品同时存在蒙语本和藏语本。另外，还有一些蒙古语作品是用藏文记录的。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一些喇嘛常常不会写蒙古文字，只能借助藏文来记录蒙古语文本。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这类"藏文"文献数量最多。

蒙古藏语文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注释文学。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宗教文学的世俗化进程，其中引入了许多世俗故事，经常是从民间文学中借用来，并经作者改编而成，有时也有一些是新作。

还有一些从汉语翻译来的文学，大部分是受人之托。翻译成蒙语的有小说、戏剧，这些作品只存在抄本，从未印刷出版。还有一种文学作品的流

传方式便是口头转述。这种说书体裁和音乐说书人的创作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在蒙古南部和东部),他们转述用蒙古史诗风格加工过的汉语叙事文学。

总而言之,蒙古十九世纪下半叶文学进程的主要特征,可以说就在于个性化写作在成长,有署名作者的作品数量在增加,与某些东方文学保持着稳定的联系,继承了生动的民间口头文学传统。

第五章 藏语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在西藏的地位由于清王朝及其管理系统的全面危机而有所削弱。

清政府在十八世纪末牢固确立的对西藏的宗主权依然存在,但是已经既不能积极有效地阻碍西藏人民族意识的增长和巩固,也不能阻碍西藏地方政府在这一方向上迈出的实际步伐。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藏地方政府就已经把原来处于四川省总督制下的东藏诸王公领地置于自己管辖之下。

十九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事件,在藏语文学中没有得到反映,藏语文学受到中世纪文学创作的传统和规范的束缚,屈从于宗教训诫目标和任务。

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前一时期的文学相比较,没有什么明显改变。文学活动依然是宗教头领——首先是格鲁派活动家的事业,格鲁派依旧是西藏地区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的中心。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局限在十九世纪初确立的传统范围之内,这一传统可以看作是一种独特的创作法则。这不能不延缓文学发展的进程。如同以往,文学作品的题材都或多或少地与喇嘛教的各种历史问题、教义问题和信仰问题相关。西藏没有世俗的历史,只有佛教的历史,没有对个人的生平记述,只有对其经过"苦修"达到涅槃的活动的描述。

以木刻刻版方式扩大文学书籍数量的条件有限。这一工作费时费力。因此出版活动依然集中在受宗教势力长期监控的大型的、富裕的寺院之中。这也限定了书面文学所包含的内容。

十九世纪下半叶,安多和位于东北藏、东藏其他一些地区的文学活动依然很活跃。

在西藏中部地区文学生活中起到显著作用的人,也来自这些地区。

这些人用宗教哲学作品继续为各种佛教学说作注释。西藏辩论术的创始人是扎瓦·乔齐僧格(1109—1169),他写作了这一学科最早的一批教科书。他众多的后继者直到十九世纪末一直都在创作精心研究出来的学习教

程。其主要任务是教会僧众在与佛教和喇嘛教的敌对者展开的辩论中获胜，在这之后使怀疑者信服。

在这一时期，来自安多的帕里·拉布萨（死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写作了若干部辩论教程，他还创作了一些宣扬佛教正统学说的大型著作。

西藏许多大宗教活动家都把写作宗教哲学著作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十九世纪下半叶有五世班禅喇嘛（1853—1882）[①]，共图·罗多还（1813—1899），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老师洛桑却吉（死于1901年），普鲁朝格·嘉帕嘉措（1825—1901），贡布寺（安多地区）四十八任主持喜图呼图克图·洛桑却吉嘉措（生于1845年），塔什奥则（1836—1910），安多人格冬丹钦嘉措（1852—1910），生活和写作在康藏的米庞嘉措（1846—1912）和米旺·乔格来·南帕札瓦（1846—1914），龙塔·洛桑·丹丘嘉措（1857—1915），沙克雅·室力（1853—1919）。

和从前一样，这些宗教哲学作品不超出注释前代权威人物的类似作品的范围，首先是宗喀巴（1357—1419）、克主杰（1385—1438）、贾曹杰·达玛仁钦（1364—1432）等格鲁派的创始人和奠基人。这些作品的结构、语言、风格、叙述都是传统的。只有少数创作于蒙古和布里亚特地区、面对最广泛的读者群和听众群的作品，才具有语言简朴生动的特点。

·689

总的来说，十九世纪藏语文学的发展明显滞后，作品数量明显减少，这些作品越来越重复前人类似的作品，逐渐变成繁琐的经院哲学。

① 按照《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记载，这里应该是指八世班禅（1855—1882）。——译注

第十编　非洲文学

本编序言

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在非洲大陆上大肆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军队不断推进，最终，欧洲诸帝国瓜分了非洲大部分领土，只有埃塞俄比亚是个例外：在1896年的阿杜瓦战役中，埃塞俄比亚击溃了意大利军队。非洲各国丧失独立，成为西方资本积累的来源。殖民者毫无节制地开采非洲各国的自然资源，残酷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

殖民统治给非洲人民带来了难以计数的损失，同时，也消除了非洲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客观上为非洲现代化提供了先决条件。而现代化在殖民统治背景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商品货币关系首先在一些迅速发展的殖民城市中产生，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冲击下，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遭到破坏，在非洲各国诞生了新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雇佣工人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成为先进社会思想的先导，随后又领导了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摧毁了殖民制度。

但在十九世纪中叶，除了西非的个别国家，非洲大陆在整体上还没有进入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新阶段，而是完成了前一阶段。穆斯林地区及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处于封建社会阶段，其他地区处于氏族部落和早期封建关系阶段。相应地，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文化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然而，在非洲各国，与十九世纪初相比已发生变化的社会政治现实直接影响了文化发展。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在热带非洲各国仍未观察到像在西苏丹的圣战时期和在东非沿岸反抗阿曼苏丹的蒙巴萨战争时期那样明显的文学创作高潮。但文学传统也没有进入衰落期，在这一时期，用非洲语言（富拉语和豪萨语、斯瓦希里语、阿姆哈拉语）创作的文艺作品继续发展。这些非洲本土语言挑战着书面语的地位。当时的书面语是指热带非洲穆斯林地区的阿拉伯语和埃塞俄比亚的吉兹语，但非洲国家的大部分人并不懂

这些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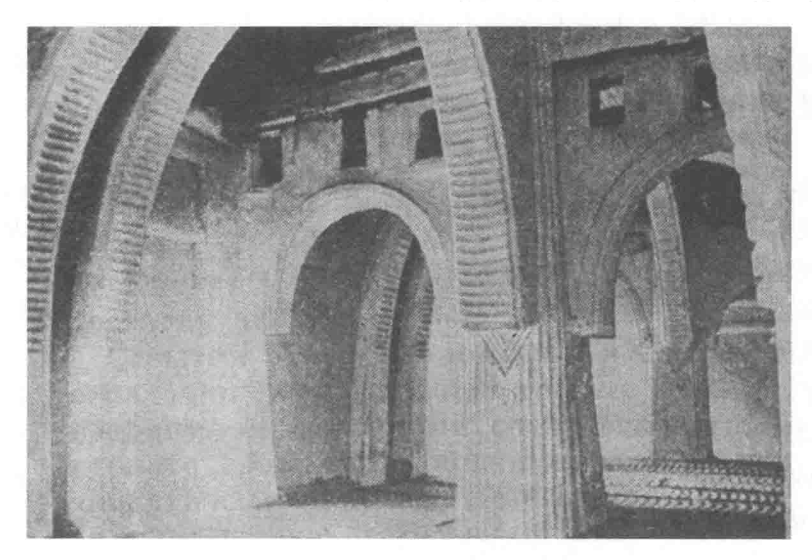
布尔人（十七世纪最早在大陆南端建立殖民地的荷兰移民的后代）的创作是南非文学的一大特点，由于布尔人和后来入侵的英国移民之间的尖锐冲突不断恶化，这些作品充斥着反英情绪。南非的布尔人既把自己与英国外来者区别开来，又认为自己与非洲土著不同，这种封闭性造成了这一时期布尔人作家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狭隘民族主义特征。

691·

第一章 豪萨语文学

索科托哈里发是一个封建神权统治大国，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豪萨语文学的发展中心。索科托哈里发的统治阶级大部分是富拉尼贵族，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统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十九世纪初，乌斯曼·丹·福迪奥发动“圣战”，建立国家，是国家宗教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统治精英与豪萨语中称为“马拉姆”的精英学者联系紧密，这些精英学者代表的是穆斯林神学家和传道者、《古兰经》讲经者阶层。富拉尼贵族将自己跟豪萨世界对立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个“伪”穆斯林世界（富拉尼人专门将他们命名为“哈别”，意思是“奴隶”、“异教徒”），但他们却与豪萨文化紧密相连。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他们遵循着许多豪萨文化中固有的行为模式，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豪萨语（逐渐代替了富拉语），这个过程在不断加深。

所有组成哈里发的酋长国（与传统的豪萨城邦的领土部分重合）都是独



扎里亚城中的清真寺 建于1862年

立的。富拉尼上层和占人口多数的豪萨农民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十九世纪末，形势因国外的事件——非洲的新老敌人的行动和欧洲殖民军队的胜利而变得复杂。在这个时期，在哈里发和整个穆斯林苏丹，与索科托官方敌对的马赫迪教派的势力壮大了。

国家的宗教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两种文化潮流的相互作用所决定，一个是发端于泛穆斯林阿拉伯中世纪渊源的传统，另一个是在非洲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民族传统，这种传统首先是指豪萨传统（随后的概念“豪萨的”、“豪萨人”代指整个社会，不带有民族属性）。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有着穆斯林渊源的豪萨社会的上层文化是完全世界主义的。民族特点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伊斯兰教的色彩。与阿拉伯穆斯林传统作品一样，上层文化中的民族基质以一种更纯粹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以旧的、圣战前的传统为基础，延续酋长时期的编年史的编纂。于是，自然而然地，民族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在穆斯林的价值观范畴中被重新认识了，或者被排挤到大众文化领域。而正是处在民族传统轨道中的作品被认为是一种“世俗”领域，成为一种非宗教的世俗题材（在这一时期的豪萨语高级文学中非常有限）的渠道。同样的，大众文化在总体上保持了豪萨文化在伊斯兰教之外的观念（相应的多神教礼仪），也接受了穆斯林的象征系统，举行穆斯林圣人的祭祀，掌握穆斯林的宗教仪式。

泛穆斯林因素和民族因素互相作用的加强，是这一时期豪萨文学创作的显著特征。在书面文学中，这个特征体现为民族传统的显著性有所增加。同时，这也提升了豪萨语作品的地位。上层文学的基本语言仍然是阿拉伯语，但豪萨语作品——首先是诗歌，实际上是作为圣战时期与大众交流的工具而诞生的——如今已成为惯用的和更广泛的创作领域，有时扮演着特殊的“出风口”的角色，伴随着更严肃的阿拉伯高级文学。这一时期，翻译作品（译自阿拉伯语和富拉语）增多，是豪萨传统编年史的重要部分。这一过程也触及了殖民地的学术界所谓的豪萨分支，尤其是在西非的一些城市（在黄金海岸，在多哥）。

上述的相互作用在豪萨口头创作中也有增强。这种口头文学不能仅仅归为大众文化，也不能完全归为民间创作。其中，与个人创作发展和作家自我觉醒相关的体裁占据着重要地位。 • 692

当时，口头文学中偏向学术传统的因素得到加强（比如，在朝圣的宗教人士的作品中）。但也有不直接与学术传统相关的口头创作带有穆斯林宗教意象，使用了相关的情节。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豪萨语文学创作的类型更接近中世纪文学，不仅是文学的构成，还有作品中包含了实用性、宗教哲学性、科学性、说教性、艺

术性的混合主义也很接近。这些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指向原型和权威，并形成了自己的规范。中世纪的观念也造就了豪萨语文学内容方面的特点。

一系列体裁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由作者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决定。豪萨语散文几乎都是历史题材作品，当时在豪萨语文学意识中没有艺术虚构的思想(除了童话)，“存在过的”才有意义。

传统的宫廷编年史保留了世俗特点。在这个体裁的作品中被研究得最多的是城邦的编年史，它们也可以被称为王朝史。城邦编年史的结构非常鲜明，有相对独立、明显的开头，通常将城邦的历史与泛豪萨的起源联系起来，充满神话诗歌的形象(通常以与豪萨王朝开创者巴雅乍得相关的神话为依据)，在结构上，把对现实的描写与对历史的描写统一起来。这些作品的中心诉求是：将充满事件和意义的历史具体呈现出来，展现从“历史开端”开始，在时代和政权的更替过程中，历史联系和对世界的构建从未间断，历史的源远流长和当代的延伸性是统一的。

显然，成文的编年史在很大程度上以宫廷口头历史传统为依据。口头历史传说也在平民之间流传，是国家历史的详尽的情节性的“片段”。这些传说中的基本冲突是城邦间的战争和封建内讧，情节是描写统治者和重臣们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们人生的几个瞬间：出生、伟大未来的预兆、死亡——“拉巴丽”体裁的口头散文作品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在地方分类中，“拉巴丽”作为民间体裁，具有真实性，与童话(“塔特苏尼阿”)有所不同。显然，这个体裁代表了当时有足够成果的文学创作方向。在类型上，可以说这些传说是对“后经典”形式的英雄史诗和与之相似的伊斯兰英雄史诗的口头仿效(尽管看上去，豪萨文学实际上并不是传统的叙事作品)。这些作品记叙久远的以及近期的历史事件，时间差距实际上被忽略了。在这里，历史事件首先被认为是具有某些社会意义和伦理内涵的：故事体现的是战士的英勇、附庸国的忠诚和荣誉，但强调命运的意志。

与历史传说一样，“拉巴丽”体裁也涉及了使徒的传奇：他们坚贞的信仰，面对考验的坚强和他们所缔造的奇迹。这些故事的传统冲突是忠于信仰的斯多葛学派的宗教人士和严厉而有强大权力的酋长之间的冲突，表现出穆斯林苦行僧的典型优点。

693 ·

宗教学术性的史料文学使人们对传统的豪萨历史，包括在更广泛的伊斯兰教神圣历史的语境下的历史知识有了新认识。史料文学主要由阿拉伯语论著组成，这些论著按照相应的传统写就，来源于圣战领导人乌斯曼·丹·福迪奥的兄弟阿卜杜拉希和儿子穆哈迈德·别罗的手笔。很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豪萨语版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在这份历史文献的世界观的框架下写成。豪萨诸城的历史在一个与传统编年史完全不同的视角下

呈现出来，被认为是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同时体裁的原则也有所变化，在传统的编年史编纂法中混合了对称的手法。在作品中似乎存在两个开头：一个是泛豪萨的（关于巴雅乍得的传奇），另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开头——苦行僧的伊斯兰教引论，回溯到最初几个哈里发的时代，描写这一时代和第二个历史节点——乌斯曼·丹·福迪奥改革之间相互对应的公正年代和不公正年代的更替，出现了"失败的革命者"这样的人物。所有这些加起来都是前传，是最终建立公正统治的富拉尼帝国的开端。豪萨史诗作品的结构通常与传统的散文编年史相似。

原则上，宗教人士的豪萨语诗歌借鉴了阿拉伯诗歌的体裁体系和诗歌的诗韵。这些诗歌中有歌颂先知穆罕默德和苏菲派创始人以及宗教领袖乌斯曼·丹·福迪奥的颂德文及传记，也有宗教哲学作品（探讨宗教本质的不可分割论）、关于命理学和占星术的长诗、关于穆斯林礼仪规范的韵诗。长诗以手稿的形式传播，并常常被当众朗读。总的来说，这种诗歌体现了穆斯林的宇宙论图景，洋溢着末世论气息。



第一批豪萨语回忆录的作家达鲁古（左）和他的伴侣阿别嘎

布道（"瓦萨"）的体裁受到广泛欢迎。它的基本主题是短暂的世俗生活和一时的福祉及永恒的死后命运。在这里，诗歌从与阿拉伯语诗歌的直接联系中脱离出来的趋势格外明显。《古兰经》的主旨与应用了口头创作的创作手法、具体现实和语言特点的豪萨意象积极地结合起来。

同时，"瓦萨"的讽喻性有所增加，这与穆斯林神秘主义的影响有关（当时，苏菲派的提加尼教派和卡迪里教派同时在索科托扩展）。训诫的热忱和布道的信念形成了作品的基调。人类的本质、死亡的必然在这里与人间和天堂这两个世界的对比联系起来：人间的世界是逐步衰败的，它衰老、空洞、接近末日（"末日审判"的画面频繁出现。"无人能逃脱末日审判，这一

天，是大声呼喊的一天，是千百万人无法自我救赎的一天……"）；而天上的世界是真实的。将人间比作骗子娼妓（诱惑者是老妇人）便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典型手法。作品呼吁人们应为来生而活，因为这样得到的福祉才是"不会被老鼠或蚂蚁啃噬的宝藏"。

布道诗人和历史学家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强调（这在上文中有所体现）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相互矛盾的时间流逝观。他们的观点混合在长诗《巴嘎乌达之歌》中（巴嘎乌达是神话中卡诺城的创立者，巴雅乍得的孙子），这部长诗至今都很流行。豪萨布道诗歌的典范《歌》依照传统，列举了难逃死亡命运的世间伟人，还包含了历史部分（"微型编年史"），记叙了卡诺城的历任统治者，从巴嘎乌达开始直到最近一任。其中每一位都用一个简短的句型记叙，例如："他统治了三十年，却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更多地停留……""他的死期到了……"从"最初"、从起源开始，将每个个体放入历史长河中，这种列举证实了人间历史的易逝性和与之对立的它的永恒性。

694·



达乌拉城中一口著名的井，传说这里曾住着一条蛇，被豪萨鼻祖巴雅乍得打死。

在"瓦萨"体裁的作品中，常以对罪人的揭发为形式来表现政治野心。

宗教人士马曼·科尼在十九世纪中叶写就的长诗，反映了此类作品在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在学界的广泛流行。讽刺自己妻子和所有雌性的世俗讽刺作品展示了作者的学识，使用了豪萨口头诗歌的体裁形式（"扎姆博"），至今仍能引起收藏家们的强烈兴趣。

流浪歌手创作的诗歌是一种口头诗歌，属于民族传统作品。其中特别鲜明地展现了当时对于人们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的观念的一个层面。这种诗歌有三种基本体裁：赞歌（“亚博”）、辱歌（“扎姆博”）和一般在失去爱人时使用的哀歌（“别格”）。这种诗歌具有自己的诗韵，有着形式上的特点，运用了一套标准的主题和形象，使用不同类型的音乐伴奏。在这里广泛借用了旧有的诗歌类型“克拉里”（短小的、由修饰语构成的诗歌，这些修饰语是赋予豪萨社会中的生物的，包括神灵、人、动物和其他一些物体，这是豪萨口头创作的一种基础）：“豪猪皮做的马鞍——一家之主难以落座”。

赞颂歌是最有名的体裁。颂德文（也包括其他体裁的诗歌）的完成是公开的，原则上可以事先指定任何一名社会成员，要求他立即呈交文章。相似的颂德文也可以由宫廷歌手献给大封建主们。

赞颂歌中主题的基本类型包括颂扬（特指颂德的部分）、自夸——作者的自我颂扬（类似赞颂）、对奖赏和鼓励的请求。这种体裁刚好建立在社会分级的绝对性之上。被赞颂的对象，和忠于偶像的诗歌的作者——也就是实际上的作品的第二主角一样，被表现得很“崇高”，其他所有的都是“低下的”。与社会地位的尊与卑、富有（首先被理解为个人的财富和生计）与贫穷、慷慨与吝啬、威望声名与默默无闻的对比一样，高超的职业技能被赋予很大的意义，超越了普通的手艺（“他锻造的标枪，世界上无出其右者”、“理发师们亵渎他，因为他剃头剃得比谁都好，他们看到了他如何扬名”）。职业高手被塑造得如此高端，以至于主人公被赋予超自然的能力，不会受到伤害，拥有神奇之物。这样的高超技艺是可以遗传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英勇”），它使主人公在职业领域享有更高地位，引起了同行的竞争和嫉妒，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给主人公带来了社会对他的积极作用的肯定（“如果不是你，人们就会饿死，荣誉献给粮食之王！”）。

诗人也会将自己写诗的艺术与这种高水准的职业性等同起来。诗人将自己的作品视为独一无二的、超越其他诗人的诗作，正如在“自我颂扬”主题中确认自己的著作权一样，诗人强调自己的职业性优势。在十九世纪有才华的诗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诗人不仅将事业看作保障生存的手段，也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是艺术作品，拥有某种独立的价值和特点。

毫无疑问，流浪歌手的诗歌应用了很多大众的、民间传说的和持续发展的诗歌艺术的主题。

从十九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开始，朝圣的宗教人士的作品开始出现，达古恩塔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在自己的布道诗歌中，他发展了具有学术传统的作家所创作的宗教诗歌中的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流浪歌者作品中的修辞和格律。在达古恩塔的作品中，这两个方面的特点的相互融合达到

了极致，促成了穆斯林价值系统在民族传统中清晰的传达。

这一时期，欧洲人对豪萨文化的研究加强了。在欧洲出现了豪萨书面和口头文学作品的出版物，为豪萨非洲组织了《圣经》文本的翻译，开展了语言研究，奠定了它的拉丁文字基础。传教士肖诺记录的豪萨人达鲁古的小说，十九世纪中叶出现在英国，率先呈现出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自传作品的特点。

与欧洲文化的互相影响的增强，对民族文化价值的关注的提高，成为不久的将来豪萨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第二章 富拉尼文学

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半封建穆斯林国家富拉尼帝国的国际威望继续加强。在西富拉尼诸国中，富塔—托罗（现在的塞内加尔）和富塔—贾隆（现在的几内亚）这两个酋长国依然处于领导地位。富塔—托罗和富塔—贾隆的统治者无休止地发动战争，企图将邻国——其中包括同族人——的领土占为己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西纳（现在的马里）依旧保持着独立，但它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索科托哈里发（北尼日利亚）依然是东部主要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尤拉酋长国（北喀麦隆和现在的尼日利亚边界地区）一直积蓄力量，在这一时期之前已经实现了对很多富拉尼小国家的封建统治，这些小国家与尤拉酋长国建立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一般被称作“阿达马乌阿”。

五十年代在西非洲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名字——哈吉·奥马尔。他是来自图库洛尔（富拉尼混血）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成功地将很多苏丹国家的领土（古代巴姆布克、卡阿尔塔、尼奥罗、通布图、富塔—贾隆的一部分领土等）归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所建立的国家曾是非洲十九世纪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1861 年，在图库洛尔军队的打击下，富拉尼国家马西纳衰落了。哈吉·奥马尔死后（1864），他的儿子和继承者阿赫马杜的国家担负起了西苏丹国家中的领导角色。正是阿赫马杜的国家（马西纳、塞古、库纳利、利普塔科等）后来成为法国军队前进的最大障碍。

五十年代，西非殖民政策强化。在占领最后几个非洲国家的斗争中，欧洲人广泛使用了分散力量的策略。就这样，富塔—托罗分散成了几个不稳固的国家，法国人成功地瓦解了阿卜杜尔·布巴卡尔的力量和根基，正是这位强大的统治者成功领导了与法国军队的战斗。1891 年，阿卜杜尔·布巴卡尔死于征战，富塔—托罗的图库洛尔人的抵抗实际上也随之停止。

阿赫马杜考虑已久的塞古与富塔—托罗重新联合的计划并没有实现，1890年，法国军队侵入塞古。1893年，马西纳国家不复存在。1896年，富塔—贾隆丧失独立。东部富拉尼穆斯林国家与英法的斗争接近尾声，而结局是悲剧性的。1901年，英国人占领了尤拉酋长国。1903年，索科托哈里发保卫者的抵抗被彻底镇压。至此，富拉尼国家和图库洛尔人的独立发展时期告一段落，他们沦为法、英、德、葡殖民帝国的一部分。

富拉尼国家的许多民族文化特征与其他苏丹的穆斯林民族文化相近。

伊斯兰教是加速富拉尼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的强大催化剂，是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将西非不同地区的广大民众引入积极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因之一。在这个政治和文化群体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游牧民族，他们保留着对异教信仰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忠诚。 ·696

得益于所谓的"知识贵族"，也就是学者们，富拉尼人得以接触阿拉伯文学。宗教说教内容的阿拉伯文学（"阿达巴"）尤为流行，一些诗歌段落也广为传诵。此外，富拉尼人对于有关宗教、法律、历史、哲学和天文学的阿拉伯科学文献也有很大兴趣。

文化中心城市对富拉尼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城市是教育中心，造就了知名的学者和诗人。尤其受到尊重的文化中心包括上富塔、科拉德、达连、毛姆别雅等。上富塔的学者和诗人们与"马拉布特"——富塔—托罗、蓬杜、马西纳和南撒赫利国的穆斯林学者和传道士们保持着紧密联系。



喀西达诗《哈吉·奥马尔的一生》手稿第一页的复制品

遗憾的是，能用于研究的富拉语的文学作品范例不多，而关于那些富拉尼的小国家如蓬杜、库纳利、嘎布、利普塔科等地的文学信息很少。我们只知道，在这些地方文学传统也有所发展，但无疑不如在富塔—托罗、索科托、阿达马乌阿或富塔—贾隆等地兴盛。

富拉语文学的很多特点都与中世纪文学相似。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富拉语文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在文盲中传播

伊斯兰教义的需要。初期的富拉尼文学基本上都带有注释和说明性质。

早期富拉尼文学的一系列特点接近民间口头创作。富拉尼诗人的作品是用来传唱和朗读的，具有便于口头传播的特征。诗人称自己为“歌手”，撰写的诗作被命名为“歌”。这些作品的特点源于音乐演奏的传统。

手稿编纂人的工作是艺术性的，他们直接参与了文学过程。诗人创作了作品后，向手稿编纂人口述或者把手稿交给他们让其代为抄写，手稿编纂人常常对作品进行润色和加工。这个形式决定了文学文本的不固定性，使这些作品像民间口头创作一样，可以有很多版本。

诗人这份“职业”通常是子继父业、侄继叔业，像铁匠、织布工等工匠的手艺一样。文学作品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人家族的威望。

697·在封建神权国家时代，富拉尼社会的社会等级复杂，人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对安拉的态度一样，受到以宗教为基础的礼仪的严格约束。礼仪是生活中——包括精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礼仪也是一种艺术。正是在这一时期，所谓的“敬语”被赋予了重要意义。“敬语”的基础是一些彬彬有礼的词汇。“敬语”在文学作品中也很常见。

十九世纪下半叶，所有出现于前一时期的文学体裁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容上，文学依然是宗教性的；体裁上，诗歌依然占有统治性地位。文学由传教士创作，其中最受尊敬的作家同时也行使着宫廷诗人、小说家、官方作家、编年史家、历史学家的使命。

“贝托哲”（宗教歌曲）在诗歌作品中依然占有主导地位，其中又分为“瓦朱哲”（劝告、训诫）和弥撒曲。弥撒曲又分为“乍默列”（安拉和穆罕默德的颂歌）和丧葬哀歌：“哲托列”（墓志铭）和“瓦诺尔杰”（字面意思是离歌，比“乍默列”更抒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富拉尼诗人作品的韵律借用了阿拉伯诗歌的韵律，但它完全符合富拉语的语音特点。富拉尼诗歌是重音音节诗，诗韵以长短音节之间、并不固定的词语重音之间的复杂交替为基础。与传统阿拉伯诗歌相同，富拉尼诗歌由两个形式相同的半行诗构成，在句法和词法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原则上以全诗一致的韵脚结尾。

杰尔诺·阿里友·布巴·吉亚姆（1845—1927）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富拉尼文学中最杰出的诗人，是“伟大导师”一代在富塔—贾隆的代表。他因写作了一大批宗教和法律方面的学术文章而闻名。他用阿拉伯语语法写作，是一名杰出的演说家，留下了大量充满激情号召和劝诫的布道文稿。他最负盛名的“瓦朱哲”《我号召学习知识》，内容是号召人们研究安拉的话，以巩固信仰；《这世界的魅力中饱含甜蜜的毒药》中，诗人向读者警示这世界的空虚和匆匆流逝的人间享乐的危险性；另有《梅金和梅济那的对话》

等。他的著名诗歌《歌颂先知》是“乍默列”体裁的典范。属于这一体裁的还有季亚朱·嘉吉叶的《巴拉福叶》(字面意思：《歌》)。在不长的篇幅中，作者讲述了自己对先知充满谦逊和崇敬的爱，以及遵循先知的全部遗训以成为“被选中的人们中那个被选中的人”的热切愿望。

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品很多都没有注明日期，增加了对诗人文学作品的研究难度。其实可以认为，正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喀西达诗这一具有复杂结构的新体裁得到了发展。最负盛名的富拉语喀西达诗是穆罕默德·阿里乌·迪亚姆献给哈吉·奥马尔的喀西达诗。穆罕默德·阿里乌·迪亚姆的喀西达诗符合阿拉伯诗歌写作的规则，但与阿拉伯经典喀西达诗有很多不同之处。如果说后者通常是由几个相互之间联系较弱的部分构成，那么图库洛尔诗人的喀西达则涉及上千首诗歌，这使它成为富拉语文学中独一无二的作品。对十九世纪著名活动家的生平描述的统一情节加强了这种整体性：谢赫的青年时期、他在麦加的朝功、对哈里发活动的准备、他的战争功勋和死亡。可以说其具有历史价值，尽管作者的热烈赞颂君主的意图很明显。阿里乌·迪亚姆用逾二十年的时间完成这部作品，直到哈吉·奥马尔去世后的法国人统治时期才完成。阿里乌·迪亚姆的喀西达诗与英雄主义史诗十分接近，因此他也标志着富拉尼民族文学真正的转折。

此外，还有很多诗人致力于喀西达诗的创作，其中著名的诗人有拉明·戈勒、阿赫马杜·季扎尼、谢赫·加其耶·季阿万多，这些人的作品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富塔—托罗地区十分普及。

在已有的诗歌体裁基础之上又不断有新的体裁形成。曼多杰源于颂歌，这种诗歌的主人公一般为世俗世界中的人，如统治者、历史名人、颂辞中的当代杰出人物等。其中歌颂马西纳国家的创建者谢库·阿赫马杜的杰出史诗便属于曼多杰，这首诗的作者是图库洛尔人统治时期的北非伊斯兰教隐士阿马杜·旺卡拉。曼多杰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为巴杰姆巴·阿尔法·伊萨克所创作的《法图·萨迪颂歌》。这首诗受到了格里奥特[1]抒情诗的影响，是一篇献给女性的诗作。诗歌的主人公法图·萨迪是统治者乌玛路·索里亚之妻，其美貌无与伦比。

在富拉尼民族文学史上，编年史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通常编年史的编纂都是按照当权者或者高官的指示。编年史的编纂者都熟知各种历史事件和帝王家谱，广泛地引用了各种口头民间传统和书面文献记载，十九世

① 在西非专门从事演唱、保存和传授口头文学的人。——译注



作者和手稿编纂人

纪二十世纪之交的《希累·阿巴斯·索编年史》便是其中著名的一部。这部编年史的语言十分贫乏，并且结构单一，中间有大量的国王家谱，也就是对过往的当权者进行了简单的列举。但是其中也包含一些详尽的故事，甚至是对话。有时编年史的编纂是为了记录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图鲁班》这部小篇幅的编年史就是为了记录1863年富塔—贾隆的军队夺取了富拉尼人国都恩加布这一历史事件而书写的。

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富拉尼文学的过渡时期，这是因为随着大部分人民开始信奉伊斯兰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教育。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便是格里奥特，他们是为当权者服务的职业歌者和说书者。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书面记录的民间文学体裁，这些记录者之中既有格里奥特，也有马拉布特。由于民间口头创作和文学传统不断融合，宗教说教文学开始变得更为世俗化，不断有新的内容补充进来。此外，格里奥特还创造了新的文学体裁，即史诗歌曲、情歌、颂歌和讽刺文学。牧羊诗人创作的牧歌也成为了书面文学的一种（富拉尼人称之为“牧牛歌”）。

随着欧洲人的到来，在富拉尼文学中出现了全新的风格和主题。这个时期的诗歌中充满着对已逝光阴的忧伤、对征服者的仇恨和对殖民者的藐视。然而却是在这之后，也就是二十世纪初，富拉尼文学中反殖民主义作

品才迅猛发展，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这个主题的民间诗歌以及阿拉伯文学风格的作品。

殖民侵略阻碍了富拉尼民族文学的发展，但是文学的传统却得以延续下去，并且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杰出的富拉尼诗人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奠定了富拉尼标准语和富拉尼诗歌的基础。

第三章　斯瓦希里文学

在东非海岸，莫桑比克以北的斯瓦希里城市如佩特、拉穆、蒙巴萨、基卢瓦等，在十八世纪阿曼国的帮助下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后，就一直处于阿曼国的影响之下。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阿曼苏丹赛伊德·萨伊德将自己的府邸由马斯喀特迁至桑给巴尔岛，并将沿海地区划归自己管辖。桑给巴尔在1856年摆脱阿曼独立，正是从这时候起成为了东非主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以其为中心形成了桑给巴尔苏丹国，包括桑给巴尔岛以及附近岛屿、沿岸领地。

在四十至五十年代，东非开始吸引欧洲人的注意力，在桑给巴尔先后建立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事馆，在距蒙巴萨不远的地方建立了第一个天主教传教机构。

在十九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英国和德国在东非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德国的使者强加给某些地区的统治者的所谓管辖条约，允许了德国在1885年占领了桑给巴尔的一大片沿海领土。赫尔戈兰条约(1890)终结了英德之间的竞争，根据该条约，英国获得了乌干达和肯尼亚领土，在桑给巴尔确定了自己的保护区。德国的领地不断扩张，向南一直延伸到鲁伍马河，向西一直到坦噶尼喀湖，这些帝国殖民地开始成为“德意志东非”。莫桑比克继续处于葡萄牙的统治之下。1889年，意大利在北部斯瓦希里沿岸的布拉瓦、马尔卡、摩加迪沙等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于是，斯瓦希里城市便被几个欧洲国家瓜分，开始了东非历史上的殖民统治时期。

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发展便是在以上背景下进行的，这个地区在欧洲统治之前已形成了庞大的民族种群斯瓦希里人，共同的语言斯瓦希里语，同时还有独特的伊斯兰化的斯瓦希里文化。这种文化重要的组成要素便是古斯瓦希里文字(这种文字使用阿拉伯字母)、标准语和书面文学。

随着桑给巴尔苏丹国的建立，伊斯兰教成为国教之后，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开始对斯瓦希里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包括对斯瓦希里语言的影响。在斯瓦希里语及其语言规范形成初期，吉亚姆和吉姆维塔等北方方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桑给巴尔的城市方言昆

古扎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种方言在沿海的区域不断扩大，并且在大陆地区还衍生出了另一种它的变体吉姆利马。在殖民统治的条件下，为了满足殖民社会的需求，欧洲人（殖民统治者和传教士）以昆古扎语为基础，创立了统一标准斯瓦希里语（使用拉丁字母）。这种语言继承了斯瓦希里语的语言规范，也就是说经典的标准语是建立在吉亚姆方言基础之上的。

从十七世纪开始，特别是桑给巴尔苏丹时期，斯瓦希里上层社会人士便有机会阅读阿拉伯文的宗教书籍和文学作品。许多神学家都具有丰富的图书收藏。著名伊斯兰教专家贝克尔也在二十世纪初期了解了若干这种收藏。这些著作涉及的领域有法律、伊斯兰宗教信条、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传记、伊斯兰教神秘观念、语法和字典、历史传说以及巫术等。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传教士（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往往都是巫术师）和社会其他有文化阶层而言，宗教及道德教诲文学在斯瓦希里语中都是通过传统的诗歌形式表达的。在不同城市的有教养的名门望族周围形成了一个个文学中心，聚集了很多口头文学的专家，他们熟知前辈讲述者和诗人的创作，并且能够很好地诠释伊斯兰教的道德教诲和历史主题文学作品。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斯瓦希里文学继续发展自己传统的体裁坦迪（宏大史诗）和马沙利（诗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文学。规模不大的长诗《阿基塔之歌》就是一篇原创诗作，诗歌讲述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诗歌的主人公是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绰号是阿基塔。他是蒙巴萨要塞的长官，反抗了桑给巴尔苏丹的命令，迫使苏丹动用武力将他押送到桑给巴尔。史诗通过古老的斯瓦希里战斗史诗坦迪反映了阿基塔的失败。苏丹的使者带着五十五名士兵去找倔强的阿基塔，并且转交了苏丹的书面命令，下令让他交出自己的全权。阿基塔在要塞中积极备战，说道："面对敌人我就会变成一只猎豹，就让所有人都知道，跟我开玩笑是不好玩的。"英国战船（应苏丹请求）向要塞射击，阿基塔亮出了白旗。

当代坦桑尼亚文学家把这首诗看作为数不多的反苏丹倾向的作品，反映了蒙巴萨反对桑给巴尔并为争取独立所作的斗争。这篇政治上十分尖锐的作品的作者是著名诗人和说书人阿卜杜拉·本·马苏德（1797—1894），他来自蒙巴萨以北的小城市达卡乌古。除此之外，他的代表作还有《巴拉西斯之歌》、《哈辛纳之歌》等。

在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关于修道士巴拉西斯的故事都广为流传，在哈德拉毛地区也十分有名。根据哈里斯的观点，这一故事正是从这里传入东非地区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伪虔诚者与世隔绝居住了七十年（根据斯瓦希里地区的传说），一直在与撒旦送来的各种诱惑作斗争。但是到最后，他还是犯下了罪行，与一名被香水迷住了的叫佩波的女子发生了关系。得知该

女子怀孕后,他便杀死了她。

《哈辛纳之歌》也是一个有关诱惑的故事:苏丹的女儿爱上了一个伪虔诚者,但是这个人拒绝了所有试图引诱他的行为。然后按照女儿的请求,父亲修建了一处与世隔绝的住所,在那里女儿得到了教训。因为修道士已被阉割,所以当姑娘发现自己已怀孕的时候,修道士通过这点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这两首坦迪诗(在后来人们将它们合并成一部情节相关的作品)与其他一些早期的斯瓦希里醒世说教作品同属一个系列。在这些作品中,典型的非洲式的开端(在举行仪式时歌唱说教歌曲的传统)和伊斯兰教的学说以及情节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阿拉伯伊斯兰教的文化在斯瓦希里人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使我们看到了在该种条件下将伊斯兰教的故事情节和历史翻译、转写成斯瓦希里语的必要性。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斯瓦希里文学中出现了新的故事,这些故事有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现实的《阿基塔颂歌》,同时也不断有新的道德教育题材的作品问世,这些作品中间充满了伊斯兰教的主题和文学样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仍是以传统的诗歌形式(坦迪诗)写成,这种形式对于更早期的斯瓦希里口头创作是十分典型的。同时,很多反映与殖民者的冲突的作品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比如很多描写德国人占领东非海岸的行经,以及土著居民反抗殖民者的斗争的作品。这些坦迪诗中虽然不断出现新的主题和样式,但是保存了该种体裁古代作品的所有特点。这些作品构成了下一历史时期斯瓦希里文学一面独特的旗帜。

第四章 埃塞俄比亚文学

在1855年,卡萨·海尔·乔治斯夺取了埃塞俄比亚的最高政权。他本是一户没落望族的后裔,因为在伪经《耶稣故事》中预言了这样一位皇帝的出现,所以他便给自己冠以"西奥多"这个名字。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他致力于加强自身权力,新上任便深思熟虑地提出一系列大胆的计划。西奥多二世进行了坚决的改革,改革针对大地主,而改革的目的则是建立独裁统治的民族国家。

然而在当时,封建主义还远未到瓦解的时期,因此,这个目标不能被社会的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这就已经预示了西奥多二世最终的失败。在实现自己统一国家的宏伟计划的过程中,西奥多二世一直遭遇着各种困难,但他仍然四处奔走,有时善意突发,有时残暴无比,征服着起义的地区。人民早已厌倦了战争和破坏,最后,虽然他一直试图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

但是封建贵族、传教士、人民都开始反对他，连他寄予厚望的英国人也开始反对他，并且这些反对的力量不断发展。因此当英国人派来的远征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君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当他的要塞被包围的时候，他深知自己不能抵抗住英国人的进攻，于是在1869年4月18日，他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并且自杀而亡。

701・ 西奥多王朝事件震惊全国，最直接的反应便体现在埃塞俄比亚文学的发展上，尤其是体现史书体裁上。在记载这个王朝历史的史书中，有三部作品最为有名。第一部的作者是西奥多二世的大臣和私人秘书——扎涅博。按照旧时传统，他还是王室历史的官方史官，留下了关于埃塞俄比亚文学过渡时期最值得关注的记录。

扎涅博的编年史延续了贡达尔时期(1632—1789)的王家历史。整部作品都贯穿着这样的思想，即西奥多二世从孩童时期便被上帝选中为王，他的统治能够拯救埃塞俄比亚免于混战和灭亡。扎涅博还引用了一个捏造痕迹明显的家谱，称其属于所罗门家族，以此来证明他理所当然要登上国王的宝座。类似贡达尔时期的《国王纪事》，扎涅博的创作也带有明显的袒护倾向，严格按照编年史的手法写成，标有各个事件准确的日期。但是这种有条不紊的、详尽的叙述在1859年11月一系列事件之后便结束了，其后是草草结尾，据判断应该是在这位君王去世之后草就的。这部作品的创新之处在于语言：作品中使用的不是死的标准语，而是活生生的口语化的阿姆哈拉语。把这种语言应用到埃塞俄比亚文学中是一系列具体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标志着埃塞俄比亚文学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动乱不安的年代加之日益尖锐的斗争，使史书体裁的作品愈发被人们所关注，并且这种体裁开始具有政论的意义。对这种体裁的关注远不仅限于懂得古代文学语言的书籍爱好者这一狭窄的圈子。由于在自己改革的过程中遭遇到不解和阻力，因此，西奥多国王及其亲信都希望让更大范围的人理解自己。抱着相同的宣传目的，西奥多国王的政治对手们也选择用阿姆哈拉语作为自己史书的书写语言。例如，马里安・沃尔德是大主教身边一位博览群书的牧师，熟知古代语言并且沉迷于文学创作，在他撰写的西奥多国王的历史中便使用了阿姆哈拉语。

但是马里安・沃尔德与扎涅博的作品相差甚大。扎涅博为我们展示了所有国王的信件和国家文件，这些文件日期准确，国家事务也详细地描写出来。而马里安・沃尔德也记录了西奥多临死前十八年的历史，但是在国王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同大主教一起被关押在要塞之内，因此马里安・沃尔德的叙述在准确性上不如扎涅博的编年史。但是他非凡的写生般的笔触却略胜扎涅博一筹。他的作品不像官方的编年史那样具有严格的大事记年

表，马里安·沃尔德着力刻画了国王的性格，这在埃塞俄比亚文学中是一个全新的现象。

马里安·沃尔德贯穿始终地用朴素的笔触向读者传达了一个与扎涅博完全相对立的理念：西奥多二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是所罗门家族的后裔，相应地，也就谈不上他是为了实现最高权力而生。不论其个人品质如何，哪怕他极为杰出，也都不可避免地在日后成为一个暴君，折磨被征服的人民。在这场个人和命运的悲剧斗争中，由于个人意识到自身正在不断衰落，因此必然会遭受失败。这里所描述的历史事件，不论是真实的还是传说的，都作为这场斗争的历史背景而出现。西奥多二世以一个仁慈的国王身份开场，却以一个暴君的结尾落幕。

· 702

马里安·沃尔德使用了一种自由的叙事手法，将虚构杜撰、个人感受和历史事实按照个人的想法任意地交织在一起，这样就使他的作品更像一部文艺作品，而不是史书，虽然旧有的史书体裁的影响仍然在这部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埃塞俄比亚国王西奥多二世自杀图
拉申纳根据埃塞俄比亚某画家作品临摹

第三部描写西奥多国王的作品（作者未详）则摆脱了这种影响。这部作品已经不是编年史，而是取材于国王生活的历史笑话集锦。作者是一个蒂格里尼亚人，他把听到的笑话用蒂格里尼亚语记录下来，同时也或多或少地使用了阿姆哈拉语（阿姆哈拉语属于埃塞俄比亚语南方的一支，而蒂格里尼亚语和已经成为死语的吉兹语则是北方的一支，是文学和宗教中使用的语言。在蒂格雷和厄立特里亚地区使用蒂格里尼亚语。）于是，阿姆哈拉语便开始作为全民的标准语在全国使用。这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传统，只是一种微弱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不但在未来大有发展，而且预示着历史文化的发展方向。阿姆哈拉语不但是阿姆哈拉民族的语言，还是埃塞俄

比亚贵族社会所使用的语言，不论其民族及语言组成多么复杂，在所有的正式庄重的场合都会使用这种语言。另外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全埃塞俄比亚的教会教育中（埃塞俄比亚也没有其他类型的教育），《圣经》学习用的是死语言，而注解则使用姆哈拉语，不论这所教会学校位于国家的那个地区。

西奥多国王去世之后，争夺政权的斗争加剧，来自北方的约翰四世成为了国王，将最高政权由蒂格雷迁往北方，在这一过程中，阿姆哈拉语文学创作继续不断发展。约翰四世的统治在一定意义上是封建势力对先前西奥多二世的大力改革的一种反弹，约翰也力图复兴自己的国家，但他并不是想创造出一种空前的新制度，而是致力于恢复埃塞俄比亚封建君主制国家昔日的荣誉和强大。他试图按照旧式的生活方式生活：建教堂，赏给自己的拥护者大量的土地，巧妙地除掉危险的对手。他唯一的希望便是周围的世界能够给他和他的国家以平静。但是外部的世界并没有给埃塞俄比亚以平静，约翰不得不集中自己手下的力量，对埃及人以及随后的意大利人的进攻发起反击，最后在 1889 年 3 月 9 日，他在与马赫迪教派的斗争中牺牲。因此在约翰统治期间，埃塞俄比亚也没有经历和平，而记录这场激荡事变的史书创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并且远远不局限于宫廷内部的范围。

但这并不意味着宫廷内部没有在撰写这段历史。虽然约翰四世曾经一再表示自己不喜欢官方的史书，认为它谄媚且虚伪，但是在他加冕后，他立即下令开始撰写自己统治期间的历史。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一共挑选了三个人：马拉维宫廷牧师首领特克勒·艾斯基范诺斯、亚杜的圣三一教堂的修道院院长伯翰以及阿克苏姆的锡安大教堂的修道院院长雅苏。约翰四世时期的史书使用传统标准语——吉兹语，以贡达尔时期的详尽的编年史为典范。按照惯例，它是从国王的出生开始记录，记录了他的青年时代、夺取政权的斗争以及隆重的加冕仪式。但是不知为何原因，在这之后记录便停止了。这部官方编年史没有保存在宫廷之内，而是保存在约翰在亚拉杜瓦所建的德勃雷·百瀚·塞拉斯教堂。古老的贡达尔时期的传统和著作在约翰王朝得以延续，尽管约翰及其亲信们都无意复兴这些传统。

传统形式的文学创作在约翰四世统治期间继续发展，但是却并非在宫廷内，而是在亚拉杜瓦和阿克苏姆那些他捐建的教堂之内。在阿克苏姆的锡安大教堂之内，一个名叫海尔·马里亚姆的人也写下了记录君王的作703· 品，但是他所撰写的不像是历史，更像是圣徒传。在这部作品里，约翰四世陷入与马赫迪教派的斗争中，作为一名为信仰而牺牲的烈士而扬名，作品栩栩如生地把他描绘成一位英勇的军人、人民的传道者和施洗者以及魔鬼的驱赶者。这部作品的结尾就像圣徒传应有的那样，在约翰身上发生了奇

迹。在另外一所阿克苏姆的教堂——约翰四世最喜欢的圣三一教堂内保存了另外一部有关这位君王的史书，但是这部作品并没有完整地保存到如今。它的作者——马尔沙修道院院长酷爱文学创作。他写了两部圣徒传，圣徒传的风格在两部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宗教性质的冗长的、辞藻华丽的演说似的插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然而不论是按结构还是内容来说，这部作品都是君王的编年史，而非圣徒传。从风格和叙述手法来看，这部作品与官方的皇帝编年史十分接近，虽然它成书于君王牺牲之后，从准确性和信息量来说都逊于官方的编年史。

以上所列举的献给君王的历史著作都源于宫廷，尤其是教皇身边的掌握教权的人。与这些作品一道，在国内还有一些更为独立的史学著作也在不断发展。无论是用吉兹语还是阿姆哈拉语写成，这些作品都早已脱离宫廷的范围，约翰的统治被放到和其他国王一样的位置去审视。叙述变得更为单调和简单，最主要的是这些史书的目的不单是记录国王的活动，更是为了记录国家的历史。虽然这些作品在规模和辞藻上逊于官方和半官方的作品，但在叙事的客观性上却大大高于后者。就像史书类作品总是随着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的改变而改变。

其实，这种改变只在不带任何偏见地仔细审视埃塞俄比亚的史书时才会明显发现。总体来说，十九世纪下半叶，埃塞俄比亚的文学还属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停滞的状态。发展极为微弱和缓慢，只在史书这种体裁上才能看出它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也十分不显著。然而即将到来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埃塞俄比亚已站在一个全新而又危险的时期的路口，史学家们将这个时期称为“非洲的分界线”。国家很快就要面临残酷的选择：或者是改变并发展自身，使自己适应帝国主义扩张的新时代；或者在不对等的斗争中牺牲。对于埃塞俄比亚而言，一段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展开。对于埃塞俄比亚文学而言，这个时期意味着中世纪文学的迅速消亡，以及全新的文学时期内文学缓慢的渐进的发展。

第五章 布尔文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南非地区，英国采矿工业的资产阶级与布尔农民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日益尖锐，为民族与语言纠纷所加剧。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年内，在布尔人的领土上发现了大量金矿和钻石矿之后，这种矛盾更为尖锐。利益上的冲突导致了1880—1881年以及1899—1902年的英国与布尔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使布尔人失去了行政自主管理权。

这次社会历史冲突也体现在所谓的第一次布尔人运动之中，这次运动

的中心是成立于1875年的真正布尔人组织。这一组织的目的如下：将《圣经》翻译成布尔语、出版用布尔人母语书写的关于母语的字典、语法书和教科书。然而在其活动中表现出了民族主义情绪、宗教狂热情绪（加尔文主义）、布尔人党派的种族主义情绪。这些因素已经预示了职业化布尔语文学的初步发展，这些作品出版在真正布尔人出版机关杂志《爱国者》（1876—1904）上。

以下这些作品很好地表明了这本杂志的观点：编辑部集体创作的《人民之歌》、杜托伊特的《德兰士瓦自由之歌》、《荷兰人是怎样占领了喀普》和《马塔贝莱兰省的夜晚和黎明》、霍根豪特的爱情抒情诗谣曲《亨德里克和菲德里雅》、《桑尼·拜尔斯》（由拜伦的《雅典的少女》改编而来），数量众多的讽刺模仿作品（对《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的讽拟）、幽默诗作和长诗，讽刺诗和宗教歌曲。这些诗作的艺术水平并不高，但其宣传、说教功能却十分重要。

布尔文学在论战中产生，常常同论战结合在一起，甚至在讨论历史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最优秀的布尔散文的典范之作之一便是牧师杜托伊特的长篇小说《希巴女王，或所罗门王在赞比西河的金矿》（1898），在这部作品中，历史与游记交织在一起。这部小说的艺术结构十分松散，这与作者的另外一部历史作品《玛格丽特·普林斯罗，或至死不渝的爱情》十分不同。杜托伊特的政治立场（他曾是“真正布尔人”运动的领袖）在以下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包括长篇小说《战争中的爱情》（1900—1902），政论性作品集如《布尔语言运动史》（1880）、《圣经国家游记》（1883）、《重新上路》（1886）等。

为了达到同样的宣传目的而开始写作的不止有宗教人士，例如奥兰治共和国的总统赖茨也选择了这种方式。在自己的作品《非洲诗歌五十首精选》（1888）中，他歌颂了布尔人在与英国人和卡菲尔人（非洲原住民）的战斗之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在对欧洲文学的情节进行加工的基础上，赖茨还写了很多在普通读者中间非常流行的幽默短诗以及一些长诗，其中最著名的有《克拉斯·盖茨维特和他的马》（根据彭斯1870年的作品《汤姆·奥·山戴尔》改编）。

霍根豪特（1843—1922）牧师是真正布尔人组织的奠基者之一，也是第一批将《圣经》翻译成布尔语的翻译之一，迫于需要，他还成为了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例如第一部用布尔语写成的著作《朋友为孩子们及其家人用母语写就的约瑟史》，或者第一部用布尔语写成的小说《卡塔琳娜，律师的女儿》（1879）以及他的诗作，都具有实用的目的。

同时还有一部分布尔的作家继续用荷兰语写作，他们面向的是教育层

次更高的布尔人(城市居民),例如迈尔特·布林克(1842—1925)的《有趣的历史和其他的诗歌》(1893—1909)。但是布林克的荷兰语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与"高级荷兰语"相去甚远,是非洲荷兰语——这是唯一的布尔民族的活语言的发展的证据。伊恩·里昂·卡斯也是一位使用荷兰语写作的作家,他的作品有历史小说《胡格诺派家园》和《至死忠诚》,还有说教小说系列《七个魔鬼及其行径》(在1907年用非洲荷兰语完整出版),这部作品揭露了七宗致命的罪行。作者认为自己是一个怀着布尔人的心的布尔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布尔人,因为有一些布尔人的内心其实是英国人或者荷兰人),这种态度也表现在他的讽刺长诗系列《布尔语》之中。他还写了很多内政主题的幽默短文,刊登在《爱国者》杂志上。不论是布尔人的"卡茨爸爸"(布林克的绰号)还是"伊恩叔叔"(卡斯的绰号),都十分擅长对于生活的描写,熟知并热爱隐忍的民族幽默。

总的来说,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布尔文学虽然受到了反动思潮——首先是种族主义和加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其确立的阶段也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在早期发展阶段也在人民中取得了支持,而第一批专业的布尔文学家在唤醒人民、教育人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结 束 语

《世界文学史》第七卷所包括的这个较短的历史时段，是世界文学史上极其充实和丰富的时期。

这一时期形成了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将全球最偏远的各个角落卷入其中，技术的迅疾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手段的提高，也使彼此相隔甚远的世界各地相互接近，奠定了更加急速的文化交流的基础，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发展的总体进程。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文学在这一时期已经无法从文学交流的复杂体系之外去认识，在一些民族文学中较晚形成的那些流派，在保留自己的本土性的同时，也带上了这些日益强化的特质的印迹。这一时期的世界文学进程还有一个特征，即大规模的加速，其原因也在于此。

这种发展节奏的加快，是由于世界历史运动本身变化了的节奏所造成的。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欧一些国家以及稍后时期的美国，资本主义体系取得了稳定和一定的成熟，而到了十九世纪末，则显露出明显的危机症状，标志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世界不同地区经历着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震荡。

文学进程加快节奏，表现在许多文学流派的同时发展或快速更迭之中。现实主义在这一时期达到相当程度的成熟，在很多情况下与继续前行、有时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中起作用的浪漫主义并存（例如中欧和东南欧、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俄国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另一方面，西欧国家的现实主义，接触到了这一时期传播很广的自然主义和正在出现的一些新的非现实主义流派，如象征主义、帕纳斯派诗歌、新浪漫主义等很大程度上带有危机特征的流派。这些新现象出现在西欧，首先是法国，后来甚至渗透到那些发展有些迟缓的文学中（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意大利、西班牙等）。"浓缩型发展"进程也出现在中欧和东南欧以及美国、拉丁美洲和东方一些国家。

这样一来,可以说这一时期已经有了文学进程同步化的趋势。但是这些趋势并不能消除文学发展明显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依然存在。这一不平衡性也影响到与这一时期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主义流派的发展。

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最高潮,它是在异常强劲的社会变革和从经济上落后、半封建的俄国向世界革命运动中心转变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非同寻常的普及,以及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艺术发现,对不同国家的许多作家具有巨大意义,这是这一时期世界文学进程的重要特征之一。俄罗斯文学在不同文学领域的作用与反映各不相同。俄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文学中与俄罗斯文学的联系以及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批评的影响特别强劲。在这些文学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加速形成的过程,一些人成为民族经典作家,如伊·弗兰科、米·纳尔班江、伊·恰夫恰瓦泽、阿洪多夫。对于中欧和东南欧文学来说,也在开展为现实主义繁荣进行的斗争,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影响以及对果戈理和屠格涅夫作品的介绍非常重要。在拉丁美洲,俄罗斯文学被看作是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民族文化的同盟军。在那些由于这一时期自然主义和颓废派的作用而使现实主义发展变得复杂化的国家中,在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的斗争中,俄罗斯经典作家、首先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起到极其巨大的作用。这一作用在本卷所包括的时期中有所体现,但最明显的体现还是在下一时期。

706·

尽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欧文学中存在限制人们现实主义地认识世界的能力的实证主义,以及后来的自然主义,有时还有颓废派倾向的某些影响,诸如福楼拜、莫泊桑、哈代、冯塔纳、易卜生等文学大师的创作,还是证明了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渐进发展。尽管到十九世纪末,现实主义有些受到自然主义和颓废派影响而受到排挤,但是在世纪交替时还是出现了新的繁荣和本质变化,以法朗士和萧伯纳、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罗曼·罗兰和高尔斯华绥的创作为代表,借鉴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的巨大成就。

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特别尖锐地体现在亚洲和非洲国家中。十九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销售市场、投资领域的斗争日益尖锐,这也是一个亚非国家进一步打破以往封闭性和孤立性的时代。这些地区出现了被当地资本主义发展和日益强化的殖民压迫推动起来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进程。因此,这些地区在该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便是资本主义中心和外围相互吸引力的增长,以及在反殖民运动和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规范和价值的抗拒中表现出的反作用力的增长。同时,一体化和非一体

化进程在亚非国家中并非同步,这造成了文学发展水平的极大差异。其他地区明显的渐趋同步化趋势,没有在这一时期的亚非国家中找到位置,恰好相反,出现了(尽管大多数亚非文学总体上在渐渐发展)处于领先地位的文学越来越明显地脱离其他地区的文学的现象。例如,在土耳其、孟加拉、日本等国的文学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掌握,但是同时,在亚非许多地区的文学中,在创作艺术方面仍保留着中世纪传统精神。

与此同时,东方一些地区的文学在积极借鉴欧洲文学经验。凭借将亚非文学引入世界文学的进程,未来在矛盾复杂的发展进程中消除其中大多数国家之间的社会类型差异的前提条件赖以产生。同时,如今的西方也不仅仅是在东方寻找异域风情,它也不再仅仅是受欧洲文化过去的"东方主义"倾向所特有的对认识"东方心灵"的追求的推动。在西方,人们在努力研究新的发展趋势,并力图了解东方所创造的文学财富。

本卷所研究时期的文学发展的许多倾向,对于未来特别具有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十世纪的文学命运。西方文学研究中有种观点,认为非现实主义流派和颓废派在未来起的作用最大。毋庸置疑,这些流派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得到了多种多样的延续,决定了后来文学发展中的许多因素。还必须考虑到,在这些流派呈现出病态危机倾向的同时,许多与之相关的作家主要是为诗歌的革新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一时期对二十世纪文学命运最具有影响力的,却是在真实描写人和分析思考社会规律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很重要的一点是,正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一系列地区的文学中出现了最成熟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这包括俄罗斯和许多西欧文学、中欧和东南欧以及其他地区的某些文学。研究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经典,能使人有可靠证据来反驳那种认为现实主义过时陈旧的观点。

· 707

对于未来而言,这一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传播不那么广泛的、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学。这一传统对二十世纪文学发展作用巨大。

可以说,本卷所涵括时期的文学在人类文学发展链条上的位置的确立,能够推翻那种目前流传甚广的将十九世纪文化与二十世纪文化对立的观点。

人 名 索 引*

* 本索引包括作者、研究者、历史人物的名称，神话和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并未列入。

参 考 书 目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ОВ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Маркс К. Восемнадцатое брюмера Луи Бонапарта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8. — С. 115—217.

Маркс К.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во Франции с 1848 по 1850 г.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7. — С. 5—110.

Маркс К.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Испания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10. — С. 423—480.

Маркс К. Франция Бонапарта Малого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11. — С. 627—632.

Энгельс Ф. Революция и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в Германии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8. — С. 3—113.

Ленин В. И. Евгений Потье (к 25-летию его смерти)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22. — С. 273—274.

Ленин В. И. Лев Толстой, как зеркал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17. — С. 206—213.

Ленин В. И. Л. Н. Толстой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20. — С. 19—24.

Ленин В. И. Л. Н. Толстой и его эпоха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20. — С. 100—104.

Ленин В. И. Л. Н. Толсто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20. — С. 38—41.

Ленин В. И. От какого наследства мы отказываемся?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2. — С. 505—550.

Ленин В. И. Памяти Герцена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21. — С. 255—262.

Ленин В. И. Развит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3. — С. 1—609.

Ленин В. И. Уроки коммуны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16. — С. 451—454.

ОБЩИЕ РАБОТЫ

Вайман С. Т. Марксист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 и проблемы реализма. — М., 1964.

Из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XIX века. — М., 1962.

История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онца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1871—1917)/Под ред. Л. Г. Андреева, Р. М. Самарина. — М., 1968.

История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онца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Под ред. М. Е. Елизаровой, Н. П. Михальской. — М., 1970.

История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Под ред. Я. Н. Засурского, С. В. Тураева. — М., 1982.

История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Под ред. А. С. Дмитриева — М., 1983. — Ч. 2: Страны Европы и США.

Типология стиле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XIX века: Стилевое выражени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и народно-поэтическая традиция; Стилевые формы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го изображ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Объективность стиля и поиски гармонии/Отв. ред. Н. К. Гей. — М., 1977.

Эпоха реализма: Из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 связей рус. лит./Отв. ред. М. П. Алексеев. — Л., 1982.

Adams R. M. Nil: Episodes in the literary conquest of voi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L. etc., 1970.

The age of realism. — Harmondsworth (Midd'x), 1974.

Becker G. J. 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 — Princeton (N. J.), 1963.

Chevrel Y. Le naturalisme. — P., 1982.

Clark B. H., Freedley G. A history of modern drama. — N. Y.; L., 1947.

Dédéyan Ch. Le nouveau mal du siècle: De Baudelaire à nos jours. — P., 1968. — T. 1: Du postromantisme au symbolisme (1840—1889).

Forgács L. Fudatosság és költöiseg. — B., 1970. — к. 2: A szocialista realizmus esztétikai meghatározásához.

Friedrich H. Die Struktur der modernen Lyrik: Von der Mitte des neunzehnten bis zur Mitte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 Hamburg, 1967.

Furst L. R., Skrine P. N. Naturalism. — L., 1971.

Hobsbawn E. Die Blütezeit des Kapitals: 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Jahre 1848—1875. — Frankfurt a. M., 1980.

Jullian R. Le mouvement des arts du romantisme au symbolisme: Arts visuels, musique, littérature. — P., 1979.

Lamm M. Det moderna dramat 1830—1930. — Stockholm, 1964.

Lukács G. Probleme des Realismus: In 3 Bd. — B.; Neuwied, 1964.

Neues Hand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Wiesbaden, 1976. — Bd. 18, 19: Jahrhundertende — Jahrhundertwende/Von H. Kreuzer et al.

Propyläen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 B., 1984. — Bd. 5: Das bürgerliche Zeitalter 1830—1914.

Scott N. A. Craters of the spirit: Studies in the modern novel. — L.; Sydney, 1969.

Sedlák J. Osonosti a diela vo svetovom realistickom románe. — Br., 1975.

Smith P. Public and private value: Studie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novel. — Cambridge etc., 1984.

Wellek R.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 2nd ed. — New Haven, 1966. — Vol. 3, 4.

Сидзэнсюги бунгаку. Қаваути Қиёси-хэн. — Токио, 1962.

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РОЦЕСС В РОССИ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ОБЩИЕ РАБОТЫ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10 т. — М.; Л., 1956. — Т. 8, 9.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3 т. — М.; Л., 1964. — Т. 3.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 т. — Л., 1982—1983. — Т. 3, 4.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Под ред. Д. Н. 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ого: В 5 т. — М., 1910. — Т. 4, 5.

Кулешов В. И.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70—90-е годы. — М., 1983.

Поспелов Г. 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1840—1860-е годы). — 3-е изд., доп. — М., 1981.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Под ред. С. А. Венгерова. — М., 1914. — Т. 1.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нца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Девяностые годы. — М., 1968.

*

Айхенвальд Ю. И. Силуэты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 3-е изд. — М., 1913. — Вып. 2.

Базанов В. Из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полемики 60-х годов. —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1941.

Борщевский С. Щедрин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стория их идейной борьбы. — М., 1956.

В память П. И. Мельникова (Андрея Печерского). — Н.-Новгород, 1910. — (Нижегор. ученая архивная комиссия. Сб. Т. 9, ч. 1).

Вересаев В. В. Живая жизнь. — 4-е изд. — М., 1928.

Вопросы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40—1870-х гг. — Л., 1954.

Гершензон М. О. История молодой России. — М.; Пг., 1923.

Десницкий В. А. Избр. статьи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I—XIX вв. — М.; Л., 1958.

Евгеньев-Максимов В. Е. Из прошлого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Статьи и материалы. — Л.,

1930.

Евгеньев-Максимов В. Е.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при Чернышевском и Добролюбове. — Л. , 1936.

Евгеньев-Максимов В. Е. , *Тизенгаузен Г.*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Современника》(1863—1866). — М. , 1938.

Евнин Ф. И. А. Ф. Писемский: К 125-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1820—1881). — М. , 1945.

Емельянов Н. П.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Н. А. Некрасова и М. 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1868—1884). — Л. , 1986.

Есин Б. 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Дело》. — М. , 1959.

Иванов И. И. Писемский. — СПб. , 1898.

Иде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Л. , 1969.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2-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 М. , 1964.

Ильин В. В. Русская реальная крит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 Смоленск, 1975.

Иовчук М. Т.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Н. П. Огарева. — М. , 1957.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В 2 т. М. ; Л. , 1964. — Т. 2.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В 2 т. — Л. , 1969. — Т. 2.

Кирпотин В. Я. Радикальный разночинец Д. И. Писарев. — М. , 1934.

Козьмин Б. П. Журнал《Современник》— орган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Журнально-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и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а. — М. , 1957.

Козьмин В. П.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тория. — М. , 1969.

Козьмин Б. П. Русская нелег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печать 70-х и 8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 М. , 1960.

Куприянова Е. Н. , *Макогоненко Г. П.*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Л. , 1976.

Линков Я.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орьба А. И. Герцена и Н. П. Огарева и тай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Земля и воля》1860-х гг. — М. , 1964.

Лотман Л. М. Реализм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6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 Л. , 1974.

Коробка Н. Очерк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настроений. — СПб. , 1903.

Кузнецов Ф. Ф. Журнал《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 М. , 1965.

Кузнецов Ф. Ф. Публицисты 1860-х годов: Круг《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 Г. Благосветлов, В. Зайцев, Н. Соколов. — М. , 1969.

Лебедева Г. М. Сати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Искра》. — М. , 1959.

Левин Ш. 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60—7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 М. , 1958.

Нечаева В. С. Журнал М. М. и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х《Эпоха》. — М. , 1975.

И. С. Никитин: Статьи и материалы о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е. — Воронеж, 1952.

О русском реализме XIX в. и вопросах народно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б. статей. — М. ; Л. , 1960.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и критики. — Л. , 1965. — Т. 2.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2 т. —

М. , 1955. — Т. 1.

Плеханов С. Н. Писемский. — М. , 1986.

Плоткин Л. А. Д. И. Писаре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М. , Л. , 1962.

Плоткин Л. А. Писаре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60-х годов. — М. ; Л. , 1945.

Порох И. В. Герцен и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 Саратов, 1963.

Пруцков Н. И. Историко-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Л. , 1971.

Пруцков Н.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 века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 — Л. , 1971.

Пустовойт П. Г. А. Ф. Писемский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 — М. , 1969.

Путинцев В. А. Н. П. Огарев: Жизнь,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творчество. — М. , 1963.

Развитие реализм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3 т. — М. , 1974. — Т. 3.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 1859—1861 гг. — М. , 1960—1970. — Вып. 1—5.

Рудницкая Е. Л. Н. П. Огарев в русско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 — М. , 1969.

Русск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Шестидесятые годы. — М. , 1930.

Русская повесть XIX века: История и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жанра. — Л. , 1973.

Скафтымов А. П.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искания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 М. , 1972.

Скафтымов А. П. Статьи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Саратов, 1958.

Смирнов М. Глеб Успенский и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 Саратов, 1964.

Страхов Н. Н. 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об И. С. Тургеневе и Л. Н. Толстом. — СПб. , 1885. — Т. 1.

Тараканов Н. Г. Н. П. Огарев: Эволюция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взглядов. — М. , 1974.

Тонков В. А. И. С. Никитин: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 1968.

Усакина Т. История, филосо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Саратов, 1968.

Фатеев П. С. М. Михайлов —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писатель, публицист. — М. , 1969.

Цыбенко В. А.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Д. И. Писарева. — М. , 1969.

Яковлев М. В.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Н. П. Огарева. — М. , 1957.

Ямпольский И. Г. Сатирическ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1860-х годов: Журнал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сатиры《Искра》. — М. , 1964.

Moser C. A. Pisemsky: A provincial realist. — Cambridge (Mass.), 1969.

Seghers A. Über Tolstoi, über Dostojewskij. — B. , 1963.

Steiner G. Tolstoy or Dostoevsky: An essay in contrast. — L. , 1959.

Vogüé E. M. de. Le roman russe. — 4ᵉ éd. — P. , 1897.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 И КРИТИКА 60-х ГОДОВ.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ДОБРОЛЮБОВ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Н. В.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 — 2-е изд. — М. , 1957.

Бродский Н. Л., *Сидоров Н. П.*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роману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Что делать?》— М., 1933.

Бурсов Б. И. Вопросы реализма в эстетик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демократов. — М., 1953.

Бурсов Б. И. Мастерство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критика. — Л., 1959.

Бурсов Б. И.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как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к. — М.; Л., 1951.

Верховский Г. О романе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Что делать?》— Ярославль, 1959.

Водолазов Г. Г. От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к Плеханову. — М., 1969.

Володин А. И., *Карякин Ю. Ф.*, *Плимак Е.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или Нечаев?: О подлинной и мнимо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сти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России 50—60-х гг. XIX в. — М., 1976.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 М., 1936.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25/26).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 критик и историк литературы. — Л., 1963.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 М., 1988.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Эстетик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итика. Сб. статей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 Л., 1988.

Ефремов А. Ф. Язык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 Саратов, 1951.

Жданов В. 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 — 3-е изд. — М., 1961.

Зельдович М.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и проблемы критики. — Харьков, 1968.

Каган М. С. Эсте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 М.; Л., 1958.

Караганов А.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и Добролюбов о реализме. — М., 1955.

Кружков В. С.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Жизнь,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 М., 1976.

Лаврецкий А. Белински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Добролюбов в борьбе за реализм. — 2-е изд. — М., 1968.

Ланщиков А.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 2-е изд. — М., 1987.

Лебедев А. А. Герои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 М., 1962.

Лебедев-Полянский П. И.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кри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2-е изд. — М., 1935.

Николаев М. П.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написанные на каторге и в ссылке. — Тула, 1959.

Пантин И. К.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в России: переход от утопии к науке. — М., 1973.

Покусаев Е. И.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5-е изд. — М., 1976.

Рейсер С. А.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а. — М., 1953.

Рыскин Ю. Д.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1836—1961: Указ. литературы 1917—1960 гг. — М., 1961.

Рюриков Б. С.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 М., 1961.

Скафтымов А. П.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 2-е изд. —

Саратов, 1947.

Смирнова З. В. Вопрос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в эстетике рус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демократов. — М., 1958.

Соловьев Г. А.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Добролюбова. — М., 1963.

Соловьев Г. А.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и Добролюбова. — М., 1974.

Стеклов Ю. М.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а (1836—1861). — Л., 1930.

Стеклов Ю. М.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Его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2-е изд. — М.; Л., 1928. — Т. 1, 2.

Тамарченко Г. Е.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романист. — Л., 1976.

Чернышевская Н. М.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1828—1889. — М., 1953.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 М., 1959.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67).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Стать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атериалы. — Саратов, 1958—1987. — Т. 1—10.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Указ.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1970. — Саратов, 1976.

Чешихин-Ветринский В. Е.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 Пг., 1923.

Шульгин В. Н.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 М., 1956.

Bazylow L. Mikołaj Dobrolubow. — Łódź, 1955.

Lampert E. Sons against fathers: Studies in Russian radicalism and revolution. — Oxford, 1965.

ГЕРЦЕН

Базилева З. П. «Колокол» Герцена (1857—1867). — М., 1949.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об А. И. Герцене: (1917—1970 гг.). 1917—1935 гг. — Л., 1978.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об А. И. Герцене: (1917—1970 гг.). 1936—1970 гг. — Л., 1984.

Володин А. И. В поисках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теорий: (А. И. Герцен). — М., 1962.

Володин А. И. Герцен. — М., 1970.

А. И. Герцен. — М., 1941, 1955, 1956, 1958.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39/40, 41/42, 61, 62, 63, 64).

А. И. Герце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б. науч. трудов. — Л., 1974.

А. И. Герцен — художник и публицист. — М., 1977.

Гинзбург Л. Я. «Былое и думы» А. И. Герцена. — Л., 1957.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 И. Герцена: 1812—1870. — М., 1974—1987. — (Т. 1—4).

Нович И. Молодой Герцен: Страницы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2-е изд. — М., 1986.

Павлов А. Т. От дворя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сти к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у демократизму: (Идейная

эволюция А. И. Герцена). — М., 1977.

Пипер Л.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Герцена. — М.; Л., 1935.

Пирумова Н. М. 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М., 1962.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Герцена. — М., 1963.

Путинцев В. А. Герцен-писатель.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М., 1963.

Чесноков Д. И.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Герцена. — М., 1948.

Чуковская Л. К. 《Былое и думы》 Герцена. — М., 1966.

Эйдельман Н. Я. Герценовский 《Колокол》. — М., 1963.

Эйдельман Н. Я. Тайные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ы 《Полярной Звезды》. — М., 1966.

Эльсберг Я. Е. Герцен: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4-е изд., доп. — М., 1963.

Carr E. The romantic exiles (A. Herzen). — L., 1933.

Labry R. Alexandre Ivanovi č Herzen: 1812—1870. Essai sur la formation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idées. — P., 1928.

Malia M. Alexander Herzen and the birth of russian socialism, 1812—1855. — Cambridge (Mass.), 1961.

Venturi F. Il populismo russo. — Torino, 1952. — Vol. 1, 2.

ТУРГЕНЕВ

Батюто А. И. И. С. Тургенев — романист. — Л., 1977.

Бердников Г. П. И. С. Тургенев. — М., 1951.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об И. С. Тургеневе: 1918—1967. — Л., 1970.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Н. В. И. С. Тургенев. — 3-е изд. — М., 1964.

Бродский Н. Л. И. С. Тургенев. — М., 1950.

Бялый Г. А. Тургенев и русский реализм. — М.; Л., 1962.

Бялый Г. А., *Муратов А. Б.* Тургенев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 Л., 1970.

Векслер И. И.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шестидесятых годов. — 2-е изд. — Л.; М., 1935.

Велчев В. Тургенев в Болгарии: (2-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 София, 1961.

Голубков В.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мастерство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 2-е изд. — М., 1960.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1852—1952): Сб. статей. — Орел, 1955.

Зильберштейн И. С. Разыскания о Тургеневе. — М., 1970.

Клеман М. К.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Л., 1936.

Клеман М. К.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 М.; Л., 1934.

Курляндская Г. Б. Метод и стиль Тургенева-романиста. — Тула, 1967.

Курляндская Г.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етод Тургенева-романиста. — Тула, 1972.

Мазон А. Париж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Пер. с фр. — М.; Л., 1931.

Маркович В. М.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и русский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XIX века (30—50-е годы). — Л., 1982.

Маркович В. М. Человек в романах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 Л., 1975.
Новиков И. Тургенев — художник слова. — М., 1954.
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 Д. Н. И. С. Тургенев. — М.; Пг., 1923. — (Собр. соч.; Т. 2).
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 Д. Н. Этюды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 2-е изд. — СПб., 1904.
Петров С. М.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2-е изд. — М., 1968.
Пустовойт П. Г. Роман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Отцы и дети» и идейная борьба 6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 2-е изд. — М., 1965.
Пустовойт П. Г. И. С. Тургенев — художник слова. — М., 1987.
Роман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Отцы и дети» в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е. — Л., 1988.
Сакулин П. Н. На грани двух культур: И. С. Тургенев. — М., 1918.
Творчество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Сб. статей. — М., 1959.
И. С. Тургенев. — М., 1964.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73, кн. 1—2).
Тургене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ы к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и писем. — М.; Л., 1964—1969. — Т. 1—5.
Цейтлин А. Г. Мастерство Тургенева-романиста. — М., 1958.
Шаталов С. Е. 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 М., 1969.
Freeborn R. Turgenev: the novelist's novelist. L., 1960.
Granjard H. Ivan Tourguénev et les courants politiques et sociaux de son temps. — P., 1954.
Magarshack D. Turgenev: A life. — L., 1954.
Peters J. U. Turgenevs «Zapiski ochotnika» innerhalb der očerk-Tradition derr 40-er Jahre: Zur Entwicklung des realistichsen Erzählens in Russland. — B., 1972.
Semczuk A. Ivan Turgieniev. — W-wa., 1970.
Yarmolinsky A. Turgenev: The man, his art and his age. — N. Y., 1959.

ГОНЧАРОВ

Алексеев А. Д.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И. А. Гончарова (1832—1964). — Л., 1968.
Алексеев А. Д.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И. А. Гончарова. — М.; Л., 1960.
Венгеров С. А. Гончаров. — СПб., 1911 — (Собр. соч.; Т. 5).
И. А. Гончаров. — М.; Л., 1935.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22—24).
Евгеньев-Максимов В. Е. И. А. Гончаров: Жизнь, личность, творчество. — М., 1925.
Ляцкий Е. А. Гончаров: Жизнь, личность, творчество: Критико-биогр. очерки. — 2-е изд. — СПб., 1912.
Мазон А.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И. А. Гончарова. — СПб., 1912.
Петрова Н. К. Творчество И. А. Гончарова. — М., 1979.
Пиксанов Н. К. Мастер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И. А. Гончаров. — Л., 1952.

Пиксанов Н. К. Роман Гончарова《Обрыв》в свет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 М.; Л., 1968.
Пруцков Н. И. Мастерство Гончарова-реалиста. — М; Л., 1962.
Рыбасов А. П. И. А. Гончаров. — М., 1957.
Утевский Л. С. Жизнь Гончарова. — М., 1931.
Цейтлин А. Г. И. А. Гончаров (1812—1891). — М., 1950.
Mazon A. Un maître du roman russe Ivan Gontcharov: 1812—1891. — P., 1914.
Russell M. Untersuchungen zur Theorie und Praxis I. A. Gončarov. — München, 1978.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60-х ГОДОВ

Вальбе Б. С. Помяловский. — М., 1936.
Ждановский Н. П. Реализм Помяловского: (Вопросы стиля). — М., 1960.
Мануйлова И. 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тиля Ф. М. Решетникова. — Чарджоу, 1961.
Семанова М. Л.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повести В. А. Слепцова《Трудное время》. — Л., 1974.
Силаев А. Лиры звон кандальный: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 И. Левитова. — Липецк, 1963.
Струков А. А. И. Левитов. — Липецк, 1960.
Филиппова К.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Повесть о писателе Ф. М. Решетникове. — Свердловск, 1952.
Ямпольский И. Г. Н. Г. Помяловский: 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М.; Л., 1968.

ОСТРОВСКИЙ
И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Анастасьев А. Н.《Гроза》Островского. — М., 1975.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об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м: 1847—1917/Сост. К. Д. Муратова. — Л., 1974.
Гроссман Л. П. Театр Сухово-Кобылина. — М.; Л., 1940.
Державин К. Н.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 М.; Л., 1950.
Долгов Н. Н.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 М; Пг., 1923.
Дубинская А. Островский. — М., 1951.
Дурылин С. Н.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Л., 1949.
Журавлева А. И.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 комедиограф. — М., 1981.
Зограф М. Н. Малый театр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 М., 1960.
Кашин Н. П. Этюды об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м. — М., 1912. — Т. 1, 2.
Клейнер И. М. Драматургия Сухово-Кабылина. — М., 1961.
Коган Л. Р.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 — М., 1953.
Костелянец Б. О.《Бесприданница》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 — 2-е изд., доп. — Л., 1982.
Кугель А. Р. Русские драматурги. — М., 1934.

Лакшин В. Я.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М., 1982.

Лебедев А. А. Драматург перед лицом критики: Вокруг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 и по поводу его. — М., 1974.

Лотман Л. М.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и русска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его времени. — М.; Л., 1961.

Милонов Н.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А. В. Сухово-Кобылина. — Тула, 1956.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 М., 1974.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88, кн. 1, 2).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драматург: Сб. статей к 6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 М., 1964.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театра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XIX—XX веков. — Л., 1974.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б. статей. — Кострома, 1974.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творчества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 Сб. статей. — Куйбышев, 1973.

Реализм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 и А. П. Чехова. — М., 1967.

Ревякин А. И. 《Гроза》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 — 3-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М., 1962.

Ревякин 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драматургии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М., 1974.

Ревякин А. И. Москва в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е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 — М., 1962.

Ревякин А. И.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М., 1949.

Ревякин А. И.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в Щелыкове. — 2-е изд., доп. — М., 1978.

Рудницкий К. А. В. Сухово-Кобылин: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1957.

Русские драматурги XVIII—XIX вв.: Моногр. очерки: В 3 т. — Л; М., 1962. — Т. 3.

Сахновский В. Г. Театр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 — М., 1919.

Уманская М.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60-х гг. XIX в. — Вольск, 1858.

Холодов Е. Г. Драматург на все времена. — М., 1975.

Холодов Е. Г. Мастерство Островского. — 2-е изд. — М., 1967.

Холодов Е. Г. Язык драмы: Экскурс в творческую лабораторию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 — М., 1976.

Штейн А. Л. Мастер русской драмы. — М., 1973.

Штейн А. Л. Три шедевра Островского: Пьесы 《Гроза》, 《Лес》 и 《Бесприданница》. — М., 1967.

Штейн А. Л. Уроки Островского: Из опыта рус. и сов. театра. — М., 1984.

Эфрос Н. Е.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 Пг., 1922.

Hoover M. L. Alexander Ostrovsky. — Boston, 1981.

Patouillet J. Ostrovski et son théatre de moeurs russes. — P., 1912.

Steltner Ulrich. Die kunstlerischen Funktionen der Sprache in den Dramen von A. N. Ostrovskij. — Giessen, 1978.

НЕКРАСОВ

Ашукин Н. С. Как работал Некрасов. — М., 1933.

Ашукин Н. С.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Н. А. Некрасова. — М.; Л., 1935.

Архипов В. А. Поэзия труда и борьбы. — М., 1973.

Гаркави А. М. Н. А. Некрасов в борьбе с царской цензурой. — Калининград, 1966.

Гин М. М. Н. А. Некрасов —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к. —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1957.

Гин М. М. О своеобразии реализма Некрасова. —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1966.

Гин М. М. От факта к образу и сюжету: О поэзии Н. А. Некрасова. — М., 1971.

Гин М. М., Успенский В. Некрасов — драматург и театральный критик. — Л.; М., 1958.

Груздев А. И. Поэма Н. А. Некрасова《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 — М.; Л., 1966.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 Л. М., Лавров В. М.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о Н. А. Некрасове: 1917—1952. — М.; Л., 1953.

Евгеньев-Максимов В. Е.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 А. Некрасова. — М., 1947—1952. — Т. 1—3.

Евгеньев-Максимов В. Е. Некрасов в кругу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Л., 1938.

Еголин А. М. Н. А. Некрасов и поэты-демократы 60—80-х годов XIX в. — М., 1960.

Жданов В. Жизнь Некрасова. — М., 1981.

Корман Б. О. Лирика Н. А. Некрасова. — Воронеж, 1964.

Кубиков И. Н.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поэме Некрасова《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 — М., 1933.

Н. А. Некрасов. — М., 1946—1949.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49/50, 51/52, 53/54).

Некрасо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 Ереван, 1972.

Некрас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 М.; Л., 1951—1988. — Т. 1—9.

Плахотишина В. Т. Поэма Некрасова《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 — Киев, 1956.

Прийма Ф. Я. Некрасов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Л., 1987.

Розанова Л. А. Поэма Н. А. Некрасова《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 Коммент. — Л., 1970.

Скатов Н. Н. Некрасов: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и продолжатели. Очерки. — М., 1986.

Степанов Н. Л. Н. А. Некрас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2-е изд. — М., 1971.

Твердохлебов И. Ю. Поэма Некрасова《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 — М., 1954.

Чуковский К. И. Мастерство Некрасова. — 4-е изд. — М., 1962.

Corbet Ch. Nekrasov l'homme et le poète. — P., 1948.

Dudek G. Die Herausbildung des kritischen Realismus in der frühen Lyrik N. A. Nekrasow's. — Leipzig, 1955.

ПОЭЗИЯ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Айзеншток И. Я. Поэт-демократ Л. Н. Трефолев. — Ярославль, 1954.

Благой Д. Д. Мир как красота: О《Вечерних огнях》А. Фета. — М., 1975.

Бородкин М. Поэтическ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Н. Майкова. — СПб., 1900.

Бухштаб Б. Я. Очерки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Фета. — Л., 1974.

Бялый Г. А. Поэты 1880—1890-х гг. — М.; Л., 1964.
Дарский Д. «Радость земли»: Исслед. лирики Фета. — М., 1915.
Жуков Д. А. Козьма Прутков и его друзья. — М., 1976.
Златковский М. Л. А. Н. Майков. — 2-е изд. — СПб., 1898.
Круглов А. В. Л. Н. Трефолев. — М., 1914.
Лагунов Л. И. Лирика Якова Полонского. — Ставрополь, 1974.
Лосев П. Песни поэта: И. З. Суриков. — Ярославль, 1966.
Озеров Л. А. А. Фет: О мастерстве поэта. — М., 1970.
Орлов П. А. Я. П. Полонский. — Рязань, 1961.
Памяти С. Д. Дрожжина. — Калинин, 1951.
Покровский В. И. Я. П. Полонский, его жизнь и сочинения: Сб. историко-лит. статей. — М., 1906.
Пустильник Л. С.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Н. Плещеева. 2-е изд. — М., 1988.
Скатов Н. Н. Поэты некрасовской школы. — Л., 1968.
Стафеев Г. И. Сердце полно вдохновенья: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К. Толстого. — Тула, 1973.
Стафеев Г. И. А. К. Толстой: 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 Брянск, 1969.
Сукиасова И. М. Язык и стиль пародий Козьмы Пруткова: (Лексико-стилист. анализ). — Тбилиси, 1961.
Федина В. С. А. А. Фет (Шеншин): Материалы 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 Пг., 1915.
Щуров И. А. А. Н. Плещее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Ярославль, 1977.
Ямпольский И. Середина века. — Л., 1974.
Gustafson R. The imagination of spring: The poetry of Afanasy Fet. — New Haven; L., 1966.
Lirondelle A. Le poéte Alexis Tolstoï. — P., 1912.
Monter B. H. Koz'ma Prutkov: The art of parody. — The Hague; Paris, 1972.

ГЛЕБ УСПЕНСКИЙ И НАРОДН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птекман О. В. Глеб Успенский. — М., 1922.
Буш В. В.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Гл. Успенского. — Л., 1927.
Глаголев Н. А. Г. И. Успенский. — М., 1953.
Глеб Успенский. — М., 1939. — («Летописи Гос. лит. музея»; Кн. 4).
Глеб Успен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М.; Л., 1938. — Т. 1.
Горячкина М. С.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роза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 М., 1970.
Кожевников С. Е.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Наумов: Очерк о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е.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52.
Маевская Т. П. Слово и подвиг: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С. М. Степняка-Кравчинского. —

Казань, 1968.

Михайлова С. Б. Глеб Успенский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 Л., 1987.

Осьмаков Н. В. Поэз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 М., 1961.

Петухов Е. В. Федоров-Омулевский: Очерк его жизн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 Томск, 1900.

Попова М. Г. А. О. Осипович-Новодворский: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 Казань, 1970.

Пруцков Н. И. Глеб Успенский. — Л., 1971.

Рябов И. А. Глеб Успенский. — М., 1954.

Соколов Н. И. Мастерство Г. И. Успенского. — Л., 1958.

Соколов Н.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 Л., 1968.

Соколов Н. И. Г. И. Успенский: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Л., 1968.

Спасибенко А. П. Писатели-народники. — М., 1968.

Таратута Е. А. С. М. Степняк-Кравчинский —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и писатель. — М., 1973.

Чешихин-Ветринский В. Г. И. Успенский. Биогр. очерк. — М., 1929.

Lothe J. Gleb Ivanovič Uspenskij et le populisme russe: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pensée et de la littérature populistes en Russie (1870—1890). — Leiden, 1963.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Базанова В. И. «Сказки» М. 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 М.; Л., 1966.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о М. Е. Салтыкове-Щедрине: 1918—1965/Сост. В. Н. Баскаков. — М.; Л., 1966.

Бушмин А. С. М. 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 Л., 1970.

Бушмин А. С.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Искусство сатиры. — М., 1976.

Бушмин А. С. Сказки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 2-е изд., дораб. — Л., 1976.

Бушмин А. С.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 Л., 1987.

Бушмин А. С. Эволюция сатиры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 Л., 1984.

Гиппиус В. В. Люди и куклы в сатире Салтыкова. — Пермь, 1927.

Горячкина М. С. Сатира Щедрина и рус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60—8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 М., 1977.

Григорьян К. Н. Роман М. 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 — М.; Л., 1962.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 Л. М.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о М. Е. Щедрине: 1848—1917. — М.; Л., 1961.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 Л. М., Лавров В. М. М. 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в печати. — Л., 1949.

Евгеньев-Максимов В. Е. В тисках реакции. — М.; Л., 1926.

Елина Е. Г. 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формы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М. 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 Саратов, 1981.

Жук А. Сатир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М. 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диллия». — Саратов, 1958.

Кирпотин В. Я. 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М., 1955.

Кирпотин В. Я.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 М., 1957.

Кривенко С. М. 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его жизнь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3-е изд. — Пг., 1914.

Лаврецкий А. Щедрин —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к. — М., 1935.

Макашин С. А.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Биография. — 2-е изд., доп. — М., 1951. — Т. 1.

Макашин С. А.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Середина пути, 1860—1870-е гг.: Биография. — М., 1984.

Макашин С. А.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на рубеже 1850—1860 годов: Биография. — М., 1972.

Мысляков В. А. Искусство сатирического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 Саратов, 1966.

Мысляков В. А.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и народниче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 Л., 1984.

Николаев Д. П. Сатира Щедрина и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гротеск. — М., 1977.

Николаев Д. П. Смех Щедрина: Очерки сати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 М., 1988.

Покусаев Е. И. «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 М. 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 М., 1975.

Покусаев Е. И. 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 2-е изд. — Л., 1977.

Покусаев Е.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сатира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 М., 1963.

Покусаев Е. И.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в шестидесятые годы. — Саратов, 1957.

Прозоров В. 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мышлении писателя-сатирика. — Саратов, 1965.

М. 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 М., 1933—1934.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11/12, 13/14).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1826—1976: Статьи. Материалы.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 Л., 1976.

Трофимов И. 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сатира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1967.

Трофимов И. Т. Сказки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 М., 1964.

Турков А. М. Ваш суровый друг: Повесть о М. Е. Салтыкове-Щедрине. — 4-е изд., доп. — М., 1988.

Турков А. М.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М., 1965.

Эльсберг Я. 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М., 1953.

Эльсберг Я. Е. Стиль Щедрина. — М., 1940.

Яковлев Н. В. «Пошехонская старина» М. 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Из наблюдений над работой писателя). — М., 1958.

Ivanof A. Le fiabe di Saltykov-Ščedrin. — Padova, 1964.

Kupferschmidt H. G. Saltykow-Stschedrin: Philosophisches Wollen und Schriftstellerische Tat. — Halle/S., 1958.

Rév M. Szaltikov-Scsedrin. — Bp., 1968.

Sanine K. Saltykov-Chtchédrine: Sa vie et ses oeuvres. — P., 1956.

Strelsky N. Saltykov and the Russian squire. — N. Y., 1940.

Vlasinova V. Satiraokřídlená fantazii: Ke stopadesátému výročí narození M. J. Saltykova-Šč edrina (1826—1889). — Pr., 1975.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Бахтин М. М. 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М., 1972.

Белик А. П.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образы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 М., 1974.

Белкин А. А. Читая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 Чехова. — М., 1973.

Бельчиков Н. Ф.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процессе петрашевцев. — М., 1971.

Бердяев Н. А. Миросозерцани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Прага, 1923.

Бурсов Б. И. Личность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Л., 1974.

Голосовкер Я. Э.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Кант: Размышления читателя над романом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и трактатом Канта «Критика чистого разума». — М., 1963.

Гроссман Л. П.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М., 1965.

Гроссман Л. П. Жизнь и труды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М.; Л., 1935.

Гроссман Л. П. Поэтик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М., 1925.

Гус М. С. Идеи и образы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2-е изд., доп. — М., 1971.

Днепров В. Д. Идеи, страсти, поступки: Из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опыт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Л., 1978.

Долинин А. Последние романы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Как создавались «Подросток» и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 М.; Л., 1963.

Достоевская А. Г.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искусства,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к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1846—1903). — СПб., 1906.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М., 1934, 1970, 1973.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15, 82, 86).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о нем. 1917—1965. — М., 1968.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Л., 1935—1988 — Т. 1—8.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его время. — Л., 1971.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Традиции, новаторство, мастерство: Сб. статей. — М., 1971.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художник и мыслитель: Сб. статей. — М., 1972.

Ермилов В. В.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М., 1956.

Жид А.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Л., 1935. — (Собр. соч., Т. 2).

Захаров В. Н. Система жанров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Типология и поэтика. — Л., 1985.

Зунделович Я. О. Романы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2-е изд. — Ташкент, 1963.

Карякин Ю. Самообман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а: Роман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 М., 1976.

Кашина Н. Человек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М., 1986.

Кирпотин В. Я.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1821—1859). — М., 1960.

Кирпотин В. Я.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шестидесятые годы. — М., 1966.

Кирпотин В. Я.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Белинский. — 2-е изд. , доп. — М. , 1976.

Кирпотин В. Я. Достоевский-художник: Этюд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М. , 1972.

Кирпотин В. Я. Молодой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М. , 1947.

Кирпотин В. Я.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е и крушение Родиона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а. — 4-е изд. — М. , 1986.

Кудрявцев Ю. Г. Бунт или религия: (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и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М. , 1969.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С. Толстой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СПб. , 1901—1902. — Ч. 1, 2.

Одиноков В. Г. Типология образов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системе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1.

Описание рукописей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М. , 1957.

Переверзев В. Ф. Гоголь.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М. , 1982.

Поспелов Г. Н. Творчество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М. , 1971.

Розанов В. В. Легенда о великом инквизиторе. — 3-е изд. — СПб. , 1906.

Розенблюм Л. М. Творческие дневн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М. , 1981.

Селезнев Ю. И. В мир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М. , 1980.

Соколов Н. А.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1903—1923) //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татьи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б. 2. Л. ; М. , 1924.

Туниманов В. А. Творчество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1854—1862. — Л. , 1980.

Фридлендер Г.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мир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 1979.

Фридлендер Г. М. Реализ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М. ; Л. , 1964.

Чирков Н. М. О стил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Идеи. Образы. — М. , 1967.

Чулков Г. И. Как работал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М. , 1939.

Шестов Л.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Нитше. — СПб. , 1903.

Шкловский В. Б. За и против: Заметки о Достоевском. — М. , 1957.

Этов В.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 1968.

Cantoni R. Crisi dell' nomo: (Il pensiero di Dostoevskij.) — Milano, 1948.

Hingley R. Dostoevsky. — N. G. , 1978.

Jackson R. L. Dostoevsky's undergraund man in Russian literature. — 's — Gr. , 1958.

Kaufmann W.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jevsky to Sartre. — Cleveland; N. Y. , 1968.

Lubac H. Le drame de l'himanisme athée. — 6 éd. — P. , 1959.

Masaryk T. G. Studie o F. M. Dostojevském. — Pr. , 1932.

Meier-Gräfe J. Dostojewski als Dichter. — B. , 1925.

Murry J. M. F. Dostoevsky. — L. 1924.

Natorp P. Dostoiewskis Bedeutung für die gegenwärtige Kulturkrisis. — Jena, 1923.

Nötzel K. Das Leben Dostojewskis. — Leipzig, 1925.

Simmons E. J. Dostoevski. — L. 1950.

Thiess F. Dostojewski: Realismus am Rande der Transzendens. — Stuttgart 1971.

Thürneysen E. Dostojewski. — München, 1939.

Vianu T. F. M. Dostoievski. — Buc., 1957.

ЛЕСКОВ

Волынский А. Л. Н. С. Лесков. — 2-е изд. — Пг., 1923.
Горелов А. А. Н. С. Лесков и народная культура. — Л., 1988.
Гроссман Л. П. Н. С. Лесков: Жизнь — творчество — поэтика. — М., 1945.
Другов Б. М. Н. С. Лесков: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 2-е изд. — М., 1961.
Евнин Ф. Н. С. Лесков. — М., 1945.
Лесков А. Н. Жизнь Николая Лескова: По его личным, семейным и несемейным записям и памятям. — М., 1954.
Лесков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Л., 1988.
Плещунов Н. С. Романы Лескова《Некуда》и《Соборяне》. — Баку, 1963.
Троицкий В. Ю. Лесков — художник. — М., 1974.
Фаресов А. И. Против течений: Н. С. Лесков. — СПб., 1904.
Kovalewsky P. N. S. Leskov, peintre méconnu de la vie nationale russe. — P., 1925.
Setschkareff W. N. S. Leskov: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 Wiesbaden, 1959.

ТОЛСТОЙ

Бабаев Э. Г. Роман и время:《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Л. Н. Толстого. — Тула, 1975.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о Л. Н. Толстом; 1917—1958/Сост. Н. Г. Шеляпина и др. — М., 1960.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о Л. Н. Толстом: 1959—1961. — М., 1965.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о Л. Н. Толстом: 1962—1967. — М., 1972.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о Л. Н. Толстом: 1968—1973. — М., 1978.
Билинкис Я. С.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Л. Н. Толстого. — Л., 1959.
Бирюков П. И. Биография Л. Н. Толстого. — М.; Пг., 1922—1923. — Т. 1—4.
Бочаров С. Г. Роман Л. Толстого《Война и мир》. — 3-е изд. — М., 1978.
Бурсов Б. И. Лев Толстой: Идейные искания и творческий метод, 1847—1862. — М., 1960.
Бурсов Б. И. Лев Толстой и русский роман. — М.; Л., 1963.
Бычков С. П. Л. Н. Толстой. — М., 1956.
Гринева И. Е.《Война и мир》Л. Н. Толстого: Заметки о мастерстве и стиле. — Тула, 1976.
Громов П. О стиле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Диалектика души》в《Войне и мире》. — Л., 1977.
Гудзий Н. К. Как работал Л. Толстой. — М., 1936.
Гудзий Н. К. Л. Н. Толстой. — 3-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 — М., 1960.
Гусев Н. Н.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Л. Н. Толстого: 1828—1890. — М., 1958.
Гусев Н. Н.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Л. Н. Толстого: 1891—1910. — М., 1960.

Гусев Н. Н. Л. Н. Толстой: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1828—1885. — М., 1954—1970. — Кн. 1—4.

Днепров В. Д. Искусство человековедения: искусство человековедения: Из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опыта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Л., 1985.

Ермилов В. В. Толстой-романист:《Война и мир》.《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Воскресение》. — М., 1965.

Жданов В. А. От《Анны Карениной》к《Воскресению》. — М., 1967.

Жданов В. А. Последние книги Л. Н. Толстого. — М., 1971.

Жданов В. А. Твор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Анны Каренино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наблюдения. — М., 1957.

Жданов В. А. Твор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мана Л. Н. Толстого《Воскресен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наблюдения. — М., 1960.

Зайденшнур Э. Е.《Война и мир》Л. Н. Толстого: Создание великой книги М., 1966.

Зайденшнур Э. Е., *Серебровская Е. С.* Описание рукописей статей Л. Н. Толстого. — М., 1961.

Камянов В. И. Поэтический мир эпоса: О романе Л. Толстого《Война и мир》. — М., 1978.

Ковалев В. А. О стил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ы Л. Н. Толстого. — М., 1960.

Краснов Г. В. Герой и народ: О романе Л. Толстого《Война и мир》. — М., 1964.

Купреянова Е. Н. Молодой Толстой. — Тула, 1956.

Купреянова Е. Н. Эстетика Л. Н. Толстого. — М.; Л., 1966.

Лакшин В. Я. Толстой и Чехов. — 2-е изд. — М., 1975.

Леонтьев К. Н. О романах графа Л. Н. Толстого: Анализ, стиль и веяние. — М., 1911.

Ломунов К. Н.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Л. Н. Толстого. — М., 1956.

Ломунов К. Н. Лев Толсто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 М., 1975.

Ломунов К. Н. Над страницами《Воскресения》. — М., 1979.

Ломунов К. Н. Эстетика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 М., 1972.

Мейлах Б. С. Уход и смерть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 — 2-е изд. — М.; Л., 1979.

Мотылева Т. Л.《Война и мир》за рубежом: Переводы. Критика. Влияние. — М., 1978.

Мотылева Т. Л. О мировом значении Л. Н. Толстого. — М., 1957.

Мышковская Л. М. Мастерство Л. Н. Толстого. — М., 1958.

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 Д. Н. Л. Н. Толстой. — М.; Пг., 1923. — (Собр. соч.; Т. 3).

Описание рукописе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Л. Н. Толстого. — М., 1955.

Прянишников Н. Е. Проза Л. Толстого. — Оренбург, 1959.

Родионов Н. С. Л. Н. Толстой в Москве. — М., 1958.

Роллан Р. Жизнь Толстого. — М., 1954. — (Собр. соч.; Т. 2).

Сабуров А. А.《Война и мир》Л. Н. Толстого: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 — М., 1959.

Семенов Л. П. Леонтьев и Л. Толстой. — М., 1914.

Спиридонов В. С. Л. Н. Толстой: Био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 М.; Л., 1933. — Т. 1: 1845—1870.

Л. Н. Толстой. — М., 1939—1965.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35/36, 37/38, 69, кн. 1, 2; 75, кн. 1, 2.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б. статей. — М., 1956—1959. — Вып. 1, 2.

Толстой — художник. — М., 1961.

Храпченко М. Б. Лев Толстой как художник. — 4-е изд. — М., 1978.

Чичерин А. В.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романа-эпопеи. — М., 1958.

Чичерин А. В. О языке и стиле романа-эпопеи《Война и мир》. — Львов, 1956.

Шифман А. И. Лев Толстой и Восток. — М., 1960.

Шкловский В. Б. Лев Толстой. — 2-е изд. — М., 1967.

Шкловский В. Б. Материал и стиль в романе Л. Толстого《Война и мир》. — М., 1928.

Эйхенбаум Б. М. Лев Толстой. — М.; Л., 1928—1931. — Кн. 1, 2.

Эйхенбаум Б. М. Лев Толстой: Семидесятые годы. — Л., 1974.

Яснополя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 Тула, 1955—1988. — Вып. 1—14.

Braun M. Tolstoy. — Göttingen, 1978.

Dolanský J. Mistry ruského realismi u nás. — Pr., 1960.

Du Bos Ch. Approximations. — P., 1965.

Gillès D. Tolstoï. — P., 1959.

Gourfinkel N. Tolstoï sans tolstoïsme, — P., 1946.

Greenwood E. B. Tolstoy: The comprehensive vision. — N. Y., 1975.

Lindstrom Thaïs S. Tolstoï en France. — P., 1952.

Ludwig N. L. N. Tolstoi. — Halle/Saale, 1960.

Markovitch M. J. J. Rousseau et Tolstoï. — P., 1928.

Maude A. The life of Tolstoy. — L., 1930. — Vol. 1.

Redpath T. Tolstoy. — 2nd ed. — L., 1969.

Simmons E. J. Leo Tolstoy. — N. Y., 1960. — Vol. 1, 2.

ЛИТЕРАТУРА 80-х — НАЧАЛА 90-х ГОДОВ

Боголюбов Е. А. Творчество Д. Н. Мамина-Сибиряка. — Пермь, 1958. — Вып. 1—4.

Бялый Г. А. Всеволод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аршин. — Л., 1969.

Бялый Г. А. Рус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конца XIX века. — Л., 1973.

Груздев А. И. Д. Н. Мамин-Сибиряк: Критико-биогр. очерк. — М., 1958.

Дергачев И. А. Д. Н. Мамин-Сибиряк: Личность. Творчество. — 2-е изд. доп. — Свердловск, 1981.

Костин Г. А. А. И. Эртель: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Воронеж, 1955.

Линин А. М. К истории буржуазного стиля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П. Д. Боборыкина). — Ростов н/Д., 1935.

Д. Н. Мамин-Сибиряк: Сто лет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1852—1952. — Свердловск, 1953.

Миронов Г. М. Поэт нетерпеливого созидания: Н. Г. Гарин-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Жизнь. Творчество.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М. , 1965.

Порудоминский Вл. Гаршин. — М. , 1962.

Спасибенко А. П. А. И. Эртель — писатель-восьмидесятник. — Алма-Ата, 1966.

Юдина И. М. Н. Г. Гарин-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Жизнь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Л. , 1969.

Якушин Н. И. По градам и весям: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П. В. Засодимского. — Вологда, 1965.

Гургулова М. Творчество на В. М. Гаршин. — С. , 1966.

РАЗВИТИЕ 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УКРАИ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ілецкий О. І. Зібрання праць: У 5 Т. — Т. 2: Українська література XIX — початку XX століття. — Київ, 1965.

Бернштейн М. Д. Журнал《Основа》і український літературний процес кінця 50—60-х років XIX ст. — Київ, 1959.

Бернштейн М. Д. Українська літературна критика 50—70-х років XIX ст. — Київ, 1959.

Вервес Г. Д. Иван Франко і питання українсько-польских літературно-суспільних взаєми. — Київ, 1957.

Власенко В. О. Художня майстерність І. С. Нечуя-Левицького. — Київ, 1969.

Возняк М. Велетень думки і праці: Шлях життя і творчості Івана Франка. — Київ, 1958.

Гольденберг Л. І. Бібліографічні джерела українського літературознавства: Путівник. — Київ, 1977.

Гонтар П. Українсько-чешські літературні зв"язки в XIX ст. — Київ, 1956.

Грицюта М. С. Селянство в українській дожовтневій літературі. — Київ, 1979.

Дей О. І. Словник українських псевдонімів і криптонімів (XVI—XX ст.). — Київ, 1969.

Дей О. І. Українська революцій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на журналістика: Проблема виникнення і становлення. — Київ, 1959.

Денисюк І. О. Розвиток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малої прози XIX — поч. XX ст. — Київ, 1981.

Дергач Б. А. Крилов і розвиток жанру байки в українській дожовтневій літературі. — Київ, 1977.

Дорошенко І. І. Іван Франко — літературний критик. — Львів, 1966.

Журавська І. Ю. Іван Франко і зарубіжні літератури. — Київ, 1961.

Засенко О. Є Марко Вовчок: Життя, творчість, місце в історії літератури. —

Київ，1964.

Заславський Д.，*Романченко І.* Михайло Драгоманов：Життя і літературно-дослідницька діяльність. — Київ，1964.

Иваньо И. 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на Украине. — М.，1981.

Исаков С. Г. Сквозь годы и расстояния：Из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Эстонии с Украиной，Грузией и Латвией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 — Таллинн，1969.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літератури：У 8 т. — Київ，1969. — Т. 3：Література 40—60-х років XIX ст.；Т. 4，кн. 1，2：Література 70—90-х років XIX ст.

Калениченко Н. Л. Українська література XIX ст.：Напрями，течії. — Київ，1977.

Каспрук А. А. Українська поема кінця XIX — початку XX ст.：Ідеї，теми，проблеми жанру. — Київ，1973.

Кирилюк Є. П. Українські письменники — революційні демократи і літератури західних і південних слов||янських народів у XIX ст. — Київ，1963.

Колесник П. Й. Син народу：Життя і творчість Івана Франка. — Київ，1957.

Комишанченко М. Літературна дискусія 1873—1878 рр. на Україні：Ідейно-естетична боротьба в українській літературній критиці цього часу. — Київ，1958.

Крутікова Н. Є Гоголь і українська література（30—80 рр. XIX ст.）. — Київ，1957.

Левченко Т. Випробування історією：（Український дожовтневий роман）. — Київ，1970.

Микитась В. Л. Галузка могутнього дерева：Літ. нарис. — Ужгород，1971.

Міщук Р. С. Українська оповідна проза 50—60-х років XIX ст. — Київ，1978.

Мороз З. Проблема конфлікту в драматургії：Нариси з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ської реалістичної драми другої половини XIX ст. — Київ，1961.

Мольнар М.，*Мундяк М.* Зв″язки Івана Франка з чехами і словаками. — Братислава，1957.

Пархоменко М. Иван Франко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1954.

Пархоменко М.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Ивана Франко. — М.，1966.

Пивоваров М. Проза Панаса Мирного 70-х років. — Київ，1959.

Поважна В. М. Розвиток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літературної критики у 80—90-х роках XIX ст.：До проблеми критеріїв і методу. — Київ，1973.

Пыпин А. Н.，*Спасович В. Д.* История славян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В 2 т. — 2-е изд. — СПб.，1879. — Т. 1.

Сахновский-Панкеев В. А. І. Карпенко-Карий і російська культура. — Кигв，1969.

Сиваченко М. Є Анатолий Свидницький і зарождення соціального роману в українській літературі. — Київ，1962.

Сиваченко М. Є Історія створення роману《Хіба ревуть воли，як ясла повні?》：Із творчої лабораторії Панаса Мирного і Івана Білика. — Київ，1957.

Сиваченко М. Є Студії над гуморесками Степана Руданського. — Київ，1979.

Сидоренко Г. К. Від класичних нормативів до верлібру. — Київ，1980.

Стебун И. М. Концепция реализма в эстетике Ивана Франко. — М.，1981.

Стеценко Л. Ф. І. Карпенко-Карий (І. К. Тобілевич): Життя і творча діяльність. — Київ, 1957.

Франко І. Нарис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сько-руської літератури до 1890 р. — Львів, 1910.

Українська література в російській критиці кінця XIX — початку XX ст. — Київ, 1980.

Чалий Д. В. Епопея в російській і українській літературах XIX ст. — Київ, 1980.

Шаховський С. Т. Майстерність Івана Франка. — Київ, 1956.

Шевчук В. І. Основні проблеми українсько-чеських літературних зв″язків XIX—XX ст. — Київ, 1963.

Шпилевая О. В. Головні етапи українсько-болгарських літературних зв″язків XIX—XX ст. — Київ, 1963.

Янковський Ю. З. Животворниі зв″язки: Іван Франко і російська реалістична проза. — Київ, 1968.

Krhoun M. Básnické dilo Jurije Fedkovyče. — Brno, 1983.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іч С. Пуцявіны роднаго слова: Праблемы развіцця беларускай літаратуры і друку другой паловы XIX — пачатку XX стагоддзя. — Мінск, 1971.

Александровіч С. Старонкі братняй дружбы. — Мінск, 1960.

Барысенка В. В. Францішак Багушэвіч і праблема рэалізму ў беларускай літаратуры XIX стагоддзя. — Мінск 1957.

Гісторыя беларускай дакастрычніцкай літаратуры: У 2 т. — Мінск, 1969. — Т. 2: Літаратура XIX — пачатку XX ст.

Грынчык М. М. Шляхі беларускага вершаскладання. — Мінск, 1963.

Дорошевич Э., *Конон Вл.*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Белоруссии. — М., 1972.

История белорусской дооктябрь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инск, 1977.

Каваленка В. А. Вытокі. Уплывы. Паскоранасць: Развіццё беларускай літаратуры XIX—XX ст. — Мінск, 1975.

Каваленка В. А. Міфа-паэтычныя матывы ў беларускай літаратуры. — Мінск, 1981.

Казбярук У. М. Ступені росту: Беларуская літаратура канца XIX — пачатку XX ст. і традыцыі польскіх пісьменнікаў. — Мінск, 1974.

Кісялёў Г. Героі і музы: Гісторыка-літ. нарысы. — Мінск, 1982.

Кісялёў Г. Сейбіты вечнага: Артыкулы пра беларускіх пісьменнікаў і дзеячоў рэвалюцыйнага руху 1863 года. — Мінск, 1963.

Клімковіч Міхась. Аб жыватворчым уплыве рускай літаратуры на беларускую літаратуру. — Мінск, 1955.

Лазарук М. А. Беларуская паэма ў другой палавіне XIX — пачатку XX стагоддзя. —

Мінск, 1970.

Ларчанка М. Па шляху рэалізму. — Мінск, 1959.

Ларчанка М. Славянская супольнасць. — Мінск, 1963.

Лойка А. А. Гісторыя беларускай літаратуры: Дакастрычніцкі перыяд. — Мінск, 1977. — Ч. 1.

Лойка А. А., *Перкін Н. С.* Беларуска-польскія літаратурныя ўзаемасувязі ў XIX ст. — Мінск, 1963.

Майхрович А. С. Белорусск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демократы: Важнейшие аспекты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 Минск, 1977.

Майхровіч С. К. В. І. Дунін-Марцінкевіч. — Мінск, 1955.

Майхрович С. К.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Ф. Богушевича. — Минск, 1961.

Майхровіч С. К. Нарысы беларускай літаратуры XIX стагоддзя. — 2-е выд. — Мінск, 1959.

Майхровіч С. К. Янка Лучына: Жыццё і творчасць. — Мінск, 1952.

Науменка І. Пісьменнікі дэмакраты. — Мінск, 1967. Пачынальнікі: З гісторыка-літ. матэрыялаў XIX ст. — Мінск, 1977.

Семашкевіч Р. М. Беларускі літаратурна-грамадскі рух у Пецярбурзе (канец XIX — пачаток XX ст.). — Мінск, 1971.

Семяновіч А. А. Беларуская драматургія: Дакастрычніцкі перыяд. — Мінск, 1961.

Смирнов А. Кастусь Калиновский. — Минск, 1963.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РОДОВ ПРИБАЛТИКИ

1. ЛИТОВ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стория литов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Вильнюс, 1977.

Кубилюс В., *Настопка К.* Поль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и балтий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 Вильнюс, 1973.

Lietuvių literatūros istorija. — Vilnius, 1958. — T. 2: Kapitalismo epocha.

Lietuvių literatūros istorija. — Vilnius, 1979.

Kostkevičiute I. Kritinis realismas lietuviu prozoje. — Vilnius, 1956.

Merkys V. Nelegalioji lietuvių spauda kapitalismo laikotarpiu. — Vilnius, 1975.

Pranskus B. Pranas Vaičaitis. — Vilnius, 1956.

Sprindis A. Lietuvių literatūrine kritika. — Vilnius, 1957.

Sprindis A. Povilas Višinskis. — Vilnius, 1978.

Umbrasas K. Žemaite. — Vilnius, 1975.

Vanagas V. Realismas lietuvių literatūroje. — Vilnius, 1978.

Zaborskaite V. Maironis. — Vilnius, 1968.

Zalatorius A. Lietuvių apsakumo raida ir poetika. — Vilnius, 1971.

2. ЛАТЫШ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авере В., *Мацков Г.* Латышско-рус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 Рига, 1965. История латыш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2 т. — Рига, 1971. — Т. 1: До 1917 г.

Apinis A. Latviešu grāmatniecība. — Rīga, 1977.

Kiršentale I. Latviešu romāns. — Rīga, 1979.

Knope E. Latviešu literatūras kritika 19. gadsimta otrajā pusē. — Rīga, 1962.

Latviešu literatūra PSRS tautu saimē. — Rīga, 1967.

Latviešu literatūras vēsture: Jn 6 sēj. — Rīga, 1963. Sej. — 2.

Latviešu un Rietumeiropas literatūra: (Literārie sakari). — Riga, 1971.

Libermanis G. Jaunlatvieši. — Rīga, 1957.

Valeinis V. Latviešu lirikas vēsture. — Rīga, 1976.

3. ЭСТО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саков С. Г. Сквозь годы и расстояния: Из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Эстонии с Украиной, Грузией и Латвией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 Таллинн, 1969.

Alttoa V. Eesti kritika 19. sajandil. — Tallinn, 1977.

Annist A. Fridrich Reinhold Kreutzwaldi muinasjuttude algupära ja kunstiline laad. — Tallinn, 1966.

Annist A. F. R. Kreutzwaldi 《Kalevipoeg》. — Tartu, 1934. Ⅰ: 《Kalevipoeg》 eesti rahvaluules.

Annist A. F. R. Kreutzwaldi 《Kalevipoeg》. — Tartu, 1936. Ⅱ: 《Kalevipoja》 saamislugu.

Annist A. F. R. Kreutzwaldi 《Kalevipoeg》. — Tartu, 1944. Ⅲ, 1: 《Kalevipoeg》 kui kunstiteos.

Eesti kirjanduse ajalugu. — Tallinn, 1966. Ⅱ: XIX sajandi teine pool.

Issakov S. Archiivide peidikuist. — Tallinn, 1983.

Jansen E. C. R. Jakobsoni 《Sakala》. — Tallinn, 1971.

Jansen E., *Poldmäe*, *R.* Carl Robert Jakobson. — Tallinn, 1968.

Nirk E. Estonian Literature: Historical Survey with Biobibliographical Appendix. — Tallinn, 1970.

Nirk E. Kreutzwald j a eesti rahvusliku kirjanduse algus. — Tallinn, 1968.

Priidel E. Ado Reinvald: Luuletaja ja talupoeg. — Tallinn, 1965.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МОЛДАВ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РОССИИ

Гацак В. М. Фольклор и молдавско-рус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е связи. — М., 1975.

Корбу Х. Г.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овой молдав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проблема творческого метода: (1840—1960). — Кишинев, 1976.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лдовеняскэ ши фольклорул. — Кишинэу, 1982.

Молдавско-рус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 Кишинев, 1979.

Попович И. Ион Крянге ши басмул к ест-слав. — Кишинэу, 1967.

Попович Н. В. Молдавский фольклор на страницах русской прессы XIX века. — Кишинев, 1982.

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ий молдовенешть. — Кишинэу, 1988. — Вол. 2.

Глава пятая
ЕВРЕ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инер М. Менделе ун зайн цейт. — М., 1939.

Винер М. Цу дер гешихте фун дер идишер литературн XIX — йорхундерт. — Киев, 1940.

Винер М. Этюден вегн Менделе ин ди зехцикер ун зибецикер йорн. — Москва, 1934.

Гурнштейн А. Шолом-Алейхем: Критико-биогр. очерк. — М., 1939.

Нотович М. Ицхок-Иоейл Линецкий. — М., 1939.

Ойслендер Н. Грунтштрихн фун идишн реализм. — Киев, 1919.

Ременик Г. Шолом-Алейхем: Критико-биогр. очерк. — М., 1963.

Шолом-Алейхем — писатель и человек. — М., 1984.

Эрик М. Этюдн цу дер гешихте фун дер гашколе: (1789—1881). — Минск, 1934.

Глава шеста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ПОВОЛЖЬЯ И ПРИУРАЛЬЯ

Ахметгалеева Я. С.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тюркоязычного памятника «Кисекбаш китабы». — М., 1979.

Бикмохэммэт. Р. Поэзиябезнен сулмас чэчэклэрэ. — Казан, 1960.

Валеев Ф. Х. Древнее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е искусство Среднего Поволжья. — Йошкар-Ола, 1975.

Валидов Дж.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образованности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атар (до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 — М.; Л., 1923.

Васин К.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тво и реализм. — Йошкар-Ола, 1976.

Воронин И. Д.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деятел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еста в Мордовии. — Саранск, 1976.

Гайнуллин М. Х. XIX гасыр татар эдэбияты. — Казан, 1968.

Госман Х. Борынги торки-татар эдэбиятынин чыгынаклары. — Казан, 1981.

Госман Х. Шигырь тозелеше. — Казан, 1975.

Закиев М. З. Татар халкы теленен барлыкка килуе. — Қазан, 1977.
И. Я. Яковлев и его школа. — Чебоксары, 1971.
Қаримуллин А. У истоков татарской книги. — Қазань, 1971.
Киреев А. Н. Башкир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 — Уфа, 1970.
Мэржани Ш. Элкыйсем эл-эууэл мин китабы Мостафэдел-эхбар фи эхвали Қазан вэ Болгар. — Қазан, 1897.
Миннегулов Х. Ю. Сэйф Сараи. — Қазан, 1976.
Насыйри К. Мэжмэгыл эхбар. — Қазан, 1895.
Нафигов Р.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передовой татар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 Қазань, 1964.
Рахим Г., *Газиз Г.* Татар эдэбияты тарихы. — Қазан, 1923.
Сагди Г. Символизм турында. — М., 1932.
Сагди Г. Татар эдэбияты тарихы. — Қазан, 1926.
Сироткин М. Я. Очерки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чуваш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Чебоксары, 1976.
Татар эдэбияты тарихы: Алты томда. — Қазан, 1984. — Т. 1.
Татар эдэбияты тарихына материаллар. — Қазан, 1967.
Усманов Х. Древние истоки тюркского стиха. — Қазан, 1984.
Фахретдин Р. Асар. — Оренбург, 1904.
Харисов А.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башкир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Уфа, 1973.
Черапкин Н. И. В братском содружестве. — Саранск, 1969.
Шахматов А. А. Мордовский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 СПб., 1910.

Глава седьма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НОГО ҚАВҚАЗА И ДАГЕСТАНА

Абакарова Ф. О. Батырай. — Махачкала, 1977.
Агаев А. Етим Эмин. — Махачкала, 1958.
Акавов З. Н.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истоки: Опыт изучения твор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 Османова и проблема новаторства в кумыкской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Махачкала, 1978.
Алиев С. М.-С. Жизненный и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Йырчи Қазака. — Махачкала, 1980.
Алиева С. Г. Непогашенная звезда: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Омарлы Батырая. — Махачкала, 1974.
Габараев С. Ш. Инал Қануков: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 Сталинири, 1960.
Габараев С. Ш.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Қоста Хетагурова. — М., 1959.
Джусойты Н. Г. Қоста Хетагуров. — Сталинири, 1958.
Йырчи Қазак — классик дагеста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б. статей). — Махачкала, 1982.
Корзун В. Б. Қоста Хетагуров: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1957.

Кумыков Т. Х. Жизн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Л. М. Кодзокова. — Нальчик, 1962.
Кумыков Т. Х. Кази Атажукин: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Нальчик, 1969.
Магомедов З. А.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Батырая. — Махачкала, 1971.
Расулов М. Р. О. Батырай. С. Курбан. Р. Нуров: Вопросы мастерства и новаторских тенденций. — Махачкала, 1971.
Семенов Л. П. Чах Ахриев. — Владикавказ, 1928.
Суменова З. Н. Инал Канук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1972.
Тедети Р. К. Жизнь Коста Хетагурова. — Цхинвали, 1979.
Хашхожева Р. Х. Адыгские просветител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 Нальчик, 1983.
Цаллаев Х. Г.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Афанасия Гасиева. —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1966.
Юсупова Ч. С. Алм-Гаджи из Инхо. — Махачкала, 1977.
Яндаров А. Д. Ингушский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 Чах Ахриев. — Грозный, 1968.

Глава восьма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ЗАКАВКАЗЬЯ

1. ГРУЗИ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бзианидзе Г. Н. Акакий Церетели: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Тбилиси, 1959.
Асатиани Л. Цховреба Акаки Церетлиса. — Тбилиси, 1959.
Гамезардашвили Д. 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в грузи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Тбилиси, 1959.
Джибладзе Г. Н. Важа Пшавела: (1861—1915). — Тбилиси, 1961.
Джибладзе Г. Н. Илья Чавчавадзе. — Тбилиси, 1966. — На груз. яз.
Зандукели М. З. Ахали Картул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3 т. — Тбилиси, 1954—1955. — Т. 2, 3.
Зандукели М. З. Важа Пшавела. — Тбилиси, 1953. — На груз. яз.
Ингороква П. Ахали картули литературис пудземдебельни. — Тбилиси, 1975.
Картули литературис историа еквс томад. — Тбилиси, 1969. — Т. 4.
Кикнадзе Г. Важа Пшавелас пшемокмедеба. Тбилиси, 1957.
Кикодзе Г. Рчеули тхжулэбани. — Тбилиси, 1965. — Т. 3: XIX саукунис картуки литературис историидан.
Котетишвили В. Картули литературис историа: XIX саукунидан дгевангланде. — Тбилиси, 1925—1927. — Кн. 2, 3.
Маргвелашвили Г. Акакий Церетели. — Тбилиси, 1960.
Натадзе Н. Важа Пшавела. — Тбилиси, 1966.
Николадзе А. К. Русско-грузин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 Тбилиси, 1965.
Ратиани П. Рчеули нацереби. — Тбилиси, 1985. — Т. 3.

Ратиани П. Тергдалеулта революциури могвацеобис историидан. — Тбилиси, 1962.

Текелидзе П. Акаки Церетели. — Тбилиси, 1985. На груз. яз.

Хаханов А. С.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рузинск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 М., 1906. — Вып. 4: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 в.

Чалая. А. Георги Церетели. — Тбилиси, 1967. На груз.

2. АРМЯ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бов Г. Габриэл Сундукян. — Ереван, 1953.

Ай нор граканутян патмутюн. — Ереван, 1961—1979. — Т. 1—5.

Алексанян С. Ай лусаворакан реализм. — Ереван, 1980.

Армиарян А. Патмутюн 19-дару туркио айоц граканутян. — Каир, 1949.

Асатрян А. Арутюн Свасян. — Ереван, 1976.

Даниелян К. Ай гюхагрутюны XIX дарум. — Ереван, 1973.

Даронян С. Микаэл Налбандян: Кянк ев горцнеутюны. — Ереван, 1979.

Даронян С. М. Налбандян,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 Ереван, 1975.

Джрбашян Э. Микаэл Налбандян ев ардиаканутюны. — Ереван, 1984.

Иоаннисян А. Налбандян ев ир аманакы. — Ереван, 1955—1956. — Кн. 1, 2.

Каринян А. Акнаркнер ай парберакан мамули патмутян. — Ереван, 1956—1960. — Т. 1, 2.

Лео. Русаайоц граканутюны. — 2-е изд. — Ереван, 1928.

Маркарян А. Тигран Камсаракан: Кянкн ев стехцагорцутюны. — Ереван, 1964.

Нанумян Р. Степанос Назарян кянк ев горцунеутюнн. — Ереван, 1978.

Овнан Г. Рус-ай гракан каперн XIX—XX дарерум. — Ереван, 1960—1961. — Кн. 1, 2.

Сагинян М. Рафаэл Патканян: Кянк ев горц. — Ереван, 1980.

Саринян С. Кнадатакан реализми скзбнаворумы ай граканутян меч. — Ереван, 1955.

Саринян С. Раффи. — Ереван, 1957.

Саринян С. Айкакан романтизм. — Ереван, 1966.

Саринян С. Мурацан: Типабанутюны, этикан, памтумян пилисопаютюнн. — Ереван, 1976.

Степанан Г. Акнаркнер аревмтаай патмутян. — Ереван, 1962. — Т. 1.

Тамразян Г. Ширванзаде. — М., 1967.

Терзибашян В. Ай драматургиан патмутюн. — Ереван, 1964. — Т. 2.

Терзибашян В. Петрос Дурян. — Ереван, 1959.

Тертерян А. Ай классикнер. — Ереван, 1945.

Тертерян А. Перч Прошян. — Ереван, 1955.

Тертерян А. Ширванзадеи гракан типери анрагитаран. — Ереван, 1959.

Чопанян А. Петрос Дурян: Кенсагракан ев кнадатакан усумнасирутюн. — Тифлис, 1894.

Шарурян А. Петрос Дурян: Кянкн ев горцн. — Ереван, 1972.

3.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зәрбајчан әдәбијјаты тарихи. — Бакы, 1960. — Ч. 2: XIX әсрин әввәлләриндән 1917-чи илә гәдәр.

Алиева А. Н. Везиров 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ий театр. — Баку, 1967.

Алиева А. М. Ф. Ахундов и театр. — Баку, 1966.

Ахундов Б. Ю.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М. Ф. Ахундова и Гасанбека Зардаби. — Баку, 1961.

Ахундов Н. Азәрбајчан мәтбуатынын илки: 《Әкинчн》 гәзәтинин 100 иллји мҮнасибәтилә. — Бакы, 1976.

Гаджиев А. Реализм в литературах Советского Востока. — Баку, 1978.

Гарајев Ј. Реалист сәнәт вә һәгигәт: Азәрбајчан реализминин мәрһәләләри. — Бакы, 1980.

Гасымзадә Ф. Н. Б. Вәзиров. — Бакы, 1954.

Гасымзадә Ф. Мирзә Фәтәли Ахундовун һәјат вә јарадычылыгы. — Бакы, 1962.

Геюшев З. Б.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Г. Зардаби. — Баку, 1962.

Геюшев З. Б. Э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е. — Баку, 1968.

Гурбанов Ш. Пушкин вә Азәрбајчан поезијасы. — Бакы, 1956.

Гусейнов Г. Из истор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и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мысли 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е XIX века. — Баку, 1949.

Дадаш-заде М. А.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1979.

Джафаров Дж.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ий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атр. — Баку, 1962.

Джафаров Дж. М. Ф. Ахундов: Критико-биогр. очерк. — М., 1962.

Джафаров Дж.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М. Ф. Ахундова. — Баку, 1956.

Зәјналов А. А. 《Қәшкүл дә әдәбијјат мәсәләләри. — Бакы, 1978.

Ибрагимов А. Описание архива М. Ф. Ахундова — Баку, 1962.

Қасимзаде Ф. Наджафбек Везиров. — Баку, 1958.

Қасимзаде Ф.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 Баку, 1962.

Қасумов М. М. М. Ф. Ахундов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 в XIX в. — Баку, 1954.

Кејүшов З. Б. Азербајчан маарифчиләринин етик көрүшләри: (XIX эсрин II арысында). — Бакы, 1960.

Көчәрли Ф. Мирзә Фәтәли Ахундов. — Тифлис, 1911.

Көчәрли Ф. Азәрбајчан әдәбијјаты тарихи материаллары: Ики чилдда. — Бакы, 1925.

Көчәрли Ф. Сечилмиш әсәрләри. — Бакы, 1963.

Көчәрли Ф. Азарбајчан әдәбијјаты. Ики чилдә. — Бакы, 1978—1981.

Қлимович Л. Из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 Советского Востока. — М., 1959.

Курбанов Ш. Пушкин 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 — Баку, 1959.

Курбанов Ш.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русских связей в XIX веке. — М., 1969.

Лерман А. Н. М. Ф. Ахундов в русской печат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1837—1862. — Баку, 1962.

Мамедов Н. Дж. Реализм М. Ф. Ахундова. — Баку, 1982.

Мамедов Н. Дж.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Ф. Ахундова. — Баку, 1962.

Мамедов Ш. Ф. Мирза Фатали Ахундов. — М., 1978.

Мамедов Ш. Ф.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М. Ф. Ахундова. — М., 1962.

Мамедов Ш. Ф.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Гасан-бека Меликова Зардаби. — М., 1960.

Меликова 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М. Ф. Ахундова. — Баку, 1958.

Мәммәдзадә һ. Мирзә Фәтәли Ахундов вә Шәрг. — Бакы, 1971.

Мәммәдов К. Нәчәфбәј Вәзиров. — Бакы, 1963.

Мәммәдов К. XIX әср Азәрбајчан ше'риндә сатира. — Бакы, 1975.

Мирахмедов А. М. Ф. Ахундов (1812—1878). — Баку, 1953.

Мирбағыров К. Сејид Әзим Ширвани. — Бакы, 1959.

Мирза Фәтәли Ахундов: (Мәгаләләр мәчмуси). — Бакы, 1962.

Мирзоева Ш.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М. Ф. Ахундова. — Баку, 1962.

Мустафаев 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М. Ф. Ахундова. Баку, 1962.

Рафили М. М. Ф. Ахундов. — М., 1959.

Рафили М. М. Ф. Ахунд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Баку, 1957.

Рзаев А. К. Правовые взгляды М. Ф. Ахундова. — Баку, 1968.

Рзаев А. К. М. Ф. Ахунд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М. Ф. Ахундова). — М., 1980.

Рүстәмов И. һәсәнбәј Зәрдаби. — Бакы, 1969.

Садыгов М.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поль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XIX века. — М., 1975.

Султанлы Ә. Азәрбајчан драматуркијасынын инкишаф тарихиндән. — Бакы, 1964.

Чусејнов С. С. Ә. Ширванинин јарадычлыг јол. — Бакы, 1977.

Чәфәров М. Ч. М. Ф. Ахундовун әдәби-тәнгиди кәрүшләри. — Бакы, 1950.

Чәфәров М. Ч. Азәрбајчан драм театры: (1873—1941). — Бакы, 1974.

Әфәндијев һ. М. Ф. Ахундовун нәсри. — Бакы, 1954.

Әфәндијев һ. М. Ф. Ахундов реалист-сатирик нәсринин давамчылары. — Бакы, 1974.

Әһмәдов Ә. Бејүк Азәрбајчан мүтәфәккири. — Бакы, 1962.

Глава девят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1. КАЗАХ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байдын емірі мен творчествосы. — Алматы, 1954.

Ауэзов М. О. Мысли разных лет: По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 тропам. — Алма-Ата, 1961.

Ахметов З. А. Казахское стихосложение. — Алма-Ата, 1964.

Ахметов З. А. Лермонтов и Абай. — Алма-Ата, 1954.

Ахметов З. А. О языке казахской поэзии. — Алма-Ата, 1970.

Ахметов З. А.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традиции казах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Алма-Ата, 1978.

Дербисалин А. Ж. Ибрай Алтынсарин: О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 Алма-Ата, 1965.

Дуйсенбаев Ы. Гасырлар сыры. — Алматы, 1970.

Жумалиев Қ. Қазак әдебиеті тарихының мәселелері және Абай позиясының тілі. — Алматы, 1960.

Жумалиев Қ. XVIII—XIX гасырлардагы казак эдебиеті. — Алматы, 1967.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3 т. — Алма-Ата, 1979. — Т. 2.

Қазак эдэбиетінін тарихы. — Алматы, 1961. — Т. 2, кн. 1.

Қазак, эдебиеті тарихынын мэселелер. — Алматы, 1976.

Кереева-Канафиева Қ. Ш. Русско-казах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Алма-Ата, 1975.

Нуркатов А. Абайдың акындык дәстурі. — Алматы, 1966.

Сатпаева Ш. Қ. Қазахск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XIX и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 — Алма-Ата, 1972.

Силъченко М. С. Творчес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Абая. — Алма-Ата, 1957.

2. ТАДЖИК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ирзозажа Х. М. Шамсиддин Шохин. — Сталинобод, 1956.

Неъматзода Т. Возех: Мухаррири масъул Ш. Хусейнзода. — Душанбе, 1967.

Раджабов З. Россия и таджик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нца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 Сталинабад, 1959.

Рачабов З. Аз таърихи афкори часъияти-сиёсии халки точик дар нимаи дуйуми асри XIX ва аввали асри XX. — Сталинобод, 1959.

Рачабов З. Маорифпарвар Ахмади Дониш. — Душанбе, 1964.

Хади-Заде Р. Источники к изучению таджик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 Сталинабад, 1956.

Ходизода Р. Адабиёти точик дар нимаи дуввуми асри XIX. — Душанбе, 1968. — Қисми аввал.

Ходизода Р. Ахмади Дониш. — Душанбе, 1976.

Ходизода Р. Шохин. — Душанбе, 1974.

3. ТУРКМЕ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ннагылыч Мәтәжи: Шахыр хакында ылмы докладлар, макалалар ве хабарлар. — Ашгабат, 1976.

Марадов А. Рус-туркмен эдеби арагатнашынкларының тарахындан очерклер. — Ашгабат, 1968.

Нуралиев Д. Туркмен эдебиятнын достклары. — Ашгабат, 1977.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в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е. — Ашхабад, 1970.

Самойлович А. Н.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туркме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Л., 1929. — Т. 1.

Сосонкин И. Из истории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в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е: (Махтумкули, Кемине, Молланепес). — Ашхабад, 1969.

Туркмен эдебиятының тарыхы. — Ашгабат, 1978. — Т. 3, кит. 2.

Хыдыров Т.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да XX асырын башларында прогрессив-демократик пикириң осуши. — Ашгабат, 1971.

Чарыгулыева А. Мэтэжиның поэзиясы. — Ашгабат, 1975.

4. УЗБЕК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бдугафуров А. Зокиржон Фуркат: (Хаёти ва ижоди). — Тошкент, 1977.

Абдугафуров А. Мукимий сатираси. — Тошкент, 1976.

Абдугафуров А. Ўзбек демократик адабиётида сатира. — Тошкент, 1961.

Абдугафуров А. Эрк ва эзгулик куйчилари. — Тошкент, 1979.

Алимджан А. Мукимий Мухаммад Амин: Хаёти ва ижоди. — Тошкент, 1953.

Арзыбеков Р. Шавкий Қаттакургоний ва унинг адабий мухити. — Самарканд, 1963.

Валиходжаев Б. Ўзбек эпик поэзияси тарихидан. — Тошкент, 1974.

Вахидов Х. Фуркат ва Мукимийнинг ижтимоий-сиёсий карашлари. — Тошкент, 1959.

Вахидов Х. Фуркат маърифатпарвар шоир. — Тошкент, 1959.

Зарифов Х. Мукимий: (хаёти ва ижлдига оид материаллар). — Тошкент, 1955.

Зокиржон Фуркат. — Тошкент, 1959.

Қабулов Н. Андижонлик прогрессив шоирлар. — Тошкент, 1977.

Қадырова М. XIX аср ўзбек шоиралари ижодида инсон ва халк такдири. — Тошкент, 1977.

Қаримов Г. Мукимий: (хаёти ва ижоли). — Тошкент, 1970.

Қаримов Г. Ўзбек адабиётит тарихи. — Тошкент, 1975. — Қит. 3: XIX асрининг II ярмилан XX асрнинг бошларигача.

Қор-оглы Х. Г. Узбек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2-е изд. — М., 1976.

Мукимий ва Фуркат хакийда маколалар. — Тошкент 1958.

Муминов И. М. Избр.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4 т. — Ташкент, 1976. — Т. 2.

Муминова В. Ўзбек демократик адабиётида лирика. — Тошкент, 1979.

Расул Х. Фуркат: Ижоди хакила. — Тошкент, 1954.

Рахматова Д. Мукимий издошлари. — Тошкент, 1978.

Ўзбек адабиёти тарихи: 5 томлик. — Тошкент, 1980. — Т. 5: XIX асринг II ярми — 1917-й.

Уйгун. Мукими. — Тошкент, 1942.

Хайитметов А. Х. Табаррук излар изиден. — Тошкент, 1979.

Хаккулов И. Увайсий шеърияти. — Тошкент, 1982.

Шадыев Э. Ўзбек-тожик адабий алокалари тарихидан. — Тошкент, 1973.
Юнусов М. Қомил Хоразмий. — Тошкент, 1960.
Юсупов Ю. Аваз: Адабий-биографик очерк. — Тошкент, 1954.
Юсупов Ю. Фуркат йулларида. — Тошкент, 1984.
Юсупов Ю. Хоразм шоирлари. — Тошкент, 1967.
Якубов Х. Ўзбек демократик шоири Мукимий. — Тошкент, 1953.

Ⅱ. ЛИТЕРАТУРЫ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ОБЩИЕ РАБОТЫ

Боборыкин П. Д. Роман на Западе за две трети века. — СПб., 1900.
Затонский Д. В.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реализм XIX в.: Линии и лики. — Киев, 1984.
Игнатов С. История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театра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 М.; Л., 1940.
Пешев А. Г., Стефанова Л.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от парижската комуна до Първата световна война. — С., 1972.
Шиллер Ф. История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 М., 1937. — Т. 3.
Dietrich M. Europäische Dramaturgie im 19. Jahrhundert. — Graz; Köln, 1961.
Hunterhäuser H. Fin de Siècle. — München, 1977.
Larkin M. Man and society im nineteenth-century realism: Determinism and literature. — L., 1977.
Neues Hand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Bd. 17. Europäischer Realismus/Von R. Lauer; In Verbindung mit D. Btiesemeister et al. — Wiesbaden, 1980.
Olteanu P. Morfologia romanului european în secului al XIX-lea. — Buc., 1977.
Pellegrini A. Dalla《sensibilità》al nichilismo. — Milano, 1962.
Poszler G. A regény válaszútjai: Müfaji változatok a XIX sz. második felében. — Bp., 1980.
Realism, naturalism and symbolism: Modes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 in Europe, 1848—1914/Ed. R. N. Stromberg. — N. Y. etc., 1968.
Smith P. Public and private value: Studie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novel. — Cambridge etc., 1984.
Zalis H. Sub semnul realului: Esen despre naturalismul european. — Buc., 1974.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еликовский С. В скрещенье лучей. — М., 1987.

Импрессионисты, и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их соратники. — М., 1976.
История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1956—1959. — Т. 2, 3.
Лансон Г. История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эпоха. — М., 1909.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анифесты французских реалистов. — Л., 1935.
Пузиков А. Портреты француз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Жизнь Золя. — М., 1981.
Реизов Б. Г.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роман XIX века. — М., 1969.
Adam A., Lerminier G., Morot-Sir 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 P., 1968. — Vol. 2.
Beuchat Ch. Histoire du naturalisme français. — P., 1949.
Caramaschi E. Critiques scientistes et critiques impressionistes: Taine, Brunetière, Gourmont. — Pisa, 1963.
Chevrel J. Le naturalisme. — P., 1982.
Cogny P. Le naturalisme. — P., 1959.
Dumesnil R. Le réalisme et le naturalisme. — P., 1965.
Henriot E. Réalistes et naturalistes. — P., 1954.
Huret J. Enquête sur l'évolution littéraire. — P., 1891.
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 P., 1978. — Vol. 9, 10.
Lalou R.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 P., 1953. — Vol. 1.
Martino P. Le naturalisme français. — P., 1951.
Maynial E. L'époque réaliste. — P., 1931.
Poulet G. La poésie éclatée: Baudelaire, Rimbaud — P., 1980.
Sarcey F. Quarante ans de théatre. — P., 1901—1902. — Vol. 5, 7.

РОМАНИСТЫ И ДРАМАТУРГИ 50—60-х ГОДОВ

Benoit-Guyod G. La vie et l'oeuvre d'Erckmann-Chatrian. — P., 1963.
Benoist A. Essais de critique dramatique: ... Feuillet; Augier; Dumas-fils. — P., 1898.
Bouvier E. La bataille réaliste. — P., 1913.
Martino P. Le roman réaliste sous la Seconde Empire. — P., 1913.

ГЮСТАВ ФЛОБЕР

Иващенко А. Ф. Гюстав Флобер: Из истории реализма во Франции. — М., 1955.
Реизов Б. Г. Творчество Флобера. — М., 1955.
Danger P. Sensations et objets dans le roman de Flaubert. — P., 1973.
Digeon C. Flaubert. — P., 1970.
Dumesnil R. La vocation de Gustave Flaubert. — P., 1961.
Nadeau M. Gustave Flaubert écrivain. — P., 1969.
Sartre J.-P. L'Idiot de la famille: Gustave Flaubert de 1821 à 1857: In 2 vol. — P., 1971.
Starkie E. Flaubert: the making of the master. — L., 1967.
Starkie E. Flaubert — the master. — L., 1971.

Thibaudet A.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Sa vie, ses romans, son style. — P., 1922.
Wetherill P. Flaubert et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 P., 1964.

БРАТЬЯ ГОНКУР

Billy A. Les frères Goncourt: La vie littéraire à Paris pendant la seconde moitié du XIX siècle. — P., 1954.
Debray-Genette R. Métamorphoses du recit: Autour de Flaubert. — p., 1986.
Garamaschi E. Réalisme et impressionnisme dans l'oeuvre des frères Goncourt. — Pisa; P., 1971.
Koehler E. E. und J. de Goncourt die Begründer des Impressionismus. — Leipzig, 1912.
Ricatte R. La création romanesque chez les Goncourt. — P., 1953.
Sabatier P. L'esthétique des Goncourt. — P., 1920.
Sauvage M. Jules et Edmond de Goncourt: Précurseurs. — P., 1970.

ПОЭЗИЯ 50—60-х ГОДОВ

Bernard S. Le poème en prose dès Baudelaire jusqu'à nos jours. — P., 1959.
Martino P. Parnasse et symbolisme (1850—1900). — P., 1954.
Sabatier R. La poésie du XIX siècle. — P., 1977.

《ПАРНАС》. ЛЕКОНТ ДЕ ЛИЛЬ

Estève E. Leconte de Lisle, l'homme et l'oeuvre. — P., s. a.
Flottes P. Leconte de Lisle: L'homme et l'oeuvre. — P., 1954.
Pich E. Leconte de Lisle et sa création poétique: Thèse... — P.; Lille, 1974.
Putter I. The pessimism of Leconte de Lisle. — Berkeley; Los Angeles, 1961.

БОДЛЕР

Балашов Н. И. Легенда и правда о Бодлере// Бодлер Ш. Цветы зла. — М., 1970. — С. 233—287.
Нольман М. Л. Шарль Бодлер: Судьба. Эстетика. Стиль. — М., 1979.
Austin L. J. L'Univers poétique de Baudelaire. — P., 1956.
Pia P. Baudelaire par lui-même. — P., 1966.
Peyre H. Connaissance de Baudelaire. — P., 1951.
Pichois C. Baudelaire: Etudes et témoignages. — Neuchâtel, 1967.
Prévost J. Baudelaire: Essai sur la création et l'inspiration poétiques. — P., 1964.
Ruff M. A. Baudelaire. — P., 1963.
Sartre J. P. Baudelaire. — P. 1947.

ЛОТРЕАМОН

Bachelard G. Lautréamont. — P., 1965.

Blanchot M. Lautréamont et Sade. — P., 1963.

Caradec F. Isidore Ducasse, comte de Lautréamont. — P., 1970.

Peyrouzet E. Vie de Lautréamont. — P., 1970.

Pleinet H. Lautréamont par lui-même. — P., 1967.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АРИЖСКОЙ КОММУНЫ

Данилин Ю. И. Очерк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оэзии XIX в. — М., 1974.

Данилин Ю. И. Парижская Коммуна и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театр. — М., 1963.

Данилин Ю. И. Поэты Парижской Коммуны. — М., 1983.

Дмитриев В. Г. Поэт — коммунар: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Эжена Потье, создателя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 М., 1966.

Bellet R. Jules Vallès journaliste, 1857—1885: Thèse... — Lille, 1976.

Colloque Jules Vallès, Lyon, 1975: Actes. — Lyon, 1976.

Delfau G. Jules Vallès: L'exil à Londres. — P.; Montréal, 1971.

Jules Vallès. — P., 1957. (Europe; N 144).

Les Ecrivains français devant la guerre de 1870 et devant la Commune: Colloque, 7 nov. 1970. — P., 1972.

Rémy T. Le temps des cerises: (Jean-Baptiste Clément). — P., 1968.

Rouchon U. La vie bruyante de Jules Vallès. — Saint-Etienne, 1937.

Zévaès A. Eugène Pottier et 《L'Internationale》. — P., 1936.

ТВОРЧЕСТВО ВИКТОРА ГЮГО ПОСЛЕ 1848 г.

Брахман С. Р. 《Отверженные》 Виктора Гюго. — М., 1968.

Минина Т. Н. Роман 《Девяносто третий год》: Пробл. революции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Виктора Гюго. — Л., 1978.

Нусинов И. М. Проблем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В. Гюго и А. Франс. — М., Л., 1927.

Трескунов М. С. Роман Виктора Гюго 《Девяносто третий год》. — М., 1981.

Brochu A. Hugo. Amour, crime, révolution: Essai sur les Misérables. — Montréal, 1974.

Rousselot J. Le Roman de Victor Hugo. — P., 1961.

Simaika R. L'inspiration épique dans les romans de Victor Hugo. — Genève; P., 1962.

ЭМИЛЬ ЗОЛЯ

Владимирова М. М. Романный цикл Э. Золя 《Ругон-Маккары》: Худож. и идейно-филос. единство. — Саратов, 1984.

Клеман М., Реизов Б. Эмиль Золя, 1840—1940. — Л., 1940.

Кучборская Е. П. Реализм Эмиля Золя: 《Ругон-Маккары》 и проблемы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XIX в. во Франции. — М., 1973.

Кучборская Е. П. Эмиль Золя —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к: К истории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во Франции XIX в. — М. , 1978.

Лещинская Г. И. Эмиль Золя: 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рус. пер. и крит. лит. на рус. яз. , 1865—1974. — М. , 1975.

Пузиков А. Эмиль Золя: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 1961.

Эйхенгольц М. Творческая лаборатория Золя. — М. , 1940.

Якимович Т. К. Молодой Золя: эстетика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Киев, 1971.

Baguley D. Bibliographie de la critique sur Emile Zola, 1864—1970. — Toronto; Buffalo, 1976.

Barbusse H. Zola. — P. , 1932; — Рус. пер. : *Барбюс А.* Золя/Пер. с фр. Т. И. Глебовой. — М. ; Л. , 1933.

Castelnau. J. Zola. — P. , 1946.

Emile Zola// Europe. — P. , 1952. — Nov. déc. , spec. N.

Faria N. Structures et unité dans《Les Rougon-Macquart》. — P. , 1977.

Hamon Ph. Le personnel du roman: Le système des personnages dans les Rougon-Macquart d'Emile Zola. — Genève, 1983.

Lanoux A. Bonjour, Monsieur Zola. — P. , 1954; — Рус. пер: *Лану А.*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Эмиль Золя! /Пер. с фр. О. Добровольского, В. Финикова. — М. , 1966.

Lattre A. Le réalisme selon Zola. — P. , 1975.

Mann H. Zola: Essay. — Leipzig, 1962.

Massis H. Comment Emile Zola composait ses romans. — P. , 1906.

Mitterand H. Zola journaliste: De l'affaire Manet à l'affaire Dreyfus. — P. , 1962.

Le naturalisme et les soirées de Médan. — P. , 1930.

Richardson J. Zola. — L. , 1978.

Ternois R. Zola et son temps: Lourdes — Rome — Paris. — P. , 1961.

Zévaès A. Zola. — P. , 1945.

ДОДЕ

Benoit-Guyod G. Alphonse Daudet: Son temps-son oeuvre. — P. , 1947.

Clogenson Y. E. Alphonse Daudet peintre de la vie de son temps. — P. , 1946.

Mantoux Ch. Alphonse Daudet et la souffrance humaine. — P. , 1971.

Roche A. V. Alphonse Daudet. — N. Y. , 1976.

МОПАССАН

Данилин Ю. И.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опассана. — М. , 1968.

Castella Ch. Structures romanesques et vision sociale chez Maupassant. — Lausanne, 1972.

Chessex J. Maupassant et les autres. — P. , 1981.

Dumesnil R. Guy de Maupassant. — P. , 1947.

Lenoux A. Maupassant, le bel ami. — P. , 1967; — Рус. пер. : *Лану А.* Мопассан/Сокр.

пер. с фр. Э. Лазебниковой. — М. , 1971.
Lemoine F. Guy de Maupassant. — P. , 1957.
Maynial E. La vie et l'oeuvre de Guy de Maupassant. P. , 1906; — Рус. пер. : *Мэниаль Э*. Мопассан: Его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Пер. с фр. Н. П. Кашина. — М. , 1910.
Vial A. Guy de Maupassant et l'art du roman. — P. , 1954.

РОМАНИСТЫ И ДРАМАТУРГИ 70—80-х ГОДОВ

Corbière-Gille G. Barbey d'Aurevilly: Critique littéraire. — Genève, 1962.
Deffoux L. , *Zavie E*. Le groupe de Médan. — P. , [192—].
Doumic R. Portraits d'écrivains. — P. , 1911.
Dumesnil R. La publication des soirées de Médan. — P. , 1933.
Farrère C. Loti. — P. , 1930.
Frazee R. Henry Céard, idéaliste detrompé. — P. , 1963.
Hofer H. Barbey d'Aurevilly: Romancier. — Bern, 1974.
Le Targat F. A la recherche de Pierre Loti. — P. , 1974.
Livi F. J.-K. Huysmans: A rebour et l'esprit décadent. — P. , 1972.
Raitt A. W. Villiers de l'Isle-Adam et le mouvement symboliste. — P. , 1965.
Sée E. Henry Becque ou la servitude et grandeur dramatiques. — P. , 1926.
Singer A. E. Paul Bourget. — Boston, 1976.
Zayed F. Huysmans peintre de son époque. — P. , 1973.

ЖЮЛЬ ВЕРН

Брандис Е. П. , *Лазарев М. Х.* Жюль Верн: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 2-е изд. , испр. и доп. — М. , 1959.
Брандис Е. П. Жюль Верн: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Л. , 1956.
Costello P. Jules Verne: Inventor of science fiction. — L. , 1978.
Raymond F. , *Compère D*. Le développement des études sur Jules Verne. — P. , 1976.

ВЕРЛЕН И СИМВОЛИЗМ

Обломиевский Д. Д.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символизм. — М. , 1973.
Adam A. Verlaine: L'homme et l'oeuvre. — P. , 1953.
Bornecque J.-H. Verlaine par lui-même. — P. , 1966.
Guenot C. Le style de Paul Verlaine. — P. , 1963.
Lawler J. R. The language of French symbolism. — Princeton (N. J.), 1969.
Lehmann A. G. The symbolist aesthetic m France, 1885—1895. — Oxford, 1968.
Marquez-Poney L. Le mouvement decadent en France. — P. , 1986.
Michaud G. Message poétique du symbolisme. — P. , 1961.
Petitfils P. Verlaine. — P. , 1981.

Zimmermann E. M. Magie de Verlaine: Etude de l'évolution poétique de Paul Verlaine. — P., 1967.

КОРБЬЕР, КРО, ЛАФОРГ

Angelet Ch. La poétique de Tristan Corbière. — Bruxelles, 1961.
Dansel M. Langage et modernité chez Tristan Corbière. — P., 1974.
Forestier L. Charles Cros: l'homme et l'oeuvre. — P., 1969.
Guichard L. Jules Laforgue et ses poésies. — P., 1950.

РЕМБО

Балашов Н. И. Рембо и связь двух веков поэзии // Рембо А. Стихи. Послед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Озарения. Одно лето в аду. — М., 1982. — С. 185—300.
Bonnefoy Y. Rimbaud par lui-même. — P., 1966.
Brunel P. Rimbaud ou l'éclatant désastre. — P., 1984.
Clancier G. E. Du Rimbaud au surréalisme: Panorama critique. — P., 1961.
Etiemble R. Le mythe de Rimbaud: In 3 vol. — P., 1970.
Etiemble Д., *Gauclère Y.* Rimbaud. — P., 1966.
Gascar P. Rimbaud et la Commune. — P., 1971.
Matarasso H., *Petitfils P.* Vie d'Arthur Rimbaud. — P., 1962.
Starkie E. Arthur Rimbaud. — P., 1982.

МАЛЛАРМЕ

Beausire P. Mallarmé: Poésie et poétique. — Lausanne, 1950.
Michaud G. Mallarmé. — P., 1971.
Noulet G. L'oeuvre poétique de Stéphane Mallarmé. — P., 1974.
Richard J.-P. L'univers imaginaire de Mallarmé. — P., 1961.

ПРОВАНСА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оловьев С. 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новой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и провансаль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СПб., 1914.
Шишмарев В. Ф. Фредери Мистраль// Шишмарев В. Ф.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 Л., 1972.
Delaçolette E. Frédéric Mistral, poète et éducateur provencal. — Bruxelles, 1947.
Lafont R., *Anatole Ch.*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Occitane. — P., 1971. — T. 2.
Peyre S. A. Essai sur Frédéric Mistral. — P., 1959.
Rey A. Frédéric Mistral: Poète républicain. — Cavaillon, 1929.
Ripert E. Le Félibrige. — P., 1924.
Rouquette J. La littérature d'oc. — P., 1963.
Souchon P. Mistral, poète de France. — P., 1945.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АНГЛ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никин А. Эстетика Джона Рескина и англ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 в. — М., 1986.
Ивашева В. В. Английский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в 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звучании. — М., 1974.
История англи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Л., 1958. — Т. 3.

АНГЛ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50—60-х ГОДОВ

Adam I. George Eliot. — L., 1969.
Allen W. George Eliot. — N. Y., 1964.
Anderson W. D. Mathew Arnold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 Ann Arbor, 1965.
Blind M. George Eliot. — L., 1883.
Bloom H. The ringers in the tower: studies in Romantic tradition. — Chicago; L., 1971.
Carlisle F. The sense of an audience: Dickens, Thackeray, and George Eliot at mid-century. — Brighton, 1982.
Cosslett T. The《scientific movement》and Victorian literature. — Brighton, 1982.
Cunliffe F. W. English literature during the last halfcentury. — N. Y., 1928.
Hardy B. Particularities: readings in George Eliot. — L., 1982.
Fackson H. The eighteen nineties: a review of art and ideas at the close of the 19th century. — Hassocks, 1976.
Marshall W. H. Wilkie Collins. — N. Y., 1970.
Sadleir M. Trollope: a commentary. — L., 1933.
Snow Ch. P. Trollope. — L., 1975. Рус. пер.: *Сноу Ч.* Троллоп/Пер. с англ. Вступ. ст. В. Ивашевой. — М., 1981.
Tillotson G. A view of Victorian literature. — Oxford, 1978.
Williams S. T. Studies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 Port Washington, 1967.
Wilson H. W., Hoeveler D. Z. English prose and critic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grude to information sources. — Detroit (Mich.), 1979.

ТВОРЧЕСТВО ДИККЕНСА 50—60-х ГОДОВ

Dyson A. E. Bleak house: A casebook. — L., 1969.
Hardy B. Charles Dickens: the later novels. — L., 1968.
Leavis F. R., Leavis Q. D. Dickens the novelist. — L., 1970.
Newsom R. Dickens on the romantic side of familiar things:《Bleak House》and the novel tradition. — N. Y., 1977.
Thurley G. The Dickens myth: it's genesis and structure. — L., 1976.

Vogel F. Allegory in Dickens. — Alabama, 1977.
Westburg B. The confessional fictions of Charles Dickens. — Dekalb (Ill.). 1977.

ТВОРЧЕСТВО У. М. ТЕККЕРЕЯ 50—60-х ГОДОВ

Hardy B. The exposure of luxury: radical themes in Thackeray. — L., 1972.
McMaster F. Thackeray: the major novels. — Toronto, 1976.
Ray G. N. Thackeray: the age of wisdom: 1847—1863. — N. Y., 1958.
Wheatley F. H. Patterns in Thackeray's fiction. — Cambridge (Mass.), 1969.

АНГЛИЙСКАЯ ПРОЗА 70—90-х ГОДОВ

Дьяконова Н. Я. Стивенсон и англ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 в. — Л., 1984.
Урнов М. В. Томас Гарди. — М., 1969.
Aldington R. Portrait of a Rebel: The life and Work of Robert Louis Stevenson. L., 1957; — Рус. пер.: *Олдингтон Р.* Стивенсон: Портрет бунтаря/Пер. с англ. Г. А. Островской; Предисл. Д. М. Урнова. — М., 1985.
Bailey E. F. The novels of George Meredith. — N. Y., 1910.
Beer G. Meredith: a change of masks. — L., 1970.
Blunden E. Thomas Hardy. — L., 1958.
Butler L. St. F. Thomas Hardy. — Cambridge, 1978.
Chesterton G. K. Robert Louis Stevenson. — L., 1927.
Eigner E. M. Robert Louis Stevenson and romantic tradition. — Princeton (N. J.)., 1966.
Goode F. George Gissing: ideology and fiction. — N. Y., 1979.
Hasan N. Thomas Hardy: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 L., 1982.
Henderson P. William Morris: his life, work and friends — L., 1967.
Kieby R. Robert Louis Stevenson and the fiction of adventure. — Cambridge (Mass.), 1964.
Knoepflmacher U. C. Religious humanism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George Eliot, Walter Pater and Samuel Butler. — Princeton (N. J.), 1965.
Meier P. William Morris, the marxist dreamer: In 2 vol. — Hassocks (Sussex), 1978.
Muggeridge M. The earnest atheist: A study of Samuel Butler. — L., 1936.
Page N. Thomas Hardy. — L., 1977.
Priestley G. B. George Meredith. — L., 1927.
Pritchett V. S. George Meredith and English comedy. — L., 1970.
Willey B. Darwin and Butler. — L., 1960.

АНГЛИЙСКАЯ ПОЭЗИЯ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Аринштейн Л. М.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английской поэзии

50-х — 70-х гг. XIX в. — М. , 1963.

Armstrong I. Victorian scrutinies: reviews of poetry 1830—1870. — L. , 1972.

Duffin H. C. Arnold the poet. — L. , 1962.

Enzensberger C. Viktorianische Lyrik: Tennyson und Swinburne in der Geschichte der Entfremdung — München, 1969.

Fleming G. H. Rossetti and the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 L. , 1967.

Fuller F. O. Swinburne: a critical biography. — L. , 1968.

Kissane F. D. Alfred Tennyson. — N. Y. , 1970.

Peters R. L. The crowns of Apollo: Swinburne's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 study in Victorian criticism and aesthetics. — Detroit, 1965.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ИРЛАН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Brown M. The politics of Irish literature. — L. , 1972.

Brown M. Sir Samuel Ferguson. — Zewisburg, 1973.

Comerford R. V. Charles F. Kickbam: a study in Irish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 Portmarnock, 1979.

Cronin A. Heritage now: Irish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 L. , 1982.

Hogan P. Dion Boucicault. — N. Y. , 1969.

McKenna B. Irish literature, 1800—1875: A guide to information souces. — Detroit (Mich.), 1978.

Welch R. Irish poetry from Moore to Yeats. — Gerrards Cross, 1980.

Yeats W. B. , *Kinsella T.* Davis, Mangan, Ferguson: Tradition and the Irish writer. — Dublin, 1970.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НЕМЕ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стория немец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 1968. — Т. 4: 1848—1918.

Batt K. Fritz Reuter: Leben und Werk. — Rostock, 1967.

Böttger F. Theodor Storm in seiner Zeit. — B. , 1958.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 B. , 1975. — Bd. 8. 2.

Hamann R. , *Jost H.* Epochen deutscher Kultur von 1870 bis zur Gegenwart. — Frankfurt a. M. , 1977. — Bd. 1: Gründerzeit; — Bd. 2: Naturalismus.

Hermann Sudermann: Werk und Wirkung. — Würzburg, 1980.

Literarische Manifeste des Naturalismus, 1880—1892. — Stuttgart, 1962.

Martini F. Deutsche Literatur im bürgerlichen Realismus, 1848—1898. — Stuttgart, 1962.

Mehring F. Aufsätze zu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Hebbel bis Schweichel. — B. , 1961.

Münchow U. Deutscher Naturalismus. — B. , 1968.

Realismus und Gründerzeit. Manifeste und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Literatur, 1848—1880. — Stuttgart, 1975—1976. Bd. 1—2.

ГЕББЕЛЬ

Gerlach U. H. Hebbel: Bibliographie, 1910—1970. — Heidelberg, 1973.

Müller J. Das Weltbild Friedrich Hebbels. — Jena, 1955.

Walzel O. Friedrich Hebbel und seine Dramen. — 3. Aufl. — B. , 1927.

Wütschke H. Hebbel: Bibliographie. — B. , 1910.

ГАУПТМАН

Герхарт Гауптман: 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Сост. А. А. Волгина. — М. , 1985.

Мандель Е. М. Гауптман. — Саратов, 1972.

Сильман Т. И. Гергарт Гауптман, 1862—1946. — Л. ; М. , 1956.

Hilscher E. Gerhart Hauptmann. — B. , 1969.

Tschörtner H. D. Gerhart Hauptmann: Ein bibliogr. Beitr. — B. , 1962.

ФОНТАНЕ

Bachmann R. Theodor Fontane und die deutschen Naturalisten. — München, 1968.

Reuter H. H. Fontane: In 2 Bd. — B. , 1968.

Глава пятая
АВСТР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Stock K. F. , Heilinger R. , Stock M. Personalbibliographien österreichischer Dichter und Schriftsteller. — Pullach, 1972.

Eisenmeier E. Adalbert Stifter: Bibliographie. — Linz, 1971.

Enziger M. Gesammelte Aufsätze zu Adalbert Stifter. — Wien, 1967.

Magris C. Il mito absburgico nella letteratura austriaca moderna. — Torino, 1963.

Mühlher R. Österreichische Dichter seit Grillparzer. — Wien; Stuttgart, 1973.

Müller J. Adalbert Stifter: Weltbild und Dichtung. — Halle, 1956.

Глава шестая
ШВЕЙЦАР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Breitenbruch B. Gottfried Kellers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 Reinbek bei Hambrug, 1974.

Carl Spitteler in der Erinnerung seiner Freunde und Weggeföhrten. — Zürich, [1947].
Fearn L. Henri-Frédéric Amiel//Swiss men of Letters. — L., 1970.
Fehr K. Conrad Ferdinand Meyer. — 2. durchges. und erg. Aufl. — Stuttgart, 1980.
Fehr K. Der Realismus in der schweizerischen Literatur. — Bern; München, 1965.
Hohenstein L. Conrad Ferdinand Meyer. — Bonn, 1957.
Korrodi E. Aufsätze zur Schweizer Literatur. — Bern; Stuttgart, 1962.
Spitzer P. G.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sdichtung C. T. Meyers. — Köln, 1980.
Straumann R. Literarischer Konservatismus in der Schweiz um 1848: Diss. — Bern etc., 1984.
Wetzel J. H. Carl Spitteler: Ein Lebens — und Schaffensbericht. — München, 1973.

Глава седьмая
НИДЕРЛАН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Ошис В. В. История нидерланд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1983.
Ошис В. В. Мультатули: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 М., 1971.
Brachin P. La littérature néerlandaise. — P., 1962.
Brakell Buys R. v. De wijsheid van Spinoza en de schoonheid der Tachtigers. — Leiden, 1959.
Brandt Corstius J. C. Het poëtisch programma van Tachtig. — Amsterdam, 1968.
Brom G. Multatuli. — Utrecht; Antwerpen, 1958.
Colmjon G. De Nederlandse letteren in de negentiende eeuw. — Amsterdam; Antwerpen, 1953.
Colmjon G. De oorsprongen van de Renaissance der litteratuur in Nederland in het laatste kwart van de 19-de eeuw. — Arnhem, 1947.
Constandse A. L. Geschiedenis van het humanisme in Nederland. — Den Haag, 1967.
Couperus bij van Deyssel: Een chronische konfrontatie in beschouwingen, brieven en notities/ Uitg. door K. Reijnders. — Amsterdam, 1968.
Dekker G. De invloed van Keats en Shelley in Nederland gedurende de negentiende eeuw. — Den Haag, 1926.
Donker A. De episode van de vernieuwing onzer poësie (1830—1894). — Utrecht, 1929.
Duinkerken A. van. Tussen Vosmaer en Tollens. — Amsterdam, 1968.
Driessen F. W. Multatuli aanklager, strijder, realist. — Amsterdam, 1960.
Essays over Multatuli. — Rotterdam, 1962.
Geyl P. Reacties. — Utrecht, 1952.
Jongejan E. De Humor — 《cultus》 der Romantiek in Nederland. — Zutphen, 1933.
King P. Multatuli. — N. Y., 1972.
Kloos W. Veertien jaar literaturgeschiedenis. 1880—1893: 2 bd. — Amsterdam, 1896.
Knuvelder G. Handboek tot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se letterkunde. —

Hertogenbosch, 1959. — D. 3.
Marja A. Over de kling. — Den Haag, 1956.
Schevenhels L. Rubricering in Noord- en Zuidnederlandse historische romans (1790—1945)... — Antwerpen, 1951.
Simons L. Vlaamse en Nederduitse literatuur in de 19-de eeuw. — Gent, 1982.
Spigt P. Keurig in de kontramine: Over Multatuli. — Amsterdam, 1975.
Stuiveling G. Een eeuw Nederlandse letteren. — 14-e dr. — Amsterdam, 1971.
Ten Brink J. Geschiedenis der noord- nederlandsche letteren in de XIXe eeuw, in biographieën en bibliographieën, 1830—1900: In 3 bd. — Rotterdam, [19—].
Veer P. v. Het leven van Multatuli. — Amsterdam, 1979.

Глава восьмая
БЕЛЬГ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ндреев Л. Г. Сто лет бельги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1967.
Bom E. de. Het levende Vlaanderen. — Amsterdam, 1917.
Bom E. de. Nieuw Vlaanderen: kunst en leven. — Brussel; Amsterdam, 1925.
Hermanovski G. Die stimme des schwarzen Löwen: Geschichte des flämischen Romans. — Starnberg, 1961.
Lissens R. F. De vlaamse letterkunde van 1780 tot heden. — 4-e herz. dr. — Brussel; Amsterdam, 1967.
Lissens R. F. Fläm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 Köln; Wien, 1970.
Mallinson V. Modern belgian literature, 1830—1960. — L., 1966.
Simons L. Vlaamse en Nederduitse literatuur in de 19-e eeuw. 1. Van Verlooy tot Gezelle. — Gent, 1982.
Van de Voorde U. Panorama d'un siècle de littérature néerlandaise en Belgique, 1830—1930. — P.; Bruxelles, 1931.

ЛИТЕРАТУРА 50—60-х ГОДОВ

Busschere K. de. Guido Gezelle. — 4-e, verb. en bijgew. dr. — Brugge; Nijmegen, 1980.
Champagne P. Octave Pirmez: Son caractère; sa pensée: 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 Prèf. de P. Nothomb. — Gembloux, 1966.
Dijck J. van. De andere Gezelle. — Anvers, 1950.
Dubois P. H. et al. Facetten der Nederlandse poëzie: Van Guido Gezelle tot Willem Kloos. s'Gravenhage. — Rotterdam, [1962].
Duinkerken A. van. Guido Gezelle. — Bruxelles, 1958.
Duinkerken A. van. Vlamingen. — Hasselt, 1960.

Kuyper H. S. S. In het land van Guido Gezelle. — 2. herz. dr. — Zwolle, 1925.
Roland Holst H. Guido Gezelle. — Amsterdam, 1931.
Vermeylen A. De Vlaamse letteren van Gezelle tot heden. — Hasselt, 1963.
Westerlinck A. De innerlijke wereld van Guido Gezelle. — Nijmegen; Brugge, 1977.
Westerlinck A. Taalkunst van Guido Gezelle. — Brugge; Nijmegen, 1980.
Wouters L. Guido Gezelle. — P., 1965.

ШАРЛЬ ДЕ КОСТЕР

Данченко В. Т., *Паевская А. В.* Шарль де Костер: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Вступ. ст. А. В. Морозовой. — М., 1964.
Литвинов П. В. Лекции по бельги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Де Костер и Бельгия). — Баку, 1973.
Мицкевич Б. П. Шарль де Костер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еализма в бельги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Минск, 1960.
Черневич М. Н. Шарль де Костер и его《Фламандские легенды》// Костер Ш. де. Фламандские легенды. — М., 1975. — С. 231—272.
Koninckx W. Charles De Coster: Bibliographie, 1827—1927: In 2 vol. — Anvers, [1927].
Gerlo A. Charles De Coster en Vlaanderen. — Antwerpen, 1959.
Gheyselinck R. De dood van taai geroddel: De snode verzinsels rond Ulenspiegel en De Coster. — Antwerpen, 1969.
Hanse J. Charles De Coster. — Bruxelles, 1928.
Hanse J. Charles De Coster et sa première《Légende flamande》. — Louvain, 1959.
Huysmans C. Le roman d'Ulenspiegel et le roman de Charles de Coster. Avec quelque aperçus sur sa vie et son oeuvre. — Bruxelles, 1960.
Klinkenberg J.-M. Style et archaïsme dans la《Légende d'Ulenspiegel》de Charles De Coster: In 2 vol. — Bruxelles, 1973.
Liebrecht H. La vie et le rêve de Charles De Coster. — Bruxelles, 1927.
Monteyne L. Charles De Coster: De mensch en de kunstenaar. — Antwerpen, 1917.
Potvin Ch. Charles De Coster. — Bruxelles, 1894.
Sosset L.-L. Introduction à l'oeuvre de Charles De Coster. — Bruxelles; Liège, 1937.
Van de Voorde U. Charles De Coster's Ulenspiegel. — 3e ed. — Nimegue; Courtrai, 1948.

ЛИТЕРАТУРА 70-х — НАЧАЛА 80-х ГОДОВ

Bazalgette L. Camille Lemonnier. — P., 1904.
Des Ombiaux M. Camille Lemonnier. — Bruxelles, 1909.
Des Ombiaux M. Les premiers romanciers nationaux de Belgique. — P., 1919.
Landau H. Camille Lemonnier. — P., 1936.
Pasquier A. Edmond Picard. — Bruxelles, 1913.
Vanwelkenhuyzen G. Les débuts littéraires de Georges Eekhoud. — Bruxelles; Liège, 1934.

Vanwelkenhuyzen G. Histoire d'un livre: 《Un Mâle》 de Camille Lemonnier. — Bruxelles, 1961.
Vanwelkenhuyzen G. L'influence du naturalisme français en Belgique de 1875 à 1900. — Bruxelles, 1930.
Vanwelkenhuyzen G. Vocations littéraires: Camille Lemonnier, George Eekhoud, Emile Verhaeren, Georges Rodenbach, Maurice Maeterlinck. — Genève; P., 1959.
Vermeulen F. Edmond Picard et le réveil des lettres belges, 1881—1888. — Liège, 1935.
Woodbridge B. M. Le roman belge contemporain: Cinq romanciers Flamands: Charles de Coster, Camille Lemonnier, Georges Eekhoud, Eugène Demolder, Georges Virrès. — Bruxelles, 1930.

Глава девятая
НОРВЕЖ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рандес Г. Собр. соч.: В 20 т. СПб., 1906—1914. — 1—4: Скандинав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еустроев В. П.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кандинавских стран (1870—1970). — М., 1980.
Шарыпкин Д. М. Скандинав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России. — Л., 1980.
Apeland O. Alexander L. Kiellands romaner. — Oslo, 1971.
Beyer E. Fra Ibsen til Garborg. — Oslo, 1975. — (Norges litteratur historie; Bd. 3).
Bull F. Bjørnstjerne Bjørnson. — Oslo, 1982.
Dahl W. 《Garman & Worse》 i naerlys og perspektiv. — Bergen, 1973.
Hange I. Jonas Lies diktning. — Oslo, 1970.
Hemmer B. Ibsen og Bjørnson: Essays og analyser. — Oslo, 1978.
Houm Ph. En mann forut for vår tid: Bjørnstjerne Bjørnson og vi. — Oslo, 1982.
Lunde J. Liv og kunst i konflikt: Alexander L. Kielland, 1883—1906. — Oslo, 1975.
Myhre R. Bjørnstjerne Bjørnson. — Oslo, 1978.
Thesen R. Ein diktar og hans strid. Arne Garborgs liv og skrifter. — Oslo, 1945.
Vinsnes A. H. Norges litteratur. Fra 1880-årene til første verdenskrig. — 2 utg. — Oslo, 1961. — (Norsk litteratur historie; Bd. 5).

ГЕНРИК ИБСЕН

Адмони В. Г. Генрик Ибсен. — М., 1956.
Морщинер М. С., *Житомирская З. В.* Генрик Ибсен: 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к 5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 М., 1956.
Храповицкая Г. Н. Ибсен 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драма его времени. — М., 1979.
Шайкевич Б. А.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Ибсена в России: Ибсен и МХАТ. — Киев, 1968.
Beyer E. Henrik Ibsen. — Oslo, 1978.
Bien H. Henrik Ibsens Realismus. — B., 1970.
Christiansen S. Henrik Ibsen og teatrets konventioner. — København, 1983.
Collin J. Henrik Ibsen. — Heidelberg, 1910.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Ibsen: Proc. of the Intern. Ibsen Seminar. — Oslo etc., 1966—1978. — Vol. 1—4.
Gran G. Henrik Ibsen: In. 12 bd. — Kristiania, 1918.
Haaland A. Ibsens verden: En studie i kunst som forskning. — Oslo, 1978.
Haugan J. Diktersfinxen: En studie i Ibsen og Ibsenforskning. — Oslo, 1982.
Heiberg H. 《... født til kunstner》: Et Ibsen-Portrett. — Oslo, 1967. Рус. пер.: *Хейберг Х.* Генрик Ибсен. — М., 1975.
Johnston B. To the third empire: Ibsen's early drama. — Minneapolis, 1980.
Nag M. Ibsen i russisk åndsliv. — Oslo, 1967.
Nilsson N. Å. Ibsen in Russland. — Stockholm, 1958.
Jorgenson T. Henrik Ibsen. — Northfield (Minn.), 1963.
Koht H. Henrik Ibsen: In. 12 bd. — Ny omarb. utg. — Oslo, 1954.
Meyer M. Henrik Ibsen: In 3 vol. — L., 1967—1971.
Østerud E. Det borgerlige subjekt: Ibsen i teorihistorisk belysning. — Oslo, 1981.
Østvedt E. Henrik Ibsen: Jn. 15 bd. — Skien; Oslo, 1955—1973.
Tedford I. Ibsen bibliography, 1928—1957. — Oslo, 1964.

Глава десятая
ШВЕ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Ерхов Б. А. Август Стриндберг: 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 М., 1981.
Неустроев В. Л.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Стриндберга//Стриндберг А. Избр. произв. — М., 1986. — Т. 1. — С. 5—26.
Alving Mg. Svensk litteraturhistoria. — Stockholm, 1932.
Aspelin K. Studier i C. J. L. Almqvists författarskap åren kring 1840: 2 bd. — Stockholm, 1979—1980.
Essays on Strindberg/Ed. C. R. Smedmark. — Stockholm, 1966.
Gustafson A. Den svenska litteraturens historia. — Stockholm, 1963. — Bd. 1: Före 1900.
Lamm M. August Strindberg: 2 bd. — Stockholm, 1940.
Strindberg: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d. and introd. O. Reinert. — Englewood Cliffs, 1971.
Strindberg and modern theatre: Pap. Symp. — Stockholm, 1975.
Synpunkter på Strindberg/Red. G. Brandell. — Stockholm, 1964.

Глава одиннадцатая
ДА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Brønsted M. Goldschmidts fortaellekunst. — København, 1967.

Busk-Jensen L., *Dahl P.*, *Gemzøe A.* Dannelse, folkelighed, individualisme, 1848—1901. — København, 1985. — (Dansk lit. hist. ; Bd 6).

Glienke B. Jens Peter Jacobsens lyrische Dichtung. — Neomunster, 1975.

Holst L., *Skyum-Nielsen*, *Wentzel K.* Fortaellende digtning i Danmark 1870—1970. — København, 1976. — (Ideol, hist. ; Bd 4).

Jensen J. F. Turgenjev i dansk åndsliv. — København, 1961.

Jolivet A. Les romans de Henrik Pontoppidan. — P. , 1960.

Lauritsen P. Chr. Collin og Georg Brandes: Fra humanismens og naturalismens kamptid i Norden: 2 bd. — København, 1958.

Mortensen K. P. Ironi og utopi: En bog om Henrik Pontoppidan. — København, 1982.

Nielsen E. A. Modernismen i dansk lyrik 1870—1970. — København, 1976. — (Ideol, hist. ; Bd 3).

Nielsen F. J. P. Jacobsen: 2 bd. — 3 udg. — København, 1968.

Nolin B. Den gode europén: Studier i Georg Brandes' utveckling 1871—1893 med speciell hänsyn till hans förhållande till tysk, engelsk, slavisk och fransk litteratur. — Stockholm, 1965.

Ober K. H. Meïr Goldschmidt. — Boston, 1976.

Den politiske Georg Brandes/Red. H. Hertel, S. Møller Kristensen. — København, 1973.

Skjerbaek T. Kunst og budskab: Studier i Henrik Pontoppidans forfatterskab. — København, 1970.

Stangerup H., *Billeskov Jansen F. J.* Fra Georg Brandes til Johannes V. Jensen. — København, 1971. — (Dansk litt. hist. ; Bd 3).

Vosmar J. J. P. Jacobsens digtning. — København, 1984.

Глава двенадцатая
ИСЛАН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теблин-Каменский М. И. Ислан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Л. , 1947.

Стеблин-Каменский М. И. Культура Исландии. — Л. , 1967.

Einarsson S. A history of Icelandic literature. — N. Y. , 1957.

Gislason B. M. Islands litteratur efter sagatiden, ca 1400—1948. — København, 1949.

Глава тринадцатая
ФИ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Aho A. J. Juhani Aho: In 2 vol. — Porvoo; Helsinki. 1951.

Ahokas J. A history of Finnish literature. — Bloomington, 1973.

Castren G. Juhani Aho: In 2 d. — Helsingfors, 1922.

Ekelund E. Aleksis Kivi. — Stockholm, 1960.

Ekelund E. Från Åbo brand till sekelskiftet. — Borgå, 1969. — (Fint. sven. litt. ; Bd. 2).

Ekelund E. et al. Turun romantikoista Aleksis Kiveen. — Helsinki, 1964. — (Suom. kirjallisuus; N 3).

Enckell M. Över stumhetens gräns. — Porvoo; Helsinki, 1972.

Karkama P. Teuvo Pakkalan romaanit. — Helsinki, 1975.

Kinnunen A. Aleksis Kiven näytelmät: Analyysi ja tarkastelua ajan aatevirtausten valossa. — Porvoo; Helsinki, 1967.

Koskimies R. Aleksis Kivi: Henkilö ja runous. — Helsinki, 1974.

Koskimies R. Kymmenen tutkielmaa Juhani Ahosta — Helsinki, 1975.

Koskimies R. Minna Canthista Eino Leinoon. — Helsinki, 1965. — (Suom. kirjallisuus; N 4).

Kupiainen U. Juhani Ahon huumori. — Helsinki, 1937.

Meri V. Aleksis Stenvallin elämä. — 3 p. — Helsinki. 1974.

Mörne A. Josef Julius Wecksell — Helsingfors, 1909.

Niinistö M. Kaarlo Kramsu. — Helsinki, 1971.

Niinistö M. Tähdettömän yön runoilija: Lisäpiirteitä Kaarlo Kramsun kirjailijankuvaan. — Tampere, 1973.

Sarajas A. Tunnuskuvia: Suomen ja Venäjän kirjallisen realismin kosketuskohtia. — Porvoo; Helsinki, 1968.

Глава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ИТАЛЬЯ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лодина И. П.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 XX в. — Л. , 1980.

Полуяхтова И. К. История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Эпоха Рисорджименто). — М. , 1970.

Потапова З. М. Русско-итальян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 М. , 1973.

Проблемы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тали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Отв. ред. З. М. Потапова. — М. , 1982.

Bertacchini R. Il romanzo italiano dell'Ottocento: Dagli scottiani a Verga. — 2-a ed. — Roma, 1964.

Bosco U. Realismo romantico. — 2-a ed. , riv. e accr. — Roma, 1967.

Croce B. La letteratura della nuova Italia: Saggi critici: In 2 vol. — 7-a ed. — Bari, 1967—1968.

De Sanctis F. La letteratura italiana nel secolo 19: Lezioni — Napoli, 1914.

Gramsci A. Letteratura e vita nazionale. — Nuova ed. riv. e integr. — Roma, 1979.
Mazzoni G. L'Ottocento. — 9-a ristampa della 2-a ed. /Con suppl. bibliogr. (1938—1972) a cura di A. Vallone. — Milano, 1973; — Vol. 2.
Ottocento/A cura di R. Bertacchini. — Bologna, 1974.
Novità e tradizione nel secondo Ottocento italiano/A cura di F. Mattesini. — Milano, 1974.
Petrocchi G. Scrittori piemontesi del secondo Ottocento. — Torino, 1948.
Pullini G. Poetiche dell'Ottocento. — Padova, 1957.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 Milano, 1968. — Vol. 8.

ПРОЗА 50—60-х ГОДОВ

Bigazzi P. I colori del vero: Vent' anni di narrativa, 1860—1880. — Nuova ed. — Pisa, 1978.
Brizio A. M. La Scapigliatura artistica. — Milano, 1966.
Catalano G. Momenti e tensioni della Scapigliatura. — Messina, 1969.
Cortini M. A. L'autore, il narratore, l'eroe: Proposte per una rilettura delle《Confessioni d'un italiano》. — Roma, 1983.
La critica e gli scapigliati/A cura di F. Bettini. — Bologna, 1976.
Dell'Aquila M. L'esperienza lirica della Scapigliatura. — Bari, 1973.
Della Rocca A. Misticismo estetico e realismo storico nella Scapigliatura milanese. — Napoli, 1965.
De Tommaso G. Il racconto campagnuolo dell'Ottocento. — Ravenna, 1973.
Di Pietro A. Per una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postunitaria: Dall'Unità alle soglie dell'età umbertiana. — Milano, 1974.
Gorra N. Nievo tra noi. — Firenze, 1970.
Isnenghi M. Introduzione alle《Confessioni》. — Padova, 1968.
Locatelli D. La fortuna critica di Ippolito Nievo. — Milano, 1971.
Mantovani D. Il poeta soldato: Ippolito Nievo, 1831—1861. — Milano, 1900.
Marcazzan M. Ippolito Nievo e le《Confessioni》. — Milano; Messina, 1942.
Mariani G. Storia della Scapigliatura. — Caltanissetta; Roma; 1967.
Marinari A. Emilio Praga poeta di una crisi. — Napoli, 1969.
Marini V. Arrigo Boito tra Scapigliatura e classicismo. — Torino, 1968.
Mirmina E. La poetica sociale del Nievo. — Ravenna, 1972.
Moestrup J. La Scapigliatura: Un capitolo del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 Hafniae, 1966.
Mollia F. Nievo. — Firenze, 1968.
Nardi P. Scapigliatura: Da Giuseppe Rovani a Carlo Dossi. — 2-a ed. — Milano, 1968.
Nardi P. Ugo Iginio Tarchetti. — Vicenza, 1921.
Portinari F. Ippolito Nievo: Stile e ideologia. — Milano, 1969.
Romagnoli S. Nievo scrittore rusticale. — Padova, 1966.
Romanò A. Il secondo romanticismo lombardo. — Milano, 1958.

Scarsi C. Scapigliatura e Novecento. — Roma, 1979.
Ulivi F. Il romanticismo di Ippolito Nievo. — Roma, 1947.

ДЕ САНКТИС

Antonetti P. Francesco De Sanctis (1818—1883): Son évolution intellectuelle, son esthétique et sa critique. — Aix-en-Provence, 1963.
Consoli D. La scuola storica. — Brescia, 1979.
De Sanctis e il realismo: In 2 vol. — Napoli, 1978.
Holliger M. Francesco De Sanctis: Sein Weltbild und seine Aesthetik. — Friburg, 1949.
Landucci S. Cultura e ideologia di Francesco De Sanctis. — Milano, 1963.
Mirri M. Francesco De Sanctis politico e storico della civiltà moderna. — Messina; Firenze, 1961.

ВЕРИЗМ

Володина И. П. Луиджи Капуана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теория веризма. (1860—1880). — Л., 1975.
Джованни Верга: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Сост. В. Т. Данченко. — М., 1966.
Кирхенштейне А. Джованни Верга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Италии. — Рига, 1965.
Alexander A. Giovanni Verga: A great writer and his world. — L., 1972.
Arrighi G. Le vérisme dans la prose narrative italienne. — P., 1928.
Asor Rosa A. Il《caso》Verga. — Palermo, 1972.
Banti A. Serao. — Torino, 1965.
Branca V. Emilio De Marchi. — Brescia, 1946.
Cappellani M. Vita e opere di Giovanni Verga: In 2 vol. — Firenze, 1940.
Cattaneo G. Giovanni Verga. — Torino, 1963.
Debenedetti G. Verga e il naturalismo. — Milano, 1976.
Ghidetti E. Verga: Guida storico-critica. — Roma, 1979.
Guglielmi G. Ironia e negazione. — Torino, 1975.
Luperini R. Verga tra ideologia e realtà. — Bari, 1970.
Madrignani C. A. Capuana e il naturalismo. — Bari, 1970.
Madrignani A. Illusione e realtà nell'opera di Federico De Roberto. — Bari, 1972.
Marchese G. Capuana-poeta della vita. — Palermo, 1964.
Mariani G. Federico De Roberto narratore. — Roma, 1950.
Marzot G. Battaglie veristiche dell'Ottocento. — Milano; Messina, 1941.
Marzot G. Preverismo, Verga e la generazione verghiana. — Bologna, 1965.
Petrini E. Luigi Capuana, — 2-a ed. — Firenze, 1966.
Pomilio M. Dal naturalismo al verismo. — Napoli, 1966.
Raya G. Bibliografia di Luigi Capuana (1839—1968) — Roma, 1969.

Raya G. Bibliografia verghiana (1840—1971). — Roma, 1972.
Romano S. F. Coscienza regionale e vita popolare nella letteratura siciliana del secondo Ottocento. — Palermo, 1960.
Rossi S. L'età del verismo. — Palermo, 1978.
Russo L. Francesco De Sanctis e la cultura napoletana — Bari, 1928.
Russo L. Giovanni Verga. — 6-a ed. — Bari, 1974.
Santangelo G. Storia della critica verghiana. — 2-a ed., ampl. — Firenze, 1962.
Scaramucci I. Introduzione a Verga. — 3-a ed. — Brescia, 1973.
Sgroi G. Renato Fucini. — Firenze, 1945.
Sipala P. M. Scienza e storia nella letteratura verista. — Bologna, 1976.
Spinazzola V. Emilio De Marchi romanziere popolare. — Milano, 1971.
Spinazzola V. Federico De Roberto e il verismo. — Milano, 1961.
Spinazzola V. Verismo e positivismo. — Milano, 1977.
Trombatore G. Riflessi letterari del Risorgimento in Sicilia. — Palermo, 1960.
Ulivi F. La letteratura verista. — Torino, 1972.
Verga e il verismo: Sperimentalismo《formale》e critica del progresso/A cura di G. Baldi. — Torino, 1980.

ПОЭЗИЯ. ДЖОЗУЭ КАРДУЧЧИ

Ватсон М. Джозуе Кардуччи: Крит.-биогр. очерк. — СПб., 1899.
Amoroso G. Giovanni Prati: Voci borghesi e tensione romantica. — Napoli, 1973.
Arrighi G. La poésie vériste en Italie. — P., 1937.
Balduino A. Letteratura romantica dal Prati al Carducci. — Bologna, 1967.
Bosco U. La poesia di Giosue Carducci. — Napoli, 1947.
Caccia E. Poesia e ideologia per Carducci. — Brescia, 1970.
Dell'Isola M. Carducci nella letteratura europea. — Milano, 1951.
Flora F. La poesia e la prosa di Giosue Carducci. — Pisa, 1959.
Giuliano G. Aleardo Aleardi nella vita e nell'arte. — Verona, 1934.
Mattesini F. Per una lettura storica di Carducci. — Milano, 1975.
Natali G. Giosue Carducci. — 3-a ed. riv. e ampl. — Firenze, 1961.
Russo L. Carducci senza retorica. — Bari, 1957.
Santangelo G. Poetica e poesia carducciana. — Palermo, 1969.
Toffanin G. Carducci poeta dell'Ottocento. — Napoli, 1950.

Глава пятнадцатая
ИСП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Balseiro J. A. Novelistas españoles modernos. — 8-a ed. rev. y aum. — Puerto

Rico, 1977.

Baquero Goyanes M. El cuento español en el siglo XIX. — Madrid, 1949.

Carballo Calero R. Historia da literatura galega contemporanea. — 2-a ed. — Vigo, 1975.

Cossìo J. M. de. Cincuenta años de poesía española (1850—1900): En 2 t. — Madrid, 1960.

Dìez Borque J. M.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 Madrid, 1974. — Vol. 3.

Ferreras J. I. Introducción a una sociología de la novela expañola del siglo XIX. — Madrid, 1973.

Fuster J. Literatura catalana contemporània. — 2-a ed. — Barcelona, 1976.

Goenaga A., Maguna J. P. Teatro español del siglo XIX: Análisis de obras. — New York, 1972.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literaturas hispánicas. — Barcelona, 1969. — Vol. 5.

Miralles E. La novela española de la Restauración (1875—1885): sus formas y enunciados narrativos. — Barcelona, 1979.

Montesinos J. F. Costumbrismo y novela: Ensayo sobre el redescubrimiento de la realidad española. — 3-a ed. — Madrid, 1972.

Ribera Llopis J. M. Literaturas catalana, gallega y vasca. — Madrid, 1982.

Shaw D. L. Historia de Ia literatura española. — Barcelona, 1973. — T. 5: El siglo XIX.

АЛАРКОН

Decoster C. C. Pedro Antonio de Alarcón. — Boston, 1979.

Ocano A. Alarcón. — Madrid, 1970.

АЛАС (КЛАРИН)

Becarud J. 《La Regenta》 de Clarín y la Restauración. — Madrid, 1965.

Beser S. Leopoldo Alas, crítico literario. — Madrid, 1968.

БЕККЕР

Barbachano C. J. Bécquer. — Madrid, 1970.

Benìtez R. Ensayo de bibliografía razonada de Gustavo Adolfo Bécquer. — Buenos Aires, 1961.

Ruiz Fornells E. A concordance to the poetry of Gustavo Adolfo Bécquer. — Alabama, 1970.

ВАЛЕРА

Bermejo Marcos M. Don Juan Valera, crítico literario. — Madrid, 1968.

Decoster C. C. Bibliografía crítica de Juan Valera. — Madrid, 1970.

Jiménez Fraud A. Juan Valera y la generación de 1868. — Madrid, 1973.

ХАСИНТО ВЕРДАГЕР

Arbó S. J. La vida trágica de Mosén Jacinto Verdaguer. — Barcelona, 1970.

ФЕРНАН КАБАЛЬЕРО

Klibbe L. H. Fernán Caballero. — N. Y., 1973.

Р. ДЕ КАСТРО

Alonso Montero X. Rosalía de Castro. — Madrid, 1972.

Carballo Calero R. Estudios rosalianos: aspectos da vida e da obra de Rosalía de Castro. — Vigo, 1979.

Kulp-Hill K. Rosalía de Castro. — Boston, 1977.

ПАРДО БАСАН

Baquero Goyanes M. Emilia Pardo Bazán. — Madrid, 1971.

Menge U. Die dialektische Struktur der Kurzgeschichten Dona Emilia Pardo Bazáns. — Hamburg, 1967.

ПЕРЕДА

Clarke A. H. Manual de bibliografía perediana. — Santander, 1974.

Klibbe L. H. José María de Pereda. — Boston, 1975.

ПЕРЕС ГАЛЬДОС

Actas del 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estudios galdosianos. —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1977.

Actas del I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estudios galdosianos. —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1979.

Berkowitz H. Ch. Benito Pérez Galdós: Spanish liberal crusader. — Madison, 1948.

Casalduero J. Vida y obra de Galdós (1843—1920). — 3-a ed. aum. — Madrid, 1971.

Galdós studies/Ed. J. E. Varey. — L., 1970.

Walton L. B. Pérez Galdós and the spanish nove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N. Y., 1970.

РУБИО-И-ОРС

Carmona A. Cataluña, mito y realidad. — Barcelona, 1975.

ТАМАЙО-И-БАУС

Esquer Torres R. El teatro de Tamayo y Baus. — Madrid, 1965.

ЭЧЕГАРАЙ

Mathias J. Echegaray. — Madrid, 1970.

Young R. J. José Echegaray: A study of his dramatic technique. — Urbana, 1936.

ТРУЭБА

González Blanco A. Antonio de Trueba: Su vida y sus obras. Páginas escogidas. — Bilbao, 1914.

БЛАСКО ИБАНЬЕС

León Roca J. L.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 Valencia, 1967.

Глава шестнадцатая
ПОРТУГА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Casais Monteiro A. A poesia portuguesa contemporanea. — Lisboa, 1977.

Hourcade P. Temas de literatura portuguesa. — Lisboa, 1978.

Rebello L. F. O teatro naturalista e neo-romantico (1870—1910). — Lisboa, 1978.

КАСТЕЛО БРАНКО

Cabral A. Estudos camilianos 1. — Porto, 1978.

Chorão J. B. Camilo: a obra e o homem. — Lisboa, 1979.

ЭСА ДЕ КЕЙРОШ

Gaspar Simões J. Vida e obra de Eça de Queiróz. — Ed. refund. e acrescent. — Lisboa, 1973.

Medina J. Eça de Queiróz e a geração de setenta. — Lisboa, 1980.

АНТЕРО ДЕ КИНТАЛ

Cidade H. Antero de Quental: a obra e o homem. — 2-a ed. — Lisboa, 1978.

Lopes O. Antero de Quental: Vida e legado de uma utopia. — Lisboa, 1983.

Ⅲ. ЛИТЕРАТУР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ОБЩИЕ РАБОТЫ

Реализм в литературах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ути и специфика лит. развития в XIX в. /Отв. ред. В. В. Витт. — М., 1983.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ПО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Цыбенко Е. З. Польский социальный роман 40—7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 М., 1971.

Literatura polska w okresie realizmu i naturalizmu/Red. J. Kulczycka-Saloni. — W-wa, 1965—1971. — T. 1—4.

Markienier H. Pozytywizm. — W-wa, 1978.

ПО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848—1863-Х ГОДОВ

Bachórz J. Realizm bez《chmurnej jazdy》. Studia o powieściach J. Korzeniowskiego. — W-wa, 1979.

Borowy W. O Norwidzie. — W-wa, 1960.

Danek W. Józef Ignacy Kraszewski. Zarys biograficzny. — W-wa, 1976.

Danek W. Pisarz wciąż żywy: Studia o życiu i twórczości J. I. Kraszewskiego. — W-wa, 1969.

Fornalczyk F. Hardy lirnik wioskowy: Studium o Kondratowiczu-Syrokomli. — Poznań, 1972.

Gomulicki J. W. Cyprian Norwid: Przewodnik po życiu i twórczości. — W-wa, 1976.

Gomulicki J. W. Cyprian Norwid. — W-wa, 1976.

Nowakowski J. Teofil Lenartowicz i jego poezje. — Kraków, 1970.

Norwid: Z dziejów recepcji twórczości/Oprac. M. Inglot. — W-wa, 1983.

Nowe studia o Norwidzie/Red. J. W. Gomulicki, J. Z. Jakubowski. — W-wa, 1961.

ПО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60—80-х ГОДОВ

Barczyński J. Narracja i tendencja: O powieściach tendencyjnych Elizy Orzeszkowej. — Wrocław etc., 1976.

Strumph-Wojtkiewicz S. Burzliwe dzieje T. T. Jeża. — W-wa, 1961.

ПРУС

Kulczycka-Saloni J. Bolesław Prus. — W-wa, 1975.

Markiewicz H. Prus i Żeromski. — W-wa, 1964.

Pięcikowski E. Bolesław Prus. — W-wa, 1977.

СЕНКЕВИЧ

Горский И. 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Сенкевича. — М., 1966.

Henryk Sienkiewicz: Twórczość i recepcja światowa/Red. A. Piorunowa, K. Wyka. —

Kraków, 1968.
Krzyżanowski J. Henryk Sienkiewicz: Kalendarz życia i twórczości. — W-wa, 1956.
Krzyżanowski J. Twórczość Henryka Sienkiewicza. — W-wa, 1973.
Kulczycka-Saloni J. Henryk Sienkiewicz. — W-wa, 1966.

НАТУР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А. ДЫГАСИНЬСКИЙ

Jakubowski J. Z. Zapomniane ogniwo: Studium o Adolfie Dygasińskim. — W-wa, 1967.

РАЗВИТИЕ ПОЭЗИИ. М. КОНОПНИЦКАЯ

Мария Конопницкая: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Сост. И. Л. Курант. — М., 1962.
Пиотровская А.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Марии Конопницкой. — М., 1962.
Brodzka A. Maria Konopnicka. — W-wa, 1965.
Konopnicka i współczesny jej świat literacki/Red. J. Leo. — W-wa, 1969.
Szypowska M. Asnyk znany i nieznany. — W-wa, 1971.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ЧЕШ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Základní bibliografie k dějinám české a slovenské literatury. — Pr., 1960.
Čeští spisovatelé 19. a pocátku 20. století: Slovníková příručka. — Pr., 1982.
Lexikon české literatury: Osobnosti, díla, instituce. Díl I. A-G. — Pr., 1985.

*

Кишкин Д. С. Чешско-рус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и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онтакты: Разыска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общения. — М., 1983.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чеш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XX веков. — М., 1963.
Ровда К. И. Россия и Чехия: Взаимосвязи литератур. 1870—1890. — Л., 1978.
Чешская и словацкая эстетика XIX—XX вв. — М., 1985.
Balajka B. Jaroslav Vrchlický. — Pr., 1979.
Dějiny české literatury. — Pr., 1961. Sv. 3: Literatura druhé poloviny devatenáctého století.
Dějiny českého divadia. — Pr., 1977. Sv. 3: Činohra 1848—1918.
Dostál V. Hálek sociální. — Pr., 1951.
Hájek J. Boje o realismus. — Pr., 1979.
Grund A. K. J. Erben. — Pr., 1935.
Hrabák J., Jeřábek D., Tichá Z. Pr ůvodce po dějinách české literatury. — Pr., 1978.
Janáčková J. Český román sklonku 19 století. — Pr., 1967.
Janačková J. Stoletou alejí: O české próze minulého věku. — Pr., 1985.

Jeřábek D. Vitězslav Hálek a jeho úloha ve vývoji české literární kritiky 19. století. — Pr., 1959.
Kopecký J. Knížka o Tylovi. — Pr., 1959.
Krejčí K. Kapitoly o Jakubu Arbesovi. — Pr., 1955.
Nejedlý Z. Velké osobnosti. — Pr., 1951.
Otruba M., Kačer M. Tv ůrčí cesta Jozefa Kajetána Tyla. — Pr., 1961.
Pohorský M. Portréty a problémy: Literarně-historické interpretace. — Pr., 1974.
Polák J., Tichý V., Krejčí K. Jaroslav Vrchlický. — Pr., 1954.
Pytlík R. Sedmkrát o próze. — Pr., 1978.
Řepnová M. Vypravěčské umění Karoliny Světlé. — Ùstí nad Labem, 1977.
Šalda F. X. O umění. — Pr., 1955.
Špičák J. Karolina Světla. — Pr., 1980.
Vlček J. Dějiny české literatury. — Pr., 1960. — Sv. 3.
Vlček J. Kapitoly z dějin české literatury. — Pr., 1952.
Z dějin české literární kritiky. — Pr., 1965.

ЧЕХ

Кишкин Л. С. Сватоплук Чех: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1959.
Шмелькова И. А. Сватоплук Чех: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 М., 1959.
Strejček F. Živé dílo Svatopluka Čecha. — Pr., 1946.
Svatopluku Čechovi: Zborník. — Pr., 1946.

НЕРУДА

Соловьева А. П. Ян Неруда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реализма в чеш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М., 1973.
Шмелькова И. А., Поглей П. Ян Неруда: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 М., 1984.
Arbes J. O Janu Nerudovi. — Pr., 1952.
Budín S. Jan Neruda a jeho doba. — Pr., 1960.
Králik O. Křižovatky Nerudovy poezie. — Pr., 1965.
Křvánek V. Jan Neruda. — Pr., 1983.
Literatura o Janu Nerudovi/Sest. H. Šik, M. Laiske. — Pr., 1976.
Novotný M. Život Jana Nerudy: Dopisy, dokumenty. D. Ⅰ—Ⅳ. — Pr., 1951.

НЕМЦОВА

Fučík J. Božena Němcová bojující. — Pr., 1950.
Laiske M. Bibliografie Boženy Němcové. — Pr., 1962.
Mukařovský J. Božena Němcová. — Brno, 1950.
Nejedlý Z. Božena Němcová. — Pr., 1950.
Novotný M. Život Boženy Němcové: Dopisy a dokumenty. — Pr., 1951.
Otruba M. Božena Němcová. — Pr., 1964.

Urban Z. Pozapomenutá tvář Boženy Němcové. — Pr., 1970.

ИРАСЕК

Токсина И. В. Алоис Ирасек: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 М., 1955.
Janáčková J. Svět Jiráskova umění. — Pr., 1978.
Kunc J. Soupis díla Aloise Jiráska a literatury o něm. — Pr., 1952.
Nejedlý Z. Čtyři studie o Al. Jiráskovi. — Pr., 1949.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СЛОВА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Encykopedia slovenských spisovatel'ov: V 2 zv. — Br., 1984.

*

История словац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1970.
Cesnaková — Michalcová M., Noskovič A., Čavojský L., Lehuta E. Kapitoly z dejín slovenského divadla: Od najstarších čias po realizmus. — Br., 1967.
Čepan O. Kukučínove epické istoty. — Br., 1972.
Čepan O. Literárné dielo L'udovíta Kubáního// Literárné postavy Gemera 1. — Br., 1969.
Čepan O., Kusy I., Šmatlák S., Noge J. Dejiny slovenskej literatúry. — Br., 1965. Sv. 3: Literatúra druhej polovice devätnástého storočice.
Franko M. Ján Kalinčiak: Životny a literárný profil k 150 výrociu narodenia. — Martin, 1971.
Lazar E. Jonáš Záborský: Život; Literárné dielo; Korešpondencia. — Br., 1956.
Lesňáková S. Cesty k realizmu. — Br., 1971.
Mazák P. Slovenský román v období literárného realizmu: Význam a tvar. — Br., 1975.
Noge J. Martin Kukučín tradicionalista a novátor: Život a dielo, 1860—1907. — Br., 1975.
Noge J. Slovenská romantická próza. — Br., 1969.
Petrus P. Svetozár Hurban-Vajanský. — Br., 1978.
Popovič A. Ruská literatúra na Slovensku v rokoch 1863—1875. — Br., 1961.
Šmatlák S. Dve storocia slovenskej lyriky. — Br., 1979.
Šmatlák S. Romantická epika alegorická. — Br., 1959.
Tomčík M. Literárne dvojobrazy. — Br., 1976.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БОЛГАР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Державин К. Н. Иван Вазов, 1850—1921: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Л., 1951.
Державин Н. С. Иван Ваз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М.; Л., 1978.

Державин Н. С.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болгар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эпох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накопления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 Л., 1932 — Т. 1: Стоян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как сатирик (1856—1927).

Державин Н. С. Христо Ботев поэт-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1847—1876. — М.; Л., 1948.

Иван Вазов: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Сост. Л. П. Лихачева. — М., 1962.

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Сост. Л. П. Лихачева. — М., 1954.

Христо Ботев: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Сост. Л. П. Лихачева. — М., 1960.

А. Страшимиров, Елин Пелин, Йордан Иовков в спомените на съвременниците си/Под ред. на М. Николов. — С., 1962.

Арнаудов М. Творци на българското Възраждане: Лит. студии и портрети. — 2-е изд. — С., 1969. — Т. 2: Поети и герои.

Баева С. Петко Славейков: Живот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1827—1870. — С., 1968.

Ботев в спомените на съвременниците си: В 2 т./Събр. и изследовал С. Каракостов. — С., 1977.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критика за Алеко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Ред. и подбор Т. Тихов. — С., 1970.

Велчев В. Българо-руски литературни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през XIX—XX в. — С., 1974.

Вълчев В. Иван Вазов: Жизнен и творчески път. — С., 1968.

Генов К. От Паисий до Ботев. — С., 1967.

Генов К. Романтизмът в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а. — С., 1968.

Георги Стойков Раковски: Възгледи, дейност и живот: В 2 т. — С., 1964—1968.

Данчев П. Чертите на гения [Х. Ботев]. — С., 1976.

Димов Г. Национална революция и национален литературен процес. — С., 1978.

Динеков П. В света на Христо Ботев: Статии. — С., 1976.

Динеков П. Възрожденски писатели. — С., 1962.

Динеков П. Делото на Димитър и 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ладинови. — С., 1961.

Зарев Л. Христо Ботев: Лит.-критич. очерк. — С., 1963.

Захари Стоянов: Нови из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материали/Под ред. на М. Цанева, Н. Георгиев, К. Бъклова. — С., 1980.

Иван Вазов: Сб. материали от научната сесия по случай 125-годишнината от рождението на писателя/Под ред. на С. Каролев, М. Цанева, В. Вълчев. — Пловдив, 1976.

Иван Вазов: Сб. по случай сто години от рождението му/Под ред. на Т. Павлов, Н. Лилиев, С. Божков. — С., 1950.

Иван Вазов в спомените на съвременниците си/Под ред. на Г. Димов и К. Йорданов. — С., 1966.

Из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татии за 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Под ред. на П. Динеков, Ст. Божков. — С., 1963.

Каракостов С. Българският възрожденски театър на Освободителната борба: От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класицизъм и сантиментализъм към героична романтика, реализъм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 демокрация，1858—1878. — С.，1973.

Карандилов Е. Антон Страшимиров и душвността на българина. — С.，1979.

Карандилов Е. Книга за народна съдба：Записки по българските въстания [З. Стоянов]. — С.，1983.

Кондарев Н. Идеологията на 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 — 2 основно прераб. и допълн. изд. — С.，1979.

Конев И. Белетристът Каравелов. — С.，1970.

Коне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и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ен процес. — С.，1974.

Конев И. 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Лит.-критич. очерк. — С.，1966.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Г. Братя Миладинови. — С.，1962.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Г. Иван Вазов：Велик реалист и патриот. — С.，1950.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Г. Не е легенда，а жива история：очерци [Г. Раковски，П. Р. Славейков，Х. Ботев，И. Вазов，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и др.]. — С.，1978.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Г. Петко Рачов Славейков：Разказ за него и неговото време. — С.，1967.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Г. Т. К. Влайков：Лит.-Крит. очерк. — С.，1960.

Леков Д. Васил Друмев：Живот и дело. — С.，1976.

Леков Д. 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 — С.，1977.

Леков Д. Проблеми на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белетристика през Възраждането. — С.，1970.

Леков Д. Райко Жинзифов：Лит.-критич. очерк. — С.，1979.

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 в спомените на съвременниците си/Състав. и ред. С. Великов. — С.，1960.

Милев Г. Български литературни портрети. — С.，1941.

Николов М. Антон Страшимиров：Моногр. очерк. — С.，1965.

Ничев А. Алеко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 С.，1964.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то 1878 и развитието на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а：Статии/Под ред. на Б. Ничев，Е.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а，И. Цветков，Л. Велева. — С.，1977.

Панова И. Вазов，Елин Пелин，Йовков：Майстори на разказа. — 2 изд. — С.，1975.

Пантелеева Н. В поетичния свят на Пенчо Славейков. — С.，1984.

Петканова Д. Христо Ботев. — С.，1961.

Петко Р. Славейков，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Христо Ботев，Захари Стоянов в спомените на съвременниците си/Под ред. на Б. Делчев，С. Султанов. — С.，1967.

Петко Славейков：Био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 С.，1979.

Пондев П. Алеко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рит. биогр. очерк. — 2 допълн. изд. — С.，1963.

Пондев П. Българска литература. — С.，1984. — Т.，1：Художествена проза.

Попиванов И. Захарий Стоянов. — С.，1969.

Попиванов И. 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 — С.，1975.

Правчанов С. Неуморимият обвинител [Х. Ботев]. — С.，1975.

Русакиев С. П. Р. Славейков и руск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а. — С.，1956.

Сестримски И. Немо Бончев: Лит.-критич. очерк. — С., 1982.

Ст. Михайловски, 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Г. П. Стаматов в спомените на съвременниците си/Под ред. на А. Тодоров. — С., 1963.

Табаков Н. Братя Миладинови: Биогр. очерк. — С., 1963.

Таринска С. Прозата на Христо Ботев. — С., 1966.

Тенев Д. Стъпалата на славата [И. Вазов]. — Пловдив, 1972.

Тодоров А. Стоян Михайловски: Баснописец и сатирик. — С., 1956.

Топалов К. Проблеми на възрожденската поетика. — С., 1979.

Топеничаров В. Ботев в живота, в смъртта и след нея. — С., 1976.

Тотев П. Литературни статии. — С., 1974.

Унджиев И., *Унджиева Ц.* Христо Ботев — живот и дело. — С., 1975.

Унджиева Ц. 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 Литературни позиции; Изграждането на белетриста; Майстор на фейлетона. — С., 1968.

Христо Ботев: Идеал и знаме на поколенията: Материали от научна сесия по случай 125-годишнината от рождението на Христо Ботев/Под ред. на С. Божков. — С., 1973.

Цанева М. В търсене на героя: Иван Вазов на прелома между две епохи. — С., 1979.

Цанева М. Иван Вазов. — С., 1973.

Цонев С. Христо Ботев: Поезия и правда. — С., 1976.

Шарова К. 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 и българското освободително движение 1860—1867. — С., 1970.

Глава пятая
СЕРБСКАЯ И ЧЕРНОГОР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Вулетић В. Светозар Марковић и руски револуционарни демократа. — Нови Сад, 1964.

Вулетић В. Светозар Марковић и српска кюижевност. — Београд, 1975.

Вученов Д. О српским реалистима и юиховим претходницима. — Београд, 1970.

Глигорић В. Српски реалисти. — Београд, 1954.

Деретић J.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е кюижевности. — Београд, 1983.

Иванић Д. Српска приповјетка измеђ у романтике и реализма (1865—1875). — Београд, 1976.

Скерлић J. Сабрана дела. — Београд, 1964. — Кю. 3.

Скерлић J. Омладина и юена кюижевност. — Београд, 1906.

Поповић М.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е кюижевности. Романтизам. — Београд, 1972. — Т. 3.

Русско-югослав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 — М., 1975.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лавянских народов. — М., 1958. — Вып. 3.

Српска кюижевност у кюижевној критици. Епоха реализма. — Београд, 1966. — Кн. 5.

Зукиħ Т. Преглед кюижевног рада Црне Горе од владике Василије до 1918 године. — Цетиюе, 1951.

Глава шестая
ХОРВА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Povijest hrvatske književnosti. — Zagreb, 1975. Knj. 4: Ilirizam; Realizam. — Zagreb, 1975.
Hrvatska književnost prema evropskim književonstima. — Zagreb, 1970.
Flaker A. Književne poredbe. — Zagreb, 1968.
Šicel M. Stvaraoci i razdoblja. — Zagreb, 1971.
Šicel M. Pregled novije hrvatske književnosti. — Zagreb, 1971.
Frangeš I. Stilističke studije. — Zagreb, 1959.
Barac A. Hrvatska novela do Šenoine smrti// Rad YAZU. — Zagreb, 1952. — Knj. 290.
Živančević M. Prilozi proučavanju hrvatske knjićevnosti XIX stolježa // Rad YAZU. — Zagreb, 1969.

Глава седьмая
СЛОВЕ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Pogačnik J., Zadravec F. Zgodovina slovenskega slovstva. — Maribor, 1970. — Knj. 4.

Глава восьмая
СЕРБОЛУЖИ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емиряга М. И. Лужичане. — М.; Л., 1955.
Трофимович К., Моторний В. Нариси з історії серболужицької літератури. — Львів, 1970.
Geschichte der Sorben. Bauzren, 1974. Bd. 2: Von 1789 bis 1917.
Jenč R. Stawizny serbskeho pismowstwa: In 2 vol. — Budyšin, 1954—1960.
Völkel M. Nowiny ačasopisy w zašłosći a w přitomnosći. — Budyšin, 1984.

Глава девятая
ВЕНГЕР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енгерско-рус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Ред. коллегия: И. И. Анисимов и др./. — М., 1964.
Россиянов О. К. Реализм в венгер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 М., 1983.
Barta J. Arany János. — Bp., 1953.
Az élö Jókai: Tanulmányok/Szerk. Kerényi F., Nagy M. — Bp., 1981.

Király I. Mikszáth Kálmán. — 2. kiad. — Bp. , 1960.
Komlós A. A magyar költészet Petöfitöl Adyig. — Bp. , 1959.
Komlós A. Vajda János. — Bp. 1956.
Lengyel D. Jókai Mór. — 2. kiad. — Bp. , 1970.
A magyar irodalom története/Föszerk. Sötér I. — Bp. , 1965. — 4. k.
Mezei J. Madách: Az élet értelme: Monográfia. — Bp. , 1977.
Schöpflin A. Válogatott tanulmányok. — Bp. , 1967.
Sötér I. Félkör: Tanulmányok a XIX. századból. — Bp. , 1979.
Sötér I. Nemzet és haladás: Irodalmunk Világos után. — Bp. , 1963.
Tanulmányok a magyar — orosz irodalmi kapcsolatok köréböl/Szerk. Kemény G. G. — Bp. , 1961. — 1. , 2. k.

Глава десятая
РУМЫ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жевников Ю. А. Михаил Эминеску и проблема романтизма в румы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 — М. , 1968.
Румынско-рус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19 — начала 20 века. — М. , 1964.
Călinescu G. Nicolae Filimon. — Buc. , 1959.
Călinescu G. Opera lui Mihai Eminescu: În 5 vol. — Buc. , 1934—1936.
Călinescu G. Vasile Alecsandri. — Buc. , 1965.
Călinescu G. Viaţa lui Eminescu. — Buc. , 1932.
Cioculescu S. Viaţa lui I. L. Caragiale. — 2 ed. — Buc. , 1969.
Dumitrescu-Buşulenga Z. Ion Creangă. — Buc. , 1963.
Istoria literaturii romane. — Buc. , 1973. Vol. 3: Epoca marilor clasici.
Ivaşcu G. C. Dobrogeanu — Gherea. — Buc. , 1973.
Nicolescu G. C. Viaţa lui Alecsandri. — Buc. , 1962.
Ornea Z. Juniinea şi junimismul. — Buc. , 1975.
Ornea Z. Poporanismul. — Buc. , 1972.
Streinu V. Ion Creangă. — Buc. , 1971.
Todoran E. Titu Maiorescu. — Buc. , 1977.

Глава двенадцатая
АЛБ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Десницкая А. В. Алб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албанский язык. — Л. , 1987.
Altimari Fr. Studi sulla letteratura Albanese della《Rilindja》. — Cosenza, 1984.
Histori e letërsisë shqipe. — Nëu red. e Dh. S. Shutëriqit, K. Bihikut, M. Domit. —

Tiranë, 1960. — Vëll. 2.

Petrotta G. Popolo, lingua e letteratura Albanese. — Palermo, 1931.

Qosja R. Historia e letërsisë shqipe. — Prishtinë, 1984. — Vëll. 2: Romantizmi.

Ⅳ. ЛИТЕРАТУРЫ США И КАНАДЫ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ША

ЛИТЕРАТУРА ЭПОХ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В 3 т.: Пер. с англ. — М., 1978. — Т. 2.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США. — М., 1964.

Aaron D. The unwritten war: American writers and the Civil war. — N. Y., 1973.

Wilson Ed. Patriotic gore: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 N. Y., 1962.

УОЛТ УИТМЕН

Венедиктова Т. Д. Поэзия Уолта Уитмена. — М., 1982.

Мендельсон М. О.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Уитмена.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М., 1969.

Чуковский К. И. Мой Уитмен: Очерки о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е; Избр. пер. из《Листьев травы》; Проза. — 2-е изд., доп. — М., 1969.

Allen G. W. The solitary singer: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Walt Whitman. — Rev. ed. — N. Y., 1967.

Miller J. E. (Jr.). A critical guide to《Leaves of grass》. — Chicago, 1957.

Walt Whitman: The critical heritage/Ed. M. Hindus. — L., 1971.

Whitman: A coll. of critical essays/Ed. R. H. Pearce. —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2.

ПОСЛЕДНИЕ РОМАНТИКИ

Emily Dickinson: A coll. of critical essays/Ed. R. B. Sewall. —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3.

The recognition of Emily Dickinson: Sel. criticism since 1890/Ed. C. R. Blake, C. F. Wells. — Ann Arbor (Mich.), 1964.

РАННИЙ ЭТАП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РЕАЛИЗМА

Паррингтон В. Л. Основные теч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мысли: Пер. с англ. — М., 1963. — Т. 3: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в Америке (1860—1920).

Bret Harte: a reference guide/Ed. L. D. Barnett. — Boston, 1980.

Brooks V. W. New England: Indian summer, 1865—1915. — N. Y., 1940.

Critical essays on Harriet Beecher Stowe/Ed. E. Ammons. — Boston, 1980.

Hough R. L. The quiet rebel: William Dean Howells as social commentator. — Lincoln (Neb.), 1959.

The realis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writing/Ed. B. R. McElderry. — N. Y., 1965.

ВТОРОЙ ЭТАП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РЕАЛИЗМА

Walcutt Ch. Ch. American literary naturalism, a divided stream. — Minneapolis, 1956.

ХОУЭЛС

Brooks V. W. Howells: His life and world. — N. Y., 1959.

Howells: A century of criticism/Ed. K. E. Eble. — Dallas, 1962.

ДЖЕЙМС

Blackmur R. P. Studies in Henry James/Ed. with introd. V. A. Makowsky. — N. Y., 1983.

Brooks V. W. The pilgrimage of Henry James. — N. Y., 1925.

Edel L. Henry James: A life. — N. Y., 1985.

БИРС

Fatout P. Ambrose Bierce: The devil's lexicographer. — Norman (Okla), 1951.

МАРК ТВЕН

Левидова И. М. Марк Твен: 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рус. пер. и крит. лит. на рус. яз., 1867—1972. — М., 1974.

Мендельсон М. О. Марк Твен. — 3-е изд., доп. и перераб. — М., 1964.

Ромм А. С. Марк Твен. — М., 1977.

Старцев А. И. Марк Твен и Америка. — 2-е изд., доп. — М., 1985.

Blair W. Mark Twain and Huck Finn. — Berkeley; Los Angeles, 1960.

Brooks V. W. The ordeal of Mark Twain. — N. Y., 1977. [1920].

Geismar M. Mark Twain: An American prophet. — Boston, 1970.

Mark Twai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d. H. N. Smith. —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3.

Mark Twain: Sel. criticism/Ed. with introd. A. L. Scott. — 2nd ed. — Dallas, 1967.

Mark Twain: the critical heritage/Ed. Fr. Anderson. — L., 1971.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КАНА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 ЯЗЫКЕ

Голышева А. И. Англоязы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анады. — М., 1979.

The Canadian novel/Ed. with an introd. essay by J. Moss. — Toronto, 1980. — Vol. 2:

Beginnings: A critical anthology.
Pacey D. Creative writing in Canada. — Toronto, 1961. (1st ed. 1952).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 ФРАНЦУЗСКОМ ЯЗЫКЕ

Baillargeon S. Littérature canadienne-française/Préf. de L. Groulx. — Montréal; P., 1957.
Ducrocq-Roirior M. Le roman canadien de langue française de 1860 à 1958. — P., 1978.
Marion S. Origines littéraires du Canada franzaise. — Hull; Ottawa, 1951.
Tougas G.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anadienne-française. — P., 1960.

V.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ОБЩИЕ РАБОТЫ

Торрес-Риосеко А. Большая латин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1972.
América Latina en su literatura. — 2-a ed. — México, 1974.
Anderson Imbert E.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En 2 t. — México; Buenos Aires, 1967.
Ara G. La novela naturalista hispanoamericana. — Buenos Aires, 1965.
Arrieta R. A. Introducción al modernismo literario. — Buenos Aires, 1956.
Blanco Fombona R. El modernismo y los poetas modernistas. — Madrid, 1929.
Carilla E. El romanticismo en la America Hispánica. 2-a ed. revis. y ampl. — Madrid, 1967.
Henríquez Ureña M. Breve historia del modernismo. — México; Buenos Aires, 1954.
Henríquez Ureña P. Las corrientes literarias en la América hispana. — Habana, 1971.
Lazo R.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El siglo XIX (1780—1914). — 2-a ed. — México, 1970.
Leguizamón J. A. Bibliografía general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 Buenos Aires, 1954.
Leguizamón J. A.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 Buenos Aires, 1945.
Meléndez C. La novela indianista en Hispanoamérica (1832—1889). — 2-a ed. — Rio Piedras, 1961.
Recopilación de textos sobre la novela romántica latino-americana/Compil. y pról. de M. Yáñez. — Habana, 1978.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СПА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АРГЕНТИ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Земсков В. Б. Аргентинская поэзия гаучо: К проблеме отношени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фольклора в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е. — М. , 1977.
Carilla E. Estudios de literatura argentina (siglo XIX). — Tucumán, 1966.
Cortázar A. R. Poesía gauchesca argentina: Interp. con el aporte de la teoría folclórica. — Buenos Aires, 1969.
Giménez Pastor A.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argentina: En 2t. — Buenos Aires; Montevideo, 1945.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argentina/Dir. por R. A. Arrieta. — Buenos Aires, 1959. — T. 3: Las letras en la segunda mitad del siglo XIX. — Buenos Aires, 1959.
Rojas R.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argentina. En 2 t. — Buenos Aires, 1948.

*

Aragón R. R. , Calvetti J. Genio y figura de José Hernández. — Buenos Aires, 1973.
Bianchi E. Martín Fierro: Un poema de protesta social. — Buenos Aires, 1952.
Borello R. A. Hernández: poesía y política. — Buenos Aires, 1973.
Carsuzan M. E. Sarmiento el escritor. — Buenos Aires, 1949.
Gálvez M. José Hernández. — 2-a ed. — Buenos Aires, 1964.
Martínez Estrada E. Meditaciones sarmientinas. — Santiago de Chile, 1968.
Martínez Estrada S. Muerte y transfiguración de Martín Fierro: En 2 t. — México; Buenos Aires, 1948.
Martínez Estrada E. Sarmiento. — Buenos Aires, 1956.
Rojas R. El pensamiento vivo de Sarmiento. — Buenos Aires, 1944.

КОЛУМБ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Caparroso C. A. Dos ciclos de lirismo colombiano. — Bogotá, 1961.
Gómez Restrepo A.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colombiana. — T. 4: Siglo XIX. — Bogotá, 1946.
Maya R. Los orígenes del modernismo en Colombia. — Bogotá, 1961.
Orjuela H. H. Fuentes generales para el estudio de la literatura colombiana: Guía bibliográfica. — Bogotá, 1968.
Sánchez Lopéz L. M. Diccionario de escritores colombianos. — 2-a ed. — Bogotá, 1982.
Vega F. de la. Evolución de la lírica en Colombia en el siglo XIX/Ed. , preámbulo y notas de G. Hernández Peñalosa; Pról. de N. del Castillo Mathieu. — Bogotá, 1981.

*

Arciniegas G. Genio y figura de Jorge Isaacs. — Buenos Aires, 1967.
Camacho Guizado E. La poesía de José Asunción Silva. — Bogotá, 1968.
Miramón A. La angustia creadora en Núñez y Pombo. — Bogotá, 1975.

КУБИ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Bibliografía de la poesía cubana en el siglo XIX. — Habana, 1965.

Bueno S.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cubana. — Habana, 1963.

Henríquez Ureña M. Panorama histórico de la literatura cubana. — Habana, 1978. — T. 1.

Lazo R. La literatura cubana: Esquema histórico desde sus orígenes hasta 1964. — México, 1965.

Olivera O. Cuba en su poesía. — México, 1965.

Perfil histórico de las letras cubanas desde los orígenes hasta 1898. — Habana, 1983.

Remos Rubio J. J. Proceso histórico de las letras cubanas. — Madrid, 1958.

Vitier C. Lo cubano en la poesía. — Habana, 1970.

*

Маринельо Х. Хосе Марта — испан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арти и модернизм). — М., 1964.

Хосе Марти: Био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 М., 1955.

Acerca de Cirilo Villaverde/Sel., pról. y notas de I. Alvarez. — Habana, 1982.

Armas E. de. Un deslinde necesario. — Habana, 1978.

Armas E. de. Casal. — Habana, 1981.

Blanch y Blanco C. Bibliografía martiana, 1954—1963. — Habana, 1965.

Chaple S. Rafael María de Mendive: Definición de un poeta. — Habana, 1973.

Dill H.-O. El ideario literario y estético de José Martí. — Habana, 1975.

Fernández Retamar R. Introducción a José Martí. — Habana, 1978.

Fernández Retamar R. Lectura de Martí. — México, 1972.

Calván Moreno C. José Martí. — Buenos Aires, 1953.

González M. P. Fuentes para el estudio de José Martí: Ensayo de bibliografía clasificada. — Habana, 1950.

González M. P. Indagaciones martianas. — Habana, 1961.

Marinello J. Once ensayos martianos. — Habana, 1964.

Marinello J. José Martí, escritor americano. — 2-a ed. — Madrid, 1976.

Márquez Sterling C. Martí: Ciudadano de América. — New York, 1965.

Peraza Sarausa F. Bibliografía Martiana, 1853—1955. — Habana, 1956.

Piñeyro E. Vida y escritos de Juan Clemente Zenea. — Habana, 1964.

Schulman J. A. Símbolo y color en la obra de José [artí. — Madrid, 1960.

Vitier C. Temas martianos. — Habana, 1982.

МЕКСИК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утейщикова В. Мексиканский роман: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этап. — М., 1971.

Dauster F. Breve historia de la poesía mexicana. — México, 1956.

Jiménez Rueda J.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mexicana. — 5-a ed. — México, 1953.

Jiménez Rueda J. Letras mexicanas en el siglo XIX. — México, 1944.

Navarro J. La novela realista mexicana. — México, 1955.

Valenzuela Rodarte A.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en México. — México, 1961.

Warner R. E. Historia de la novela mexicana en el sigo XIX. — México, 1953.

*

Carter B. G. Manuel Gutiérrez Nájera: Estudio y escritos inéditos/Pról. de E. K. Mapes. — México, 1956.

Glass E. S. México en las obras de Emilio Rabasa/Trad. por N. Pizarro Suárez. — México, 1975.

Gómez del Prado C. Manuel Gutiérrez Nájera: Vida y obra. — East Lansing (Michigan), 1964.

Hakala M. A. Emilio Rabasa: novelista innovador mexicano en el siglo XIX/Pról. de O. Rabasa. — México, 1974.

Ochoa Campos M. Ignacio Manuel Altamirano: El soplo del genio. — México, 1966.

Rojas Pérez Palacios A. Juan Díaz Covarrubias: El Mártir de Tacubaya. — México, 1967.

УРУГВ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Rela W. Contribución a la bibliografía de la literatura uruguaya, 1835—1962. — Montevideo, 1963.

Barbagelata H. D. Una centuria literaria (Poetas y prosistas uruguayos) (1800—1900). — Paris, 1924.

Caillava D. A.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gauchesca en el Uruguay: Resumen histórico, 1810—1940. — Montevideo, 1945.

Lauxar. Juan Zorilla de San Martín. — Montevideo, 1955.

ПЕРУ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Contribución a la bibliografía de la literatura peruana. — Lima, 1969.

Mariátegui J. C. Siete ensayos de interpretación de la realidad peruana. — 3. ed. — Lima, 1952. Рус. пер.: *Мариатеги Х. К.* Семь очерков истолкования перуанск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Пер. М. И. Полякова, К. С. Тарасова; Ред. и коммент. А. Ф. Шульговского. — М., 1963.

Romero de Valle E. Diccionario manual de literatura peruana y materias afines. — Lima, 1966.

Sánchez L. A. La literatura peruana: Derrotero para una historia cultural del Perú. — Lima, 1965. — T. 3.

*

Blanco Fombona R. Crítica de la obra de González Prada/Apéndice de J. C. Mariátegui. — Lima, 1966.

Miró C. Don Ricardo Palma, el patriarca de las tradiciones. — Buenos Aires, 1953.

Orígenes del cuento hispanoamericano: Ricardo Palma y sus tradiciones/Por A. Flores, W. J. Peñalosa, J. M. Oviedo. — 2-a ed. — México, 1982.

Porras Barrenechea R. Tres ensayos sobre Ricardo Palma. — Lima, 1954.

Sánchez L. A. Mito y realidad de González Prada. — Lima, 1976.

Sánchez L. A. Panorama de la literatura del Perú: Desde sus orígenes hasta nuestros días/ Pról. de W. Delgado. — Lima, 1974.

Tauro A. Clorinda Matto de Turner y la novela indigenista. — Lima, 1976.

ЧИЛ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Castillo H. El criollismo en la novelística chilena: huellas, modalidades y perfiles. — México, 1962.

Poblete Varas H. Genio y figura de Alberto Blest Gana. — Buenos Aires, 1968.

Silva Castro R. Alberto Blest Gana (1830—1920). — 2-a ed., refund. — Santiago, 1955.

ЭКВАДОР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Cumanda 1879—1979: Contribución a un centenario/Ed. prepar. por M. Corrales Pascual. — Quito, 1979.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РАЗИЛИИ

Cunha F. O romantismo no Brasil. — Rio de Janeiro, 1971.

Haberly D. T. Three sad races: Racial identity and nacional conciousness in Brazilian literature. — Cambridge, 1983.

Sales D. Do ideal às ilusõs: Alguns temas da evolução do romantismo brasileiro. — Rio de Janeiro; Salvador, 1980.

Veríssimo J. Estudos de literatura brasileira. — 2-a ser. — São Paulo, 1977.

Werneck Sodré N. O naturalismo no Brasil. — Rio de Janeiro, 1965.

*

Тертерян И. Эуклидес да Кунья —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герой Бразилии. — М., 1959.

Amado J. Abc de Castro Alves — 4. ed. — São Paulo, 1953. Рус. пер.: *Амаду Ж.* Кастро Алвес/Сокр. пер. Ю. Калугина; Послесл. И. Тертерян. — М., 1963.

Caldwell H. Machado de Assis: The brazilian master and his novels. — L., 1970.

Carneiro E. Trajetória de Castro Alves: uma interpretação política. — Rio de Janeiro, 1947.

Cavalcanti Proença M. Jose de Alencar na literatura brasileira. — Rio de Janeiro, 1966.

Coutinho A. Machado de Assis na literatura brasileira. — Rio de Janeiro, 1960.

Exposição: Castro Alves: [Com motivo de] Centenário do nascimento de Castro Alves, 1847—1947. — Rio de Janeiro, 1958.

Grieco A. Machado de Assis. — 2-a ed., rev. — Rio de Janeiro, 1960.

Magalhães R. Arthur Azevedo e sua epoca. — 3-a ed., rey. e aum. — Rio de Janeiro, 1966.

Orico O. José de Alencar: patriarca do romance brasileiro. — Rio de Janeiro, 1977.

Pessoa de Barros F. Poesia e vida de Castro Alves. — São Paulo, 1962.

Viana Filho L. A vida de José de Alencar. — 2-a ed., rev. — Rio de Janeiro, 1979.

Ⅵ.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ндреева М. Г. От подражательности к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у своеобразию (Из истории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й поэзии XIX в.)//Литература Австралии. — М., 1978.

Генри Лоусон: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Сост. Ю. А. Рознатовская. — М., 1980.

Петриковская А. С. Генри Лоусон и рождение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го рассказа. — М., 1972.

Anderson H. Farewell to old England: A broadside history of early Australia. — Adelaide, 1964.

Anderson H. The story of Australian folksong. — 3rd ed. — Melbourne, 1970.

Argyle B.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ustralian novel, 1830—1930. — Oxford, 1972.

Australian folklore: A dictionary of lore, legends and popular allusions/Comp. W. Fearn-Wannan. — Melbourne, 1973.

The Australian nationalists: Modern critical essays/Ed. C. Wallace-Crabbe. — Melbourne, 1971.

Barnes J. Henry Kingsley and colonial fiction. — Melbourne etc., 1971.

Brissenden A. Rolf Bolderwood. — Melbourne, 1972.

Cooper J. Catherine Spence. — Melbourne, 1972.

Edwards R. Index of Australian folk song. — Holloways Beach, 1971.

Elliott B. The landscape of Australian poetry. — Melbourne, 1967.

Elliott B. Marcus dark. — Oxford, 1958.

Green H. M.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pure and applied. — Sydney, 1961. — Vol. 1: 1789—1923.

Gunton E. J. Bibliography of Catherine Helen Spence. — Adelaide, 1967.

Hadgraft C. Australian literature. — L. etc., 1960.

Hadgraff C. James Brunton Stephens. — Brisbane, 1969.

Henry Lawson criticism, 1894—1971/Ed. with introd. C. Roderick. — Sydney, 1972.

Hutton G. Adam Lindsay Gordon: the man and the myth. — L.; Boston, 1978.
The literature of Australia/Ed. G. Dutton. —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1964.
MacRae C. F. Adam Lindsay Gordon. — N. Y., 1968.
Manifold J. S. Who wrote the ballads: Notes on Australian folksong. — Sydney, 1964.
Moore T. J. Social pattern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 Sydney, 1971.
Ollif L. Andrew Barton Paterson. — N. Y., 1971.
Palmer V. The legend of the nineties. — Melbourne, 1963.
Phillips A. A. Henry Lawson. — N. Y., 1970.
Roderick C. Henry Lawson: poet and short story writer. — Sydney, 1966.
Roderick C. An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fiction. — Sydney, 1950.
Semmler C. The Banjo of the bush. — Hong-Kong, 1975.
Semmler C. Barcroft Boake: poet of the stockwhip. — Melbourne, 1965.
Spence C. H. An autobiography. — Adelaide, 1975. — (1st. ed. 1910).
Ward R. Felons and folk song on native grounds. — Sydney, 1968.
Wild W. H. Henry Kendall. — Boston, 1976.
Wilde W. Adam Lindsay Gordon. — Melbourne, 1972.
Wright J. Preoccupations in Australian poetry. — Melbourne, 1965.
The writer in Australia: A collection of literary documents, 1856 to 1964/With comment. J. Barnes. — Melbourne, 1969.

Ⅶ. ЛИТЕРАТУРЫ БЛИЖНЕ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ТУРЕ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йзенштейн Н. А. Из истории турец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 М., 1968.
Алькаева Л., Бабаев А. Туре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 М., 1967.
Алькаева Л. Сюжеты и герои в турецком романе. — М., 1966.
Гарбузова В. С. Поэты Турции XIX в. — Л., 1970.
Гордлевский В. А. Очерки по новой османов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збр. соч. — М., 1961. — Т. 2.
Желтяков А. Д., Петросян Ю. А. Истор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в Турции. — М., 1965.
Желтяков А. Д. Печать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культурной жизни Турции (1729—1908). — М., 1972.
Кямилев 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мотивы в турецкой поэзии. — М., 1969.
Кямилев Х. К. У истоко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урецкой поэзии. — М., 1967.
Петросян Ю. А. Турецкая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эпохи реформ в Осм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конец XIX — начало XX в.). — М., 1985.
Смирнов В. Д.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турец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

СПб., 1892. — Т. 4.
Стамбулов В. Намык Кемаль. — М., 1935.
Aki Niyazi. XIX yüzyil türk tiyatrosu tarihi. — Ankara, 1963.
Akyüz Kenan. La littérature moderne de Turquie // 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 — Wiesbaden, 1964. — T. 2.
Ali Ekrem. Namik Kemal. — Istanbul, 1930.
Bilgegil M. K. Ziya pasa üzerinde bir arastirma. — Erzurum, 1970.
Dizdaroglu H. Abdülhak Hamit Tarhan. Hayati, eserleri. — Instanbul, 1953.
Dizdaroglu H. Sinasi. Hayati, sanati, eserleri. — Istanbul, 1954.
Bombaci A. Storia della literatura turca. — Milano, 1956.
Gibb E. Y. W. A history of Ottoman Poetry. — L., 1907. — Vol. 5.
Horn P. Geschichte der türkischen modernen Literatur. — Leipzig, 1902.
Kaplan M. Namik Kemal. Hayati ve eserleri. — Istanbul, 1948.
Kisakürek N. F. Namik Kemal. Sahsi, eseri ve tesirleri. — Istanbul, 1966.
Kocatürk V. M. Türk edebiyati tarihi. — Ankara, 1970.
Özön M. N. Son asir türk edebiyati tarihi. — Istanbul, 1945.
Sevengil R. A. Türk tiyatrosu tarihi. Istanbul, 1961. — C. 3.
Tanpinar A. H. XIX asir türk edebiyati tarihi. — Istanbul, 1956.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ЕГИПЕТСКАЯ И СИР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Крачковский И. Ю. Новоараб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Избр. соч. М.; Л., 1956. — Т. 3. — С. 65—85.
Крымский А. Е. История новой араб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1971.
Левин З. И. Развитие основных течен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в Сирии и Египте (новое время). — М., 1972.
Долинина А. А.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араб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Египет и Сирия: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1870—1914 гг. — М., 1968.
Долинина А. А.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араб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Египет и Сирия: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ий роман 1870—1914 гг. — М., 1973.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ИРАК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брахим аль-Ва'или, аш-Ши'р ас-сийаси ал-' ираки фи-ал-карни ат-таси' ашар. — Багдад, 1961.
Йусуф иззад-Дин, аш-Ши'р ал-ираки, ахдафух ва хаса'исух фи-ал-карн ат-таси' 'ашар. —

Багдад, 1958.

Мухаммед Мехди аль-Басир. Нахдат ал' адабийа фи-ал-карн ат-таси' 'ашар. — Багдад, 1946.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КУР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лькаева Л., *Бабаев А.* Туре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 М., 1967.

Вильчевский О. Л.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зарубежных курдских печатных изданий в XX столетии// Иранские языки. — М.; Л., 1945. — Т. 1. — С. 147—181.

Курдоев К. К. Изучение курд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Ираке//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иранской филологии: Тез. докл. — Л., 1962. — С. 31.

Хазнадар М.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урд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1967.

Мухаммед Мела Керим. Хаджи Кадыр Койи. — Багдад, 1960.

Суджади А. Межуй адаби корди. — Багдад, 1952.

Bois T. Coup d'oeil sur la litterature// Revue《al-Machrid》. — Beyrouth, 1955. Mars — avril. — P. 201—239.

Bois T. Connaissance des kurdes. — Beyrouth, 1965.

Edmonds C. A kurdish lampoonist Shaikh Riza Talabani//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 1935. January. — P. 111—113.

Глава пятая
ПЕРСИ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ертельс Е. Э.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персид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Л., 1928. — С. 80—99.

Брагинский И. С., *Комиссаров Д. С.* Перси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1963. С. 74—89.

Аринтур Яхья. Аз Саба та Нима. — Тегеран, 1972. — Т. 1.

Касм-Макаш Фарахани Абулкасем. Моншаат. — Тегеран, 1958.

Browne 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Modern times. — Cambridge, 1953. — Vol. IV. — P. 277—343.

Rypka Jan. Dějing Perské a Tadžicke Literatury. — Pr., 1963. — C. 268—283.

Глава шестая
АФГ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Жобаль Мохаммадх. Негахи бе адабийа-жи моасер дар Афганистан. — Кабул, 1958.

Халил Мухаммад Ибрахим. Эстехрадже-е тарих дар назм. — Кабул, 1958.

Риштин С. Ды пашто адаб тарих. — Кабул, 1954.

Гулами Мухаммад Тулам. Джанг-нали. — Қабул, 1957.
Қашмири Хамид. Акбар-нали. — Қабул 1954.

VIII. ЛИТЕРАТУРЫ ЮЖ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НДИИ

Бычихина Л. В., *Дубянский А. М.* Тами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1987.
Глебов Н., *Сухочев А.* Литература урду. — М., 1967.
Джордж К. М.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алаялам. — М., 1972.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и театр Индии. — М., 1961.
Ламшуков В. Маратх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1970.
Серебряков И. Пенджаб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1963.
Сухочев А. С. От достана к роману. — М., 1971.
Товстых И. Бенга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1965.
Челышев Е.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нд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1981.
Indian Drama. — Delhi, 1956.
The Novel in India: Its Birth and Development. — Ed. by T. W. Clark. — L., 1970.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НЕПА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ганина Л. А. Непа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 М., 1964.
Аганина Л. А. Человек, общество, религ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епальской поэзии. — М., 1985.
Бабурам Ачарья. Пурана каби ра кабита. — Қатманду, 1961.
Шарма Балчандра. Непалко айтихасик руп-рекка. — Бенарес, 1951.
Шарма Балчандра. Бханубхакта. — Қатманду, 1963.
Шарма Джанакал. Джосмани санта парампара. — Қатманду, 1967.
Хридай, Читтадхар. Джигу сахитья. — Қантипур, 1954.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СИНГА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ыхухолев В. В. Синга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 М., 1970.
Минаев П. Л. Очерки Цейлона и Индии: Из путевых заметок русского. — СПб., 1878.
Талмуд Э. 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Шри-Ланки в новое время. — М., 1982.

Godakumbura C. E. Sinhalese literature. — Colombo, 1955.
Gunasekera A. M.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sinhalese language. — Colombo, 1891.
Malalgoda K. Buddhism in Sinhalese Society, 1750—1900: A Study of Religions Revival and Change. — Berkeley, 1976.
Rahula W.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 Colombo, 1956.
Вӣмалакӣрти Мя. Сумангала Ка. Синхала бхāшāавē итихāсая. — Коломбо, 1965.
Викрамасинха Кē. Дӣ. Пӣ. Нуттана синхала сахитйайа. — Коломбо, 1965.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БИРМ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Осипов Ю. М.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ндокитая: Жанры, сюжеты, памятники. — Л., 1980.
Попов Г. П. Бирм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 М., 1967.
Пхей Маун Тин У. Мьянма сапей Тамайн. — Рангун, 1958.
То Зин, У. Пьяза Тамайн. — Рангун, 1965.
Хла Пхей. Мьянма сапей эйкхан садан. — Мандалай, 1969.

Глава пятая
ТАЙСКАЯ (СИАМ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ерзин Э. О. История Таиланд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 М., 1973.
Корнев 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Таиланд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 М., 1971.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стран зарубежной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 2-е изд. — Л., 1971. (разд. 《Таиланд》. С. 362—365).
Прават ваннакади тай, дой Най Плыанг Нанкон. Крунгтеп, 2503.
Schweisguth P. Etude sur littérature siamoise. — P., 1951.

Глава шестая
КАМБОДЖ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и Тхием Тенг. Аксосах кхмае. — Пхном Пень, 1960.
Ним Сает. Правот аксосах кхмае. — Пхном Пень, 1960.
Ом Накри. Тьялана аксосах кхмае. — Пхном Пень, б/д.

Глава седьмая
ВЬЕТНАМ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икулин Н. Вьетнамская поэзия XIX века//《Восточный альманах》. — М., 1973. — Вып. 1.

Nguyên Lôc. Van hos Viêt Nam nua cuôt thê ky XIX. — Ha Nôi, 1976.

So thao lich su van hos Viêt Nam giai doan nua cuôi ky XIX. — Ha Nôi, 1964.

Vu Dinh Lién va cac tac gia khac. Luoc thao lich su van hoc Viêt Nam. — Ha Nôi, 1957. T. 3.

Vu Dinh Lien. Nguyen Dinh Chiêu (1822—1888). — Ha noi, 1958.

Tu tzong di san (Nhu-ng y kien vê van hoc tu the ky X den the ky XX o'nu'o'c' ta) — Ha noi, 1981. — The ky XVIII, tr. 47—103.

Глава восьм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НДОНЕЗИИ И МАЛАКК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Сикорский В. Индонез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 М., 1965.

Salmon C. Literature in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 A provisional annotated bibliography. — P., 1981.

Pramoedya Ananta Toer. *Tempo Doeloe*. Antologi Sastra Pra-Indonesia. — Jakarta, 1982.

Mohammad Taib Osm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lay literature. — Singapore, 1961.

Li Chuan Siu. Ikhtisar Sejarah Kesusasteraan Melayu Baru, 1830—1945. — Kuala Lumpur, 1966.

Глава девятая
ФИЛИППИ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Губер А., *Рыковская О*. Хосе Ризаль. — М., 1937.

Губер А. А. Филиппин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1898 г.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 — М., 1961.

Левтонова Ю. О. Истор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на Филиппинах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 М., 1973.

Левтонова Ю. О. Очерки новой истории Филиппин (60-е годы XVIII — 60-е годы XIX в.). — М., 1965.

Макаренко В. А. Поэзия и поэты земли филиппинской //《Бамбуковая флейта》. — М., 1977. — С. 3—21.

Макаренко В. А. Хосе Рисаль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филиппи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столетия //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и ново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ах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 М., 1982.

Макаренко В. А. Язык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а Филиппинах в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 //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 1970. — № 5. — С. 123—135.

Подберезский И. В. Эволюция творчества Хосе Рисаля // Зарожде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филиппи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 1982.
Подберезский И. В. Хосе Рисаль. — М. , 1985.
Daviel-Maramba A. Early Philippine literatu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1940. — Manila, 1971.
Medina J. B. S. Tatlong panahon hg Panitikan. — М. , 1972.
Tonagbanua Fr. G. A survey of Filipino literature. — Manila, 1965.
Agoncillo T. A. Filipino nationalism, 1872—1970. — Quezon city, 1974.
Valenzuela J. Z.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the Philippine Istans. — Manila, 1933.
Schumacher J. N. The Filipino nationalist'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Europe, 1880—1895. — Wash. (D. C.), 1965.
Schumacher J. N. The Propaganda movement,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Solidarity》(Manila). 1975. — Vol. 9, N 4. — P. 17—25.

Ⅸ. ЛИТЕРАТУРЫ ВОСТОЧ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ЯПО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Григорьева Т. , Логунова В. Япо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 1964.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япо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Пер. с яп. — М. , 1961.
Конрад Н. И. Очерки япо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 1973.
Ёсида Сэйити. Хигути Итиё кэнкю. — Токио, 1956.
Накамура Мицуо. Нихон но киндай сёсэцу. — Токио, 1958.
Накамура Мицуо. Фтабатэй Симэй. — Токио, 1951.
Окицу Канамэ. Тэнканки но бунгаку: Эдо кара Мэйдзи э. — Токио, 1960.
Такахама Кёси. Масаока Сики. — Токио, 1943.
Фукуда Киёто. Одзаки Коё// Киндай бунгаку кансё кодза. — Токио, 1959.
Хомма Хисао. Мэйдзи бунгакуси: В 3 т. — Токио, 1956.
Хомма Хисао. Цубоути Сёё. — Токио, 1959.
Keene Donald.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 Tokyo, 1963.
Marks A. N. and Bort B. D. Guide to japanese prose. — Boston, 1975.
Okazaki Yoshie.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Meiji era. — Tokyo, 1955.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Голыгина Н. И. Теория изящн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в Китае XIX — начала XX в. — М. , 1971.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1840—

1898). — М., 1961.

Ли Жу-чжэнь. Цветы в зеркале. — М. — Л., 1959.

Петров В.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ериодиз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 начала XX в. //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М., 1977. — С. 170—187.

Семанов В. И.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ериода новой истории //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 М., 1972. — С. 585—597.

Семанов В. И. Эволюц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Конец XVIII — начало XX в. — М., 1970.

Товаров В. К. 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и и стихах Гун Цзычжэня (1792—1841). // Вопросы эстетики, поэтики и текстологии литератур Востока. — М., 1977. — Т. 1. — С. 133—149.

Фишман О. Л. Китайский сатир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Эпох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 М., 1966.

Ch'en, Jerome. China and West. Society and Culture. 1815—1937. 1980.

Hummel A.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2 vols. — Wash., 1943—1944.

Lu Hsün.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 Peking, 1959.

Wong S. S. Kung Tzu-chen. — Boston, 1975.

А Ин. Япянь чжаньчжэн вэньсюэ цзи. — Пекин, 1957. — Т. 1—2.

Ван Цзя-цзянь. Вэй Юань няньпу. — Тайбэй, 1967.

Вэй Ин-ци. Линь Вэньчжунгун няньпу. — Шанхай, 1935.

Лин Ти-ань. Чжэн Цзы-инь няньпу. — Чанша, 1941.

Лай Синь-ся. Линь Цзэ-сюй няньпу. — Шанхай, 1981.

Лю Шэн-му. Тунчэн вэньсюэ юаньюань као. Тунчэн вэньсюэ чжуаньшу као. — Тайбей, 1974.

Лян Кунь. Тунчэн вэньпай лунь. — Чанша, 1940.

Сунь Вэнь-гуан. Гун Цзы-чжэнь. — Шанхай, 1985.

Тунчэнпай яньцзю луньвэнь цзи. — Хэфэй, 1963.

Ху Ши. Чжунго чжанхуйсяошо каочжэн. — Далянь, 1943.

Цай Гай-инь. Циндай цибай минжэнь чжуань: В 3 т. — Шанхай, 1937.

Цзян Ши-ди. Линь Цзэ-сюй. — Шанхай, 1981.

Цзян Шу-гэ. Тунчэн вэньпай пиншу. — Шанхай, 1930.

Чжан Цзун-сян. Циндай вэньсюэ. — Шанхай, 1930.

Чжу Сюань. Яо Си-бао сюэ цзи. — Тайбэй, 1974.

Чжу Цзэ-цинь. Гун Дин-ань яньцзю. — Чанша, 1940.

Чжу Чжун-юй. Вэй Юань. — Пекин, 1962.

Чжунго цзиньдай вэньсюэ луньвэнь цзи (1949—1979). Гайлунь цзюань. — Пекин, 1981.

Чжунго цзиньдай вэньсюэ луньвэнь цзи (1949—1979). Сицзюй миньцзянь вэньсюэ цзюань. — Пекин, 1982.

Чжунго цзиньдай вэньсюэ луньвэнь цзи (1949—1979). Сяошо цзюань. — Пекин, 1983.

Чжунго цзиньдай вэньсюэ шигао. — Шанхай, 1960.

Чжэн Вэнь, *Сюэ Цзюнь*. Цзиньдай айгочжуи сысянцзя — Вэй Юань. — Пекин, 1976.

Ю Синь-сюн. Тунчэн вэньпай сюэшу. — Тайбэй, 1975.

Ян Го-чжэнь. Линь Цзэ-сюй чжуань. — Пекин, 1981.

Курата Садаёси. Симмацу минсё-о тюсин тосита Тюгоку киндай си-но кэнкю. — Токио, 1969.

Хорикава Тэцуо. Рин Соку-дзё. — Токио, 1966.

Аоки Масару. Синдай бунгаку хёрон си. — Токио, 1950.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КОРЕ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таблица истории коре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Чосон мунхакса нёндэпхё). — Пхеньян, 1957.

История коре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Чосон мунхак тхонса. — Пхеньян, 1959. — Т. 1—2.

Писатели-классики = Кочжон чжакка-рон. — Пхеньян, 1959.

История коре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Чосон мунхакса. — Пхеньян, 1971.

История Кореи = Чосон тхонса. — Пхеньян, 1977.

История Кореи. — М., 1974. — Т. 1.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ихайлов Г.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монголов. — М., 1969.

Михайлов Г. И., *Яцковская К. Н.*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 М., 1969.

Монголын уран зохиолын тойм.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8. — Т. 3.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Монголии. — М., 1981.

Оюн. Монгольские песни-пьесы.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59.

Heissig Q. W. Geschicht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 — Wiesbaden, 1972. — Bd. 2.

Gombojab J. H. Köke sudur (the blue chronicle). — Wiesbaden, 1973.

Глава пятая
ТИБ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Snellgrove D. L., *Richardson H. 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 — L., 1968.

Stein R. A. Tibetan civilization. — Stanford (Cal.), 1972.

X. ЛИТЕРАТУРЫ АФРИКАНСКОГО КОНТИНЕНТА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 ЯЗЫКЕ ХАУСА

Щеглов Ю. К.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 языках Тропической Африки. — М. , 1976.

Abdulkadir Dangambo. Hausa wa'aji Verse from ca. 1800 to ca. 1970: a critical study of form, content, language and style. — L. 1980.

Greenberg J. Hausa verse prosody//J. Amer. Orient. Soc. — 1949. — Vol. 69, N 3.

Greenberg J. The influence of Islam on a Sudanese religion. — Seattle; L. , 1966.

Hair P. E. H. The early study of Nigerian languages. — Cambridge, 1967.

Hiskett M. Hausa literature//Encyclopedia of Islam. — Brill, 1966. — Vol. 3.

Hiskett M. Mamman Konni: an eccentric poet and Holy Man from Bodinja // African language Studies. — 1965. — Vol. 6.

Hiskett M. A History of Hausa Islamic Verse. — L. , 1975.

Hiskett M.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 L. , 1984.

Hodgkin Th. The islamic literary tradition in Ghana // Islam in Tropical Africa. — L. , 1966.

Last M. The Sokoto Caliphate. — L. , 1967.

Pilaszewicz St. Historia literatur Afrykanskich w językach rodzinnych: Literatura Hausa. — W-wa, 1983.

Prietze R. Dichtung der Hausa//Africa. — 1931. — Vol. 4, N 1.

Smith M. G. The social functions and meaning of Hausa Praise-Singing//Ibid. — 1957. — Vol. 27, N 1.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ФУЛЬБЕ

Зубко Г. В. Фольклор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рода фульбе//Фольклор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родов Африки. — М. , Наука, 1970.

Bâ Amadou Hampaté, *Daget J*. L'Empire peul du Macina. — P. , 1956. — Vol. 1.

Delafosse M. , *Gaden H*. Chroniques du Fouta Sénégalais par Siré Abbas Soh. — P. , 1913.

Mohamadou E. Introduction à la littérature peule du Nord-Cameroun // Abbia. — 1963. — N 3.

Seydou Ch. Essai d'étude stylistique de poémes peuls du Fouta-Djallon//Bull. Inst. Fond. Afr. Noire. B. — 1967. — T. 29, N 1/2.

Seydou Ch. Panorama de la littérature peule//Ibid. 1973. — T. 35, N 1.

Sow Alfa Ibrahim. Notes sur les procédés poétiques dans littérature des Peuls du Fouta-Djallon// Cah. Etud. Afr. — 1965. — N 3, 9.

Sow Alfa Ibrahim. La Femme, la Vache et la Foi. — P., 1966.

Tyam Mohammadou Aliou. La Vie d'El Hadj Omar. Qacida en Poular, par H. Gaden. — P., 1935.

Vieillard G. Notes sur les Peuls du Fouta-Djallon // Bull. Inst. Français Afr. Noire. — 1940. — T. 2, N 1/2.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СУАХИЛ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Becker C. H. Materialen zur Kenntnis des Islam in Deutsch-Ostafrika// Der Islam. — 1911. — Bd. II, H. I.

Hinawy Mbarak Ali. Al Akida and Fort Jesus. — Mombasa; Nairobi; Dar es Salaam; Kampala, 1970.

Knappert J. Four centuries of Swahili verse. — L., 1979.

Knappert J. Four Swahili epics. — Leiden, 1964.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ЭФИОП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айнберг И. 《Сказание Иисуса》: Апокриф о последних временах мира. — СПб., 1907.

Bairu Tafla. A chronicle of Emperor Yohannes IV (1872—1889). — Wiesbaden, 1977.

Chaine M. Histoire du règne de Iohannes IV, Roi d'Ethiopie (1868—89) // Rev. Semitique. — 1913. — T. 21.

Conti Rossini C. La cronaca reale abissina dall'anno 1800 all'anno 1840 // Rend. Reale Accad. Linceq. Ser. V. — Roma, 1916. — Vol. XXV, fasc. 7—10.

Flad J. M. Zwölf Jahre in Abessinien, oder Geschichte des Königs Theodorus II und der Mission unter seiner Regierung. — Leipzig, 1887.

Fusella L. La cronaca dell'Imperatore Teodoro II di Etiopia in un manoscritto amarico// Ann. Ist. Univ. Napoli. N. S. 1957—1959. — T. VI—VIII.

Littman E. The Chronicle of King Theodore of Abyssinia. — Princeton, (N. Y.), 1902.

Mondon-Vidailhet C. Chronique de Théodros II, roi des rois d'Ethiopie. — P., 1905.

Moreno M. La cronaca di re Teodoro attribuita al dabtara 《Zaneb》 // Rassegna di Studi Etiopici. — Roma, 1942. — Vol. 2.

Pankhurst R. Ethiop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thiopia Observ. — Addis Ababa, 1963. — Vol. 7, N 1.

Ricci L. Una cronaca breve in amarico sul regno Yohannes IV, re d'Etiopia // Riv. studi

orient. — 1947. T. 22.
Rubenson S. The survival of Ethiopian independance. — Stockholm, 1976.

Глава пятая
БУР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Antonissen Rob. Die Afrikaanse Letterkunde van die Aanvang tot Hede. — Pretoria; Kaapstad, 1955.
Dekker G. Afrikaanse Literatuurgeskiadanis. — Sesde druk. — Kaapstad; Bloemfontein; Johannesburg, 1961. — D. l.
Conradie E. J. M. Hollandse Skrywers uit Suid-Africa. — Amsterdam; Pretoria, 1934. — Bd. 1: 1652—1875.

中文版编后记

《世界文学史》第七卷的译本统筹与校订工作由陈松岩担任，译者的分工如下：

陈松岩翻译本卷编者的话，本卷总序，第一编序言中的第六至八节、第十四节、结语，全俄文学发展进程导言，第一编第八章，第二编第五至八章，第六编，第九编序言、第二至五章，全卷结束语及人名索引；王立刚翻译第一编序言中的第一至二节、第五节，第九编第一章；荀波淼翻译第一编序言中的第三至四节；王国鹏翻译第一编序言中的第九节、第十节（与鲁蒙初合译），第三编序言；陈思红翻译第一编序言中的第十一节；叶芳芳翻译第一编序言中的第十二至十三节；彭爱民翻译第一编第一至二章、第五至七章；周宇翻译第一编第三至四章、第九章；周清波翻译第二编序言、第一章第一节、第十二节；杨楠翻译第二编第一章第二至四节；刘雯翻译第二编第一章第五至六节；刘阳翻译第二编第一章第七至八节；田碧菲翻译第二编第一章第九节；任聪翻译第二编第一章第十节；王熙骋翻译第二编第一章第十一节；杨世招翻译第二编第二至四章、第九至十六章；陆琪玮翻译第三编第一章；陈若君翻译第三编第二章；高雅琪翻译第三编第三至四章；刘红萍翻译第三编第五章，第十编第三至五章；吕行翻译第三编第六章，第十编序言、第一至二章；刘娴真翻译第三编第七章，第八编第一章第四至六节，第八编第二至四章；蔡捷翻译第三编第八章，第八编序言、第一章第一至三节；王蕊翻译第三编第九至十章，第八编第五至九章；张天宇翻译第三编第十一章，第七编序言、第一至二章；穆路遥翻译第三编第十二章，第七编第三至六章；王璐翻译第四编第一章第一节；刘晓敏翻译第四编第一章第二至三节、第二章第二节；申茜翻译第四编第一章第四节；王琰翻译第四编第一章第五节；尹旭翻译第四编第一章第六节；施天驰翻译第四编第二章第一节；吴娜娜翻译第五编序言、第二章；金美玲翻译第五编第一章。

此外，尹旭、袁勋、赵振宇、金珊翻译了俄文原版附于卷末的共时年表，由于种种原因，该部分内容未能收入此次出版的中译本《世界文学史》。

由于工程浩繁，翻译、审订及出版的过程历经曲折，耗时良久，编辑进程中也曾遇到诸多难点，虽已尽力处理，但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专家不吝指正。

最后，衷心感谢曾为本书的翻译出版付出心血的各界人士。

2013 年 12 月